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

美国总统的诞生

1960

Theodore H. White

[美] 白修德 ——— 著　　舒琦　赵仁涛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总统的诞生

作者:[美]白修德

译者:舒琦 赵仁涛

ISBN:978750866837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谨以此书献给

海登（Hyden）和戴维（David）

序言

白修德［朋友称他为特迪（Teddy）］1961年出版本书时，已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出色记者了，他不仅报道事件，而且试图影响事件。白修德1938年从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专业毕业时，荣获一笔奖学金，这使他有幸前往中国重庆。到那里不久，他就成为《时代周刊》的记者。由于希望真实记述纷乱动荡的战时事件（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即将爆发的革命反对力量），白修德与蒋介石的审查官员以及《时代周刊》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发生了冲突，时任周刊编辑试图粉饰白修德对国民党政权失败的报道。

白修德随后创作了《中国的惊雷》，书中真实揭露了倒行逆施、日趋丧失人心的蒋介石政府。白修德披露的真相也反映了美国驻中国外交人员的不满，他们预测国民党政权将在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国内战争中分崩离析。

白修德于1948—1953年在欧洲度过了6年时间，主要报道日趋激化的冷战。但是希望影响和记录新闻事件的热情促使他回到美国，以便详细阐述国内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他认为，认识并帮助公众了解时事的最佳方式是探索性地真实记述总统选举。1960年好像就是一个绝佳时机：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F·肯尼迪之间的政治角力使1960年成为里程碑时刻。尼克松是1836年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以来首个竞选总统的现任副总统，也是希望问鼎白宫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肯尼迪有望成为首个问鼎白宫的天主教徒和最年轻的候选人。

本书1961年一经发行就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被誉为“颠覆政治报道技巧的佳作”。过去，报纸和杂志安排记者报道竞选活动的每日进程，而白修德则率先将报道变成纪事书籍。在四卷总统选举丛书中，这一本尤为成功。他的系列丛书也真实报道了后来的三次选举。

在本书1988年再版发行的引言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认为它的恒久魅力就在于“白修德不仅报道了候选人，而且记录了整个美国”。正如赖斯顿所认为的，也正如白修德所希望的是：这本书是了解一个变化中的国家的一扇窗口。

从2009年的角度来看，白修德对1960年竞选对垒的详细记述不仅承载着历史，也是时代的产物。白修德无疑抓住了竞选各方旗鼓相当角力选战的戏剧性。他对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及其提名对手——民主党阵营的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以及共和党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生动刻画，始终表现出他善于抓取人物生平细节的出色能力。他不仅生动描述了竞选总统的候选人，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周围的人员，这些人包括：肯尼迪的兄弟，博比（Bobby）和特德（Ted）；特德·索伦森[注]，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肯尼迪的波士顿帮和尼克松的加利福尼亚助手，他们都是管理和开展竞选活动的得力干将。

白修德书中的许多内容在涉及1960年选举的历史档案和传记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如果希望了解选票竞争的刀光剑影以及肯尼迪如何以0.1%的微弱优势战胜尼克松（肯尼迪49.7%，尼克松49.6%，另外0.7%的选票落入其他候选人的手中），请认真研究白修德对如下方面的描述：民主党初选、两党代表大会、尼克松和肯尼迪辩论、各方为击败对方而使用的竞选策略（包括各自对民权和黑人投票的反应，以及对最终计票统计的分析）。

人们一致认为，白修德对肯尼迪和尼克松在首轮电视辩论中的显著差别所进行的描述是令人难忘的：肯尼迪“看起来那么镇定自若。与之相比，副总统则表现得紧张、胆怯，阵阵流露出阴郁神情，有时看起来面色憔悴，透着一种病态……副总统半佝偻着身子，敷在脸上的‘懒汉剃须粉’（Lazy Shave）被汗水冲出若隐若现的沟痕，双眼凹陷，眼神无光，下颌、面颊和脸部也由于紧张下垂着”。白修德对人物生动鲜活的描写始终是本书的最大魅力。

作为历史，本书存在某些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言，历史学家在试图了解现在时，就如同一个人将鼻子紧紧贴在镜子上试图观察全身。回想往事，显然可以发现一些疏漏：关于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美国和苏联之间所谓的导弹差距，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古巴所做的交易，国内经济的衰退，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斗争，老年人医疗保险，联邦对教育（1960年的学生）提供补助等问题均有待研究。

对于两次竞选鲜为人知的方面也是如此。即使白修德知道肯尼迪沉溺女色难以自拔，他也会像当时的其他主流记者那样对此秘而不宣，他们遵循1960年的惯例：此类信息仅限于私人谈话。同样，即使白修德知道约翰·肯尼迪有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他也会对此讳莫如深。不过更可能的是，

除了已经公开的背部手术，肯尼迪在20世纪50年代9次住院也仅是42年之后才对外公布的“既定事实”的一部分。

关于1960年的这个男人和候选人——肯尼迪，这些也不会是最终的披露信息。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密封保存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里面的500页口述历史直到她去世50年之后才能被开启——距今还有35年的时间。我曾问图书馆馆长，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否会发现肯尼迪夫人的回忆录颇具价值，她除了回答“当然！”以外，没有透露任何内容。

或许本书最大的不足就是充满浪漫色彩地将肯尼迪总统描述为一个身披铮亮盔甲的威武骑士。白修德认为他是一个智慧超群、高瞻远瞩的人。在他投入竞选之际，白修德认为：肯尼迪已经“驾驭左右美国政坛的所有政治掮客和势力”。他“也是一个满腹经纶、口才出众、有雄才大略的天才”。白修德将总统职位置于顶礼膜拜的崇高地位：“总统职责，”他写道，“是可以被编制成册的……总统的职责和权力涉及方方面面。”但使总统职位充满特殊性的不仅是肯尼迪和赋予他的职位权力：这位候选人周围的谋士们均各尽其才。白修德大胆地指出，“如果发生了危机，他立刻可以得到必要的情报，所有的备选方案均已被周密策划，几乎不可能发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愚蠢行为”。

人们禁不住疑惑，当肯尼迪于1961年4月在猪湾事件中失败后，这种描述如何令读者信服？在这次夭折的行动中，将近1 500位古巴流亡分子由于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计划失败而被杀死或俘虏。在训练、招募和运送入侵者时，肯尼迪政府显然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失败也令总统极其尴尬，他禁不住自问：“我怎么会如此愚蠢？”

在一些方面，白修德对于总统不切实际的描述反映了那个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国家一直在寻求前进方向和英明的领袖。虽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1961年1月卸任时依然深受欢迎，但整个国家情绪低落：国内经济衰退和苏联通过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突出其优越性的宣传，均使数百万美国民众感到失落。新闻界和国会认为迫切需要重新确立美国的国家目标。对于白修德而言，本书的宗旨就是作为一种振臂呐喊的方式——提醒国民不要忘记，美国制度和领导人在全世界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这一切随着以下系列事件的发生而逐渐成为记忆：林登·约翰逊的言行不一，使5.8万名美国大兵命丧他乡的越战失败，由于滥用权力而致尼克松1974年辞去总统职位的水门事件，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业绩惨淡的一届总统任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期间的伊朗门事件，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对经济衰退的束手无策使他在1992年丧失总统宝座，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遭弹劾，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战争以及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低的总统之一。

白修德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他在客观记录历史方面的局限性。“虽然以后的历史学家将以更加翔实的事实资料和更准确的术语来讲述1960年发生的这段权力争夺过程，”他在作者按语中写道，“然而，当一位当代记者试图对那些寻求领导60年代美国的人所表现的喜怒哀乐、紧张疲惫、欢欣鼓舞和犹豫不定进行记录时，他的记录无疑蕴含着某些恒久价值。”

过去50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使理想随之破灭。在2008年大选之际，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强调重燃希望，其竞选口号是：“是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使人们回想起肯尼迪誓将美国带入“新边疆”（New Frontier）的1960年承诺。如果白修德创作《美国总统的诞生，2008》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它将和本书非常类似——使用生动形象的笔触记述奥巴马以及他如何意气风发地号召全国上下众志成城，继续约翰·肯尼迪当年发起的改革运动，努力应对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挑战，保证国家的未来和平与繁荣。

白修德能够迅速收集并生动记述的翔实细节使本书仍然被认为是关于选举的宝贵原始资料，也是美国政治著作的重要文献。虽然通过有线电视网和博客实时报道总统选举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但任何方式也不能再现一部400页专著对一场选举所进行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白修德树立了电视抑或网络均不能替代的标杆。本书的再版发行也许将激励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回到他的方式——对此种报道的优势和挑战都同样关注。深度政治纪实题材的复兴或许能再次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总统们是如何赢得美国政治桂冠的。

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
华盛顿特区
2009年7月9日

---

1. 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律师和作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主要演讲撰稿人，也是肯尼迪总统的亲密助手。肯尼迪总统曾称他为“知识输血库”。——译者注

作者按语

本书旨在大致讲述美国人在1960年是如何选举总统的。

无人能够面面俱到——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选举总统时所涉及的权力交易是如此复杂，以至于那些身涉其中，甚至竞选总统的人对它的了解也不过是冰山一角。政治的本质就是这样，人们的行动必须始终基于不确定的事实，在当日报告的基础上，凭借其本能以及之前在其他环境中所积累的经验，仓促做出判断。否则，政治将不是现在的样子——管理和领导艺术；政治将是一门精密科学，我们的目标和命运将由冷冰冰的伟大计算机决定。

我认为，虽然以后的历史学家将以更加翔实的事实资料和更准确的术语来讲述1960年的这段权力争夺过程，然而，当一位当代记者试图对那些寻求领导60年代美国的人所表现的喜怒哀乐、紧张疲惫、欢欣鼓舞和犹豫不定进行记录时，他的记录无疑蕴含着某些恒久价值。对于我而言，政治的核心始终是领导人物在强大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非凡素质。

我的创作以1960年渴望问鼎总统宝座的7个人为起点，作品充满个人化色彩，许多人对此不予苟同，但这是本人的最合理选择。我在1959年秋天就开始创作本书，从那时直到1960年11月8日，我一直努力密切关注许多相关人物的行程和想法。我花费数月时间将本人在这些行程中的所见所得整理到了纸上。

我曾得到太多人的慷慨帮助，请原谅不能逐一列述。同时在当代政治报道中，情况更加复杂。历史学家必须列出其信息来源以及具体参考的资料。但是对于那些友好提供信息的人，记者有责任保护他们的隐私。我是以记者的身份撰写本书，因此我选择隐匿所有那些友好慷慨的朋友，而不是列出有失偏颇的致谢名单，但文字和脚注个别提及者除外。

不过，我不能不提请读者注意我的两位伙伴。如果说本书值得一读的话，他们是功不可没的。其中舒托·戴尔（Chouteau Dyer）的出色报道技巧以及在语言韵律方面的非凡能力为成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的成功出版也离不开雪利·法默（Shirley Farmer）的洞察明鉴、宽厚优雅和鞭策鼓励。

此外，我还要对以下人士深表谢意：

首先，感谢美国的政治家——长久以来，我发现他们是快乐自信、精明强干和值得尊敬的一群朋友。无论哪个州，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的建议都深深影响着本书的每页内容。

其次，我必须感谢我的新闻同行——他们对各级美国政治的报道年复一年地净化、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制度发展。若没有他们的共同信念和出色的新闻报道，本书不可能成功付梓。

Part I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第一部分

第1章

等待

一如以往，暗战在悄然进行。

午夜时分，人们依惯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开始投票了，距肯尼迪起床还有七个半小时。其手下之前已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哈特镇搭起了帐篷，向村里的12个登记选民分别发放了亲笔签名照片。他们知道那里有5票是确定无疑的——尼克松已板上钉钉地赢得了5票，但尚有2票去向不明。这里值得一搏，因为当人们喝着咖啡翻看晨报的时候，哈特镇的结果将是映入上千万选民眼帘的第一条快讯。不过从此之后，一切都难以预测——暗战在悄然进行。

肯尼迪在8点30分离开波士顿酒店的时候，数百万人已经投票了，他们遍布各地——学校、图书馆、教堂、商店、邮局。这一切也是悄然进行的，但毋庸置疑，此时此刻的投票结果绝对是共和党占尽优势。在选举日，晚上五六点钟之前，美国是共和党人的天下。当天的最后几个小时，上班族及其家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晚饭后开始投票；接着当夜幕降临时，风头开始转向民主党了，这正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一切都难以捉摸，其特点是，当竞选活动在进行时，令人感觉雾里看花，成千上万的人汇聚成溪，形成一个个谜团，任何人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当然，这些谜团整合汇集的结果就是形成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权力交接——统帅和调动军队的权力，发动战争的权力，征税和毁灭的权力，破立予夺的权力和责任，指挥和恢复的权力与责任，一切都集于一人手中。自古罗马和雅典时期，英雄豪杰和睿智哲学家、英勇无畏的人和卑鄙邪恶的人，都曾试图有效解决这种独特的权力交接；长期以来，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做得更好。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除了人们在教堂或学校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伙人焦躁不安地在雨中等着进入投票间，其他都显得风平浪静。在选举日，没有喧闹的乐队，没有游行队伍，没有荷枪实弹，在隐秘的总部没有阴谋诡计。漫长秋季选战的喧嚣与号角、乐队与呐喊、集会与演讲随着选举日的到来，都已渐行渐远。所有策划已经结束，一切努力已经付出。现在，肯尼迪必须等待。

肯尼迪从酒店出发，驱车行驶在队伍前面，目的地是波士顿公立图书馆弃用的西区旧馆。阅览室里现在挤满了波士顿西区的无数移民和他们的孩子，这两代人直到一年前才登上这个将引领他们走向幸福、摆脱贫困的“梯子”。废弃荒凉的图书馆空空荡荡，现在是第六行政区第三选区的投票点。上午8点43分，他投下郑重的一票，登记姓名是波士顿鲍登大街122号约翰·F·肯尼迪。

他投票时看起来有点儿紧张，周围簇拥着同一伙形影不离的记者。这群记者摩肩接踵地跟了他3个月，行程遍布全国；妻子随着他会见了媒体，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这样的推推搡搡会对妻子造成什么影响，毕竟她怀有8个月的身孕。从投票间出来时，他自己走到镜头前。然后，这支最后的车队继续前进，还是按熟悉的选战顺序——摄影师的车打头，肯尼迪的车排第二（敞篷车的顶部关闭了，他不想让妻子感冒）。安保车辆紧随其后，三辆记者大巴最后压阵。车队迅速地驶出西区，走过肮脏破败的斯科雷广场，穿过隧道，前往东波士顿和机场。这里曾经是他赢得首个政治胜利的福地——马萨诸塞州第十一国会选区。这片土地上聚集着不同种族的移民，包括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部分黑人以及少数北方人。

在整整一年的行程中，他都是步伐矫健地登上同一架飞机，临别时的优雅举止是所有随从再熟悉不过的——和达官政要最后握手，突然转身并快步跑上舷梯，最后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接着进入家一般舒适的“母舰”号飞机和安全区。

今天早上，他走上舷梯时步履滞缓，灰色西装外披一件深蓝色的马海毛大衣，没有戴帽子，背部略显佝偻。他太累了。走到舷梯顶部时，他暂停下来，身子依然微驼，转过脸。然后，他缓慢转向门口，没做任何动作，身影随即消失了。这一次，他将去海恩尼斯港（Hyannisport）：飞机航程只有25分钟；没有任何打扰；飞机里都是祝贺的消息；在科德角迎接的人减少到几十个，无须再做演讲。

他到达海恩尼斯港时，有100多位记者和其他飞机上的80多位工作人员随行。片刻时间内，紧张感又可笑地涌了上来。在他们中间，许多人自劳动节以来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行程差不多有44 000英里。其中一位记者神色不宁地拦住他，不断抱怨说一直被阻挡着近距离观察他，她作为记者可以轮流接近他的权利被剥夺了。他对这位记者印象不错，知道她一直忠心耿耿，另外他也是敌友分明的人，于是转身郑重其事地说：“你和我是永远不会分开的，玛丽。”然而他和其他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梦想成真，他和这些曾经是亲密朋友的人将永远分离——遥不可及。

一支由当地政界人物组成的喧嚣队伍聚集在一起，准备带着他穿越城区。再举行选举游行？他真受不了了。他转身走向表妹安妮·加根（Anne

Gargan）驾驶的一辆车，吩咐前往其家庭夏季别墅；警察已将这里包围起来并设了路障。在路上，警察护送人员得到命令，在他坐车回家时，将浩荡的记者队伍和其车辆隔开。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他今年第一次希望独处。

当他再回来与媒体和群众见面时，有可能就是威风八面的下届总统了。不然，他就是一个仅在史书中充作脚注人物的落选之马。现在，除了等待，别无可做。

那天，海恩尼斯港和新英格兰的所有地方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海恩尼斯港有100多座村舍和夏季度假别墅，这些建筑散布在海恩尼斯村（Hyannis，人口不到6 000人）西侧附近的南塔基湾水畔。这里属于巴恩斯特布尔镇（Barnstable Township，巴恩斯特布尔县的县政府所在地），是科德角夏季最受人欢迎的度假中心。房子高大宽敞，护墙板和屋面板刷成了白色和褐色，各自被篱笆或新英格兰式石墙隔开，它们之间有修剪整齐的草坪。海恩尼斯港秉承精致简朴的新英格兰老式风格，建筑讲究低调舒适，这一点和纽约富豪趋之若鹜的长岛汉普顿斯不同。世世代代，波士顿的优渥家庭在此安家是为了享受真正的惬意；32年前，肯尼迪家族是第一批打破这里宁静的爱尔兰人。周围院落很大，里面建有多座房子，它们位于斯卡德大道（Scudder Avenue）一端，沿大街可以延伸到水畔；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为了他那群出色孩子的生活，购买了一座有17个房间的房子。时光荏苒，他的儿子杰克在同一个院子又买了一座房子，距老房子仅有数百英尺；几年之后，博比购买了第三座房子。这三座房子围着同一片绿茵茵的平坦草坪，呈三足鼎立之势。草坪延伸逐渐变成沙丘草，然后突跌进入海滩沙地（现在，父亲的房子外飘扬着美国国旗）。

当地的人们对于肯尼迪家族从未多么喜欢，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外来侵入者。虽然毗邻而居的一些人已渐渐成为朋友，但多数邻居在1960年夏季曾经很是烦恼；这一年，杰克获得提名之后，成群结队的新闻记者、工作人员和好奇的游客总是围着肯尼迪，本来宁静的街道好像也随之沸腾了。洛杉矶大会之后，公民委员会曾为防止局面失控而召集非正式会议，他们甚至建议警察局将海恩尼斯港和公众完全隔离，警察局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些成员威胁要抗议聚会。为了平息人们的愤怒，杰奎琳·肯尼迪着手在欧文大道（Irving Avenue）修建一道木栅栏；从这个位置算，前门距公路正好是13英尺。但是当她丈夫从提名大会回来时，他下令立即停止栅栏施工。除了不离开海恩尼斯港，他将尽力与公民委员会配合。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他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夏天。他计划一直把这里当作家。最后仅有一道尚未完工的木栅栏、白色尖桩篱笆和12个当地警察将3座别墅和坐着狗仔队的汽车隔开。警察彬彬有礼，办事高效，也善于配合。即使那一

天尼克松对肯尼迪的投票结果是4 515比2 783，巴恩斯特布尔镇也算仁至义尽了。

11月到了，新英格兰的阔叶树——橡树、榆树和枫树随着叶子的飘落而褪去色彩，科德角的短叶松逐渐露出饱经风霜、历经飓风洗礼的锈褐色枝端。海上的微风略过，水面波澜不惊；随着微风吹过，沙丘草和滩涂地上毛灰色的乔木丛轻轻弯下腰。一只海鸥整个早晨不断盘旋在房子和海滩上空，当猎物闪现微光时，就立刻俯冲到水面。天空纯净如洗，气温零摄氏度以上，舒适宜人；风力逐渐增强，空中的浮云在晚上开始消散。

从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到阿利根尼山脉（Alleghenies）的顶部，碧空万里，正是选举投票的好日子。但是从密歇根州一直到伊利诺伊州和北部大平原各州，阴云密布：底特律和芝加哥飘着雨，在落基山脉附近的一些州，天上还下着小雪。南部地区向北一直到俄亥俄河，天气温和宜人；整个太平洋沿海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天公作美加上全年的努力，本地及其他各州的自由投票人数创了纪录——总计68 832 818人，比1956年增加11%。

但是，现在一切都无能为力了。人们已在不断投票了，他们五花八门的动机、直觉、教育、传统、担心和希冀此时将左右最终的结果。

肯尼迪因此变得忐忑不安。

他在父亲那里吃的早餐（隔着草坪与他的房子相对）。肯尼迪家族的9个人已围坐在餐桌边：他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弟弟罗伯特和弟媳埃塞尔（Ethel）、小弟爱德华和弟媳琼（Joan），以及姐夫彼得·劳福德（Peter Lawford）。在上午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其他的成员悉数到场——妹妹尤妮斯·施赖佛（Eunice Shriver）和妹夫萨金特·施赖佛（Sargent Shriver）、妹妹帕特·劳福德（Pat Lawford）、妹妹珍和妹夫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

肯尼迪迅速地吃完早餐。为了找个能独处放松的地方，他回到个人别墅，暂时坐在走廊里晒太阳，身子外面裹着大衣，以抵御阵阵袭来的寒意。数月来的车马劳顿已使他筋疲力尽了。一位助手走上前来和他聊天——他们谈到了诺曼底登陆日；助手至今还记得他谈到在这个漫漫长日里静心等待的重要性，还谈到了隆美尔将军注。他们交谈时，一家报社的飞机盘旋在房子上空，为了拍照，滑翔到距草坪200英尺的地方——如果他来日当选了总统，其周围数千英尺的地方是不准有任何飞机飞行的。他的一些邻居为了祈求好运，通过卫兵送来红玫瑰拼成的马掌吉祥物注，吉祥物高达10英尺；礼物送给他时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如果他当选了，未经特勤

局拆检，任何此类物品不会再被直接送到他的手中。他想起落下了某个东西，于是派一位信差到飞机里去取。这是他在一年的行程中为3岁的女儿卡罗琳（Caroline）带回的一大麻袋玩具。泰迪熊用玻璃纸包着，几乎和卡罗琳本人一样大。信差还记得回来时厨房里传出烘焙棕色贝蒂布丁的芳香。他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走过草坪，待了一会儿。有人看到父亲紧紧地抓着儿子紧握的拳头，但没人听清他们说的是什么。

中午时分，一群摄影记者前来为他正式拍照。据记者们说，他只给他们紧张仓促的10分钟。几分钟后，他从房子里出来了，手里牵着卡罗琳，看到两位活跃分子——他的弟弟博比和特德正在草坪上踢足球。他示意传球，和他们一起踢了几分钟，卡罗琳在一旁观战，随后他又回到屋里和妻子共进午餐。他心里仍然忐忑不安，午餐后，走过草坪，身穿一件运动衫和茶色休闲裤，外套一件厚毛衣（说下他的鞋子，一只鞋子像平时一样擦得锃亮如新，而另一只鞋子则破损肮脏了），打算前往在弟弟博比家里建立的指挥部；为方便晚上值班，里面杂乱无序地安装了30部电话、4台新闻社电传打字机以及全国各地的专线。后来在下午3点30分的时候，他回到自己家里准备小憩一会儿。

太平洋沿岸标准时间15分钟之后，准确地说在3点45分，理查德·尼克松也回到他在洛杉矶的酒店准备打个盹儿。投票结果陆续返回。这些数据对于两人来说虽然捉摸不透，但也够让人心烦的。到傍晚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在一英里半之外的海恩尼斯国民警卫队军械库（Hyannis’ National Guard Armory），当地和国内外媒体的大约250位男女记者聚在一起，准备报道下届当选总统的晚间新闻发布会。在洛杉矶的国宾大酒店（Ambassador Hotel），情况也是如此。

肯尼迪的两位先遣人员仅在一周之前才到达海恩尼斯，着手将科德角这个冬天通常落窗关门的夏季度假别墅改造成两大选举中心之一，世界各地可以从这里获得下届新总统的消息。他们的工作不仅认真而且出色，因为此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资金有点儿捉襟见肘了，给海恩尼斯选举中心改造项目拨付的总资金仅为8万美元。如果民主党失败了，即使这些钱也是花多了，赤字状况将雪上加霜。

这两位先遣人员设法说服马萨诸塞州国民警卫队允许将军械库作为新闻通信中心。他们也动员了一家当地的电视经销商捐赠12台电视机用于军械库和肯尼迪的别墅。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安装了100多条专用长途电话线和50多台电传打字机，由新闻采访机构负担相关费用。这座夏季度假别墅现已人去楼空，两位先遣人员设法征用了这座空间宽敞的建筑，同时擅自将多余房间分配给250位记者、80多位工作人员及其妻

子。当地木材公司捐赠了木材，一位当地的木工也被说服了——免费搭建新闻中心隔板和平台是一件荣幸的事。当地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商出借多辆全新汽车（包括10辆雷鸟）供肯尼迪的工作人员使用。桌椅和板凳都是由当地的新教徒教堂捐赠的（当地天主教堂由于某种微妙原因，不愿意这样做）。到投票日清早的时候，巴恩斯特布尔县国民警卫队训练用的高射炮已从军械库大厅运走，凳子已安装完毕，按字母顺序向250位记者分配了座位，从纽约运来的方平织纹的厚布已经悬挂好，新闻中心的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在美国的选举之夜，习惯上对要点新闻进行一番概述，虽然这种概述由于计票技巧的原因而存在人为、虚假和牵强的色彩，但还是令人激动并具有指导意义的。在美国，大量民众的投票是同步进行的；投票结束，计票方才进行。计票顺序使这一过程就像一场叙事大戏；虽然是一场虚幻大戏，但仍然富有启发性。

通常，新英格兰北部首先传来结果，北部山区洁白的小村庄大部分是清教徒，共和党在这里具有压倒性优势，每个村庄你追我赶地争上新闻头条。随着他们的名字闪过早报，上午10点左右，他们暂时性地家喻户晓了。到下午晚些时候，这个地区乡村和山区县镇也逐渐传来结果。田纳西州的农村地区在下午4点钟结束投票；一个小时之后，肯塔基州东部开始结束乡村投票，亚拉巴马州的乡村也是如此；缅因州选区的投票也已结束，选民不到300人。这时，堪萨斯州（以共和党人为主）传来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今年在这个州，单独计票纸和单独投票使一些堪萨斯社区在一整天边投票边计票。人们下班回家后，从下午晚些时候报纸的报道看，共和党处于领先地位。

接着在6至7点钟，形势发生了变化。6点钟，亚拉巴马州乡村、伊利诺伊州乡村、印第安纳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何马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乡村和佛蒙特州都结束了投票。6点30分，北卡罗来纳州和俄亥俄州结束投票并开始检查登记工作。7点钟，大城市民主党派的投票结果汹涌传来。

7点钟过后几分钟，东北部工业区的政治形势首先明朗化——康涅狄格州在7点钟就结束了投票，由于是机器投票，计票也非常迅速。7点15分，民主党的工业堡垒——布里奇波特市（Bridgeport）、纽黑文市（New Haven）、哈特福德市（Hartford）纷纷传来结果。15分钟后，纽约共和党高层大本营——费尔菲尔德县（Fairfield County）的郊区城镇稍缓传来的结果也统计完毕。康涅狄格州是一个改变投票走向的州，费尔菲尔德县的共和党主力和工业城镇的民主党主力势均力敌时，决定选战走向的真正迹象首先显现出来。在1956年投票日的7点30分，布里奇波特市拒绝了阿德莱·E·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时，立刻表明工业城镇的拒绝意味

着艾森豪威尔在全国大获全胜。

当新闻系统和电视解说员完成对康涅狄格州的分析梳理之后，东部民主党派盘踞的大城市也开始不断传来消息。首先是费城（投票在7点30分结束），随后是匹兹堡、芝加哥；9点钟，是纽约市。从9点钟纽约市结束投票开始直到半夜，随着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各大城市的消息淹没新闻网络的投票收集系统，民主党的势头达到高潮。

10点至午夜时分，美国在政治上已群龙无首——除了大型广播公司和两家大型新闻社驻纽约的总部，整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信息中心。在选举之夜，任何候选人和党派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大众传媒的新闻采访资源；因此，和每个坐在家里观看电视或收听收音机的公民一样，他了解的情况和任何他人没有差别。在这些时间里，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任何人再也不能左右这场竞争美国最高权力的伟大运动了。投票已经结束。无论好坏，无论结果如何，美国都将接受这一选择，任何反对声音将被淹没，即使对于数百万人而言，这个选择和他们的投票相反。公众投票是表达国民意愿的一种方式，是替代暴力和流血的唯一方案，和人类维护文明一样，必须维护国民的决定。

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中国都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意愿表达方式。在现代历史上，只有另一个伟大民族曾尝试通过自由的大众普选方式来直接选举领导人，那就是德国魏玛共和国，其统一投票的模式以美国做法为基础。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实验尝试，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美国人则选出林肯、威尔逊、两位罗斯福。当投票结果陆续涌入时，一切都无计可施了，白宫及其权力将移交到两位候选人其中之一的手中。早晨来临时，所有人都将知道结果。但在这段时间里，历史的长河停止了流动。

如果民主党要获胜，他们必须在午夜之前赢得数百万张选票的较大优势。午夜之后，随着农业各州、山区各州、太平洋海岸开始核对其传统的共和党票数，形势会出现逆转。这种情况每隔4年都会重复上演，选举之夜宛如上演着情节变幻莫测的大剧：下午和傍晚时不断传来共和党的投票结果；8点至午夜时分是民主党潮起云涌的时刻；午夜之后，共和党派又发起反攻。

对于选情的潮起潮落，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能为力，除了电视和收音机近期给他们提供了敲边鼓的机会。在选战中，最后的边鼓声是否响起，需要看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通常在7点钟结束投票，7点30分之前就知道结果；和以太平洋沿岸时间为标准时间的加利福尼亚州相比，它有3个小时的优势。当康涅狄格州的时间是8点时，加利福尼亚州只是下午5点钟。就像1956年一样，如果康涅狄格州早期传回的结果表明共和党人大获全胜，

将使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投票工作人员感觉好像希望破灭，他们往往身心疲惫地回到家和总部，和朋友一起舔舐受伤的心。相反，如果康涅狄格州的结果表明民主党遥遥领先，它将激励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员——理论上大约如此——继续加倍努力，争取其余的登记选民、拖拉的选民在太平洋时间7点钟之前抓紧投票。追随胜者、见风使舵的心理可能将影响10万、20万或50万的加利福尼亚州选票；反之，如果看起来有一线希望的话，危机心理可能会促使慢腾腾的人们冲出家门投下其信任的一票。两党都在密切关注着康涅狄格州在选举之夜的选情，以便为了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投票而尽快把结果传过去。（从过往来看，人们对于结果的理解是相互矛盾的。在加利福尼亚州6 507 000张选票中，尼克松的优势是千分之一——35 623张。有人说是胜利了，因为艾森豪威尔在东部时间8点钟——太平洋时间5点钟就通过无线电波来应对康涅狄格州结果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影响；有人说，双方不分伯仲，因为民主党为了迅速传送结果，已做好有效准备。）

这种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于是在高大宽敞的军械库里，下午的时光过得轻松悠闲，香烟的烟雾逐渐弥漫了大厅。约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肯尼迪短暂地休憩了一下，全国等待着海恩尼斯的军械库和洛杉矶的国宾大酒店报告正在发生的一切。确实根据早期的报告，新英格兰、阿巴拉契亚山和堪萨斯的村庄铁定支持共和党人——这是正常结果。另一方面，芝加哥选举委员会的锡德·霍尔茨曼（Sid Holtzman）清早在电话里对肯尼迪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估计芝加哥93%的登记选民将在那天投票——这次投票数量很大，所以是肯尼迪在大城市的意外收获。

6点25分，肯尼迪在家族宅邸的指挥中心向军械库提供了最初少量的重要消息。肯塔基州坎贝尔县（Campbell County）自古以来就是与胜者为伍，这里最初的统计结果通过电话传到了总机；根据传回的一半结果来看，坎贝尔县有56%支持肯尼迪（5 300张选票），而尼克松的得票率为44%（4 100张选票）。1956年，共和党赢得了坎贝尔县64%的选票，民主党得票率仅为36%！这是否预示全国选情的变化？

此时任何人都没有把握，消息通过电信系统频频传来。（后来，坎贝尔县传来了后期结果，尼克松的得票率为54.2%，而肯尼迪为45.8%，坎贝尔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了失败者一边。）

在这条消息之后，另一条消息接踵而至：肯尼迪指挥中心收到克利夫兰（Cleveland）整个第一选区的结果：肯尼迪是158票，尼克松是121票。（1956年，同一个选区的结果是：艾森豪威尔为186票，而阿德莱·史蒂文森为86票。）不错！

军械库现在欢欣不已。像洛杉矶一样，在海恩尼斯，记者们也争先恐后地站在胜利者一边。接近权力使所有人都倍儿有面子。海恩尼斯军械库的人们觉得正在靠近权力的宝座。欢欣鼓舞的场面持续了将近半小时。

7点钟过后不久，当美联社（AP）发布第一期选票统计数据综述时，人们的心又提了起来：尼克松得票203 628，肯尼迪仅得票166 963。噼里啪啦不断打字的打字员可以忽略美联社的消息，因为这些结果可能是共和党通常滞后传来的最初消息。不能掉以轻心的是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7点15分发布的电视快讯。CBS在选举之夜一直与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人才和资源进行合作。IBM反过来在认真分析国内500个关键选区以前结果的基础上，曾邀请社会科学专家、数学家、分析师对全国投票习惯建立计算模型。他们的理论是，政治如同随机粒子构成的其他宇宙一样，是一种由随机性人类粒子组成的世界，亦可进行统计分析和数学预测。IBM–CBS团队对科学筛选的美国社区样本，进行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细致的调查，然后将边缘切口红卡上面的500个关键社区分别输入IBM的7 090台计算机。卡上的每个切口代表社区的每种特征：白领、蓝领、乡村、城市、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黑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有的数据均接受交叉跟踪和交叉索引，从而使大型计算机可以即时扫描结果，将过去的数据与当晚的新报告进行对比，然后立即对晚上的情况进行全国性预测。所有的事实和数字都输入计算机——但不夹杂任何感情因素。现在是7点15分。随着大型计算机分析首批卡片和结果，它做出了最初的预测：尼克松可能获胜——100比1！尼克松的得票数为459，而肯尼迪为78。

阴霾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7点35分时，电视上传来康涅狄格州大城市工业区第一波强劲的投票浪潮。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和政治大佬约翰·贝利（John Bailey）指挥着高效运行的大西洋沿岸民主党机器，第一批结果现在从哈特福德、布里奇波特、纽黑文等工人集中的城镇陆续传来，他们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根据电视和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贝利预测肯尼迪在康涅狄格州的领先优势是100 000张票。1956年，艾森豪威尔领导共和党在康涅狄格州赢得306 000张票的优势。

又过了几分钟，肯尼迪指挥中心为了准确了解自己的得票记录，时刻紧盯着国内电视新闻的滚动播放。佛蒙特州克里坦登县（Crittenden County）的标志性选区——肯尼迪比1956年的史蒂文森领先50%！佛蒙特州柏林顿（Burlington）第一行政区标志性选区——肯尼迪领先1956年的史蒂文森20%；尼克松比艾森豪威尔的得票记录落后40%。宾夕法尼亚州泉源山（Fountain Hill）的标志性选区——肯尼迪赢得61%的选票（史蒂文森在1956年的得票率仅为25%）；尼克松的得票率为39%（艾森豪威尔则赢得

75%的选票）。

指挥中心停止录入返回结果了，因为此时电视和新闻通讯社一刻不停地播放消息——每份报道均表明肯尼迪已经完胜。新闻中心的任何人在好长时间里都没注意到肯尼迪指挥中心的标志性选区报告已经停止了。

8点钟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IBM控制台改变了立场，现在预测肯尼迪的普选得票率将为51%。9点钟时，预测差距提高：52比48。9点过后几分钟，芝加哥首批选区圆满交卷，这令民主党大喜过望——霍尔茨曼说得对，芝加哥没有问题。（实际上那天晚上，只有芝加哥、费城和纽约真正利于肯尼迪——赢得了预计可以得到的所有票数；除洛杉矶以外，其他所有大城市，1960年的投票人数均少于1956年，从而削弱了民主党在大城市的优势。）

8点钟后不久，为了鼓舞西海岸奋勇阻挡民主党派当前的汹涌势头，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电视上露面了，激励全党上下战斗不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作为战士时的辉煌成绩和事业，坚持让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艾森豪威尔那天晚上非常生气，当他想到尼克松必败无疑时就恼怒不已，尼克松在整个竞选中的表现令他不满，对肯尼迪也心怀愤恨。）

此刻在军械库，向全国报道肯尼迪的媒体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程度——不像洛杉矶的同行们，他们正和胜利者在一起。计票器显示肯尼迪的优势从800 000张扩大到1 100 000张。看着电视，又看了一下将发布最新公告的讲台，记者们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走上讲台，这人面色阴郁，戴着褐色男式软呢帽，举止透出侦探般的警惕。他用力震动了一下身子，看看讲台是否可以承受住整个总统团队的重量；所有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人们亦看到其他身着便装的人在检查窗帘、三角旗、讲台后面的帷幕，好像里面隐藏着危险。这是一个好兆头。

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10点30分，人们开始在讲台上布置座位。电视上计票器的优势统计显示肯尼迪的胜出票数为1 500 000张；对比总投票数盲目预测一下，一些人认为肯尼迪的胜选优势为4 000 000或5 000 000张。

在电传打字机和电视银屏上，投票总数节节攀升，肯尼迪现在已领先1 600 000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RCA–501计算机现在预测有401张选举人票(注)支持肯尼迪。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IBM计算机预测肯尼迪的选举人票为311张。午夜时分时，肯尼迪的优势已经增加到2 000 000张普选票；现在随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首批结果的出炉，显而易见的是，加利福尼亚州也站在肯尼迪一边。如果肯尼迪能够以现在这样的情势

一举拿下尼克松的家乡——洛杉矶县，那么在充满流动雇农和纯粹民主党人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山谷地区——甚至史蒂文森曾于1956年战胜艾森豪威尔的地方，选战优势将不断扩大，最终以旧金山传统的民主党胜出票数而完美收官。电视上引述加州州长派特·布朗（Pat Brown）的话预测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优势可能会达到800 000张。（和约翰·贝利不一样，派特·布朗错了，他对州内情况了解不够。）

当时钟的指针徘徊在午夜时分时，在海恩尼斯军械库，看似唯一的问题就是尼克松先生何时宣布承认失败。在军械库后面的餐厅，可乐、橙汁和咖啡换成了烈酒；隆重的庆祝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大厅散发着汗味和难闻的烟草味；由于手指累得不断抗议，脑子里绞尽脑汁地为马上到来的新总统琢磨一个新导言，打字员噼里啪啦的打字声慢了下来。讲台上，摄影师们聚集在一起，使用光度计测量光线，步量到新总统要站的位置有多远。肯尼迪团队的“先遣人员”悄悄地离开去组织车队，队伍将马上从军械库出发去接肯尼迪家族别墅里的候选人，然后以下届总统的身份将他送到这里。记者们最后一次在酒吧里倒满酒杯，穿过人群回到预先安排的座位里，等待新总统的光临。消息传来。“他要来了，马上要来了。”一位当地记者说，“州警察局的人告诉我，车队已在他的房子外面集结完毕了。”但还是没见到人影。

在肯尼迪家族的别墅里，人们的心情别有一番滋味。

因为到午夜时，选情在他们这些明眼人看来并不像之前所计划的那样。局势正变得糟糕甚至危险——他们的私人分析通过筛查增加的票数，发现领先优势在不断缩小，而且选情的变化使任何人也说不清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判定这是否反映了过去的美国偏见或者美国的未来担心情绪。整个下午和晚上，肯尼迪指挥系统的分析工作比媒体和电视提前了几个小时；他们在洞察不良征兆方面也远远走在了前面。肯尼迪也是如此。

肯尼迪起床了。除了头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打了个盹儿，他一直心神不宁。他首先到弟弟博比家日光室那里的通信中心看了一下，然后给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打电话，了解是否有任何最新消息。在哈特福德的康涅狄格州政府大厦，政治人物贝利接电话时深深倒吸了一口气。他转身对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e Ribicoff）说：“Himself[注]打来的电话。”说这句话时，他兴奋地引用了爱尔兰常见的一句习语。“Himself？”里比科夫问。他不熟悉盖特语的习语。“Himself是谁？”“杰克。”贝利说，接着转向电话，开始向肯尼迪报告他在下午早些时候看到的所有情况：中学的民意调查（贝利对此深信不疑）表明肯尼迪优势明显，缺席选票表明优势微弱，选票记录机的第一次统计结果——设备曾在下午出现故障，随后打开进行了维修检查。

肯尼迪随后穿过草坪回到自己的家里，接着又坐立不安了。7点钟刚过没几分钟，他又回到弟弟博比家里的通信控制中心。

他7点钟来当然是为了了解康涅狄格州的正式返回结果——预料之中的胜利；但是当他走上楼梯时，看到的是一片阴郁沉闷的景象。二楼是粉白相间的儿童卧室，那天晚上已被清理成一个数据分析中心，床被搬了出去，婴儿座椅被推到了一边，里面摆了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成堆的投票统计数据。公众舆论分析师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正在整理楼下的通信中心和临近卧室里新闻通讯社四台电传打字机传来的报告。

从4点钟开始，哈里斯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4点钟，他收到并分析了大约15%的堪萨斯州统计结果；他推断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更出色；这个关键农业州的农场主们好像不准备投票反对埃兹拉·本森（Ezra Benson）及共和党的农业政策，对于民主党派及东部的外来文化反而持排斥态度。6点钟，显而易见的是，堪萨斯州将使尼克松获得60比40的优势，农业地区的其他州或许将群起效仿。虽然楼下的通信中心为了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仍然不断向媒体和公众提供战绩不俗的关键选区所传来的捷报，但楼上的哈里斯研读着其他标志性报告，心中实在不能释然。边境州传来的第一份报告来自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县哥伦比亚选区。虽然肯尼迪的战绩略微好于1956年的史蒂文森，但他的表现比1952年的史蒂文森逊色，并且远远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路易斯维尔的初期结果不久就接踵而至；很显然，哈里斯预计肯尼迪将以55比45获胜的肯塔基，实际上仅取得了微弱胜利——或者说是一个失败。

“我们的形势不妙啊。”博比·肯尼迪说。他刚刚打了一下午触身式橄榄球，准备晚上漫长的值班。随后在7点15分，好像要确认博比的第一反应，楼下电视监控器传来了报告——IBM刚提供的尼克松的胜算为100比1！

此时，肯尼迪本人来了，正好看到康涅狄格州传来的首批结果。他听到了IBM的预测信息，直截了当地说机器疯了。哈里斯几乎绝望了，虽担心IBM已经输入海恩尼斯港尚未发布的计算结果，不过也神色严肃地附和说机器确实疯了——它们预测的仅仅是堪萨斯州和肯塔基州的结果；大工业州的投票甚至还没有结束呢。肯尼迪立刻满面笑容，和原来一样泰然自若，然后对统计员说，从现在起，他和卢·哈里斯不再理会这台机器了。

据说，仅仅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就兴奋地大喊着冲到楼上的儿童卧室见他哥哥：贝利刚刚通过电话报告了康涅狄格州的最初结果！票数正在计算，在哈特福德，肯尼迪比1956年的史蒂文森领先18个百分点——贝利说，肯尼迪将以60 000张选票的优势在康涅狄格州大获全胜。不到3分钟，博比又冲到楼上——贝利从哈特福德打来电话，随着结果陆续统计：贝利估计有100 000张票的优势。3分钟之后，贝利第三次打来电话——结

果现在落实了，90 000张票的优势。随着这个好消息的传来，人们不再担心康涅狄格州。

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步结果也陆续传来，成绩同样令人振奋，费城的战绩斐然。别墅里的人们的情绪开始由阴转晴。肯尼迪悠然地点了一支小雪茄——哈瓦那皇家细长雪茄。肯尼迪家族的姑娘们穿着宽松长裤，神气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像在参加一场盛大晚会。彼得·劳福德刚从好莱坞出来，神态茫然，脚穿着袜子沿楼梯跑上跑下，每当通讯社传来结果时，他马上从电传打字机上撕下新闻表单。歌手莫顿·唐尼（Morton Downey）是约瑟夫·肯尼迪的客人，他从主人屋子里缓步走来，就像一个侍者一样，有谁饿了，就递上三明治和点心。情况现在更好了：工业区战绩的雷霆汹涌之势逐渐掩盖了农业区投票结果带来的阴霾；肯尼迪决定离开欢欣鼓舞的通信中心，漫步穿过草坪回家吃晚餐。

家里静悄悄的。卡罗琳的鼻子上有道浅浅的划痕，她正等着向爸爸道晚安。肯尼迪让她在膝盖上欢快地跳了几下，然后打发她上楼睡觉了。在这个忙碌的日子里，他终于可以倒上一杯代基里酒，惬意地和妻子杰奎琳、朋友威廉·沃顿（William Walton）坐在一起。沃顿身体强健，面呈麦色，充满魅力，意志坚定，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是一位乐观积极的勇士。在华盛顿的多年间，两人就是好朋友，沃顿在春季之初就主动提出参与全程选战；6个月以来，他抛下画笔和画布，在威斯康星州、西弗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之间积极奔走，作为政治协调员，其职责显得日趋重要。他的情绪几乎是随着肯尼迪的喜怒哀乐而变化，现在当他们惬意地坐在起居室（一个根据肯尼迪夫人的品位装饰的房间，白色基调，宽敞明亮，古色古香）里时，他们谈起了绘画而不是政治。沃顿是否喜欢壁炉台上方的帆船图画？这是杰奎琳·肯尼迪在洛杉矶会议后迎接丈夫回家购买的礼物。沃顿是否喜欢肯尼迪自己绘制的这幅风景画？（像丘吉尔、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和处于压力之下的无数其他人物一样，肯尼迪在几年之前也开始绘画。在海恩尼斯港，他挂起了最喜爱的一幅画，描绘的是里维埃拉注的景色。画作色调温暖，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海滨呈蜂蜜色，肯尼迪在1956年大会之后不久曾在此度假。）沃顿认为这是一幅相当不错的原始派作品。他们轻松随意地交谈着，没有收音机、电视或通信中心的干扰，谈话一直持续到餐厅8点钟备好晚餐。整个餐厅为白色基调，与红色地毯相得益彰，透出一种典雅高贵的氛围，风格与肯尼迪家族的其他别墅截然不同。

晚餐期间，当草坪对面的通信中心正在汇总统计结果时，肯尼迪又从另一个层面谈起了政治。也许因为他们在晚餐之前一直谈论绘画，他现在想起了选举期间的一些生动画面。在走出选战的骚动喧嚣之后，周围逐渐尘埃落定，在宁静的氛围中，他开始梳理值得日后回忆的场景。他记得40小时

前、周一早晨两点钟到达了缅因州刘易斯顿（Lewiston），驱车穿过机场，驶过空荡荡的街道，车灯在黑暗中发着蓝光。最后突然到达公园时，他发现1.5万人正在瑟瑟寒风中等着他，突然间光线亮起，他们手电筒的光芒在面前不停地闪烁着。他记得一个月以前在宾夕法尼亚的胜利之旅中，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一袭黑衣，站在空无一人的乡村公路上——父亲的鼻子上夹了一个衣夹，肯尼迪的目光转到母亲身上时，她突然向他伸出了舌头。记忆之河又流淌到了这样一个场景：每当他巡回在大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人行道占满了人，有的甚至挤到了机动车道上。他仰望写字楼的窗户，在街道两旁欢呼的人群上方，看到白领管理人员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好像出于天性一样，他们都拿出曲臂攥拳的姿势表示轻蔑，有时从口型上看，他可以看出是咒骂的喊声。其他人也不断回忆着，但是晚餐吃得很快。8点45分时，他们又回到客厅，一起观看一台包着皮革的小型便携电视，肯尼迪的妻子刻意将电视机放在了突出位置。

晚餐后不久，特德·索伦森也来一起看电视；随后，草坪对面通信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和家人一个又一个地进出这里。皮埃尔·塞林杰[注]——肯尼迪的公关主管进来汇报工作；博比进出了好几次；有时，电话铃声响了，肯尼迪站起身简短接听电话。他的几个姐妹无忧无虑地傻笑着从草坪对面走过来，肯尼迪斥责她们向媒体透露（因为电视已经报道了）他“经常吸黑色大雪茄”，以及“高兴时连蹦带跳”。

在人们来往期间，他们四个人在客厅里一直缄默不语。肯尼迪冷静自若、面无表情，当工业州的结果蜂拥到来之际，他一直盯着电视屏幕。在大约10点30分这一刻，胜利好像已势不可挡，他妻子轻轻地说：“哦，亲爱的，你现在是总统了！”他同样语气轻柔地说：“不……不……还为时过早。”

无论表现得多么镇定，肯尼迪仍感到阵阵紧张。9点到午夜期间，他曾好几次走过草坪进入通信中心，但总是再回家和妻子一起坐在客厅里。对于清楚看到的消息，他始终显得漠不关心。大约11点30分时，因为他妻子距临盆还有三周时间了，他打发她上楼睡觉；后来，肯尼迪决定穿过草坪，在通信中心等消息，不过摄影记者们先前已同意在得到允许之前不会将他来往别墅之间的照片传出去。然而，灯亮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一台移动式电视设备，热机需要40分钟。于是所有的灯一直亮着，其炫目耀眼的光线在夜空中勾勒出一道轮廓——黑白区域截然分明。借着灯光，肯尼迪午夜时小心翼翼地穿过草地，进入弟弟的房子和指挥中心，他打算下半夜一直待在那里。

在指挥中心，虽然公共电视报道说胜利已势不可挡了，但指挥人员的心里

仍然忐忑不安、心神不宁。罗伯特·肯尼迪家中日光室里的家具都已被清理干净了，电话总机装在了那里。一条长桌从一端几乎延伸到另一端，另一条短桌与之交叉呈丁字状。长桌上放了14部电话，安排了14个姑娘接听电话。10部电话专供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总部和负责人使用，他们都有海恩尼斯港总机的专门号码；两部电话专供全国各地90个标志性选区的90个投票监督员使用；两部电话用于占线和紧急信息。几位电话主管坐在交叉桌子旁边，当电话打给相关人时，立即切换信号。他们的前面是一台硕大的爱而近（Elgin）钟表，随着时光老人从东向西经过整个国家，长长的红色秒针记录着每一分钟和每一小时；在钟表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一台电视机正播放着举国关注的消息。电话响起和报告传来时，姑娘们立即将单独的选区结果填写到油印表格里，然后迅速送到楼上哈里斯的数据分析室，在那里对其意义进行研读。

日光室后面埃塞尔·肯尼迪的餐厅里，斯图本（Steuben）水晶器件被收拾了出去，大咖啡壶也换了。餐具柜上摆了两台电传打字机和一台制表机，另外增加的几条直拨电话线使地板上的电话线纵横交错。在房子近陆一侧埃塞尔·肯尼迪的起居室里，设了三明治自助餐点。房间周围还有简便椅、休闲椅、另外几部电话、其他几台打字机以及一台大电视机。

现在是午夜时分，肯尼迪在指挥中心看到，选情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8点之后不久直至10点30分，人们的激动情绪不断高涨，傍晚的阴霾被一扫而光了。康涅狄格州完胜的消息刚刚传来，费城的首批消息接踵而至，迹象表明仅这一城市就可赢得300 000张选票的优势。（“结果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博比·肯尼迪说。但最后结果有过之而无不及——331 000张选票的优势，肯尼迪以68.1%的支持率获胜。）费城结果传来之后，过了40分钟，匹兹堡、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斯克兰顿（Scranton）的首批指标数据也来了；在这些城市，煤炭和钢铁的萧条造成了人们的失业和不满。很早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在乡村或城郊的选票根本抵挡不住宾夕法尼亚州的这股力量。9点至10点期间，得克萨斯州的首批私人报告也送来了；拉雷多市（Laredo）的报告刚结束，显而易见，南得克萨斯州的美籍墨西哥人纷纷把票投给了肯尼迪，力量如此之大，甚至可以与达拉斯和休斯敦的南部共和党选票不分伯仲。

好像是为了巩固得克萨斯州的胜利成果，南卡罗来纳州也上演了逆转剧情——每隔10分钟就打来一次电话。最初正如预期，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是站在共和党一边。但是根据南卡罗来纳州乡村的报告，共和党的优势不断萎缩——从54%到53%，再从52%降到51%。最后令人兴奋的是，共和党的支持率降至49%。毋庸置疑，南卡罗来纳州和南部联盟依然主要是民主党的地盘。新泽西州的形势看来也不错，因为在郊区的卑尔根县

（Bergen）、默瑟县（Mercer）和米德尔塞克斯县（Middlesex），肯尼迪远远超过了史蒂文森1956年在这些共和党大本营的战绩；哈里斯此时预测将以53%或54%的支持率赢得整个新泽西州。由于纽约州、罗得岛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都陆续传来优势领先的消息，胜利好像确定无疑了。

接着在10点30分，投票如潮汐般从大西洋海滨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然后涌入中西部地区，麻烦开始了。密歇根州的韦恩县（Wayne County）在凯旋高歌的队伍中首先掉了链子。韦恩县的县治位于底特律市，当初肯尼迪的选举团队预计这里的票数是800 000张。但是当日仅有745 000张选票（那天下雨）；那个大城市的优胜票数对赢得密歇根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投票人数减少了，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克利夫兰市也出了问题，这个城市最初预计有60%—65%的选票支持肯尼迪，该地以前甚至超过了这个比例（70.9%），但投票总数（338 000）远低于预期（根据票数分配，肯尼迪赢得141 000张的多数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200 000张）。显而易见，俄亥俄州是勉强过关。中西部其他地区也是困扰不断：艾奥瓦州不出所料，尼克松全胜；在印第安纳州，尼克松又一次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在威斯康星州，肯尼迪曾经在3月份四处奔走，竭力演讲争取选票，当初预计将稳稳获胜，结果失败了。截至11点，电子指示器表明肯尼迪已经获得241张选举人票——但至少赢得269张票才能当选。在肯尼迪团队的有力争取下，已赢得有把握得到的所有选票——东北部工业区和老南方。想要取得真正胜利，现在必须从某些地方赢得其余的30张选举人票。虽然距品尝胜果仅有一步之遥，但是共和党在中西部和落基山脉地区的强大势力仍然使胜利不知花落谁家。

当此类报告不断传到中心时，肯尼迪也在家里悄悄地认真研究。他一度实在控制不住情绪了，俄亥俄州真是令他伤心透顶。在竞选过程中，他曾6次经过俄亥俄州。在上次10月17日的行程中，他一路经过米德尔敦（Middletown）、代顿（Dayton）、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和哥伦布（Columbus）等城市；那一天充满了辉煌和奇迹，那是一个迎接英雄和上帝的日子。俄亥俄州的人们沿着公路几乎连绵不断地站了113英里，他们把孩子举过头顶观看他，试图抓住他、扯拽他，向他挥手示意，对他尖声喊叫，最后其随行人员甚至担心他的安全了。不过沿这条线路，精确地讲在这些城市——富兰克林县到哈密尔顿县，从南部俄亥俄州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内心仍然偏向罗伯特·A·塔夫（Robert A. Taff）和理查德·尼克松。俄亥俄州的投票意向始终是他竞选活动的最大失望。肯尼迪倾听着这个州的结果，慢慢挽起袖子，他的右手在竞选活动结束时，由于数月以来不断握手，已经肿胀得变形了；他现在将手露出来——僵硬、红肿，一直到肘部都是划痕。他举起红肿的手，一直露到肘部，悻悻地说：“俄亥俄州这样对我——他们竟然这样做。”接着，他放下袖子，摇了摇头，困惑

不解，又表现得像平时一样平静。

现在当肯尼迪在午夜过后不久走进指挥中心时，弟弟的屋子里弥漫着一种平静的紧张气氛。早些时候，博比·肯尼迪的别墅里戏剧性地分成了两派。在起居室里的电视机周围，是为人们分发三明治和饮料的地方，肯尼迪的姐妹和一些家庭朋友已经喜气洋洋地吵嚷着开始庆祝了。但是在邻近的日光室，设有通信中心，楼上是研读报告的数据分析中心。自从10点以来，这里的情绪一直是人们默默关注的焦点之一。楼上，卢·哈里斯不断操弄计算尺，试图通过研读与1956年史蒂文森竞选的对比统计结果，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是在楼下——奥布赖恩[注]、奥唐奈[注]、多纳休（Donahue）和邓根（Dungan）等政治运行主管听取报告的地方，他们将结果与1948年杜鲁门的成绩进行对比，不禁忧心忡忡。

午夜时分，日光室通信中心和楼上数据分析中心的紧张情绪感染了房子里的每个人。庆祝活动结束了，梅菲尔餐饮服务的服务员反复地问："我们没问题吧？我们没问题吧？"但是没有回应。演员彼得·劳福德坐在通向哈里斯数据中心的楼梯上，心里牵挂着那天早上在波士顿和海恩尼斯之间某地丢失的行李。歌手莫顿·唐尼静静地在客厅里休息，用力咀嚼着由他分发的三明治。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著有《最长的一天》）曾任海恩尼斯港行动小组后勤先遣人员，晚间早些时候，新闻主管塞林杰要求他安排将肯尼迪胜利送到军械库的车队；现在他蹑手蹑脚地走着，心里既充满希望又忐忑不安。

肯尼迪走进指挥中心时，无人需要向他解释当前形势。他准备在那里待上3个小时。对于各种层面的政治形态，他熟稔于心，就此而言，当代美国的任何人都不能望其项背。当还在妈妈怀里吃奶的时候，他就见识到美国基层的政治形态；孩提时代，身为政治家的祖父和外祖父对他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1939年，这个战争与和平悬而未决的年代，他在父亲驻伦敦的使馆官邸目睹了政治如何在发生世界重大事件时纵横捭阖。他曾经在波士顿多语言混杂的第十一国会选区首次纵身投入这种选举之夜的战斗，认真评估其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北方人选民的反应；后来他也曾在马萨诸塞州范围内的此类选举之夜中拼杀，仔细对比伯克县（Berkshires）和萨福克县（Suffolk County）投票结果；今年，他奋力征战的身影曾闪现在威斯康星州、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在这样的日日夜夜里，一切能做的都已做到，现在无能为力了，只有等待、观察和了解是否能问鼎宝座。

肯尼迪坐在日光室、餐厅和客厅在屋内会合的角落处，观看着日光室远处角落的电视机。他情绪紧张，坐立不安，有时站起身踱步，将正在阅读的两本平装书紧紧地攥在一起，不时地到楼上的数据中心看看。屋内现在很

暖和，他脱下苏格兰花呢夹克衫，身着白衬衫、棕褐色斜纹裤、绿领带、白色棉袜站在那里，仔细观察着周围。桌子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能获胜，他们明天将都随着升迁，一些人还将被载入史册；否则，他们将默默无闻，被人遗忘。桌子周围的这些人现在都很平静，有人显得轻松淡定，有人在努力工作，有人在深沉思考，有人在和声细语、不慌不忙地交谈；他们已不止一次地经历这样的夜晚；人人都是行里高手。

现在插入一件滑稽可笑的事儿，权做补充吧。在军械库，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安装了两条直接联系华盛顿共和党全国总部和洛杉矶国宾大酒店的直达电报线路。这些线路专用于那天晚上从海恩尼斯港向洛杉矶和华盛顿或者从华盛顿和洛杉矶向海恩尼斯港传递失败和祝贺信息。大约凌晨1点钟时，军械库一直有人值守的电报线发出嗒嗒声——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当选总统肯尼迪发来的祝贺信息！在发布消息之前，新闻秘书塞林格立刻致电华盛顿和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erty）反复核对。哈格蒂非常震惊，要求不要发布消息——他现在掌握两条信息，一条是胜利消息，一条是失败消息，他无意过早透露任何一条消息。塞林格虽然与新闻代理联系密切，但仍然心领神会地没有向媒体披露这条消息；不过此刻，整个别墅沸腾一片；喜悦渐渐退去，紧张的气氛又笼罩在心头。

有时候，当国内其他地方打来电话时，肯尼迪通常自己接电话，更多时候拒接电话。林登·约翰逊从得克萨斯州打来了电话，肯尼迪到楼上接听。他几分钟后下来时，发现人们都在注视着他，他立刻原原本本地汇报了林登说的话："听说你失去了俄亥俄州，但是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做得还是不错的。"他着重强调"你"在俄亥俄州的失利和"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胜利。这种语气让人们忍俊不禁，但人们的笑声毫无恶意，他们深知约翰逊在得克萨斯州和这里的人们一样拼搏。纽约州州民主党委员会（坦慕尼协会注控制）电话催促肯尼迪向他们发一份纽约州大获全胜的贺电——但是他推托了，因为他知道涉入纽约州拜占庭式民主党（Byzantine Democratic）政治和确定哪一派真正赢得了胜利为时尚早。

一般而言，博比·肯尼迪负责接打电话，博比的电话现在也不断缩小关注范围：首先是给芝加哥迪克·戴利（Dick Daley）的电话，戴利了解"他的"选区和"他们的"选区哪些出现了选票流失，他说不用担心，一切没问题；然后是给密歇根州锡德·伍尔纳（Sid Woolner）的电话，他既没有说密歇根州胜利了，也没有说失败了；最后是给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杰西·昂鲁（Jesse Unruh），他没有说哪些选区的选票流失了，哪些选区的选票已收入囊中——兆头不好。

随着时间缓慢地到了早上3点钟，选举形势逐渐明朗。4个州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其中3个

州在中西部，一个在遥远的西部。在每个州，一致的投票模式源自相同的生活方式和相同的意识偏见——城市对乡村，旧势力对新力量。洛杉矶和旧金山在1956年支持共和党，现在他们站在了肯尼迪一边。但是在中央山谷地区，史蒂文森曾于1956年战胜了艾森豪威尔，但肯尼迪勉强实现平分秋色——中央山谷的居民主要是俄克拉何马人和南部圣经地带注。在洛杉矶的郊区，肯尼迪严重受挫。在中西部三个州，大城市均使他获得预期中的胜出票数；但在农场、郊区以及小城镇，形势则急转直下。

在这4个州中，任何两个州都将使他稳操胜券。但是假如仅仅赢得了一个州，那么鹿死谁手就要看南部腹地（Deep South）14或15票种族隔离州的选举人票了。这些票没有承诺，不属于任何党派；依据宪法规定，选举将在170年的美国历史上第二次交由众议院决定。只有当肯尼迪失去全部这4个州时——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理查德·尼克松才能获得胜利。所以，虽然尼克松几乎败局无疑，但是肯尼迪也并非稳操胜券。

3点钟后不久，电视屏幕上显示他的选举人票是261—262——这个悬而未决的结果已显示好几个小时了，屏幕上传来一阵骚动画面；人们看到洛杉矶国宾大酒店吵吵嚷嚷的新闻中心突然变得喧闹和混乱，里面的解说员说尼克松不久将向全国发表声明。肯尼迪看了一会儿这个场面，然后对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说："你想让我陷入这种场面吗？"塞林格刚才一直催着他到海恩尼斯军械库露露面，以使吵吵嚷嚷的记者们平静下来。

肯尼迪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三明治，夹克衫拖在地板上，黄色的真丝内衬外翻着，上面印着金色的马形图案。

"家里还有牛奶吗？"肯尼迪边嚼着三明治边问，但工作人员都忙着看电视，等待尼克松露面。他们的神色逐渐缓和下来，心底既有奋力搏杀赢得胜利的悲壮情怀，又对尼克松放下武器承认失败的勇气惺惺相惜。他们中的一个人现在依然记得，这一切曾经离他们是多么近，但承蒙上帝的保佑，他们幸运过关了。

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默默地等待着；肯尼迪离开房间，在尼克松走到电视镜头前，从厨房冰箱旁边回来了。"没有牛奶，"他烦躁地说，"只有啤酒了。"

尼克松讲话时，他缄默不语，目不转睛，表情透出丝丝的厌恶。他本人在公开露面时，一直显得优雅得体；他绝不会让妻子暴露在这类事情面前；尼克松英雄般地努力微笑着，尼克松夫人竭力掩饰的悲伤使他心里刺痛，他几乎觉得有些尴尬。他本人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肯尼迪喜欢干脆得体！尼克松讲话结束时，桌子旁边肯尼迪的人员立刻从同情转为暴跳如雷，这个人竟然在放弃退让的讲台没有低头认输，肯尼迪尽力平息他

们熊熊的怒火。

“他为什么应该退缩认输？我也不会。”他干脆地说。

塞林格在新闻界和电视摄影师的压力下，再次催促肯尼迪前往军械库，在东部各电视台的镜头前露一下面，和尼克松刚刚在西部发表的电视讲话较量一下。肯尼迪拒绝了。在尼克松再次讲话之前，他无话可说，他打算回家睡觉，他们都应该回家睡觉。

肯尼迪经由客厅离开了弟弟的家，穿过门口到前廊，然后向家里走去。

一年前，在同一个房间，和同一伙人，他认真研究了美国的每个州，批准了最终行动方案，启动了将他投入这个选举之夜的政治机器。当时，没有一家媒体了解这次会议，没有一家电视摄像像现在这样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走在草地上，他们那炫目的灯光使天鹅绒般的秋天草地发出浅淡光亮的春天绿色。

他和伙伴们策划了一场看似完全不合常理的选战——依靠一群少壮派助理，将20世纪一位最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一位少数派天主教徒，一位背负家族财富与争议于一身的人，大胆推向政坛前台，竞选美国总统。1959年10月的那一天看似如此遥远，那天他们就在这个房间灵活巧妙地策划了这场选战，冲出了60年美国偏见的重围，涤荡了昨日政治的陈腐势力，创造了新的未来。

现在距早上4点钟还有20分钟，当他穿过草坪回家时，不能确定成功与否；如果他胜利或失败，这场选举是否就标志着美国的过去或未来？

自10月傍晚的那次会议起，他和伙伴们在整整一年里历经风风雨雨，走过一条漫漫征途，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行程长达229 000英里。这条路将带他走向何方，他依然如雾里看花。但是沿着这条路，在过去的这一年，他已经以某种方式唤醒了美国政治体系的每个神经末梢，这个体系正在焕发新气象。

这一切，至少他已做到！

---

1. 隆美尔将军，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著名的军事家、战术家、理论家，绰号“沙漠之狐、帝国之鹰”。——译者注

2. 自古以来，西方都把马掌当作吉祥物；很多人家，尤其是农人，都爱把马蹄铁钉在门楣上；他们相信马掌能驱邪怯鬼，给他们带来好运。——译者注

3.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各州选民对本州各党提出的总统选举人（electors）名单进行投票；获选的各州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于12月“间接选举”总统，但选举人受选民委托，投票意向由选民事先决定。根据各州选举人票归属情况，11月实际上已经选出美国总统。美国绝大多数州和首都实行“胜者全得”制度，即在一州或首都获得选民票最多者获得该州或首都所有选举人票。赢得270张或以上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即获得选举胜利。各州选举人人数等于该州国会议员人数的总和，每州众议员人数是根据人口多少分配的，因此人口越多的州，议员越多，选举人也越多。因此，人口众多的州成为总统候选人争夺的主要目标。——译者注

4. Himself，指（爱尔兰、苏格兰英语中的）男主人，重要的男人。肯尼迪家族是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逃荒到美国的移民。——译者注

5. 里维埃拉（Riviera），海滨度假胜地（尤指法国的地中海海滨）。——译者注

6. 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后任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言人。——译者注

7. 奥布赖恩（O’Brien），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注

8. 奥唐奈（O’Donnel），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译者注

9. 坦慕尼协会（Tammany），美国民主党在纽约市的一个很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创建于1789年，由一个兄弟会发展而成，19世纪贪污成风，大搞腐败政治。——译者注

10. 圣经地带（Bible belt），美国俗称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在美国，这个称呼特指以美南浸信会为主流的南部及周边地区。——译者注

第2章

民主党：蠢蠢欲动

成为美国总统没有一条固定的道路可循——既不像西欧经典议会制中有一条清晰的阶梯可以攀上权力巅峰，也不似古往今来专制统治中的暴君赤裸裸地夺权。

在两个多世纪的国民生活中，生活方式随技术革新而改变；识读和学习日渐普及，文化格局被重塑；各种交通工具喧嚣得令人麻木；人口一波又一波从乡村流向城市，从东海岸流向西海岸——总统竞选之路随之改变，在这个历久弥新的国度里曲折前行。

唯一经久不变的是总统竞选政治中的悖论：公开论坛与闭门密商，苦心孤诣与皆有定数，愤世嫉俗与庄严高贵。

但在所有的悖论中，最突出也最能体现美国政治与众不同的悖论就是，以小众之力调动广大民众自愿参与大选。

在每一个美国大选年的秋季，大量民众积极并负责任地参与国家领导人的选择，人数之众，态度之自愿，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之相比。无论是欧洲的议会民主制还是东方的专制制度，都不可能有如此小的群体通过运作触及权力巅峰，或动员不计其数的民众行动起来。在美国，传播、影响力和政治的这张网极其敏感，只要有懂行的人用正确的方式触及这张网，就会得到迅速的响应。他们凭自己的主动性和参选意愿，不远万里汇聚而来，挤过州的独木桥，去争取更大的赢面，这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正是这种小众之力抓住了历史学家的眼球。

1960年11月8日，星期二，68 832 818个美国人参与了投票。在这6800万人中，350万到400万人（根据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的合并统计）积极参与了总统大选。他们出资捐款，装过信件，按过门铃，递过邮票，组织集会，动员邻居。而在这些积极的选民当中，可能只有不到1 000人在一年前就意识到，他们当时或更早萌生的决定，将支配他们日后的行为。在这些非常警觉和敏感、能洞悉时局的1 000人中，不到50人出席了后来的小规模启动会议，每个会议的人数可能是3人、5人或者12人，远不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那时，1960年的7名主要参选人已经展开冷静调研，

了解如何在美国取得权力的大问题。

这些会议在不同的地点举办，包括马萨诸塞州、佛罗里达州、明尼苏达州、得克萨斯州、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州。但关注点不外乎一个，就是调查当时美国民众游移不定的情绪，以此做参照来衡量自己的资源，包括资金、人脉、忠诚度和影响力，从而调动这些资源左右民众情绪，入主白宫，大权在握。这些会议当时都是鲜为人知的，只有当他们拟订的计划和谋略在一年或一年半后获得成功，这些会议才会声名鹊起，被载入史册。会议地点多元而普通——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一个普通旅馆，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港一个简单的新英格兰风格小别墅，纽约一间俯瞰中央公园的三层公寓，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查尔斯·雷博佐(注)棕榈成荫的住宅，马里兰州草坪上克拉克·克利福德(注)的白色钢架结构的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宽敞办公室——会议举办地简单朴素，与其他国家追逐权力道路上设立的威严而隐秘的总部截然不同，益发凸显出美国权力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只要有意愿和想象力，谁都可以尝试撬开这扇门。不过1958年和1959年的这些早期会议上，并没有出现不理智的人，也没有滋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1959年下半年，美国人的注意力一如既往地被五花八门的事件分散：一场国际外交闹剧在赫鲁晓夫首次访美后达到一个沉闷的高潮；庄稼地里丰硕的收成刚刚移入存粮仓库（39.09亿蒲式耳玉米，11.26亿蒲式耳小麦）；在东北工业区，一场看似永不止息的钢铁工人大罢工（51.9万名钢铁工人总计174天没有发薪）再次把一个明显无解的工业法学问题摆到大家面前；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职业生涯戛然而止，观众对智力问答节目的轻信，把小众的百老汇词汇“商业贿赂”(注)变成了流行全国的时髦用语，整个国家在自卑的欢愉中沉沦。

不过，这些都是头条新闻。在1959年秋的那几周里，当候选人与友人共谋大计之时，更复杂的问题正在头条新闻的掩盖下发酵。在国内，孩子们刚刚开学返校。那时的学校好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家长们却要为教育体系头疼。30年前，这些家长不得不在城市学校里挤在塞满四五十人的教室上课；现如今，他们的孩子则要被塞进郊区学校里30多人的教室上课。美国没有足够的学校，也没有适合的学校，更没有就如何建造更多学校达成明确共识。而在国外，非洲虽然相去万里，但交织着希望和抱怨的喧嚣，犹在耳边。时任比利时外长皮埃尔·维尼（Pierre Wigny）1959年秋到访纽约，私下里曾情绪激动、义愤填膺地对有影响力的宣传人员和重要的政府官员主张说，比利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绝对、绝对不会从刚果撤出；他坚称留守和教化刚果是比利时的基督徒的责任，要防止刚果沦为野蛮之地。但他的主张无人问津。

当然，1959年秋天，参加闭门会议的那些人都察觉到了这些事。身为政治

家，他们知道这类问题将会主导大选年的氛围，只不过有些人看得模糊，有些人更为敏锐。他们自身的努力很重要，而大选氛围也同样重要。一旦获得提名——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人获得提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将会为以后的两党对垒造势；1年或18个月后，这些问题将会成为他们执政中的棘手问题。但现在还不是。

当下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使用美国的权力，而是如何夺取美国的权力。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事实上，比起第二个高潮——1960年11月的大选，所有人都更关注第一个高潮——提名。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提名比大选更需要周密的计划。争取提名的过程很复杂，他们要对所有因素进行理性分析和把控。而大选又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提名成功与否，失败的人最后都会言之凿凿地把结果归因为重大失误、决策、交易、政变或背叛。获得提名的人，就会纵身投入疯狂、不可控的另一半竞选之路。但正因为有了提名，他在问鼎白宫的道路上也已经成功了一半，而他在这套政治体系中就掌握了主动权。所以，提名一定是第一个目标。

因此，在1959年春夏秋，希望和雄心的溪流从这些秘密基地发源，像几股支流一样时急时缓地流淌，然后汇聚成两大政治洪流——共和党和民主党。一年后，两党相遇，1960年大选鸣锣开战。当中，一些溪流完全是发于偶然，跌跌撞撞地流淌；一些溪流突然来个急转，一些溪流（例如史蒂文森的选战）则是被政治的万有引力拉到竞技场中。而在两大党中，走入大众视野的姓名和幸运获得提名的候选人都将变得家喻户晓，从而被载入美国史册。

那么，先从民主党说起。

我们最好先谈谈休伯特·霍雷肖·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尽管他势单力薄，最早的战术决策却掌握在他手中；就像夜间巡逻兵试探敌军主力一样，他是首先来检验约翰·F·肯尼迪实力的人。其他民主党人在制订方案时，会根据汉弗莱的动向做出调整。

汉弗莱是什么时候或是怎样萌生竞选总统的想法，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说不上来。在他的密友看来，最明显的时机可能是1945年。那一年，他首次以爆发之势踏入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政坛，那时他还没有被国家级政治圈里的人注意到。很久以后，他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领导了1948年民主党大会上的草根民权斗争，才走入大家的视线。后来，汉弗莱在1952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更是脱颖而出。他领导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提名战，那时他的心里就埋下了对副总统之位渴望的种子，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希望擦肩而过。1956年，他成为公开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在史蒂

文森二度获得提名后，汉弗莱发现他的偶像史蒂文森已决定把副总统人选的决定权抛给民主党大会，而汉弗莱肯定敌不过基福弗（Kefauver）或肯尼迪。得知这个决定的那个晚上，汉弗莱被人看到正在一个朋友的身旁哭泣。现在，随着大选年再次临近，他也到了这个岁数，政治明星还是那几个，他必须在这一季靠自己的力量为总统之位放手一搏。

汉弗莱在1956—1960年成长为一个公众人物。在成长的那几年，他基本上是被国家媒体忽视的，或是被刻画成一个中西部的怪人，但现在他逐渐赢得了尊重。1958年秋，他访问赫鲁晓夫一事赢得了国际关注。1958年民主党在国会赢得压倒性胜利后，他登上了《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他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有分量。在1959年刚入冬的那几个月，汉弗莱曾经探听过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口风。史蒂文森告诉他，美国需要他这样的人。他还询问了林登·约翰逊，约翰逊暗示无意与他争夺总统宝座。除此之外，在他与赫鲁晓夫会晤之后，雪片般的信件飞入他的办公室，请他到各处去演讲，去遥远的西部，去纽约，遍布全国各地——有时候一周能收到100封这样的邀请函。

早在1958年夏天，汉弗莱就开始与少数华盛顿的密友探讨争夺总统宝座的持久战。1959年夏天到来前的6月，明尼苏达州民主党领导层的一个会议在明尼阿波斯的利明顿酒店举行。会上，汉弗莱争取提名的话题令他的追随者激动不已。但如果一定要说在哪一天梦想有了现实的雏形，那应该就是在旧德卢斯酒店的一次会议上。会议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汉弗莱也到场了，他是来出席1959年7月11日圣劳伦斯航道开通仪式的。汉弗莱的卧室套房里集结了最核心的政治领袖圈子。这是一个家庭的决定，因此他的妻子缪丽尔（Muriel）也在场，另外在场的还有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Orville Freeman）、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众议员约翰·布拉特尼克（John Blatnik）和约瑟夫·卡思（Joseph Karth）、明尼苏达州民主党领袖杰拉尔德·W·希尼（Gerald W. Heaney）和雷·海明威（Ray Hemenway）。汉弗莱的私人助理赫布·沃特斯（Herb Waters）也在场。沃特斯是加州人，其他人都来自明尼苏达州，这一点值得注意。大部分的总统竞选，尤其是1960年的竞选，都是以单一州为基地。这个州的组织气势如虹，由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率领，它发现自己还有余力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弄潮，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在历史上，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的俄亥俄团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奥尔巴尼（Albany）团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密苏里团队就是这样养成的。领导人需要一个“圈内人集团”，并且都是从自己的同类中挑选出来的。所以，在1960年，肯尼迪的竞选团队是马萨诸塞州人，赛明顿的团队是密苏里州人，约翰逊的团队是得克萨斯州人，尼克松的圈内人团队——尽管他在国家中心待了整整8年——是清一色的南加州人。

而在德卢斯酒店开会的这个团队里，我们基本上还是得把目光锁定在奥维尔·弗里曼和休伯特·汉弗莱自己身上，因为正是他们，在彼此交织的职业生涯和宏图大志中把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势力拧成一股绳。

大选往往会让很多老朋友分道扬镳，不例外，这两个人也因为大选年的一些事件彼此隔阂，进而疏离；但在那一刻，他们是一体的，就像在过去整个成人阶段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圣保罗，当时汉弗莱是政府指派的教员，而弗里曼是他最珍视的学生之一，一个常常挨饿的忧郁孩子，半工半读念完了大学。“周六晚上，”弗里曼曾经公开回忆说，“我常常去休伯特家吃晚饭，缪丽尔会给我们做华夫饼，那是我一周吃过的唯一热餐。”

汉弗莱和弗里曼都是穷孩子出身，他们对人民有着近乎浪漫主义的信念；这股信念在他们抑郁的生活中闪闪发光。凭着这股信念，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的信念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政府属于人民，必须毫无保留、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办事，不局限于正统的自由主义。汉弗莱在1945年当上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那年他34岁；奥维尔·弗里曼27岁，成了他的秘书。他们一起整顿了这个城市，改组警察，把共产主义者从工会清理出去。汉弗莱在1948年擢升到参议院（明尼苏达州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参议员的民主党人士），在他背后的阶梯上站着一列被他训练出来的年轻人，准备接管整个州。弗里曼在1954年当选州长，尤金·麦卡锡在1958年成为美国参议员；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州打造成全美最优良、最灵敏、最务实又最有远见的政府之一，也把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塑造成了一个政治廉洁、办事务实的典范，激励着美国中北部一带的公民团体。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由知识分子领导，无丑闻缠身，得到大工会给予资金和人力上的坚定支持，受到本州农民的爱戴，这是他们不败的良方。冷静客观的人会注意到，这个州的民主党更多是被精神和情结凝聚在一起的，而非依靠冰冷、有条不紊的机器。他们靠的是人们发自内心对个人和领袖的热忱，以及不受党派控制的组织团体的支持。这样的党派模式在其他州能行之有效吗？

据一个参会者事后回忆，在下午德卢斯的会议上，大家对能否在全美推广明尼苏达州的政治模式存在分歧。据悉，正是弗里曼坚持认为他们必须“当机立断”。弗里曼是一个壮硕的前海军陆战队官员，真挚，又有点儿脆弱。他主张立刻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筹款，因为愿意支持汉弗莱的大捐款者估计寥寥无几，所以需要众筹资金，积少成多。弗里曼得到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man）、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杰里·希尼（Jerry Heaney）的大力支持。弗里曼是这个房间里所有年轻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得到汉弗莱的提拔，以汉弗莱的信念支撑生活和治理明尼苏达州。

但是，有三个人非常谨慎，他们就是汉弗莱、尤金·麦卡锡和国会议员约翰·布拉特尼克。汉弗莱在华盛顿当了11年参议员，麦卡锡在华盛顿当了11

年国会议员，布拉特尼克13年。这三人身居首都观察国家政治，看出国家政治与明尼苏达州或西北部的政治截然不同。他们清楚，在明尼苏达州适用的政治模式并不尽然会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三个人了解在全国范围交流信息的机制、政治寡头的联盟和大工会在国家层面上玩弄政治时的犬儒主义。

“除了史蒂文森，我认为我的能力不输给任何人，我足够胜任总统一职，”汉弗莱之后说，“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常被拿来与肯尼迪比较，而他的宣传太出色了。他的宣传做得非常到位，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家庭杂志、出色的报纸、优质的节目。我知道我的形象。我总是被描述成一个亲劳工、好争辩、暴躁易怒、好胜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我唯一待过的组织就是明尼苏达州，我没有资金，没有大媒体的支持，没有公关。我的明尼苏达州团队不懂如何利用公关。我们有一套在明尼苏达州行之有效的模式，但他们不了解国家媒体的运作模式。奥维尔·弗里曼是全美最出色的州长之一——但没有人认识他。

“我们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提名，但是，机会还是有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我没有得到提名，也能做两件事：首先，适应大选的整个政治氛围；其次，我们写出一个纲领，无论谁获得提名，他都要接受这一纲领。这是一个能和南方民主党人（Dixiecrats）分庭抗礼的方法。在我刚到参议院时，哈里·伯德（Harry Byrd）和他的同僚们就向我发难。自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方法。我会答应争取提名，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过去一直在小范围内说的事情，将会说给大众听。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获得提名。我想要争取，但我明白道长且阻。”

晚上会议结束时，团队仍然意见不合。对于这场会议，显然有两种解读——在明尼苏达州安居乐业的民众相信竞选活动已然启动，他们这个团队正在向总统之位进发，侦察结束，组织委员会正式上线，开始摸索筹钱，在周边的农业州争取支持。但在汉弗莱的记忆中，他只同意探讨总统之位。其他人决定设立汉弗莱竞选总统委员会，但是汉弗莱仍然没有公开表态参选。如果他发现从明尼苏达州的基地出发并不能成功走上竞选之路，他还可以退出。

而汉弗莱的另一个朋友当即助推了汉弗莱的竞选，他就是华盛顿特区的詹姆斯·罗（James Rowe）。我们必须停下来总结一下像罗这样的人，因为华盛顿可能有50或100个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律师，事业有成；在他们暗色调木质装修的律师事务所里，培养着一个业余爱好者对政治的热爱，只要现实允许，他们就会踏足政坛。在美国的各个地区、城市和州，省级律师爱给地方政治家出谋划策，为当地司法部门荐人，替一些小角色安排候选资格。而华盛顿的律师会涉足国家政治，他们踏足的职位会带他们走向更光明的政治前途。他们的影响力集合在一起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个群

体比大多数候选人握有更多智慧、经验、人脉和见证30多年国家政治的记忆宝库，这是候选人凭借自身力量永远无法企及的国家政治财富。当然，拆开来看，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独一无二，而罗比大多数人更独特。他曾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手下一个出色、真挚的年轻律师。罗曾经在白宫为这位伟大领袖担任匿名助手，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首都律师，现在对美国政治更实际的层面形成一种坚韧不拔、愤世嫉俗的态度。但是，像很多头发花白的新政追随者一样，他很珍惜三十几岁时自由主义者的记忆和情结。在汉弗莱的极端自由主义者阵营里，罗总被视为保守派；而在保守主义者中，罗又被看作极端自由主义者。

正是罗在6月，甚至是早在德卢斯会议之前，就向汉弗莱指出了他的唯一竞选路线。“在政治上，”罗说，“你的战略从来就不是主动选择——而是选择强加于你。”

罗指出，很显然，汉弗莱在明尼苏达州之外毫无知名度，即使大家认识他，脑中浮现的也是一些刺耳、负面的形容词，比如狂热和极端福音派。要获得全国认知度，他就得利用这些年在明尼苏达州赢得的好感，有了认知度，就能在民主党少数派大会和权力掮客那里获得默许。要想实现这一切，首先，汉弗莱要走入大家的视线。

为大家所熟知，让选民一眼就能认出来，可能是美国总统竞选政治中最难获得也是最必要的条件。人们不会投票给一个不认识的候选人，这样的政治营销让任何同等的商品营销相形见绌。但是，花钱买知名度，或是上演一场激发公众关注度的秀，那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而名望又是买不来的。要想赢得名望，只有得到国家媒体的大力支持（通常都预留给共和党人了），或是得到美国政府的背书，政府可以把一个人擢升为内阁部长或是外交显要。政府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抬升到国家舞台上受人瞩目，就像罗斯福为杜鲁门、哈里曼（Harriman）和另外6个人所做的一样，或是像艾森豪威尔为尼克松所铺的路一样。

这样的方式简单而优越，但是，如果一个地区政治领袖无法以此蜚声全国，他就必须在选举中秀肌肉，选民可以让他成为新闻热点——就像埃斯蒂斯·基福弗在1952年和1956年所做的一样。这是初选的一条道路——艰困之道。但是吉姆·罗（Jim Rowe）坚持认为，汉弗莱别无他法。他想要赢得知名度，就得在初选州发表竞选演说，就得在竞选公开赛中挑战肯尼迪，或任何其他对手。

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像基福弗那样拉一个很长的初选战线。1952年，基福弗横扫民主党初选，只是因为他没有对手；1956年，基福弗在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竞争中重走当年路，却首先在佛罗里达州败下阵来，然后在加利福尼亚州一败涂地，因为他已经财尽力竭。可以肯定的是，这一

次，在与肯尼迪的对战中，汉弗莱要寸土必争。但是，要知道，在战斗力上，肯尼迪至少可与史蒂文森匹敌，更别提他还资金雄厚。

因此，在罗和汉弗莱的策划框架下，初选阵地必须精挑细选。汉弗莱不敢奢望在初选中能赢得足够选票，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处于优势地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筹到足够资金在一个以上的初选州上演一场大秀。所以初选的赛场必须有所取舍，筹谋之下，也许他会有机会获得足够出线的150—200票和除此以外的一些票数，出席全国代表大会。首先，他要拿到最低出线的票数，这样才能在洛杉矶确立谈判地位；其次，他还要赢得热心公民团体的注意和支持，因为这是民主党政治中的一支关键力量；而最重要的，他必须吸引东部大城市政治领袖的注意力，他们控制着民主党大会上抱团的一组摇摆票。但是，金钱并不足以吸引这些领袖的注意（如有需要，他们可以尽情从市民身上榨取金钱，为己所用）；同样，想用未来政府的职位来收买他们也很难（联邦政府的职位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荣誉——耀眼但不实用；在这些大城市，有价值的职位是地方行政长官、法官、神职人员、许可委员会委员）。不过，只要参选人能证明自己实力雄厚，在选举中游刃有余，或是展现出迷人的政治魅力，让人相信选民在11月会不假思索地把票投给他，而他的支持，会令大城市的地方候选人如虎添翼，这些大城市的政治领袖也很容易动摇。

如果汉弗莱选择正确，并赢下这些初选州，他将会获得足以到党代表大会谈判的150或200票——到那时，他还能期望公民团体和史蒂文森旧信徒给予支持。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向东北部大城市的政治领袖秀肌肉。有这两个团体的支持，他就有可能在党大会上压倒南方的政治寡头。

但是，选哪些初选州呢？如果汉弗莱只挑容易的上，尽管在这些州他具有压倒性的天然吸引力，但这样的胜利并不能帮他摆脱政治上的固有形象——极端自由主义的狭隘定位。比如，哥伦比亚特区的初选可以轻松取胜——但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大部分来自黑人，而黑人在情感上已经偏向汉弗莱这样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南达科他州的初选也能轻松拿下——但是，同样不能打动任何人，因为这是明尼苏达州的邻州，在这里农业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如何这个农业大州已经提前被汉弗莱收入囊中。威斯康星州很好。但是，这里政治信仰混杂，种族多样化，工业和农业共舞，天主教徒比例高（31%），而且距离明尼苏达州太近，会让人不禁联想到汉弗莱的明尼苏达州员工周末会跨州来对他们洗脑，改变政治信仰。而从理论上来说，威斯康星州很近，在这里打选战成本最低。西弗吉尼亚州也很好——一个失业率高企的州，一个诱人的战场，离明尼苏达州够远，这里的胜利会让汉弗莱的魅力走向全国。然后就是俄勒冈州，一个坐落在太平洋海岸、自由开放、向所有人敞开怀抱的初选州，但是，这里的民主党似乎正在以明尼苏达州和中西部偏

北地区新兴民主党的套路复苏崛起，打的也是民众基础的牌。

面对5个初选州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汉弗莱的人自然就要考虑钱的问题了。从头至尾，汉弗莱的竞选资金池里就没有足够的钱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打完一场初选战。从12月开始，汉弗莱和他的助手不得不在筹款和竞选活动上投入相同的精力。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虽然我们一直在谈开支、资金和资源，其实汉弗莱的竞选仰仗的并不是钱，而是点子和情怀，靠的是他把自身那股斗士的热情直接传递给全国民众。如果汉弗莱对美国精神的解读是正确的，如果他的浪漫主义情怀与选民契合，如果他筹组工会–知识分子–农民跨界联盟的技巧放之全国而皆准（在明尼苏达州非常有效）——他就会赢。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如此相似，正是打响头炮的不二选择。因此，所有的资源都要先用在威斯康星州，他们要争取拿下这个州。如果一举拿下，这场胜利将会给汉弗莱带来足够的资金去争取西弗吉尼亚州；如果西弗吉尼亚州也赢了，他就能筹到更多钱去攻下下一个州……如果……如果……最后就能走到党大会。

所以，在1959年秋转冬的时候，汉弗莱——不论他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是大是小，一场旷日持久、风险无时不在的选战即将打响，他将到一个陌生的初选州造势。在那里，他的热情还未受到检验。所以在1959年12月30日，即将迈入决定性的新年之际，他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而且，汉弗莱是第一个宣布参加1960年大选并且开跑的人。

“我从未真正说过我为什么而竞选。”汉弗莱后来在1960年夏天对一个朋友这样说道。当时，他竞选总统的希望已经破灭，正拼命寻求连任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你注意到，”他露出标志性的狡黠微笑，令人放松警惕，继续说道，“所有我的小徽章和海报了吗？上面写着‘汉弗莱1960’，但没写为什么竞选。”

如果汉弗莱的竞选之路展示了民主党争取总统宝座的一个套路，那同时展开的斯图尔特·赛明顿的竞选之路，则展示了另一个套路。

汉弗莱的竞选策略是从基层着手，向选民展示力量，如果成功，就能打动那些控制南部和东部代表的权力掮客。

但是，赛明顿的竞选策略是先直接对准权力掮客。

和汉弗莱一样，我们无法明确指出斯图尔特·赛明顿第一次萌生竞选总统的念头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一想法是在什么时间第一次说出来，是向谁说的，以及是什么激发了他的信心。

1958年11月，民主党大胜，共和党落败，密苏里州的民众再次把斯图尔特·赛明顿选为参议员，而且是以780 056票（66.4%）对393 847票（33.6%）的大比分胜出。在美国政治中，任何选举中以55%或以上的票数胜出的，都是压倒性胜利；赛明顿被竞选搞得筋疲力尽，竞选结束后，他就应波多黎各总督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Luis Muñoz-Marín）的邀请，立刻带着他美丽端庄的妻子埃维（Evie）飞到波多黎各，与阳光大海为伴，好生休养。但是在休息的时候，赛明顿的大脑却在盘算着近期的胜利对于全国选举有何意义。所以他坐下来，写下人生为数不多的手写信，收件人是他的密苏里州同乡，身在华盛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注)。信中写道，他一回首都，他们就要认真谈谈整体形势。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是华盛顿律师精英中的一员。他的人生平步青云，加上长相英俊，完美到几乎让美东大城市的人腻烦，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平步青云是因为良好修养和善于分析的头脑，才真正折服。克利福德多年来一直是赛明顿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敦促赛明顿在几乎无望的情况下于1952年出来参选密苏里州参议员，这是赛明顿第一次竞选；在赛明顿投身首都政治圈前后的日子里，他始终引导赛明顿。

讨论赛明顿参选的第一次会议只有两个人参加，时间是1959年1月初，赛明顿刚从波多黎各回来三四天；会议在克拉克·克利福德位于罗克韦尔大街（Rockwell Pike）的一所有150年历史的白色农舍举行，那里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再往北。克利福德和赛明顿的夫人与男士们一起用完晚餐后，就让男士们去了克利福德楼上的私室，他们单独谈到了凌晨一点半。

在克利福德的印象中，赛明顿从来没有在房间里大步踱来踱去，然后突然伸出一只手说，“克拉克，我要参选”。那是一段漫长而冷静的对话。赛明顿坦诚地说，他现在确实在认真考虑竞选总统，而且他知道克利福德早就开始为他考虑这件事，他希望克利福德简明、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个夜晚是开拓性的，而且值得一提，因为那是赛明顿第一次向别人说出要参选的想法。

在初始会议和1959年早秋之间的几个月里，两人又进行了多次对话，直到9月6日，一个周日的早晨，地点还是克拉克·克利福德的家里，最终调研和决定竞选的时刻终于到来。在这头尾两次会议之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联络，进行考察，在大本营密苏里州开始动员。现在，他们有8个人。除了克利福德和赛明顿之外，还有一个全密苏里州阵容——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理查德·R·南希（Richard R. Nacy）、登顿·史密斯（Denton Smith）、威尔伯·丹尼尔斯（Wilbur Daniels）、斯坦利·菲克（Stanley Fike，参议员的私人助理）和来自密苏里州第七国会选区的议

员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他后来成了政治运作的战地经理。这次会议只缺密苏里州州长詹姆斯·T·布莱尔（James T. Blair，就像明尼苏达州州长弗里曼一样，布莱尔能让整个密苏里州为全国竞选活动出力）和最伟大的密苏里人，前总统哈里·杜鲁门。

会上讨论的内容围绕着资源、对手和决策。

所有人都认为，最重要的资源就是赛明顿本身。从地域上来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的出生地很好——一个工业化的边境州。他有为总统而生的外表，相貌英俊，一头银发。他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成功串联起来的：在私营企业的成功，在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功，在参议院的成功。而且在与会人的眼里，他的能力很强，没有一个对手可与他相提并论。

赛明顿的问题和汉弗莱相似——在密苏里州以外，他寂寂无闻，而能认出他的人也都认为他是个单面手，一个国防领域的专家，其他一概不知，而在国防领域又被贴上了“轰炸机大男孩儿”的标签。另外，在全国竞选活动中，赛明顿个人的政治人脉基本是很有限的。最后，他的媒体的关系一般，或者说很糟，华盛顿的媒体基本都把他看作国防话题上的偏执狂，认为他在其他议题上都无足轻重。

虽然为时尚早，但与会人士还是会考虑其他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以及他们可能遭遇的竞争：汉弗莱——但他们确信汉弗莱绝不会被南方的政治寡头们接纳；林登·约翰逊，他们同样肯定他不会被东北部那些有权势的工会领袖所认可；派特·布朗，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被排除了，因为如果有且只能有一个天主教竞争者，那必然是肯尼迪；新泽西州的迈纳（Meyner），当时被视为黑马，也被排除了，因为他们认为他年轻时脱离天主教会让他丢失了一些偏执狂、天主教徒、新教徒选民和代表的支持。他们知道，约翰·F·肯尼迪是头号劲敌。但他年轻，是天主教徒，看起来像个男孩儿，没有行政经验。另外，史蒂文森的动向当时无法被纳入考量。

分析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构之后，他们的解读就是一个词：僵局。1/4的民主党大会将一如既往地把持在南方领袖手中。其余的3/4很可能分化成相互敌对的几派——天主教徒占比高的大城市、农业占主导的中西部和理论家们。美国的多数党就这样撕碎成几个少数派。除此之外，信仰伊斯兰教的黑人说客和强悍的工会说客也会施加重压，还有一些各州的宠儿。民主党大会一定会关注汉弗莱和肯尼迪在春天的头场遭遇战。如果各州初选的结果是不分胜负（一些聪明、有前途的华盛顿人通常会用“好一场光明磊落的较量，无人胜出”来形容这样的结果），这也不无可能，那么民主党大会就会分裂成一些敌对的派系，到时候就得靠控制各派的权力掮客选出一个折中的候选人。

在1959年的秋天预想1960年的民主党大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将是一场僵局。如果注定是一场僵局，那斯图尔特·赛明顿就是最合适不过的候选人。

事实上，他们还讨论了赛明顿是否应该加入初选战。首先，初选需要一大笔钱——一场大型活动大约需要至少20万美元。其次，赛明顿在初选州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现身初选州之前，他在全国媒体中无足轻重的形象必须予以修正。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圣人杜鲁门，现在也成了斯图尔特·赛明顿的赞助人和最大的政治资产。但是，就像大多数从大城市政治机器中成长毕业的人一样，杜鲁门认为开放的初选近似罪孽，内耗随时都有可能撕裂党组织。在这种4年一次的竞争中，胜利不保证带来什么（参见埃斯蒂斯·基福弗），但失败却会让人失去一切［参见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和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另外，哪里？哪个初选州？在威斯康星州，汉弗莱会夺走农民的选票，肯尼迪会夺走天主教徒的选票，赛明顿必然会排在可怜的第三位。在西弗吉尼亚州，像赛明顿这种贵族做派和执行官的脾气，怎么与汉弗莱和肯尼迪这种粗犷干练的斗士相争？再者，一个初选州就会让赛明顿和对手走上怨怼之路。既然赛明顿成为候选人最大的机会来自折中方案，又何必触犯众怒呢？

关于初选州的决策一直没有定论，1959年秋天的会议宣告破产。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决定已经有了。赛明顿和他的助理们负责权力掮客这条线，他们是政治的神经，哈里·杜鲁门执掌白宫期间巧妙地掌握着这条线，现在要移交给他选择的接班人——赛明顿。不管是真是幻，感觉上这些来自大城市和大州的君王缔造者会把赛明顿视为他们的唯一安全牌。卡迈恩·德萨皮奥（Carmine de Sapio）和迈克尔·普伦德加斯特（Michael Prendergast）是友好的，他们当时看起来在纽约权势滔天；杰克·阿维（Jake Arvey）在芝加哥的影响力虽然日渐式微，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也是可以拉拢过来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David Lawrence）也许能争取过来；印第安纳州麦金尼组织的人几乎确定会追随麦金尼，而杜鲁门指东，麦金尼不会往西。南方人已经表示如果没有约翰逊，他们会青睐赛明顿，国会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尤为暖心。除此之外，还有明摆着的事实就是，赛明顿的从政记录对黑人选民、工人和商人都有潜在吸引力，因为赛明顿在民权和劳工上的立场先进，而商人能判断他在私营领域的成就。其他候选人可能在各个领域分别是第一选择——但没有一个人能在别人的领域占据第二位。

在制定策略的时候，赛明顿的经理人深信，只要参选人有能力，他就可以把这个人推上总统宝座。但在久经沙场的政治老手看来，这个想法近乎天真。赛明顿所拥有的那种能力对大众来说有点儿曲高和寡；以他的个性，不管是在德国还是英国，都能在议会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这点毫无疑

义，但在喧嚣的美国政治中，通常如石沉大海，激不起浪花。而根源就在于，赛明顿的个人影响力与群体规模成反比。在公众集会上，赛明顿表现平平，暗淡无光；在10人的集会上，他有适度的说服力；二三四人为伍时，他光芒四射，是绝对的主角。他是核心圈子里的行动派，会醉心于一个恰当的组织和组织的方向，会因为责任而备受激励，喜欢让事情顺利进行。人以群分，正是这样的人，对他的同类——那些依照组织和权力来办事的人有巨大吸引力。

赛明顿能否获得提名靠的就是民主党组织的现有领导层。当人们和这些政治大佬交谈时，会一再被他们认真考虑总统之位的样子所打动。一些政客在谈到总统候选人时最喜欢的一个用词就是“分量”。（“他够分量吗？”他们问道，或者会说：“相较这个职位，他分量太轻。”）另外一个时常会用到的词是“格局相当”。（“他有这个职位需要的格局吗？”或者：“他只够一个州长的格局，没有总统的格局。”）掂量能力时，他们会问：“他能一直走下去吗？”

说到选择，政坛小将们倾向于选择能充实票仓的总统参选人。这样的参选人自带威名，能确保他们在当地的竞争中胜出。青睐有选票号召力的强人领袖，这样的行为有时候被称为“舒思深规则”（Shorenstein rule），因为海米·舒思深（Hymie Shorenstein）在上一代人中最好地诠释了这种情况。多年以前，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还是犹太人的地盘，身材圆滚滚的海米·舒思深就是那个地区的强人领袖。作为一个在自己领地里的大人物，海米通常会以14或15比1的大多数胜出，他激情四射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出色。在罗斯福的一次竞选中，他为小罗斯福拿下了60 000比3 000的成绩。这样一个人在上司麦库伊（McCooey）的布鲁克林政治机器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是替麦库伊拍板的人。海米相信有选票号召力的领袖，这样的信念一直以来都在帮他。有一年——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当政客们因为当地提名人而陷入分歧、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让舒思深来选择一个他愿意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如此获得提名的候选人自然给舒思深委以重金做竞选开支，静观选战进入10月，进展似乎良好——但候选人却看不到任何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海报挂在墙上，没有组织在运作，没有游行和集会。候选人担心自己的赢面，一个下午，他没敲门就步入麦库伊的接待室，想要抱怨舒思深的懒惰。他正好在那里撞上了舒思深本人，舒思深也在等着见麦库伊；舒思深问候选人为什么来这里，候选人倾诉了自己的担忧。“啊，”舒思深回答，“你在担心？听着，你有没有往南去过码头，看看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渡轮进港？你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低头看过水里的口香糖包装纸、香蕉皮和垃圾？当渡轮进港，自然会把所有垃圾带进港。你这艘渡轮的名字叫作富兰克林·D·罗斯福——别再担心了！”

今时不同往日，舒思深规则已经不复上一代的辉煌了。美国人受教育程度提高，见多识广，选票也就随之分流；他们不再愿意追随领袖。当然，政客们还在找寻有选票号召力的强人领袖；但是当他们找不到这样的人，不能坐享其成，当他们不得不提携候选人向总统之位挺进时，他们希望这个人能成为一名出色有用的总统，一个强力执行者，一个能让国家平稳繁荣前进的人，还能允许他们从中牟利。我和纽约的一些顽固老派政治家谈论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发现他们对这个问题极其感兴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他们的区，这个问题是个麻烦（“总会给妈妈和家庭制造麻烦”）；第二，在他们的理念中，如果一颗氢弹落在纽约市（他们知道纽约市是第一目标），对商业、政治和政治机器都很糟。政治机器无法在含有放射物的残垣断壁中运作。而他们不希望氢弹降临纽约市的最原始理由就是——这会令大家同归于尽。他们期望有一个强大的总统，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强悍的国防，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封疆大吏。只要总统允许他们管辖自己的片区，事务自理，有任免的权力，他们就能放手让总统来处理战争与和平，通胀和滞胀，法国、中国、印度和外交事务（但不是以色列、爱尔兰、意大利或者当今的非洲）。

老派的大城市领袖是所有政治领袖中最偏狭的，比少量激进的极端社会主义分子、下莱茵省（Bas-Rhin）、马赛（Marseille）或任何法国偏远小镇的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的那些政客虽然偏狭，但他们不会只盯着一件事，而是对什么事都指指点点。美国这些政治领袖只盯着自己的地盘，如果让他们和恺撒瓜分世界，只要恺撒让他们全权负责自己的街道、公园、许可证和当地任命，他们会把整个世界都交给恺撒，绝不从中使绊。所以，按照他们的定义，杜鲁门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当然，即使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他也是世界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样的一类人就觉得在赛明顿身上看到了一位“安全的”总统，至少他看上去像，这对他们很重要。赛明顿懂导弹、五角大楼、外交事务、农业补助、通胀和滞胀，他能安全地治理国家。作为一个首领，他也是张安全牌：他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成为政府首脑，他会承认那些政客的地盘和责任，而政客们也会认可他。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赛明顿远不止这种扭曲的形象，他的格局更大。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在企业，他都称得上行政管理的艺术大师。他热爱并且懂得行政的简单和复杂，这有别于大多数民主党人。他已经赚到了财富，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只想服务社会。

可惜，赛明顿身上欠缺了点儿什么。一个总统候选人必须能通过平面媒体、电视和电台这样的媒介激发出超乎常理的情感。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他无法和所有选民面对面，他要通过媒体去煽动选民，无论男女老幼，直到他们的热情都被激发出来。赛明顿在自己的大本营密苏里州具有这样的魔力。但他的经理人知道，在民主党大会之前，赛明顿没有能力把

这种魔力扩散到全国，只有在大会之后，当权力掮客选择了他，他才可以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出现在民众面前，去继承民主党的所有情感与传统。

因此，和汉弗莱一样，赛明顿的竞选策略也只有一个选择。

汉弗莱不能指望权力掮客的慷慨或慈悲，只能靠自己在初选中展示力量，所以汉弗莱不得不选择初选州策略。汉弗莱绝不会是任何人的折中选择。

赛明顿还能指望权力掮客的友好待见，通过杜鲁门的引荐，让自己得到赏识；具体来说，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陷入僵局的民主党大会；再具体一点儿，党大会上，他必须在对手的默许下成为各方折中后的候选人出线，必须避免在初选混战中与他人兵戎相见。

因此，赛明顿和克利福德在1959年夏天没有宣布参选，直到1960年3月24日才宣布——太迟了。

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现任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竞选证明，在美国政治权力中还有另一种力量。

表面上，林登·约翰逊的选战就是老南方选战。民主党大会上总会有南方候选人，这个传统从约瑟夫·T·鲁滨逊（Joseph T. Robinson）和约翰·南斯（John Nance）时代一直延续到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和林登·约翰逊时代。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约1/4的代表来自南方，南方人期望自己的声音在大会上得到倾听——或者至少在返乡的时候，证明自己为了目标奋斗过，即使失败，也要战斗。林登·约翰逊在1956年就曾是这样一位传统而无望的候选人。

但是，1960年，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约翰逊的候选人身份先于汉弗莱或赛明顿揭晓，消息是在大本营得克萨斯州公布的，当时气氛轻松愉快。1959年10月17日，在达拉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宣布成立一个非正式的约翰逊总统竞选委员会，他和得克萨斯州州长普赖斯·丹尼尔斯（Price Daniels）是联合主席。不久之后，约翰逊总部就设在州首府奥斯汀（Austin）的利特菲尔德大厦（Littlefield Building）。从1959年秋冬到1960年，这里就锣鼓喧天地展开了约翰逊的选战——得州的地方政客想要在国家层面上试水，得州那些锐意进取的富人予以支持，不能提供资金的，也会自己出力或提供人手。他们一起在南部和边远西部高喊着“一路与林登·约翰逊同行”的口号。他们的装扮很有辨识度，一眼就能看出是得州人，黄色的玫瑰徽章，大檐

帽（还有，用对手的话说，靴子上的牛粪）。他们嬉闹和欢乐地来了又走了，一波又一波，在密苏里州和太平洋之间的每一次民主党集会上引起骚动。他们在观众席一直喊着林登·约翰逊的名字，提供饮品，用得州县政府的风格游说国家代表，但是雷声大，雨点儿小。他们的活动的确展现了得州大本营满满的能量，但是利弊功过现在还存有争议。

要想了解约翰逊的正式战略，就得把目光放到几个更瞩目的人物身上。够得上这个层次的只有5个人：两位主力——林登·约翰逊本人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另外3个人——约翰逊在家乡州多年的臂膀，约翰·康纳利[注]；他在华盛顿的私人顾问和助理，魁梧的乔治·里迪（George Reedy）；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G·马格努森（Warren G. Magnuson）借给约翰逊的实地调查员欧文·霍夫（Irvin Hoff），负责收集西部地区的情报。

对1960年民主党大会做了一番分析后，他们与赛明顿的智囊不谋而合：一场僵局。但是对待可能出现的僵局，约翰逊团队与赛明顿智囊制定的策略大相径庭。约翰逊的智囊团熟谙大会规则，因为他们把控着美国国会政治体系。他们知道，约翰逊要想获得提名，靠游说个别的大会代表是行不通的。约翰逊留给公众的印象都来自他过去的政治记录——精明沉稳，是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的问题处理高手。如果约翰逊精明能干的形象在1960年整个国会会期得以维持，而民主党大会又如预期般陷入僵局，那他们的计划就可以启动了。

这个计划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对国会的掌控，以及约翰逊和雷伯恩通过立法上的交易日积月累攒下的人情债和尚未兑现的约定。可以这么说，在美国的每一个州，至少都住着一位政治领袖，公开或私下，新近或久远，受过雷伯恩或约翰逊的恩惠，比如帮忙通过一个议案，提交一个法案，或是给某个州、城市或区域一些优待。遥远的康涅狄格州是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和政治大佬约翰·贝利无可争辩的政治资产，也是约翰·肯尼迪的坚定后盾，一如他的大本营马萨诸塞州那样稳固。但即使是在固若金汤的康涅狄格州，新任参议员托马斯·J·多德（Thomas J. Dodd）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被康涅狄格州的单位投票法捆住手脚，不得不支持肯尼迪，但内心里，他倾向于雷伯恩和约翰逊；如果民主党大会陷入僵局，康涅狄格州投票将不受约束，多德就会转投约翰逊了。在整个美国，受过他俩恩惠的人不胜枚举。即便是在看起来最不待见南方候选人的纽约黑人区哈莱姆，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也可以算是支持约翰逊的，因为他曾得益于两人的帮助获得心心念念的委员会主席一职……以及其他的恩惠，这也算是回报。在全美上上下下，1960年的政治季将会把新一批怀揣抱负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带入选举的棋局中，他们都清楚自己在国会委员会的任命和首个诉求都受控于约翰逊和雷伯恩的政治机器；

在国会政治体系中，这两位政治领袖不能躺在过去的恩德簿上高枕无忧，而是要在这批新晋大军的身上激发出敬畏和希望，来平息或压制他们在民主党大会上的敌意。美国国会政治体系是一个宏大的立法程序，也许算得上是西方民主世界中最有效的立法程序。但是国会政治体系有别于市政厅、州议会和总统政治，政治工具也是各有分工的。但约翰逊认为国会政治机器可以应用到总统政治中。

约翰逊阵营的另一支作战力量也值得一提，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战斗成果，而是他们身上的情怀。如果说1960年大选有哪位候选人能代表罗斯福新政拥护者（New Dealers），那就非约翰逊莫属。已届老年的新政拥护者组成一支散漫低效的联盟军，作为约翰逊竞选的北翼部队（华盛顿—纽约）行事，但地位略尴尬。这些新政拥护者包括一些名望仍在的顾问，比如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奥斯卡·查普曼（Oscar Chapman）和汤米·“软木塞”·科科伦[注]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也是新政拥护者，他送上了祝福，还有艾略特·詹韦（Eliot Janeway），现在转型成了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为约翰逊筹集了大约13.5万美元的资金，当然主要是在纽约一带募得的；但是他们发挥的作用不见得比得克萨斯州的那支队伍强。在纽约人眼里，那支队伍穿着牛仔靴，散发着马厩的臭气，纽约人轻蔑地称他们为“得克萨斯游骑兵”。

这些新政拥护者都是一些念旧的人。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刚好碰上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政，他们在那个时期开启了新视角，开阔了视野，林登·约翰逊本人也成长在那个时代。用法国人的话说，他们忠诚，是因为他们属于“1948阶级”。1948年，杜鲁门赢得大选，民主党告别罗斯福世界——但罗斯福的影响在延续，从各州推及全国。而在罗斯福的政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帮人，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主导民主党。正是在1948年，伊利诺伊州率先选择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康涅狄格州选择了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明尼苏达州首次启用了休伯特·汉弗莱，田纳西州提拔埃斯蒂斯·基福弗为参议员——得克萨斯州把林登·约翰逊从众议院的无名小辈擢升到参议院，他以87票的优势当选参议员。这些人骨子里都受到新政的影响。现在，大选年临近，那些新政幕后操盘手需要挑选一个60年代的新政领军人物来抵御敌手，大多数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林登·约翰逊这个名字。直觉告诉他们要团结一致对抗约翰·F·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属于更年轻的战争一代，而60年代应该属于他们。选择林登·约翰逊为核心，已经可以看出不同世代的人自动按年龄站队，而且两党都是如此；如果你够聪明的话，还会发现年轻人不仅更有活力和远见，在保险统计表上也显得更有优势。

但是到了1959年年末1960年年初的时候，无论是旧时的新政拥护者还是林登·约翰逊的得州同乡们都没能想到更好的战略，他们的王牌依然是这位

精明的参选人本身，由他继续领导好这个人人想出头的参议院，然后期待民主党大会陷入僵局，从而对国会权力体系加以利用。

1959年年底前，汉弗莱、赛明顿、约翰逊的竞选组织都已经成立，但还不具规模，都是由这些竞选总统的人亲率，手底下只有几个核心圈子的人，三五十个。而打选战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和唯一的理想。

1959年年底，还有一个人当时不确定是否愿意参选，7个月后却成为肯尼迪争取提名的头号劲敌。他就是阿德莱·史蒂文森。没人知道他的动机和意图——恐怕在那个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在外人眼里，甚至在他的家人和密友看来，1959年以前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是一个快乐的人。1952年大选后，他就回到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的旧农舍。他孤独忧郁，选举落败，婚姻破裂，孩子在外上学，房子出租多年，收回后却变得陌生。1952—1956年的数年内，他心里隐隐期待着1956年的民主党提名。他深深觉得自己对党有一种义务，因为他对民主党有愧。但是1956年落败后，他的人生变得豁达。他的儿子小阿德莱和他住在同一条路上；小阿德莱和他温柔的妻子南希周末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家庭生活开始好转。史蒂文森喜欢利伯蒂维尔，也喜欢宁静的夏日里树木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会穿着蓝色运动鞋和蓝色短裤，在草坪上晒太阳。他随心所欲地睡在自己的床上；世界各地的政要和学者带着景仰之情来到他家；如果他想感受大都市的辉煌刺激，他随时都可以动身去纽约；他以记者的身份游历世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了解世界大事。

但是在老谋深算的政客看来，这个表面平和快乐的人内心其实很矛盾，总统这一职位附带的双重权力属性让阿德莱·史蒂文森很是分裂。对公共事务，史蒂文森的姿态称得上高尚，这是任何国家的政治体系中罕见的，但对政治，他是蔑视的，他觉得政治充斥着噪声、交易、残酷和诡辩的肮脏。但是公共事务和政治的关系就像爱与性，密不可分。史蒂文森对待政治的态度，总让人觉得他把爱和性割裂开来，把爱看作人类最高贵的情感，却把性视为肮脏污秽的事物。

这种内在矛盾性似乎也是他思考问题的特点。“内心深处，”在1959—1960年冬天那几个月里，他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想要提名。但他希望民主党大会来找他，而不是他去找民主党大会要。”

一方面，党大会前的政治角力肮脏且残酷，令史蒂文森心有余悸；1956年，为了打败埃斯蒂斯·基福弗，他在美国国土上参加一场接一场的初选活动，从新罕布什尔州到明尼苏达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州，每一场都充满杀气，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身心俱疲的了。残酷的1956年初选选战之后，同

样残酷无情的总统竞选活动紧跟着就启动了。可以说，史蒂文森的精气神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史蒂文森知道，在美国国内政治体系中，内斗催生和管控着权力，而他恰恰痛恨这一点。

但是，总统的职位还有另一个属性——在海外行使美国的权力。一旦问鼎白宫，就能手握权杖，总统一职自带庄严强大的力量与影响，它属于历任总统。这一点吸引了史蒂文森。他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在海外的地位和角色；他游历海外整整8年，深刻意识到美国在世界面临的压力、危险和对世界的承诺。他在气势磅礴的演说中，在私下的谈话里，在大量的文章中，都流露出这种关切，其影响力超过任何普通公民，震慑人心。像史蒂文森这样的好公民，在世界舞台行使美国的权力是他不能逃避的任务，一旦被召唤就要出山；但是如果民主党没有邀请他，他不会主动请缨，也不会为了提名去做交易、密谋或重拳出击。没有人能动摇他的立场，直到洛杉矶提名大会的最后24小时。

但是，很多人仍在努力。有一句政治格言是这样说的，任何职位的候选人承载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雄心，还有众人的理想。史蒂文森把这句格言演绎到了极致。史蒂文森不会自发行动的，但是在政治定义里，他本人就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是不容忽视的。他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号召力。在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戴维·劳伦斯对他钟爱有加，而且是那种年轻人充满朝气的喜爱；在加利福尼亚州，他的那些追随者都是真正的狂热分子；在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俄勒冈州，还有其他虔诚的力量。1952年，他在全美召集的那批初入政坛、士气高涨的年轻人，现在都已成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放弃他。如果史蒂文森不行动，其他人会替他行动。

1959年12月，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开始有组织地展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拨力量在行动，一拨是自发组织的狂热追随者，他们不计代价，穷尽办法，希望能让1952年和1956年的领袖再次出征；还有一拨就是认真的规划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然后不急不躁、低调地把这些活动和史蒂文森的提名挂钩，以确保他的提名之门始终敞开，直到他们能够说服当事人去竞选。

第二拨人的规划中有4个焦点团队。第一个团队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史蒂文森在芝加哥的朋友负责提供资金，前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主席詹姆斯·多伊尔（James Doyle）负责盯着那批狂热、政治圈外的史蒂文森追随者，密切留意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壮大的过程，防范他们的负责人做出出格的事。第二个团队在纽约州。一个纽约改革团队在华盛顿的阿格尼丝·迈耶（Agnes Meyer）女士的资助下，雇了作家威廉·阿特伍德（William Attwood）全天候工作，帮史蒂文森准备研究和演说材料，用于春季的政治活动。第三个团队由电影制作人多尔·沙里（Dore Schary）率领，在洛杉矶之外的地方筹款，以备将来有什么大东西需要资金。第四个团队负责

协助前面三个团队，成员有：华盛顿律师乔治·鲍尔（George Ball）以及他的年轻合伙人约翰·沙伦（John Sharon）、参议员迈克·蒙罗尼（Mike Monroney）和他的得力行政助手汤姆·芬尼（Tom Finney），他们4个人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中心。鲍尔–沙伦–蒙罗尼–芬尼团队才是所有团队的战略核心。

在史蒂文森宣布参选前，这些人不能宣布竞选意向。但他们要制定好应对策略，因为也许某一天他就愿意参选了，或者某一天各地初选把民主党撕裂，这个国家需要史蒂文森。这样，当机会来临时，他们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而是能立刻投入战斗。

就在那个冬天，12月将尽，1月来临之际，汉弗莱和肯尼迪都宣布参选了，史蒂文森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仍然很坚定，不会寻求提名。自1956年以来，他在挑剔的职业律师界日益赢得尊重，成为一名冷静、精益求精、娴熟和高效的律师。现在，作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理事会的成员，为了准备这个大部头著作的西班牙语版本，他在南美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工作要做；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是雷诺兹金属公司（Reynolds Metals）的法律顾问，这家公司在南美也有一些工作。在1月底，史蒂文森仍然迷惘，保持沉默。他启程去了南美，打算在那里待两个月，就是工作和观光，所以当初选临近的时候，提名战却少了提名人。

但是，在那个政治季的萌芽阶段，所有筹划团队里首屈一指的当属1959年10月28日周三早上在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港开会的那支。

在权衡对手时，没有谁能对他的团队坐视不理，那都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只有这支团队才能被载入美国史册。

他们在罗伯特·肯尼迪家的起居室会面。1年零11天后，这间起居室就成了他们在大选夜的指挥所。据参会人回忆，那是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天气，寒冷，晴朗；一个孩子的足球半瘪着躺在外面的草坪上；透过阳台的窗户，他们能看见海；透过壁炉上方的窗户，他们能看见新英格兰的叶子变成了秋天的颜色，红黄色格外耀眼，在严冬里与海角的绿色短叶松形成鲜明对比。海恩尼斯港就坐落在科德角；壮阔的大西洋沙滩起于佛罗里达州，跨越新泽西州和火岛，止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这一段最美，因为这里有天然沙丘。他们开会的房间布置简单——摆着黄色和绿色的躺椅，几张旧安乐椅和一两个厚垫；房间朝阳，最大的摆设就是壁炉，房间很大，是一个办聚会或开秘密会议的舒服场所。

16个人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我们最好细细研究一下他们，因为他们的匠

心艺术和无限活力将在下一年里缔造总统神话。一个世纪前，亚伯拉罕·林肯的支持者改变了19世纪的政治格局。在那以后的总统竞选中，无论是计划周密性、面对的困难和传统的阻碍，这支竞选团队都可以碾压众人。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和平、中等繁荣，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稍感不安，对这批人的谋划全然不知。

在这16人当中，至少有9个人应该拎出来说一说，因为正是他们共同打造和指挥的政治机器，在下一年，在这个房间里，给他们带来了胜利。这9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候选人和他的弟弟——曾经参与过总统政治；但这9个人却各显神通，证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虽然竞选活动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聚在同一个房间里。

首先是参选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他的弟弟、聚会的主人罗伯特，他们分别是42岁和33岁。

还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两个年轻人。肯尼思·奥唐奈，35岁，前哈佛大学橄榄球队队长，罗伯特·肯尼迪大学期间的队友，皮肤黝黑，身材瘦小，沉默寡言。在接下来一整年，他在公共场合只会流露出两种情绪：一种是好奇，这时他会抬起深色的眉毛；另一种是乐不可支，这时他的嘴角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奥唐奈的搭档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劳伦斯·F·奥布赖恩，42岁，圆脸，慈眉善目，健壮，温和，工作上有不竭的才能，从不会恼怒，一贯的绅士。奥唐奈和奥布赖恩算一个团队，他们的配合就像橄榄球的四分卫和拦截中锋——奥唐奈负责战术，奥布赖恩负责组织。他们很有默契，一个点子冒出来的时候，很难说到底是谁先想到的。到目前为止，他们一起为肯尼迪工作了8年；他们一起颠覆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以肯尼迪的名义对付当地的无赖，指挥了1958年肯尼迪的参议员竞选。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就以1 362 926（73.6%）对488 318（26.4%）的大比分领先不知名的对手，以席卷之势横扫马萨诸塞州。在这个团队中，奥唐奈与肯尼迪直接对接，把肯尼迪的想法传递给奥布赖恩，由奥布赖恩指挥组织工作。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政坛中还培养起一批年轻人，当然这些年轻人没有出现在那天早上的海恩尼斯港，但是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会运作竞选活动，他们是肯尼迪的作战部队。

坐在肯尼迪旁边的是西奥多·C·索伦森[注]，时年31岁。如果说奥唐奈和奥布赖恩负责打理肯尼迪的政治事务，那么索伦森则负责充实他的知识储备。“我的知识血库。”肯尼迪之后在选战中这样形容他。索伦森高大帅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说话轻声细语，害羞。和其他人一样，他也为肯尼迪出谋划策。索伦森是一个直觉型自由主义派［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的竞选经理］，他与肯尼迪合作了7年；他的内省、丰富的阅读、优雅的写作激发了肯尼迪很

多卓越的想法和表达。索伦森从1953年1月起受雇于这位年轻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一开始只能算是一个门客，但是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之后，索伦森用他的渊博学识、恪尽职守、全身心投入征服了雇主，几乎成了肯尼迪的军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所有国内和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都要经过索伦森的筛选才会送达肯尼迪。

有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像往常一样不易被察觉，他就是斯蒂芬·史密斯，31岁，是肯尼迪的妹妹琼的丈夫。1959年1月，也就是10个月之前，斯蒂芬来到华盛顿秘而不宣地开设了第一个肯尼迪竞选总部。他瘦削，轻声细语，谨言慎行，接受过商务培训（他的家族是纽约港运输家族的翘楚）。斯蒂芬后来成为第一个办公室经理，之后担任后勤经理，然后又成了行政主管。他从容不迫地处理选战中一应复杂棘手的财政和人事问题，最终负责动员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雇员。

出席会议的还有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民意分析师，38岁，年轻，精明，活力四射。他发现了数据的精妙之处，学生时代深受美式思维的影响。哈里斯成功经营着一家市场调研公司，1958年肯尼迪参加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竞选之前，雇他当民意分析师。哈里斯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只当是例行的商业合约，但接触之后，渐渐被肯尼迪的个性所吸引。肯尼迪的热情和激情，肯尼迪在美国政治之巅的大展拳脚，让他成为肯尼迪的狂热拥趸和核心圈子成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在全国范围内为肯尼迪做了大量民调，样本庞大，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分析师；他的报告，他对美国思维的剖析，以及他在美国人身上发现的偏见，扭转了约翰·F·肯尼迪的很多重大决策。

当时在场的还有首次踏入核心圈子的皮埃尔·塞林杰，34岁。塞林杰是法裔美国人，深肤色，圆脸，宽脸颊，再过10年到15年，他就会变成法国勃艮第区的任何一个镇长的形象——彬彬有礼，充满热忱，喜饮酒，白兰地尤甚；他有着法式思维，天性快活，才思敏捷，精明务实。在接下来的一年，他的雪茄变长了，责任心也跟着长了。塞林杰历经磨炼，从一个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19岁时，他在太平洋的一艘扫雷舰上当船长，后来去了加州做新闻记者，然后又成了国会调查员。塞林杰有两大爱好——媒体艺术和政治民俗学。对一名新闻秘书而言，无论放到什么时代，这两者的结合就是绝配。关注1960年肯尼迪竞选活动的人对塞林杰的情感，只有尊重和喜爱，别无其他。

这个核心团体的最后一名成员就是约翰·贝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主席[注]。他高大，秃顶，爱抽雪茄，表面冷酷，说话迟缓，声调略高，而且总是一副神秘的样子；他成功隐藏了自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的事。贝利在康涅狄格州任职14年期间，用近乎无情的高效打造了新英格兰地区最严

格的政治机器。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的灵魂深处残留着新英格兰政治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冲突留下的创伤。但是，贝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桥梁一般的人物。他既能用最强硬偏狭的语气与东北地区的党魁们谈论政治，也能大方理解现代政府。在他治下，康涅狄格州涌现出一连串民主党籍州长，都是联邦国家最能干的。在肯尼迪提名大会前的规划中，他的角色有点儿像东北地区党魁们的看护人。在座的那些年轻人都是政坛新面孔，太年轻，民主党内那些运筹帷幄的前辈大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贝利当时54岁，精力充沛，正是赢得党魁们信心的不二人选。

约翰·F·肯尼迪从政14年，一路走来，有很多下属、助手和帮手追随他。而每当他前进一步，身边的团队变成掣肘时，他就会彬彬有礼地甩掉一些帮手，只留下能与他携手打入下一关的得力之人。在场的所有人正是在肯尼迪10年遴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在肯尼迪的字典里，没有什么表达比“他是个普通人”或“他很一般”更惨的了。肯尼迪的衣着、用词和仪态都很优雅，一直要求上乘的工作。按照他的标准，这些人都是非凡的；他们是他选中的。

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得力助手：他的小弟弟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帅气、满头银发的芝加哥律师海曼·拉斯金（Hyman Raskin）；来自哥伦比亚特区的迷人黑人律师玛乔丽·劳森女士（Marjorie Lawson）；参议员亨利·F·杰克逊（Henry F. Jackson）的助手约翰·索尔特（John Salter），华盛顿人；罗得岛州前州长丹尼斯·罗伯茨（dennis Roberts）；肯尼迪的行政助手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个老朋友戴维·哈克特（David Hackett）。但在这部政治机器中，他们只能算零件，不能算中枢。

花名册上还有一个人——约瑟夫·P·肯尼迪，他担任过驻英国大使。他是肯尼迪的父亲，行动全凭自己做主。

这次会议的种子其实早就埋下了。自从阿德莱·E·史蒂文森在1956年落败，3年来，肯尼迪一直在做争取总统宝座的努力。一开始，只有两个人——肯尼迪和他的至交特德·索伦森。索伦森身兼数职——智囊、写手、联系人、战地经理人、政治眼线。1958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选举大胜后，他们需要更精密的政治机器，队伍开始壮大。首先，史密斯开设了华盛顿竞选基地办公室。之后，奥布赖恩从马萨诸塞州转战华盛顿；哈里斯被启用，塞林杰被留用；各地悄悄成立委员会，一旦成气候，这些委员会可能会发展成肯尼迪的区域大本营，将大有作为。

早在1959年4月1日，第一次调查会议就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召开了。那个春天，他们在华盛顿埃索大楼的10个房间里设立了总部和文员办公室，距离参议员的办公大楼只有400米。在秋天之前，罗伯特·肯尼迪辞去了参

议院立法监督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Legislative Oversight）顾问的职务，他的畅销书《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业已完成，他准备好做一名全职的竞选经理。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审视最后的作战计划，并做精细分工，责任到人。会上决定，先前的竞选经理索伦森改任政策主管，罗伯特·肯尼迪担任竞选经理，负责实际运作。虽然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些人每星期也会开会，从外地赶到总部，带来新的信息，充实总部繁复的文件和索引系统，但所有人都相聚于此，还是第一次。他们不远万里，从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哈特福德抛下繁忙的电话，远离媒体的注意，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他们讨论的不是是否参选，而是如何竞选：用什么样的手段，以什么样的姿态，在美国的权力架构中一路挺进白宫。

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只记得一些片断，没有人能全盘回忆出来。可能索伦森记得最清楚，因为他有史书般的记忆力。

“开会有利于信息交流，”索伦森几个月后说道，“可以消除误会。会上通常做不出什么重大决定。会议的一个根本意义就是提振信心，从那天早上在棕榈滩召开的早期会议到华盛顿的会议，皆是如此。我们对如何达成目标胸有成竹，我们也知道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那样的会议不会产生硬性的、重大的、非黑即白的决定，而是自上而下地确定问题后，把工作安排得更加稳妥。

“而根本的难题最终可以归结为几个现实：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出过天主教总统，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出过43岁的总统。20世纪，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总统是从参议员直接被选上来的。

“鉴于这些现实，我们得好好想想提名流程。提名可不是一次自由开放的普选，其结果由民主党联盟的各个群体决定，包括农民、劳工、南方人和大城市的人等等。他们结盟后在国家的影响力比不上他们各自在民主党大会中的分量。肯尼迪得向他们证明自己能赢得大选。通过协商获得提名是天方夜谭，他必须打一场硬仗，来证明自己的赢面，让这些团体心甘情愿地把票投给他。一旦民主党大会进入密室协商，他就与提名无缘了。所以这次‘自上而下’的会议结论就是，必须投入初选。”

既然是“自上而下”的会议，那就意味着在场的人都要聆听并服从肯尼迪的话。

开会的时候，约翰·F·肯尼迪就站在那儿，其他人坐着。他背对火炉，面对众人，一身运动夹克（之后脱掉了）和休闲裤，穿着乐福鞋，看着就像个

男孩儿。（当时他还是寸头，看起来很年轻，这是他一贯的形象，是公众所熟悉的模样，之后他换成了更成熟的侧分头，也就是他担任总统时的发型。）他当时的表现令人惊艳，在场的所有人还记忆犹新。肯尼迪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声音很高昂，能引人共鸣，但还有点儿忧郁的感觉。在私下里，他侃侃而谈的天赋仅次于休伯特·汉弗莱。他轻松自在，言辞简洁，有声有色。那个早上，他处在最佳状态。

连续3个小时，他一直在探讨整个国家的情况，没有地图，没有笔记。他只在向员工询问信息的时候偶尔中断一下，然后继续。他时而坐下，时而站着。他逐个地区、逐个州地把整个美国过了一遍，从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移到大西洋沿岸各州和中西部地区，穿过农业州和山区州，沿太平洋海岸向南，经过西南地区再到南部。“我记得，”奥布赖恩说，“他对每个州都了如指掌，不只是党派领袖，不只是华盛顿的参议员，他还知道所有的派系和派系里的关键人物，真是令人赞叹。”

“我们拥有的，”索伦森说，“不仅是最佳的参选人，还身兼最佳竞选经理。他了解现实，他知道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他知道他应该去哪里，不应该去哪里；他对地点、姓名、日期、该给谁写信、不该给谁写信都记得格外清楚。”

“他沿着波士顿的一条街开车时，”另一个人补充道，“还能回忆起10年前哪些店里张贴过他的竞选海报。

“他偶尔会停下来，让特别了解当地政治形势的人点评一下，给他指正，再继续说。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整个团队也该休息吃午饭了，竞选战略已经‘自上而下’地出炉，他也打定主意，就是这个策略了。”

在初选州打提名战是唯一出路。只有让别州的选民看到他的强大力量，肯尼迪才有资本去找东北地区的政治领袖和权力掮客谈判。他们内心里喜欢同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但是现实点儿来看，肯尼迪天主教徒的身份，令他竞选总统的希望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注定要失败。在开展初选造势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肯尼迪必须全力攻克大本营以外的州：属于政治机器型的州，指定专人与当地政治领袖联络；公民是有效力量的，就成立公民委员会。这样的布局不只是着眼当下，为了顺利走到党大会，也是未雨绸缪，以期将来一旦获得提名，即刻把这些组织转而为大选服务。

1960年，全美共有16个州将举行初选，选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些州不能碰，因为可能会冒犯到本州的宠儿；有些州不予考虑，因为根本不重要。但肯尼迪得在这16个州中挑出足够多的州，且这些州必须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广泛代表性；有重要价值，体现在对邻州的影响力上；能让观察选战的政治大佬们为之动容。一旦选出，每一个初选州都要拿下，不能

有一个拖后腿的。“每次都得扔出个7[注]。”肯尼迪后来在第一个初选州——威斯康星州启动造势活动的时候这样说道。

除了新罕布什尔州，那天早上的会议并没有确定其他出战的初选州。毋庸置疑，新罕布什尔州第一个被纳入阵线，其余10个州还在考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机会和时局都处在变化中。

当时，威斯康星州是所有人心目中的上上之选——大获全胜将会给休伯特·汉弗莱致命一击；但威斯康星州很危险。接下来的两个月，肯尼迪的团队因为威斯康星州的分歧而分为两派，直到肯尼迪在他父亲和卢·哈里斯（Lou Harris）的支持下，把威斯康星州划入作战规划中，他的弟弟和其他人只有服从。还有马里兰州——可能性极大（后来被纳入）；印第安纳州——很有趣（如果斯图尔特·赛明顿被引诱去挑战印第安纳州并出局，那就值得一试，不过赛明顿意识到这是个陷阱，只在春天短暂考虑过印第安纳州，然后就避开了这个雷区）；俄勒冈州是绕不开的，因为俄勒冈州的法律要求所有参选人，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参加当地的初选投票；西弗吉尼亚州比较模棱两可——当下没有人能预见到西弗吉尼亚州后来的影响力；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很特殊——这两个州都要仰仗肯尼迪同当地宠儿州长迈克·迪沙利（Mike DiSalle）和帕特·布朗的私交。肯尼迪把16个初选州梳理了一遍，解释各州不同的初选法律，摒弃了无望的州或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州。早上的会议就此结束。

所有参会的人穿过草地来到老约瑟夫·肯尼迪家。肯尼迪家一如往常地提供了丰盛的午餐——烤火鸡和好几种派，他们家厨师煎的派是普通派的两倍厚。

下午的会议由罗伯特主持。这也是肯尼迪选战的一个特点。肯尼迪不仅是旗手和领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种资源。他的能量不能被过度使用，就像你不会过度消耗电池一样。（“我们不会把他的力气用尽，会留有余地。”肯尼迪的一个助手这样评说那场选战的技巧，“有些天，我们会让他跑15个城镇，做15场演讲，但还是会让他在晚上11点前上床休息。我们完美地利用肯尼迪——不会把他搞到筋疲力尽。”）

早上的会议是战略分析会，而罗伯特现在主持的会议是作战会议，分配任务。肯尼迪的团队把美国划分了片区，就像一个政治总参谋给每一个作战指挥官分配作战阵线：

§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北部由约翰·贝利负责。新英格兰地区是肯尼迪的家乡，这里的114张选举人票一定要稳稳拿下，而在缅因州（赛明顿的势力范围）和新罕布什尔州（史蒂文森的势力范围）会有些许动荡。除了新英格兰地区，纽约北部也划给了贝利——这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跨界掠夺布

朗克斯县界以北的选举人票，在优柔寡断的南部坦慕尼协会领袖反应过来之前，把帝国州摇摆不定的选票收入囊中。

§纽约市和新泽西州北部没有做太多分配，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这里要靠肯尼迪的人脉、约翰·贝利的运作和约瑟夫·肯尼迪的个人资源来解决。

§拉斯金负责西部州和他的家乡艾奥瓦州。拉斯金在史蒂文森的两次竞选中初登全国舞台，崭露头角。他在西部的个人和组织人脉很广，这些人脉在山区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尤为宝贵。

§肯尼迪的弟弟特德和拉斯金一组，负责调查落基山脉各州（Rocky Mountain states）。

§华莱士负责调查和刺探西弗吉尼亚州，做好万全准备，以备将来有必要在西弗吉尼亚州打选战。

§博比·肯尼迪除了总参谋的职责，还负责建立与南方领袖的联系，尽快搜索出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朋友圈。

§奥布赖恩负责起草组织的总体规划以及各州的流程，确保所有地方都有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另外，他还负责观察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

这样一来，像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关键州还无人认领——但这些州还需要肯尼迪本人和各州的“宠儿”进行领袖之间的协商。塞林杰、奥唐奈和哈里斯的工作基本是跨州界操作。所有人都在这个漫长的会议上做了笔记——具体到各自的工作分配，简短记下这场竞选的总体框架。哈里斯那个周末要去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度假，他只是随意地提到这件事，马上就被分配到去找两个当地的联系人，毕竟维尔京群岛在民主党大会上有两张选举人票。3年来，索伦森都在负责记录具体的政治联络人和可能的机会，现在终于卸下这个担子，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选战策划、出主意、撰写演说稿和解决问题。

下午四点半，会议终于结束，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他们走到草坪上，满怀感激地呼吸着冷冽的新鲜空气，注视着微风吹皱海湾的白浪花。他们三两成群地谈论着自己的任务和政治的细枝末节，直到有车来接他们，送他们登上肯尼迪的飞机，在纽约和华盛顿把他们放下，开始新的工作。这一天谈论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姓名、地点，但这些恰恰就是美国政治的出发点；在所有人的记忆里，那天没有什么高谈阔论，没有涉及什么大事件，也没有谈到美国海内外的险象环生。历史和未来都已在肯尼迪的心中。

下午天色渐暗的时候，这群获得精确号令的人被带走了。两个月零6天后，即1960年1月2日，果然不出所料，约翰·F·肯尼迪向媒体宣布，他将竞选美国总统。

---

1. 查尔斯·雷博佐（Rebozo），古巴裔美国商人，也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尼克松的亲信。——译者注
2. 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ifford），1961—1963年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外交顾问，后任国外情报顾问团主席，主管美国谍报活动。——译者注
3. 商业贿赂（Payola），唱片公司向电台的DJ（唱片骑师）贿赂，以换取旗下歌手的歌曲能播出更多。美国在1960年立法将此视为刑事罪行，称为“Payola”。——译者注
4. 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哈里·杜鲁门在白宫时期的门徒，替杜鲁门撰写演说稿并担任首席法律顾问，其间从杜鲁门的身上学习政治。——译者注
5. 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1961年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海军部部长。——译者注
6. 汤米·“软木塞”·科科伦（Tommy “The Cork” Corcoran），罗斯福给他起了绰号“Tommy The Cork”。他是约翰逊背后的华盛顿律师，每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都需要华盛顿律师。——译者注
7. 西奥多·C·索伦森（Theodore C. Sorensen），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顾问。——译者注
8. 约翰·贝利后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9. 双骰子游戏，掷出7或11，掷骰人自动胜出。——译者注
10. 帝国州（Empire State），纽约州的别称。——译者注

第3章

共和党：萌动初生

巨大的政治分歧使美国分为两大党派，共和党的情况与民主党完全不同。虽然共和党的政客们使用的公共辞令以及私人技巧和他们的民主党对手毫无差别，但两大政党在迥然不同的现实世界中运行。共和党对权力的掌控与民主党的方式是如此不同，有时看起来这个在不同“丛林”中你争我斗的群体，好像来自政治生态体系的不同层级。尽管悲观者声称这两个全国性政党对于美国人不过是一种半斤八两的选择，然而共和党和民主党是完全不同的。究竟差别如何？我们稍后将进行探讨。当政党领导进入1960年时，共和党已走过百年，如果人们不研究一个世纪以来令所有观察者们困惑不解的共和党“精神分裂症”奇观，就难以描述真实的共和党。

准确地说，共和党就像双胞胎，从诞生那一刻起一直像双胞胎——这对使用相同名号且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双胞胎就像雅各(注)和以扫(注)一样：他们自相残杀，而非手足情深。在共和党的内部汇集了两股溪流，一股溪流是崇高无上的美国理想主义，另一股溪流是粗俗不堪的美式贪婪。这两股政治“溪流”自共和党诞生之日起就交融汇合；此时，纯粹无限的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将人性的良知和一些精明老练的辉格党人的技巧相互结合，组建了一个以结束奴隶制为宗旨的政党。在他们中间，新英格兰的亚当斯（Adams）家族和纽约的瑟洛·威德（Thurlow Weed）家族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卡梅隆（Cameron）家族、密苏里的布莱尔（Blair）家族、伊利诺伊州的麦考密克（Mckormick）家族聚集在一起，其主要追随者是北方新教徒农场主。他们选举亚伯拉罕·林肯领导全党进行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正义战争。通过这场战争，部分共和党人收获了荣誉，而另一些人则发了大财。在之后的40年里，随着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欧洲新移民的到来，共和党内部的这对双胞胎——善良与贪婪——为了争夺政党控制权和国家权力相互倾轧。

既然民主党的宗旨是追求大众的自由，人们由此忘记了美国自由社会的蓝图有多少是由共和党人绘制的。今天，人们视他们为右翼党派。然而，就是这个党派——废除了奴隶制，撰写了第一部公务员法，通过了有关反垄断、铁路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首批法规，然后凭借卓越的外交技巧，领导美国踏上主导和管理全球的舞台，现在我们依然在努力地维

护这一地位。

这一切几乎被文化界精英遗忘的事实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直到20世纪以及整个前10年，美国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自然归属党派曾经是共和党。政界和外交界的人士过去往往是思想家和学者；现在值得怀疑的是，即使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总统是否曾像西奥多·罗斯福（他也是美国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一样使白宫成为作家和艺术家常来常往的官邸。

今天共和党脱离美国知识界主流的情况实际上就始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因为在1912年，共和党内部的双胞胎由于罗斯福–塔夫脱（Roosevelt-Taft）内讧产生了严重分裂。塔夫脱派的“中坚力量”依然控制着政党机构，而由进步人士和知识界共和党人组成的公民派则处于无家可归的流放状态。

从1912年起，差不多时至今日，共和党机构始终掌握在中坚分子——瑟洛·威德和马克·汉纳（Mark Hanna）门徒的手中。这些人对党忠贞不渝，对未来怀有坚定信念，将党团结在一起。他们不辞辛苦地履行日常职责，积极筹集资金，维持党的纪律，在漫长惨淡的政治季节里，仍然完成基本任务。总体而言，每当召开大会时，他们都显得沉闷沮丧，不愿意和人交谈，对于报刊和书本内容持怀疑态度，总认为整个世界出卖了他们。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每四年一度的极端愤懑完全是人之常情，因为当共和党隆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往往被潮水般涌入的旧公民进步派弄得措手不及。这些人坚持要求瓜分共和党原来的遗产，喋喋不休、胡说八道，说的话在中坚分子看来几乎和自由民主党派没有什么差别。

诚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共和党的自由进步派偶尔也轰轰烈烈地几次造反——但是，除了纽约，这些自由派赢得的选举胜利往往是昙花一现和区域性的。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有内布拉斯加州的诺里斯（Norris）、爱达荷州的博拉（Borah）、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史塔生，党的机构仍然属于保守派。只有在四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自由派才有机会真正一秀肌肉；这种情况通常仅发生在自由派通过某种宫廷政变方式将资助党常设机构的人士（国内大公司的高管阶层）争取过来之后。现在，虽然自由派和国内经济领导阶层之间的联盟曾经主导了1940年、1944年和1948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但直至1952年，自由派和公司高管阶层才推出了一位既赢得了全国选民又问鼎了总统宝座的候选人。

1952年的竞选在博弈中的初选、代表大会和选举人回合阶段应称为政治经典——其经典性堪与1932年的罗斯福竞选或者1960年的肯尼迪竞选相媲美。但是1952年的胜利将一位谦谦君子般的人推上了美国总统宝座，亦为共和党带来了这样一位领导人：生活曾远离政治，对自私贪婪、暗流涌动

的派系政治格局深恶痛绝。缺乏强大的进取精神很快在其管理国家政府行政团队时就表现出来，同时在其党派的政治领导方面也体现出来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习惯于以军事训练的方式来要求和处理与专家之间的关系，政党机构的领导工作完全交由专家打理，这些人几乎全部来自党内的旧中坚派。自由派共和党人曾期望政党能注入新的力量，政党的理念、方向和人员能重现活力，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派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一切愿望最终都落空了。相反，虽然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在全国一举获胜，但随着一次次的选举，共和党却节节败退。

抛开作为伟人头顶上笼罩的个人光环，他领导下的共和党在重要的非大选年议会选举中连遇败绩。1950年，共和党赢得49%的选举人席位。1954年的非大选年选举，共和党总席位降至47%；1958年，其投票支持率已降至43%。在艾森豪威尔主持的4次国会会议上，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会议只有一次。随着民主党在1958年选举中获胜，共和党的党运陷入自1936年罗斯福新政鼎盛时期以来的最低潮。紧接着在1958年选举之后，共和党人突然发现全国的48个州长职位，他们仅拿到14个；在前一天的选举中，48个州立法机构仅有7个入选。

理查德·M·尼克松和朋友们沐浴着佛罗里达比斯坎岛和煦的阳光，认真回顾了这种惨淡悲观的现状。他们在国会选举几周之后——1958年12月齐聚佛罗里达当地一位房产经纪人雷博佐的家里，希望首先研究党内的惨败结果，然后继续制定相关策略，辅佐理查德·M·尼克松副总统在两年后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参与1960年七大选战的所有派系中，这群人无疑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首先，政治选举与这些人的自身优势毫无关系；他们的东道主是一位名不见经传但富有的佛罗里达商人，自从理查德·M·尼克松在20世纪40年代作为年轻议员崭露头角以来，他一直将其尊为上宾。除了两个人——莱恩·霍尔（Len Hall）和鲍勃·芬奇（Bob Finch），多数人都偕夫人前来，他们参与其中是出于关系亲密和个人友谊而不是共同成就、政治才能或权力欲望。

杰克·德朗（Jack Drown）偕妻子塞尔达前来的原因是他们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就是尼克松夫妇的故交了。德朗是一位性格直率、快乐开朗、和蔼可亲的公司经理，其公司是南加利福尼亚州最出色的区域杂志发行公司之一，但是他对高层政治的了解有限。雷·阿巴思诺特（Ray Arbuthnot）和妻子也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他们前来是出于多年的友情。阿巴思诺特是一位加州风格的农场主，精明干练，但同样不谙熟国内政治。

不过，两位重要人物是才能非凡的。在未来的15个月内，他们将与尼克松携手组建尼克松总统选举最高指挥部。一位是加利福尼亚人，另一位是纽约人，随着尼克松竞选团队由最初的势单力薄到后来的发展壮大，其成员始终仅限于南加利福尼亚人和纽约人。两人中更出色的是伦纳德·W·霍尔（Leonard W. Hall），此人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亦曾任国会议员，现在正好赋闲无事，同时也对纳尔逊·A·洛克菲勒在今年夏天竞争纽约州州长职位的共和党提名时刚刚给他带来的羞辱郁闷不已。霍尔是尼克松的老朋友了，他在政坛历练多年，其从政经验几乎与民主党的约翰·贝利不相上下；霍尔加入竞选团队实质上是出于深情厚谊，人们亦可推断，渴望此时向那位曾在纽约褫夺其党内控制权的人——洛克菲勒报一箭之仇，也让他动力倍增。另一位较少为人所知，一位年仅35岁的年轻加利福尼亚律师，名叫罗伯特·H·芬奇，国内政治的新锐，但是由于勤奋工作，这个人有望成为尼克松团队招募的精英人物：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友好随和，思维敏捷，言谈优雅，有人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其谦谦君子的出色风度完全有资格进入肯尼迪的一线团队”。

据与会人员回忆，会议持续了3天。他们研究分析了形势和相关观点，最后制订了几个方案：

首先，在纳尔逊·A·洛克菲勒表明态度前，不制定任何选举战略，因为在其胜利之后的两周内，洛克菲勒已开始令共和党人选民的想象力驰骋无限了。他在纽约州的胜利（573 034张选票的优势）不仅本身令人称奇，而且在共和党遭遇滑铁卢的日子更加引人关注。只有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曾于1958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在亚利桑那州赢得了类似战绩。戈德华特是个另类，在那里仅属于极端情况，在1960年的选举季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洛克菲勒将会怎么做？他是否觊觎总统宝座？他是否将竞争提名？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其次，副总统尼克松在党内机构的保守派中间积累了丰富的人脉。7年来，无论淡季还是旺季，副总统都车马劳顿地来往于全国各地，亲自与常设党组织见面，在晚餐、宴会和选战中提供帮助。在总统任职的6年中，他替他们排忧解难、处理问题，而他们对总统的评价则是委婉但负面的——“超然于党派属性”。

因此，在共和党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长期的内部倾轧中，保守派对于尼克松是放心的。进一步说，副总统无须像罗伯特·A·塔夫脱在1948年和1952年那样组织一个庞大的专业机构。因此，卷入党内派系候选人——保守派之选的公开立场中是没有必要的，或许也是不明智的。所有人认为，副总统应当出现在非政治性且彰显政治家风度的场合。

最后，初选依然存在一个长期问题。如果洛克菲勒参选，他需要经过初选渠道。但是，初选始终是一个有损人格的可怕争吵过程。毋庸置疑，民主党在1960年春季将爆发全国性混战。作为副总统，立即与他人同台竞争或许是不明智的。政治家形象是他的主要资本，必须倍加珍惜。在初选阶段，不宜做任何决定——为时尚早。

这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周密合理。芬奇辞去了在洛杉矶的法律工作，1959年1月马上搬往华盛顿；公关官员赫伯特·克莱因（Herbert Klein）通过招募形式加入了竞选团队，1959年6月前往华盛顿，此人也是南加利福尼亚人；莱恩·霍尔准备将纽约的事务处理完毕之后，再携手共谋大业。整个1959年，尼克松团队的计划都在顺利、安静且小心地进行着，他们在静观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形势发展。

他们对于方案的策划本身就典型体现了美国总统政治的“正统性”原则。总统职位居于万人之上，在普通美国大众的想象中几乎像一个祭祀职位——一般政治标准对其失去效力的圣职。任何总统都将被载入史册，无论他们多么缄默不语，美国人对其均倍加尊崇。他们选择的总统来自对其而言好像熟悉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战争首领或纵横捭阖的外交精英，来自曾在华盛顿担任内阁成员的人物，来自作为副总统传承白宫权力的人物。这种“正统性”继承在20世纪仅仅中断过三次——有一次是意外，当时正值1912年，共和党分裂为二，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轻松赢得选举；另一次是1920年，由于厌恶战争，人们将威尔逊驱逐下台，沃伦·哈丁被推上总统宝座；最后一次是1932年，由于大萧条的灾难性冲击，人们不得不寻求初出茅庐的新领导人。从1932年到1960年，“正统性”观念始终占据主导。罗斯福之后是副总统和罗斯福指定人选——哈里·S·杜鲁门；杜鲁门之后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既是战争英雄，也是罗斯福早期选定肩负历史重任的人物。

此刻是1958年年末，尼克松选择超然于党派差别的政治家姿态，精明地秉承“正统性”价值。他在选举口号中阐释这一原则的政治措辞——“经验”证明是其在1960年选战中的最大亮点。虽然洛克菲勒在纽约州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胜利，唤起了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对新型领导的兴趣和关注，但是这种情感往往来去迅速。早在1959年春天，由副总统朋友资助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他在共和党支持率方面落后于洛克菲勒——在决定性力量尚未确定的时候，洛克菲勒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一度领先尼克松38%—40%。但是在1959年夏季，“政治家”的分量还是显现出来了。尼克松那年夏天的苏联之行使他人气大增。根据民意调查人的评测，其支持率大幅飙升；他在签署钢铁协议时发挥的作用（作为副总统享有的另一个政治家权力）使其支持率再次大幅提高——但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在选举中的前期表现走过了这样一个历程——支持率飙升，登上新闻头条，最后像肥皂泡般昙花一

现。对于纳尔逊·洛克菲勒及其辅佐团队而言，1959年的美国政治有许多东西尚待深入认识。

描述理查德·M·尼克松和纳尔逊·A·洛克菲勒之间的差别无须什么技巧，因为按美国人的分类，他们几乎都属于模式化角色。

尼克松出身贫寒，精明能干，紧张严肃，对周围世界常常表现得忧郁警惕。青年时代贫穷的中产阶级生活使他集中了许多独特气质——内在动力强大，极其渴望获得他人认可，如果被断然拒绝，习惯不顾一切地无情回击。凭借自身努力赢得他人认可之后，他不得不学习争取内心讨厌的人。他需要认识到，在这个出于不明原因给予他粗暴对待的无情世界里，一个无权无势、赤手空拳打拼的人将是多么脆弱。于是，他怀着一种机警严峻的怀疑态度审视着周围世界。他忧郁多思，喜怒无常，耽于内省，只相信自己和妻子；在任何情况下，他只信任极少数的人。举例说，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当处于1960年芝加哥大会这样的形势时，没有其他人会像尼克松那样在纽约和洛克菲勒达成秘密协议，完全撇开了最密切的个人助手，也不通报交易信息。1960年，七大候选人中，只有他的竞选团队人数最少，也只有他更多地自主做出关键决策。尼克松是出类拔萃的，但也是一个内心孤独、情绪不定的人。

关于尼克松这种奇怪的多变性格以及外表刚强坚毅的人有时突然改弦易辙、转变方向的做法，也许是加利福尼亚人的独特个性。似乎他从小成长的南加利福尼亚州变化不定的社会环境，将些许的不确定性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他的童年经历几乎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9岁以前，他一直在父母（中西部移民）经营的柑橘农场里，然后搬到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市（Whittier）安静祥和的夸克敦（Quaker town）。他曾步履沉重地走在人行道上卖报纸，在市内泳池做管理员，为派对活动自制冰激凌，在教堂弹奏钢琴，在高中辩论队担任主角。正当他逐渐长大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不断涌入美国各地的流浪者和无家可归者，橘子园环绕的惠蒂尔市打破了平日的宁静。由于人口连续翻番，洛杉矶郊区最终一点点地吞并了惠蒂尔市。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南加利福尼亚州文化中，尼克松不断寻求自我，最终长大成人，综合性和纯粹性、美丽绝伦和丑陋不堪、兼容并蓄和开放包容是当地的文化要素。

即使登上了最高政治舞台，好像也没有满足他的追求。作为一个精明强干、高效务实的年轻保守派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他在1952年被选为共和党这边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原因正如一位加利福尼亚赞助人所述，“我们选择尼克松不是因为他属于左派或右派，而是因为我们累了，再说他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个人当时参加了选定竞选伙伴的秘密会议。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大选中对他近乎抛弃的态度深深刺痛了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个任期的4年中，个性差异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艾森豪威尔极

为重视一个人在战争、金融和工业方面的成就，他好像不认可尼克松身上那种纯粹的政治业绩和才干。尼克松的一位朋友还记得1956年大选之初的一次对话场景。那年的早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从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农场向民主党的史蒂文森–基弗福组织发起全国性选战。共和党的大小政要均从华盛顿来到葛底斯堡农场，电视和报刊也等着报道开启全国选战的隆重仪式。活动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愉快地示意邀请两位密友进入农舍。尼克松当时正和朋友站在草坪上，注视着这一小撮人走进农舍。他转身对朋友悻悻地说：“你知道吗？他至今还未邀我进去过呢。”他的朋友迄今依然记得他的话。尼克松始终极其敏感，一直不断地寻求他在美国政坛和领导层中的位置与定位。随着1960年的来临，渴望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和地位显然成为他最强烈的动力之一。

他的共和党内主要对手——纳尔逊·A·洛克菲勒在个性和背景方面完全不同。他是一个充满安全感、自信和快乐的人。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类似皇室贵族的美国家庭，坐拥金山银山长大，万贯家产使四兄弟中的三个人和一个姊妹性情害羞、索然离群和沉默寡言，但洛克菲勒摆脱了这种影响；相反，金钱无忧使他风采洋溢。无论从形象还是本性看，洛克菲勒都是美国政坛最阳光、最健谈和最开朗的人物。命运之神偏爱于他（“我从未觉得身为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是一种障碍。”他曾经说），他始终挂在脸上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见到人时张开胸怀的拥抱是真诚快乐的。他对于美国政治礼仪和服饰（印第安人战帽和得州佬靴子，吃薄饼卷和挑选比萨）的喜爱毫不矫揉造作。

然而，在这个大男孩儿般“单纯政治家”的表情下面，掩藏着一个坚定、精明、极其负责的男人特质。如果透过快乐的外表仔细审视这个人，你会发现一种冷酷无情、永不退缩的倔强性格。由于在其生活的家庭中，国家大事和共和党状况始终是一代代家人餐桌上的话题，他对于美国命运的发展拥有比共和党任何他人更加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一点和阿德莱·史蒂文森相似。他曾在华盛顿先后任职于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手下，最后于1956年怀着深深的挫折感决定离开艾森豪威尔政府，回到纽约踏入政坛。

洛克菲勒进入选举政治及其动机需要着重说明一下。从根本上讲，他认为其曾任职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危机重重，该政府制订计划和管理国家事务时着眼于每个月每一年，然而为了改变世界，美国应当制订从现在到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远的可预见未来的宏伟计划。这种信念的支撑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他数年来在华盛顿受到的教育，其次就是他最终意识到他曾任职的多种联邦委任职务带不来任何政治实力，只有选举中的投票才能真正赋予一个人在美国政府中的权力。

上述两点评论对于纽约州的共和党高层而言均不是什么秘密，在1958年年

初，纽约的共和党领导层试图让他参加秋天的参议员竞选。这种决定对于胆小怕事的人也许有效，但是洛克菲勒家族多年来一直慷慨资助纽约的共和党人，洛克菲勒不认为他们的决定对他有什么约束力。这是共和党领导层第一次见识到其倔强的性格。洛克菲勒断然拒绝了参议员候选人资格。在参议院，他的手脚将被捆住——只能成为一个喉舌、追随者，将被迫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他希望成为纽约州州长——一个直接从人民手中赢得的行政职务。他计划实现这一目标。他在1958年全纽约夏季大会前进行的宣传以及后来的秋季竞选活动是初涉选战的尝试。这些活动从管理和运作方面都非常出色，亦取得了极大成功。

自1956年以来，洛克菲勒的内心一直觊觎着美国总统的宝座。当他于1958年11月成为纽约州州长后，美国政治的另一个传统压力也开始影响他。通常情况是，每位纽约州州长将必定患上"总统癖"的毛病——野心瞬间膨胀。自美国内战到1948年的21次全国选举中，至少有13次是一个或另一个（有时两个）主要政党选择纽约州的州长或前任州长作为总统候选人。帝国州形势复杂，人口稠密，资源丰富，选民众多，在影响美国人思想的通信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计票结果确定其胜选的那一刻起，纽约州州长通常被认为是总统的可塑之才了。即使他还没有上任，公众和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其下一步走向；洛克菲勒也是如此，这一刻从州长选票依然在统计中的1958年11月5日星期三黎明前几个小时就开始了。"我真的不感兴趣。"纳尔逊·洛克菲勒那天晚上怀着胜利的激动对媒体就总统职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做出回答。但第二天下午在记者满怀狐疑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的确意识到人们普遍推测他可能将争取196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但他认为"提前跨桥越界是不明智的"。鉴于这一原因，他接着说，他不能明确承诺一定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度过4年，虽然他下定决心做好这一工作。

然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他是纽约州州长，众所周知，他还很关心国家事务——尤其是国防和对外政策。操之过急就容易受到攻击，但他已51岁了，1960年就是52岁。如果不在1960年行动，继任的共和党总统按常规再任期两届的话，到1968年他就60岁了，廉颇老矣！在总统政治中，一个人必须在合适的人生阶段行动起来。人们都希望事业的潮汐踏着人生的节奏翩翩起舞。如果人生的相应阶段在历史的潮汐中来得过早或过晚，这个人始终不会事遂所愿——像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亨利·克莱（Henry Clay）、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罗伯特·塔夫脱、塞缪尔·雷伯恩（Samuel Rayburn）、埃斯特斯·基弗福等人。洛克菲勒也毫不避讳这样一个事实——他不喜欢尼克松，认为此人无力担当总统大任。

和尼克松不同，洛克菲勒相信调查、咨询、协商、策划和团队工作。这位

纽约州州长貌似随意且平易近人，对组织工作充满热情；虽然不面面俱到，但是一位坚定的倡导者，在发出倡议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组织工作。至1959年6月，也就是在奥尔巴尼就职6个月之后，洛克菲勒总统竞选的第一根天线架了起来，以便密切关注共和党的政情信息。秋天时，积极的调研活动开始了，纽约州州长在曼哈顿精心设立的办事处也有的放矢地运作了，其影响力逐渐传遍美国。

到12月中旬，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员工和纽约州州长的政治资源进行了整合。洛克菲勒的总统竞选调研堪称一种政治奇观，其规模之大甚至使肯尼迪的选举活动俨然成了蒙大拿州的街头表演。位于纽约西第55大街的两座大楼（20号和22号）当初是州长数年前为了开展慈善活动购买的，现在成了州长工作人员的寓所，也是进行全国性活动的指挥中心。通过修复和改造，这两座古旧的褐砂石建筑重新焕发了光彩，内部用玻璃隔板做成了隔间，隔板上挂着现代绘画，屋内陈设着现代家居，地面全部铺着地毯。楼内设有暗室、新闻中心、几间会议室、油印机、可连接电视的房间，这一切使该中心的效率远远超过位于华盛顿第一大街的共和党全国总部。

政治小组负责对各州共和党的领导班子进行全国性调研；讲稿编写小组负责就国内外事件进行研究并撰写重要声明；“形象”小组由麦迪逊大道[注]的顶级广告精英组成，他们负责研究个人的公共关系问题；后勤小组则像人马齐备的总统选举团队派出的先遣人员一样，细致入微地计划和安排州长的行程；日常的新闻关系则由州长在奥尔巴尼的新闻秘书负责；洛克菲勒俱乐部负责上传下达，上与总部联系，下与地方基层的洛克菲勒俱乐部成员沟通。这些基层组织就像龙种一样散布于全国各地，随时准备全面发展。此外，竞选传记和洛克菲勒长期从事公共服务及慈善工作的记录作品也在撰写中。

通常，一支如此庞大复杂的团队有一种自我保护本能，他们的信息、建议和杂乱往往令负责人不知所措，除非有外力推动，否则永远难以理清。

在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团队管理人，准确地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员工将做什么以及其先期行动的目标是什么。他的最初目标是调研候选人资格，而不是宣布竞争候选人资格。如果调研结果表明有希望，那么接着就宣布竞争候选人资格。

大约70人参加了调研工作，包括州政府人员或洛克菲勒的熟人。除了参与这个略带新鲜感的活动，多数人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专职的政府或私人工作方面。和其他选举的核心小组一样，洛克菲勒调研核心班子规模也不大。具体地说，他们包括：纽约共和党的政治领袖［乔治·L·欣曼（George L. Hinman）、L·贾德森·莫尔豪斯（L. Judson Morhouse）、莱

尔·W·霍恩贝克（Lyle W. Hornbeck）]，以及洛克菲勒帝国的精英领导——已故的公关天才弗兰克·詹姆森（Frank Jameson），他的去世令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悲伤不已；洛克菲勒家族的首席投资顾问理查森·迪尔沃思（Richardson Dilworth），是美国企业界的年轻精英之一，彬彬有礼且认真负责；约翰·洛克伍德（John Lockwood），这个人寡言谨慎，是洛克菲勒家族的首席法律顾问；候选人的弟弟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精力过人，不过天性害羞。

这份名单不能漏掉埃米特·J·休斯（Emmet J. Hughes），这个人风度翩翩、魅力无限，是美国政坛无党派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埃米特·休斯当时不到40岁，之前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战争期间，他曾在西班牙工作并表现出色，后被评选为时代集团战后驻海外记者优秀团队杰出人物之一。在1952年的大选中，他加盟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团队，这是他首次接触美国国家政治。无论在艾森豪威尔的早期政府还是在时代集团，只有他和其他少数几个人能够使文章的风格和修辞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然而，无论是洛克菲勒的随从人员，还是服务于艾森豪威尔，休斯都算是异类——从家庭背景和早期选择来看，他总体上属于民主党派；他最初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智库成员之一出类拔萃，现在又成为洛克菲勒选举的主要理论家和战略家。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洛克菲勒在1960年的选举中有效传达了共和党公民派压抑已久的反对呼声。就其本人而言，休斯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他们不尊崇美国政治的任何政党路线。洛克菲勒最初在华盛顿遇到了休斯，当时两人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有点儿“身在曹营心在汉”。他逐渐意识到可以与休斯联手，于是在1958年当选纽约州州长之后，邀请对方在演讲修辞等方面助一臂之力。现在当洛克菲勒对全国共和党政治现状进行调研时，休斯作为与州长在思想上最相投的人，无疑将可以负责传递洛克菲勒愿望的整体战略。他对相关细节和战术不予理会，与共和党的宗旨相比，他更感兴趣的是汇总各种观点。

三大考量深深影响着1959年的洛克菲勒的总统竞选调研。

第一个考量看似简单，目的是评估普通公民对于美国福祉的关注程度，这一点和促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宣布竞争候选人资格的因素相似。洛克菲勒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调研人员对此铭记在心。在内心，在灵魂深处，在最隐秘的私人谈话中，纳尔逊·A·洛克菲勒认为美国进入了一个全球充满恐怖和痛苦的历史阶段，如果不加干预，这个世界可能毁掉美国。他的家族曾为缔造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他觉得对国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必须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就像他对一位密友所说：“想到迪克·尼克松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我就不痛快。”洛克菲勒也同样关心涉及如下方面的国内事务：全国种族融合问题、美国医疗、美国教育、青少年犯罪问题。针对上述方面，他认为国家绝不能毫无计划和章法——现在必须做好准

备。

这一方面的关注度很高——但对此强烈关注的主要是共和党自由进步派——公民派，也就是在4年中有三年半蛰伏休眠但突然在第四年选择威尔基或艾森豪威尔之类人物的群体。尼克松无疑控制了党内的保守派——但是在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公开追随者期间，尼克松使多少公民派丧失了立场？这一点首先需要调研。

第二个考量就是具体评估一下党内各州代表的构成和来源。只有对每个州控制着党组织的保守派及代表的看法和态度进行抽样调查，才有可能在党大会上占据优势。为此，第55大街总部精心设立了一个政治情报行动处，将整个国家分为4个区。东北部政治情报由30岁的华尔街律师罗斯韦尔·P·珀金斯（Roswell P. Perkins）收集。南部情报由前州长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的法律合伙人R·博戴尔·比克斯比（R. Birdell Bixby）负责调查。乔治·欣曼负责西部，此人是纽约北区的律师，也是积极参与纽约政治的睿智人才之一。纽约州共和党委员会秘书莱尔·W·霍恩贝克负责充满敌意的中西部。

于是纽约这些人开始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情报，休伯特·汉弗莱的明尼苏达州人、斯图尔特·赛明顿的密苏里州人和约翰·F·肯尼迪的马萨诸塞州人和他们一样，也在时刻收集各方信息。但是他们过去和现在寻求的不是代表的承诺，他们现在没有也不能进行任何交易。准确地说，他们希望了解，尼克松先生是否已牢牢控制了共和党全国大会代表的领导层，也希望了解代表们对洛克菲勒是友好、冷淡还是充满敌意。

第三个考量也许是最有趣的，毫无疑问也是对洛克菲勒最具指导意义的，那就是财务调研。

洛克菲勒家族涉入国家政治已颇有历史了，他们深知共和党的政治管理方式。这个家族意识到共和党分为两派，在过去20年中，其天平的砝码已偏重于公民派。一个总的情况是，共和党内保守势力主要是倚重大公司高管阶层的大力支持，而民主党的自由派则始终依赖工会领导层的支持。事实上，为共和党筹款的那些人对共和党的控制程度通常远远超过了为民主党筹款的那些人。除了纽约，几乎在共和党占据优势的每个州，如果了解了其“财务大臣”的名字，也就能够了解权力核心在何处盘根错节。甚至在纽约北区，最好也应了解罗契斯特市（Rochester）的博士伦（Bausch & Lomb）什么立场、古尔德水泵（Gould Pump）站在哪一边以及康宁玻璃厂（Corning Glass Works）支持谁。和民主党应当了解密歇根州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立场怎么样或者纽约的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支持谁一样，这种做法也不是什么过分要求，不过共和党的控制势力很少像民主党那样明显或公开。在华盛顿州，若想了解共和党政

治，应从惠好家族（Weyerhauser family）开始；在爱达荷州，应从爱达荷电力公司开始；在俄亥俄州，应从乔治·汉弗莱开始；在伊利诺伊州［既然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McCormick）上校已经去世］，应从爱德华·赖尔森（Edward Ryerson）开始。这些公司高管通常并不是保守力量。一般而言，他们比那些为了控制政党机器而提供资助的保守势力开明得多。在共和党近期历史上，他们经常冲破保守势力的阻力，对自由公民派提供支持。

对于洛克菲勒而言，虽然可能耗资不菲，但从技术上讲，显然亦可凭借其惊人的私有财富支撑总统选举。不过显而易见，即使他们成功了，仅凭财富买来的提名也没有什么政治价值。核心团队也知道，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道德和良心对这种做法也难以容忍。最后，如果美国企业高管组成的超级“俱乐部”反过来选择资助理查德·M·尼克松，即使金钱也收买不了保守势力。

对“商业俱乐部”各下属分支机构依次调研的目的是了解“商业俱乐部”是否发现国家危机已发展到应加入洛克菲勒团队并强迫当地保守势力给予支持。

这种调研交由两个人负责：洛克菲勒的弟弟——戴维·洛克菲勒，首席投资顾问——理查森·迪尔沃思。（迪尔沃思与费城的民主党市长同名同姓，两人是堂兄弟关系。）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

洛克菲勒家族一直认为他们是美国商界第一家族。数十年来，洛克菲勒家族是共和党的最大资助人。现在，他们发现其规模或力量还达不到左右美国商界的程度。

他们到任何地方，对方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筹集资金的赖尔森先生在芝加哥俱乐部设宴招待了纳尔逊·洛克菲勒。洛杉矶乔纳森俱乐部（Johnathan Club）和旧金山太平洋联盟俱乐部（Pacific Union Club）的人们也是如此。洛克菲勒的使者到任何地方都受到了礼貌接待：俄亥俄州的人们［乔治·汉弗莱代表国家钢铁公司（National Steel Corp.），马克·汉纳（Mark Hanna）及随从，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代表共和钢铁公司（Republic Steel Corp.），拉尔夫·拉扎勒斯（Ralph Lazarus）代表联邦百货公司（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克利夫兰信托公司（Cleveland Trust Company）的人员］，密歇根州的人们［沃克·L·西斯勒（Walker L. Cisler）代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Detroit Edison），约瑟夫·M·道奇（Joseph M. Dodge）代表底特律银行与信托公司（Detroit Bank and Trust Company）］，以及威斯康星州的人们。任

何人都不愿意冒犯洛克菲勒。

然而在政治道路上，他们向洛克菲勒关上了大门。

这些商界领袖中，少数个人在社交或商业行为层面认同马克·汉纳的理念；但整体而言，他们的理念是消极的，因为过度管理干涉了经济运行，他们很自然地需要寻求一个能够对此发挥遏制作用的否定性力量。他们对政客不那么重视，甚至对共和党这边的人也是如此。（一位俄亥俄州经营者谈到他支持的一位州内共和党重要领导人时，这样说：“我们面对现实吧。在政治领域，你必须能够忍受二流人才，他们是你必须打交道的唯一选择。”）此外，这些人作为企业经理，天生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人们在大型企业等级分明；一个人慢慢地爬到公司上层，公司的忠诚度应优先给予努力工作的员工而不是突然闯入者。他们对尼克松怀有忠诚度，对于政坛新人洛克菲勒而言就不这样。（颇有意思的是，亨利·福特作为一个在企业领导方面特立独行的人，被证明是共和党大实业家中的少数特别人物之一——早在1959年，他就认为理查德·尼克松将失败，共和党应当试一试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的一位核心小组成员说：“前进的大门锁上了、封上了且关闭了。我时常读到民主党对我们的评论之词，当时还认为他们天真可笑。这些俱乐部不仅因为纳尔逊是自由派而反对他，而且承诺支持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很精明：他早在7年前就发现了谁控制着提名权。当他巡回全国各地时，不仅与州主席和保守派交朋友，也和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共进晚餐。显而易见，除了家族钱包，纳尔逊从其他地方争取不到任何金钱支持。这些人喜欢艾克，但他们更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不仅精明强干而且听从劝告，他将继续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他们认为纳尔逊的个性过于独立，他聪明绝伦但又变化莫测。纳尔逊的财富害了他，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他们——他太独立了。”

在报纸和新闻提要中，洛克菲勒的“选战”总共持续了8周——从10月上旬到12月上旬。他的演讲（除了一次美国政界的仪式性演讲——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晚餐会演讲表现平平）均精彩纷呈——他谈及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农业政策、经济增长的需求，表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天生的出色口才。他认真进行了两次考察之旅，第一次在11月，第二次在12月。他在第一次行程中考察了西海岸——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受到尼克松狂热追随者的不公正对待，在华盛顿州受到隆重欢迎。在第二次行程中，他考察了中西部和南部——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在其中一些州，他做得不错；在其他州（比如威斯康星州），他感到非常失望。学生、家庭主妇以及公民派的人们都欣赏、倾听和沉浸于他的演讲。控制着代表组织的保守派则对他

不理不睬。在俄克拉何马州，他成了一个荣誉波尼族印第安人(注)（佩戴羽毛头饰），在达拉斯城成为一个荣誉得克萨斯人（配有高顶帽和牛仔靴）。但共和党的基本力量——瑟洛·威德、汉纳以及塔夫脱的铁杆传人根本就不接受他。

提名取决于候选人初选会。初选会的焦点集中于3月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第一次初选会，1月28日之前要求备案。洛克菲勒的考察之旅及其精彩纷呈的演讲引发媒体的大肆宣传，民众的信件纷至沓来。

但是莱恩·霍尔驻扎在华盛顿喜来登公园酒店的尼克松营地，针对在纽约同一阵营的老对手，策划了阵阵宣传反击。如果洛克菲勒警告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人，霍尔则可能会突然宣布新泽西州共和党领导人坚定支持尼克松的声明。霍尔以长途电话为武器，不懈地展开防御。假如洛克菲勒借助霍默·凯普哈特（Homer Capehart）宣布他们之间交情深厚而在印第安纳州找到少许力量时，莱恩·霍尔会立刻宣布新罕布什尔州州长韦斯利·鲍威尔（Wesley Powell，共和党人）将在新罕布什尔共和党初选会上领导尼克松竞选战役的声明。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会是最重要的。

12月中旬，洛克菲勒团队准备迎接最后结果。为收集“保守派”政治情报而划分的4个区域传来的报告是：无人支持。尼克松牢牢控制了保守派。

洛克菲勒考察全国得出的报告是：无人支持。在印第安纳州、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他感受到人民的慷慨支持和欢呼，也赢得了继续前行的力量之源，但那里及其他每个地方的代表掮客通通表示反对。

财务调查报告也是：无人支持。企业界反对纳尔逊·A·洛克菲勒，支持尼克松。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因素。洛克菲勒已初尝竞选之路的滋味——对个中酸甜苦辣生了厌倦之心。他的日程连轴转，天天演讲，身心疲惫不堪。他现在知道，如果政治角逐从初选就开始的话，当事人必须没有牵扯精力的任何其他职务或职责。然而他是纽约州州长，内心也渴望做个好州长。纽约州议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他还没有研究和制订一个良好方案，也觉得实在分身乏术，难以继续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或其他可能的后续选举了。

12月24日周四上午，埃米特·休斯、乔治·欣曼、约翰·洛克伍德以及弗兰克·詹姆森等4人和洛克菲勒在第55大街的州长私人办公室相聚。州长刚刚结束了上次中西部的短期考察，不过他还在路上时，他们就依其建议起草好了退选声明。

这些负责人都清楚，洛克菲勒通往1960年共和党提名的道路已经被有效封

堵了。他们知道，不仅在党内无法挑战尼克松，而且若盲目建议他投入初选，将使洛克菲勒的立场变得令人不解和模糊不清。在初选中，洛克菲勒必须对阵捍卫艾森豪威尔立场的尼克松；于是他或者模糊淡化与艾森豪威尔立场之间的分歧，或者毫无希望地在初选期间号召共和党选民驳斥这位最受人欢迎的共和党总统。退出初选和短兵相接将使这位纽约州州长可以自由随意地指点国内问题，此时退选使他能够采取一种丘吉尔式的领导姿态——警示提醒。凭借该角色所取得的结果远远比一系列紧张且可能失败的初选竞争更重要。

顾问们简单地起草了一份“高风亮节”并对尼克松表示支持的退选声明，但这个提议被放弃了。那天上午，另有人建议声明中应当包含“大会控制人及其背后财团如此这般……”的愤愤不平之词，但埃米特·休斯删除了这类措辞，大家对其修改内容均表示认可。最终声明内容如下：

> ……我相信……控制着共和党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将坚持反对任何提名选举……因此我方若寻求提名，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初选阶段的大规模竞争，进而将浪费本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最终使我不能有效履行纽约州州长的职责……鉴于此，我决定本人现在不，以后也将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本决定为最终的明确决定。

然而，该决定并非意味着盖棺定论和万事大吉。退选声明于某个周五下午在奥尔巴尼发布，当时州长本人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准备乘坐周末火车去费城和妻子与家人共度圣诞。他随意地与一位报社记者友好交谈，话题包括近几个月需要了解的各种天下大事与尚不确定的未来问题以及提问者的提问动机。他谈到了作为公众人物的挑战和技巧——他说这需要平易近人和放松身心，但依然充满渴望地说这一切是“充满乐趣的”。

在纽约，调查行动被暂时搁置了。竞选传记取消了，部分演讲撰稿人解散了，先遣人员又回到了律师事务所。但是生活在洛克菲勒核心圈子里的人们深知促使这次调查行动的情感动力（亦即强烈关注）只是暂时被雪藏而已。

其中一个人说：“他曾对我讲：‘我越积极竞选，就越将尼克松推向头版，也使党的整体形象更好。此外，我越采取这种路线，就越促进党走正确方向。’”思考了一下，这位朋友接着说：“总之，和任何其他方法相比，他以这种方法赢得提名的可能性至少是一样的。通过其他方法，他也不能获胜，除非向艾森豪威尔发起人身攻击。”

目前是1959年的圣诞周，当约翰·F·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拟定参选总统的

正式声明之际，纳尔逊·洛克菲勒退选休息了，等待着外部世界的事件推动他实施后续行动。

有些人说尼克松通过情报人员和朋友已在数天前就听说洛克菲勒决定退选的消息，但是也有一些证据确凿的相反说法：第一位记者带着洛克菲勒的退选消息在下午前往国会大厦的副总统办公室时，现场与副总统在一起的朋友们瞬时变得惊愕和惶恐。副总统的一位幕僚听到这位记者的首份报告时，他的反应是："有人狠狠踢了我们的下身一脚。"

无论他们是否已提前几小时或几天知道了情况，副总统的成员对这条消息感到吃惊惶恐还是有充分理由的。自从他们在比斯坎岛首次会面至今一年时间里，他们已周密谋划与洛克菲勒在任何初选中一决雌雄的决策。尼克松的谋士们也已为共和党这边的大选年写好了推演剧本——尼克松在初选中过关斩将，成为积极的竞选者；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是陪练角色，最终难逃失败的结果。他们开始期待着初选成为焕发春天生机、活跃党内筋骨、与民主党争夺报刊版面和电视时间的前奏；更重要的是，为迎接秋季总统大选，将他们需要的所有人力资源都调动起来。

现在一切超出了预期，他们可以再扮演几个月的政治家角色，密切注视着政治分界线另一侧约翰·F·肯尼迪的动向，不过也始终留心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情况，谁知道他的关切又促使其采取什么行动呢。

---

1. 雅各，《圣经》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之孙，以撒之次子。雅各意为"抓住"。据《旧约·创世记》记载，因其出生时紧抓其孪生兄以扫的脚后跟而得此名。他曾以一碗红豆汤换取以扫的长子名分，并骗得其父的祝福。——译者注

2. 以扫，《圣经》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之孙，以撒之长子。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以扫身体强壮而多毛，故起名以扫。他与雅各为了继承权而兄弟反目，但最终和好。——译者注

3. 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纽约曼哈顿区的一条著名大街；美国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因此这条街逐渐成了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译者注

4. 波尼族印第安人（Pawnee Indian），美洲原住民，很多居住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译者注

第4章

初选的艺术：威斯康星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初选之争，不论是哪个层次的，都是美国对民主艺术最原创的贡献；然而，这种艺术形式，不论是哪个层次的，恰恰是把政治当交易的职业政客们深恶痛绝的。

理论上，初选之争把提名候选人的权力从犬儒主义的党魁手中夺走，直接交到缔造党的人民手中。事实上，当初选从理论走向现实（有些州的初选是愚蠢而无意义的），其竞争会带来难以磨灭的灾难性冲击。一场真正的初选，是党派大家庭的内斗——而且，和所有的家庭斗争一样，与自己人为敌，往往会比11月与真正敌人的战斗更惨烈，留下更持久的伤痛。在初选中，野心不知发端于何处，无名之辈也来凑热闹，老人们被无情地送入政治坟墓，领袖和党魁们轻则被羞辱，重则丢了乌纱帽。在选区、县和州各层级的初选战中，大家都是一副笑里藏刀的面孔。

政治领袖和党魁们痛恨初选是有理由的。初选意味着他们要把心愿直接捧到民众面前，请求支持。初选会吸收和浪费捐助人大笔的金钱，这笔钱如果用于11月的决战，更加适得其所。初选的口水战给对手党提供了弹药，不管谁脱颖而出，都要面临对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打击，且杀伤力极大；初选的造势活动让参选人筋疲力尽，演说材料和精气神都消耗殆尽，在正面遭遇大敌前，他已然疲惫不堪。

到了总统初选，所有地方选举的弊端都会被放大10倍。美国幅员辽阔，初选连番登场，需要庞大的资金。总统一职如此受瞩目和诱人，不乏一群斗志昂扬的公民和门外汉也执意参选。地方初选通常会把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政治机器搞得一片狼藉，但是和总统初选对地方组织造成的破坏力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总统初选中，两个来自其他州的政治巨头煽动地方组织的野心，全然不顾当地微妙的平衡与折中的局面，一心只想追逐统治国家的权力。

尽管如此，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总统初选，进入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代表将会由地方的党魁选送，大会无法衡量参选人的选票号召力，完全由政治领袖在后台商量出一个结果，这样做出的决定就是一叶障目。从

1865年到1900年的35年间，总统候选人就是由党内领袖在大会期间决定的。这段时期选出来的国家领袖都非常平凡，就算说“那是自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打破美国社会的平衡以来最平凡的时期”也不为过。到了20世纪之交，总统大选引入了初选，迅速席卷全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很多州都试行了初选——其中一些州就永久采用了这一模式，一些州则取缔了初选，大部分州数十载以来不断修改规则。到1960年的时候，只有16个州仍然保留了法定开放的初选。所有想要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派，都要在这里直面选民。这16个州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各异，是美国文明多元化的写照，最后剩下这16个州的组合，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规划。在外国人眼中，这个组合是最荒谬的战场，而那些渴望成为自由美国领袖和掌权者的人将在这里竞技。古往今来，在玩弄美国总统政治的游戏中，这些州都至关重要。

对于约翰·F·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来说，只有初选这一条路可以通往全国党代表大会。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初选证明自己在美国人心中的分量，党内大佬们就会在洛杉矶的密室里做出让他们痛彻心扉的决定。所以，随着战斗的临近，他们感觉到不同观众投来的目光——首先，是初选州看似友善的民众，是他们要直接争取的对象，还有地方代表，也许能随着初选的胜利一并拿下（当然，他们不敢期望太高）；其次，是全国的观众，因为这是全国民众第一次观看这场比拼并做出评估；最后，东部大州和秩序良好的小州的政治领袖会冷眼旁观这场政治赛马。

在这16个初选州里，休伯特·汉弗莱到暮冬时节选择了5个州作为战场，约翰·F·肯尼迪选了7个，其中不少与汉弗莱重合。那么，他们将首先于4月5日在威斯康星州短兵相接[注]。

在全美50个州当中，威斯康星州可能是职业政客最讨厌打初选战的地方。微妙的是，1903年威斯康星州始创总统初选制，之后其他州开始效仿。当初的政治理念启发了革命性创造，而今却把威斯康星州变成（用政治术语来说）一个无组织的州，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州，一个在初选中屡屡葬送大人物总统梦的州。

那么，威斯康星州的政治理念从何而来？它与姐妹州加利福尼亚州的亲缘关系是怎样的？这是两个值得探究的问题。19世纪末，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是共和党的两大铁杆州，也是最腐败透顶的两个州。这两个州政治机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握在铁路大亨、银行家和实业家的手中。他们掌控着共和党，腐败无赖的风气从党内开始散播。革命由此爆发，相似的两位领导人想要给整个美国政治体系吹一股清新之风。半个世纪后的今

天，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特立独行的政治仍然如出一辙，正派高效的州政府系统也是毫无二致。这两个人凭一己之力改变社会，影响力延续至今。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这无疑是向他们的一种致敬。50年前，加州的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和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决定把这两个州变得更好。他们去世后几十年，威斯康星州和加州确实越来越宜居了。

在罗伯特·拉福莱特的理念里，威斯康星州政府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公开选出一个州政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在他眼中，政治大佬是所有邪恶的源头，他们控制利益集团和赞助体系，以及党大会选出来的候选人，还不都是千人一面，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经过30年激烈的政治活动，罗伯特·拉福莱特成功改变了威斯康星州的政治和架构，脱胎换骨的程度至今令职业政客咋舌。

今天，威斯康星州的候选人仍然是通过完全开放的初选，而非党大会选出来的。这里禁止有组织、建制、法定的政党机器（加州也是如此）。赞助这件事在威斯康星州（加州也一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威斯康星州州长最多只有8个因赞助可获得的职位供其支配。政治参选人不得在报纸和杂志上投放付费政治广告，选前24小时内，不得在电台和电视投放。参选人不得雇用车辆拉选民到票站，或是花钱做民调。尤其是总统这样神圣的职位和总统初选，政治纪律和政党控制在这里遭遇极大挫败：在总统初选中，选民不管登记在哪个政党，可以在自己党和对手党的初选中投票，所以交叉投票的共和党人可以阻挠他们讨厌的民主党人，民主党人亦是如此。这样的体系近乎无政府状态，以至于威斯康星州的有识之士开始大肆谈论起废除跨党派投票的特权（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也留下了与拉福莱特类似的政治遗产——在初选中跨党派投票，不过加州在6年前废除了这一制度）。

彻底瓦解了威斯康星州的官方党派政治后，拉福莱特家族在1934年正式把进步分支从共和党独立出来，成立威斯康星进步党（Wisconsin Progressive Party），并在接下来的12年主导本州政治。在威斯康星州，进步党才是第一大党，共和党居第二，民主党仅排第三。共和党重度依赖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血统、郊区的中产阶级、大产业和德裔农民，通过开放初选选出了像约瑟夫·麦卡锡[注]这样可怕的领导人，以及亚历山大·威利（Alexander Wiley）这样正派的领导人。民主党已经被时代淘汰，龟缩在沿密歇根湖一带的工业城市，接受华盛顿赞助人的一点儿施舍。用其中一位领袖的话说就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波兰裔–爱尔兰裔小社会”。到了1938年，民主党人只获得了8%的普选票。第一大党进步党得到不同类型选民的支持：为拉福莱特的革新成果感到自豪的校园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在德裔美国人居多的大城市里生活的工人阶级选民，他们受日耳曼啤

酒馆社会主义（Teutonic beer-hall socialism）影响（密尔沃基几十年来选出的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市长）；乡村地区主流的斯堪的纳维亚裔农民，这里的丹麦裔美国人信奉社会主义思想，向清教倾斜。

“二战”后，进步党迅速瓦解，这才颠覆了威斯康星州的政治模式——也促成了乔·麦卡锡（Joe McCarthy）的崛起。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伟大的拉福莱特之子重新加入共和党。尽管拉福莱特曾经在19世纪世代主导过共和党，但时过境迁，共和党现在的领导人是麦卡锡，即使拉福莱特这个显赫的姓氏也无法让进步党支持者转投共和党阵营。数以万计的进步党人心灵还在流浪，这个时候的他们正好赶上民主党内的公民复兴。全民参政是过去10年民主党最大的承诺和问题之一，如今这把火从中西部偏远地区点燃。休伯特·汉弗莱和他的公民团体在1948年获胜，接管了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同年，G·门嫩·威廉斯[注]、尼尔·斯特布勒（Neil Staebler）和沃尔特·鲁瑟接管了密歇根州的民主党。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重燃了数以千计圈外人对政治的热情，他们品格高尚，开始投身政界；史蒂文森在重塑全美民主格局方面具有影响力，但要说他对哪支民主党的改变最持久有效，那还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不仅是威斯康星州首府，也是史蒂文森派在全国势力的心脏。）1952年大多还是业余选手级别的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年轻新秀们，以及没有归属的进步党人，开始涌入偏居沿湖地带的民主党，在更迭中取代了旧领导层。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接管了民主党。1957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当选美国参议员；1958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当选州长，这还是20世纪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民主党一时大受欢迎，生机勃勃，风头无两。

3月，初选临近，威斯康星州还是银装素裹。飞机从西边的纽约飞过威斯康星州上空。俯瞰这个地方，白雪皑皑，所有的山上都像铺着水晶地毯，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的白色毯子上还有黑色点缀，那是一些光秃秃的树。结了冰的灰色湖面上覆盖着白雪，冰雪开始消融，渐渐露出裂缝。白雪包裹着威斯康星州。

白雪之下，很难分辨出哪里是穷苦农家，哪里是富裕农庄，因为大雪临门，农户们不得不把汽车和设备移到室内。大地白茫茫一片，奶牛场和玉米地，德裔美国人和波兰裔美国人的宅地，盎格鲁血统和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并无二致。

选战即将开始。

一个孤独凄凉的年轻人，一个漫长离谱的日子，这是1960年肯尼迪选战留

给我的第一个户外记忆。记忆中，那个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的年轻人仿佛还在眼前。他像运动员一样轻盈，脸上没有皱纹，眼神镇定中带着疲惫，独自徜徉在威斯康星州最北边的第十国会选区乡村街道上。街上空荡荡的。第十国会选区是延伸至五大湖的一块土地。

第十国会选区是一个寒冷又荒凉的乡村地带。这里曾经森林密布，因为坐拥五大湖的铁矿，也曾经是一个主要的采矿中心，但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曾经壮观的冷杉林现在全被砍掉了，1886年原木堆积如山（世界上最壮观的原木堆积：7亿板尺的原木），这种画面只能在记忆里找了。矮栎和短叶松代替了原始的冷杉林，黑熊和鹿也回来了。铁矿石多年来被开采殆尽，当地臭名昭著的采矿营地不复往日的狂欢盛宴。威斯康星州北部的冰川土太贫瘠，难以耕种，这里的农民只能勉强度日。从事农耕的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路德会教徒。第十国会选区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威斯康星州南部声名狼藉，因为这里有很多怪人——芬兰托洛茨基分子注和拉丁裔矿工，加上移居此地的肯塔基山地人，他们几十年前到这里来伐木，原木砍尽后走私酒，现在靠偷猎和从加拿大走私为生。第十国会选区人口逐渐流失，很可能会在当下国会议席重新分配中被取消，从而沦为一种记忆。

对于肯尼迪来说，这是一片怀有敌意的土地（卢·哈里斯的一次抽样调查告诉他，第十国会选区有60%的人反对他）。而且那一整天，这个地方都给他摆了一副臭脸。他在早上六点半起床，他的车队从欧克莱尔（Eau Claire，第九国会选区）飞速出发，穿行在第十国会选区乡村的柏油路上。早上他曾把脑袋探进康奈尔（Cornell）的恩乔伊咖啡馆，希望能看到等待他的集会——结果只看到8个人围坐在一个绿色冰激凌蛋糕前，等着听他说话。他在莱迪史密斯（Ladysmith）、英格拉姆（Ingram）、普伦蒂斯（Prentice）和菲利普斯（Phillips）停下来，看到街上只有零星几个人，冷眼打量着他。间或他的先遣人员已经说服一个高中，让他到一节公民学课上讲话，他会给孩子们讲讲总统政治和历史逸事注，敦促他们好好学习，因为他们的大脑才是真正的“国家金矿”。

中午，他站在菲利普斯一个村子的街头。这里只有一条街，他从街头望到街尾，看不到一个人。他走进一个硬纸板厂，和生产线上的工人说话，工人不耐烦地让他挪开。他访问当地的报社，这家报社对一个总统参选人的来访漠不关心。他挨个走进菲利普斯主街道上的咖啡馆，打断正在喝咖啡和吃三明治的男人和女人。他说，“我叫约翰·肯尼迪，我参加了总统竞选的初选”，然后他们继续吃东西。午后不久，他离开了这里。这个镇子毫不关心他的出现，仿佛他的出现就像一阵冷风吹过。

第十国会选区的面积比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还大，但是人口却能塞进波士

顿的5个行政区。整个下午，他都行驶在第十国会选区的路上。他只和小学生说过话，或者是独自走在大街上，看看能否碰见几个人。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这里无声的傲慢才透出友谊的曙光。在一个叫梅隆的十字路口，有5个人在等他——其中一个人喝得很开心，坚持说碰巧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注]，肯尼迪一定要去十字路口的酒吧喝一杯，向守护神致敬。肯尼迪费劲摆脱了那个酒鬼，继续上路，独自一人。

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已经在第十国会选区兜了185英里，可是他这一整天见的人不超过1600个，其中1200个很可能都是孩子，还不到投票年龄。但他却没有一刻失态或急躁。第十国会选区是打通美国总统之路的一个站点。过去，他们从纽约和华盛顿这样的政治制高点远观这里，如今亲临此地，从近处看这里的竞选活动，倍感荒谬。

只有肯尼迪不觉得荒谬。夜幕低垂，他行驶在那一天的最后一段路上，从赫尔利开往更荒凉的亚什兰镇。他解释说，局势很清晰：要想排除万难抵达全国代表大会并走得更远，这一天只是总体规划中的一片拼图。第十国会选区绝大部分是清教徒，像汉弗莱这样的人对农民有天然的吸引力，这里的社会结构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肯尼迪认为，第十国会选区是威斯康星州10个选区里最难拿下的。如果他能拿下第十国会选区，那他可能会拿下所有选区，农庄也好，城市也好，清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都不在话下。迎难而上很重要，和小学生对话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回家会说给父母听。

他在这里停了下来，因为车转了个弯，雪的尽头是冰封的苏必利尔湖，一马平川，这是他一整天里第一次看到苏必利尔湖。司机开始说话。司机是个当地男孩儿，他说冰是灰色的，开始融化了，过几个星期就会裂开，然后就会有胡瓜鱼。苏必利尔湖的胡瓜鱼都是成群结队地游过来，鱼鳞闪着微光，水里泛起一团团的黑色。司机还说，过几个星期，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各地的人都会带着渔网和鱼篓到这里捕胡瓜鱼。只是，你不可能三餐都吃胡瓜鱼——这里的胡瓜鱼多得让人吃到吐。

肯尼迪一向对技术细节感兴趣，那天也一样。他认真地听司机说着，间或问一两个关于胡瓜鱼的问题，记下这些信息，好像多了解一点儿当地的知识都是好的，以便将来当了总统会用到。他的注意力即刻从第十国会选区悲惨的一天转投到全国代表大会。如果他能拿下第十国会选区，他就可能拿下威斯康星州所有选区。如果他能横扫整个威斯康星州代表团，他想不出“他们”（东部政治大佬）有什么理由会在洛杉矶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拒绝提名他。想到这里，他的思绪又转到那些控制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佬——他揣测着这里的胜利会怎样影响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劳伦斯的想法，接着他又想到宾州劳伦斯的问题和华盛顿州州长罗塞利尼（Rosselini）有相

似性。那时，车已经开到苏必利尔湖边一个小得可怜的城市阿什兰——这里是威斯康星州白人的第一个家（1661年）——曾经是一个繁忙的铁矿港口，但是自从铁矿石贸易不断萎缩绝迹，湖边的码头已经破败不堪，大量房屋关着门，一副萧条阴沉的景象。然后，肯尼迪开始谈论起经济萧条的问题，以及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在他看来，这一整天并没有什么荒谬的地方，孩子也好，醉汉也好，荒凉也罢，就算他要在阿什兰这样荒凉的地方做些什么，都不可笑。

和休伯特·汉弗莱相处的那一夜就完全不同了。汉弗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当一个浪漫主义者开始理性看世界，他隐隐觉得通过初选走向总统宝座是荒谬至极的。不过，汉弗莱还是可以直面自己的处境，因为只有通过初选，他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那天晚上很冷，我只能草草记下一些零碎的笔记，并不能准确再现那天的情景，但是他的声调和态度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许多记者都在汉弗莱入住密尔沃基的恺撒–尼克博克酒店（Kaiser-Knickerbocker）等候，要到深夜才知道他是否会在第二天到威斯康星州南部举行竞选活动。汉弗莱在等华盛顿的电话，确认参议院一个关键的议案是否需要他的投票。（对亲自到参议院投票这样的事情，汉弗莱比肯尼迪上心得多，肯尼迪认为竞选总统才是他最重要的全职事业，出席参议院投票只能排第二位，所以他就一心一意竞选总统。）晚上十点半，汉弗莱确定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出席第二天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活动，他就和仅剩的3名记者、2名助手、他17岁的儿子、未来的女婿一起钻进冰冷的竞选巴士，驱车前往两小时车程外的麦迪逊。这是一段漫长而寒冷刺骨的旅程。

外面很冷，雪堆得有蛋糕那么厚，雪堆的粉末被吹到挡风玻璃上。车里比车外更冷。汉弗莱累了——他已经连轴转了一个星期，整周都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忙立法的事情，然后就飞到纽约，找纽约的支持者追加资金，接着飞到威斯康星州，整个周末都在进行竞选活动。他知道他大概会在凌晨1点抵达麦迪逊，又必须在五点半起床，在暗夜曙光中到奥斯卡·迈尔（Oscar Mayer）的肉类包装厂和人握手，紧接着就要上路参加其他竞选活动。巴士上放了一个简易床给他打盹儿，但是车上太冷，压根儿睡不着，而且汉弗莱很紧张，所以他就坐在床沿上。巴士在结冰积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一路上，行李架上的阅读灯照下来，只有两支铅笔杆粗细的光束，把他本就消瘦的轮廓映照得更加苍白和消瘦。

一个记者也感觉到瑟瑟寒意，从行李箱里拿出一瓶可以报销的上好威士忌和几个纸杯，给每人倒上一杯来抵御寒冷，也给汉弗莱递了一杯。我们都前倾身子围着汉弗莱，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

印第安纳州初选中与肯尼迪叫阵——因为肯尼迪已经确定参加印第安纳州的初选。

汉弗莱用手指转着纸杯，开始了一段长达一小时的独白。我还记得，他的嗓音很好听，盖过了巴士的嗡嗡声。

“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为什么也不参加佛罗里达州的初选？好的，我来告诉你——任何进入初选的人其实都不适合当总统。只有疯子才会参加初选。现在，一场初选的折磨胜过一场拷问。如果是意外地参加了初选，或是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没问题，但如果是事先筹划的……”他摇了摇头，一些思绪或者一些问题让他跳跃到农场问题。

“这些人不愿意离开农场，但是形势逼迫他们离开，这比30年代的情况更糟；这些农场的孩子生活开支减少了30%；竞拍愈演愈烈；竞拍率已经比肩30年代的水平了，他们在逼迫农民离开农场，而农民不愿意离开。哦，我明白这里面的经济学，我懂农业生产的所有经济学原理，但是我只想说，这个国家留有一些家庭农场是有好处的，我是这样觉得。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需要一些靠农场谋生的农民家庭。而本森（Benson）就是个白痴，他的脑袋瓜还不如一个傻子，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因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我有调查的权力……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当过市长，我们曾有一帮很出色的年轻人。市长是个很好的职位，是当州长和当总统之间最好的职位，如果我能调查……”

他用凌厉的眼神看着我们，似乎我们正在问他问题。

“你说，为什么汉弗莱想当总统？为什么谁都想当总统，尤其是我，形势还对我非常不利——有时候我半夜醒来，我对自己说，天哪，如果我是总统，如果我是总统，会怎样……现在国家如此艰难。”

我对汉弗莱理念的了解几乎都来自那个漫漫长夜——来自他对普通人近乎古雅的浪漫主义信念。我们经过了一个购物中心。他讨厌购物中心，尘封的往事被翻了出来——只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s）、蒙哥马利·沃兹公司（Montgomery Wards）和小猪扭扭百货公司（Piggly-Wigglys）这样的大公司才进驻崭新的大购物中心，小商户就会被挤走，而他的父亲就曾被挤走。政府应该照顾到这些小商户，给小规模的商业租赁提供联邦政府保障。他谈到农民，以及年轻的农民如何离开农场，到大城市去挣钱——就好像他百般呵护着那天晚上经过的每一片黑暗的农场。对于汉弗莱，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国家，这是一个个体散落的国家，而他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

令人吃惊的是，汉弗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国内的工会政治到牛奶的

价格，到花生的补贴价，到圣劳伦斯航道的吨位，到他赞赏的“粮食换和平”计划，再到核裁军。随便一个主题，汉弗莱都能从过往的阅读中找到相关知识，并且融会贯通，放在自己的理念框架内娓娓道来。而他的理念就是：这是一个个人、自耕农和农村商人的国家，政府的职责就是防止大人物压榨小人物。“政治的目的，”他在面对威斯康星州中部的一群农民时说道，“就是给人们指明方向。”

与光环如影随形的是一种奇怪的抽离，这种抽离能让人看出他内心的分裂。当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说“我认为”或“我想要”或“我做了”。当他谈论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了“汉弗莱提倡”或“汉弗莱首先建议”或“正是汉弗莱指出……”，好像他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在陈述。他身上兼具娴熟的政治技巧（“你好奇我为什么周日去退伍军人医院——也许他们不能投票，但周日他们都有访客”）以及对无助者的柔情关爱。访问威斯康星州中部的一个聋哑学校时，他会盛装打扮向学生做一场演讲（通过手语翻译），然后噙着泪离开，因为他们如此令人难过。在整个初选过程中，这种奇怪的抽离感如影随形。他发现自己很难去痛恨什么。他会向记者们发表一段针对肯尼迪的尖锐讲话——然后，私下里，他像个男孩儿一样垂下脑袋，离开床沿说：“我一会儿还有很多要说的，可能也是琐碎的内容。”

汉弗莱的竞选之所以失败，除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在这个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在1960年听人布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让所有的问题简单化、透明化、归于平淡。他能在阳光下谈论任何话题——对着农民、工人和大学知识分子。而他讲完之后却没有留下任何传奇，他自己也没有成为传奇人物。他和底下的听众没什么两样。他没有距离感，没有刻意与政治阴谋划清界限，没有一个君王的威严光环。穿着药剂师外套的汉弗莱，在小镇里说明药商的问题和库存（其实他可以做到引人注目），或是混在纠察队队伍中唱着“永远团结”的汉弗莱，泯然众人矣。不幸的是，一个总统必须与众不同。汉弗莱渴望国家媒体的关注，但是国家媒体虽然很喜欢他，却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汉弗莱总是能用优美的嗓音说出一些艳惊四座的话，或是就国家政策的任何领域即兴发表专题演讲。但是他的即兴演讲、他的观点，媒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也就没那么珍贵了。他的言论中少了一点儿克制，而且他总是轻易表现出友好。

稍加约束，汉弗莱其实就离伟大不远了。在上周末的威斯康星州竞选活动中，他的优美、高亢、富有磁性的嗓音哑了，突然完全失声。整个周日上午，医生都在医治他的喉咙。他的嗓音是他的第一作战武器，那天下午他要亮相3个重要的电视节目，嗓子必须保持良好状态。但是他已经答应一个犹太群体上午去演讲，所以在医生治疗后，他就直接赶到密尔沃基的一个犹太人社区中心。他晚了一个半小时。医生严格嘱咐他不能用高过平时

聊天的声调说话。在这样的约束之下，他不能像往常一样用洪亮悦耳的声音发表汉弗莱式演讲，只能让大家聚到他身边，用轻柔的语调，第一次向听众讲述他在明尼苏达州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带领一帮年轻人重塑那个州的民主党。然后，他即兴地说起下面的话：

> 我们相信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才智——要给自由主义插上翅膀，这对翅膀就是对人民的了解和热爱。自由主义不能只存在于文字或文件中。如果你置身政界却不动一点儿真情，那你得到的只有恨。
>
>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竞赛不是军事竞赛，我们与苏联真正的竞争不是经济竞争。我们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也不只停留在经济、科学和教育上。这是一场价值体系的对垒……允许别的价值体系在某一历史时刻在一些区域盛行，这也许是必要的——但接受它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与之共存——但不是去接受它。这是人性中的正邪之争，宽容与偏狭之争。在我们的文明里，我们相信造物主是以自己为蓝本创造了人类，并注入了自己的精神遗产——人类尊严绝不能被绝对权力所亵渎或滥用，我们视此为人生信条。没有人有权力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去统治别人，人们只有明白这一真正的道德价值才能获得自由。纵观整个历史，人类不断争取自由，免于恐惧、暴政和无知。而我们就是还民自由的人，这就是现实，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要让人们思考自己在政府中的角色，在历史中的角色。
>
> 选举一个总统，要看他是否心地慈善、品格高洁，这比他是否熟谙政治、聪明或有政治家风范更重要。成为一名领袖意味着你愿意去冒险——并且愿意去爱。这位领袖是否曾发自内心给予你什么？——或者一切都是事先筹划，一切都是照章办事？这样是否有效？如果你想要高效的政治，你可以去找极权主义者[注]。我相信政治就是和人民打交道，要遵从人性。如果我间或在报纸上读到休伯特·汉弗莱的选战打得多么混乱这样的内容，我会说，谢天谢地。

说着“谢天谢地”，汉弗莱的声音突然恢复了原样。医生对他喉咙的治疗起了作用。那个威严、思虑深远的男人嗡的一下消失了，他那如音响一般的喉头开关被打开，声音飘了出来。

“谢天谢地！”汉弗莱几乎是吼出来的，似乎是为选战的混乱感谢上帝，也为嗓音的恢复感谢上帝，这样就不影响他上电视了。

“谢天谢地！”他又开心地说了一遍，“我们是人民，只是人民。我们也许不够高效。但是你们去读独立宣言、宪法和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会发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效率’这个词。”

汉弗莱成功收尾。这是一次出色的演讲，如果他能多做类似的演讲，稍加约束，也许他会赢。

但是他很少做这样的演讲，初选中根本没有机会发表长篇大论。在总统初选中，第一次的公开亮相通常在很基层的地方，但还是会影响未来的命运。参选人既要表现得像地方议员一样亲近，又要维持距离感显得比较尊贵，这才是总统的姿态，这就是初选的艺术。这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参选人要在一系列简短的政治演说中尽情发挥。这些演说时长不过5分钟或10分钟，地点不限，工会礼堂、茶话会、维也纳烤肠聚餐、学生团体、少数派集会均可。一篇演讲稿，三两词汇，必须能在所有场合发挥效用。在初选中，参选人不能浪费那些精彩的表述。如果他成功胜出成为候选人，日后在更宏大的竞选活动中还能用上。他也不能真的与对手撕破脸，如果失败了还得支持自己的对手——或者胜出了就要寻求对手的支持。

汉弗莱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一面与人为善、一团和气，另一面尽量只谈实质问题和细节，证明他熟谙黑人区的黑人问题、业村的奶业问题、工会乡村的工会问题，连当地的议员都没有他了解得多。他执着于谈问题，这在初选选战中通常是一个错误。如果是竞选国会议员，而不是总统，那他这样做就会被接受。

但肯尼迪从两个层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是他的亮相方式。在接连不断旋风式的竞选活动中，他总是以一个年轻战神对抗大佬（这也是事实）的姿态出现，号召所有的听众去思考总统之职的本质：总统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职位，总统一人就能影响、造就、复兴和保护这个国家，因此，威斯康星州的人民有此待遇，可以在总统选举中第一个拥有发言权，就应当和他一样慎重对待。

其次是组织层面。肯尼迪的竞选组织是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地区以外运作，还处于试运行阶段。

从技术来说，两位总统竞选人在相互争夺威斯康星州的31张民主党代表票，其中10张票根据普选投票结果赢者通吃，另外20张票分配到10个国会选区，每个选区各两张，全国委员会成员将瓜分剩余的选票。威斯康星州西部的3个国会选区——第三、第九和第十选区——是农场和奶制品为主业的乡村，邻近明尼苏达州和汉弗莱的大本营，很容易被汉弗莱拉走，汉弗莱对农场有天然的吸引力。两个南部选区——第二和第一选区——也是奶制品和农场为主业的乡村，但较富裕，掺杂一些工业。密尔沃基有两个选区——第四和第五选区——是工业区，肯尼迪的东部气质对这些地区很有吸引力。第七国会选区位于威斯康星州中部，尚不可预测。密歇根湖

沿岸的第六和第八国会选区属于老乔·麦卡锡的势力范围，部分工业，部分木材业，部分农业。

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学府。几年前，大学的农村社会学系准备了一份展示威斯康星州各种族血统分布的地图，其多样性不可思议，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令威斯康星州成为美国政治和谐的重要代表。威斯康星州的71个县里，任何一个县都有不下23种不同的种族血统（注）。德裔美国人在威斯康星州占多数，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裔（主要是挪威裔），英国裔居第三。

不过，很快，人们看待威斯康星州的时候不再局限于血统差异的角度了。经过分析和宣传，以及压力集团的介入，每一种血统又分裂为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阵营。不管原先民主党选民是不是根据宗教倾向来划分阵营（因为在威斯康星州，东部大州的"平衡候选人名单"还是未知的），在媒体和电视不断渲染和放大他们在宗教归属上的分歧后，他们实际上也就按照宗教倾向站队了。

本书后面会提到，其实谁也说不清美国任何一个社区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比例。所有的数据都是猜测。但是在威斯康星州，最靠谱的猜测结果就是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31%。在东部，总体来说大多数天主教徒还是会投民主党，但是在威斯康星州，近几年有大量天主教徒转投共和党，比例超过大多数州。鉴于威斯康星州采取开放初选的模式，选民有不限党派投票的特权，共和党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可以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投票，而不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投票。那么，共和党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是否会利用这一项特权介入民主党初选，投票给自己同教派的参选人呢？如果是这样，谁获利最大？据我所知，这两名参选人都没有什么偏见的黑历史，他们谁也不希望或者追求这种跨党派的投票。但是国家媒体的报道很快就把视线聚焦在无法预判的宗教分离上，还把这一点当作选战的核心政治议题。犯众怒的商人和怀偏见的宗教人士成为大肆报道的对象。尽管两位参选人都谴责偏见，但谁也无法消除这种宗教情感的入侵。

每一位参选人都明白，宗教和种族一直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注），只有把自己的大纲、政策和个性与对手严格区分开，才能克服这一问题。但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中，汉弗莱和肯尼迪的先进自由主义大纲如此相近，做出政治目标上的区隔是天方夜谭，"亲缘政治"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两位参选人都全身心投入威斯康星州初选中。他们投入了差不多数额的资金，大约15万美元。但金钱并不足以衡量他们的努力。正如汉弗莱所说，他就像一个"街角水果店杠上了连锁店"。汉弗莱也有室外广告牌、宣传广告、一辆竞选车、购买电台和电视时段、宣传单——竞选手段应有尽有。

但他的明尼苏达州团队要在大本营处理日常事务，只能匀出周末的时间帮他。他的全国竞选总部、组织基地只有6个人的团队，在一家华盛顿酒店的4个房间工作。

而肯尼迪为第一场初选做了几个月的准备。肯尼迪无须在机场坐立不安地等飞机——他的私人飞机可以全国飞，可以随时进出威斯康星州，全凭他调遣。（有一架私人飞机更省钱，肯尼迪说，这符合他一贯的作风，而且他是对的，因为一场竞选活动中，私人飞机飞行里程的成本比商业飞机低。）肯尼迪麾下有路易斯·哈里斯——哈里斯对2.3万名威斯康星州选民做的民调不仅是目前单个州最大规模的民调，也是一笔无价之宝，帮助肯尼迪了解民情。最重要的是，肯尼迪有良好的组织，他还是国家媒体追逐的对象。

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只有两个办公室，给他的高层员工使用，一个在麦迪逊（第二区），一个在密尔沃基；肯尼迪在10个国会选区里的8个选区都配有办公室，配备顶尖人才。肯尼迪的人员也不是用钱招募的，而是靠肯尼迪那些老友以及他的社会背景积累的人脉。他的姐妹和兄弟本身就是一支免费的政治精英部队，在全州各地运作。10个选区中有4个区配备的都是他的常春藤大学同学，全日制为肯尼迪志愿者组织工作。在偏工业的第一区，他邀请到大艺术家沃尔顿（Walton）为他创建志愿者组织。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Gloucester）前市长本·史密斯[注]从格洛斯特赶来接管第十选区，肯尼迪在参议院的那些工作人员，除了索伦森，都倾巢出动来到威斯康星州。汉弗莱所能依赖的只有这些年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组织赢得的声誉。他曾给予党组织帮助，在国会替他们发声。汉弗莱过于依赖在大工会的好名声，要靠他们提供人力、资金和帮助。而肯尼迪团队靠的就是自己。他们估计这些选举出身的州民主党官员（州长、联邦参议员、国会议员）会保持中立，以免在别州候选人的争夺战中被撕裂。但是肯尼迪还是争取到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主席帕特里克·J·卢西（Patrick J. Lucey）做他们的顾问，还选择了年轻又有魅力的民主党籍麦迪逊市市长伊万·内斯廷根[注]来领导他们全州范围内的公民委员会。除此之外，肯尼迪团队带着自己的组织进驻威斯康星州，运用自己的技巧，动用自己的人力，召开自己的会议，举行自己的招待会，设定自己的目标，全凭自己做主。

有活动才有新闻。威斯康星州成了肯尼迪的主场。他坐“母舰”号私人飞机，他有显赫的家世，他的执行者和组织者都来自常春藤的圈子。媒体被肯尼迪的魅力折服，为他的政治机器发出的轰鸣声着迷，慢慢锁定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选人为赢家。随着初选日临近，媒体预判肯尼迪能拿下的选区数量水涨船高——从10个选区里的6个变成8个，又跳到9个。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州长办公室里的聪明政客相信肯尼迪能10区通吃，在威斯康星州的提名战中交出完美答卷。

4月5日周二前，威斯康星州都在为投票做准备，肯尼迪将会轻松取胜（预言家们也这么认为）。

真实的投票结果显示，这并不是一场唾手可得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将会影响接下来到11月的肯尼迪总统争夺战。

在密尔沃基菲斯特酒店三楼拐角处的套房里，肯尼迪和几个家人一起接收信息反馈，弟弟罗伯特和分析师卢·哈里斯在一个单独的通信中心接收第一手信息。通信中心有直线电话通到肯尼迪房间，这种模式被一直沿用了下来。票站关闭两小时内，投票形势已经明了。西部选区——第三、第九、第十选区将全线失守，原因何在？因为这些选区是农业区？还是因为是清教徒区？其实他也无从判断。他将以窄幅优势拿下第七选区，在第六选区和第八选区（多数人口是天主教徒，老乔·麦卡锡的地盘）大幅领先，确定拿下第一区和密尔沃基的第四和第五选区（也是多数人口为天主教徒）。在汉弗莱拿下的选区里，选民反对肯尼迪是因为他们的清教徒身份，还是因为这里是距离明尼苏达州最近的农业区，没人说得清；肯尼迪拿下第六选区，因为这里以天主教徒为主，还是因为这里依赖工业，也没人说得清。8点，反馈的信息已经初现轮廓；10点，整体形势已经明了。

他一直在读报纸，慢慢地喝着鸡肉面条汤，时不时抬头看看电视，或者接个电话，是他的弟弟罗伯特从通信中心打过来的。他的大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不管是小幅取胜还是压倒性胜利，他都没松懈过，其间他只流露过一次情绪。

“这意味着什么？”他的一个妹妹问道。

“这意味着，”他平静但苦涩地说，“我们要重头来过。我们要在每个初选州重演一遍，拿下每一个初选州——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和俄勒冈州，一直到我们抵达全国党代会。”

他第一时间清晰解读出投票结果。他赢得了56%的普选票，这样的结果不是决定性的。普选失利就无法说服控制东部代表票的大佬们：他是一个赢家。他丢了4个主要是清教徒的选区，万分惊险地拿下了没有宗教倾向的1个选区（第七区），主要优势都来自4个天主教徒为主的选区——第六、第八、第四和第五选区。他曾经说过，总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位，是一个决定战争与和平的职位，但在数据面前，这些话失去了说服力。他知道，无论是谁，看到这些数据，在政治上都会解读为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分裂。他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来避免这一问题，汉弗莱也是，但现在他不得不来一场正面遭遇战了——在西弗吉尼亚州，清教徒占到95%，天主教徒只有5%。他紧绷着脸，没有笑容，明显很受伤，还要准备起身离开，到电视演播室感谢威斯康星州的民众给他带来这场胜利，一场似是而非的胜

利。

如果肯尼迪把6比4的领先视为一场挫败，那么汉弗莱几乎把4比6的失败视为一场胜利了。

汉弗莱预期滑铁卢，也接受了一边倒的专家预言。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这些数据给他带来希望、鼓舞和安慰。尼克松在那天的共和党初选中只拿了个区区第三名——民主党的总体投票规模是共和党的两倍多。在汉弗莱看来，肯尼迪能获胜仅仅是因为共和党的天主教徒跨党派投票。看起来，福克斯河谷（Fox River valley）、格林湾（Green Bay）、希博伊根（Sheboygan）、马尼托瓦克（Maintowoc）和第六、第八选区的共和党天主教徒纷纷跑到民主党初选中投票支持自己人。汉弗莱欢欣鼓舞地坐在恺撒–尼克博克酒店房间里，他的妻子和朋友也在身边。他就像主持庆功会一样，舀起一勺洋葱酱浇在薯条上，招呼客人享用他的胜利果实。

汉弗莱从朴素的庆祝场景里回过神来，面对电视镜头简短地回应。他兴高采烈地对记者们说："你们可以援引我的话说，我倍受鼓舞和振奋，抱歉，一切已经结束。"他说了几分钟略带嘲弄的话，就说他第二天要直接回到华盛顿，然后再去西弗吉尼亚州。

"我想试试能不能搭杰克的顺风飞机，"他笑道，"不过他觉得我应该去赶下一趟巴士。你们何不一起来？我们那儿有减价爆米花卖。"

然后，在奔向他的妻子和庆功会之前，他转过身，对预言失败的新闻记者们微笑。"我总跟你们说，政治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他说。

现在回想起来，约翰·F·肯尼迪最后能获得提名，首先当然得益于他自己的英明决定，但其实休伯特·汉弗莱那晚在密尔沃基的决定也起了不少作用。

因为在与"连锁店"肯尼迪团队对决的战场上，汉弗莱赢了10个选区里的4个，这出乎所有人意料。在汉弗莱眼里，这就是精神上的胜利。

但是全国层面上的关键人物只会从另一个方向来做政治上的解读。如果汉弗莱不能拿下威斯康星州，一个在文化和社会形态上如此接近的邻州，他在中西部将会颗粒无收。因此，在严肃政治定义里，他连大本营都能丢，自然就被除名了。

如果汉弗莱能意识到这一点，在那一刻退选，那么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初选中将不会遇到任何阻力，那么肯尼迪的任何胜利都不能证明什么，

在与东部政治大佬面谈时就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现实点儿来看，汉弗莱就算赢了西弗吉尼亚州，他自己还是一无所获。威斯康星州一役后，他已经不是提名的有力竞争者。如果他拿下西弗吉尼亚州，最多只能制造全国党代会的僵局，而这正是约翰逊团队、赛明顿团队和史蒂文森团队翘首以盼的。

这是汉弗莱独自做出的决定——在密尔沃基的恺撒–尼克博克酒店里，黎明尚未到来，初选夜热情未退，汉弗莱突然凭直觉拍板。也许再过几天，一番沉思会让他有不同的想法。如果汉弗莱真的想伤及约翰·F·肯尼迪，他就应该在那天晚上决定退选，这才会起到作用。

接下来的几天里，很多人试图动摇休伯特·汉弗莱的决定。有来自东部的施压，替纽约工会领袖和纽约自由党（Liberal Party）发声的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e）不能袖手旁观。有来自沃尔特·鲁瑟的施压，他看到两个自由派的参选人即将在西弗吉尼亚州自相残杀，令全代会陷入僵局，很可能令林登·约翰逊从中渔利。甚至遥远的加州也有撼动，加州州长帕特·布朗决定给奥维尔·弗里曼打电话，请他说服休伯特·汉弗莱退选。连汉弗莱阵营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敏锐的吉姆·罗看出一些端倪，敦促汉弗莱趁自己处在巅峰时期，去和威斯康星州的真正赢家谈判。

但是，汉弗莱的战斗怒火被烧了起来。威斯康星州以外的选票分布让他相信，他只是表面上败给肯尼迪，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共和党的天主教徒跑到民主党初选中投票。他想要来一场只有民主党人投票的初选。他已经从全国各地的朋友那里募集到一大笔钱，他欠他们一场真正的战斗。他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史蒂文森的人，利用他制造全国党代会的僵局，来对抗肯尼迪，这样一来史蒂文森就有可能拿下提名——但是汉弗莱还是觉得自己身负战斗的使命。另外，还有一些未受肯尼迪委托却以他的名义给汉弗莱施压的人，他们卑鄙的行为堪比敲诈勒索。汉弗莱以果敢之姿予以回击。对于这样的压力，汉弗莱选择奋力一搏。

所以他将入局，他拒绝退选。

肯尼迪团队的领导层一直在观察汉弗莱，他们也误读了当时的形势。回想起来，他们应该意识到，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这样一个清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州打选战，是他们胜利的有力注脚，说明他们的吸引力是全国范围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愤怒的。他们刚在威斯康星州打完一场干净有节操的选战，现在汉弗莱拒绝接受结果，还准备在西弗吉尼亚挫败他们——不，在他们看来，汉弗莱没有任何希望在全代会获得提名，充其量只是一个心理阴暗的第三方，无视初选战斗热情，挟私报复，不想让约翰·F·肯尼迪获得提名。

汉弗莱是怎么看自己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胜算，此处按下不表。至少在肯尼迪眼中，汉弗莱就是来搅局的。肯尼迪阵营的战斗热情也被燃起了。他们在威斯康星州遵守当地的规则，也会在西弗吉尼亚州遵守当地的规则。而且他们想要赢。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政治模式很少由地理决定，联邦各州不是简单地按照地域远近把自己归入某个政治家族，更多的是依照过去的历史来划分。

在地域上，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和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距离只有640英里，但几个世纪的岁月和传统、迥然不同的文化，却让这两个州相去甚远。如果要选出一些最正派和值得尊重的州组成一个令人自豪的组合，人们一定会把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分到一组。如果要选出一些政治最肮脏、腐败和卑劣的州（有着巴洛克式政府大楼的南部州除外），人们会把西弗吉尼亚州列入美国朱克斯政治家族[注]，印第安纳州、马萨诸塞州和得克萨斯州都属于这个家族。

西弗吉尼亚州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面山坡的一处凸起，占地24 282平方英里（面积在美国各州排名第41），居住着185万人（过去10年，美国有3个州的人口减少，西弗吉尼亚是其中之一）。几个世纪以前，坚毅的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先驱从潮间地出发，翻过阿巴拉契亚山顶，进入这片丘陵地带，在山坡上定居，就像在一个半圆形的露天竞技场安家落户，西望俄亥俄河与中部地带的广袤平原。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有一片稀有的棒球场那么大的平原。他们在山上打猎，在山谷种地，内战时期从实行奴隶制的弗吉尼亚州脱离，成为自由州（他们的格言是“山地人总是自由的”）。内战后，西进移民潮兴起，欧洲各种族后裔绕过他们的丘陵地带，抵达更远处富饶肥沃的平原州。

他们的说话方式还保留着殖民地时期的谦恭有礼。他们知道自己很可能坐拥世界已知储量最大的煤层。在煤炭的助力下，美国工业在19世纪成长起来，西弗吉尼亚州成为世界含煤省份里的“世界惊奇”。（山下埋藏的煤层如此复杂多样，按照标准地质估算，西弗吉尼亚煤层在地下绵延的区域是整个州地表面积的1.5倍。）西弗吉尼亚州一年产煤1亿吨到1.73亿吨之间，有些年份比整个德国的产煤量还要多。但是煤只让少数人富起来，煤虽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基础产业（雇用了11.6万人，10年前占全州非农就业人数的1/5），但这个行业低薪又辛苦，充斥着暴力和工会斗争。

过去30年，煤塑造了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开始（他让约翰·L·路易斯组织矿工对抗美国工业独有的行业暴行），西弗吉尼

亚州成为一个民主党州；矿工工会（Mine Workers Union）成为政治中的一股力量，可与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或纽约的制衣工人联合会比肩。

大约15年前，煤业开始死亡，西弗吉尼亚州也跟着式微了。科技也是杀死煤业的一把刀；因为煤气和燃油成为美国能源的主要来源，煤在美国能源供给中的占比从51%（1945年）滑落到23%（1960年）。美国产业和铁路不再需要煤做能源——煤气、水力发电、燃油是更高效的能源资源。只有钢铁需要烟煤来焦化，还有发电产业仍在支撑着受损的煤业。

工会高薪是杀死煤业就业的另一把刀——工会把工资不断推高，经营者利用战后精密的新机器实现自动化操作，这样不仅成本更低，也是势在必行。渐渐地，这些经营者迫于压力，解雇了矿工，矿工朝不保夕。1960年，西弗吉尼亚州仍然产出1.19亿吨煤——但是矿工数从13年前的116 421（那时年产1.73亿吨煤）减少到可怜的42 900人。新的化工产业利用西弗吉尼亚州的煤气、煤和清洁水在卡诺瓦（Kanawha）和俄亥俄河谷成长起来。新的自动化企业靠工程技术实现生产，只需要很少的人，这就是这个行业的成功秘诀。1960年，在西弗吉尼亚州的55个县当中，不少于20个县有15%的民众靠联邦政府救济金生活。像明戈（Mingo，41%）或麦克道威（McDowell，26%）这样的县，1/4及以上的人口需要并接受可怜的政府食品救济。

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正是从这种饥饿中逐渐成形，充斥着欲望。当人们失业了，任何工作看起来都很好，西弗吉尼亚州的很多县政府就成了工作的首要来源。依照久远的传统，县治安官办公室仍然采用酬金制，一些县治安官的岗位薪酬估计1年3万美元，一些县估税员的岗位薪酬更多，一年高达7万美元。当地学校董事会的岗位竞争残酷，全州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争抢。“见鬼了。”一位当地政客回答我，“课程？他们根本不关心课程，他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不认识‘课程’这个词。学校董事会意味着工作——教师的工作、门卫的工作、巴士司机的工作。他们会在5分钟通过课程，然后花两个小时争论让谁当皮堡特1号线的巴士司机。巴士司机是一份兼职工作，1个月收入有160美元。”

在西弗吉尼亚州，政治不仅是兼职工作，也是全职，而且从州议会到县政府，越往下走，这种情况越严重。到县一级，政治大佬地位稳固，是小王国的领主，在结盟和破裂中分分合合。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涉及金钱——热钱、台底交易、自由交易。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可能是暴力的［哈特菲尔德家族（Hatfields）与肯塔基的麦考伊家族（McCoys）因为西弗吉尼

亚州洛根县（Logan County）结下了宿怨]。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也是复杂的。选举日，西弗吉尼亚州的选民可能要面对美国最繁复的选票，上面列出一堆名字，看起来好像每个人的表兄弟和叔叔都在竞选公职。1960年，《查尔斯顿公报》（*Charleston Gazette*）在5月9日星期一的报纸上登出选票样本，以迎接第二天的初选，结果用去整整3页标准版面，才算再现了卡诺瓦县分部的选票。如果一个查尔斯顿人想要认真投票的话，他就要从一张超大选票上的53个参选人中做出选择。这样一张让人迷茫的选票需要简化，简化的方法就是提供一份“内定名单”。当地的政治大佬、工会领袖、遍及全州的参选人、教育委员会候选人甚至退伍军人组织，都结成跨界联盟，在堆积如山的名字里决定他们认可的参选人，并印刷出一份“内参”。他们的追随者和忠实拥趸会把印刷的“内参”带到票站，作为投票指引。显然，如果没有这份“内参”，一个平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在票站不花上5分钟以上的时间，是无法应付一张西弗吉尼亚州的选票的。太多的参选人挤在一张西弗吉尼亚州选票上，生生把理性选择扭曲成非理性。至此，一份印刷版“名单”至关重要，自然就会有大笔金钱挥霍在这样一份“内参”上，不过这是合法的。

凭良心说，在这样一幅政治的饥渴图景里，有一条信息被我们忽略了：他们是一群英俊的人，而且毋庸置疑，是全美最有教养和彬彬有礼的人。他们教自己的孩子对长者说“先生”和“谢谢”，他们说话柔声细语，而且在黑人比重高的州当中，无论南北，他们和黑人的关系是最好的。黑人得到尊重和礼遇，也回报以礼貌和尊重。不管是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巴士上，还是在拥挤的西弗吉尼亚州商店，无论男女都很有教养且友好。他们还很勇敢——在这个国家，没有哪个州的参军比例超过这个山地州，也没有哪个州的伤亡占人口比重超过这个州。可是他们却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这简直是美国生活的一道伤疤和耻辱，控诉着美国政治体系和他们自己州的政治体系。

在这些好人身上，有两个明显的事实：他们是白人，他们是清教徒。西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大约占人口4%，天主教徒占5%，余下的几乎都是拓荒者的后代。当年拓荒者揣着步枪和《圣经》翻山越岭，至今他们的信仰仍然保存得浓烈而纯粹，一如他们的私酒。这两名参选人准备在西弗吉尼亚州打选战。在大众关注焦点里，西弗吉尼亚州的贫穷只能屈居第二，西弗吉尼亚人的宗教信仰才是美国政治的头号热点。

西弗吉尼亚州很早就被约翰·F·肯尼迪盯上了，可能比美国任何州都要早，仅次于他的家乡州。两年前寻求连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时候，他就雇了路易斯·哈里斯第一次在家乡州之外做了民意调查——就是在西弗吉尼亚

州，那是1958年6月。（当时民调的结果显示肯尼迪的支持率52%，尼克松38%，余下的未做决定。）

一个影子组织于1959年年初在西弗吉尼亚州成立，当地负责人是罗伯特·麦克多诺（Robert McDonough），他是克拉克县（Clark County）的一个印刷厂主，纤瘦，沉默寡言，但想象力丰富，刚刚踏入西弗吉尼亚州怪异的政坛。而华盛顿方面最初的策略分析师和掌舵人是特德·索伦森。整个1959年，肯尼迪的人拉网式地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织就了一个组织，名叫“支持肯尼迪的西弗吉尼亚人”（West Virginians for Kennedy）。这个组织蓄势待发，一旦需要就披挂上阵。1959年12月，路易斯·哈里斯再次对西弗吉尼亚州做了民调——这次肯尼迪和汉弗莱的支持率分别是70%和30%。那时候肯尼迪还是没有决定在西弗吉尼亚州启动选战。一个小州，初选结果也不能约束实际当选的党代表，除非有一定的条件，不然绝不值得大家在这里费九牛二虎之力启动一场选战。那条件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正如肯尼迪早期计划书中的一份文件所说：“布下陷阱，引诱汉弗莱入局。”1960年2月，汉弗莱果真“入瓮”，在查尔斯顿提交了初选竞选报告，肯尼迪欣然跟随，准备收网。

但是到了1960年4月，威斯康星州初选后，已经说不清是汉弗莱掉入了陷阱，还是肯尼迪作茧自缚了。因为在2月和4月之间，美国的政治氛围开始热络，威斯康星州初选吸引了国家媒体和电视网络的目光。这个国家开始意识到，宗教问题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在美国政治中发酵。从西弗吉尼亚州到阿拉斯加州，无论男女，都逐渐知晓了主要参选人的身份和宗教信仰。西弗吉尼亚州的浪潮开始掉头，不利于波士顿的参选人。现在，5月10日，初选投票日三周前，哈里斯在查尔斯顿的抽样调查发现，卡诺瓦县——包括首府查尔斯顿——居民的情绪激烈转向，60%支持汉弗莱，40%支持肯尼迪。当肯尼迪总部询问西弗吉尼亚州的顾问，从12月的70%对30%领先到现在40%对60%落后，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他们被简单告知，“12月时西弗吉尼亚州无人知道你是天主教徒，现在他们知道了”。

在漫长的1960年，有两次挫折似乎严重动摇了肯尼迪获胜的信心。更严重的那次是在8月底，全国党代会之后，他掉入国会特别会议的陷阱，犹如跌入万丈深渊。而第一次正是在威斯康星州初选之后，肯尼迪的人向西弗吉尼亚州进发。他们在威斯康星州过度自信；他们被媒体误导，选票在明晰的宗教界限上自动分化。现在，他们在西弗吉尼亚州面临考验，虽然与他们对垒的人一个也绝无可能在全国党代会胜出，但如果这个人在西弗吉尼亚州胜出，又会把提名决定推入密室。而现在每一份调查都显示，情况对他们自身不利。

和往常一样，肯尼迪团队的解决方案在两个层面展开——战略和组织。二者都值得细究，因为都是美国政治的经典代表。

组织层面的解决方案当然由奥布赖恩负责。劳伦斯·F·奥布赖恩为约翰·F·肯尼迪工作了10年，对新派政治运作得心应手。

旧派与新派采取的政治策略区别就是排外和包容。旧派政治机器刻板僵化，其核心思想就是参与的人越少越好，决策和行动只把控在尽可能少的局内人手中。而新派政治是由公民团体和新机器运作（共和、民主两党皆是），核心思想就是给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感：燃起参与者的热情，让他们感觉领袖的胜利与自己息息相关。

一个魅力四射的参选人想要唤起听众的同理心还是很容易的。更难的是，一旦被唤醒，他们需要感受到参与的价值。例如，1958年，约翰·F·肯尼迪曾经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竞选中散发提名请愿书，有25.6万名海湾州（Bay State）居民签名——有些人很热情，有些人敷衍了事。同时，肯尼迪在波士顿的总部收到1800名志愿者的工作申请，又很难为他们找到有价值又容易上手的工作，一时间不知所措。奥布赖恩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这些志愿者给25.6万名提名请愿书的签名者一一送感谢信。这是一个政客能想到的几近完美的方案：收到感谢信的人很开心，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志愿者都有参与感。在南波士顿的酒吧，至今还有人在津津有味地说起约翰·肯尼迪给他的感谢信，感谢他在1958年为提名请愿书签名。当然，这些都被编入了奥布赖恩的手册——一本64页的黑色封皮书，图解了从开始到结束每一次肯尼迪竞选活动的组织。现在来总结这本册子显得很多余。这本册子之所以沉甸甸的，是因为每一张选票都有价值，每一个公民都希望自己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权力架构中，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需要感受到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权力体系中有用且重要。这本册子用最有效的方式利用了人们最朴素、最崇高的政治冲动。

奥布赖恩在威斯康星州一夜未眠。初选甫一结束，周三，他愁云惨淡地抵达了西弗吉尼亚州。当时距离5月10日的投票日只剩4个星期，他们原先的组织只是为了等待一场轻松的胜利，其配置根本无法应付紧急情况。执行主席鲍勃·麦克多诺（Bob McDonough）只在几个星期前新雇了一名有偿服务的全职员工，高大的马特·里斯（Matt Reese）。里斯和麦克多诺一起为肯尼迪志愿者组织寻访配备了主席。西弗吉尼亚州55个县里，39个县都有肯尼迪志愿者组织。各县主席在两周前得知奥布赖恩需要寻找选区负责人、电话指挥女性选民工作的负责人、初选日集合汽车拉选民去票站的负责人，以及两个待命的副主席，日夜倒班，在教会聚会或工厂大门散发资料，一个工作到黎明，一个工作到黄昏，轮替着来。在39个县里，只有25个县的组织全部或部分完成了指派任务。威斯康星州初选刚结束，威斯康星州人的中欧口音犹在耳畔，奥布赖恩和博比·肯尼迪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西弗吉尼亚州，整合组织架构，应付紧急情况。这是事故补救，他们无须知会对方，心知肚明，如果西弗吉尼亚州失败，将会断送约翰·F·肯尼迪的

提名机会。

上午，北部地区主席会议首先在克拉克斯堡（Clarksburg）的石墙杰克逊酒店（Stonewall Jackson Hotel）召开。接着，下午，南部地区主席会议在相距100英里的查尔斯顿卡诺瓦酒店召开。

工作安排如下：

§组织志愿者挨家挨户散发肯尼迪的资料。

§农村邮递。

§电话造势。（西弗吉尼亚州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一个同线电话制盛行的州打电话造势是有问题的，但奥布赖恩还是坚持这样做。）

§安排招待会。（因为茶话会对西弗吉尼亚州来说太老套了，还是在北边办“烤牛会”，在南边办“烤火腿会”比较好。）

§最后，各县主席获知肯尼迪家族成员（加上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时间安排，哪一天可以参加哪个地区的巡回。

§最重要的是：开始工作。

5天后，威斯康星州初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地区指挥官们已经抵达。肯尼迪的地区指挥官本身也值得研究，因为有很多关于肯尼迪如何花钱砸选举的文章，将来也还会有人写这个话题。关于肯尼迪资金的争议主要围绕实际竞选活动中花的钱（合法且光明正大）和那些无偿为肯尼迪家族提供的服务估值（大得惊人）。因为西弗吉尼亚州的紧急安排，肯尼迪竞选团队成立了8个主要总部，后来又增加了8个支部。但是，这些机构配备的都是志愿者（无党派），而这些志愿者的才能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到底有多少肯尼迪的志愿者为了初选涌入西弗吉尼亚州，至今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单；但即使只有部分名单，也有50个人（汉弗莱的人才库只有不到10个人）。这里面有：肯尼迪在乔特学校（Choate School）的室友莱姆·比林斯（Lem Billings），广告人；肯尼迪的海军战友比尔·巴特尔（Bill Battle），弗吉尼亚某一任州长的儿子；艺术家比尔·沃尔顿（被指派到荒凉贫瘠的麦克道威县）。其他志愿者还包括：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哈佛大学毕业），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Gloucester）前市长，无党派，富有；克劳德·胡顿（Claude Hooton），肯尼迪的哈佛大学同学；查克·斯波尔丁（Chuck Spalding），肯尼迪的哈佛大学同学，无党派，富有；R·萨金特·施赖弗（R. Sargent Shriver，耶鲁大学毕业），肯尼迪的妹夫，无党派，富有；理查德·K·多纳休[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委员

会副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Lowell）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保罗·B·费伊[注]，肯尼迪鱼雷快艇时期的队友。除此之外，还有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的所有员工（除了索伦森–古德温–费尔德曼组成的战略智库），加上女职员、司机、打字员、媒体负责人、私人司机和电视台记者。当肯尼迪因为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开支而受到指责时，这些员工通常会被提及，作为他铺张浪费的佐证。但这些员工里的核心人物都是志愿者，他们不是花钱就能请到的；事实上，他们的价值也不是用金钱加以衡量的[注]。后来，理查德·M·尼克松的朋友、司法部部长威廉·P·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授权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一项调查。在不遗余力的调研之后，他们没有找到肯尼迪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

这8名地区指挥官，加上他们的副手，在威斯康星州初选6天后都齐集西弗吉尼亚州。周一晚上，他们在卡诺瓦酒店见面，准备被派往山地州各区。

第一个指示：检查奥布赖恩手册里描绘的所有政治机器，看看这些机器在当地选定的主席带领下是否正常运作，3天后回电，就自己分管的区域做全面报告。

电话报告一周后，他们需要提交一份书面报告，精确详细地阐述问题、前景和需求。另外一个指示：因为他们都不是西弗吉尼亚人，都来自东部，会受到山地州民众的质疑，不管当地县政府的政治领袖态度友好还是恶劣，他们都必须在当地领袖的安排下打出在各区的第一个电话。他们接到指示，不管做什么，都要预先向当地领袖诚实汇报。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浸礼会基督徒的秘密共谋。肯尼迪当时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Montego Bay）度假，能分配给西弗吉尼亚州的时间不超过10天（他还要同时在内布拉斯加州、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打初选战）。但是只要他一到西弗吉尼亚州，就能唤起民众的热情。各区指挥官的职责就是要好好利用肯尼迪的魅力所带动的人气。

奥布赖恩这样说的时候——疲惫，亲切，仍然平静。

如果是组织能做的，他就会去做。这是他的职业。在西弗吉尼亚州，他所做的一切将会成为初选艺术中的杰作。而组织之外的，就是美国政治原始的部分：朴实的民众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些话，表达他们的情绪、担忧和信任。

令他们困扰的问题显而易见，至少在记者的记忆里非常清楚：

§在西弗吉尼亚州西哈姆林的一个草坪上，学校乐队在演奏，举世无双的郁金香在风中摇曳。一个妇女说："我没有偏见。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和政

治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要当天主教徒，就应该当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相信政教合一，我不信。”

§西弗吉尼亚州萨顿（标语上写着“美味金苹果之乡”），一个小老太太在雨中撑着打湿的雨伞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的总统，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的人创建了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想让一个天主教徒当总统，他们会写进宪法里的。”

§一个魁梧的男人，大颚骨，相貌不错，跛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受伤后跛脚）说：“我是路德教会的——你知道我们的感受。自从我们在1919年下船后再也没有去过纽约，我听说纽约已经变了。”

§西弗吉尼亚州普特南县政府前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很生气，因为有人在人群外围吵闹。他说：“那个傻瓜在吹嘘什么？我是一个浸礼会基督徒，但是我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

显而易见，问题就是宗教，远远超出奥布赖恩组织天才的范围：在这个西部文明的飞地，人们敬奉基督的方式不同。

所有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肯尼迪的谋士已经精心制定了几条攻击汉弗莱的辅线。他们开始不断强调约翰·F·肯尼迪的战争功绩，因为在西弗吉尼亚州这样一个英雄和志愿军之州，1942年秋天，这个波士顿参选人在所罗门群岛海峡的十足勇气，在每一座山都引起了军事上的共鸣。（“听听他们的话，”一个愤怒的汉弗莱手下说，“你还以为那场仗是靠杰克一个人赢下来的。”）肯尼迪的人继续抨击汉弗莱，说史蒂文森–赛明顿–约翰逊支持者不愿意公开打选战，就结成统一战线，把汉弗莱当他们的挂名前锋。他们强调肯尼迪对饥饿和失业人士的同情和关切。汉弗莱儿提时代就尝过饥饿的滋味，自然是能代表工人阶层的参选人——但是肯尼迪看到西弗吉尼亚州的苦难时，还是头一次受到这样的，掺杂着发现新大陆的情绪。肯尼迪从童年到成人，从未知晓饥饿是什么。现在，在奢华的蒙特哥湾短暂享受阳光后，他抵达了西弗吉尼亚州，很难相信还有人不得不靠罐头装的救济配给品生活，他说这就像是另一个文明的产物。“想象一下，”他在一个晚上对一名助手说，“居然还有孩子从来没有喝过牛奶。”在党大会前的选战中，在肯尼迪所有的情感体验中，目击到这片矿场的悲惨可能是对他改变最大的冲击，当他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时，可以感觉到他赢得了人心。

但是，宗教问题仍在。随着投票日临近，肯尼迪的人就解决宗教问题的紧迫性产生了分歧。西弗吉尼亚州本地的顾问说，西弗吉尼亚州害怕天主教徒，这种恐惧必须消除，这个问题必须正面解决。路易斯·哈里斯有民调报告在手，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大多数华盛顿的员工不同意，他们认为不能公开谈论宗教问题，他们说，宗教问题就是个地雷。

决定权交到了肯尼迪自己的手中。从4月25日开始，他的决定逐渐清晰。他决定出击，他会迎头直击宗教问题。

不管是出于信念还是战略，这是肯尼迪最正确的决定。两名民主党参选人都在诉诸民主党的共性；一旦宗教问题变成包容或偏狭的问题，休伯特·汉弗莱就悬了。没人能通过投票给汉弗莱证明自己的良心，证明自己是包容的。但是任何人，即使内心对选谁当总统犹豫不决，至少可以通过投票给杰克·肯尼迪证明自己是包容的。

这个形式上的问题决定了汉弗莱这样最包容的人，却无法让包容成为自己竞选的利器。只有肯尼迪能在这点上做文章，还能以高品位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取胜。如果他们拿宗教问题刁难肯尼迪，他就会讨论宗教。他巧妙精湛地利用电视，谈论了宗教。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他做的一次电视演讲，那是我听过的最出色的一次政治参选人电视演讲。据我所知，高效的肯尼迪组织犯下了一个错误，是极少次失误中的一次，因为听过那次演讲的人，谁都没有见过文字记录，没有录音，没有录影带。那次演讲是在5月8日，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肯尼迪面向西弗吉尼亚州群众做了一次演讲。我现在所写的全靠记忆和零碎的笔记。

在西弗吉尼亚州投票日前的那个周末，肯尼迪还飞到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也有一场初选，而且和西弗吉尼亚州同日举行。他已经连续10天昼夜不停地直击宗教问题（“我无法相信，我在受洗的那天就被剥夺了成为总统的权利”）。在内布拉斯加州，特德·索伦森的家乡州，肯尼迪请这个最亲密的助手写下清教徒对天主教徒最担忧的四五个问题。索伦森思考了一夜，想出了问题。第二天，也就是周日的晚上，在西弗吉尼亚州，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被叫来提问。在付费的电视直播中，罗斯福问了肯尼迪宗教的问题。

小罗斯福在电视节目开始三四分钟后插入了宗教问题。据我的记忆，肯尼迪用了半小时节目的10到12分钟回答。虽然后来宗教问题变得没有杀伤力了，但当下肯尼迪谈这个话题还是需要勇气的。他回顾了宗教和政治相互博弈的漫长历史，以及所有宪法决定中最伟大的一个：政教分离。然后，他凝视摄像机，直接与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众对话。在我的记忆中，他是这样说的：

> ……所以，当一个人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总统，他是在宣誓支持政教分离；他在宣誓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圣经》上，举起另一只手向上帝致敬。如果他违背誓言，他不仅是犯下了有违宪法的罪

行，国会可以因此弹劾他——也应该弹劾他——也是对上帝犯下了罪行。

说到这里，肯尼迪从想象中的《圣经》上举起了手，似乎是要把手举向上帝，柔声重复道："对上帝犯下的罪行，因为他已经摸着《圣经》发誓了。"

汉弗莱面对这个问题很无力。肯尼迪团队还在残忍地加压。

在每一个山谷、山丘和城市，肯尼迪的运作团队培植了县政府的政治领袖。他们在威斯康星州遵守了当地的规则，打了一场正当的胜仗；他们也会遵守西弗吉尼亚州的规则，然后赢下这个州。在奥布赖恩的鞭策之下，志愿者数量不断翻倍。到了初选日前，奥布赖恩估计他们有9000名志愿者会在初选日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工作。

报纸上，肯尼迪的广告拼命宣扬这位战争英雄的功绩，或是严厉指责汉弗莱是一个傀儡，受那些不敢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选露面的人操纵。

在起起伏伏的道路两旁，闪过的都是肯尼迪的名字，他的兄弟姐妹都把时间预留了出来，随时可以演讲或露面。在这个家族的名字里，还要加上一个自带光环的名字——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重要的是，这名英俊坦率的参选人一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展示自己，证明一个天主教徒身上没有刺。电视上播放的纪录片开头画面就是一艘鱼雷快艇喷射出白色尾波，划破黑夜，肯尼迪是一个战争英雄；影片接下来呈现的就是这个年轻人手拿一本书，在自己的图书馆获普利策奖，他是一个学者；之后，这个年轻人抱着金色卷发的两岁女儿，女儿坐在他的膝盖上，他给女儿读书，他是一个年轻的父亲；他总是严肃地睁大双眼，带着无法伪装的真诚向世人说明，他将忠于美国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

猛然间，人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哈里斯的民意调查员现在每天都在全州做民调，每周在特定城镇的特定街道反复核查。"你会看到他们的转变，"哈里斯说，"你会碰到一个拉法奇夫人式的女人，全身黑色，她会说：'我不关心汉弗莱，但我就是不想要一个天主教徒的总统。'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就会向病菌一样感染街上的每一个人。我还记得在投票日前的一个星期一，我回到那条街上，那是肯尼迪发表以宗教为主题的电视演讲之后，她接待了我，拉下百叶窗，说她现在会投票给肯尼迪。'西弗吉尼亚州问题已经够多了，不想再被人叫作宗教偏执狂。'"

卡诺瓦县是西弗吉尼亚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州首府查尔斯顿所在地。威斯康星州初选后在那里做的第一次民调显示，汉弗莱的支持率是64%，肯尼

迪是36%。初选两周前，汉弗莱的优势跌到55比45；汉弗莱和肯尼迪电视辩论后的那天，汉弗莱的优势跌到52比48；初选前的那个星期六，哈里斯的抽样调查显示汉弗莱以45比42领先，其余未定；在最后一次以宗教为主题的周末电视演讲后，两人的支持率对比变成了肯尼迪小幅领先。（在初选日当天，卡诺瓦县的民调显示肯尼迪以52比48领先。）

这次竞选的演变激怒了汉弗莱。一旦问题定调为包容对偏狭，西弗吉尼亚人只有一种方法证明自己的包容——投票给肯尼迪。事态的发展已经把这个问题变成一堵墙。汉弗莱背对这堵墙，从精神和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都没有好的回击方式，只能退守到资金的问题上。（“政治分三种，”他会说，“大企业的政治，大佬的政治，还有大笔钱的政治，我反对这三种政治。我支持人民的政治。”）

事实上，人们可能会为汉弗莱感到难过。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全力以赴，在哥伦比亚特区为了毫无意义的初选而努力，这些都已令他身心疲惫。他还要不断疲于奔命（乘坐商业航班，拖着自己的行李进出舱门），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筹款继续选战，另一半时间都乘着他孤独的巴士做巡回演说（巴士上的标语写着“和汉弗莱共度时艰”）。汉弗莱远离家乡，没有资金，正在一场格斗赛中被迎头痛击，就算赢了，也收获甚微，如果输了，他在1960年竞选中硕果仅存的影响力也将烟消云散。

为了威斯康星州的选战，汉弗莱已经负债累累（进入西弗吉尼亚州的时候，他还有1.7万美元的债务未偿还），他已经耗尽能为新选战筹款的每一份资源和友谊。他在华盛顿为那些老工会领袖尽心竭力战斗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被他们放弃了；他们想让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初选后退出；他们不会在这里给他任何帮助。还有一些不愿意主动放弃汉弗莱的，也遭到肯尼迪组织的阻击。高效的肯尼迪组织知道这些力量会影响自己的命运，就主动出击，截断他们给汉弗莱的支持。在纽约，原本很多史蒂文森的资金都进了汉弗莱的资金池，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根据肯尼迪的指示，警告所有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如果他们继续给竞选无望的休伯特·汉弗莱提供资金，阿德莱·史蒂文森将不在国务卿的考虑之列。必要时，肯尼迪的助手会更加粗暴。在康涅狄格州，政治领袖约翰·贝利告诉康涅狄格州前参议员、大英百科全书的发行人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如果他继续资助汉弗莱（本顿曾经在春季给汉弗莱提供了5000美元），只要他贝利在康涅狄格州的政坛还有发言权，本顿就不可能在康涅狄格州获得任何选举或任命的职位——这就等于在豆蔻州(注)下达了永久政治驱逐令。

汉弗莱因为缺钱几乎窒息（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开支一共只有2.5万美元——以美国政治规模来说，寥寥无几），他知道自己深陷债务，也知道肯尼迪最后发力所动用的资源，其性质和深度都不容小觑。随着最后的

周末临近，汉弗莱变成了一个引人怜悯的人物。他需要广告，需要员工，最重要的，他需要电视在整个州展示自己。

我记得那个最后的星期六早上，稍早前披露的消息显示，肯尼迪单单一个州的电视开支就达到3.4万美元。汉弗莱只睡了4个小时，7点起床，准备乘他的巴士，在那个下雨的早上，从北边的查尔斯顿开始做巡回演说。那时候，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预定他周日晚间做半小时节目的电视台威胁说，如果他们当天不能预付现金，就要取消节目。

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我看到这位和善的男人失控发怒。

“付给他！”汉弗莱咆哮道，“付给他！我不关心怎么付，不要拿这种事来跟我说！”然后，他意识到这个垂头丧气的助手和他一样，也很穷困，汉弗莱掏出自己的支票簿放在早餐桌上，说“好，我自己付”，然后草草写下了一张个人支票。

汉弗莱夫人注视着他的动作，眼神黯淡而悲伤，让人感觉这张支票的钱就像是从家庭日常用款里拿出来的——或者这些钱是留待初选后那一周给女儿操办婚礼的。

我的记忆告诉我，那张支票是750美元——对于一个全州联播的半小时节目，这不算多。但是这张支票只能买下时间，却买不来产出，买不来妥善的准备工作，买不到关注度。电视节目想要操纵公众舆论，必须有关注度。

当一个人靠一笔家庭日常用款清冷地出现在政论电视节目上，会是什么样？选举前的那一天，汉弗莱向西弗吉尼亚州选民发出的最后呼喊，正好荒诞地呈现出这一幕。不知道他从哪里又筹集了750美元，用来购买另外半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现在（就像理查德·尼克松那年晚些时候所做的）他准备把这笔钱省下来，用于马拉松式电视广播节目。马拉松式电视广播节目就是一个把戏，参选人理论上开放接受所有打进广播站的选民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好的马拉松式电视广播节目需要一名好的员工来筛选问题，并有技巧地排序，让人以为一切都是即兴发挥，实际上问题已经给参选人看过，他可以巧妙地理清思路。这是现代政治伎俩中最虚伪、最令人生厌的方式。

当一场马拉松式电视广播节目变成真的会怎样？汉弗莱周一用他可怜的750美元给出了答案。当一切都是真实的，未经筛选的问题摆到参选人面前，效果是滑稽的。除此之外，看着休伯特·汉弗莱拿出家庭日常用款打全国竞选的最后一仗，呈现的效果，悲哀胜过滑稽。

马拉松式电视广播开始了。汉弗莱独自坐在桌子前，他面前有一台人工电话，电话上有两条线的切换按钮。提问者打电话进来的时候，他可以交替按下去。观众可以在电视上听到未经筛选的问题和答案。

第一个是常规问题："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当总统，汉弗莱参议员？"接着是第二个问题："你会被提名吗，汉弗莱先生？"

然后，电话里传来刺耳的嗓音，可以听见一个老妇人在山上很高的地方絮絮叨叨。汉弗莱有些畏缩。那个刺耳的声音说道："滚出去！你滚出西弗吉尼亚，汉弗莱先生！"汉弗莱慌乱地试图回答，但是声音被盖过："滚出去，听见没！你不能忍受共和党人超过你！那你为什么不滚出去？"

下一个电话进来时，汉弗莱还没从冲击中缓过神。这个问题是："喜欢打猎的人需要轻武器，他会对轻武器许可做什么？他会对社会保障做什么？"没有一个问题和汉弗莱竞选活动的目标有交集。然后，一个甜美的女声开始慢吞吞地说："那些被忽视的贫困孩子怎么办？汉弗莱先生，我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像你说的那样减税，照顾所有的贫困孩子？他们需要更多的学校和医院，什么都需要配置更多……"她不停地说着，声音甜美，汉弗莱（他的宝贵、昂贵的时间正在嘀嗒嘀嗒地流淌）试图插话，他也关心那些被忽视的贫困孩子。

至此，马拉松式电视广播节目正在变成家务事。下一个声音是好听的山区嗓音，随和，缓慢，温柔，带着西弗吉尼亚的彬彬有礼，说道："汉弗莱参议员，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想替刚刚让你滚的女士道歉。我们西弗吉尼亚人并不那样想，汉弗莱参议员，我很抱歉她刚刚说那样的话……"他还想继续说个没完，但是汉弗莱几近崩溃，简短感谢了他，按下了另一个按钮。

他还几乎没有开始回答问题，一个清脆快速的声音打断了来电的合用线："清理线路，马上清理线路，这是一个紧急情况。"接线员不断重复，合用线路在某个不知名的西弗吉尼亚州山头卡住，可能有人正在试图打电话叫医生，而汉弗莱面无表情，眼神迷茫，挂断电话，颤抖着，按下另一通电话的按钮（一个粗哑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口音，问他和肯尼迪会为矿场经营者做些什么，他们到目前一直在谈论矿工，而不是经营者）。从那一刻起，这场电视广播支离破碎了——除了证明电视不是适合穷人的媒介，别无其他。

西弗吉尼亚州在5月10日投票，那是一个潮湿、飘着小雨的日子。8点前，票站关闭。还有一些地方选举同时在进行，候选人有100多个，所有这些

都比总统初选投票更重要，因为这关乎工作，所以点票很慢。但是，快到9点的时候，第一条速报来了：哈迪县奥德菲尔德选区（Old Field Precinct，Hardy County），东部一个狭长选区，已知只有25名天主教徒选民，计票结果是：肯尼迪，96票；汉弗莱，36票。

计票缓慢进行。到9点20分，全州2750个选区的10个选区已经报上结果，首个微弱的趋势开始清晰：肯尼迪，638票；汉弗莱，473票——60比40。不过，这些都是西弗吉尼亚州北部的结果，北边是易被感化的文明区域。参选人在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南方采矿区情况如何？到9点40分，计票结果显示：肯尼迪，1566票；汉弗莱，834票。汉弗莱总部有人喃喃低语："我们完了。"

到了10点，席卷之势不再是零星的，而是全州的。在南边的洛根县，肯尼迪超越了本地的政治领袖；在麦克道威县，他的成绩好过60比40。山上的弹丸之地、山坡上的选区、工业城镇、查尔斯顿、帕克斯堡（Parkersburg）、惠灵（Wheeling）、郊区、白人区、黑人区——肯尼迪的浪潮不断推进，势头强劲，不可阻挡，横扫清教徒之州。这样的胜利让全国的每一个政客来见证。

现在只剩两场仪式了，汉弗莱竞选之路的葬礼和肯尼迪的庆功会。

消灭一个总统参选人不是易事。休伯特·汉弗莱在晚上10点之前已经决定认输。过了两个半小时，他从下榻的拉夫纳酒店（Ruffner Hotel）打电话给自己在全国的支持者和捐赠者（明尼苏达州、华盛顿、纽约），宣告一切结束了。凌晨1点，西联邮递员带着汉弗莱认输的电报抵达肯尼迪总部；1点15分，博比·肯尼迪穿过查尔斯顿落雨的街道，代表身在华盛顿的哥哥优雅地拜访了汉弗莱下榻的酒店。汉弗莱同样礼数有加地宣布他会去拜访肯尼迪总部，向肯尼迪致意，肯尼迪会连夜飞到查尔斯顿宣布获胜。两人一起走到雨中，转过街角，沿着国会大街朝设在卡诺瓦酒店的肯尼迪总部走去。

在国会大街上，汉弗莱停下来，走进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主要（实际上是唯一的）总部。少数不肯服输的人还留在咖啡纸杯和烟头堆里，空洞地盯着孤零零的通告板，上面列出了总计票数。在整个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头和山谷，一直有一个民谣歌手陪伴着汉弗莱，唱着大萧条时期的老歌，对往日的新政[注]有着狂热的执念。现在，这位民谣歌手吉米·沃福德（Jimmy Wofford）走出来，最后一次拨起吉他的琴弦。"投票给休伯特·汉弗莱，"他唱道，"他属于你，也属于我。"

明亮的灯光下，汉弗莱的眼中闪着泪光。电视台在这里布置好灯光，准备捕捉认输的一刻。他酝酿了一会儿，才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我要做一个简短声明。”他说。他读着声明：“我不再是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参选人。”

吉米·沃福德弹起最后一支小夜曲。“投票给休伯特·汉弗莱，他属于你，也属于我——”

但他再也无法继续。他把头靠在吉他上哭泣。

汉弗莱参议员转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哦，吉米。”他说。

博比·肯尼迪和大家一样湿润了眼眶，走过来抱住参议员。然后，他们再次走进雨中，一前一后进了卡诺瓦酒店，肯尼迪将很快抵达这里。这是一场选战的落幕，长达一年的计划和希望的落空。山区的人们，从美国总统参选人的7人名单上划去了第一个名字。早上，汉弗莱醒来，总统梦化为泡影。他停在拉夫纳酒店外一整夜的巴士被贴上了违规停车的罚单。

肯尼迪在初选日情绪低落，满腔忧愁，尽管最后一刻奋起直追，他还是觉得在西弗吉尼亚州没有赢的希望，所以他选择在那个晚上避开公众、媒体和西弗吉尼亚州的选民。如果他将被打败，他希望能在私下里而不是在全世界的监督下接受失败。他在初选日的早上就飞到华盛顿，在一个妇女团体的午餐会上发表了演讲，回到他在乔治城的家，邀请了两个朋友与他们夫妇共进晚餐。这两个朋友带来一瓶香槟，肯尼迪说：“嗯，今天晚上，两种方式，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打开这瓶酒。”

当所有的政治老手、操作人员和预言家都在担心他的反应和行踪时，他却泰然自若。肯尼迪非常冷静，邀请了两个朋友和他一起溜出去看电影。投票结果出来得很晚，他们也可以趁机放松一下。他们直到十一点半才看完电影回来，发现楼梯扶手上有仆人留下的便条，让他立刻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打电话。当他和卡诺瓦酒店的弟弟博比通电话时，肯尼迪的脸上咧开笑容，然后，他放下电话，发出一声很不符合参议员身份的战争呐喊。香槟酒的软木塞嘣的一声打开，客人喝醉了，肯尼迪小酌几口，放下酒杯，准备出发前往西弗吉尼亚州。他召集了机组人员，上楼换装，打电话给马萨诸塞州的父亲，再给查尔斯顿打了个电话，确认选情不会逆转，然后就驱车前往机场；登机后，他叫了最喜欢的饮品——一碗热番茄汤——开始享受这个夜晚。

到了凌晨3点，他已经进入查尔斯顿，在电视上感谢西弗吉尼亚州，见了休伯特·汉弗莱，还握了手（“很感谢你过来，休伯特”），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我想，”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彻底埋葬了宗教问题。”），然后

他将再次离开。在卡诺瓦酒店大堂，一大群人紧紧围着他，他艰难地从人缝里挤到门口，进入雨中。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杰克？”一名记者问道。

“我今天晚上要钻研马里兰州的问题，”肯尼迪说，“我明天在那里参加竞选活动——周五是初选日。”

---

1. 从技术上来说，3月8日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是1960年大选打响的地方。前几年，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塔夫脱的对阵、1956年基福弗和史蒂文森的对阵中，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政治上来看，新罕布什尔州都是战争打响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会战开始的地方。但是1960年不同，肯尼迪从马萨诸塞州跨州界渗透过来的力量使得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后院的任何挑战在政治上都变得毫无意义。他以9比1胜出一个来自圆珠笔制造商的成绩可以大肆宣扬，但在政治上毫无意义。

2.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美国政治家，生于威斯康星州，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他曾任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在全美国清理共产党制造的影响，指挥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民主党成员以及他的政敌、对他有意见的新闻人物，不少人被撤职、逮捕甚至被处死。受他迫害的人包括著名影星卓别林、科学家爱因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华裔钱学森等不同阶层的人。后来他在军队中搞忠诚调查，引致艾森豪威尔的不满。1954年，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译者注

3. G·门嫩·威廉斯（G·Mennen Williams），后任肯尼迪政府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译者注

4. 托洛茨基分子，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托洛茨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托洛茨基的政治信条与斯大林主义有所不同，认为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永久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因为对国际主义等原则的坚持而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左翼。——译者注

5. 他最喜欢给高中生讲两个故事，一个关于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General Winfield Scott），另一个关于麦迪逊（Madison）和杰斐逊（Jefferson）。

   他会这样讲述故事：斯科特将军是第一个到全国做巡回政治演说拉票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斯科特将军用的理由是要在全国为退伍军人医院选址。“我来这里不是为医院选址的，”肯尼迪会说，“我是来竞选总统的，我

来这里是因为这是一个关键州的关键初选，你们的投票至关重要。”接着，笑声一片。

他给孩子们讲麦迪逊和杰斐逊的故事时效果一样。1805年，麦迪逊和杰斐逊从北边的弗吉尼亚州开始造势，但是他们宣称是作为自然学家进行考察，他们要沿着哈德孙河寻找蝴蝶。但是，他们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首先结成了弗吉尼亚人与坦慕尼协会的联盟，演变成今天民主党的南方人和大城市政治领袖的联盟。“但我不是来寻找蝴蝶的，”肯尼迪会说，“我是来拉票的。对于重要的总统职位，这是一个关键州的关键初选。总统职位很重要……”

6. 圣帕特里克节在每年的3月17日，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这一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如今已成为爱尔兰的国庆节。随着爱尔兰后裔遍布世界各地，现在，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渐渐在一些国家成为节日。——译者注

7. 多个月后，我听说有人把这次演讲汇报给肯尼迪，提到汉弗莱把肯尼迪和他的组织比作“纳粹”的效率。这比报道中汉弗莱说的其他任何内容要严重多了。这样的类比把肯尼迪妖魔化，也激怒了肯尼迪。因为我当时在场，我知道当时汉弗莱并没有这样说，我很乐意纠正。

8. 1940年主要的种族血统有：拉脱维亚、意大利、冰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英国清教徒、挪威、印第安人、瑞典、丹麦、波兰、芬兰、波希米亚、混合［？］、俄罗斯、爱尔兰、苏格兰、英国、瑞士、德国、比利时、荷兰、威尔士、立陶宛和法国。排名不分先后。

9. 参见第8章，更全面地介绍了在政治中如何对待宗教和种族问题。

10. 本·史密斯（Ben Smith），肯尼迪总统促使他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

11. 伊万·内斯廷根（Ivan Nestingen），后任肯尼迪政府的教育福利部副部长。

12. 朱克斯政治家族（Jukes family），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家族，该家族中的6个成员被投入同一所监狱。一个多世纪以来，朱克斯家族是美国最受鄙视的一个家族。——译者注

13. 哈特菲尔德–麦考伊宿怨，指的是1863—1891年，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边界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械斗。两个家族傍大沙河（Big Sandy River）支流塔格佛克河（Tug Fork）而居。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特菲尔德家族当家的是威廉·安德森·哈特菲尔德（William Anderson Hatfield），肯塔基州的麦考伊家族则以伦道夫·麦考伊（Randolph

McCoy）为首。100多年过去，这一宿怨冲突已经成为美国的民俗学词汇，指代党派群体之间长期积怨的符号，暗喻过度讲求家族荣誉、正义与复仇所带来的危险后果。——译者注

14. 理查德·K·多纳休（Richard K. Donahue），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白宫助理。

15. 保罗·B·费伊（Paul B. Fay），后任肯尼迪政府海军部副部长。

16. 有一个政治技巧需要在这里提一下，当肯尼迪的第一支全员队伍在西弗吉尼亚州成立的时候，同时，比西弗吉尼亚晚三天举行初选的马里兰州也成立了第二支完整队伍，晚7天举行初选的俄勒冈州成立了第三支队伍，第四支初始队伍也开始在印第安纳州组建。

17. 豆蔻州（Nutmeg State），即康涅狄格州，其豆蔻贸易举足轻重。

18. 我当时不在场，所以接下来的故事是从在场的《华盛顿明星报》玛丽·麦格罗里的出色报道中了解的。

第5章

代表大会之前：民主党

当西弗吉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上方透出第一缕晨光时，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农场已夕阳西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政治和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看似相隔千山万水，它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银河般的鸿沟。然而在1960年5月1日的早晨，当休伯特·汉弗莱和约翰·F·肯尼迪起床后，兴奋地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道路漫步时，一位在相同群山中长大的山区男孩儿正随着降落伞穿过云层徐徐降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平坦农场里。他的不幸以一种特别方式将两种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由于这次事件，世界事务和美国选举活动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变得扭曲异化。

西弗吉尼亚时间前天晚上稍晚，正值帕米尔高原晨曦微露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这位在肯塔基山区出生、在弗吉尼亚群山长大的小伙子，驾驶着美国航空工程的奇迹——U–2高空飞机，刚刚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eshawar）起飞。航线飞越苏联边境，直接横跨苏联腹地，预计前往挪威，后遭到苏联战机的拦截，当天下午被击落，成为苏联抓住的美国承认的首位间谍。当华盛顿等待着西弗吉尼亚州的消息时，克里姆林宫的政界正因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消息而瞬间气得浑身发抖呢。

但今天过后，随着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尴尬困境和后续供词的公开，华盛顿及美国政界对U–2灾难及其影响的关注超过了西弗吉尼亚州的选举。由于U–2侦察机的击坠及其后果彻底撕碎了无数美国人的梦幻世界。它们对国家和平与安全的警示，在以后的两个月内，撼动了立志统领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针对国内选举的所有运筹帷幄。

这架孤独的侦察机那天在苏联中部上空被击坠后，其命运与诸多不同的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U–2事件发生时，再过几天就要举行东西方首脑峰会了，双方分别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率领，两人原计划讨论柏林问题。U–2事件为苏联人造成会议破裂提供了绝好借口，于是美苏外交界进行的为期10年的

对话无果而终。

11年前，在1949年5月举行的首届此类会议上，美方和苏方初次会面讨论了柏林封锁问题。他们当时制定的三点议程包括：1. 柏林问题；2.东西方关系问题；3.裁军及和平问题。现在是1960年5月，转眼11年过去了，他们的议程包括：1.柏林问题；2.东西方关系问题；3.裁军问题。“和平”一词在新议程中虽已省略，但11年后，其余内容依旧未变。不过在1949年5月，随着北约装备的不断增强，美方谈判正值马歇尔计划进入第一波高潮以及杜鲁门政府的宏伟计划即将给苏维埃制度带来预期压力之际，美方谈判者在巴黎福煦大街（Avenue Foch）的那座粉色宫殿赢得了一定胜利：和平解除柏林封锁。现在是1960年5月，他们的谈判正值其早期倡议日渐式微和赫鲁晓夫先生18个月以来不断施压之际，显而易见在本次会议上，他们将无功而返。只是赫鲁晓夫利用U–2事件的笨拙技巧和过度渲染，以及事后反而凝聚的联盟支持，才有幸使这次郁闷的新首脑峰会避免演变成终极灾难。

§U–2事件引起关于总统命令的讨论。谁在双方即将举行形势微妙的相关谈判之前不久，下令U–2侦察机飞越苏联上空？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他显然没有，那么在美国的军事和情报官僚链条中，命令是从何发出的？当此类令人费解和危险的命令在缺乏高层政治控制的情况下签发时，美国体系中决策链条退化到何种程度？苏联和美国现在都有氢弹。美苏双方的雷达监测和空防系统在瞬时反应和精密度都达到了装置错误本身就可能导致核战争的程度。在渗透苏联空域这类的关键问题上，谁在行使美国权力？

§U–2事件造成涉及美国荣誉和威信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美国和苏联都需要不间断但又谨慎的情报刺探活动。相关人员可以认真探讨一下，U–2侦察机戏弄苏联的报复触发机制从技术上讲是否为一种正确方法。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发言人在事件之后向世界和国人撒了谎，谎言掺杂着矛盾、含糊和混乱。

所有这些都是极其精细、复杂和微妙的深层次治国之道问题，对于全体美国公众而言是不易理解的。但是立刻暴露出这些问题的事件，对美国人自身及其领导人形象以及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惨痛影响。

自从5月5日赫鲁晓夫先生得意扬扬地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击落U–2飞机，到7月11日民主党洛杉矶召开代表大会，美国政坛踽踽走过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混乱和屈辱时期。在此之前，伟大的约翰·海（John Hay）优雅巧妙的外交策略曾使美国作为世界强国之一拥有独特风采。

5月到6月，发生了如下事件：

§U–2飞机被击坠，美国的发言人被曝撒谎。

§艾森豪威尔总统乘机到巴黎参加首脑峰会，会议很快以失败告终；会议失败后，他被赫鲁晓夫斥为“伪君子”和“骗子”。

§土耳其的骚乱撼动并几乎推翻了与美国亲和的政府。

§韩国学生骚乱升级为暴力，李承晚政府摇摇欲坠。

§随着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权益以及从克里姆林宫取得赫鲁晓夫先生的部署导弹支持，美国与古巴这位大胡子领导人的关系从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永久的完全敌视状态。

§在远东，由于日本舆论强烈反对我们这位爱好和平的总统访日，其最后的亲善之旅以屈辱结束。

§美苏间目前的裁军谈判在曙光乍现之后，最终以破裂无果收场。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迄今一直对非洲日益高涨的不满敷衍了事。随着刚果独立，他们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和野蛮行为的发展可能使整个联合国分崩离析。

对于有思想的美国人而言，所有这些问题像炮弹一样连续冲击着大脑。从全球意义或未来前兆角度看，上述任何个体事件均不会影响他们对下届总统的选择，当选总统处理这类问题时将合理调配美国的力量。但是这些振聋发聩的外部事件，如果汇入美国国内政策的溪流，融入总统候选人的计划、考量、抱负和感情，那么在代表大会后几个月的政坛，将带来剧烈的变化。

两党内部对问题的关注情绪都要爆发了，每个几近蛰伏的候选人在这些外部事件的召唤下都立即苏醒了。

为了解决和控制这种情绪爆发，每个党针对全国的后期竞选活动，准备改变其观点和立场。

首先是民主党。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全球事件宛如遥远的战鼓阵阵响起，初选结束了注，底牌已亮明，政治注意力集中在“761”这个奇妙数字上面。它就是代表们相聚洛杉矶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时，构成代表多数所需的票数。

首先感受到这些国外事件影响的候选人是阿德莱·E·史蒂文森。

过去8年中，阿德莱·史蒂文森已成为民主党派关于对外政策最清晰有力的声音。通过旅行、写作、演讲以及简单的观点渗透，无论形势好坏，他都勾勒出一幅世界全景和美国前进方向，虽然在最初发表时常常遭受攻击，但是逐渐为人们接受，最终成为1960年春季之前人们头脑中耳熟能详的观点。加强联合国、停止核试验、改组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在欧洲与苏联努力达成妥协——所有这些由史蒂文森首先提出的观点，现已成为民主党发言人的共同说辞。

于是，当美国对外政策在1960年5月遭遇滑铁卢并且需要创建一个全新架构体系时，以前中立和冷漠的民主党上上下下突然又开始关注史蒂文森。他在华盛顿未经批准的总部现在电话不断，打电话的人既有州长和议员，也包括志愿者和捐赠者。1952年和1956年选举时，他在全国各地群龙无首的竞选队伍现在也焕发了热情。如果他愿意带头，他们将重新踏上征程。但是，他会带头吗？

早在1960年6月，我曾到其在芝加哥区外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尔市（Libertyville）的家里拜访过史蒂文森州长。我上次是在1955年夏季到他家里拜访——时间已提前约定。那年夏天，他是如此坚定果断。他当时确信，在1956年大选中，任何准备和艾森豪威尔角逐的人必定失败。许多朋友（包括一些颇具实力的杰出共和党人）纷纷联系他，力劝他不要参与1956年的竞争，因为这一年他必将遭遇失败的厄运。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这些朋友向他承诺：如果尼克松选择角逐1960年大选，他们将全力帮助他阻击尼克松。然而，史蒂文森直接拒绝了他们。他曾在1955年说过，当时机对你成熟的时候，党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党代表着某种意义，它是一种力量和对人们的教诲。在需要时，你应履行领导之职，无论是否方便，都应积极宣传它的信条。于是，他参加了1956年选举。

现在是1960年，他与其说是优柔寡断，不如说是不愿意再考虑政治，他要思考更重要的问题。

他坐在农庄的草坪上。这是一座白色乡村住宅，窗缘采用白色装饰。从草坪开始，农场绵延80英亩。放眼望去，美国中部夏季的葱绿美景一览无余，中间只有毗邻的网球场和关着黑脸萨福克羊的尖桩篱笆遮挡了视线。我们坐在一个种满了牡丹和鸢尾花的花坛旁边，花坛掩映在一棵枫树下，即使在清晨，依然挡不住太阳炽热的光线，6月的高温笼罩着整个平原。橘黄色的蝴蝶在草坪上方来回翻飞，枫树的叶子沙沙作响，远处高空飞机偶尔传来的轰鸣声不时打破这里的寂静。史蒂文森躺在一把沙滩椅上，身

穿一条褪色的卡其短裤和橘黄色的运动衫，脚踏一双破旧的蓝色球鞋，眼睛在阳光下眯着。他谈起了他关注的一些问题。

他关注很多方面——比如各种国内问题。“公众贫穷和私人富足的巨大差距，对经济发展未能给予足够重视，集中精力促进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消费。”他说，“如何让人们注意这些问题？其他方面是很容易看到的——多数人的就业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然而人们不容易发现我们的供水系统、教育系统和城市交通等方面的长期问题。这些问题的影响从来不是立刻显现，所以不能引起相关负责人的足够重视……”

但是以上方面还不是其关注的主要问题，他尤其关注对外政策。史蒂文森思维清晰笃定，视野放眼全球，对重要问题始终有独到见解：

> 我们是一个恣意放纵的消费社会，我们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严重践踏。我们不能失去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力量，还有道德标准。我们犯下了严重错误——愚蠢行为接连不断，从蒋介石的“拒绝国际托管”到首脑峰会的破裂。我认为我会见的国家首脑超过任何其他美国人，当你听到他们谈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时，这些人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奇怪和好笑的。
>
> 看看欧洲及其麻烦——我们不能任由欧洲四分五裂，我们不能允许19世纪古老的贸易均等化原则再盛行起来。需要召开一个大西洋会议，不过我要说，6年来尚无证据表明我们在朝那个方向发展，我认为狄隆（Dillon）近来做得很好。为应对大规模的冷战，我们需要整合欧洲资源，否则形势对我们是极端不利的。
>
> 我在史泼尼克危机[注]之后到了华盛顿，撰写了大量材料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Dulles）在北约会议上使用，这些材料从未使用过。我认为我们需要呼吁北约的所有成员国不要优先发展发射火箭和导弹，工作重点应当是协调各方资源帮助新兴国家，这样我们可以让他们名利双收。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各尽所能。它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还离不开奥地利、瑞典和瑞士等国家的资本输出水平和技术能力。针对这项工作，我们需要一个比北约还大的机构，该机构至少应考虑到国防的紧迫性，但他们不能对此凭空想象，不能这样。

我们那天一直交谈着，刚果分裂又回到混乱的野蛮状态仅有几周时间，史蒂文森好像有先见之明，他继续说：

我认为这到了极其迫切的程度。他们一旦实现了独立，这些新兴国家的状况将迅速恶化。为了解决他们的需求，需要我们各显神通并有强烈的紧迫感。只有调动文明世界、日本和意大利的所有资源才能应对紧急情况，我们解决问题不应当以双边形式而是以多边形式。

所以，问题是如何创建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共同体。我们对于欧洲拥有永久承诺。但是，我们不能包办一切。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应当合理配置资源，需要利用我们的海军和核武力量作为他们的强大后盾；但是他们必须为国防承担费用。

他最后谈到了欧洲，像平时一样，话锋转向政策方向问题；他将美国在欧洲防御政策的“线性思维”和劝诱苏联军队从中欧撤出的战略必要性做了对比。他指出我们较为刻板的欧洲盟国（尤其是德国）在尝试制定新政策时可能面临的复杂情况。他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应当从新战略层面思考问题：“我们应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欧。双方可以考虑都撤军，当这一刻到来时，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于是我们需要对此研究。我深知以上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能操之过急。但是，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有方向感。”

我们就政策方向和改变战略不断交流着，后来话题转向了亚洲。

当时在亚洲，由于蒋介石时刻幻想着打回中国大陆，因此我们一直把金门和马祖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我们1955年错失良机是我们当代的最大政治罪行之一，因为在1955年，我们本有机会和他们磋商并着手解决那里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放弃这些岛屿来劝说他们停止在东方用兵并同意在福摩萨(注)实行全民投票。

我们失去了良机，同时也增强了那里的防御力量；我们在1957年又这样做——你让美国人怎么看这些问题？

此时，屋里的电话铃声突然打断了我们的交谈。直到那时，他一直冷静清晰地点评国内外大事。阿德莱·史蒂文森及其响亮的声音正是寻找英明领导人的美国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当他在整整45分钟之后从屋里回到草坪时，阿德莱·史蒂文森像是变了一个人，此时显得沮丧不安、刚愎自用且优柔寡断。他手里拿着一个黄色便笺突然出现在草坪上，看起来愤怒烦闷。

他说他刚刚从纽约来的一个电话中了解到，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要求他在其专栏或公开信中当众声明是否要寻求民主党提

名。但是他认为已很清楚地表明立场了，对此也已反复做过声明。他认为全党务必击败尼克松，国家落入尼克松的手中将有安全之虞。因此，如果党需要他出征，他必将以公民、领导人或被提名人的身份踏上征途。但是，党已给了两次机会。他对此不再要求，也不会去争取。他也不会宣布退出竞争。他无意阻止任何人或帮助任何人——这一切不都很清楚了吗？

一小时过去了，太阳照得热烘烘的。他竭力缕清混乱的思绪，试图找到一个可以让埃莉诺·罗斯福公开的明确答案；华盛顿打来电话，纽约再次来电，这让人好像可以体会到远方的人们正喧闹着寻求一位领导人。但他将不会行动。他只有等待。

电话里的喧闹声的确不虚。在民主党上上下下，人们对史蒂文森的动机、迟钝和言谈进行着斟酌和剖析。这些人多数是他的拥趸。

很少人在公共生活中能像阿德莱·史蒂文森那样福星高照。人的内心都渴望隐秘和独处；然而他的个性和口才使公众注意力自动围绕着他，这一点令其他政客们望尘莫及；人们的关注常常令他窒息。就像美国历史上的诺里斯、拉福莱特（Lafollette）、塔夫脱等其他人物一样，他没有赢得至高荣耀，但是时光荏苒或失败挫折绝不会磨灭忠诚支持者对于他的热爱。现在直至7月13日洛杉矶提名截止，朋友和敌人都对他纠缠不休，所有人都喧嚷着他应当公开申明态度。

时年年初，一场其实没有史蒂文森参加的史蒂文森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参阅第2章）。整个春季，他们一直在静候西弗吉尼亚州的初选结果，当史蒂文森一方的领导人觉得肯尼迪与汉弗莱两败俱伤之时，民主党就必须求助于其最杰出的全国领导人。在此期间，史蒂文森竞选团队冷静且负责的调控系统一直在努力抑制全国史蒂文森追随者们自然迸发的热情。曾几何时，当加利福尼亚州的志愿者们给纽约打电话时［致电乔治·贝克（George Backer），美国政界的卓越智囊之一，现在是史蒂文森团队的成员之一］，贝克坚持要求他们不能使用其在西弗吉尼亚选战中募集的资金来阻挡肯尼迪的机会，否则他们将落个“反天主教”的名声。“不过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乔治？”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来访者问，“我们现在有10万美元，人们一直向我们踊跃捐款。”

4月上旬，史蒂文森竞选活动的4个中心（参阅第2章）在华盛顿印第安纳大街100号的邮政大厦联合设立了总部，他们要在这里收集全国各地的一般性情报。在代表推选之后，对姓名和地址进行归档，然后对随着大会临近可能面临的压力编制参照索引。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胜利给这些领导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几天之后首脑峰会的破裂使史蒂文森竞选候选人和总统的必要性比以前更迫切。在纽约，由罗斯福–芬勒特–莱曼（Roosevelt-Finletter-Lehman）领导组建的反坦慕尼改革的俱乐部每天进

行电话交流。6月上旬，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办事处负责领导和管控志愿者的詹姆斯·多伊尔（James Doyle）被引荐到华盛顿，他在那里正式宣布发起“选派史蒂文森”（Draft Stevenson）运动。截至6月下旬，美利坚合众国的42个州均设立了“选派史蒂文森”俱乐部；纽约的都市类报纸刊登了呼吁捐款的整版史蒂文森竞选广告（首批广告就募捐40 000美元，超过1952年或1956年的任何一次广告）。

从印第安纳大街，现在接连不断地向即将参加大会的每位代表和政客邮寄信函（民意调查、分析、请愿书），证明史蒂文森确实能保护国家免遭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伤害。在洛杉矶，史蒂文森团队的负责人租用了比特摩尔酒店（作为大会总部）附近潘兴广场对面空闲的百乐门大厦，同时挂了一幅100英尺长、9英尺高的横幅广告，请求与会代表：选派史蒂文森。在大陆另一边，志愿者们在7月4日周末时租用飞机拖着高空广告飞过科尼岛（Coney Island）、洛克威（Rockaways）和火岛（Fire Island）的海滩，上面写着：选派史蒂文森。此情此景令纽约人难以忘怀。全国各地和每个俱乐部传来这样一条消息：洛杉矶将举行大游行，宗旨是攻克对手堡垒。志愿者们放弃假期、乘坐客车、驾驶着老爷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好像要奔赴“善恶决战战场”[注]，他们要和约翰·F·肯尼迪一决高下。

这场运动表面看来是一场嘉年华的狂欢，其实是向政客、代表和媒体施压的必要造势。但是，史蒂文森团队领导层表现得比较低调。他们制订了周密计划，对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构进行更为实际的分析。志愿者们的狂热激情旨在让大会一边倒地支持史蒂文森，但是在产生这种效果之前，需要通过施加压力令大会的各派力量出现分裂。

此时，史蒂文森派的领导权由一对非同寻常的政客代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0年。其中的资深政客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现年58岁的迈克·蒙罗尼（Mike Monroney）议员，他不惜以政治生涯做赌注，心里也不期求他正在挑战的高层政治势力给予什么补偿或手下留情。另一位是33岁的约翰·沙伦（John Sharon），他是华盛顿Cleary–Gottlieb–Steen–Ball律师事务所的新合伙人；这位年轻人在4年前初涉政坛，当时他建议1956年的副总统职位采用“公开选举大会”的方式。

这两个人的战略需要大会进入僵持局面，所有的僵局都围绕着“761”这个神奇的数字——大会多数票数。在规定的761票中，史蒂文森的管理团队估计肯尼迪已经掌握了604票。他们预计约翰逊是450—500票。赛明顿估计是100或150票。此外，他们已通过“非竞选方式”积累了45—50张“滩头阵地式”史蒂文森选票。根据预测，第一轮投票过后，这些票数可以很轻松地增加到75或80票。

接着是一些未知情况：当地受拥戴候选人的所在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堪萨斯州、艾奥瓦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未表态的州——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如果当地受拥戴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后依然稳定且没有票跑向肯尼迪，如果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代表的选票在首轮投票中出现分化或保持不变，那么肯尼迪则可能止步于估计的第一轮票数——距获得提名差150票左右。如果因为1票、2票或3票而受阻，那么大会必定会脱离他而寻求另一位领导人。他们推测，约翰逊将是下一位领导人——但是他们又觉得，约翰逊绝不会说服北部各州（受工会和黑人压力的影响）给予他规定的多数票。赛明顿则可能是下一位领导人。但到那时，脱离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选票将可能把票投给史蒂文森。他们的领头人——史蒂文森曾两次获得提名，是代表大会上唯一真正的全国名人。最后，随着肯尼迪、约翰逊或许还有赛明顿接连陷入僵局，疲惫和沮丧将笼罩着与会代表，选票会蜂拥投向史蒂文森。

于是，史蒂文森的智囊们开始制定战略。

为了准备战略、稳定住摇摆不定的当地受拥戴候选人以及主意未决的政治首领，蒙罗尼和沙伦在5月下旬和整个6月踏上了行程。他们4周内走过了大约30 000英里，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宣讲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与布朗州长在家里共进晚餐；当他们谈到外部世界战争和灾难形势日趋紧张时，他深受震动。布朗承认确实如此，史蒂文森毋庸置疑就是总统的最佳人选。谈话持续到夜晚，布朗一直犹豫不决地难以决策。他们离开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感到为难和不安，他给他们的托词是不能忘记欠杰克·肯尼迪的人情——如果肯尼迪当初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他州长本人将被彻底击败。

沙伦和蒙罗尼意识到，伊利诺伊州也是站在肯尼迪一边的，因为固执冷漠的芝加哥市市长——迪克·戴利控制着69张代表选票的3/4。但是，他们依然进行了努力。史蒂文森团队选派芝加哥桂冠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去见戴利，请求他支持伊利诺伊老乡史蒂文森。戴利没做任何承诺。不过史蒂文森的人现在希望如果肯尼迪在首轮或第二轮投票时不顺利的话，戴利毫无疑问在第三或第四轮将支持他们。

宾夕法尼亚州的当家人戴维·劳伦斯也会见了他们。劳伦斯一直是史蒂文森的忠实支持者，但他深知州内大城市支持肯尼迪的代表给他的巨大压力；他热情接待了史蒂文森的人们，也认真倾听了他们的诉求，但是没有做出保证。他刚刚结束了欧洲之行，目前努力在做出决定之前，仔细审视国内政治动向。通过劳伦斯，他们联系上了新泽西州州长罗伯特·迈纳，返回的消息是：迈纳将紧紧抓住新泽西州的代表，无论肯尼迪势力在内部施加多大的压力，他都将在整个首轮投票中与这位马萨诸塞州议员死磕到底。迈纳的立场很坚定。

蒙罗尼（挺拔瘦削、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和沙伦（年轻热情、活力四射）反复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坚持不懈——梦幻组合即将诞生，史蒂文森和肯尼迪。虽然他们不能对选票工作准确评估，但依然可以察觉到变化。选票忠诚度参差不齐令戴维·劳伦斯感到心神不安，他前往伊利诺伊州与戴利、杰克·阿维以及史蒂文森本人进行了交谈。问题出现了：史蒂文森本人。由于那天晚上与蒙罗尼和沙伦的交谈令他一直犹豫不决，同时春天给肯尼迪许下的矛盾承诺压得良心透不过气来，帕特·布朗决定亲自和东部的史蒂文森通个电话。他在纽约办公室找到了史蒂文森，通过长途电话，史蒂文森就首脑峰会的破裂、自由世界的麻烦前兆以及这一切在11月份对政党的影响均洋洋洒洒地表达了真知灼见。但谈到自己时，史蒂文森告诉布朗，他不是候选人，将不支持任何人，将不与任何人做交易，不会阻挠任何人，也不会私下或公开拒绝任何人干脆取得他曾两次赢得的提名资格。

史蒂文森这一伙的负责人虽然工作时没有领导指挥，家乡伊利诺伊州的代表也拒绝支持提名其候选人，但他们依然努力领导这个群龙无首的团队朝着既定战略方向——“僵局”奋勇前进。

6月末时，约翰·沙伦在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只能待上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坐立不宁地接打电话。当电话不断打断其谈话时，人们可以听到他结束交谈时说：“是的，议员先生……是的，议员先生……不，我们掌握这事儿了……好的，议员先生，我会把消息传给他。”或者说：“是的，州长先生……是的，州长先生……请联系某某议员……他负责处理这件事儿。好的，州长先生……”然后说：“好的，议员先生。”或者更具体地说：“好吧，如果你们（这是赛明顿的电话）在亚利桑那州代表团再增加一票的话，我们认为可以为你们拉到一张半选票……是的……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我认为我们可以使亚利桑那州代表团僵持不下并乘势赢得这个州的选票。”

蒙罗尼和沙伦这对搭档竭力保证日益壮大的支持者队伍行事正大光明；但是沙伦和蒙罗尼每到一地，都会组织阻击肯尼迪的运动。看起来超然脱俗和泰然自若，阿德莱·史蒂文森及其两位长期助手——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注]和牛顿·米诺[注]准备在7月4日那一周乘机前往洛杉矶，届时住在公园–维尔特郡酒店（Park-Wiltshire Hotel）的两个房间。不过在7月4日，蒙罗尼和沙伦已在他们之前先期到达，志愿者们也乘火车、汽车、飞机和老爷车随后抵达，总人数差不多有数千之众。

最终使赛明顿的候选人资格泡汤的，与其说是首脑峰会，不如说是西弗吉

尼亚州的初选。赛明顿的整个战略（参阅第2章）主要建立在以下预判和方案上：斯图尔特·赛明顿是一个深受民主党少数群体欢迎的候选人——劳工、黑人、美国南部、大城市老板、边境州；西弗吉尼亚州初选后，对于民主党的领导人而言，显然需要推选一位妥协性候选人，原因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初选造成了一种宗教怨恨，此时肯尼迪或汉弗莱均不能获得全体公民明确授权；西弗吉尼亚州之后，赛明顿一伙可以与权力掮客们接洽了。

现在，这个战略已化为泡影了。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赢得了令人瞠目的胜利。如果希望出现僵局的话，赛明顿召集的人马说了不算，这要看其他势力团体——应视史蒂文森或约翰逊而定。赛明顿不属于积极主动的一派。他只能频繁地访问各地——向全国各地党代会表明：如果代表大会完全破裂，他将是一个可能的避风港。不过，他的心思没有放在这一方面。

也许罗伯特·D·诺瓦克（Robert D. Novak）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文字最佳描述了这一时期赛明顿给外人留下的印象。他在6月这样报道：

> 在大选之年的喧嚣混乱中，还保留着一隅宁静的绿洲：斯图尔特·赛明顿议员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之战。在角逐激烈的政治圈，从未出现这样的场景……
>
> ……赛明顿的竞选团队如同梦游一般，令人感觉这位议员及其助手只是走过场般遵循要求每位候选人竞选的社会惯例。
>
> 想一想他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演说吧。虽然多数未来总统们都早在拂晓就起床了，但赛明顿先生却在上午11点这个“方便”时间才离开圣塔莫尼卡机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石油大亨埃德·波利（Ed Pauley）的洛克希德–北极星公司］，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他抵达安大略市时早了30分钟，于是在飞机里安静地等待着其官方接待人员。
>
> 那天晚些时候，赛明顿先生从容不迫地坐着敞篷车行进在精心安排的一支车队前面，向两边几乎空荡无人的人行道注目示意。几天后，他抵达旧金山，为了休息一下，马上取消了记者招待会。这种情况在赛明顿的竞选之战中是经常发生的，但多数政客认为此类做法和一位英国臣民取消谒见女王一样轻率……
>
> 赛明顿先生行程中的这些细枝末节问题使竞选活动显得异常寡淡无味。但竞选活动的冷漠不仅因为明显缺乏目的，而且也与候选人的个性有关。

……

> 与任何其他方面相比，有一个因素使赛明顿的竞选之战和其对手不同：这位城市长大的密苏里人天生没有促使他迫不及待地问鼎白宫的强烈欲望。总统梦的破灭可能会使肯尼迪先生或约翰逊先生愤愤不平。但是赛明顿先生给人的印象就是：即使他永远当选不上美国总统，生活仍将一如既往，太阳照常升起……

只有知己朋友知道，赛明顿的外表和内心是有天壤之别的，外部世界的事件以及美国在国外蒙受的一连串耻辱深深刺痛着他的心。选战期间，我在一次午餐会上第一次并且唯一一次遇到斯图尔特·赛明顿，此前一天我刚刚在利伯蒂维尔拜见了史蒂文森。这天，赛明顿显得非常痛苦。他刚刚参加了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Senate Armed Forces Committee）的一场听证会；他一边大步流星地沿走廊走着，一边显然很恼怒地和其两位助手交谈着刚结束的听证会。“……你们知道吗？我们驻柏林的一些部队竟然还配备着‘一战’时期的步枪，甚至还不是‘二战’时期的步枪……你们知道其他事……猜猜他们打算从新武器总预算抽出多少钱投入我们在有限战争中需要的陆军装备？……继续猜……用于陆军的费用甚至还不到新式装备总预算的千分之一。甚至不到这个比例，只有3 700万美元……我告诉他们我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我绝不同意……你们知道吗？苏联一半的军队已完全装备了‘二战’以后的全新现代武器了……”

他在午餐桌旁坐下，点了一份汉堡，心里琢磨着以美国在全球被逼得步步后退的形势，从现在起10年之后，是否还有国家可以保卫。他参照美国的增长率，对苏联的增长率进行了评论。后来他心绪逐渐平静下来，谈起他对于总统职位的看法。

> 我希望做的是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政府是企业的合作伙伴，是劳工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必须使政府也成为农民的合作伙伴。共和党主张联邦政府应脱离与企业合作关系的观点不仅愚蠢……而且危险。举例说，你乘坐飞机，当然希望它安全着陆——我们不能放弃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你认购了一家矿井的股票，当然希望这家矿井确实存在——我们不能放弃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你在商店里买了一瓶药，当然希望确保标签和瓶内信息完全对应——我们不能放弃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你调试收音机，当然不希望同一频道有5个电台——我们不能放弃FCC……愚蠢的共和党人竟然天真地希望政府摆脱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政府是每个人的合作伙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力量是我们的唯一希望……一条新公路是力

量，一座新桥梁是力量，一家新学校是力量。最重要的是，一位好老师是力量，她的工作对象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源。

就本次业务对话而言，政府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查利·威尔逊（Charlie Wilson）入主五角大楼时，他将通用公司的管理方式也照搬到那里。我了解通用公司，他们是我在商界时的第二大客户，是一个秉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理念的群体。他们共享期权和利润。但在五角大楼，这种制度的效果适得其反。在企业，利润至上，人越少，利润就越高，如果运营中冗余一个部门，就应该将它裁掉。但在政府，没有利润动机——唯一愿望就是权力，你手下的人越多越好，这意味着权力更大。我在五角大楼时，有8个秘书，两个是多余的。现在竟然达到36个！数年来，我一直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改组五角大楼节约数十亿美元。

桌旁有人发了一通党派言论，大意是每个政府部门散布在华盛顿各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拆得零零散散的小孩儿手表。赛明顿正说得口若悬河，他以此为话题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想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就必须撵走管子工，招进修表匠。为应对变化，必须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你必须设立行动计划和相关机构，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拿航天的事儿来说，整个航天工作现在弄得乱糟糟的，就像全美式七巧板。我们对航天工作的划分和所罗门（Solomon）智断亲子案中分割孩子的方式相同。我们设立了直接向总统汇报的一家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其执行秘书甚至尚未任命。国防部也设有一个航天部门——ARDA（预研开发署）。那么在NASA和ARDA之间，需要有一个协调结构。海军、陆军和空军在航天领域均有涉足。如果海军为了其项目向陆军提出某个要求时，陆军将对海军说：“你必须听我的。”当陆军向空军提出某个要求时，空军会说：“你必须听我的。”当三个军种同时启用ARDA权力时，他们可能会大喊：“我是老大！”这时人们就商量着设立一个专门的“和平秘书长”——我们既需要“爱心秘书长”，也需要一个“和平秘书长”！你必须按职能组织好各方面，让人们知道职责是什么以及在什么环节做出最后决策。最基本的管理理论需要像金字塔一样，决策应当有条不紊地到达塔尖——不能像耙子一样，把所有决策不分主次地弄到顶部。

此时，他愈发按捺不住愤怒情绪，拳头逐渐握紧，骨节变得发白。想到这些违背施政本质的做法，他那相貌俊朗、表情丰富的脸散发着阵阵怒火。

这种管理制度，你必须牢牢控制。不是你执掌权力，就是权力凌驾于你之上，没有妥协余地。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时，将一位名叫C·D·克莱因（C. D. Kline）的人叫到办公室说："克莱因，作战部、帕特森（Patterson）和空军采购部之间的关系很荒唐。每份10万美元以上的合同均需先在俄亥俄州莱特机场洽谈，接着再到华盛顿这里重新谈判和重复一些环节，把一切处理完毕光在繁文缛节上面就要浪费几周时间。我希望你直接去莱特机场，就此情况和他们谈谈并研究一下。"

不过，48小时后，他回到办公室给我汇报那边项目总监的情况。克莱因说："我刚和他说了5分钟话，他就说：'我只告诉你三点。第一，不要相信工业工程师；第二，我不会用你的；第三，我根本就不想和你说话。'"

当时大约是上午9点，我走进图希·斯帕茨（Toohey Spaatz）的办公室，他时任空军参谋总长。我说："我希望你在上午10点之前炒掉这个人。"

20分钟后，斯帕茨回来告诉我这办不到，莱特机场的这个人拥有文官身份，你不能解雇他。

我回到办公室，接着给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负责人打电话。我约定在下午3点钟与他会面。我走进办公室，解释了相关情况，然后问是否可以解雇这个人，我这样说："在你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希望说明一件事——如果你说我不能炒掉他，我就直接从这里前往白宫申请辞职。"于是在听到我的情况之后，文官委员会给出最终结论：鉴于不服从命令，可以解雇此人。

我记得一起离开办公室的还有位空军上将。我让他开着我的车直接去机场，当天下午乘机前往莱特机场解雇这个人，然后把这家伙带到我这里来。当他第二天来我的办公室时，这个家伙像变了个人——他痛哭流涕。他告诉我这一切对其事业及家庭的影响有多么大，又说他马上也要退休了，等等，我说我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惩罚——如果他能向我做出保证，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他说能做出保证。实际情况是他确实做到了。

但是你必须管理，必须有效施政，否则权力会凌驾在你之上！

我们在漫长的午餐时间里谈到了很多事情：城市的衰败和改造、农业问题、卡斯特罗、美国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衰退、美国和苏联的科技。针对

每个话题，他都讲求相同的执政理念和大刀阔斧的做法。在交谈期间，我们4个人都知道赛明顿的选举之战已近尾声——因为美国总统政治并非取决于执政措施和能力；它们属于另一个体系，在政治这一个陌生的世界中，赛明顿的唯一希望只是：默默地等待，等待幸运地出现妥协情况。他举止严肃庄重、毫无怨言地关注着瞬息万变的形势，但是领导阶层的选择始终取决于那些势力强大、控制力更强以及更擅长把握美国政治奥妙的另外一些人。

因此，在国会为了党大会一插曲而准备暂时休会之际，斯图尔特·赛明顿和密苏里州的伙伴们制订了前往洛杉矶的行程。

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的办公室，林登·约翰逊如同一个身陷囹圄的人一样，默默注视着5月和6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也和史蒂文森一样，享受着当世界大事发生时立刻显现出来的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大事首先从首脑峰会的破裂开始，令初出茅庐的肯尼迪显得幼稚可笑。但是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完胜证明这位马萨诸塞州议员是可以赢得基督教区域的，这一点极大抵消了国际事件带给约翰逊的优势。肯尼迪对于眼前的现实情况有清晰认识，据说他曾对一位朋友说，他从巴黎或莫斯科不会得到林登所需要的这种帮助，他需要从北部大城市和西部赢得这种帮助。

于是约翰逊开始回想当初的战略概念，这一战略使他只能踱脚前行。如果要赢得胜利，该战略（参阅第2章）也不能失败，他必须证明自己掌控住了难以驾驭的参议院，证明自己是国内的一位资深议员，证明自己是一位成熟、自由且具有非凡管理才能的人。由于外交事务和令人不安的国内政治分散了其注意力，现在参议院经过燥热的春季之后，正缓慢筹备着代表大会，约翰逊作为民主党首席立法设计师一直希望创建的“负责任调整”计划尚未完成。针对增加最低工资、老年人医疗补助、校舍建设补贴、增加公共住房、共产主义者弃权宣誓、农业立法的所有法案均在缓慢接受国会复杂立法机构的审核。约翰逊需要亲力亲为地呵护着每项法案通过华盛顿政治丛林中隐藏伏兵和公开反对势力的围追堵截。肯尼迪可以在巡回路上和其他时候随意结交代表和领导人，然后返回华盛顿集合相聚。立法领导权将帮助约翰逊树立起自由、理性、智慧、驾驭能力出色的形象，这需要约翰逊经常出现在国会大厦。

约翰逊的其他障碍主要包括其外部举止和经历。从许多方面看，林登·约翰逊和1928年的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 Smith）很相似。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是天主教少数派中第一位被正式推荐参选美国总统的人。1960年，林登·约翰逊也代表了一个少数派，也许是美国最幽怨的一个群体——南部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他是这个群体中被正式推荐参选总统的第一

位代表。1928年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史密斯来自纽约的下东区，他喜欢抽雪茄，戴着圆顶礼帽，说话口音怪异；1960年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穿着得体，口若悬河，辩才无双；从史密斯到肯尼迪，整整相隔了一代人。自1960年的林登·约翰逊到未来将走入美国主流生活的某个南方人之间，一代人也将走过类似的历程。

对于1960年的林登·约翰逊而言，无论他多么精明和谙熟华盛顿的情况，其国内形象总体上还是显得土里土气。观看林登·约翰逊带着家乡口音演讲就如同欣赏演艺船的演出一样。他开始通常使用从华盛顿学来的那种低沉严肃的语调。然后，随着拳头握紧、在空中挥舞摆动，他的声音开始发生变化，大喊时如公牛咆哮，讲到原创笑话时，音调忽然降低，窃窃私语宛如要保密一样；这种音调起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南方共鸣效果；所有的文字不是重要的了，在印刷文本中，缓缓的拉伸语调、突然停顿的语句、假意微笑的保密神情等特点永远不能再现。除了艾森豪威尔之外，他有着国内政坛上最多变、最富有表现力的一张面孔；他的脸好像是一块天然橡胶——生气时，嘴绷得紧紧的；怒吼时，嘴张得大大的；沉思时，嘴角收缩着；玩笑之后，粲然微笑；哀叹国内问题时，表现得黯然神伤。如果林登·约翰逊状态良好并且场合合适的话——举例说，在一个小镇共济会教堂专为小镇南方民主党人举办的一场晚餐会上，复活节明星淑女负责端上热菜，人们就可以欣赏到美国政治艺术的大师级表演。但是，如果同样的表现转接到纽约布鲁克林民主党人的晚餐会上，或者通过电视播放，我们就发现其表现缺乏总统特质。令人伤心的是，在冷嘲热讽的北方人和墨守成规的西部人看来，这就是“乡巴佬”；与总统职位的高贵标准相比，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蹩脚语法、东部口音和纽约方言同样相距甚远。

林登·约翰逊还面临着另一个沉重包袱，那就是他的特殊经历以及在总统政治中展示该特殊性的困难。如果赛明顿的头脑像华盛顿的行政手段一样先进的话，约翰逊的头脑就如同先进的立法机构，但是同样难为公众了解。在约翰逊看来，美国参议院不仅仅是参议院，它还是一种信仰、使命、社团、习惯、放松、投入、爱好和真爱。对他而言，参议院基于神圣的传统，是人类最值得称道的管理机构，它的每个方面——庄重的决策、不见阳光的小交易、敏感易怒的个性、公开的冲突和背后的阴谋诡计——都令他着迷不已。在超过12年里，参议院几乎成为他的偏执爱好和私人领地，他将美国参议院和生活本身混为一谈。在1960年的政坛陷入危机时，林登·约翰逊差不多认为“参议院”就是美国，“他”就是参议院。在华盛顿，许多人和他怀有同样的混乱想法，华盛顿存在的一种情况和错误做法就是：首都的人们将授予权力和实际权力混淆在一起。无论在华盛顿的行政机关还是在国会，负责授权数十亿对外援助、导弹经费、大型公共工程的人们（以及游说这些决策者的小人物）都认为他们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巨大权力。长期在华盛顿的议会做出权力决策使人们忘记了这种权力最终来自波

托马克河注之外的地方。

对于约翰逊来说，这一点尤其不幸。他12年任职参议院和8年领导参议院期间所形成的精湛立法艺术只能由政治学者来概括。在波托马克河北部和西部的公共形象简略描述中，约翰逊通常看起来就是一个谙熟参议院各种技巧的“精明骗子”。对其创新努力进行简单概括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殚精竭虑发布的法律和法令卷宗看起来那么死板无趣，几乎找不到可体现创新的东西。但特别结合1960年的形势，若要找到一个可以展现其立法艺术的例子，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他在美国种族关系领域取得的成就。自从首批奴隶于1619年抵达弗吉尼亚州以来，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坛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它曾令当初的宪法制定者绞尽脑汁；它在最初的70年曾令政坛分裂；它曾成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由于其暴力的前线移师北部，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美国社会的爆炸性问题。1861年的内战证明美国黑人和白人的问题当时不能依照立法方式进行讨论或解决，于是国家走向了战争。在此后近一个世纪以来，通过心照不宣和阻挠议事，所有美国问题中的这个老大难从来没有在国会大厅被适当地讨论过。林登·约翰逊在过去8年来的业绩就是使种族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华盛顿讨论和立法的主题之一。通过秘密和迂回技巧——哄骗、威胁、承诺、虚张声势，他成功地使南方和北方的国会议员“真正地”谈论、“真正地”寻求、“真正地”努力找到可以跨越鸿沟的交汇之处。过去8年中的极少量公民权立法迄今仍没有体现出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答案不仅在国会议院，更在于社会。但是，约翰逊的业绩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种族关系问题可以进行合理讨论了，无论多么谨慎小心，起码可以最低程度上受到立法管理了。就像赛明顿的行政管理才能一样，这种业绩是很难展示给选民的；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北方一直对约翰逊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种族偏见的南方人，南方则视他为一个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的背叛者。

这些都是约翰逊为之所累的负担；有些问题，他意识到了，对于其他问题，他仍然没有察觉到，显得无忧无虑。这一切在其5、6月份的竞选战略中也反映出来了。

由于在大会召开之前的近期主要对手是约翰·F·肯尼迪，约翰逊的选战也就集中在肯尼迪身上；以肯尼迪为目标也奇妙地预示着后来尼克松选战的情况。约翰逊不止一次地说，肯尼迪太年轻，太缺乏经验——这个国家需要一个“成熟资深”的人。约翰逊反复强调，肯尼迪关于U–2击坠事件的观点是错误的——其观点是美国必须毫不退缩地面对苏联的挑战。肯尼迪认为，就U–2事件而“道歉”就是一种绥靖做法。此外，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约翰逊德高望重（同样，后来也幸亏尼克松的威望），其辅佐团队一定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宗教分歧的问题，他们会坚定主张天主教徒不能赢得选举，否则深藏的偏见会危害大选。

虽然姗姗来迟，但约翰逊的真正选战终于开始了。吉姆·罗曾是汉弗莱选举之战的谋略大师，现在成为约翰逊的智囊核心，其策略显然有点儿过分讲求务实。这位多数党领袖周末离开华盛顿繁重立法工作的时间日益增加。他坐着私人飞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华盛顿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艾奥瓦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其华盛顿总部开始宣布主要支持者名单：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拜布尔（Bible）、安德森（Anderson）、奥伦·朗（Oren Long）、马格努森（Magnuson）等参议员。但华盛顿新闻界冷嘲热讽地指出，这些人都是参议院名人，在参议院仰仗着约翰逊的支持，他们都早已被约翰逊俘虏。在巡游路上，在山区各州的代表大会上，他的竞选干事加倍努力；得克萨斯州那些年老随性的业余成员现在换成了更加精明强悍的人选。7月5日——距代表大会召开仅有5天，林登·约翰逊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告诉世人他确实准备竞争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

但在很久之前，由于代表大会构成的原因，他胜选的可能性其实已经明了。作为南方候选人，他不可能获胜。他必须作为西部候选人才能赢得竞争。如果他能将西部的150位代表以及中西部另外20张选票整合到其南部基础力量中，就可以作为更大范围的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注)新月形区域的候选人，来对抗占据优势的东北部集团。为了让肯尼迪止步，在最初的一两轮投票中，应当联合史蒂文森、约翰逊、赛明顿和当地政治宠儿的力量，新月形区域的力量和北部代表相结合，向东推进，走向胜利。代表大会前约翰逊势力的估计票数——提名前两周——是502.5票（约翰逊估计肯尼迪的总票数是602.5票），而成功提名最少要达到761票。在约翰逊的502.5张票中，385张来自老南方和边境各州，另外80张来自西部和山区各州，其余票数则来自东北部工业区零零散散的朋友们。

如果以上算法没有错误并且其他候选人和当地政治宠儿立场坚定的话，就可以让肯尼迪止步不前了。但是如果以上算法不正确，肯尼迪就可以轻松获得提名。在上述算法中，令人举棋不定的数据主要集中在约翰逊声称可以在山区各州获得的大约80张票。约翰逊所说的这些票是确定无疑还是凭空想象？这些票数代表的人们是立场坚定、摇摆不定、和善友好、承诺守信、谨慎小心还是冷漠无情？针对这些选票背后的人们，肯尼迪集团已经开始做工作了。

追溯到约翰·F·肯尼迪的政治生涯始端，人们可以发现几条清晰可辨的哲学信条，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识社会的卡莱尔方法（Carlylean approach）。

在与肯尼迪就任何阶段的美国国内政治所进行的几乎任何层次的任何谈话中，很快可以发现他对美国政治的看法不同于他人。他在谈话中说，政治就是由一些人领导的很多团体。想知道谁是领导人并了解他们，就应当知道和了解这些团体是如何运作的。对于他人的领导能力、个性以及品质的认识应该是个人化的，应完全独立于媒体或公众舆论的任何评价。这一点就导致他会对于别人认为伟大而其本人认为虚伪的人表现出谨慎热情或冷若冰霜；同时，对于他认为思想水平、言谈、智力、口才或影响力可能对他有用但多数世人尚不了解的人，表现出强烈关注并积极培养。这种想法存在风险，但这种方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观察这种想法在1960年5月和6月如何管理和部署肯尼迪的强大队伍，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的政治。

美利坚合众国由50个州组成，宪法赋予每个州一定的独立主权。这些主权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在每个州创建了两大政党。在每个政党内部，有2—4个政治团体首先竞争州内政党的领导权，然后是州内的管辖权。要想知道在成百上千个循环、解体、初生和衰败的政治团体中，何处蕴藏着真正的力量，只能去探访当地的民间传说和公开报告的源头。此类信息是政客们的闲谈八卦，是政治记者跨州交流的智慧宝藏，是寻求持久真相的政治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是普通选民在试图了解谁真正控制政府时所面临的神秘一面。

反诽谤法律、政治报道准则、基于友谊和习俗的惯例、距离和偏见的障碍都有效掩盖了美国政治不断变化的分布状况。媒体不可能公开报道哪一位闻名于世的州长通常被党魁称为“蠢货”，哪一位看起来凶恶狡诈的政治首领在其他人的手中只是纸老虎，哪一位工会领导人真能提供选票和资金而哪一位不能做到这一切，哪一位了不起的工业家是个政治阉人而其邻居则是执掌州内实权的人物，哪一位国内杰出的黑人在追随他的人们眼中是一个“汤姆叔叔”[注]而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亲属则实际控制着地方选区，哪一位年老领袖失去了对当地领导人的控制而哪一位则牢牢掌握着权力。美国政治的根源问题始终是：应当认真研究什么人？要了解美国政治就应当了解人，应当了解重要人物的相对分量——谁是英雄，谁是稻草人（无足轻重的人），谁掌控着权力，谁没有控制权。但是若想参与美国政治，人们就必须更进一步——与这些重要人物建立联系，确立友情和个人关系。美国地缘辽阔，政治团体众多，当地领导人离开家乡的大本营时，将不断探索，渴望相互建立联系，他们对于任何使其增添力量的人都万分感激。

肯尼迪家族在成长过程中就学会了这一切，这一点常常体现在他们对名人淡然相待，对默默无闻的领导人才求贤若渴的态度上。从最早参与马萨诸塞州残酷的政治斗争起，他们就开始寻求并创建自己的领导团队。他们不管这些人是否属于州内疯狂的政治圈子，总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从斯普林

菲尔德到洛厄尔等地招募愿意听命的优秀年轻人。他们在这些青年才俊中建立了一个完全归属个人的组织，该组织将多年来令州内元气大伤的腐朽党组织踢到了一边。注

1956年，肯尼迪家族看到同一个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作用。在一个狂热的夜晚，19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约翰·F·肯尼迪和埃斯蒂斯·基福弗在竞争副总统资格的代表授权，肯尼迪家族认识到全国性政治也离不开人缘。博比·肯尼迪回忆说："我想起一位优秀的马里兰州代表及其妻子。他们友好和善，对我们也颇有好感。基福弗曾到家里拜访过他们，还给他们送过圣诞贺卡。我们不能失去他们的支持，给他们送圣诞贺卡也成了我们的一贯做法。"

因为全国性政治以人为本，肯尼迪家族从1956年就开始了解合适人选。1956—1960年，约翰·F·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州、做过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Jefferson-Jackson Day）晚餐会演讲、参加的由民主党人出席的当地及市长活动，超过了任何一位民主党人，甚至阿德莱·史蒂文森也不如他。到1960年春天时，肯尼迪不仅拜访了美国的每个州，而且其情报文件夹塞满了或许最完整的索引信息资料，这些信息描述了国内每个政党的权力构成。每经过一个地方，他的组织都勤劳地撒播种子；工作先后由索伦森、奥唐奈、奥布赖恩、博比·肯尼迪负责。组织悉心培养肯尼迪最初种下的幼苗，影响力逐渐遍布除了南方基地之外的每一个州。肯尼迪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了。和那些自诩为州主人的人相比，他的组织往往信息更灵敏，更有组织性。肯尼迪的一位组织人员曾以平实朴素的语气对记者说："嗨，你知道吗？林登竟然认为卡迈恩·德萨皮奥和坦慕尼派控制了纽约！"在这位记者看来，这句话就是为约翰逊选举撰写的祭文。

现在是1960年5月和6月，这种"知彼知己"策略也到了收获季节。自从上一年秋天和海恩尼斯港会议以来（参阅第2章），肯尼迪指挥部将这个国家划分成由助手管辖的不同区域。在整个春天，第一分队——选举机构主要负责初选之战，向选民争取选票，向各地的观察者证明肯尼迪选举团队的魅力和魔力何在，击碎充满偏见的谎言，展示肯尼迪参议员在全国的吸引力。初选现在结束了，他们获得大约134张代表票。现在其余的收获过程仍在继续，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走遍全国各地。这一过程体现了美国生活的多元性，始终遵循着每个州内政治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

赢得密歇根州的政治支持时，肯尼迪就注意到了这个州政治运行的特色。1960年密歇根州的领导权掌握在3个人的手中：C·尼尔·斯特布勒（C. Neil Staebler）、沃尔特·鲁瑟、G·门嫩·威廉斯州长。这几个人心气高傲且态度强硬，肯尼迪团队之前对他们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历经12年，时任州主席并且是美国政坛谦谦君子之一的尼尔·斯特布勒，在上中西部地区创建了最

高效的公民政治组织之一；他决不允许任何干扰其组织平稳运作的阴谋诡计；虽然一度是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但斯特布勒现在最希望迎来一个1960年的胜利者——一个属于自由派阵营的胜利者。肯尼迪在初选中证明自己是一个胜利者、一个支持自由派立场的胜利者，他之前曾谨慎地不让肯尼迪组织者进入密歇根州。肯尼迪已赢得了斯特布勒的尊重或喜爱。沃尔特·鲁瑟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与密歇根州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美国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与纽约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一样，他最初在休伯特·汉弗莱、阿德莱·史蒂文森和约翰·F·肯尼迪的选择方面持中立态度。作为30年代创新工联主义的忠实信徒，鲁瑟首先希望确保劳工在白宫会议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次他希望确保民主党被提名人能够通过他个人在公民权利和工会权利立场上的考验；最后但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民主党获胜。到5月中旬，俄勒冈州的初选甚至尚未结束，肯尼迪已经通过了鲁瑟的所有考验。

关于威廉斯，有必要引述肯尼迪的助手对这位奇怪人物所做的最早（1960年1月）分析之一。这份发给肯尼迪总部的报告中写道："每个人似乎都一致认为威廉斯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自视甚高，自认为是遵从上帝旨意来发展自由、人道主义事业的使者。他是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总是不时地让人们观看他前往圣地（Holy Land）朝拜的影片。威廉斯显然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将登山宝训[注]付诸政府管理的人。这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体现了一种真诚信仰。我之所以对此略做详述，是因为我认为，如果忽略了这种与其个人抱负完全结合的强大宗教力量，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他。"

随着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和俄勒冈州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密歇根州的三驾马车现在确信肯尼迪就是他们的选择了。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证明自己是捍卫斯特布勒观点的一位纯粹、坚定且重视组织性的出色战士；他已向劳工清晰表明了承诺和善意，鲁瑟对此甚为满意；他也通过了威廉斯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所有考验。密歇根州准备加入这支胜利之师。肯尼迪现在已经为赢得密歇根州的支持做好了一切准备。

6月1日晚上，肯尼迪是在旧金山度过的。6月2日上午，他为接受美国纺织工人联合会（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的支持而在旧金山略作停留。现在，为了在礼仪上表示尊重，他的飞机满载着记者飞抵密歇根州北部，与威廉斯州长及其美丽的夫人会面。不知什么原因，记者和要员们随即乘车45英里前往麦基诺桥（Mackinac Bridge），然后乘渡船前往历史上著名的麦基诺岛（Mackinac Island），州长的避暑别墅就在这里。在州长别墅里，私人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记者们则在外面冻得瑟瑟发抖，偶尔啜饮一口威廉斯夫人送来的热咖啡。然后，在离开小岛返程的渡船上，威廉斯州长向聚拢在一起的记者们宣布他与杰克·肯尼迪就未来的许多问题进

行了讨论，他最终决定支持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而且他说，肯尼迪在到达密歇根之前并不“了解”会谈中将发生的一切。（在乘机飞往密歇根州的路上，肯尼迪告诉过记者他猜测会稳稳获得支持的。）州长表示他相信肯尼迪将赢得密歇根州51张大会投票的“大多数票”，这种说法和赫鲁晓夫先生的说法很类似，赫鲁晓夫也相信他将赢得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大多数票。当着威廉斯的面，肯尼迪先生神情严肃地强调了这一支持的“重要性”，宣称这一支持“在候选人提名和选举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接着乘车到达机场，乘机前往科罗拉多州去收获更多的选票。

到纽约争取选票的时刻接踵而至。但这是一个在完全不同层面上的领导层运作。赢得密歇根州的策略是尊崇地位和拘泥细节，不冒犯心性高傲的领导人。赢得纽约也得依靠技巧，不过是通过其他政治策略。

纽约州的民主党曾经是美国最大的党派，亦是该政党创新思维的智库和源泉，不过现在却遭逢厄运。由于被东北部传统的种族冲突至少分成了5派（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黑人、白人新教徒），纽约民主党的领导人很久之前就不再试图让这些群体摈弃前嫌，使他们成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集体；这种做法没有使帝国州的这些族群团结一致，而是分化了他们。自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以来，纽约民主党的领导层没有向整个州或城市提出任何伟大设想或宏伟愿景。除了南部和马萨诸塞州，在美国任何其他州，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强的管理人员、大学里思想活跃的人们和民主党政治领导层之间都没有横亘着如此一道鸿沟。政党领导机关脱离了人们普遍关注的想法和现实，落入了一群粗俗人手中，他们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狭窄圈子里，越来越脱离群众及其需求和愿望。纽约州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州，其民主党领导人在党内代表大会上可以投114张票，这个票数占候选人提名所需总票数的1/7。直到1960年春天，这些领导人还认为将亲自投下这些选票。

由于5个人私下里悄然进行的有效工作，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想。这5个人包括：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布朗克斯区（Bronx）的查尔斯·A·巴克利（Charles A. Buckley）众议员、布鲁克林区（Brooklyn）的尤金·基奥（Eugene Keogh）众议员、伊利县主席彼得·克罗蒂（Peter Crotty），以及约翰·F·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

这几个人绝对现实地审视着纽约。在他们的眼中，笼罩纽约的政治神话已经过去，相反，腐败已令它日渐式微。外人来到纽约时往往首先到曼哈顿，始终想着坦慕尼协会的传奇力量，认为全国政党委员卡迈恩·德萨皮奥就是坦慕尼协会的首脑。然而政党老板德萨皮奥仅仅控制着纽约州的一个区（曼哈顿）；在这个区内，他还面临着公民改革派的强大压力。纽约市还有其他4个区，这个州共由57个区组成。

肯尼迪的计划是从北部开始行动。从1959年秋天起，康涅狄格州的全国政党委员约翰·贝利被分派在纽约北部侦查情况，他以一种越境政治突袭的方式搞定了松松垮垮的帝国州民主党。自休伊·朗（Huey Long）从路易斯安那州突袭阿肯色州以来，在国内政坛还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贝利小心翼翼地行动着，水牛县（Buffalo County）领导人彼得·克罗蒂和纽约州民主党干事长本·韦茨勒（Ben Wetzler）被悄悄地争取到肯尼迪一边，同时没有惊动沉沉欲睡的曼哈顿领导人。他们在克罗蒂和韦茨勒的帮助下，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试探着北部各区的忠诚度。到春天为止，贝利报告大约40张纽约北部代表选票将稳稳地支持肯尼迪。

韦斯切斯特（Westchester）、布朗克斯、皇后县（Queens County）和奥尔巴尼归父亲约瑟夫·肯尼迪管辖，他在那里充分利用老交情和游说展开工作。两位众议员——布朗克斯的巴克利和布鲁克林的基奥与他一起携手合作。截至5月，在纽约市内，肯尼迪–巴克利–基奥联盟又赢得40张选票——114张选票中一共获得80张。

由于担心春天采取反击行动为时已晚，党魁德萨皮奥及其性情温顺的伙伴迈克尔·普兰德加斯特现在希望（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竞选活动由于宗教斗争而崩溃，代表大会随即陷入僵局，然后他们可以劝说亲近肯尼迪的北部各县主席持中立态度，接着他们也许依然能够操纵着纽约数量不菲的114张选票，在僵局中发挥最大效果。但是随着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俄勒冈州取得胜利，肯尼迪的胜利战车已经启动。北部县主席和布朗克斯区、皇后县以及布鲁克林区的多数政客们早已获得个人位置。对于德萨皮奥–普兰德加斯特领导层而言，已别无选择，只能强撑着所剩无几的优雅和尊严爬上滚滚前行的胜利战车。

肯尼迪在6月16日到纽约出席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为他提议的一场招待会，活动在古老瑰西园[注]葱绿漂亮的草坪上举行。6月16日这一天暴露了纽约一些人言而无信的嘴脸和肮脏政治；德萨皮奥–普兰德加斯特集团因为不能向肯尼迪发泄，于是对改革派大放厥词；那天上午，他们将纽约最受人尊敬的民主党人之一、前州长雷曼排除在大会代表团名单之外。肯尼迪在草坪上坐着，相貌英俊但神情疲惫，光亮的棕色头发泛着一点儿灰色。他举止放松，语调柔和，但仍显得矜持冷淡。这一伙人对雷曼的冒犯令他大为不悦，他觉得雷曼的支持对其后来拿下纽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现已将坦慕尼协会的代表牢牢掌握在手心了，他要让坦慕尼协会的首领觐见他，就像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的罗马地方总督在帝国行军路上接见蛮族首领一样。改革派站在草坪的一边（在纽约，只有改革派才能为竞选款项筹措起大笔资金），守旧派则在另一边。几位黑人政客在人群中间怒气冲冲地走着，其中一个人与一位改革派政客就黑人是否支持改革派正争吵不休。（“我们不会做你们的跟屁虫，你们

本来应该向我们提前打声招呼。”）

坦慕尼协会的保守政客们在太阳下眯着眼看着现场，他们将嘴里的雪茄收了起来，咄咄逼人的面庞显得迷惑不解但没有透出敌意。这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是他们种子的传递，是他们血统的传承，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像他们一样是政治头目的走卒。他曾求学哈佛大学，在英国接受了训练，现在变得与他们有些不同了——正如他们期望的那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三伙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因为他不知用什么办法拿下了纽约，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准确地说出所以然。他们排成一行与他握手，他对每个人的态度都是一种得体但冷淡的礼貌；有时，他强压着厌倦的情绪，从交谈中抬起头，示意后面的人过来；这不完全是个受降仪式，但是他那语调顿挫以及举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他徘徊在威斯康星州菲利普大街上时没有多大差别。当他们鱼贯而过的时候，他一一问候：“您好。”“您好，很高兴见到您，您能来可真好，您好。”下一周，参加民主党大会的纽约州代表团聚集在奥尔巴尼，对其全体成员做了民意测验，结果发现114人中有87人支持肯尼迪，但肯尼迪没有特意露面。

对于肯尼迪而言，5月和6月是体力严重透支的几周。他马不停蹄地飞往全国各地，收获前面4年探访各地领导层的成果。现在难以重现他穿梭于全国的出行日程了，时间长达5周，从5月20日的俄勒冈州初选到6月27日的蒙大拿州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代表遴选大会。下面是从俄勒冈州开始的部分日程：芝加哥（拜访阿德莱·史蒂文森，请求他的支持但遭到拒绝）、海恩尼斯港、华盛顿特区、新泽西州、纽约州、华盛顿特区，接着是华盛顿州、旧金山、芝加哥、密歇根州、科罗拉多州、明尼苏达州、新墨西哥州、马萨诸塞州，再去科罗拉多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再去纽约州，再去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州、艾奥瓦州、蒙大拿州，最后返回马萨诸塞州家乡休息。他的车马劳顿、体力透支或个人演讲以任何测定标准也体现不出他希望在任何地区获得的票数。对于肯尼迪而言，希望获得选票的价值不仅在于这种简单的数字统计，更在于它们对整体战略所产生的多重作用。

举例说，在落基山脉各州，可以赢得的票数赶不上纽约或宾夕法尼亚任何一个州。然而，落基山脉各州在5月和6月将进入州内与会者和代表遴选的几周；基于战略需求，无论耗费多少精力，他也应当关注山区各州。

5月21日对史蒂文森的拜访使他坚信史蒂文森不会退出，因此代表大会上的主要阻力如果不来自史蒂文森本人，也是来自史蒂文森的铁杆追随者。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史蒂文森的压力只有在代表大会经过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陷入僵局之后才会出现。如果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后出现了僵持局面，打破僵局的主要人物将是林登·约翰逊。如果林登·约翰逊确实可以从落基山脉各州获得80或90张选票的话，那么他的确可以向全国表明他不是

南方候选人而是一个西部候选人。为了削减约翰逊在山区各州的总票数，隔离并为约翰逊树立一个南部候选人的形象对于肯尼迪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即使消耗大量的个人精力，从战略上讲也是值得的。

自从海恩尼斯港会议以来，山区各州一直是弟弟特德·肯尼迪的监控区域，特德从早到晚地为哥哥招募年轻领导人。现在随着西部各州代表大会在春末召开，肯尼迪及助手都感受到了压力。几乎在所有这些州，约翰逊的参议院联盟或史蒂文森的狂热追随者明显占据上风。但在各派控制势力之下，肯尼迪团队也培养了新生力量。在新墨西哥州，参议员丹尼斯·查维斯（Dennis Chavez）和克林顿·P·安德森（Clinton P. Anderson）都站在约翰逊一边，约翰逊预计可以获得新墨西哥州代表的全部17张选票。但是肯尼迪手下的年轻人非常努力，当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为推选代表而召开州代表大会时，这位马萨诸塞州候选人闪电拜访了他们，离开时抢走了约翰逊预计17票中的4票。在亚利桑那州，前州长欧内斯特·W·麦克法兰（Ernest W. McFarland）预计本州将协调一致，在单位投票制的基础上，会把亚利桑那州的全部17张票投给约翰逊，但是年轻众议员斯图尔特·L·尤德尔（Stewart L. Udall）一直组织州内各方力量支持肯尼迪，最终全部17张票落入肯尼迪手中。在科罗拉多州，参议员约翰·A·卡罗尔（John A. Carroll）是史蒂文森的人，而州长史蒂芬·L·R·麦克尼克科尔斯（Stephen L. R. McNichols）和前参议员埃德温·C·约翰逊（Edwin C. Johnson）则倾向于约翰逊；但是年轻的拜伦·怀特（Byron White）和特德·肯尼迪一直在科罗拉多州各区活动着，预计在6月末之前可以获得科罗拉多州21张大会选票中的10张（后来在洛杉矶的第一轮投票，他们将可得票数增加到13.5张）。6月的一天，肯尼迪疲惫地团坐在科罗拉多州杜兰戈机场休息室的绿色皮革沙发上等待着康维尔专机滑行停好，他对拜伦·怀特和弟弟特德说："老实说——经过这2000英里的航程，我赢得了多少票？半张？"怀特说："你使我们都情绪振奋起来了。"他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临近6月底时，肯尼迪在州代表会议上做了最后一次演讲（蒙大拿，6月27日），大会的选票构成开始明朗化。肯尼迪从出生地新英格兰可稳稳获得114票，从东北部（密歇根州、纽约州、特拉华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俄亥俄州）可再获得265票；从农业州仅有把握获得36票；从南部各州仅可获得31票；从山区各州的净得票数是61张；从太平洋沿岸可获得28票；从边境地区还可获得分散的12票。总之，他可以赢得的公开确认票数是550张。

除了这些票数，还有一些选票去向尚不得而知。3个原住民州的情况比较微妙：艾奥瓦州（26）、堪萨斯州（21）、明尼苏达州（31）。接着是4个大州，这几个尚存疑问的州将决定他是否功亏一篑：伊利诺伊州

（69）、宾夕法尼亚州（81）、加利福尼亚州（81）以及新泽西州（41）。在这些州，总票数达到了350张——远远超过了被提名票限。在每个州，肯尼迪都赢得了保证、承诺、希望和朋友。他曾在这些地方辛勤耕耘，就是机会均等的话，他也能获胜。但在代表大会召开和各方力量协调整合之前，他或任何人均没有办法确定最终结果如何。

除了6月初在参议院大厅举行了一场关于外交事务的演讲，外部世界的大事对于新闻读者而言好像发生在遥远的月球，也根本进入不了约翰·F·肯尼迪的考虑范围。5月，他收到访问英国并发表几场演讲的邀请，当时他草率地认为这次邀请是为候选人资格赢得国外尊崇的良机，后来还是拒绝了邀请。他的首要目标是代表大会，最主要是争取代表支持。别人愿什么立场就什么立场吧，他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要争取更多的代表支持，要事第一。

无论是谁来竞选总统，他都无法决定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真正能决定这些的是美国以及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无论出行还是休息，肯尼迪除了不断寻求代表支持，其实在私下里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我曾随着肯尼迪最后一次到美国西部——这次航程两天两夜，首先去艾奥瓦州和蒙大拿州，然后返回马萨诸塞州。6个月的竞选活动令他非常疲惫，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边缘；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此后与共和党之间的对决之战就要打响。坐在空荡荡的飞机后部，同行的还有几位他信任的朋友。他任由思绪纵横驰骋，大脑想到哪里，思绪就跟到哪里。其知识面和观察力的范围、广度、深度以及细节令周围的听众惊叹不已。

在一个晴朗、炎热和阳光灿烂的上午，他拥抱了妻女之后，从海恩尼斯港机场出发，将前往艾奥瓦州与大会代表会面。他边离开边思考着艾奥瓦州，同时认真研究路易斯·哈里斯对艾奥瓦州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有人问艾奥瓦州州长洛夫莱斯（Loveless）是否可以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他做了回答，然后开始仔细研究民主党内所有副总统可能人选的性格。他们的名字好像和弦一样——奥威尔、休伯特、赫谢尔、盖洛德、亨利、克莱尔、赛明顿、阿尔伯特，等等，他好像在安排戏剧角色，每个名字都附带一个三言两语的性格简述，每个描述旁边都有一个大笑或轻笑的笑脸。他的思绪从民主党的可能人选，到副总统职位的性质，再到尼克松先生的性格，最后到洛克菲勒先生。（他认为，洛克菲勒先生是一个劲敌。）

当时，他态度坦诚，话锋犀利，言语不留情面；和我们轻松一阵以后，他接着开始看报纸，每次浏览好几个栏目。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的专栏吸引了他的眼睛，他不禁好奇地再次研读一篇有关林登·约翰逊的专

题。以前，他曾认为林登·约翰逊是最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的人选；但现在随着战斗的烽火在胸中燃起，他简短、激烈和刻薄地谈论起这种朋比为奸的行为——史蒂文森–约翰逊–赛明顿–汉弗莱组成的“阻止肯尼迪”统一战线。现在他概览美国的思绪转向纽约政治、边境州政治、山区州政治和农业政治。他谈到了竞选活动，以及无论身在何处，当你与许多成排的人合掌和握手的时候，如何找机会与农民交谈。他喜欢握着农民坚实的手掌。他接着又谈到艾奥瓦州的农业问题，最后注意力转向他正在研究的一份关于农业剩余产品的学术调查。

他下午和晚上两次在艾奥瓦州降落，地点分别是锡达拉皮兹市（Cedar Rapids）和得梅因市（Des Moines），与两地代表均进行了交谈：参加锡达拉皮兹市外面的一次农场野餐会，出席得梅因市的一位电视观众和一次记者招待会。

飞机再次起飞，当翱翔在空中前往山区和蒙大拿州时，他在黑暗中显得神情忧郁。女乘务员给他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汤。随着佐料，他搅拌了一块酸奶酪，轻轻地尝了一口。出行时，在下午和晚上的任何时候，汤是肯尼迪的最爱——对任何汤几乎来者不拒：鸡汤、西红柿汤、豆汤，以及（如果在海恩尼斯港有人提前为路上准备好的话）他最喜爱的新英格兰蛤蜊浓汤。喝完汤，他闷闷不乐地盯着黑漆漆的窗外；一道闪电划过远处的夜空，随着闪电炸响，下面连绵不断的落基山脉清晰可见，飞机也上下颠簸着。他弓起一条腿，下巴放在膝盖上，然后将椅子从窗户边后退，转向旁边的朋友。

这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飞机不停地上下颠簸，不知正飞经何地的上空。他喝完了汤，此时早已把艾奥瓦州和农业问题抛之脑后，但没有想到蒙大拿州。他此时的思绪飞到了另一个境地。

话题是关于赫鲁晓夫的。说完尼克松，接着就谈到了赫鲁晓夫。他也想到了柏林。他现在谈到柏林时语调缓慢，好像在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思路。然后，他说到了中国。现在他不断就中国提出问题，问题又快又尖锐，令对话者应接不暇。中国在1945年和1946年是否本来有可以挽救的机会？他提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话者正试图回忆遥远的中国重庆在1945秋天所做的一系列决定，肯尼迪突然插进问题：谁做的这个决定？什么时候？谁负责指挥决策？为什么指挥决策没有执行？周恩来这个人怎么样？毛泽东呢？

“二战”之后不久，在法国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于1947年提出美国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问题，以及在拉马迪埃(注)内阁领导下干预当地共产主义者活动的建议。肯尼迪希望知道当时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其实施效

果如何。然后，其思绪又跳到了国务院及其人员；他提到了几个名字；显而易见，他很熟悉该部门的所有运作方式——虽然他在深夜正乘机飞经艾奥瓦州与蒙大拿州之间某地奔波在奔赴民主党提名的旅途中，但角色俨然变成了总统。他不断询问、征求意见，问题一个接一个：总统是否应该出席首脑峰会？个人外交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是否是一种有效技巧？艾森豪威尔在最近的全球之行中已释放了多少善意？美国总统出国是否过于频繁和随便了？他深入思考着这些问题，突然飞机颠簸起来，一道闪电照亮了群山。他扣上安全带，身体又转向漆黑的窗户，静静地注视着下一道闪电照亮远方的大好河山。当他重新从沉思中走出来的时候，飞机已降落在海伦娜机场（Helena Airport），时间正值晚上一点钟，他的身心已到了蒙大拿州：海伦娜的先遣助选人员是谁？谁负责安排相关事务？

次日早上6点30分，他就起床、接听电话和听取报告。他在酒店房间吃了早餐，然后接见了蒙大拿州政界人物，一起谈论政治，共进午餐，当蒙大拿州代表大会举行时，为蒙大拿的同僚们鼓劲儿打气。蒙大拿州仅有17张票，不过非常重要。当蒙大拿州的代表们在对面的马洛剧院举行会议时，他在普拉塞尔酒店已安顿就绪，中国、柏林和法国等问题此时都已抛至九霄云外。他现在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正率领着军队向林登·约翰逊的后方发起突然袭击。

外面，蒙大拿的绵延群山在初夏的沐浴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6月的日子里，碧空如洗，松树和冷杉高耸入云，树身散发着微微的光辉；蒲公英飘飞播种的季节刚刚过去，漫山遍野的雏菊、报春花、蓝铃草、黑眼苏珊、紫色羽扇豆灿若群星。但肯尼迪没机会出去欣赏旖旎的风光，他不厌其烦地做着宣传，希望这个山区州府那些理性善良的民主党人能够认真选择美国最合适的总统（斯图尔特·赛明顿当天也在那里，约翰逊团队的选举现场指挥也在此地）。他向这些民主党人讲了一位加利福尼亚州代表的故事，这位代表不能确定谁是最佳候选人。（这位加利福尼亚州代表说："我只能说，在不能确定而最终做出决定时，我会对选择痛苦不已。"）他也讲了马萨诸塞州代表团参加1924年民主党大会时的故事，当时人们眼看着大会慢慢走向104轮表决，会议经费也快用光了；马萨诸塞州主席随后将代表们召集在一起说："先生们，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我们搬到一个更便宜的酒店，要么选择一位自由派候选人。"

晚上，他与代表共进晚餐并发表了一个简短恳切且意味深长的讲话，其间谈及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西部做出选择的重要性，以及西部总体上的重要性。（他引用马萨诸塞州另一位政界人物梭罗的一句话说："向东，我将全副武装；向西，我将自由轻松。"他接着说："这就是我来蒙大拿州的原因。"）晚餐结束，已是晚上9点钟，他顺利完成了谋划已久的参会步骤。现在所有代表已经选定，他准备乘机返回马萨诸塞州休息10天，直至大会

召开。

在机场登机时，夏日刚刚在群山后面落下。大山的空气很是干燥，机场依偎在落基山脉的怀抱中，群山呈紫灰混搭的色调，看起来清新明快且近在眼前，令人感觉触手可及。遥望山顶，可以欣赏到落日散发的金色、淡紫色、粉色和红色交融的粲然光芒。他现在很疲劳，双眼困倦不堪，动作虽不失优雅但略显缓慢。几位也很疲劳的同行人员为了不打扰他，没有靠近他坐着；他又慢慢地喝了一碗热汤，精神焕发地坐起来，环顾下四周，好像要找人说话。

交谈是在突发的怒火中开始的。那天晚上，一份纽约的报纸报道说，一位东部州长声称肯尼迪承诺给他一个内阁职位，交换条件是他在代表大会给予肯尼迪支持。[注]肯尼迪虽火冒三丈，但依然保持冷静。精确地说，肯尼迪生气时，就像老师生气一样。他说，以承诺给任何人联邦职位为条件请求帮忙是违反联邦法律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事实也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永远不会发生，这不是正当的政治运作方式。人们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随后有人提到那天在海伦娜市看到的一件事：他写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在市内最好的一家书店（苏珊·埃克小姐经营的一家出色书店）已售罄。这条消息令人欣慰，他开始谈论书籍。现在话题转向其文学经历，显而易见，他喜欢谈论这类东西；接着又探讨了历史写作和美国历史。有人提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Simon Cameron）时，引用了林肯关于卡梅伦说的话，肯尼迪对引述做了纠正，然后谈论其他的历史片段。比如他曾经那么喜欢丘吉尔撰写的马尔伯勒[注]历史，肯尼迪愉快地引述了丘吉尔就其了不起的祖先所写的含有嘲讽意味的一段话："年轻时，他喜欢金钱胜过情感；年老时，他喜欢金钱胜过名誉。"他问我们是否有人曾阅读过他刚刚读过的一份出色历史报告——西奥多·罗斯福就爱德华七世的葬礼所撰写的历史报告。他将美国过去的历史学家——知名的和默默无闻的列举了一个遍，心中好奇现代历史学家是否因为像我们一样看到了"配上灯光"的美国历史舞台而了解或好像了解得更多，从而显得更优秀呢？

谈话内容从马尔伯勒和历史写作到阿德莱·E·史蒂文森的性格，再到美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接着对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在美国生活中的现状进行了长久、慎重且全面的探讨。后来又谈及美国黑人、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对领导地位的追求。某某是否真的控制着哈莱姆[注]？某某真的如报道的那样喜欢研究历史吗？抑或不过是个传说？他们再次谈到了中国。随后讨论了他在关于1946和1948年的中国大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还就由于无知而当时公开诋毁和伤害现已知无辜的一个人，向在场的人们表示道歉。

飞机一直在夜色中向东飞行着，时间慢慢过了午夜时分。他又要了一碗汤。两位助手已筋疲力尽了，在飞机后部睡着了，与其交谈的两个人俯下身子靠近他。他说话时，不时将头顶的灯光关闭。当某个谈话人回应时，为了观察对方表情，他不安地又打开灯光。必须睡觉的时间到了，一天的紧张已经远去，他走向飞机后面套房的两个铺位，关上门，准备在旅途中睡觉了。

黎明时分，飞机在科德角上空降落，科德角的6月天气特色鲜明——冷热温差很大。6月的早上，大西洋的空气裹挟着咸味儿吹过来，令人们措手不及，此时我们还没有从昨天晚上蒙大拿州以及山区空气的记忆中走出来。肯尼迪独自下了飞机，走向机场另一边等待他的一辆汽车，然后乘车独自回家了。

我下次再见到他是10天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当时正值代表大会召开前夕。3 000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挥舞着旗帜，乐队演奏着音乐，姑娘们高声尖叫。他那天稍晚在洛杉矶走下飞机时，爆发的人群令他措手不及。我记得洛杉矶的警察立刻淹没在人潮中，有个穿棕色西装的高大男子使劲推搡着穿过人群冲向肯尼迪；说起来，洛杉矶警察不知是否算得上全美国最果断勇猛的，但起码属于最高效的一支队伍。这位棕色衣服高大男人一把抓住了约翰·F·肯尼迪的西服翻领，一时间我还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问候方式，接着才意识到这个人也许是个疯子。洛杉矶警察早就意识这一点，在我察觉到危险之前，他们已迅速窜入人群，毫不留情地将这个人疯狂挥舞的胳膊从肯尼迪身上拽开。自那以后，他不再单独出现在公共场合或独自相处——他是可能成为总统的人。就此而论，不仅仅涉及其本人，由此安排保护措施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这是10天以后的事儿了。在这10天时间里，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

1. 柏林封锁（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苏联封锁西方占领区通向西柏林的通道而引起的国际危机，首次造成了人员伤亡。——译者注

2.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译者注

3. 从西弗吉尼亚州开始，初选均一边倒地支持约翰·F·肯尼迪。3月8日，他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我们知道，威斯康星州也被拿下；印第安纳州胜

利毫无阻力；5月10日，他在西弗吉尼亚州以优势获胜。在赢得西弗吉尼亚州的同日，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选民也投票支持他。马里兰州于5月15日星期五正式授权；俄勒冈州——初选竞争的最后一站，于5月20日使他以60对40的优势战胜当地对手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无论这一事实承载着何种意义，政治研究者们不会忘记约翰·F·肯尼迪在7个州拔营夺寨勇夺民主党提名，而理查德·尼克松在后来的11月选举中仅为自己拿下了5个州。

4. 史泼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由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史泼尼克一号卫星开始，是冷战的转折点。当时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上居于领导地位。美国曾经在史泼尼克一号发射前尝试过两次试射人造卫星，但均告失败。史泼尼克一号的成功令美国芒刺在背。此后太空竞赛展开，美国公布阿波罗计划并于1969年登陆月球。——译者注

5. 福摩萨（Formosa），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外国人沿用的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台湾省的称呼，有殖民色彩。 ——译者注

6. “善恶决战战场”（Armageddon），《圣经》中记载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者注

7. 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William McCormick Blair），后任肯尼迪政府的驻丹麦大使。

8. 牛顿·米诺（Newton Minow），后任肯尼迪政府的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9. 波托马克河（Potomac），（比喻）美国联邦政府。——译者注

10.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年3月19日—1925年7月26日），美国政治家，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颇有吸引力的演说家。1896年、1900年、1908年3次竞选总统均未成功。他是思想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代表。——译者注

11. 汤姆叔叔（Uncle Tom），美国女作家斯托1852年发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旧时有时用以指想讨好或侍奉白人的黑人男子。——译者注

12.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在1958—1960年再次堕入混乱平庸的常规模式差不多完全是因为州内最优秀的青年为了加盟和参与肯尼迪的全国性总统竞选活动而脱离政党。

13. 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耶稣的）山上训诫（其内容构成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译者注

14. 瑰西园（Gracie Mansion），纽约市长官邸。——译者注

15. 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1888—1961），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7年1月—11月）。——译者注

16. 后来该州长没有得到任何内阁职位。

17. 英国的伟大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1st Duke of Marlborough）约翰·丘吉尔的直系后裔。——译者注

18. 哈莱姆（Harlem），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东北部的黑人聚居区。——译者注

第6章

洛杉矶的会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每一次的全国党代会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宇宙，每次都有不同的引力中心，新浮现出一批英雄和傻瓜，自行消解压力和困扰，自带扑朔迷离的舞台和氛围。

洛杉矶就是1960年民主党大会的舞台。7月第一周，当代表们开始齐集这里，洛杉矶献出了最好的一面。烟消雾散，蓝色的天空一天比一天延伸至更远的地方，就像19世纪一样柔和与澄澈，那时候工业和汽车还没有用废气污染这个城市。

城市中心交通拥挤，酒店扎堆，全国党代会通常会把大家聚集这些酒店里，因为住得近，代表们常常都聚集在咖啡馆、酒吧、人行道和大堂。在每天熙熙攘攘的喧嚣中，他们互起摩擦，小冲突不断，窃窃私语，说长道短，打压和缠斗，直到夏天的热浪、绷紧的神经和日益紧张的态势让他们的情绪临近沸点，迸发出来的就是最后的决策。但是洛杉矶很大，代表们散落在这个大都市的各个地方，他们下榻的酒店都落在35英里长的棕榈大道上，他们就待在酒店里。他们散布在洛杉矶广阔的地界上，不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应付高速上疯狂的交通，大部分人也不愿意花5美元到10美元打车从一个集散中心去到另一个。1960年的民主党代表就这样变得支离破碎。[例如，从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在帕萨迪纳市（Pasadena）的总部到纽约州代表团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总部，打车需要15美元，这就打消了两个有着传统友谊的代表团随意拜访的想法。]他们就以州为单位，在分配给自己的酒店里召开党团会议。不开党团会议的时候，他们就闲散地打发时间，完美的天气、棕榈树下的酒店游泳池散发着诱人的气息，有时他们会带着妻子和孩子去迪士尼（在全国党代会的两周期间，迪士尼比洛杉矶所有夜总会加起来的吸引力还要大），或是去享受好莱坞影城的热情好客。国宾大酒店有巴士通往好莱坞，满足代表们想一览电影世界的心愿。

大会虽然分散，但还是有其神经中枢的，这也是必需的。当年的神经中枢就是比特摩尔千禧酒店（Biltmore Hotel），黄褐色建筑，宏伟典雅的旅店，有11层楼高，坐落在潘兴广场（Pershing Square）的长方形绿化带上。退休的老人、流浪汉、消磨时间的人、激情四射的自由演讲人都把潘

兴广场当作他们在洛杉矶的永久露天总部。比特摩尔千禧酒店不仅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宏大电视网络的总部、所有主要参选人（肯尼迪、约翰逊、史蒂文森、赛明顿、迈纳）的总部，这里也有疯狂的记者团，住着数百名记者、官员和曲意逢迎的人。比特摩尔才是制造新闻的地方。

7月第一周，随着4 509名代表和代理人以及4 750名媒体代表中的第一梯队、数百名党内官员和参选人的数千名工作人员开始抵达，大会开始发酵[注]。两支敌对的波多黎各代表团列队穿梭在比特摩尔千禧酒店的大堂，用钢鼓和吉他演奏音乐，穿着拉丁服饰跳舞。这里飘荡着美丽的姑娘，穿着红白蓝的条纹制服裙，戴着宽檐帽，都分不清谁是谁。她们引诱代表们，咯咯地笑着，扭动着腰肢，无论谁在她们的总部徘徊一小会儿，都会被她们别上徽章。她们给林登·约翰逊送上太妃糖（他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空运了半吨太妃糖过来），给斯图尔特·赛明顿递上百事可乐，给乔治·斯马瑟斯送上橙汁，给约翰·F·肯尼迪的总部送去咖啡、电影和小面包。素食者党总统参选人，美国陆军退役准将詹姆斯·A·霍尔德里奇（James A. Holdridge）的传单也散落在这里，他宣称1960年的选举违反了宪法，因此无效。晚上，外面有唱着赞歌的洛杉矶人游行，他们身上挂着广告牌，上面写着（白色背景板上，平淡的红色印刷体字）：多多祈祷，基督徒。我们想要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是一个来自罗马或者苏联的统治者。

这些都被电视摄像机拍下来，呈现给全国观众。电视能表现事件、行为、动作、抵达或离开，但不能呈现思想、静默或决定。所以电视摄像机捕捉的是大会狂欢的外衣，盛况空前，姿态十足：穿着夏日洋装的姑娘，乐队和音乐，轻生的人试图从酒店楼顶跳下来，每一位主要候选人的休息室里都招待着来自摇摆州游移不定的代表。电视摄像机就像一块磁铁，吸引南加州的人涌入比特摩尔——一些好奇的人就是想出一下镜；一些小商贩想借机在全国观众面前露一下商标，做个即时宣传；散落在城市各处酒店里的政客们来寻求60秒的全国瞩目；孩子、母亲、骗子和公民学生，你推我挤地蜂拥而至。（在拥挤的史蒂文森总部，新闻记者大声向史蒂文斯的公关要新闻时，一个壮硕的母亲在前开路，带着羞怯的男孩儿挤过去。她硬拉住人群中不堪重负的记者，指着她的儿子说："你看，他是他们高中校报编辑，他就要采访史蒂文森了，听见没？他有采访机会了，我知道史蒂文森先生会接受采访的。"）

还有一些是带着特殊要求而来的：好公民团体要求大会拯救密歇根湖的沙丘；效率专家呈上重振行政部门的计划（通过立法，每个政府部门在年底自动解雇效率最低的10%的人员）；黑人领袖坚持要求此次大会记录在案，内阁当中要有一名黑人；等等。当7月的第四个周末结束时，飞机载着数千名乘客陆续抵达。代表们像解封了一样，给他们的领袖打电话，然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漫无目的地游荡，就不自觉地到了比特摩尔。代表们

和观光游客挤在一起，几乎要把大堂挤爆了。警察在警戒疯狂的记者团，防止他们闯入；结果记者团的人越来越密集，像浓稠的岩浆一样，缓缓地打转。人几乎动不了，只能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空隙里渗出来，最后终于在楼道完全失控，电梯组的8个电梯门全部打开，载人上到参选人的总部。在那里，他们的一些问题或许能得到回答。

代表们是迷茫的。如果说大会上有任何情绪，那一定是迷茫。他们都是陌生人，他们都在家乡州经过政治斗争或是长期奉献才赢得这份权利，到洛杉矶选择一位总统，代表们都郑重其事。这次大会比我记忆中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大会都要持重。另外，这也是一次令人忧心的大会。在整个洛杉矶，从东边的帕萨迪纳到西边的比弗利山庄，大书店的图书销售情况是这样的：肯尼迪的《和平战略》（*Strategy of Peace*）售罄，史蒂文森的《分清主次》（*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售罄，肯尼迪的《当仁不让》售罄。［在好莱坞，皮克威克书店的报告说布兰沙德（Blanshards）的《美国自由与天主教权力》（*American Freedom and Catholic Power*）也售罄。］

代表们担忧的问题五花八门。不过，他们出现在洛杉矶的方式很有代表性。几乎所有东部海岸的代表都是乘坐新式后掠翼喷气机飞过来的，这种飞机只要5小时就可以横跨美国大陆。4年前，想要飞洛杉矶，就得搭乘现已淘汰的螺旋桨飞机，可能要花上9小时到11小时。无形中，美国大陆缩小了一半。美国自1956年以来缩小了很多——美国周围的世界也缩小了很多。空间本身也在缩小，因为人造卫星现在正绕着遥远的月球轨道运行。就算代表们不知情，他们应该也嗅到了，在地球的另一端，把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设定为打击目标的核弹头导弹已经就绪，随时可以发射。

还有，他们无法忘记，世界对美国的包围圈不断收紧：越来越小的世界，日新月异的世界，充满挑战、骚乱和共产主义的世界，是所有演说的中心思想。所有的演讲人——在党团会议，在电视上，之后在大会上——都抓住这个主题，反复深入延展，直到整个大会变成充满焦虑的絮叨，笼罩在重复冗余的迷雾中。任何时候想要竖起耳朵，从这些絮叨中听到关键词，重复的措辞在模糊的世界里发着微光："这个世界，一半自由，一半奴隶"…… "我们守护自由的城墙"……"人们等待我们去领导"…… "技术革命"…… "距离赫鲁晓夫桌子上的发射钮按下只有25分钟……"等等。到了周一晚上，主旨演讲人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开始定调的时候，他要说的话却都变成了陈词滥调。

变成陈词滥调也是很好解释的。在洛杉矶，代表们通过读报来了解传闻、小道消息或是外界对他们的反应，而报上的头条却在勾勒一个比大会更大、更危险的的世界，不断敲击他们的心。大会前的星期四早上，报纸头条是：古巴蔗糖消失。下午头条是：赫鲁晓夫威胁奥地利。星期五，非洲

很混乱，数千名白人惊慌逃离刚果就是当地的头条。苏联击落美国飞机的报道讲的是星期一大会开幕的那天RB–47的命运。当代表们在权衡自己即将投下的选票时，洛杉矶《镜报》出了一个通栏标题：赫鲁晓夫警告，美再增派间谍飞机将引爆战争。

在关于未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民主党并不分裂，因为4个星期后，他们将与共和党就此开战。他们达成默契，在外交和国防问题上团结一致。令他们产生分歧的是历史问题，搅动他们情绪的是美国从哪里来，而不是美国向哪里去。他们的分歧包括白人与黑人的关系，对待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态度。最重要的，他们在领导人的问题上不一致——谁值得信任？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什么样的个性才能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游走，游刃有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错中，选举的本质第一次彰显出来。

短短数日之内，媒体共同观察的结果敲出另一锤重音，这个观察的过程也很奇妙。从声音和影像，从比特摩尔数百张迷失和打转的面孔，媒体提炼出一个事实，同时也是异常准确的历史性评判：这是一次年轻人对阵老人的会议，这是一代人给另一代人让路的会议，这是——用詹姆斯·赖斯顿非常贴切的表达——见证换岗仪式的大会。

在初选州，普通选民送代表搭上全代会直通车。这些代表也许不比普通选民聪明，但至少年纪比较大。其实大多数州的代表都是由党内领导遴选出来的，要么是长期一心一意为党服务的人，这算是对他们的嘉奖，要么是一些文化、外交或专业领域的翘楚，他们的成就和名声能让代表团熠熠生辉，或者，特别是在组织控制的州，很大比例都是一些捐赠大笔竞选专款的人，他们渴望入选国家代表团，让他们有高度荣誉感和参与感。所以，大部分跻身大会的人，能被委以重任，那都是因为多年来在某些层面取得的成就或做出了贡献。比起这些政治机器遴选的代表，来自初选州的代表往往更年轻，更有朝气，但是他们只是少数。不管怎样，全代会就是一帮长者的集会，平均年龄超过50岁，其中一些人号称参会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提名的时代，而且中间从未间断。在维持美国政治延续性上，（两党大会的）代表们和国会一样功不可没。

这些长者最先反思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从他们忧郁的面容就可以看出来。比特摩尔的大堂里会有一些前政要飘过，比如詹姆斯·法雷（James Farley）、汤米·科科伦、斯科特·卢卡斯（Scott Lucas）和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但他们现在都不是重要人物了，像幽灵一样出没在曾经由他们主持的宴会上。即使是一些时下仍活跃的政客，像卡迈恩·德萨皮奥和迈克·普伦德加斯特，作为纽约大而无力的代表团领袖，看起来也是到了力不从心的年纪，惶惑，还有些茫然。第一天，他们几乎是手挽手踱过比特摩尔的大堂，好像害怕在这个阳光城市和无法融入的陌生人大拼

盘里落单，然后退回到国宾大酒店游泳池旁的躺椅。大会开幕，萨姆·雷博恩出场时照样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埃莉诺·罗斯福出场时响起温暖热情的掌声，阿德莱·史蒂文森初次现身，会场更是一片激动的掌声。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些掌声不仅是献给他们个人的，也是献给熟悉的过去，一个更安全、更辉煌的过去，他们是过去的象征。即使是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这样在美国赢得赫赫声名又在纽约政治派系斗争中挥霍掉的人，在提名排位上升到仅次于约翰·F·肯尼迪的时候，人们也报以真挚的热情。在这一刻，在洛杉矶，在这个大时代里，似乎只有哈里曼在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胜利跳脱出来，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所有民主党过去的辉煌人物里，只有哈里·杜鲁门缺席。直觉告诉他，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不愿意现身在年轻一代的浪潮里。

在历史的长河中，美国政治很少见证这样尖锐的决裂。历史其实有过惊人的相似。19世纪50年代，克莱–卡尔霍恩–韦伯斯特（Clay-Calhoun-Webster）一代淡出舞台，即将发动南北战争的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19世纪90年代，南北战争中年长的那个梯队最终折损在时代里，国家领导力从控制战争的指挥层传递给麦金利（McKinley）这一梯队的人，麦金利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州志愿军。而现在，民主党也在上演类似的剧情（虽然没那么明显，但其实1960年的共和党也是一样）。

要观察这种转变，最佳位置就是比特摩尔千禧酒店的8300侧翼最远的拐角处。第八层的8315房间是一个4室套间，是肯尼迪的行动指挥站。4个完全放松的年轻人从8315房间环视了他们周围的人群和混乱，从容不迫，指点江山。他们的年龄是最大的看点。其中一间房里住的是首席幕僚罗伯特·肯尼迪，战争时期是一个普通的水手，现在才34岁。另外一个间房里住的是肯尼思·P·奥唐奈，战争时期的轰炸领航员，现在只有36岁。第三间房里住的是皮埃尔·塞林杰，有19年操控扫雷舰经验，参加过战争——现在才35岁。4人里面最年长的是劳伦斯·F·奥布赖恩，43岁，成熟威严的年纪。待在比特摩尔一楼的是肯尼迪团队较年长的梯队——约翰·贝利，55岁，亨利·拉斯金，51岁。他们周围是几千名打转的人群，以及游荡在各总部之间迷失的代表。代表们听各位候选人兜售理想，询问候选人问题、誓言和承诺。但是，在楼上坐镇指挥的是新一代。其中一个年轻人对我说："你知道吗？老前辈们害怕我们。我们得有一些像贝利和拉斯金这样年长的人在楼下和他们周旋，给他们安全感。"

幸运的是，大会期间，我被分配到8300侧翼的一个房间，毗邻肯尼迪的指挥站。在大会那一周后期的一个早上，肯尼迪获得提名之后，一个疲惫的年轻现场工作人员来到总部汇报工作，飘进我的房间，躺在沙发上休息。他躺在那里，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吗？我过去以为，战争时期，在美国本土工作的人比我们领先。我们身处海外，那些年都落伍了。在美国的

人就超前了。现在我为那些年长的人感到难过。我想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怎么做事，我们学会了将军们不太能理解的做事方式。他们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我们要自己想办法组织起来——消除繁文缛节，准时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扔掉规则手册。我们学会在一起工作而不发任何牢骚。几天前，他们试图把这里的规则变得不利于我们，没有人抓狂或是激动。拉里对肯尼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人聚集到规则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肯尼说：‘我想你是对的。我会把他们召集起来，传达这个指令。’就这样。没有会议或计划。我想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那样做事，对于永远没有学到的老前辈，我替他们难过。”

大会期间，要论起谁掌控局面的话，必然是8315房间。

如果还有谁能挑战他们的控制权，那就是第二个年轻人的团队——史蒂文森的领导团队。从比特摩尔穿过广场，对面废弃的派拉蒙大厦里就是他们的总部，不过考虑到要接待代表，他们还是在比特摩尔的夹层里留了一个两房套间的据点，里面拥挤不堪，人满为患。

所有其他参会的人——赛明顿领导团队在6300侧翼，约翰逊领导团队在4300侧翼，还有一些不那么受追捧的人在比特摩尔或其他地方。这出竞选大戏由两支优越的部队主宰，他们就在这出戏剧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一天，流言四起，代表们在比特摩尔挨个房间走访，再回到自己的酒店；问题、困惑、怨恨、喧闹和骚乱越来越多——只有身处8315的肯尼迪年轻团队和史蒂文森的朝圣团队领导层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他们在决斗。

8315房间对形势的掌控精准、有序、缜密——同时又像一支退伍军人作战部队一样率性而为，血染沙场之后，这支部队对自己的内部架构和技能勇气有了更深的了解。春季初选战之后，肯尼迪战区指挥官们都是久经沙场，他们在大会前的那个星期六全部抵达了洛杉矶。令他们如虎添翼的，还有来自马萨诸塞州代表团的大约12名年轻人，都是肯尼迪组织在去年春天亲手挑选的，这是一批有品性、镇定、有政治悟性的年轻人。选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大会的舞台上进行运作。现在，轮到他们上场了。大约有40名代表团负责人分别分配到每一个州代表团，他们要去把那些代表团培植成自己人；每个人都拿到一沓姓名卡，上面有州代表的姓名、职业、爱好、孩子、妻子、癖好和宗教，然后分头作战。他们接到指示，如果发现任何代表团有意向转变，要马上向比特摩尔3308房间的一个私人制表总部汇报。在那个总部，从星期五一直到投票日，精确到每个小时都会更新数据，新汇总表格会按时准备好。这些负责人被告知，在这5天里，他们不能睡觉，不能见妻子，不能放松、玩乐或是与8315失联。从星期六到星期二投票日的这5天大会会期中，每天早上9点，他们都要聚集在

8315房间进行员工调查，然后再分散到各自的战场去完成任务。

1956年芝加哥大会上，在基福弗和肯尼迪竞争副总统的投票时，混乱中，肯尼迪团队的楼下助理和楼上指挥官通信中断。肯尼迪团队现在深谙大会时期的即时通信有多重要。1960年，他们在所有的作战部队和总部指挥站之间拉了独立的通信网。肯尼迪分到洛杉矶体育场附近的一座小楼，用作了外联站，这就是后来海恩尼斯港成立的通信控制站的雏形。小楼与大会保持通信，小楼的强化地板下布置了一个直接通信线路网，这些线路联通到一些友好代表团的固定电话（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怀俄明州、罗得岛州）。40个州代表团的负责人里，有8个在大会会场走动的时候随身带着对讲机，方便他们和小楼的通信控制站联络。康涅狄格州州长里比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是会场经理，给在会场走动的40个州代表团负责人安排工作和下达指令。还有另外一个线路网从小楼的控制板连到8315的特别总机，还有一条线连到参议员在好莱坞的私人住所，一条线连到参议员的公开总统套房(注)。

到大会前的周末，对决形势已经明朗，想把史蒂文森推上总统宝座的人和杰克·肯尼迪的团队对成败的决定因素看法一致。

毫无争议的，双方都认同，约翰·F·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中会稳拿600票：114票来自6个新英格兰州；另外265票来自6个东部地区的工业州；还有36票来自农业州；另外31票来自4个南部州；另外最少还有61票来自8个山区州（得益于5月和6月的奋力一搏），还有40票来自4个太平洋州；除了这些群集的铁票仓，还有另外50张零散票，会令他得到不可撼动的600票。

剩下还有一些可能增加票数的地区，肯尼迪必须拿到另外160票：两个农业州（堪萨斯州和艾奥瓦州），还有52票仍然支持他们的宠儿州长［乔治·多金（George Docking）与赫舍尔·C·洛夫莱斯］；加上5个意向不明的大州：宾夕法尼亚州，81票；加利福尼亚州，81票；新泽西州，41票；明尼苏达州，31票；伊利诺伊州，69票——总计303票。肯尼迪和史蒂文森的主力军要拼的就是这5个州的忠心和领导层，而他们的散兵突击队要到每个代表团各个击破，争取摇摆不定的公民党员，1个、2个、3个。这些党员认真对待自己将为美国总统选举投下的一票，但做决定的时候却由衷感到迷茫。

想要报道一个自由大会的所有活动，那是天方夜谭。每个州的代表不远千里从家乡汇集到这里，召开党团会议，州内政治、宏大的国家问题以及州领袖的雄心和个人希冀掺杂在一起。主要总统参选人会在各个州的党团会

议间游走，恳求和劝告，敦促和请求，一天出现5次、8次或10次，调整他们的天线，对准各州的特殊波段和关切担忧，不管是小麦过剩、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还是炼钢厂或煤矿失业；总之，主题或目标不一[注]。所以，在每个州，新的伤口被撕开，新的仇恨被播种。这么多活动和党团会议同时进行，想从中理出逻辑是很难的，最好就是聚焦那5个意向不明的大州——各州不同的问题都反映出美国政治画卷上迷人的多元化。而竞争者们也确实是聚焦了这5个大州。

肯尼迪和史蒂文森的战略反映了相同的判断：如果可以阻击肯尼迪并且拖得够久，他在第一轮投票中的优势就会崩塌。肯尼迪组织的效率吓到了老前辈；肯尼迪团队无须做出政治承诺，这一点令大城市的政治领袖感到不快，他们希望有一个依赖他们的总统；险恶的国际政治头条困扰着公民代表，一个总统面对的问题如此复杂深刻，约翰·F·肯尼迪年轻的面孔和嗓音能否镇得住，这一点，他们不得不反复权衡。如果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稳拿700票或750票，他和史蒂文森就无须开赛了；但是如果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持有的票数远低于700票，接下来，他就要面临一场真正的考验了。这里有多少政客（像印第安纳州代表团）在第一轮是被迫投票给肯尼迪的（因为他赢了印第安纳州初选），在第二轮还会支持他？现在史蒂文森力量崛起，在这样的势头下，有多少在春末时候赢下的落基山脉代表会改变阵营？俄亥俄州的迈克·迪萨尔在第二轮还会坚定支持肯尼迪吗？如果还有第二轮、第三轮投票，届时史蒂文森和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会不会联手，从而削减肯尼迪预期从纽约州114票中拿到的100票？

肯尼迪谋士们的策略就是，稳住他们在第一轮投票的优势，再从五大州中拿到一些选票来巩固优势。而史蒂文森谋士们的计划就是，把五大州的票牢牢锁在各州宠儿身上，或是敦促他们投给除肯尼迪之外的任何人。

新泽西州首先被锁住。在这个州，内部政治斗争和国家格局相契合。新泽西州代表团向自己的州长罗伯特·迈纳承诺，第一轮全部41票都给他。约瑟夫·P·肯尼迪通过1960年整个漫长春天的努力，终于为他身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儿子赢得新泽西州北部政治领袖的忠心和选票。但是约瑟夫不动声色的运作同时招致了新泽西州州长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绕过，他的政治机器受到了威胁。如果迈纳对新泽西州松手，大约有30票将归于肯尼迪，剩下的归赛明顿和史蒂文森。但是，一个周末过去，现在迈纳变得很坚定，拒绝松手。

伊利诺伊州第一个解封。库克县政治领袖、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预计控制了伊利诺伊州69票中的55票。戴利曾经是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朋友。1955年，史蒂文森在芝加哥市市长长初选中施展自己在当地的强大影响力，帮助戴利当选。但是整个春天，约瑟夫·P·肯尼

迪都在游说戴利，约瑟夫在芝加哥的房地产利益让他对库克县政治了如指掌。在戴利心中，是过去对史蒂文森的感激占上风，还是现在对肯尼迪的倾斜占上风？还是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伊利诺伊州星期日下午召开了党团会议，采用秘密投票。当门打开时，戴利市长宣布，伊利诺伊州59.5票投给肯尼迪，2票投给阿德莱·史蒂文森，1票未表态，余下投给斯图尔特·赛明顿。肯尼迪首战告捷。

星期一是宾夕法尼亚州之日。这场戏也是围绕着一个人。理论上来说，宾州的81票全凭州长戴维·L·劳伦斯说了算。劳伦斯是一个头发灰白的退伍军人，他在美国政治中实现华丽转身，从政治领袖转型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公职领导人。戴维·劳伦斯在过去8年对阿德莱·E·史蒂文森的尊敬和喜爱已接近仰慕；所有国家政治圈的人都知道，他的喜爱之情还在。肯尼迪的战略分析师小心行事，尊重劳伦斯在宾州的政治权威，就像他们尊重威廉斯在密歇根州的权威一样，他们没有在宾州成立自己的组织来对付宾州州长。但是在宾州东部，能干的费城国会议员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同时也是费城的政治领袖，在早春的时候就开始煽动代表们支持肯尼迪。劳伦斯无法忽视来自格林的压力，以及肯尼迪在宾州初选中获得的大量自发补名选票，当时结果令人震惊。劳伦斯会让宾州代表自主投票吗？若如此，宾州的81张选票就会被肯尼迪和史蒂文森瓜分，这81张选票的效用就会降低。或者像他这么精明的政治领袖会选择把宾州的全部选票压在一个人身上，实现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会压谁？

劳伦斯是一个谦谦君子，也是美国政治中最沉默寡言的领导人之一。7月9日星期六的晚上，他一抵达洛杉矶机场，约翰·贝利就在机场迎接他，开着自己的车把这位宾州州长送到比特摩尔，一路上都在热切地给他灌输肯尼迪的事业。贝利竭力让州长接受了肯尼迪的邀请，第二天早上11点进行私人会面。肯尼迪和劳伦斯在比特摩尔单独商谈了半个小时，没有发布公告。入夜后，戴维·劳伦斯悄悄开车到8英里外的比弗利山庄酒店，拜访他很仰慕的阿德莱·史蒂文森，两人谈了两个小时，一直持续到午夜后很久，也没有发布公告。直到星期一，劳伦斯的决定才公之于众。星期一十一点半，宾州党团会议在帕萨迪纳市结束，劳伦斯州长宣布：宾州64票投给肯尼迪，8票投给史蒂文森，余下票都分散了。毫无疑问，现在肯尼迪的总票数已经超过700，胜利在望。

还有两个意向不明的州——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明尼苏达州只有31票——但明尼苏达州在大会的影响力是全国性的。现在洛杉矶仍然有几百名代表和代理人在游荡，在不同候选人之间游走和询问。他们身负公民托付，感到责任重大，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明尼苏达州代表团，一个良心队伍，可以给他们树立榜样。休伯特·汉弗莱已经解封家乡州所有忠于他的选票，让他们凭良心投票。但是，良心会给出何种

指令？是史蒂文森吗？他国际经验丰富，看起来是应对大事件挑战的最佳人选。还是肯尼迪？他把自己的目标直接摆在民众面前，他在全国7个州的初选中获胜。谁才是最佳人选？他们是否应该听从G·门嫩·威廉斯的恳求支持肯尼迪？还是听埃莉诺·罗斯福和赫伯特·莱曼的？他们生动地阐述史蒂文森的目标，引人共鸣。明尼苏达州代表团在星期日、星期一（两次）和星期二（两次）举行党团会议，还是没有做出决定。结果，一直很团结的明尼苏达州民主党领导层分裂了——州长奥维尔·弗里曼(注)将提名肯尼迪，年轻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将提名史蒂文森，而他们的领袖休伯特·汉弗莱尚未决定。

截至星期二，史蒂文森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州的分歧甚至比明尼苏达州更大。在大会前那个漫长的周末，州长埃德蒙·G·布朗（Edmund G. Brown）对代表团的控制已经崩溃。此前18个月里，一系列愚蠢的政治错误已经把1958年选举（获得100万票）赋予他的权威消耗殆尽。现在，在洛杉矶，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在对肯尼迪的承诺和对史蒂文森的喜爱之间被撕裂。他还知道，此前为他胜选而筹谋和工作的公民党员里，已经同时有几波反叛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布朗主持了一系列加州党团会议，但他的控制越来越不稳定，终于，在7月12日星期二的晚上，加州的选票公布，分歧巨大：30.5票投给肯尼迪，31.5票投给阿德莱·史蒂文森，其余票分散。这是第一次（尽管太迟），史蒂文森团队有了可供谋划的一笔选票。他们的最后一搏，姗姗来迟，没有领袖，但很强势，终于开始见效。

他们的努力激起了什么浪花？是什么影响了加州人？想要了解这些，就得从比特摩尔、从酒店党团会议室离开，驱车前往体育场看看；在那里，周一晚上大会开幕。新场馆的玻璃窗格和瓷砖闪闪发亮，在大会的第一天，入口处似乎聚集了所有南加州的政治怪人，在那里迎接代表。

一个示威者的海报上写着“投票支持禁令”；他身后有一个女士拿着横幅，上面写着“现在就要自由”。还有一个巨型标牌上写着“警告：我们作为个人和一个民族已经惹恼了上帝，我们要摈弃充满罪恶的方式，向耶稣基督和《圣经》求助”。

另一个标牌上写着：“救助马恩岛”，还有一个标牌上写着“废除《麦卡伦–沃尔特法》”(注)。

还有标牌上写着“支持杰克”，“废除种族隔离，现在”，“只有耶稣能拯救我们”，“取缔死刑”，“为生命而行”。

代表和参会的人穿过室外的“欢迎礼”，陆续进入场馆，坐下，开始聆听开

幕致辞。大会开始后约一个小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

简单调查过后，我们知道外面已经大变样。会议大厅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声叫喊。年轻人和老人，男孩儿和女孩儿，丈夫和妻子，推着婴儿车的人，穿着工作服的人，穿着西装的人，一看就是刚离开办公室，还有一些人穿着加州人喜欢的亮色运动衫，紫色、橙色和花纹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游行，包围起来，大声叫喊："我们想要史蒂文森！我们想要史蒂文森！我们想要史蒂文森！我们想要史蒂文森！"

他们带了五花八门的横幅："阿德莱是一个高尚的人"，"阿德莱高尔夫球水平不高"，"智者的选择——史蒂文森！"，"与阿德莱一起走向胜利"，"无出其右——史蒂文森！"，"直面道德挑战——史蒂文森"，"我们想要史蒂文森！"

这哪里是一场示威，简直就是一场爆炸。第一天，整整一个晚上，示威者把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第二天，人数似乎翻倍。数以千计的示威者疯狂、愤怒、呐喊、尖叫，他们喊道："我们想要史蒂文森！我们想要史蒂文森！"他们相互感染，因为人多势众而底气十足，连会议大厅里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带来的震颤。

对政客来说，所有人都代表选票。这些人是坚定的选民还是南加州的疯子？光看外表无法分辨。婴儿车、蹒跚学步的孩子、游行的老人，这些当然是南加州人——不是疯子。其他人呢？数以千计的人，又来自哪里？从多远的地方来？他们代表什么？

星期一是肯尼迪的大日子，星期二是史蒂文森的大日子。加州代表团被示威动摇，星期二下午在压力之下屈服。潘兴广场上，比特摩尔千禧酒店外面和史蒂文森在喜来登酒店的新套房外，示威愈演愈烈——其他代表团开始观望。多金州长和洛夫莱斯州长（堪萨斯州和艾奥瓦州）周末还承诺会支持肯尼迪，现在，受史蒂文斯示威浪潮的影响，堪萨斯州和艾奥瓦州代表团开始反抗他们的领袖，不管他们的州长是否期望如此，他们会在第一轮把票投给自己的州长，造就一个开放式局面，等着看结果。

阿德莱·史蒂文森一贯很冷静、倔强和严谨，但是星期六下午一抵达，他就被大会的喧闹和热情所感染。在他抵达后的星期日早上，当蒙罗尼（Monroney）参议员的行政助理、格外能干和能言善辩的汤姆·芬尼（Tom Finney）向阿德莱简单汇报了为支持他当选而在洛杉矶全面运作的情况时，阿德莱第一次动摇了。之后接连不断地，每个小时都有他的老友来力劝他出山。这些老友是他一手带入政坛的，现在都闯出了一片天。中立的代表和他的忠实拥趸一再等待，希望从他口中听到带领众人的话，都

想知道最终他是否会说：“好的，我们前进。”

星期二早上，陷入困境的明尼苏达州代表团恳求史蒂文森到党团会议上讲话。他向明尼苏达州屈服了。他来到党团会议室，里面满是渴望领袖的代表，随时准备燃烧，准备为他改弦易辙，然后他发表了讲话。但是他拒绝号召他们追随自己。星期二下午，他决定到会场走走，在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位子坐下。走廊里的人和代表们都沸腾了，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掌声淹没了他，他们的热情压得他喘不过气，后来他好不容易逃脱，被安全带到讲台。现在，星期二的午夜，他的助理们在喜来登酒店的拉斐特房间聚集了250名代表和代理人，坚称史蒂文森会从楼上的套房下来发表讲话。第二天就是投票日。肯尼迪团队的领导们坚持认为，即使没有加州的选票他们也能赢，但史蒂文森团队的领导们知道，除了公开宣布会支持史蒂文森的33张加州选票外，他们还持有另外12张承诺会投给史蒂文森的加州选票。有这些选票在手，第一轮结束后，他们就可以随意改变局面——12张保留选票并不算多，但对启动新的趋势非常重要。艾奥瓦州、北达科他州和阿拉斯加州都采取赢者通吃的团体制，而肯尼迪在这些州都有半票的领先优势。堪萨斯州也采取团体制。任何一个代表团里一两票的转向都会令整个州转向。堪萨斯州和艾奥瓦州代表已经在对抗他们的领袖。北达科他州代表那天晚上开会时已经明显分裂，而山地州的代表据说正在一个个改变态度。纽约州代表团的残余力量那天晚上在国宾大酒店开会，重新考量史蒂文森胜出的概率。史蒂文森会来吗？他会领导大家吗？

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在凌晨一点，史蒂文森从他的私人套房下来问候他的新老追随者，考虑公开竞选。第一次，他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因为那些渴望者的情绪直抵他内心，打动了他。史蒂文森对政治的了解丝丝入扣，他完全理解他们的情绪，而现在他就定定地站在现实和梦想之间。他简短而动情地说着，但语意含糊。结尾的时候，他说道，那天晚上，前一位发言人劝他要胸怀大志，这让他想起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一首诗。这样看来，他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他在结束的时候说他不能再与他们待在一起了，因为“树林可爱幽暗又深密，但诺言须守怎能儿戏，想要歇息还需行万里，想要歇息还需行万里”。注

说完这句话，史蒂文森离开了，回到他的套房，思忖他必须做什么。那一刻，史蒂文森的追随者们终于觉得他们有可能得到引领。

在一次大会的发酵过程中，流言就有了事实的力量。有流言说史蒂文森自己也打算提名约翰·F·肯尼迪，星期一，代表们就把这一流言当作事实接受了。星期三，当他们醒来，又有流言说史蒂文森参与竞选，已经决定为提名而战，他们又把这一流言当作事实接受了。到7月13日星期三下午4点，体育场外的示威者已经膨胀到6到8排。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高声呼

喊“我们想要史蒂文森”。一份晚报在通栏标题上宣告：“肯尼迪浪潮衰退。”另一份晚报标题是：“肯尼迪大势已去。”

会议大厅里，提名一个接一个开始。外面的示威还在持续。这是事先策划的示威，一直在无休止地机械重复，枯燥乏味，虽然曾招致群情激动，但令人厌烦的态势已经开始蔓延。走廊里到处可见史蒂文森的海报和横幅。外面，洛杉矶警察呼吁加强警戒，因为支持史蒂文森的数千名示威者扬言要冲进会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拦起来的大门一点一点被渗透，然后就如洪水般涌入。观察家推测史蒂文森的人是怎样把这些示威者塞进大厅的，因为每一个座位都有编号，要凭票入场。有些人被控制造假票，其他人据称是精心策划之下把票偷偷带进带出。（“如果我们也用这种肮脏的把戏填满走廊，”肯尼迪手下的一个人咆哮道，“他们一定会说这是肯尼迪的把戏。”注）但是，现在史蒂文森的人正焦躁地等待着示威，连走廊都跟着颤动了。

当然，洛杉矶大会的高潮还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提名阿德莱·史蒂文森。他用洪亮的声音和有节奏的呐喊慑住群众，与群众互动，问问题并等待群众的回应。麦卡锡在为阿德莱·史蒂文森站台。“不要拒绝这个人，”他恳求道，“不要拒绝这个人，因为他，我们为身为民主党而自豪。不要让这位先知在自己的党派颜面扫地。”

这是一场卓尔不群的演讲，只是语言组织的逻辑有一点儿小瑕疵。因为麦卡锡恳求代表们不要偏信他们接到的指令，在投出自己的承诺票之前，停一停，重新思考一番。但是肯尼迪对新罕布什尔州和威斯康星州、西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俄勒冈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普通选民的选票拥有不可置疑的所有权。他从这个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在乡村的广场，在学校的体育馆，通过自己的演讲和努力，对这些受委托的代表拥有了无可争辩的控制。在赢得选民的信心后，他才开始向东走，到大城市去。有初选中选民的委托在身，他敲打大城市的政治领袖直至他们投降。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变成今天会场上他的盟友——与被他打败的首领一样，变成他最坚定的盟友。恺撒征服高卢后，在接下来的罗马内战中，利用法国骑兵来清除庞培。如恺撒一样，肯尼迪现在正利用大城市的政治领袖来终结史蒂文森。

代表知道这一点，但走廊里的人不知道。在尤金·麦卡锡说完后，会场沸腾了。示威者从各个大门涌进来，蜿蜒行进，叫喊着，鱼贯而入，呐喊着。天花板的金色气球爆炸了，从骚乱的示威群众上头飘过。这帮人大喊：“我们想要史蒂文森。”纸横幅从所有的走道里进入会场视野，上面写着“我们想要史蒂文森”。现在叫喊声变得像鼓声一样，大厅里有节奏地响起回声：“我们想要史蒂文森，我们想要史蒂文森！”会场现在塞满了人，

再也没有人能挤进来了。还堆在走道里的示威者就开始自己的小范围示威，围着走道边缘一圈圈游行，砰砰的脚步声更是提振了叫喊声："我们想要史蒂文森。"一个巨大的纸型球以同样的节奏在人山人海的示威者中上下弹跳。史蒂文森的示威者在经过各州代表团时就扯走他们那个片区的州旗帜。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蒙大拿州的旗帜在会场的人潮中晃动，随着"我们想要史蒂文森"的节奏挥舞。主席请求现场安静；麦卡锡请求现场安静；大会乐队试图用演奏声盖过他们的叫声；灯光关掉；叫喊声还在继续："我们想要史蒂文森。"

在美国政治中，全国代表大会通常会产生这种不加修饰的历史性行为和决定。1860年、1912年以及1952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都有过类似行为。自从1940年共和党费城大会上代表们被"我们想要威尔基"的叫喊声淹没以来，这次的示威是最壮观、最真实的情感表达。但是，如果仅凭示威和噪音就能在国家政治的神经中枢左右决策的话，美国政治就会退化成赤裸裸的暴力，重蹈法国和德国的覆辙。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常常悲剧般地被暴力左右。靠示威为竞选打前站是行不通的，示威只能在竞选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情况下锦上添花。那个下午，在整个史蒂文森团队里，恐怕只有阿德莱·E·史蒂文森自己知道这一点。他的机会悲剧性地姗姗来迟。其实史蒂文森在那天早上就已经回应了这股呼唤和喧闹，而且失败了。尽管会场那些史蒂文森的忠实信徒还没有意识到，但其实史蒂文森的竞选已经在3小时前结束。

在整个1960年大选季，如果说有那么一刻，史蒂文森谋求过美国总统之职，就是那个早上。周三，史蒂文森早早醒来，混乱的示威和周二深夜的会议刚过，他已经做出决定——虽然有违他的意愿——如果他被推着去积极竞争提名，那就要采取点儿实际的行动。尽管史蒂文森厌恶肮脏的政治，但他深谙美国公共生活中的行事方法和人。现实点儿说，就是在会场一定有一个大本营，由这个大本营来积极推动他的提名，把代表派出去寻求支持，就像马萨诸塞州的代表被派出去为肯尼迪寻求更多支持一样。

这就意味着，史蒂文森要有一个大本营——伊利诺伊州。他自然会想到戴利市长，他曾经的朋友。周三早上的某个时间，史蒂文森曾经给戴利打过电话。直觉告诉戴利，那天早上他会接到这样的请求，所以他整个早上都在躲避史蒂文森。下午1点，史蒂文森找到老朋友杰克·阿维，曾经的芝加哥政治领袖。4点，阿维在会场找到戴利，那时候提名已经开始，他坚持要求戴利给史蒂文森回电话，这是对前领袖应有的礼貌。戴利从会议大厅里给史蒂文森回了电话。史蒂文森对戴利说，他听说了伊利诺伊州党团会议的结果（肯尼迪，59.5票；史蒂文森，2票），他想让戴利了解以下的事实：他确实没有谋求过提名；但是他希望自己不会因为一套说辞就被忽略掉；他希望伊利诺伊州代表们这样投票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史蒂文森

不会全心全意、用所有的热情和勇气与理查德·M·尼克松打选战；他点出他是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第一个有希望竞选总统的伊利诺伊州人——在自己的家乡州只得到两票是对他职业生涯的打脸。戴利人在会场，匆匆忙忙地告诉史蒂文森，没有人支持他。史蒂文森问，是没有人支持他，还是因为在代表们的心目中他不是参选人，所以没有人支持他。戴利回答，是没有人支持史蒂文森，就是这样。他本可以就此打住，但他觉得有义务补充一句，1956年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也没有人支持史蒂文森——是他，戴利，靠个人力量把大家团结起来支持他的前州长。

这样一来，史蒂文森当选候选人的希望破灭了，而4小时后体育场的示威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支持史蒂文森的示威者几天后带着悲伤和苦涩离开了洛杉矶。但是悲伤和苦涩都来得太早了。其实，后来史蒂文森因为人品获得了一个他自己更青睐的职位注。作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因子，史蒂文森在美国政坛留下的影响，是其他任何竞选总统失败的人只能望洋兴叹的。他在两党的血液里留下了道德的传播因子，获胜候选人无论在行为和态度上一直都对他抱着无上的敬意，而他的对手共和党人也是如此。

星期三早上，约翰·F·肯尼迪在他位于北罗斯莫尔大道（North Rossmore Boulevard）上的秘密藏身之处醒来，稍稍有些心绪不宁。他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的精神是警觉的。前一晚，北达科他州有反对他的力量。但是整个晚上，萨金特·施赖弗都在劝服一名摇摆不定的北达科他州代表，他手上的半票就能让肯尼迪拿到必要的多数票，然后赢者通吃，最后工作做通，北达科他州的11票再次安全。

那天早上，肯尼迪独自和一个老朋友（波士顿的戴维·鲍尔斯）在北罗斯莫尔用早餐，吃的和往常一样——两个4分钟鸡蛋，一片烤培根，橙汁和牛奶。

在8315房间，博比·肯尼迪最后一次把各州负责人集结在一起，他们最后一次清点各州选票。早上的数据是739.5票。新泽西州的党团会议还没有开，也就意味着指挥中心还要对新泽西州采取行动。第一轮投票就让鲍勃·迈纳拿到了他的41票，但是，第一轮之后，必须让迈纳对代表团松手，让支持肯尼迪的30名代表能自主投票，这样肯尼迪才能获得多数票。

肯尼迪仍然在艰苦卓绝地打选战（因为他是个尽一切方式竞选的人）。他在星期三早上又到6个党团会议上发言，到了下午三点半，距离提名开始只剩半小时，才回到自己的隐秘住所。他抵达的时候，新闻媒体和电视台终于知道他过去4天隐秘逗留的地方，他被包围了。肯尼迪要和隐私说拜拜了，但他还是想去游泳和放松。他和鲍尔斯一起从公寓后面的防火疏散

楼梯溜下去，跳过后面的围栏，躲开守在前门的记者。他直接开车到他父亲从玛丽昂·戴维斯（Marion Davies）那里租来的比弗利山庄别墅，整个下午都泡在游泳池，晚上和他的父亲、母亲、戴维·鲍尔斯、他的表姐安妮·加根（Anne Gargan）一起吃爱尔兰炖肉。

晚上8点，他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公寓。那时，大会提名已经开始。他拿起总部每天都会印刷的一份小报，在投票表单样本上标记他预计会从50个州分别获得的选票。他都不需要看笔记，一切都在脑海里，精确到半票。他用自己的专用电话打给弟弟博比核对票数，发现算出来的总数和博比的分毫不差。据戴维·鲍尔斯说，他抿了一口可口可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坐立不安，然后电视里开始点名投票，肯尼迪开始做记录。

“亚拉巴马州？”

“亚拉巴马州20票投给约翰逊，3票半投给肯尼迪，1票半投给史蒂文森，3票半投给赛明顿。”

轮到伊利诺伊州的时候，肯尼迪已经有100多票。到了艾奥瓦州，超过200票；到了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超过300票；到了纽约，接近500票；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已经超过650票。照目前形势来看，每个州的实际情况和8315房间早上的计票结果误差只在2票、3票或4票之间，而且都是8315房间的计票偏保守。到落基山脉州投出选票，约翰逊的票数总是比他们自己的计算少1票、2票或3票。清晨的时候，博比就指示现场经理和各州负责人格外注意花名册上的华盛顿州；如果按字母顺序点到华盛顿州的时候，票数已经超过700，虽然有点儿额外的压力，但是在字母顺序表点完之前拿到761票还是有可能的。实际上，点到华盛顿的时候，肯尼迪的票数是710；西弗吉尼亚肯定有15票，这样就有725票，加上威斯康星州的23票，总数就有748票。

肯尼迪身子往前倾——下一个，怀俄明州，成败在此一举。身在会场的博比和特德同样警觉，电视镜头切到特德·肯尼迪，他坐在怀俄明州代表里面。从去年秋天起，他就开始策动怀俄明州。

“这个州可以带来胜利。”肯尼迪对着与他同处一室的鲍尔斯说，而事实确实如此。

特雷西·S·麦克拉肯（Tracy S. McCraken）喊道，怀俄明州国家委员会委员“全部15票投给下一任美国总统”。

这样一来，肯尼迪获得763票；余下的不过是高潮之后的余波。

怀俄明州一投完票，整个大厅都起立了。他们没有等到最终的计票结果——肯尼迪806票。那些懂政治的人从体育场飞奔出去，寻找刚刚出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过去20分钟里，体育场的史蒂文森示威者像被女巫施了咒语一样消失了。体育场的混凝土外缘对面就是肯尼迪的通信站小楼，连接会场操作员和身在隐秘住所的肯尼迪。如果他打算今晚来这里，这个指挥站一定会先得到消息。

这些了解权力跳动和脉搏的人，有着致命的直觉。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来。约翰·贝利第一个抵达，他光着头，心情愉快。在东北大城市的政治领袖里面，只有他是在约翰·F·肯尼迪开始征召之前就站在肯尼迪阵营的。随后到的是俄亥俄州州长迈克·迪萨尔，他是去年早冬时候第一个自愿被肯尼迪招致麾下的领袖。接着到的是芝加哥市市长迪克·戴利，也是伊利诺伊州民主党领袖。之后来了两名宾夕法尼亚人，宾州州长戴维·L·劳伦斯和费城国会议员威廉·格林。他们一个接一个抵达，整个会议大厅里都传开了，说肯尼迪会在这里稍作停留，私下里问候这些领袖，然后再去大会的演讲台。记者一直在小楼起居室的角落里观察他们。在记者眼里，这里的政客类型似乎平均分成两种：瘦长型和矮壮型。戴利、迪萨尔、劳伦斯、麦克洛斯基（McCloskey）、普伦德加斯特和格林都是矮壮型。纽约州的阿维尔·哈里曼、密歇根州的G·门嫩·威廉斯和波士顿的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都是瘦长型。康涅狄格州的里比科夫，身材瘦削，皮肤黝黑，面容一如既往的英俊，一开始就在肯尼迪阵营，是一个难以决断的人。但是总体来说，无论高矮，他们都代表了控制工业文明的美国东北部的权力体系。我也从未见过他们这么多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心神不宁地踱步。他们如此强大，此刻却如此不安。这不是我一开始想象的密室；这里没有人抽烟；没有人喝烈性酒，因为肯尼迪不喜欢烈性酒；这里只供应可口可乐和啤酒。这些政治领袖们局促地等待着。

在这个样板小楼的小露台上，3个人漫无目的地聚在一个小型样板游泳池旁——康涅狄格州的贝利、俄亥俄州的迪萨尔，还有另外一个人。然后其中一个人，我记不清是谁，说道："他来了。"

3个人一下子安静了。远远地，他们看到一排闪烁的红灯，勾勒出一条蜿蜒的洛杉矶大道。他们都认出了这一列晃眼的、闪烁的、让人惴惴不安的、忽明忽暗的灯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大佬、市长、州长和警察上司。他们认出来：这是一个警车车队，护送着可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从隐秘的住所来到这栋小楼。

肯尼迪迈着轻松雀跃的步子小跑到楼里，和站在他前面的人打招呼。他像春天一样青春和轻盈。然后，他似乎是要躲开他们，因为他从这间错层式

小屋的楼梯走下去，来到一个角落；他的弟弟罗伯特和妹夫萨金特·施赖弗在那里边聊天边等他。房间里群情激动，其他人都跃跃欲试，想要加入他的行列，但是他们停住了。他们和他之间只有30英尺的距离，却是不可逾越的。他们站在两边，这些长期手握重权的长者看着他。几分钟后，他转过身，看到他们在注视他，他和妹夫悄悄耳语。然后，施赖弗就跨过"鸿沟"来邀请他们过去。首先是埃夫里尔·哈里曼，然后是迪克·戴利，接着是迈克·迪萨尔，一个接一个，顺序全凭肯尼迪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他让他们过来祝贺自己。那些没有受到邀请的人却无法跨过他们之间小小的"鸿沟"，因为这是肯尼迪的薄隔离层。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赞助人，而是客人。他们只有获得邀请才能过来，因为这个人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

寒暄几句后，是时候前往会场大厅了。一个半小时以前，会场还在随着那些爱戴史蒂文森的示威者尖叫而震颤。

屋子外面瞬间人头攒动，人群总是凝聚在权力周围。从小屋到会场，乱糟糟的群众叠起来有几百英尺远，而且就像所有的无组织群众一样，他们很危险。屋子里的人都知道外面的人群。所有人——市长、州长、政治大佬——在肯尼迪侧面连成防护人墙，由戴着白头盔的洛杉矶警察带领，把肯尼迪护送到会场。人群越来越庞大，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责任：矮的——迪萨尔（俄亥俄州）、瓦格纳（纽约州）、格林（费城）、戴利（芝加哥）——和高的——哈里曼（纽约州）、威廉斯（密歇根州）、麦科马克（波士顿）——其他人也效仿着，低下头，用肩膀在人群中为肯尼迪挤开缺口，在两边保护着他，这是在向另一个人和另一个时代臣服。他们当中也许没有人会想起6个月前或1年前，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有别的参选人，还在做别的梦。现在，肯尼迪就是他们的候选人，他迫使他们臣服；就像他迫使本届大会臣服，因为本届大会别无选择。

肯尼迪向大会致辞，然后回小屋逗留片刻，就回到他在北罗斯莫尔的公寓。没有庆功宴，他实在太累了。他请戴维·鲍尔斯做一些吃的。鲍尔斯用黄油给他煎了两个蛋，递给他烤面包和果酱，给他倒了两杯牛奶。用完餐后，肯尼迪就去睡了。

我回到比特摩尔千禧酒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从会场散了的人在吧台喝酒；所有失意的工作人员都在深度放松，摆脱所有束缚，释放自己——就像激情已经褪尽，既然已经散场，这一刻的释放才是永恒的。

到了凌晨的时候，我乘空电梯上楼，去我下榻的8300侧翼。在电梯里还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而且我累了，就没说话，只是好奇他要去哪里。他和我一样，在8楼出了电梯，大步流星地沿着走廊往南走，和我一样；我开房门的时候看到他猛敲8315的门，就像他是8315的

人，而且不怕吵醒别人。博比·肯尼迪打开门，一副困倦的样子，放来人进去。他是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儿子。他来是替一个总统的家庭和一代人向另一个总统的家庭传话的。

肯尼迪选择林登·约翰逊做美国副总统的真实故事，必须留给明天的历史学家去书写，而不应该让今天的记者来撰写。时间，更久的时间，会把回忆里原本相互矛盾的人和事，雕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样子，最终就变成了真相。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不，事实上是几小时里，洛杉矶比特摩尔千禧酒店的任何人都能说出三四个得到证实的交易版本，而且都声称是唯一的真相，似乎都能找到相互契合的点，但所有版本又都是矛盾的。

7月14日，星期四，提名后的那一天，对民主党高层来说是疲惫的一天。当事人、使者和中间人在比特摩尔顶楼几层上上下下爬楼梯，趟数多得都记不清了，因为筋疲力尽，因为目标交叉，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记忆里也模糊了。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重构，整件事看起来还是迷雾重重，偶尔在某个时刻，露出一个或另一个山峰，但是两个事实的山峰之间却被乌云挡住，很难串联起来。历史往往要几代之后的人来撰写是最好的，那时候，乌云、事实和记忆都已经融在了一起，被后人当作真相来接受，事实是否如此已经不重要了。

在肯尼迪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的星期四，凌晨两点，他回到北罗斯莫尔德公寓睡觉，留下他的助理们和幕后大佬们在体育场小屋。他留给众人的感觉是，总统的人选只有两个：华盛顿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和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他离开前，就算林登·约翰逊这个名字有在他的脑海里闪过，或者在他的脑海里盘旋过，也一定没有一个大城市领袖知道。数星期前，肯尼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过，如果他自己不能成为总统，他认为林登·约翰逊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有资格当总统。但是，春天的总统提名战的糟糕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在大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他谈及约翰逊的时候，和约翰逊谈他一样五味杂陈。不过基本的尊重还是要继续，在洛杉矶的时候，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日，他们的冲突达到顶点。那时候，肯尼迪看似无心地对华盛顿的出版商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说，如果他认为约翰逊愿意接受副总统的职位，他可能会向约翰逊发出邀请。肯尼迪是否希望有人将这样的想法转告给南方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格雷厄姆是一个在华盛顿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人，是约翰逊信赖的密友。第二天晚上，约翰逊就知道了这些试探性的话，不过他还处在提名前的愤怒中，简单地回了一句脏话。

星期四凌晨，肯尼迪在获得提名后从会场回到北罗斯莫尔的公寓，他发现约翰逊发来了最暖心的贺电。这是他认真思考的原因。直到那一刻，肯尼

迪才在表面上接受了约翰逊说的话；约翰逊说他绝对、绝对不会拿他在参议院的投票权换取副总统的小木槌。那么，现在约翰逊是不是愿意接受副总统的职位邀约了？如果是这样，把他放在这个位子会令人满意吗？肯尼迪的考量是什么，那天晚上他没有说——他也没有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分享。那些人还都支持另一个人来当副总统。但是，第二天早上8点，他打电话到林登·约翰逊在比特摩尔的套房。约翰逊的妻子接了电话，叫醒她的丈夫，随即他们约定，肯尼迪要来登门拜访这位得克萨斯州参议员。

9点前，他给在比特摩尔8315套房的弟弟罗伯特打了电话。几分钟后，新闻秘书塞林杰和谋士肯尼思·奥唐奈进了罗伯特的房间。一进去，罗伯特就安排他们简单计算一下选举人票：新英格兰地区的选票加上南方铁票仓的票，他们还需要多少选票才能拿下选举？碰巧几分钟后我也进了8315套房，里面几位可以说是惊呆了。

清晨那个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几位当事人可能都忘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约翰逊一定不会忘。我大概九点半到了约翰逊的套房，肯尼迪来访的消息还没有散播开，那里还是一片寂静。我看到一个睡意未消的助理正在匆忙穿衣服，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困倦的助理主动开口说："嗯，是的，他猜想只要他发出副总统的邀请，林登就会接受——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的夫人伯德·约翰逊女士觉得多数党领袖这个职位对一个曾经得过心脏病的人来说压力太大了；她觉得副总统或总统就好多了。而且，民主党如果想拿下南部或中西部的票，他们就需要约翰逊的号召力。"

在等肯尼迪的时候，这位多数党领袖给几个亲近的朋友打了电话。其中一个朋友说，副总统的权力比多数党领袖小得多。对此，约翰逊回答说："权力相吸。"不管怎么说，民主党新领袖在10点15分抵达的时候，这位多数党领袖十分镇定。据肯尼迪几周后回忆，他曾经试探过多数党领袖是否愿意接受，多数党领袖暗示他愿意。而据那天也在场的肯尼迪员工回忆，他们之前只在相互问候和政治寒暄的时候随意提到副总统这一话题，直到那次拜访约翰逊的时候，肯尼迪才意识到这位多数党领袖乐意接受新的职位和地位。"我们想到，"当一切结束，星期四的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肯尼迪总部的员工冷冷地说，"我们会提名约翰逊，但我们从来没想到的是，他会接受。"

比特摩尔千禧酒店的这3层正在见证一场收尾会议。一小群爱探究的人、记者和电视电台的人聚集在7300侧翼，约翰逊的7334套房外。另一群人聚集在8300侧翼，围着8315套房。第三群人，也是最庞大的一群人聚集在9300侧翼。9333套房里，约翰·F·肯尼迪正在进行审议。10点45分之前，肯尼迪已经从约翰逊的套房上了两层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回程的走廊里单独和萨姆·雷伯恩简单商议了一下），那时候总统套房外面的乱象就已经开始了。在9333外面窄窄的走廊里，三大电视网和几家地方电视台

已经布上了电视光缆、设备、电源组和摄像机；广播网还在楼梯间上上下下架了独立的电线；记者们挤挤攘攘地靠近总统套房的门。那一天，在那个又热又挤的走廊里，人类媒体为了报道选择美国副总统这件事，他们的汗味在空气里渐渐弥漫开来，就像一种肉乎乎的动物的气味。

接下来的时间里，民主党的各方势力开始陆续进来梳理副总统候选人的整体情况，帮助他做决定。首先抵达的大城市领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接着是纽约的那帮人——瓦格纳、哈里曼、德萨皮奥和普伦德加斯特；然后进来的是费城的威廉·格林；接着是俄亥俄州的迪萨尔；之后是康涅狄格州的贝利和里比科夫；最后是其他人。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显然都是听劳伦斯的话，劳伦斯在他们当中影响力最大——都认为约翰逊是个好选择——对国家好，对选票更好。

但是，接着进来的是工会领袖代表团——华盛顿最重要的劳工律师亚瑟·戈德堡注，纽约自由党的亚历克斯·罗斯，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鲁瑟。这些工会的人歇斯底里地反对提名约翰逊；在他们看来，北方关键的黑人选票绝不能冷落。工会领袖们一致认为，如果约翰逊看起来想要副总统职位，那就做做样子，发出邀约，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邀请的时候注意措辞，让约翰逊不得不拒绝。但是，肯尼迪拒绝了：如果要邀请约翰逊当副总统，就必须是真心邀约，是真的，而不是虚情假意的。工会领袖们提出强烈反对后，就撤回到沃尔特·鲁瑟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房间，肯尼迪说会在两点之前叫他们回去。同时，第二顺位的两名候选人——杰克逊和赛明顿——还在等待命运的宣判；领袖们在这个房间进进出出，把所有人都搞糊涂了，他们对房间里的事态有各自不同的解读。约翰逊进来了，约翰逊出去了；赛明顿进来了，赛明顿出去了；杰克逊得到提名了，杰克逊没有得到提名。

现在总统套房里的事态是，民主党的两大势力——工会和大城市领袖——发生了正面冲突。

民主党的第三股势力——南方势力——逗留在7300侧翼的约翰逊总部。在这里，困惑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听取南方朋友的意见，他发现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一些人不容争辩地说，如果约翰逊要搭档这样一位民权和天主教的候选人去竞选，那就是对老南方的背叛；其他人同样激烈地认为他必须接受副总统提名——民主党的南方分支不能在政府的行政机构失声。据悉，中间有一刻，约翰逊拨通了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的电话。加纳也是得州人，也曾在大约30年前被一位哈佛人选为竞选搭档，剧情如此雷同。“我告诉你，林登，”据悉，这位尤瓦尔迪县的智者是这样对他困惑的得克萨斯同胞说的，“副总统的职位不值得大费周章。”

中午刚过，约翰逊的房间里已经变得一片混乱。博比·肯尼迪和肯尼思·奥唐奈从8315套房下来和雷伯恩议长、约翰逊的顾问吉姆·罗、出版商格雷厄姆以及其他几名约翰逊核心圈子的成员核对事情进展，向他们讲述楼上大城市和工会领袖的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可能导致楼上因为副总统提名一事陷入党内论战的风险。当他们在约翰逊的套房里商议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格雷厄姆找肯尼迪的，他敦促肯尼迪现在就以候选人的身份直接给困惑的多数党领袖打电话，坚定地邀请他当副总统，因为所有可能的利弊都已经反复商讨了，无须再犹豫。当其他人还在商议冒着党内论战的风险是否明智，肯尼迪直接给约翰逊打来电话，约翰逊坐在里面卧室的床边听电话。电话那头，肯尼迪发表声明草案宣布他的选择；约翰逊问肯尼迪是否真的想要他，肯尼迪告知他是真的。约翰逊同意接受，不管是否会发生党内论战；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决定出现在大家开会的那个房间。

但是，楼上的局面还需要收拾。林登愿意以副总统身份参与竞选。听到这个消息，大城市的领袖们再次考虑这件事本身，以及可能带来的与工会分裂的风险。民主党内有三大势力（南方、大城市领袖和工会），其中任何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对付第三股势力或是党内其他的派系力量，2/3的胜率，这是不言自明的。大城市的领袖们很清楚，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的领袖不会支持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无论肯尼迪选谁当竞选搭档，他们不支持肯尼迪，又能支持谁？所以很明显，如果一个被冒犯而愠怒的林登·约翰逊和萨姆·雷伯恩合作，会把接下来的国会夏季会期变成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几乎可以毁了肯尼迪。

除此之外，像约翰逊这样的大城市领袖，是不喜欢大工会领袖的，只喜欢他们为竞选提供的资金。一个大城市领袖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想法：工会总是夸下海口——但是一到落实选举的时候，工会从来都不能把豪言壮语变成选票。更有甚者，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领袖都是团结的。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戴维·麦克唐纳其实也青睐约翰逊。

3点刚过，总统套房里终于有了决定，林登·约翰逊将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剩下的就是礼节性地通知其他几位失望的备选人。肯尼迪开始清理他的房间。（同时，洛杉矶的警察和消防部门正在清理门外走廊里的媒体群和电视设备，走廊里臭气熏天；安保人员最后断定，消防楼梯和楼层都有倒塌的风险。）总统候选人向其中一位新闻秘书查尔斯·罗奇口述宣布提名约翰逊的终稿。声明一打印出来，他就在电话里读给多数党领袖听了，一经认可，立马递给工作人员去发布；他宣布四点半召开新闻发布会。至此，提名副总统的一场政治大戏接近尾声了。

现在只剩下星期五的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仪式了。洛杉矶的天气温暖舒

适，像前两个星期一样完美。约翰·F·肯尼迪坐在台上，身边环绕着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左右两边是他的手下败将——汉弗莱和赛明顿，约翰逊和史蒂文森。日落的时候，他面向西，对着洛杉矶体育场的8万名观众致辞。一年的紧张压力和一周的缺觉，让他看起来面色疲惫而憔悴，他的声音高亢又悲伤。

……我想，美国民众对我们的期待远不止义愤填膺和誓言打击。

当下形势如此严峻，挑战迫在眉睫。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像往常一样展开激情的政治辩论，因为风险太高。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诅咒黑暗，而是为了点亮蜡烛，指引我们穿过黑暗，抵达一个安全美好的未来。就像温斯顿·丘吉尔大约20年前就职的时候说的：如果我们还在争吵现在和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将会失去未来……今天我们关心的必须是未来，因为世界日新月异，旧时代已经结束，旧方法不再管用……

……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战斗还没有全部拿下。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60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和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

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向我们承诺了一个新政治和经济框架下的国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允诺了安全与帮助。但是我所说的新边疆不是一系列的承诺，而是一系列的挑战。新边疆概括起来并不是我打算要向美国人民提供什么，而是我要向他们要求什么。它要求的是他们的自豪感，而不是他们的钱包——给出的承诺是更大的牺牲，而不是更多的安全……

拥有美国这种组织架构和执政模式的国家能否长久？这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有勇气和意愿吗？我们能否在这个时代里渡过难关？在这个时代，不仅有杀伤性武器的新突破，还会有各国竞相征服天空、雨、海洋和潮汐，遥远的太空和人类的思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才抵达这个拥挤的会议城市。现在我将开始另一场漫长的旅程，抵达你们在全美的城市和家。请帮助我，

［群众欢呼］

给我你的手，

——［群众再次欢呼］

你们的声音和你们的选票。

[群众沸腾，欢呼声久久不能平息]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3 500万美国人通过电视观看了约翰·F·肯尼迪在洛杉矶接受民主党提名。

其中，有两群人的反应值得探究。

在美国大陆东边，华盛顿特区，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决定是时候在电视屏幕上观察对手的一举一动了。所以他邀请了竞选活动中的两个密友到他家，一起观看和分析敌人的表现。他们全神贯注地坐着，接着心满意足、满心欢喜了。肯尼迪语速太快，通篇书面用语，疲态明显，还有露天电视直播中，摄像机从100英尺开外拍摄，不可控的条件下有一些固有的缺陷。所有元素综合到一起，让尼克松他们感觉良好，斗志满满。副总统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场糟糕的演说，语言高深，语速太快。所以他觉得他能在电视上胜过这个人。其实此前共和民主两党已经暗中交火，互发电报提议在两位候选人之间展开一系列电视辩论。和副总统先生一起讨论的人说，那天晚上看到电视屏幕上肯尼迪疲惫的形象后，副总统现在一点儿也不担忧了。但他无法预见，在那个秋天，时间、疾病和压力对自己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会造成什么影响。他在期待着两人的碰面。

另外一群值得一提的电视观众在纽约。那一整个星期，约瑟夫·P·肯尼迪都隐居在比弗利山庄玛丽昂·戴维斯的别墅，躲开公众视线，其实他这一整年都是如此。约瑟夫·P·肯尼迪一直在通过他用心经营的渠道暗中使劲：是他一手策划了纽约市代表团的倒戈，也是他组织新泽西州北部的代表团脱离州长罗伯特·迈纳的掌控，因此也导致接下来肯尼迪和迈纳之间的不对付；把芝加哥的迪克·戴利招入肯尼迪阵营这件事，他居功至伟，从而使肯尼迪拿到伊利诺伊州的选票。随着选战的第一阶段结束，一直不辞辛劳的前大使无意留在洛杉矶见证儿子接受提名，他不希望在儿子的光辉时刻转移焦点。约瑟夫·P·肯尼迪就在那个星期五的早上从洛杉矶飞到纽约。他到纽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他不想浪费时间独自通过电视观看提名仪式，于是他打电话到《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的出版商亨利·R·卢斯的家里。那天晚上亨利·卢斯正在和儿子吃晚餐，就礼貌地邀请民主党候选人的父亲和他们一起用餐和看节目。所以，在温馨友好的氛围中，约瑟夫·P·肯尼迪与美国思想和观点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一起观看了儿子接受提名。他的儿子开始了一场争取美国人心所向的竞赛。

7月17日，星期六的早晨，肯尼迪在洛杉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提名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为全国委员会主席。下午，他去游泳了。第二天早上，肯尼迪、他的弟弟妹妹们、孩子们、员工和记者包机飞到海恩尼斯堡，开始期待已久的假期。

到了星期日，比特摩尔千禧酒店的员工就开始拆除散布在走廊和房间的众多总部。晚上，那些拥挤的分区媒体中心已经变回夜总会。星期一，最后剩下的那些电视电缆、绳索和电子控制中心的线路都已经被移除。星期一早上，一组油漆工进了8315套房，家具、地毯和电话全部被移走，油漆工重新粉刷8315，去掉这个房间在戏剧化的短短几周里积累的烟味、污垢和灰尘。到第二天早上，8315套房被全部粉刷完毕，铺上了新的地毯，摆上了新的家具，又变回酒店里几百间4室套房中的一间。走廊里的花纹地毯都刷洗过，用吸尘器清洁了。在洛杉矶的盛夏时节，8300侧翼都是空荡荡的，只有沙沙响的声音。从9333套房一路到地下室，整个酒店都是空的。出差的销售员和路过的游客在空荡荡的酒店里喋喋不休。在美国人的政治历史记忆中，不会有斯莫尔尼宫[注]或雅各宾修道院[注]这样的地方，只有酒店房间。

---

1. 洛杉矶会议局估计大会一共为这个城市带来4.5万人。

2. 几个史蒂文森派的领袖断言肯尼迪的对讲机非常强大敏感，能监听到他们自己与现场的原始无线电通信。

3. 约翰·F·肯尼迪从7月11日星期一开始的大会早上日程是这样的：星期一，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一点半之间，他到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阿肯色州、纽约州、南卡罗莱纳州、佛罗里达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下午的日程一样紧张。星期二，早上8点45分到下午一点半之间，他到北卡罗来纳州党团会议、新英格兰地区集体早餐会、怀俄明州、南卡罗莱纳州党团会议、一个民族团体和加利福尼亚州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星期三是投票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之间，他到农业州印第安纳州、弗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夏威夷州的党团会议上发表讲话。这只是肯尼迪的个人活动，是大会日程的部分缩影。在这段时间，史蒂文森和约翰逊团队的活动也同样疯狂。

4. 奥维尔·弗里曼后任肯尼迪政府农业部部长。

5. 《麦卡伦–沃尔特法》（*The Walters-Mccarran Act*），用作控制美国境内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它对相关组织、个人的权利做了很大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宪法。《麦卡伦–沃尔特法》分为两部分：颠覆活动控制法案及紧急拘留法案。——译者注

6. 这首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也是约翰·F·肯尼迪的最爱之一，他在自己的竞选中也屡次引用。

7. 走廊里堆满史蒂文森的人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在大会前，他们一共只分配到35张门票。他们就展开一系列行动：首先征询了750俱乐部所有成员（一个民主党筹款机构，答应给每个捐助1000美元的人两张门票），拿到他们不想要的门票，这样一来一共收集了1000张免费门票；接下来，他们又极力劝说加州民主党大会主办委员会的朋友至少交给他们1000张门票；最后，他们得知肯尼迪的组织者要从大会机构领取2500张门票，就安排自己的人插在特殊分配队列里领票，冒着肯尼迪的名号，从肯尼迪的配给中拿到1500张门票。所以，在提名大会当晚，史蒂文森的人利用拿到的差不多4000张门票，斗志昂扬、欢欣鼓舞地挤满了走廊。

8. 1961年，史蒂文森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9. 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轮投票的最后计票结果显示：肯尼迪806票，约翰逊409票，赛明顿86票，史蒂文森79.5票，其他人总计140.5票。

10. 亚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后任肯尼迪政府的劳工部部长。

11. 斯莫尔尼宫（Smolny Institutes），位于圣彼得堡市东北部，是一座三层建筑，始建于1806—1808年，原为贵族女子学院。斯莫尔尼宫是蓝白相间的，是巴洛克风格和拜占庭风格的融合，相当具有代表性。它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成为革命的指挥中枢，现为圣彼得堡市市长办公地。——译者注

12. 雅各宾修道院（Rue des Jacobins），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区图卢兹，是法国图卢兹的一朵建筑艺术奇葩，整个建筑全部采用当地红色黏土制成的砖瓦建造而成，整体造型恢宏大气而美观。——译者注

第7章

共和党人：从峰会到芝加哥

在政治的民间说法中，最让人充满希望的箴言就是："一个人加上真理就构成了多数。"

然而，验证其真伪则难于上青天。纳尔逊·A·洛克菲勒在其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超过了任何人，验证之路走过了12周时间——从美国U–2飞机击坠事件到共和党于7月27日推选理查德·M·尼克松作为总统候选人。

国外事件对民主党的影响仅仅是涟漪微波，但对共和党而言则如洪水滔天——基于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笃定信念，这如同一场爆炸，他坚信这场灾难足以撼动其政党的多数派地位。

对洛克菲勒而言，1960年的冬春季节是艰难岁月。他已把竞选总统这一项公开从理想清单中删除了。他在纽约州实施的新征税计划虽然深受民主党的诟病，但仍然让所有人接受了。该计划不仅是财政清廉与责任的典范，而且取得了空前成功。由于对新盈余几乎有点儿不知所措，州政府现在乐意支持各种计划。洛克菲勒怀着满腔热情，继续推出一项行政举措。该举措虽说不算创新，但也是自16年前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以来最具效率和热情的计划。说它不是创新，是因为华盛顿和国外发生的事件不断吸引着洛克菲勒的个人想象力。自始至终，正如我们所见，从12月退选以来，他一直打算就美国在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犹豫不决提出警告。1月到5月的事件使他如鲠在喉——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之间的首脑峰会计划在5月中旬举行，届时他们将讨论国际事务、战争与和平。洛克菲勒认为，在总统即将进行如此重要且微妙的谈判之际，对其政党领导的政府说三道四是不可能的。他私下里想到这一切时，虽然天性乐观快乐，但依然流露出淡淡的郁闷。

这种郁闷情绪传到了共和党总部和尼克松先生那里。5月1日，尼克松向一家国内媒体透风说洛克菲勒是他在196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洛克菲勒公开拒绝了这一提议。同一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向洛克菲勒先生提出：选任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或主要发言人。洛克菲勒先生回应说他甚至没打算参加这种大会。

后来发生了U–2击坠事件，之后是首脑峰会和惨淡破裂。洛克菲勒先生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他现在说话无所顾忌了。

5月中旬，洛克菲勒最亲近的幕僚之一——纽约州共和党主席L·贾德森·莫尔豪斯（L. Judson Morhouse）发表了一份看似随意的声明：纽约州州长极有可能参加总统候选人遴选。国外事件在迅速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变化，赫鲁晓夫先生天天在头条新闻中喋喋不休，卡斯特罗先生进入癫狂状态，土耳其、韩国、日本不断发生街头骚乱和暴力。

在第55大街的办公室，洛克菲勒宣称美国和共和党必须就峰会破裂及之后的所有事件进行公开坦率的辩论。两天后，在奥尔巴尼举行的一场州共和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洛克菲勒州长承认他愿意接受调遣来应对国内危机；其助手接着在未做说明的情况下没有派纽约州州代表参加芝加哥大会；洛克菲勒承认他本人现在很可能将以代表团领袖的身份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要想了解现在这一行动的本质，我们必须知道洛克菲勒家族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洛克菲勒家族的人认为，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家族可以考察纽约市，决定清理市中心贫民窟，然后伫立起一座雄伟傲世的行政综合大楼；可以考察腐臭熏天的廉租公寓区，决定拆除建筑，然后修建梦想中的建筑——林肯表演艺术中心（Lincoln Center of Performing Arts），根据设计，它将成为雅典城之后最伟大的人类精神殿堂；可以判定华尔街的拥挤不堪有破坏这一世界金融中心的危险，于是清理出5英亩空地用于修建绿地以及面积比威尼斯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还要大的广场，然后让曼哈顿峡谷的清新空气徐徐吹来。无论是导弹、电子、房地产、石油还是拉丁美洲投资，洛克菲勒家族一旦做出决定，他们敲定的事情必将通行无阻。此外，这种公共权力意识往往伴随着一种奇异且虔诚的责任意识。当契合洛克菲勒家族的爱好或道德准则时，大学、博物馆、基金会将兴旺发达；要让美国人欣赏到现代艺术，必须提升他们的品位——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应运而生；要让美国的医学教育重新整合——确实办到了；要消灭疟疾——洛克菲勒基金机会的高级研究员们将发起歼灭战。要在波多黎各修建房屋——要让亚拉巴马州的黑人接受教育——要这么办，要那么办。在想象力所及的任何机会面前，只要他们愿意，洛克菲勒家族都可以让它们成为现实。总体而言，他们对于美国的态度不是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相反，美国是他们的祖传财产。他们的家族财产富可敌国，现在估计在30亿到60亿美元之间，美国环境与命运的任何变化和转折都对这个家族具有深远影响。这个家族如此庞大，美国的任何问题都牵动着他们的关注神经。无论发生什么，它一定会在经济或慈善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的某个地方，触及洛克菲勒的利益。

自1880年以来，洛克菲勒家族就悄无声息并谨慎小心地涉足每个领域——石油、钢铁、市场、科学、导弹、刚果、医药、房地产、银行、教育等。在美国生活中，洛克菲勒家族一致认为，只有两个领域排除在其活动范围之外，首先是对通信传媒的任何投资或活动（许多富有家族希望涉入的由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组成的庞大网络），其次就是政治。公共服务始终应在私下里进行——避开公众的关注；政治活动仅限于［自从美孚石油（Standard Oil）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早期严重的舞弊行为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和纽约当地向共和党提供谨慎的资金支持。

纳尔逊·洛克菲勒早在1940年就背离了这个家族传统，当时的战争紧急情况促使他接受富兰克林·D·罗斯福请求他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员的提议。后来他担任了哈里·杜鲁门政府的国际事务特别顾问。接着他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任职，直至由于沮丧灰心和希望破灭而离开。他后来以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身份参加竞选，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的职位。但是即使在政界，他依然虔诚保持着家族传统，这一传统的活力源自家族的不渝信念——一切皆有可能。在所有的私人谈话中，他对政府的态度有时天真到荒谬可笑的程度——然而现在他是纽约州州长，这个州的人口在全美位列榜首。

我在1958年的州长竞选期间曾有幸与洛克菲勒闲谈过几次。我根据记忆对他当时的话做一下复述。其谈话贯穿着一个主题：身处这个世界的这个国家，两者都变得日趋复杂——科学在不断发展，管理变得更加复杂，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安全。旧式的民主能应付得了这一切吗？我们的政治制度在这些挑战面前是否还有效？“我们这一伟大的制度”（他的话）能否应对这些挑战？

不难想象，现在——1960年5月末，随着美国的国际问题日趋复杂，上述态度也变得更加尖锐。纳尔逊·洛克菲勒数年来一直思考着一系列美国问题，他以慈善家身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小组，这些组织的宗旨是提交关于美国问题的报告，他们虽说不上特别出类拔萃或创新，但是都信息灵通且非常努力。在所有的国家问题中，一个方面尤其令他关注：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联动危险。他偏激地认为美国处于濒临毁灭的境地，由于国家减少了预算资金，安全正在削弱，美国没有为了国家安全而增加资金，其观点最后变得非常极端。他始终认为1961—1964年——美苏存在紧迫的导弹差距年代，是国家面临紧急状态的时期。现在——1960年5月，与苏联之间的裁军会议在日内瓦破裂收场。从非洲到亚洲，从巴黎到北京，美国的地位正岌岌可危。

1960年5月30日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他在纽约州塔里敦（Tarrytown）洛克菲勒帝国庄园与首席智囊埃米特·休斯（Emmet

Hughes）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评估上述问题以及理查德·M·尼克松的素质是他们的讨论话题。这次讨论之后，洛克菲勒决定发起抨击——抨击美国的骄傲自满。如果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先生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伤害，那就顺其自然吧。8天后，基于该决定，他发表了著名的6月8日宣言。

在总统选举中，很少美国竞选文件能够比这份宣言更坦率诚实和直言不讳——或者说显得更天真幼稚。乔治·欣曼曾向他指出这份宣言将使他的候选人提名走向绝路。“这无关紧要。”洛克菲勒回答，随后向媒体发布该宣言。

> 我深信并担心那些现在掌控着共和党权力的人未能清晰阐明党将走向何方以及它准备领导国家走向何方。现在到了面对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新的时期开始了，它在召唤着新人的涌现。新问题需要新理念、新举措……
>
> 我不能假装相信共和党已经完全履行了这一职责。我知道谈论自己政党的不足或失误在政治层面上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固守传统的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不仅是党派政治的一己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政治现状——或者命运。这不是极端邪说，只是面对现实。
>
> 本着这种精神，我不得不坦率地谈谈两个方面。第一，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的主要总统提名候选人固执地坚持不在党内提名之前而是之后才公布其纲领及政策是不合理的。第二，我认为共和党新发言人现在而非以后确切地宣布他们为应对全国面临的严峻考验而认为并计划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当务之急……
>
> 对于这一事实，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当高举的竞选旗帜上只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或政党，我们不能继续——任何人也不能擅自要求我们继续——踏上迎接未来的征程……

紧接着是一项九点计划，这项措辞强硬且具体的计划呼吁采取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部政策截然不同的外交、军事和国内举措。这项宣言的结尾这样说：

> 我相信人民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政党是否已做好了准备？伟大的领导之路不是在篱笆顶上左顾右盼。它必须不断翻越高度。它必须讲真话。人民有一个超越其他所有方面的诉求——坦率清晰地宣布其目标的领导层。

由此，共和党内部公民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古老内战又重燃战火；在后来的5周内，共和党对洛克菲勒的激烈炮火做出了回应，因为从每个营地，纽约（北部和南部）、华盛顿、芝加哥、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以及他到过的任何地方，纳尔逊·洛克菲勒都启动了炮轰模式。1960年6月1日到7月19日，除了频繁的电台、电视和一般性露面，他发表的9个重要文件[注]是美国选举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系列政治文件。然而，这些文件综合在一起意味着他向其政党领导层公开宣战，同时也对他们在过去8年中处理国内事务的做法提出了含蓄抨击。洛克菲勒对民主党领导层同样持嗤之以鼻和讽刺挖苦的态度，说起话来也毫不含蓄；但是共和党是他的主战场，他的战斗在那里。

纳尔逊·A·洛克菲勒此时是否真的认为他可能像1940年的温德尔·威尔基和1952年的阿德莱·史蒂文森一样在晚些时候赢得总统提名？这一点依然是其贴身顾问之间的辩论焦点。多数人坚持认为他（他们）从开始就意识到尼克松对提名过程的控制是难以打破的，他们还坚持认为洛克菲勒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唤起人们对纲领和计划予以关注和认真考虑。其中一个人曾对我说："不可能。每个人都认为不可能。也许只有纳尔逊清早独自站在淋浴花洒下时，会梦想着今年会问鼎总统宝座；但无论怎样，如果有机会竞选总统的话，他不会首先通过攻击党纲的方式让梦想破灭。"

洛克菲勒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7月初，在他如火如荼地开展攻击期间，我设法让他暂时停下聊了几分钟。我当时问他凭借这项计划如何设法跨越其政党的思路。他干脆利落地回答："我必须双手抓住决策机构。"接着，他又向我详细描述了他作为州长在过去18个月中如何在北部共和党保守派控制纽约的立法机构中跨越共和党思路的。不过，他不愿意说是否将正式竞选总统职位。

无论他意欲如何——竞选总统或动员共和党人积极应对国际危机，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任何一方面的唯一影响力就在于思想。基于这些思想，他或者胜利，或者失败；当7月里数周时间的活动结束时，当其思想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时，他展示了美国政治的另一个重大主题。欧洲的社会学家对欧洲的政治党派熟稔于心，往往拘泥于僵化的知识教条。他们常常认为美国政党完全是实用主义且缺乏思想。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治家都使用优雅华丽的措辞来理想化地阐述政党传统；但是这些思想早已了无生机，只是挤掉了鲜活思想的位置。在美国政治中，各种新鲜思想宛如一阵阵狂风横扫全国各地，人民和政党不断受到震动，直至曾经新鲜的思想也成了明日黄花、凋败消亡。

6月和7月，洛克菲勒的思想开始在共和党内部造成暗流涌动。这一点和史蒂文森的情况类似，其思想同样在国际危机的推动下，在民主党一边也引

起了骚动。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每隔4年都达到高潮，这一点在共和党方面也开始产生效应。

若要了解在洛克菲勒“造反”的影响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最佳做法也许就是跨越大陆拜访一个年轻律师的办公室，这个人名叫威廉·M·布林顿（William M. Brinton）。他的办公室位于旧金山的一座山上，放眼窗外可以俯瞰金门大桥、辽阔的海湾以及岩石遍布的阿尔卡特拉兹岛（Alcatraz）。类似史蒂文森这边的约翰·沙伦，布林顿（一位战争退伍老兵）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认为公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传达个人呼声。1959年夏天，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创建了第一个洛克菲勒公民（Citizens for Rockefeller）组织，设立第一批支持洛克菲勒的广播节目（资金来自听众捐款）。然而正当建立洛克菲勒公民全国和谐工作网络时，洛克菲勒在1959年12月宣布退出竞选无疑破坏了他的计划。不过现在——1960年春天，随着东部不断回响着风暴和冲突的声音，他就像莱克星顿的民兵一样，听到保罗·里维尔[注]的警告和呼声（“拿起武器，拿起武器，英军马上来了”），立刻行动起来了。

洛克菲勒6月8日的冲击波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后一天（星期三）释放了。布林顿和朋友在初选时未经同意就对洛克菲勒进行了“试飞”；他们在4个大都市区域（圣地亚哥、洛杉矶、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督促所有倾向洛克菲勒的人在初选名单中划掉尼克松。分析投票之后，布林顿总部判定在初选投票的核心共和党成员中，有不到18%的人听从要求将尼克松换成了洛克菲勒。现在由于6月8日的冲击波以及一连串的后续声明，洛克菲勒公开成为一股竞争力量。

6月27日，布林顿从旧金山飞往纽约，请求洛克菲勒的工作人员允许他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选派洛克菲勒”（Draft Rockefeller）运动。6月28日，洛克菲勒最高指挥部说他可以这样做——但他们不给予正式授权。6月29日——布林顿乘飞机回家前，电话通知旧金山的朋友在其办公室设立“全国选派洛克菲勒”总部。截至7月8日，寻求支持的报纸广告在21个州的29家报纸上纷纷刊登，这些州的洛克菲勒公民总部也恢复了活动。根据一份收费的公关分析报告，布林顿预计可以收到大约1.6万个回复。在7月11日召开民主党代表大会前，他收到大约4万个回复。现在他的资金主要来自捐款，工作不断进行着。

但是，组织像史蒂文森这样的志愿者在洛杉矶为领袖发起游行和舆论宣传现在为时已晚了。为了调动另一种压力，7月18日，布林顿将指挥部从旧金山转移到芝加哥的康拉德希尔顿酒店（Conrad Hilton Hotel）。现在通过另一轮的国内报刊广告以及另一波的国内电视广告宣传，布林顿呼吁各地的共和党成员通过向在芝加哥的代表写信、发电报或打电话的方式来要

求提名洛克菲勒。

他们确实施加压力了。虽然按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在洛杉矶确立的标准来看，在芝加哥实际举行的洛克菲勒游行显得缺乏人气和影响，但是洛克菲勒公民组织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取得的结果就惊人展现了公民精神能够唤起的力量。在周末电视宣传的24个小时内，芝加哥大会收到了26万份邮件，另外源源不断的电话电报达到史无前例的数量。在广告投放之后的56个小时内，100多万份邮件和电报涌入酒店、特设邮局和会议场馆，邮递业务手忙脚乱，结果在周三大会召开前，一些酒店还在拣选邮件，直到48小时以后才完成。

对于布林顿及其热情的志愿者们来说，现在他们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设有总部，在街道对面的黑石剧院（Blackstone Theatre）设立了大本营，5个独立的全国性“洛克菲勒竞选总统”（Rockefeller for President）组织步调一致，撼动代表大会的意愿好像暂时是可能的。一位中西部的洛克菲勒领导人说：“当塔夫脱派的人们在1952年来到这里时，他们在大会开幕当天让532位代表高唱着‘基督精兵前进’（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齐步走进会场——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但志愿者和公民组织在美国国内政坛属于散兵游勇，他们就像“二战”时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游击队员，仅当现有的正规军与敌人陷入交锋而志愿者游击队伍不断骚扰敌人后方时，其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当纷至沓来的邮件和舆论造势达到顶峰时，洛克菲勒志愿者希望支持的正规军与对手之间的交锋也已达到了高潮。到了晚上，在一次无声的冲突中，双方同意休战。在外面街道、酒店里、会场和料场，洛克菲勒志愿者们唱着歌，将小圆形徽章别在行人身上，大声喊叫和欢呼，好像他们正在参加一场大会。但在小槌敲响并宣布召开公开大会之前，真正的决定性会议已经开始并且几乎完成相关工作了。

如果说党代表大会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神话和传奇，芝加哥则是会议之城的典范。自从亚伯拉罕·林肯在总部获得提名以来，它成为政治大会的首选城市。纵观这类每4年一届的会议曾举行的25次会议，两党在这个城市举办全国代表大会的次数是：共和党14次，民主党9次。芝加哥引以为豪的是，这些总统都是首先在这里提名的：林肯、格兰特、加菲尔德、克利夫兰、哈里森、西奥多·罗斯福、哈丁、柯立芝、富兰克林·D·罗斯福、杜鲁门以及艾森豪威尔。

芝加哥在应对成群结队的访客方面称得上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召开会议时，警察局出租车管理处通常要求所有的出租车司机穿着干净的白衬衫。

环境卫生部门在核心会议区域排列布置一些颜色明快的专用垃圾桶。摩托骑警也被动员起来了，每当任何候选人要举办竞选游行时，湖滨快车道将禁止车辆通行。夜总会准备好了，价格也相应提高；设施简陋的廉价餐馆摇身变成了华美典雅的餐厅，餐饮老板为迎接八方来客做好了准备。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酒店，成百上千的酒店在卢普区和湖滨之间鳞次栉比，定位适合不同收入和口味，任何能想象的休息住宿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当代表们（参加1960年大会的有大约2 600位代表和候补人选，他们将投出1 331张票）聚集在这些酒店时，他们拥抱、会面、互动交流。湖滨这块弹丸之地集中了各路精英，这一情形一直持续着，直至他们在中心会场剑拔弩张地激烈辩论。会议中心位于密歇根大街和巴尔博（Balbo）的交汇处，此时从北部的黑石酒店到南部的康拉德希尔顿酒店，所有车辆都禁止通行。

自反共济会党（Anti-Mason Party）于1832年首先发明这一制度以来，美国政治史上的每次党大会不是召开一次会议，而是系列小型会议。在会议大厅集体聚会、投票程序以及历史档案对议程的总结掩盖了大型会议包含系列小型会议的事实。重要的是，美国幅员辽阔，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职责，各州相互不熟悉的领导成员必须学着相互了解。于是，随着党大会确立好整体格局，在大框架下，再举行系列小型会议。每个州的代表首先在州内举行领导层预备会议。来到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后，他们需要进一步熟悉对方、同舟共济。农业州单独举行领导层预备会议，再举行集体会议；每个州的工会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如何更好地共同施加压力；黑人代表相互联络建立共同阵线。通常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南部诸州的代表重新找到了他们失去的“南部邦联”（Confederacy）。在4年一度的重聚中，他们才意识到其人数是多么众多。在投票前的几天内，他们相信迪克西即将重生，甚至对其实力心生幻想（约翰逊战队在洛杉矶也是如此）。注

代表大会和领导层预备会议——像初选一样——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特色。这种制度如果不是在130年前被发明，也必将在今天被发明出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它们仅4年举行一次，因为这一过程给人们带来了紧张和压力，在人们的心底孕育了怨恨和野心，抚平这一切需要时日。全国上下也不愿意在4年中频繁公开暴露其政治领导人的神经末梢以及赤裸裸地展示他们的野心和卑微。在备受诟病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领导下，内阁危机（等于美国的党大会）一年几乎要发生三至四次，法国紧张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比较而言，第四共和国辉煌的战后重建成就及其对人类弱点和尊严的宽厚包容都显得黯然失色了。由于会议过于频繁，法国于1958年废除了第四共和国。在每次美国全国代表大会上，激情雄辩和雄心迸发的场面不断上演——在芝加哥，更是如此。

资深人士说，在过去几十年，代表大会在缓慢变化。部分原因在于随着越

来越多的公民参与政治，公民代表越来越多，受代表寡头任意操纵的胆小民众越来越少。芝加哥的黑石酒店依然以设有知名的“密谈室”注（408–409–410套间）而自豪，代表寡头们曾在里面曾推选沃伦·哈丁为美国总统；但是密谈室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已像禁酒令一样被废弃了。寡头们对大会的直接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这座会议之城之外的技巧运用和调兵遣越来越明显地控制会议。

在一定程度上讲，变化也是由于电视对大会的侵入。大会的美国观众人数现在从大厅里的1.2万人增加到1亿人，他们在1960年通过电视观看了所有两场全国代表大会或部分会议。鉴于数量如此之众的公民观众压力，同时为了适应摄像要求，代表大会将更严格地按议程举行，为了实现最高收视率而调整时间。程序优化不是为了代表的方便或娱乐，而是考虑到全体国民。

在1960年7月的最后一周，当共和党代表相聚的时候，无论男女，都显得那么平和真诚。如果说他们没有像两周前在洛杉矶相聚的民主党人那样体会到令人忐忑的不祥预兆，也许是因为美国全球外交令人眩晕的跌宕起伏已尘埃落定（北极星潜水导弹注刚刚发射，这是全国4个月以来最振奋人心的国际新闻），另一个原因就是绝大多数代表实际上认为他们参加会议仅仅是确认候选人而不是选择候选人。

表面的靓丽光彩足以让所有的电视镜头和芝加哥街头的喧闹看客心满意足。伊莱（Eli）自称为“主的仆人”，他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外面宣传末日言论，不断分发着传单，上面写着：“你们都忙着崇拜万能的金钱和相互诱惑，唯独没有看到墙上的字：美国必将衰落。”昨天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还在记者中间流传：菲利普·威尔基（Philip Willkie）——大名鼎鼎的温德尔·威尔基之子自认为可以在代表大会上轻松地攻城略地，重写父辈辉煌。他现在不断放风，要竞选尼克松先生的竞选搭档。（威尔基先生同时作为印第安纳州民众教育总监，也在芝加哥为选举造势；其纲领的主要内容是：在小学低年级，教所有孩子学会使用语音方法阅读并且会说和理解一门外语。）尼克松的女子宣传队占了两个酒店，一些人身穿鲜红色裙子和白色衬衫，其他人穿着粉色条纹格子棉布衣服。一位争取上电视镜头的芝加哥小丑带领一群健美的长腿姑娘在两家酒店附近为其候选人游行助威，姑娘们的大腿套着紧贴皮肤的黑色紧身裤，显得惊艳迷人。洛克菲勒的广播车在巴尔博的一角高声播放着他们的主题歌《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尼克松的广播车针锋相对，他们在另一角高声播放《快乐向前行》（*Merrily We Roll Along*）。不过夜总会的老板怒气冲冲地抱怨这伙参加会议的人是有史以来最抠门的人，即使在高档餐厅，当大会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座位仍然随来随有。

就像在洛杉矶一样，电视将这一切都收入镜头并向全国播放。当电视作为一种传媒不能揭示当前问题本质的时候，国民对共和党的看法就出现了分化。对于在芝加哥上演的冲突和戏剧场景，实际上不是人们之间的冲突；说来奇怪，这是思想之间的碰撞。在美国政坛，问题本身很少令人激动。然而在1960年的芝加哥，情况确实如此。

影响共和党大会的问题是纳尔逊·A·洛克菲勒强行施加的那些问题。斗争在不同的战场同时进行：芝加哥黑石酒店的政纲草拟委员会（Platform Committee）听证会，纳尔逊·A·洛克菲勒在纽约市的公寓，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正在避暑的罗得岛纽波特海军基地（Newport Naval Station）。

无论本意是否如此，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做法就是号召全党成员在共和党于11月迎接全国选民的考验之前，先对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政策展开批评。

在整整一年里，纳尔逊·洛克菲勒不断向美国公众提出他的观点。在过去6周，他已将观点打磨得犀利无比。它们涵盖所有的美国问题，我们稍后再回到令大会陷入僵局的具体观点。但是在所有观点的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刻不容缓。所有观点都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一个伟大的政府绝不能仅限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应当通过独创计划、问题框架以及解决问题的机构，努力寻求改变。

人们可以想象，洛克菲勒的这种自然态度和艾森豪威尔是不同的；然而，艾森豪威尔在18个月前也决定为了改变共和党的社会生活态度而采取全新举措。艾森豪威尔稍早推出的计划现在和洛克菲勒当前的计划纠缠在了一起。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公民，他忠诚于全心投入的任何事业。在1958年共和党选举灾难后，他曾要求对共和党的理念和党纲全面重审，原因是它们显然对美国人民失去了吸引力。为此，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组织纲领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gram and Progress）审查共和党的理念，该委员会由理查德·M·尼克松直接负责。尼克松先生则选择一位年轻的优秀共和党商人在1959—1960年领导由共和党理论家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制定现代共和党人应遵守的新信条，此人叫查尔斯·H·珀西（Charles H. Percy），是芝加哥贝尔–豪厄尔公司（Bell & Howell Company）的总裁。

珀西先生风华正茂（40岁），聪明练达，执行力强，金发碧眼，风度翩翩，最大优点是为人友善；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如果喝了一杯加冰杜本

内酒（Dubonnet），”一位曾经与他密切合作的人说，“珀西就会认为自己混账，像疯子一样挥霍无度。”珀西在1959—1960年一直保证不乱花钱；他真诚地依靠个人力量形成共和党的现代执政理念，尽量在党内的两个派别之间达成意识妥协，这种妥协注以1961年春天的共和党纲领草稿为基础。由于上述努力以及珀西在担任政纲草拟委员会主席期间所表现的非凡个性，共和党在1960年的党纲和政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随着在共和党大会之前的数周时间里不断完善，珀西先生的纲领草本堪为和谐的统一体。它首先对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充满赞誉之词，也包含契合现代共和党纲领的前瞻性内容。纳尔逊·洛克菲勒认为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艾森豪威尔政府则不这样认为。对于这种矛盾，珀西先生以前出色的从商经历不能提供解决之道。

7月初，珀西先生飞往纽约，在第五大街与纳尔逊·洛克菲勒及其顾问探讨了这一矛盾并向他提供了一份纲领草稿。数周之后，共和党的公共政纲草拟委员会将应约通过该文件。洛克菲勒先生对这份纲领草本并不满意，他关注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老年人护理、黑人权利、为实现国内经济增长而提高资本投资、外交事务；除了以上方面，这位纽约州州长还非常关注国防问题；对于他眼中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人们应当停下来（至少暂时）审视一下州长观点的实质。

洛克菲勒坚持说，美国正在进入“导弹差距”时期。我们的B–47s和B–52s导弹发射基地易遭受苏联的报复，需要严阵以待。他认为，国防预算应至少再增加30亿美元。这些导弹基地正在进行的建设应立刻加快进度；为抵御苏联的攻击，它们必须以美国经济能够支撑的最快速度予以加固。任何纽约州州长的工作必须每天关注这座位于哈德孙河口的特大都市及其复杂的科技中枢系统通常面临的脆弱性，他平时应负责保护这一脆弱复杂的系统免受伤害。洛克菲勒先生第一个表现得好像该职责掺杂个人色彩，同时更多地融入战争威胁的因素。当他坚持为保护国家和城市而要整顿国防的时候，也认为共和党应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防御方向提出公开质疑。

实质上，洛克菲勒先生坚持涉及国防的纲领内容应当疾呼：“危在旦夕！”

但事实上，共和党政府否认存在危机。

怀着困惑不解的心情，珀西于7月6日离开纽约与三人组的第二方进行磋商，就是后来控制了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尼克松先生。尼克松对珀西在折中调和方面的工作表示了赞赏；珀西返回芝加哥领导正集中在一起的纲领起草人，这些人认为他们对共和党政策拥有权威。

众所周知，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由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提出的任何党纲或

政纲除了用于宣泄情绪，没有任何用处。党纲是一种惯例程序，本身需要被载入历史，在编写之后，它们主要供学者们作为考古性政治文献进行分析。编写党纲确实可以让许多人心理满足，使许多压力集团[注]有机会公开宣泄情绪，使这些压力集团的领导人能够向成员汇报他们积极游说的勇敢行为。但事实上，所有的纲领都没有意义：任何党派的纲领都取决于党内推选的候选人的远见卓识和道德良心。

既然美国人民日益希望制定这种程序化的纲领，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制定了纲领，不过他们的纲领编写技巧不同。民主党通常组织一大班子人对整个纲领进行讨论，然后由代表大会通过纲领草拟委员会的审慎结论，最后在听取证言之前批准所写内容。共和党通常将纲领编写组分成小组委员会，每组负责编写其中一条纲领条款（关于外交、农业、教育、科学、国防等等）。然后他们向大会做出报告，大会将审批在没有举行听证情况下编制的纲领草稿。在共和党这边，委员会小组有权修改措辞。遣词造句和编辑修改实际上对于两党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它让受聘为纲领草拟委员会的成员或主席很是高兴，因为他们此时相信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共和党大会上出现的情况是编制纲领变得极其重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体现在僵持不下且存在争议的实践中。

共和党纲领委员会通常由每州推选的两位代表组成，然后这些人被分到小组委员会研究编制单独的纲领条款。由于任命相应人选进行这些无关紧要的任务通常无关大局，于是这一工作就抛给保守派控制的机构负责。因此，1960年共和党纲领草拟委员会中的103位男女成员主要来自该党的“中坚力量派”或塔夫脱–汉纳–威德联盟派。不过，他们必须认真考虑对于洛克菲勒领导的党内公民派至关重要的事项。

他们在7月18日星期一——大会召开前一周就开始工作，首先在黑石酒店的水晶舞厅（Crystal Ballroom）举行一般性公开会议，然后在7月20日星期三分成小组委员会，各自到更小的房间和会议室听取相关特定领域的证言。

这些优秀公民为改进政府的政策而付出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一些纲领分组会议也令人难以忘怀。回忆起共和党代表大会，有一点我最欣赏：教育分组委员会和数位证人就天才儿童问题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对话（在意见分歧的氛围中），双方还就天才儿童以及普通孩子在成人后谁能更好地适应成人角色这一话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一位证人根据福特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做了证言，这个人指出仅有7%的天才儿童成人后不能很好地适应责任要求，然而在所有学生中，高达14%的孩子长大后不能适应责任要求。）国防分组委员会显得相对平淡乏味；它举行了一个上午的小组会议，仅听

取了4位证人发言，这些人希望他们的观点能够反映给美国当时执政党的政策制定者。［两人是“美国堡垒”注的倡导者，一位是美国商会代表，一位是加利福尼亚州无名避难所（Shelters Anonymous of California）的女性代表。］然而国防分组委员会将在国家这个最严峻问题上使共和党大会陷入僵局。

到7月21日星期四时，分组委员会对纲领条款的重拟和改写工作已经开始了。为了调和洛克菲勒、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分歧，珀西和团队成员小心翼翼地尽力调整条款措辞。但从黑石酒店送到喜来登酒店（洛克菲勒的助手在此设立了总部）的草稿没有包含洛克菲勒认为的美国处在危机之中的观点。实际上，草案与洛克菲勒的观点相差无几（除了黑人人权和国防拨款），但在措辞方面，它们对过去8年的工作都赞誉有加，同时满怀希望地承诺将再接再厉。对于这种态度，洛克菲勒一派不予认可。

这个问题真是考验神经。深感无奈的调解人——珀西先生提议洛克菲勒的人负责编写纲领说明短片的前言、结论和述评。整个星期四，洛克菲勒的人竭力躲避着，他们在酒店里与珀西先生派来的调和使者玩起了捉迷藏。无论他们的复杂动机如何——一些人希望制定具有洛克菲勒色彩的大会草案，一些人要和共和党政策一决雌雄；洛克菲勒的人们知道他们在大会上必须保证其观点及危机意识蕴含着一种力量，如果不顾珀西先生的调解而竭力保持与尼克松先生之间的目标差异，他们就可以获得在必要时能搬到大会现场的斗争地位。如果不能做到的话——屈从于调解，他们将无所斩获。

一方面，他们的做法堪称勇敢。他们眼前的对手强大无比：即将卸任的现任政府、副总统调集的各方力量、主要保守势力的顽固态度，以及纽约代表隐藏的反叛力量。洛克菲勒先生及助手曾看到，由于在洛杉矶代表大会上未能控制住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埃德蒙·布朗在尊严、声望乃至以后的政治生涯方面一落千丈。在纽约州共和党代表中，洛克菲勒领导层现在知道在诡计多端的莱恩·霍尔不断搅动下，也有一股反叛势力蠢蠢欲动。纽约北部共和党人长期以来主要受塔夫脱派的影响；他们对州长在奥尔巴尼的支出计划持怀疑态度；他们知道尼克松先生将获得提名；和所有的政客一样，他们也寻求与胜者为伍。纽约州代表团将于周日下午举行领导层预备会议，这些难以驾驭的成员能保持一致步调多长时间呢？莱恩·霍尔在黑石酒店的第三层套间里可能随时拿起电话，纠集20至30个代表来声讨他们的州长。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洛克菲勒将像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几周前的下场一样，灰溜溜地回到纽约，看起来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从这一点看来，英勇无畏和崇高理想必须携手共进、相互支撑。

另一方面，对手们认为洛克菲勒的做法是赤裸裸的政治敲诈行为。时至周四晚上，洛克菲勒一派决定如果需要的话，将在两方面对纲领草案提出质疑——国防和人权。如果将意见带到会场并指责国家现在和未来国防政策诸多不当的话，他们无疑会祭出一根击败共和党后来提名人的大棒，这根大棒在杰克·肯尼迪的娴熟挥舞下必将是致命性武器。如果有关人权的草拟条款（温和渐进式）与洛克菲勒决意讨好黑人领导层的人权条款相对立的话，那么拒绝洛克菲勒条款的共和党提名人在关键的东北部各选举州区中，是否有希望赢得至关重要的黑人选票？从这个角度看，洛克菲勒团队将尼克松、珀西和艾森豪威尔诸位先生逼到了绝境。

洛克菲勒州长将芝加哥的指挥权已经授予湖滨喜来登酒店里的战略委员会了。这个四人战略委员会包括两位战术助理（马尔科姆·威尔逊——纽约州副州长，L·贾德森·莫尔豪斯——纽约州共和党主席；这两位都是精明老练的政治战术家，帝国州的共和党人长期以来都很了解这一点）和两位重要的战略家，他们就是埃米特·休斯和乔治·欣曼。关于他们在芝加哥如何携手结盟，多少有些浪漫的戏剧色彩。在这对组合中，一位是朝气蓬勃的非共和党理论家，他曾周游世界各地；一位来自纽约北部小镇，执业律师，性情温和，睿智博学，他在一家芝加哥酒店的客房里决定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就关于国防、核毁灭及美国外交政策等根本问题进行辩论和提出质疑。只有在美国才能发起这种挑战。

到星期四晚上，战略委员会已将纲领的所有条款草案审阅完毕，结果发现差强人意——他们感到非常不满意，最后决定建议领导人公开表示反对。州长在奥尔巴尼表示同意。星期五早上，大会的新闻公告栏发布了一条简短声明：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在奥尔巴尼的行政会议厅对正起草的纲领内容深表关注，他认为纲领草稿“尚欠缺力度和细节”。

这是要在大会现场公开发动内战的威胁。

不到数分钟，通讯社将威胁信息传到华盛顿、纽波特，以及政客们可以查看即时新闻或收听收音机的任何地方。

现在，镜头切换至纽约。

切换镜头到尼克松先生。周五收到了洛克菲勒要与纲领起草人公开分裂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他就致电纽约的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此人曾任美国司法部部长，之前在艾森豪威尔的两次选举胜利中负责出谋划策，在政治活动中是托马斯·E·杜威的黄金搭档。不到几分钟，纽约的布劳内尔就电话通知纳尔逊·洛克菲勒：副总统希望马上到纽约与州长会面；他说在外交政策、人权或国防方面，没有真正的观点分歧可以让州长和副总统立场对立。他们是否可以在一个中立地点

会面？比如在布劳内尔的家里？

州长在咨询芝加哥的战略委员会后才给予答复。战略委员会那天早上的做法就是勇敢地据理力争，现在仍毫不动摇。他们鼓励说：要不屈不挠，尼克松会屈服的。他们提出的会面条件几乎就是投降条件：尼克松亲自致电洛克菲勒要求会面；他们应在洛克菲勒的公寓而不是在布劳内尔的家里会面；会面秘密进行，由州长而不是尼克松通过新闻公告宣布；明确宣布会面是应副总统请求进行的；根据会面发布的政策声明应当翔实全面，不应是一个简明扼要的公报。州长当时对顾问们的强硬表示质疑，随后同意无畏面对尼克松。不到一个半小时，洛克菲勒再次致电战略委员会：尼克松已接受条件，当晚将飞往纽约；他们那天晚上计划采取行动，立即起草要求尼克松同意的条款。

副总统在晚上7点30分秘密到达纽约，随行人员是副官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少校，汽车径直开到纳尔逊·洛克菲勒位于第五大街810号的三层公寓。

在芝加哥，大会的酝酿筹备工作已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了。纲领起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已近尾声，开始惬意放松了；媒体在茫然不知地苦心策划新闻稿件。尼克松在芝加哥的随从人员也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他们安然入睡了。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单独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让所有的侍从人员完全蒙在鼓里，在关键时刻犯下了严重错误。7月23日星期六晨曦初露时，纽约会面的最初传言开始在芝加哥流传，副总统的首席新闻助理赫伯特·克莱因仍然极力否认举行过这类会晤（他确实毫不怀疑），以前对他信任有加的记者们愤怒地斥其为骗子。

在纽约，尼克松先生和洛克菲勒先生的交易正在暗箱操作。他们首先一起进餐；在餐桌旁的一个半小时里，尼克松竭力劝说洛克菲勒做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洛克菲勒最终拒绝了邀请，他们接着讨论两人对美国未来的实质性观点分歧。他们一直谈到半夜，同时也讨论了洛克菲勒人员从芝加哥匆忙通过电话传来的声明草稿。

到午夜时分，他们准备把两人达成的协议通知芝加哥的纲领草拟总部，于是建立了一套四方电话系统，系统可以连接的四方人员包括：黑石酒店的珀西；一位在芝加哥附近的洛克菲勒副手；坐在洛克菲勒私人书房写字台旁的尼克松；洛克菲勒本人，他正在一个豪华房间的床上懒洋洋地坐着，深夜里放眼望着窗外，可以看到中央公园之外星河璀璨般的迷人夜景。在三个多小时里，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四方电话交谈一直进行着。尼克松有时对特别难以接受的部分踌躇不决，洛克菲勒根据助手们的建议坚持不懈，尼克松通常会退缩让步。

最终出炉的是著名的“第五大街十四点合约”（Fourteen Point Compact of Fifth Avenue）。其中7点涉及外交政策和国防（在外交方面，要求建立新的美国外交友好同盟；在国防方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制订一项针对强化导弹计划、二次打击能力和局部战争机动力量的加速计划）；在国内事务方面，两人商定联邦政府实施行政部门大改组，同时商定优先采纳洛克菲勒在经济发展、老年人医疗保健和人权方面的建议。

早上3点20分，两人完成议定文本。尼克松先生离开，从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返回华盛顿。在拉瓜迪亚机场，其助手唐纳德·休斯才首次向芝加哥的尼克松总部通知发生的一切。早上5点钟时，洛克菲勒的声明经过编辑和油印，陆续发到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的国内媒体。



声明开头盛气凌人：“今天，副总统和我在纽约市的家里进行了会面。本次会面应副总统的要求进行。会面的目的是讨论共和党纲领……副总统与我就以下外交政策和国防的具体和基本立场达成一致……”

两个地方好像同时爆炸了：一个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黑石酒店；另一处就是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军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此时正在这里度假。

当然，芝加哥的纲领草拟委员会首先反应最强烈。共和党纲领草拟委员会此时的痛苦、愤慨和暴怒，真是难以名状。纲领草拟委员会的103位成员是由党机关选定的，如我们前面所述，他们自然主要从作为党中坚力量的保守派中遴选。他们首先研读珀西先生在春天辛苦整理的纲领草案，经过几天的听证之后，才被允许重拟和改写纲领中的部分条款，此时朦胧地感觉融入工作了。珀西先生中庸的调和措辞也使他们在心理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让步。他们虽然始终勉为其难，但也尽量灵活圆通。一位和他们共事的起草者有点儿感到厌烦了，他说：“各位看到了吗？在本党，为了保持一致，你必须尽可能努力；让他们批准艾森豪威尔所做的一切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尽管如此，纲领草拟委员会还是批准了一份纲领。和民主党数周前在洛杉矶通过的纲领相比，这份纲领从根本上讲更综合和理性。很少委员会成员能解释清这份纲领是如何产生的。其中的观点是东部自由派强加给他们的——在过去2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中，保守派学会了接受党内公民派强加的观点，他们无可奈何地认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东部阴谋计划之所以阴魂不散，就是为了阻挠他们和政党表达真正信念。

此刻是周六早晨，他们的阴谋论完全得到了验证——其尊严遭到了无情蹂躏。自由派对保守派4年一度的突袭从未像这份公开的“第五大街合约”那

样更具有赤裸裸的戏剧色彩。他们在效力纲领草拟委员会期间所体验的荣耀现已被涤荡殆尽。在830英里外哈德孙河畔繁华之都一位百万富翁的三层公寓里面，两个人的单独会面彻底否决了他们。在全世界眼中，他们就像小丑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在周六早上——距共和党大会公开举行还有两天，局面一片混乱。代表们怒不可遏，无心开会。亚利桑那州的巴里·戈德华特——共和党右翼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愤愤不平地大声说：他头天早晨曾致电华盛顿的尼克松，对方还对这次秘密会面秘而不宣；戈德华特称这份“第五大街合约”为“屈膝投降”“共和党的不抵抗退让”和“共和党11月溃败”保证书。到中午时，珀西先生纵有无限魅力和善意，也不能安抚得纲领草拟委员会成员假装秩序井然了；他们暂停小组会议，为遭受的屈辱怒吼。

现在，另一个声音也加入他们的痛苦中：这是从罗得岛州纽波特传来的一种压抑吼声。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最后看完“第五大街合约”后，心中怒不可遏。他首先异常愤怒的是，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行为在其眼中就是一种个人背叛。最初想到重组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是他艾森豪威尔本人，由内阁第一秘书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初衷就是让总统摆脱琐碎的行政事务，专心制定大政方针。邀请纳尔逊·洛克菲勒任职小组委员会为总统的个人计划阐释上述想法的人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幻想着，当1961年1月向国会发表告别演讲时，他在所有人的眼中不再是一位政客，而是一位战争英雄和资深政治家，他可以向第87届国会提交这一政府改组方案，以此作为载入史册的遗产。现在借助“第五大街合约”，洛克菲勒将这一想法强加给尼克松，接着通过尼克松强加给纲领制定者；洛克菲勒使之成为个别派系的方案。这是背叛行为，这是偷盗行为，这是剽窃观点的抢功行为。艾森豪威尔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不过他不能反对这一观点本身，因为他从心底里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然而，艾森豪威尔可以在另一条战线发起战斗：“第五大街合约”所述的国防内容。这几乎等于直接否认他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虽然尼克松在第五大街的晚间会晤中已经软化了最初洛克菲勒国防声明的语气（比如，尼克松删除了国防拨款中再增加30亿美元的具体数据。根据洛克菲勒之前的估算，这是必须立即照办的），但洛克菲勒观点的本质毫发未损，危在旦夕的调子也昭然若揭。

在星期六下午，为了反对一夜之间结盟的尼克松—洛克菲勒势力，保守派和艾森豪威尔的人们在芝加哥组成了一个奇怪同盟。时至今日，洛克菲勒一派认为如果他们把观点强加给尼克松，对方会将这些观点强加给纲领和政党。到周六晚上时，这种想法破灭了。由于来自纽波特的强大压力，既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又是艾森豪威尔忠实信徒的思拉斯顿·莫顿（Thruston Morton），下令印刷并发布已经起草的所有纲领——其中不

含“第五大街合约”的任何内容，他将允许整个纲领草拟委员会现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为了符合“合约”条款而修改这些草案。

时至周日，共和党代表大会已完全失控。一夜之间，尼克松总部还没来得及对草案深入研究，负责农业政策、教育、国防等的各小组委员会就发布了相关纲领条款。星期天，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格莱纳德·P·利普斯科姆（Glenard P. Lipscomb）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上自豪地宣称他的国防纲领原稿没有因尼克松—洛克菲勒的纽约协议而修改任何词句。在黑石酒店二层的1号哈伯德房（Hubbard Room），纲领草拟委员会的103位成员再次集合，他们坚定拒绝执行命令；在芝加哥的郊区，党内保守派举着潦草书写的标语牌开始示威游行，对委员会表示声援。哈伯德房间外面的一个标语这样写道：“纲领委员会，继续编写纲领吧，意志要坚若磐石。”另一个标语这样写道：“我们的意志坚若磐石，你们呢？”

局势如何演变？谁可收拾河山？

理查德·M·尼克松7月25日星期一上午抵达芝加哥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混乱景象。

要想理解他现在的表现，就必须认真研究副总统心中一直思考的那些微妙而又矛盾的战略。

整个春天，尼克松的战术定位和个人态度恰恰体现了他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洛克菲勒卸去在华盛顿的一切职责之后，可以在全国各地纵横驰骋，深得共和党公民派和独立派人士的追捧；身为副总统的尼克松为支持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必须遵守政治规则。在动荡不安的春天，尼克松本人无论对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观点如何——其助手也意识到他对国务院不再抱有幻想，但仍然必须公开支持、称赞并尽力缓解危机。虽然不负主要责任，但他是政府的一分子；由于副总统办公室预算捉襟见肘（所有的礼仪和行政职务预算不到12.5万美元），他不能像洛克菲勒和肯尼迪一样可以负担起一支为他出谋划策的团队或智囊团。即使能够组建一支志愿者智囊团，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先生也将其作为不忠行为而耿耿于怀；在秋天，无论他计划实施什么竞选活动，均离不开艾森豪威尔的支持。

尽管如此，束手缚脚和唯命是从使尼克松心生厌倦。他现在赢得了党内保守派的坚定支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需要争取公民派和独立派的支持。然而艾森豪威尔对于其政治阵线漠不关心，为了保住这一阵线，尼克松不得不采取模糊的派别立场。对于这一点，民主党把他说得有些言过其

实了。

因此洛克菲勒对尼克松右翼无所顾忌的进攻最终被证明不完全是一种悲剧。洛克菲勒津津乐道的原则对尼克松而言，既不陌生，亦不令人反感。实际上，对于洛克菲勒的许多观点，他私下里由衷赞成。在他看来，“第五大街合约”未必是媒体认为的那种可怜投降。“合约”使他可以求助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个人不能直接冒犯，亦可求助于拥护他的保守派，实际上可以对双方说：这对党内和谐是必要的；这是政治敲诈；由于受到会场争斗的威胁，我这样做迫不得已；你们了解我尼克松是什么人。

虽然在周五晚上被尼克松排除在心腹圈子之外而深受伤害和不悦，除了一个人（莱恩·霍尔），其他人都欣然接受了“合约”声明。“这个家伙，”其中一个人提到洛克菲勒时说，“正在占领我们靠一己之力永远不会占领的高地。”

然而，高地不是那么容易被占领的。现在经过一个周末，即使尼克松竭力压制着，大会情绪还是爆发了。除非尼克松这边向洛克菲勒表明他们能够秉承“第五大街合约”的精神推出一份纲领，否则洛克菲勒依然高喊着不守信义并在会场大吵大闹。不过如果他们无情地对纲领草拟委员会置之不理，也将面临巴里·戈德华特的先锋高呼“通敌背叛”或“压制权利”的指责。

尼克松先生在周一中午前不久刚从华盛顿到达机场，表面看起来没受到什么影响，笑容春风满面，像个大男孩儿一样；他随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不同的领导层预备会议，他都表示了必要的祝贺；他接着在黑石酒店的二层套间安顿下来准备后续工作。

显而易见，他不能仅仅为了在每个方面迁就洛克菲勒而直接要求大会服从其要求。不过，他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对洛克菲勒进行安抚。尼克松先生毫不犹豫地选定“第五大街合约”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决定无论是否存在冒犯保守派的风险，都将作为洛克菲勒的同盟放手一搏，该方面就是“人权”。

共和党大会从周一到周二犹如一场漫长的考验。在来去匆匆的活动中，为了观察这些意义深远的长期政治问题如何首先作为战术决策载入史册，人们应当稍作停息。针对尼克松先生纵身投入的人权战斗，请预测在未来10年中，美国政治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重新定位可能是什么；两大政党的未来将取决于以后10年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黑人和白人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对于政治战略家而言，这一问题是全国计划的最敏感选择。自黑人从南向北迁徙以来（更全面的论述，请参阅第8章），如果选举势均力敌，在美国8个人口大

州中，黑人选票可以在6个州力挽狂澜。忽视黑人选票和他们对人权的主张，或者是绝对的傻瓜，或者是绝对的深思熟虑。

12年以来，黑人选票和权利问题一直刺激着民主党。北部民主党和北部黑人一致认为在人权领域，联邦政府应当接替州政府介入州内事务。但南部白人希望自己处理他们的种族问题，北部民主党支持联邦介入南部种族问题或许将永久地动摇民主党对老南方基地的掌控。同时共和党在南方的势力显著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南方人意识到那些寻求遏制联邦政府总体权力的共和党保守派，对于保护他们在种族关系方面的州主权，是天然盟友。

共和党最高指挥部的前景因此也令人极其焦虑。如果他们制订的人权计划比民主党略显克制，南方将对他们有求必应；如果共和党赢得他们永久的忠实支持，南方将成为选举力量的有力补充，也将使共和党像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再次成为国家的多数党以及国家行政权力的半永久掌舵人。此外，既然北部黑人习惯上投票支持民主党——3比1到8比1的压倒性优势，为什么在不能胜过民主党的地方和对方较劲呢？共和党保守派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理念可以总结为一种交换：把北部黑人的选票让给民主党，我们独享老南方。

目前在芝加哥，当总统选举的全国性选战即将拉开序幕之际，理查德·M·尼克松发现他面临着一种战略窘境。这种情况是在周末形成的，它体现在战术形式方面。纲领草拟委员会编制的最初条款草案是一个稳健版本：它避免直接宣布支持黑人在便餐馆的静坐罢工，删除了联邦为保证黑人获得完全的就业平等权而介入的任何承诺——民主党在洛杉矶对以上两方面均做出了承诺。这份纲领从字面上看，几乎确定地使南部各州站到尼克松一边，回想起来，它可以帮助他赢得胜利。巴里·戈德华特现在坚持认为共和党最初关于人权的“稳健”条款本可以保证1960年共和党的胜利，洛克菲勒改写这一条款葬送了最终胜利。7月25日星期一，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尼克松有权朝着南北保守派的中轴线调整共和党的方向，这是他的唯一选择。

我认为，尼克松做出选择是出于良知而非基于战略，但良知不等于个人历史准则或者筹划实施重大事件。尼克松坚持纲领草拟委员会将关于人权的稳健立场（该立场或许帮助他赢得大选）替换为洛克菲勒关于人权的激进立场（如果他真正领会了洛克菲勒的立场，该立场兴许也能帮助他赢得北部大选）。在9月和10月，当胜利的诱惑离得如此之近的时候，由于竞选活动的压力，他显然不能确定是争取北部选举人票还是南部选举人票；后来他完全模糊了其在芝加哥的最初立场，最后与北部黑人和南部白人都疏远了，在选举中将这两股力量都丧失了。这是尼克松的特点和致命弱点之一——他经常表现出一种分裂形象。

但在芝加哥，良知和战术暂时促使他对准相同方向。他从良知上笃信人权，知道北部城市的黑人选票在选举中是至关重要的，还意识到洛克菲勒在这一方面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不仅洛克菲勒是纽约州州长，而且其家族两代人始终肩负着争取黑人权利的责任。尼克松表现得很老练，他将纲领草拟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及负责人一一召到面前，坚持修改人权条款，以满足洛克菲勒的要求和应对民主党的挑战。他的一位助手说："我们那天晚上把在全国开出的每张政治白条都收回来了。"

星期二，当纲领草拟委员会的全体103位成员再次相聚时，尼克松做好了准备；施压之后，政治白条收了回来。珀西将主席职位让给了资深议员——威斯康星州的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先生；在三轮连续投票中，采用了颇具力度的议会程序规则，根据最后计票，委员会以50比35（加上弃权票）的票数允许副总统就关于人权的激进新条款举行听证，这一条款随即通过。几分钟后，我和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士交谈。"哦，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你们北方人怎么想的。但是我们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告诉你，我们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州。林登·约翰逊现在可以跨越边界和他们谈论'南方美女'了，他们将投票支持民主党。我们本可以拥有路易斯安那州，我们本可以的。"（共和党确实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约翰·F·肯尼迪赢得这个州50.4%的直接选票，其余选票则被共和党和种族隔离主义者瓜分。）

然而，仅在人权方面的表现并不能令洛克菲勒满意。对于他们而言，国防同样重要，他们毫不妥协地要求尼克松支持他们也修改国防条款。但是，这一点难度较大，因为有关国防的原始草案条款不仅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而且纽波特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也是支持的。周一午夜之后的某个时候，洛克菲勒团队在副总统愿意让步之前，不得不重弹会场公开斗争的威胁论调。周一到周二，尼克松的助手通宵达旦地通过长途电话与纽波特进行磋商，探讨相关措辞和折中方案。直至周二上午，他们终于向洛克菲勒团队提交了一份既让纽波特满意，又使尼克松可以满足纽约州州长要求的原始国防条款重订草案。

在晚上的艰难磋商中，纽波特批准修改国防计划中原始草案的67个字。新条款要求：努力"强化导弹基地"，增加"潜艇和弹道"导弹内容，"促进"和"生产"远程导弹，为适应新形势要求而提供"任何必要的额外开支"。洛克菲勒一方是否愿意与总统达成妥协？

他们愿意。在通过洛克菲勒人权纲领的同一个周二下午，洛克菲勒和艾森豪威尔均认可的新国防纲领也顺利通过。此后，洛克菲勒先生收回了会场抗争的威胁，同时向桀骜不驯且吵闹无序的纽约州代表团明确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人们可以认为洛克菲勒在芝加哥的表现荒谬可笑，亦可认为他英勇无畏。但无论如何，他光荣地退出了战场，此时纽约州的政治体制和代表尽在其掌握之中，同时知道纲领中包含关于人权和国防的警示措辞，这些内容使理查德·M·尼克松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共和党人姿态走上竞选战场，但是这取决于尼克松先生。尼克松先生依然没有正视竞选之战或者距总统职位一步之遥时所面临的压力。

周二晚上时，一切尘埃落定。大会剩下的议程均公开进行，参议员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发表了主旨演讲；洛克菲勒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他不愿意发表这种演讲。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于是选择了贾德，这个人是个拉仇恨高手；贾德向众人做出如下提问时，洪亮的声音令大厅震颤不已：

“在1933年认为苏联好像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可信赖成员的是我们共和党人吗？”

“在德黑兰不听从丘吉尔先生的迫切建议而同意苏联人自由处置巴尔干地区的是共和党人吗？”（“不是。”众人高声回答。）

“秘密分割波兰并将其中一半划给苏联的是共和党人吗？”（“不是。”）

“分割朝鲜半岛并将朝鲜北部拱手让给共产党的是共和党人吗？”（“不是。”）

问题一个接一个。对每个问题，保守派都前仰后合地高声回答“不是”。令人奇怪的是，无论在民主党大会上还是在共和党大会上，演讲最具技巧且最具轰动效应的都是明尼苏达人——尤金·麦卡锡和沃尔特·贾德，两人好像均继承了老派明尼苏达州平民党（Populist）煽动政治热情的技巧。

最后在7月27日周三晚上，理查德·M·尼克松被列入美国总统竞选提名名单。路易斯安那州代表团提名巴里·戈德华特，在出席的1321位代表中，获得10张支持票；亚利桑那州对提名尼克松一致同意；晚上11点13分，理查德·M·尼克松成为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

接下来要推选副总统候选人，这一工作在黑石酒店一个戒备森严的房间里进行。尼克松在7月28日周四下半夜在此召见了36位共和党领导人。理查德·M·尼克松在1952年也是通过这样的会面被选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地点在对面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一个房间里，但是艾森豪威尔先生没有亲自参与这种会面，遴选工作交由战略委员会负责。1960年，尼克松亲自参加了；他不想遴选副总统还要征得别人的同意。数月前，考虑到洛克菲勒

不愿意接受这一职位，他曾暂时选择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作为竞选伙伴；但是他现在给每个人说话机会。问题出现了分歧：共和党人需要一个更吸引中西部农民的人选［伊利诺伊州的斯特拉顿（Stratton）州长说：“就外交事务而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在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肥猪价格是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一个总体上对普通美国人更具吸引力的人？尼克松宣称：“如果你们让对方（民主党）仅打国内问题这张牌的话，我们必败无疑——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主打外交。”在场的20个人和他都认为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利用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解决外交问题的上佳人选，这也是尼克松决定好的，必须这样了。[注]

7月28日周四晚上，尼克松先生阔步走上围栏露天剧场（Stockyards Amphitheater）的讲台，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曾接受了他的第一次提名。他通过传统的后台或围栏路线进来，接受记者的短暂采访时像个大男孩儿，同时告诉记者他为了准备这次演讲已阅读“历史、文学和哲学书籍”两周时间了。最后，他登台对党内同仁发表了如下演讲：

> 此刻站在本次盛会的讲台上目睹你们对本人、帕特[注]、我们的女儿、我母亲……的友爱之情当然是我一生中的最美妙时刻……
>
> ……我再次希望与各位探讨下届美国总统将面临的一些难题以及我认为破解这些问题应当采取的政策……
>
> 我此时此地郑重宣布无论政治后果如何，我们在本次选战中都不会像我们的对手那样乱许诺言。
>
> 在本次选战中，我做一个预测。我认为，就像1952年和1956年一样，数百万的民主党加入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党，而是因为他们的党两周前在洛杉矶抛弃了他们……
>
> 现在我要和你们谈谈另一种进攻——没有硝烟的进攻，因为此时的进攻者不是占领者而是和平、自由的捍卫者，它将为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带来进步、富足和希望。
>
> 我今晚要说说美国下届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大问题就是让人们了解这种进攻的特点，使人们意识到它所带来的致命危险并且激励人们无畏地战胜危险……
>
>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谓之困难是因为我们下届总统必须时时告诉人们的话不是他们想听的，而是他们必须听的。为什么？举例说，在印度修建一个大坝对于国家利益可能和在加利福尼亚州修建一样至关重

要。这也将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美国人始终能够看清并理解导弹、飞机和炸弹存在的危险；但是我们发现很难察觉如下方面隐藏的更致命危险：扭曲心灵的宣传，削弱民族意志的经济攻势，破坏民族反专制斗志的颠覆活动。

……当赫鲁晓夫先生声称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时，让我们大声宣布他的子孙将生活在自由乐土中。

当赫鲁晓夫先生声称门罗主义注在美洲已经终结时，我们将大声宣布自由的旗帜将插遍世界上的每个角落。

100年前，在悲剧性南北战争期间的黑暗日子里，有人问亚伯拉罕·林肯，他认为上帝是否站在他那一边。他的回答是："我关心的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一边。"

我的美国同胞们，让我们一起为国家祈祷；基于对美国的忠诚，怀着对美国理想及其人民的不渝信念，我郑重接受你们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

尼克松先生在共和党大会结束时郑重宣誓和祷告，为迎接约翰·F·肯尼迪和美国人民的考验整装待发。

美国选举过程的高潮阶段即将拉开序幕。

---

1. 这些文件都是措辞强硬、事实具体的研究性文件，内容包括：美国经济增长、公民权利、外交事务、国防、政府重组、老年人医疗保健、裁军和军备控制、教育、拉丁美洲一体化以及针对共和党党纲的一般性总结。
2. 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美国银器工匠，也是一名爱国志士。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计划发动突袭，里维尔得知后连夜骑马通知独立人士英军的到来。——译者注
3. 迪克西（Dixie），美国东南部各州的非正式统称。——译者注
4. 密谈室（smoke-filled room），（政界决策的）香烟弥漫的会议室。——译者注
5. 北极星潜水导弹（Polaris missile），世界上第一种真正能威慑全球的潜射弹道导弹。——译者注
6. 珀西先生一年工作的完整报告可以参见《为更美好美国之决策》

（*Decisions for a Better America*）一书。

7. 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按照政治学定义，是指那些致力于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策方向的社会组织或非组织的利益群体。——译者注

8. 美国堡垒（Fortress America），指退守美国的孤立主义主张。——译者注

9. 声明全文请参阅附录2。

10. 我对于本版本的副总统遴选过程所做的评述是基于卡尔顿·肯特（Carleton Kent）在《芝加哥太阳报》（*Sun-Times*）的独家出色报道。经当时在场的人们确认，该报告真实可信。

11. 特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尼克松（Thelma Catherine Ryan“Pat”Nixon），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妻子。——译者注

12.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在美洲，美国将视为敌意行为。——译者注

Part II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第二部分

引言

随着提名过程的结束，美国政治步入了没有逻辑的轨道。

如果代表大会一如既往顺利结束的话，那么两位出色的候选人将呈现在美国大众面前。现在是他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他们必须以原始野蛮的审判方式做出选择。虽然竞争是不流血的，但终结竞争的抉择依然缺乏理性，这恰如其他大国权力更迭时充满残酷和阴谋一样。在柏拉图理想中的哲人共和国创建之前，领导人始终由他人选择，他人选择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本能与信任。在美国，所有公民都肩负着选择重任。

组织宏大竞选运动的宗旨就是激发人们的本能和情绪。无论讨论什么问题，讨论是次要的，激发情绪是主要的。代表大会结束了，逻辑亦随之消失了。现在必须由不同的人从不同层面组织其他活动。现在必须发动选民注册运动，现在必须点燃公民的热情，现在必须发挥电视的爆炸效应。一切皆为一个目标：当选民参加集会、阅读报纸或在家中通过电视观看候选人活动时，他们能够忧虑、沉思、反思和争论，直至最后，每个人在头脑中独立冷静地确定国家领导人。

我们图书馆的书架上关于美国选民行为研究的资料，堪称汗牛充栋。本书无意从这一角度再进行学术研究。但研读和总结所有资料之后，掩卷沉思，你会发现所有研究可归结为一个恰如真理的说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每次美国选举均号召每位选民审慎权衡过去和未来。

过去包含不同要素：选民的种族血统、父辈的投票方式、母亲讲过的故事、生活道路上逐渐形成的偏见、他达到或传承的社会阶层或地位。未来包括选民的担忧和梦想：如果是农民，则担心遭受压榨；如果是黑人，则渴望自由平等；如果是商人，则是对个人企业怀有的希冀和担忧；如果是退休者，则是对社会保险体系的信赖；对于所有人而言，则是美国的战争与和平前景。

美国社会中的每个社区都以不同比例分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但这些不同的比例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则是永久现实。它们变化缓慢，历史的沉淀使想象、偏见和梦想固定不变。每位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必须做的就是通过坚持崭新未来的某种愿景，逐渐削弱历史在每个群体中的支配性影响。即使

在充满戏剧性的选战中，上述固定比例的变化更多的也是逐渐削弱选民的固有观念，不是骤然扭转他们的看法。一般而言，80%的美国选民是根据传统投票的，他们还未等代表大会结束就已经做出选择。数百万人在选战中进行的狂热活动只是为了争取剩余的20%，其余20%的分化将导致压倒性胜利或微弱优势获胜。

一直、永远这样，无论在什么层次，主要做法是一样的——对照过去选择未来。

因此，如果要研究两位候选人对过去主动发起的进攻，以及他们就进攻所做的策略分析，应首先研究1960年秋天时的美国选民，因为最近和遥远的过去都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8章

从昨天看向未来

新闻报道的一个职业障碍就是，事后很久，记者才会意识到他所了解的事件有多重要。

所以，当威斯康星州初选过去很久，已经变成资料库里尘封的一段往事，我才意识到，在冬去春来，初选的那几周里，我与一位老友的一次秉烛夜谈很重要，而我当时竟丝毫没有察觉。

我是在给威斯康星州州长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我在东海岸工作时的一位同事现在正替州长做事。纽约的地方风格浓重。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驱使他离开让人振奋的华盛顿和纽约，转战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政坛。

那天我们吃到很晚，我一直在思考初选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性，而他的漠不关心令我感到困惑。几杯下肚，我们开始谈论他在这个地方究竟关心什么，还有州长办公室在做哪些努力。

纳尔逊州长的日子看起来并不好过，尤其是税收和预算给他出了大难题。我带着点儿隔岸观火的意味说，我听说了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税问题，如出一辙——州政府想征更多税，联邦政府也是，市政府也是。这些钱流向了哪里？这些州为什么如此贪婪？

这个问题一定是激怒了他。

“你是在说人口爆炸的问题，是吗？”他一针见血。

当然，我说，所有人都这么说，都是些陈词滥调。

“不，”他说，“这不是陈词滥调。在过去10年，威斯康星州的人口从340万增加到400万。这是数据。但是你知道增加的人口从哪里来的吗？增加的这部分人口中，74%是18岁以下的孩子或65岁以上的老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在现实中，相同数量的劳动力人口，现在要抚养的人几乎是过去的两倍——每两名新的纳税人要多抚养8个人。

“这意味着学校。你得有更多的学校，而这也意味着州政府要给学校更多的补助。我们现在有1所大学和10所州立学院。每一年，这些孩子，这些大学生都在增加，每年增加3 000名。这相当于两个新的州立学院每年招收的所有学生。

“这意味着我们得赡养老人，投入更多的钱去解决老龄化问题。这意味着要建更多医院。威斯康星州一直有一个关于智障儿童的优良项目。但是这些孩子还活着，而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新药。有一些智障儿童现在已经长到四五十岁了，还需要在州政府的关怀下生活。

“然后是公园设施。周末人们想要走出密尔沃基和芝加哥，到外面度假。我们在全州增加了47%的露营设施，但是我们需要道路联通到那里。人们平常被困在城市，渴望户外休闲活动。”

他又从需要征税谈到州长税收问题的技术性细节，对比了销售税和所得税、消费税和使用税。正是五花八门的税收让博伊西（Boise）、哈里斯堡（Harrisburg）、奥尔巴尼和波士顿人疲惫不堪。他想让这些技术性细节看起来很重要，枯燥的论调里带着急切的语气。他在担忧盖洛德·纳尔逊连任注的机会。

我说，看起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大肆渲染并不难，还可以借此打出一场漂亮的选战。他说不。

“因为，”他继续说，“没有关注度。学校、税收、老龄化和智障儿童的话题都无法引起关注。能引起关注的只有禁止滑水。”

“那是什么？”我问。

“同样是人口爆炸的问题。”他说。“威斯康星州有很美的湖，很多很多。但是这些湖也越来越拥挤。有些湖给人游泳的，有些给人钓鱼的，有些给人滑水的。但是那些滑水的人和动力船在水面上呼啸而过，毁了钓鱼、游泳和闲逛的所有乐趣。我们已经提议圈出一些湖禁止滑水。曾经有过关于滑水争议的9页报道，那是到目前为止得到最多关注的一个项目。”

“还有其他大家关心的问题吗？”我问。

“有。”他说，“我们有一个控制高速公路广告牌的议案，很受关注。这些是公众能够理解和关心的。这也是里比科夫在康涅狄格州打出名声的方法——关注高速公路安全。但是，我们想让大家也关心其他的事情。

“几周前，我和州长一起去了白水（Whitewater），来了两百多人。那天

晚上，纳尔逊疯了，他真的是在鞭笞他们。‘人们说州政府一事无成，为什么还要拿走那些钱。’他开始怒斥他们。‘你们说说看，’他说，‘还有什么和教育孩子一样重要？还有什么像防止水污染一样重要？还有什么像保留开阔的野地一样重要？’他把问题摆到他们面前。结束后，一个小店店主走过来说：‘今天晚上是我老婆拽我过来的，但是我很庆幸我来了，我听到一些重要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向他们解释，让他们理解。但是你怎么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呢？”

每20年，美国总统选举和全国人口普查的时间都会重叠一次。1960年恰好就是这样的一年。当候选人就美国的各种事物相互攻击的时候，记录人口普查的磁带卷轴一直在转动。这些磁带收录了美国近10年的生活画卷，那是候选人未来想要塑造的画卷。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揣摩一下1960年的画面。

每次的人口普查都是一件大事，但是有一些人口普查在美国历史和意象中独树一帜，格外重要。比如，1890年的人口普查是向美国边疆的正式告别。那一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宣示，大量人口覆盖了美国大平原和北美大草原，人们再也不能划出一条边界线，圈出过去两个半世纪美国人生活的范围。3年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正是利用这些数据，通过研究得出了“边疆假说”理论。这在美国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在历史画卷中提供了一个看待美国的新视角。

在人口普查中，拥挤的马里兰州苏特兰（Suitland）耗费了1万英里长的磁带，那里开始涌现出新的美国生活方式。从1960年盛夏开始，有一件事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1960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和历史特征将会比肩1890年的人口普查。

有人曾说过，历史没有奇迹，所谓“奇迹”，不过是很多人突然开窍，看清了过去一直没看清的事实而已。1月，在人口普查局简朴的办公室里工作的统计人员里，谁也没想过这10年的人口普查能带来什么奇迹；到了春末，统计数据开始转换成电子扫描仪上的脉冲，奇迹还是没有出现。过去10年，他们把精力都扑在统计上，注意力都局限在这10年。他们使用的分析工具也很灵光，什么样的普查结果都很难让他们意外。只有到了今天，我们回头看，把1960年的标志性数据与1950年和1940年对比，隐藏的惊奇才被挖掘出来。即使这些算不上奇迹，也至少算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最大的奇迹应该是人口增长的总数。美国人口从1950的1亿5130万人增加到1960年4月1日的1亿7930万人，这10年见证了美国50年来最快的增长率——18%，增加的人口总计有2800万，差不多是一个世纪前南北战争爆

发时美国的总人口。这10年里，有4100万美国人出生（1600万人死亡），其余都是移民。在一个人口膨胀的世界里（未来10年预计世界人口将从28.5亿增加到34.8亿），美国也会齐步并进，预计到1970年美国人口将会增加到2亿1000万或2亿1500万。

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更刺激的是增长模式的变化。1890年的人口普查宣示了边疆时代的终结，而1960年的人口普查则宣示了大城市的终结。半个世纪以来，大城市中心主导着美国文化和政治。一个10年接着一个10年，每次人口普查都会发现大城市的规模在稳步增长，就像遵循着不容改变的历史法则。

但是1960年已经过了增长的波峰，大城市规模开始下降。美国前15大都会区（人口大约在150万或以上），其中14个里面的核心城市和自治市的人口在减少。从纽约到巴尔的摩、华盛顿、水牛城、克利夫兰、芝加哥、底特律一直贯穿到旧金山，人口都在流失。席卷之势，让人很难将其定义成个别城市的危机，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唯一一个例外的就是洛杉矶，人口增长了24%。但是，洛杉矶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而是一群郊区的集合体（中心城区也已经因为闲置而被毁）。以百分比来看，最大的失败者是波士顿。回忆带着作者回到20年代，那时我还是在波士顿公立学校上学的小男孩儿。老师告诉我们，要有信念，波士顿的人口（当时75万）将来总有一天会达到100万。1950年，波士顿人口勉强达到80万，1960的统计显示人口降到69.7万，比我出生的时候还少。只有南方的城市人口还在增长，比如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Atlanta）和伯明翰（Birmingham），那里比美国正常生活落后了一个世代。不过，形势很明朗。

不仅是大城市的人口在流失，乡村也是如此。全美3072个县，有一半以上，也就是1536个县的人口在减少。阿肯色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全州的总人口都在减少。但是在另外19个州[从南往北，经过阿巴拉契亚–奥索卡山脉（Appalachian-Ozark）的乡村，再横跨中北部各州，折转向南经过落基山脉，画下一个大大的弧线]，人口流失的县数量更多。因为人口流失和土地荒废形成的狭长地带在美国中心地区扩散，而北边新英格兰地区空置和遗弃的片区相对较少。数字可以说明一切，当然，在乡村地区举行竞选活动也会发现这一点。整个夏天，西弗吉尼亚的乡村里，野花鲜艳地盛开着——金凤花和白色山茱萸，像羽毛一样的蒲公英和蛋黄草，新长的白蜡树和细细的梧桐树上结出棕色茸茸的荚果，阔叶树已经从纤细的幼苗长成大树，遮蔽了历经风吹雨打的废弃小屋和外屋，住在这里的人已经离开。我们把视线转到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明尼苏达州一次关键的党团会议上，代表们仔细斟酌，该选肯尼迪还是史蒂文森，他们希望自己的决定问心无愧。我记得有一位强壮的农民

代表站起来发表意见，他说："离道尔顿（Dalton）两英里的地方，我们有17个空置的农场。我们不能再失去小农场了，我们承受不起。我只希望他们能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1960年人口普查说明，美国正在放弃城市，荒废乡村。

人口普查也说明了人口的去向：郊区。2 800万庞大的新增人口中，2/3都来自郊区。从人口普查可以看出，一个奇怪的新社会形态正在形成：一些大都市中心向外围郊区发展和扩容，直到这些郊区都相互靠近，连到了一起，绵延几百英里长，成了容纳庞大人口的郊区带，郊区的外围又变成一片荒野（美国现在鹿的数量比外来移民刚到的时候还多），郊区圈内的城市中心也被空置而荒废。

从空气也能明显看出变化。盛夏时节，白天的长岛能看见尘埃云，因为有推土机在土豆田作业，为东海岸的郊区发展清理出更多土地；从洛杉矶起飞后，又可以看到尘埃云，推土机在圣费尔南多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柑橘园作业。晚秋时节，搭肯尼迪的媒体专机从佛罗里达州往北飞纽约的时候，我到驾驶舱和飞行员说话。当时是晚上。那位资深的飞行员说，过去从这里看出去，下面一片灯火闪烁的城市（从高空望下去，红—绿—蓝色的霓虹灯在十字路口处交汇）。过去，在一个能见度好的夜晚可以凭视觉飞行。你可以从空中辨认出诺福克，然后是华盛顿，接着是巴尔的摩，一路往北到波士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都可以凭肉眼认出来。现在，从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一路往北，夜晚只能看到连绵的灯带，你无法凭肉眼认出下方的城市，只能靠设备。"不过晚上在哈特福德和波士顿之间，还有一片开阔的乡村地带可以认出来。"他说。

美国生活方式的变化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讲段子的素材，也是他们讨论和分析社会学时最频繁的话题。不过这个变化实在太广泛、太深刻、太包罗万象，当时并没有人对这种变化展开政治上的探索，或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新的美国生活方式甩掉了旧的需求，制造了新的需求和问题。比如，美国生活不再需要过去的铁路格局，现在日常只有82.2万人在铁路上工作，1945年有146.4万人做这些工作。住在郊区的人开车去上班，吉米·霍法（Jimmy Hoffa）的司机开卡车运货到新的超市。郊区生活的物流需求导致四轮交通工具越来越多，霍法在美国生活和经济上的权力逐年增长，最后都赶上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铁路巨头。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铁路巨头能随意掐死一时看不顺眼的公司，如今的霍法就有这样的地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在这个全新的国家，郊区的错层式房屋和大牧场式屋子不再使用煤，而是使用石油和天然气。（在1950—1960年的10年间，美国天然气消费翻了一番多。煤占全国能源供应的比

例减少到区区23%，所以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数量是14年前的35%，从1947年高峰期的116 421滑落到1960年的42 900。）

分析人口普查数据，就像从一个交叉路口出发，有多条高速公路通往不同方向。

比如，一条路可以通向信贷和信贷控制产生的一切政治影响（一个无聊透顶的辩论话题，两名候选人对此都有疑虑，仔细思考之后，都选择回避这个话题）。新式美国生活的其中一个事实就是，郊区依赖信贷。战后建设大面积的郊区带比清理原来的荒地更需要国家出力。住房和建筑成了美国最大的单一产业，1960年解决了5%的美国人就业。美国人今天居住的房屋有1/4是从1950年开始建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具有十足的活力，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住房和建筑成了美国生活中最大的单项资本投入，影响了整个信贷结构。从“二战”结束后到总统大选年伊始，大企业动用美国金融的外部信贷手段，最多也只能贷到大约900亿美元用于扩充生产设备，为购买工厂、办公楼和商业建筑最多还能贷到大约360亿美元的按揭贷款。但是生活在郊区的美国人为了购房已经用掉了1160亿美元的按揭贷款。

郊区最大限度地贷款，不仅是为了整个郊区的公共未来，也是为了郊区里生活的每个居民的未来。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美国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是“翘楚”，他们是西方文明民族里结婚最早的。（今天，29%的少女在19岁以前结婚。）这些年轻人结婚就需要采买，需要花钱，但用的不是积蓄，而是信贷。在“二战”以前，人们只需要拿出税后收入的1/14来偿还分期付款，不过现在估计得拿出1/9的税后收入来购置家电、工具、汽车，才能在郊区过上舒适的生活。

根据人口普查结果，美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郊区；而相关的数据也表明，郊区的发展主要依托信贷。

以上说的是信贷本身，接下来看看信贷产生的政治影响。这种灵活信贷已成气候，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有赖于过去的积累和政府的政策。罗斯福新政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先后有住房法、信贷法和退伍军人法。19世纪60年代，共和党出台宅地法，把西部开阔的土地免费提供给定居者；30年后，1890年，美国疆界消失了。与之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立法也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最终在1960年的人口普查中反映了出来。每一次，当一代人的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政策取得成功，他们的成功又会给下一代人带来全新的问题。

1960年夏天，郊区问题将会在总统竞选中提出来，随之将爆发大量的理性辩论。要怎么处理这种新式文明？如何提供资金？美国繁荣会在自我放纵

中爆发（很多民主党人认为会是繁荣的爆发），最终走向道德品行和理想追求的覆灭吗？还是会稳稳地流淌，强而有力（共和党人更倾向这种观点），依托自由创业的法律不断前进，把民富国强推向更高的水平[注]。

在辩论这个问题时，两党的智者说得都有些高深莫测，超出了公众的理解范围。还没等他们把问题解释清楚，没有把真理辩明，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竞选的一个陈词滥调：惠及个人的总是能惠及大众吗？两个在超市肉类柜台碰到的女人，牛肩肉不要，拿了牛里脊肉扒，她们嘴中常常抱怨的是学校过于拥挤，那纹理肉的质量真的比学校拥挤重要吗？对于两个在周日割草坪的男人来说，能准时买到割草机更值得开心，还是没有割草机，但每天通勤经过的拥堵道路变得更畅通、安全、交通压力小一些更值得开心？这些新社区的公共和私人贷款都已经到顶了，那这些道路、学校或医院的钱怎么来？

美国人的精力该用到何处？私营企业还是公共项目？1970年大学生数量将会翻倍，怎样在这短短的10年里准备好新的大学、实验室和教师？提供好的学校、医药、道路和桥梁的代价是多大？需要牺牲多少好的肉类、百叶窗、新车和新家电？

人口普查能说明的问题不胜枚举，若是列成清单，那就没有尽头了，而且每一条都很重要。

数据告诉我们，人口以粗放的方式蔓延和收缩，其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地理问题，也是一个人的问题，即美国人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首先，1960年的数据告诉我们，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白领阶层的国家。在1950年和196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学者把时间定在1955年，具体日子不确定），在美国历史上，白领阶层的人数（专业人士、管理人员、文员和销售员）第一次超过蓝领阶层（从事生产或操作工作）。到了1960年夏天，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清晰了：2 870万美国人坐办公室或在柜台卖东西，是白领阶层；只有2 420万美国人用双手制造、递送或是生产产品。（在浩大的波音飞机工厂里，白领和蓝领的员工比在过去15年发生逆转，从过去的1比3变成了现在的3比2。）

进一步探索职业结构的变化，你会得到很多启示。美国生活中的文员数量大幅增长（从1950年的760万增加到1960年的980万）。专业人员在美国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从8%增加到10%。不过，虽然美国经济总量大幅飙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 600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 000亿美元），销售人员的占比保持持平，有些分析认为，可能还会减少。在美国比较旧的社区，从马萨诸塞州到威斯康星州，人们会发现一些小食品杂货店和肉铺的窗户用木板封住了，被超市的扩张挤出了市场。在所有主要的

商业中心，大鱼吃小鱼，那些小批发商、经销商和个体户已经不复存在。在威斯康星州初选期间，我从没觉得密尔沃基百老汇北路上开的一排代理行很重要。但是据那里的老人说，20年前，光4家代理行就能送200—250车的商品给那些小杂货店，有浆果、水果和蔬菜。黄昏的交通简直能让密尔沃基的集市区窒息，就像现在巴黎的中央市场一样。不过，现在这些街道已经清静了。过去20年间，有15家代理行倒闭了，其中有两家就是在1960年伊始到4月威斯康星州初选期间倒闭的。老人说，这都是大型连锁超市直接和大型生产商交易，直接从厂家整车采购产品。20年前，喜欢苹果的密尔沃基人有30种苹果可以选择，现在美国生活、经销和农业的同质化把市面上可供销售的苹果种类减少到4种，每一种都红得发亮。昔日的鲍德温苹果和褐色粗皮苹果在哪里？

在1960年新鲜出炉的所有数据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个体经营的数据。在美国，有一批人开办了自己的小生意和小企业。这10年，美国就业机会增加，其间总的受雇就业人数从6 000万增加到6 700万，个体户和创业者的数量基本持平，甚至可能有轻微下降。10年前，1950年7月，640万美国人经营自己的商店；1960年7月，这个数字降到630万。人口普查专家很快指出，这点儿细微的差别可能是季节性波动，但是他们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非农业个体户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幅下滑，跌至美国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从1950年11.6%跌至1960年的10.4%）。

所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替别人打工，到越来越大的企业里工作。那些解决美国人就业的企业巨头（像贝尔系统，过去10年雇用员工的数量从602 466增加到735 766）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自治，有庞大、不可思议的官僚机构——堪比政府官僚机构，他们与政府冲突和斗争，努力维持组织独立。1960年大选中，两党都努力安抚小企业主和小私营企业，但他们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就像美国农民，过去10年从439.3万减少到278万。

人口普查的报告越来越长。玻璃墙的空调房里，嗡嗡作响的计算机正在重新分类和筛选无穷无尽的数据，寻找新的事实。这样一来，接下来的两年还会出更多的报告。

人口普查的最新报告大部分都已经落入竞选人和他们的员工手里。当候选人从这个国家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发表竞选演说时，他们争论的似乎是谁能规划更多的超市停车场，谁的停车场能容纳更多家庭主妇。

候选人通过人口普查分析问题。但是，比起1960年的问题，历史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人口普查恰恰也向我们呈现了悠久的美国根源问题。而竞选人最关心的正是那久远的过去。

州选举也好，全国选举也罢，在任何竞选总部，私下里讨论最密集的话题

莫过于美国人的种族起源和他们抱团投票的习惯。人类有不同职业，而政治家这个职业，就是通过研究波兰裔选票、犹太裔选票、爱尔兰裔选票、黑人选票、斯堪的纳维亚裔选票、意大利裔选票以及每个族群的权利、期待、公职和尊严，成为相关专家，从而赢得职位。在一些东部州，“平衡的候选人名单”已经盛行了好几代。按照传统，某些特定的职位会预留给某些特定的族群。在波士顿，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居多的城市，按照传统，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馆长一职仍然体面地留给旧殖民地移民后裔中的清教徒；在康涅狄格州，两党都依传统把代表全州的国会议员职位留给波兰裔美国人；在纽约市，警察局局长的职位依传统留给了爱尔兰裔美国人，而曼哈顿区长的职位则留给了黑人族群。

当然，平衡的候选人名单在美国历史上得到了弘扬，亚伯拉罕·林肯正是因为这种传统制度才得以闻名全国。1858年，早期的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政客需要找人参加参议员选举，对抗民主党的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他们觉得，本州的参议员有太多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想从南部族群找人。不同文化和族群的融合，是美国文明最杰出的成就。到了今天，像纽约这样的世界中心，再去实践这种制度（在40年代末期的一次选举中，政治领袖同意纽约市的高层官员由三方组成，布朗克斯的政治机器选择犹太裔，曼哈顿的政治机器选择意大利裔，布鲁克林的政治机器选择爱尔兰裔），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想要拿到总统候选人的入场券，并不需要平衡各种族和族群。但是，一旦成为候选人，就必须关心各地方族群的一切微妙传统，要去说服每一个小群体；他们的担忧和期盼，候选人都要放在心里。即使是向全体国民发表演说，谈的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候选人也要始终警醒自己，他是在与国家里的每一个族群对话，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传统。

因此，了解族群的过去很重要。对于学生、作家和政治家而言，美国政治版图上的所有领域，从来都不发端于幻想、概括和揣测。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浪漫的历史、大量但不完整的统计事实，还有相当的猜测成分，构成了美国人的过去。

1819年，美国才开始对移民进行统计。当时，美国国会首次提出要按照来源国对抵达美国海湾和东海岸的移民进行统计；1820年，统计正式开始。

人口普查告诉我们，1820年美国有963.8万人，其中几乎20%都是黑人，其余就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移民后裔——大量英国人后裔，稍稍掺杂了一些来自北欧的探险者。从那时起到1960年6月，整整140年，据历史记录，有4317.7万名移民到达这个国家，基本上都来自欧洲和加拿大。

这一大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敬畏的民间迁徙。我们对大

迁徙的节奏和高峰期有一定了解，第一批抵达的是爱尔兰人，数量庞大，以至于他们的爱尔兰口音让旧殖民地时期的居民明显感觉到外来文化的进驻。1847年到1854年的8年间，来到这个国家的爱尔兰人达到118.6万，几乎占当时白种人的7%！当时条件那么恶劣，仅靠小小的帆船实现这样大规模的迁徙，实在是超乎人类的想象。

德国人几乎是同期来的，而且力量相当，从1850—1857年的8年间来了88.9万德国人。德国人继续大波涌入美国：南北战争后的7年里，90万德国人迁入；1881—1885年的5年间，95万人迁入；1923—1928年的5年间，30万人迁入；1950—1952年是最后爆发的3年，30万人迁入；德国后裔成为当今美国生活中的第二大族群，仅次于殖民地时期移民后裔。［按照党派来划分人群和族群的政治家会指出，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都选择加入民主党，在南北战争期间，领导了1863年对抗共和党的纽约征兵暴动（Draft Riots），而德国人来到美国就加入了共和党，成为联邦军（北方军）的一支坚实骨干力量。］

南北战争之后，继续有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有一波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入，那时候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达到最高峰。接着在1890—1910年之间，大批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迁入。在1900—1914年之间（“一战”爆发），多达303.5万意大利人迁入，同期迁入的东欧和中欧移民有650万（相信在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之间分配得相当平均）。

正是后期从南欧和东欧过来的移民触发了殖民地时期移民后裔的担忧。

如何从政治角度看大迁徙，这个话题在很多文章中可见。爱尔兰人在19世纪50年代刚抵达纽约和波士顿的时候，受到牲畜一样的对待。但是，30年后，这些爱尔兰人后裔卸去坦慕尼协会里老一批高层的权力，取而代之，接管了坦慕尼协会，让纽约市为己所用。而波士顿的殖民地后裔政治领袖给了他们强大的阻力（事实上，约翰·F·肯尼迪祖父那一代正是爱尔兰裔挑战当时政坛的首领）。波士顿的警钟响起，振聋发聩，所以马萨诸塞州第一次有人明确呼吁大家要阻止移民。发出呼吁的是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祖父——第一个积极限制移民的重要国会领袖，而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60年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战略家们认为，在副总统人选中，洛奇在移民族群中最具吸引力，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其实说来也怪，他的祖父在60年前还试图阻断这些移民的抵达。

世纪之交后，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持续了20年，在1924年达到高潮。美国敞开的大门终于关上了。［看看时间是如何逆转美国人身上的标签和态度，也是很有趣的。在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辩论中，美国劳工联合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坚持停止接收移民，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则坚持移民政策继续对所有人自由开放。］这些辩论迫使公众第一次反思美国人是谁，美国人的根源是什么，他们怎样在美国文化大熔炉中和谐共处。国会在移民法案中要求，以后从欧洲四面八方来的移民，不得改变1920年美国人口中的种族和族群比例。美国每年只接受15万移民（移民流入的最高峰值是1907年的128.5万人）；这些移民将按照国家分配额度，每个国家的配额要和这个国家的移民在1920年美国人口中的占比相对应。

好了，阻力来了。国会授命一个由国务院、司法部和商务部组成的政府间技术委员会，根据现有的移民和人口普查数据来探寻国家根源，但是1820年以前的移民情况并没有被记录在案。那些苦恼的委员会成员想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式，把每一个美国人都按照血统成分进行分类，然后不同成分列入不同族群，组成配额单位（例如，一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爱尔兰人的美国人，或是4个都只有1/4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都算作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有不同血统的美国人被切分到不同的国家配额里）；精心的估算填补历史数据的不足，艰苦的计算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29年《民族始籍法》（*National Origins Act*）生效的那一年，计算才完成。尽管后来人们对这些计算做了润色和排除，它仍然是我们移民法的基础。

如果想对美国的初始血统做出更符合实际的评估，我们最好把这个法律公式放到一边，看看1954年准备的一项研究。1954年，《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案》（McCarran-Walters Immigration Act）被广泛讨论。人口普查人士接获要求，提供关于美国人来源的数据。这一次，人口普查学者准备了一份研究结果，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这份研究结果在几个大的范畴都符合实情，记者仍然视之为已有的关于美国人来源的最佳分解。

这项至今没有公开发表的人口普查研究以1950年1.51亿美国总人口中的1.35亿白人公民为基数。其中，1.26亿人都有欧洲血统。

首先，这项研究里的英裔美国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大约有5 200万，包括男女老少，占欧洲血统的1/3。其次是德裔美国人，大约2 100万[注]。再次是大约1 400万爱尔兰裔美国人。（虽然有些刻意而为，不过这3种血统的梯队倒是有趣地反映在3个名字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第四是意大利裔美国人，700万；第五是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600万；第六是波兰裔美国人，500万。剩下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后裔——法国、荷兰、加拿大、西班牙、捷克、瑞士、苏联、希腊、比利时等等。（来自任意欧洲国家的犹太裔美国人估计有540万。）

如果有任何人询问这些数据，人口普查学者会立刻提醒他，这些数据绝不能完美反映美国的根源。

首先，这些数据是拿过去几十年的移民数据编纂出来的，根据当时普遍的出生率进行机械和整齐划一的推断。所以，每个群体都被假设有相同的出生率，圣公会教徒的出生率和摩门教徒一样，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出生率和虔诚的意大利裔天主教徒一样。政府官员不允许官方计算受到一些观测性现实的影响。诚然，政治家们模糊地知道这些现实，但也无法用数据来证明。不过，假设最初大量迁入的英国清教徒比后来的移民出生率低，不遑论这就是个事实，所以就算我们假设英国清教徒的后裔占全体欧洲裔的比例不是1/3，可能低至1/4，也算保险。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数据忽略了美国文明的一个主要事实，几百年来，美国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都愿意和不同背景、习俗和出身的人相爱、结婚和养家。很长时间里，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结合，他们的血统、希望和基因糅合到一起。他们始终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未来，他们的每个子孙身上都带着欧洲所有的基因，是美国人当中最强大的个人基因库。但他们身上究竟有多少血统，他们究竟是谁，或者他们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说得上来。美国大熔炉已经熔了将近两百年，不同族群以不同的速度融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如果请人口普查专家来推测一下，有多少族群其实已经彻底告别了纯种血统，他们也一定会摊摊手，就此放弃。这是天方夜谭。

正是因为没有精准的答案，美国政治才成为一种艺术。有多少美国人因为过去的牵绊而无法去面对未来？一个政治家要向每个群体中的多少人做出保护和尊重的承诺？一个不走心的呼吁，提醒美国人注意种族起源，各个群体里有多人会因此受到冒犯，因为这样的诉请会分化他们和其他美国人？所有人都是美国人，是美国种族根源的大和谐，赋予了美国交响乐般的生机活力。政客们虽然约略也会珍视这一点，但是他们非常肯定地知道，亲缘政治的力量是他们无法忽视的。

因此，政治家眼中的政治地图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地图。对政治竞选人来说，南部州、边疆州和农业州，往北一直到达科他州（以及新英格兰地区北部和纽约上州那一片）都是英裔和殖民地后裔美国人的地盘。水牛城、底特律、芝加哥和中西部一些满眼都是乡村的农业州北部是波兰裔选票集中的地区。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和华盛顿州是斯堪的纳维亚裔票仓。对于政客来说，犹太裔选票在纽约市及其郊区、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洛杉矶和迈阿密举足轻重。德裔选民在全国除威斯康星州以外的地方分散很广，所以不能以地方为单位分开考量。意大利裔选民主生活在纽约市、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新泽西州北部、匹兹堡和俄亥俄

州，他们抱团，非常活跃。

爱尔兰裔是个特例。爱尔兰人是最早来到美国的大规模移民群体，在美国积累经验的时间最长，开展了一些对美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活动，令他们成为移民当中最富有政治多元化的族群，仅次于殖民地后裔。1870年以前，他们一直是美国最庞大的外籍移民群体，之后被德国人取代。爱尔兰人是后来者的政治先锋，即使后来数量被其他移民超越，爱尔兰人的这一角色并没有消退，依然延续了很久，“爱尔兰政客”的笑话正是出自他们的这种形象。

在美国政治历史中，“爱尔兰政客”颇值得玩味。不管这是正面或负面的形象，爱尔兰政客在塑造现代美国政治生活方面至关重要。在城市边缘，他们是持续了差不多60年的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和规划师。

爱尔兰人的角色很好解释。数百万欧洲移民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下了船，发现在这片承载希望的土地上他们所有人都失语了，还得忍饥挨饿，受人鄙视。他们来自旧欧洲的独裁体制，不理解民主的运作，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体系的概念一窍不通。是的，只要学会阅读和书写简单的英语，他们马上就可以参与投票了。但是投票为了什么？抵达5年内，政府就赋予他们选举权，这样的政府系统又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些移民生活在贫民窟和出租公寓里，他们看向警察的时候充满恐惧，浑身颤抖，没有受过训练就替雇主干活，不管雇主开多少钱他们都接受。在这样一群人里，只有一种人会说当地的语言：爱尔兰人。“县治安官”（sheriff）、“地方法官”（surrogate）、“市长”（mayor）、“市议员”（alderman）在爱尔兰人眼中都不陌生。爱尔兰人最先来到这里，几个世代以来，他们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其他移民的挑战。那些怀揣英国传统的定居者在这里所设立的政府机器，他们很容易理解。政府对移民来说很重要：政府就是警察，可以勒索小贩，也可以放了小贩；是法官，可以把一个初犯送进监狱，也可以赦免他；是学校，可以对孩子敞开，也可以紧闭大门。所以，需要政府但语言又不通的其他移民，接受爱尔兰人成为他领袖，因为爱尔兰人一来就懂英语、移民的需求和美国政府。

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里，爱尔兰人在北方大城市赢得政治权力。之后的很多年，他们不屈不挠地把权力紧紧攥在手中，执掌民主党。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两件大事动摇了大城市民主党内爱尔兰裔领袖的地位。当然，一件事就是罗斯福新政。这个政策慷慨地提供救济和就业，相较之下，无论当地的爱尔兰政治机器给那些移民提供什么，都相形见绌。新政把贫民窟的移民从爱尔兰机器中解放出来，令他们不再依赖爱尔兰裔

领袖偶尔的慷慨和恩惠。第二件事是慢慢发酵的，比爱尔兰人晚来一两个世代的移民，其子孙的教育和地位见长，说的是英语，在美国接受训练，骨子里就是美国人。凭着本能，他们开始在美国城市生活中夹击爱尔兰裔领袖。一些族群从侧面渗透，比如犹太裔就是通过行业和华盛顿方面来渗透。其他的，比如意大利裔，就是在阳光下赤手空拳与爱尔兰领袖们打丛林战。（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裔是纽约市人口中最大的单一族群，但是直到1932年，爱尔兰人领导的坦慕尼协会才允许一个意大利裔的区领袖进驻协会，而且这唯一的席位还不是通过温和的坚持赢得的，而是在贫民区赤手空拳、打得头破血流赢来的。）

当然，在大城市，还有很多爱尔兰裔小政客被排除在政治机器之外，他们其实与那些意大利裔、犹太裔、波兰裔和黑人同僚无异，他们赢下一个城市或一个州的领导地位，不是靠继承前人，或无人挑战他们。我想，在这个国家只剩下一个“爱尔兰裔政客”还在按照老派方式运作，在幕后操纵整个州的合纵连横。今天那些杰出的爱尔兰裔政客，都是站在阳光下的。芝加哥的戴利，宾夕法尼亚州的劳伦斯，费城的格林，旧金山的雪莱，都是公开竞选国会议员、市长或州长。他们的政治战争是公开进行的，他们的胜利是在投票中赢下的，而非密室。除了这些人，还有第三波爱尔兰裔政客，也就是第四和第五代年轻人，他们在优秀的大学接受教育，发现生活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治理下都一样。他们替史蒂文森派和改革派工作，替尼克松和洛克菲勒的组织工作。他们没有偏狭的观念，彻底融入美国共同的生活态度中。

这些事实是每一次总统大选都要考虑的。每隔4年，两党的全国委员会都会一再分析各族群，从而知悉，旧殖民地时期移民的后裔分为两派，北方支持共和党，南方支持民主党，德裔和斯堪的纳维亚裔对于是否支持共和党产生强烈分歧，而犹太裔、波兰裔和意大利裔也会为是否支持民主党分裂，爱尔兰裔还无法判断。两党都想与所有族群结成联盟，这样一来，在本党派的候选人胜选后，才能让所有族群都尽心竭力，总统才有信心召集他们去应付美国海内外的各项任务和职责。

但是，1960年的总统大选又多了两道裂缝，对选举策略有决定性作用，是美国政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两道裂缝就是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对立，以及美国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立。就此，厚重的历史在竞选中投下了最深刻的阴影。

想当年，美国宪法起草人求解白人与黑人融合的问题而无望，首次陷入困境。自此以后，黑人问题就成为美国政治中最严重的问题。他们找不到一

个人道的解决办法，由此，南北战争爆发。黑人问题纠缠至今，同和平与战争、经济的适当运行一起，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三大难题。

黑人和白人水火不容，不仅是因为肤色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过去生活在不同的条件下，由此养成了不同的社会习惯和习俗。

这段过去始于万恶的奴隶制。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在发现新大陆和殖民地时期，被带到这个新半球的黑人比白人多，从非洲装运过来的黑人少说有600万，多的话估计有1 500万，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在非洲落入陷阱，被戴上镣铐，被卖给白人中间商（人口贩子）。这些黑人被卖到新世界，出售的就是他们身上那把动物的力气。那些非洲人被带到今天叫作美国的这片土地上，人数难以估计，少说有35万到40万，这个数字尚可接受，往多了算高达百万。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残酷，像牲畜一样被圈养。从第一个黑人来到这片土地后过了一个半世纪，到美国革命的时候，活着的奴隶大概只有50万。又过了85年，这些奴隶继续过着非人的生活，劳作，繁殖，遭毒打。这是人类犯下的一个永远无法赎回的罪。他们与所有的文化和进步隔绝，除了极少数情况下，他们连婚姻的权利和誓约都被剥夺了，也被剥夺了希望和教育的机会。1865年，他们被解放了，却在南方社会绝望地流浪，结果还是回到农场和牧场里干活，遭受牲畜一般的对待。直到1870年，全美80%的黑人还不会阅读和写字。20年后，黑人还只是美国政治讨论的对象，而非参与者。

过去10年，美国黑人一直坚持与白人讨论自己的命运。在1960年的大选中，黑人的坚持，以及美国政治对这种坚持的认知，成为两位候选人心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美国生活中，自西进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黑人从南方迁移到北方和西边，（在南方和西边）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唤醒了黑人的坚韧，也赐予他们将坚韧变成行动的力量。这种大规模的持续迁移运动其实是不易被察觉的，也没有留下什么影像证据。任何一个晚上，午夜的时候，如果你站在芝加哥南区的第63街车站，就会看到在夜色中闪烁的橙棕色专列“新奥尔良”号，沿着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由南向北开，在密西西比河谷下游行驶了一天才抵达这里。通常会有不到20或50人、有时候80个南方黑人下了火车，在车站的灯光中眨巴眼睛。有些人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有些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所有的行李都裹在包袱里。亲戚接到他们，然后就一起消失在夜色中，也无人察觉。他们从遭受风吹雨打的平板弹簧卡车里爬出来时也一样是悄无声息的，那些卡车每年夏天都会卸下一大堆外来劳工到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农场务工，秋天再回到南方，但是带回南方的黑人比带来北方的少。黑人迁移的细流不易察觉，就像70年前从欧洲到纽约城堡花园的白人一样，每天的数量很少，但是连绵不断。像其他的移民一样，黑人只有在大城市里集结起来才会醒目，只有那时，他

们的迁移才会显现出来。

这些族群在美国的迁移，是没有逐年计算的。有些年份，从南方来的黑人估计低至10万，有些年份又高达20万。现在我们回望过去，通过人口普查，才大抵观测出迁移的情况。1910年，全美90%的黑人生活在老南方，任由南方习惯性地粗暴对待，被美国政治完全排除在外，在田地里干活。到了196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只有52%的黑人仍然生活在旧邦联土地上，几乎一半人生活在北方和西部，这些黑人在北方大都会中心聚集起来，很有影响力。注

北方和南方的变化都很显著。在南方，没有一个州是黑人占多数的（就像南北战争之前的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单单20世纪40年代的那10年，从密西西比州离开的黑人移民净值就接近26万，差不多是1940年密西西比州黑人总数的1/4，而且离开的那些黑人都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那10年里，差不多有一半到了30岁的黑人离开了密西西比州。

在北方，说迁移的结果很显著，那都不够准确，应该说是近乎爆炸性的。1960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大城市（从1950年的35%变成1960年的54%）。纽约市的黑人数量从1950年的77.5万（占总人口的9.8%）增加到1960年的108.7万（占总人口的14%）。（曼哈顿人口是190万，在公立小学上学的孩子里，1/4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现在，费城的黑人占比是26%，底特律是29%，新泽西州纽瓦克市（Newark）的黑人人口过去10年几乎翻倍，从1950年的7.5万（17%）增加到1960年的13.8万（35%）。1940年，纽瓦克市的黑人才占总人口的10%。人口普查表明，过去10年，东北部地区的大城市人口都在减少。他们流失的人口是白人，填补流失人口的是黑人。（过去10年纽约白人人口减少了45万以上，黑人人口增加了30万以上；过去10年纽瓦克的白人人口减少了10万，黑人人口增加了6.5万。）

这不仅给北方的每一个城市带来了最激烈的邻里相处问题，也提出了一个头等重大的政治问题。

北方的黑人手中握有选票。他们主要是在大都市的州投票，这里有全国最集中的选举人票。其中，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加起来就有132张选举人票，几乎是当选总统需要的一半选票。这些州里除了首府以外的最大城市都有一张黑人选票。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一张选票就关乎生死。

40年前，出于对亚伯拉罕·林肯和解放黑奴的感激，黑人都坚定地投给共和党。[“我记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曾经说过，“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堪萨斯城，那时候要是有黑人敢投票给民主党，就有孩子当街拿石头砸他／她。”]但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改变了这一切。在罗斯福的治理下，政府带来了社会保障、救济、强大的工会和失业补贴。（“让耶稣指引我，福利养活我”是萧条时期黑人的一句口号。）而且，黑人迁移到北方后，旧的习惯也跟着改变了，他们迁移到了民主党阵营。

当今美国很多杰出的黑人领袖都亲身经历过这段政治过渡期。“我出生在佐治亚州的多尔蒂县（Dougherty County），”资深的美国国会黑人议员、芝加哥议员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几年前说，“差一点儿就踏进鬼门关。我15岁的时候，有一整晚都守在我父亲身边，阻止别人对他施以私刑。我刚来北方的时候痛恨民主党这个词。我看见他们在‘一战’时期把黑人从南方带过来，把他们塞到这里，一个4.5英里长的黑人聚居区，直到这里变成了地球表面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我看见他们在仓库里挖出地下室，把黑人推进去，让他们生活在老鼠肆虐的肮脏环境中，直到黑人聚居区变成天杀的瘟疫区，根本超乎人类想象。”

但是罗斯福让道森从共和党转到了民主党阵营。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带来了援助和救济。“如果不是他一直牢牢控制着这笔钱，直到黑人拿到手，他们早就像苍蝇一样死掉了。”道森说。所以道森就成了芝加哥的一名民主党政治领袖，他一开始只是黑人选区的领袖，后来进入了库克县的高级委员会。

到了1948年，黑人领袖和黑人选票给民主党带来的好处才显现出来。1948年，哈里·杜鲁门紧逼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在伊利诺伊州以33 612票领先，在加州以17 865票领先，在俄亥俄州以7 107票领先。在一场平分秋色的选举中，没有一个务实的政客能够继续无视黑人选票在北方大城市的分量。

自从那时起，黑人从南方迁移的速度和规模都还在增长，北方政治领袖对黑人选票的重视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黑人的选票是民主党手头最牢固的政治资产。它代表了权力。

在势均力敌的大选中，黑人领袖握着足以左右选举结果的一半选举人票，这种权力、这种能力让其他政客无法继续把黑人领袖拒之门外。

在北上大迁移的过程中，除了工业化之外，黑人身上还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教育。

根据1959年的特别人口普查报告，过去10年，黑人在教育和发展上的飞跃令人惊叹，是美国其他重要族群无法比拟的。今天，只有7%的黑人还

是文盲。1940—1959年，成年的年轻黑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增至原来的3倍。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全国范围内的黑人领袖越来越多，他们才华横溢、热忱奉献，算得上是民主信念的一大胜利。不过，黑人领袖仍然局限在自己的社区，只为黑人的目标全情投入、不遗余力，却不愿意（即使得到许可）为全国的目标而努力。

1960年，黑人经过6年的努力，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现在信心满满、活力十足。从1954年开始，当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所有公立学校都要消除种族隔离，黑人领袖终于感觉到来自法律的支持。有法律在手，黑人领袖不断推进，一年接着一年，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一个州接着一个州，一个战场接着一个战场，从1955年的奥瑟琳·露西[注]和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注]到1960年的静坐，他们利用自身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力去争取黑人族群的诉求。在1960年的大选中，黑人族群在这些卓越人才的带领下，直白而又强有力地提出了具体诉求，这在1960年之前从未发生过。

如果政治记者在报道美国黑人问题时，只关注杰出政治领导力，或者单纯的数据，或者正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是皆大欢喜。当然，1960年，正义的天平是倒向黑人领袖的。

但是在美国，一个政治记者在报道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时候，如果不能呈现问题的全貌，不去报道困扰南方白人的问题，加之这些问题也日渐蔓延到北方大城市，那他的报道就不够充分公允。

黑人权利运动的进展如此迅猛。但过去20年里，黑人的进步领袖和落后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几乎赶上了进步的速度。如果说黑人教育、文化和责任感不断提高，同样，黑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传统也回来了。过去黑人受到南方白人的残酷对待，传统被遏制，一经解封，现在迅速窜起，令人生厌。摆脱折磨，迁移到北方后，黑人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大幅攀升，引人瞩目，也令人警惕。1940年，（根据人口普查记录）美国黑人的非法出生率是16.8%。（同年，白人的非法出生率是2%。）到了1958年（可以获得对比数据的最后一个年份），白人的非法出生率基本持平：2.1%。但是，黑人的非法出生率窜到21.2%。也就是说，在美国黑人当中，1/5的孩子出生时没有父亲。在一些较大的北方城市，这一比例估计达到1/4或者更高。

这些令人沮丧的数据主要归因于传统和社会习惯的差异。1950年，孩子未满18岁的非白人家庭中有21%是破碎家庭，而白人家庭大约是8%。与数据相伴而来的就是犯罪数据和街头暴力，以及相应的政治意蕴。

在黑人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暴力和犯罪的攀升是一个过渡性高峰，还

是一种更病态的现象，时下无人知晓。几年前，记者试图对4个拥有最多黑人人口的北方城市展开调查，从各个角度去了解事情真相。那时公众调查能够获取的最新数据就是1955年的数据，那可是个多事之秋，数据显示：在芝加哥（黑人估计占城市总人口的17%），黑人占监狱人数的65%，公屋住户的70%，靠救济生活人数的75%。在纽约（当时黑人占12%），黑人占公屋住户的38%，靠救济生活人数的38%，监狱数据没有公开披露。在费城（当时黑人占21%），黑人占监狱人数的80%，公屋住户的43%，靠救济生活人数的50%。在底特律（黑人占19%），黑人占监狱人数的58%，公屋住户的50%，靠救济生活人数的69%。

这些数据令人惊慌，也透着戾气。不过，似乎还有两件事可以缓解一下。

第一件事是我从费城委员会的一位真诚杰出的黑人委员那里听来的。我们一起讨论过黑人的情形。他说："你还记得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书里写的贫民窟那个有色人种男孩儿吗？他抬头看着天上的飞机喃喃自语：'开飞机的是白人男孩儿，开飞机。'他知道开飞机的是一个白人男孩儿，永远不会是他，不管他有多渴望。黑人感到很压抑。他觉得他要与所有人为敌。警察粗暴地对待他，社工不把他当人看，而是当成'物品'，一个'黑色物品'。学校试图限制他，老师一攥到点儿经验就想转到其他地方。一个白人男孩儿引起骚乱，警察会对他好言相劝，送他回家。一个黑人男孩儿引起骚乱，就要采集指纹，逮捕，拍罪犯照片，从此就记录在案了。他成了别人嘲弄的对象。25年前，费城因为吸毒被捕的人中，1/10是黑人，现在就反过来了。毒品让他摆脱这个世界，摆脱现实，是另外一种逃离的方式。他生活在贫民窟，他痛恨这个地方，但没有人允许他到其他地方生活。"

第二个就是数据本身。洛杉矶可能是美国对待黑人最公平的城市了，那里的黑人最有可能住在像样的房子里。1955年，洛杉矶的黑人占总人口的11.3%，黑人占监狱人数仅为14%，公屋住户的18%，靠救济生活人数的18%。如果洛杉矶的数据属实，那么如果任何肤色的美国人在工作和住房上获得完全平等的待遇，那么有可能他们也会报以充分和相称的责任感。不过这只是洛杉矶的数据，在东北大城市还没有得到验证。其实，来自欧洲的其他族群过去在适应美国城市生活的时候，也有过类似暴力的行为。信念和历史促使今天的观察家们期望黑人暴力终会慢慢平息。

总的来说，社会学家比政治家对这样的数据更感兴趣。不过政治落实到行动中就是社会学，在北方大城市，城市生活的摩擦开始在政治中消失。在种族问题上比较盲目的南方政客在过去几十年开窍了，把这些摩擦变成政治资本。北方的政治领袖虽然私下考虑过这个问题，却没有像南方政客那样做。

街头摩擦的增加把一个具体问题摆到白人和黑人政治领袖的面前：谁是黑人真正的领袖，怎样对黑人负责。过去，白人领袖都会努力给黑人选区找到低级的“汤姆大叔”型领袖，唯唯诺诺的傀儡，任由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但是现在全国的黑人社区都在拒绝这样的领袖，他们在寻找新的、积极的黑人领袖。但是新的、积极的黑人必须无情地谴责白人“权力结构”，以及这种权力结构给黑人贫民窟带去的贫穷、凄凉和拥挤不堪，才能赢得选票。好像他们所有的精力和动力都用来对付白人敌人，却丝毫没有余力去负责任地引导和关注黑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那些令白人深感担忧的问题。在努力达成社会平衡的漫长征程中，白人和黑人领袖都有责任去寻求共同的标准。如果说，在政治上，黑人领袖无法忽视黑人社区对改善学校、住房和年轻人就业机会的诉求，那么，在政治上，白人领袖也无法忽视白人社区对调试中的有序宁静和城市和谐的诉求。

这一政治问题日益严重，造成北方黑人领袖和白人政客在对话时表现虚伪和缺乏信任。白人政客知道黑人选票至关重要。当黑人领袖公开要求平权时，白人领袖口头答应。但是黑人知道，这些人私下一定会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双方会拒绝商讨。

在美国漫漫历史中，这些问题可能会不断累积，1960年大选实际上就是一个标杆。1960年的大选结果比1948年更倚重黑人选票。黑人领袖，像美国大城市的很多其他少数族裔的领袖一样，发挥自己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在美国，北方城市握着当选总统所必要的选举人票，对美国至高权力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几代以来，他们都在利用这种影响力塑造和改变世界。“一战”期间，北方大城市的爱尔兰裔利用这种影响力让爱尔兰脱离了英国。191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捷克裔在匹兹堡写下了第一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在“二战”期间和结束后，北方大城市的犹太裔运用政治影响力，争取和保障了以色列的独立。

所以，1960年，北方城市的黑人也想在总统选举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为南方同族争取平等。黑人领袖动力十足，1960年夏天，大选一启动，他们就开始仔细观察，这些被两位总统候选人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他们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意识和战略上优雅地驾驭黑人领袖，助自己拿下总统宝座。

在品评这两位候选人的时候，还有一个历史遗留的裂痕不容忽视，这也是美国社会最大、最重要的裂痕——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分化。

美国文明始于宗教。最早的欧洲移民塑造了美国的文化、法律、传统和道德标准，他们来自英国。当年，英国人对敬拜基督的方式存在分歧，英国

文明饱受折磨。整个17世纪，这些早期定居者从英国的丘陵、荒野和乡村来到这片土地。来的时候，他们伤痕累累，身上残留着宗教战争刻下的苦涩和紧张，那是清教内各派系的斗争，是清教徒和清教徒的内斗，血腥凶残。克伦威尔是一个严肃的人物，在他治理下的英国，清教徒就派别和教义相互攻击，也攻击天主教徒。

正是带着记忆中的苦涩，这些英国移民开始在一个新世界建设一个新社会。虽然他们内心充满挣扎，却能从昔日的苦涩中孵化出美国独特的文明，一个美国文明的标杆，一个创造性的和解，令美国与众不同，那就是：信仰自由，政府无权干涉公民信仰，政教分离。在人类文明史上，自从最早的金字形神塔和寺庙在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泥墙房村庄里竖起来，还没有一个国家放任自己的国民自由敬拜上帝，却不加以引导。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写入美国宪法的最伟大的历史性决定。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不是没有信仰的，他们是基督徒。事实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基督教的痕迹在宪法处处可见。虽然基督教从来不能保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发展好民主，但是没有基督教的影响，民主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无法茁壮成长。没有怜悯和原谅的品质，只有逻辑和理性的引领，一个国家无法保障任何人的自由。那些英国移民逃离了欧洲的宗教内战，又不愿意把这种战争带到新大陆，就达成和解，而美国宪法就接受英国后裔达成的有效和解，编入法典。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而国家只处理政治事务。清教徒缔造了美国。但他们在英国的祖先却截然不同，200多年前，祖先们拒绝接受罗马天主教会法典。

直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清教徒文明才开始接纳大量天主教徒，当时（除了历史性的新奥尔良社区）的天主教主要局限在东部海岸的少数大城市，大波爱尔兰移民开始抵达东海岸。到了1891年，美国人口普查破天荒地开始估算美国人口中的天主教徒数量，依据是天主教的信息来源。那一年，人口普查估算，美国6436.1万的总人口中有827.7万名天主教徒，占比13%。到了1928年，也就是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作为第一个天主教徒竞选总统的那一年，美国总人口中的天主教徒比例增加到16%（总人口120 501 000，天主教徒19 689 000）。1957年，美国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宗教人口普查，那年有两组不同的数据。以旧资料表格为基础加上天主教方面提供的教友数量得出，当年美国天主教徒大约有34 564 000，估计总人口为171 229 000，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20%。如果依据特别人口普查数据，当年的天主教徒数量是43 037 000，占美国总人口的26%。

1957年官方天主教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相差860万，这样巨大的差异显示出美国宗教数据花样百出。有一些群体，比如基督教科学家（Christian Scientists）就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们人数的估算。一些清教徒群体，比如路德教会，从受洗那一刻起就算作教友了，天主教也是这样。其他（大部

分的清教徒）群体都是从十三四岁开始算作教友的。有些年，犹太教群体只把男性教友算进去，现在的犹太教群体是根据已有的教堂会众来计算教友数（估计今天的美国有540万犹太人，是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来最大的犹太人社会）。美国所有关于不同宗教的数据，不管是州统计的还是国家统计的，都是猜测，误差率高达20%。

但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天主教徒自1890年以来的扩散情况很清楚地表明，增加的这部分天主教徒首先来自20世纪初的南欧和中欧的大波移民（意大利、波兰、一些捷克、一些德国的天主教徒），后来得益于天主教徒的出生率不断提高。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唐纳德·N·巴雷特博士（Dr. Donald N. Barrett）估算过，1950—1959年间美国天主教人口增加了35.8%，而总人口只增加了16.6%。换言之，就像他说的，“美国1950—1959年间增长的人口有41%都来自天主教徒的新增人口”。

当然，数字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点，美国政界在几个世代以前就注意到了。从美国东海岸一直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或者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那一代两党的务实政客都在研究这一变化。

总的来说，大多数天主教徒都支持民主党，理由与宗教无关。当他们作为欧洲移民刚来到美国大工业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当时的美国政治机器把控在共和党的手中，而共和党不信任大城市。所以，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民主党的阵营，而民主党恰好也在寻求和培植他们的支持。他们不仅加入了民主党阵营，在短短50年里，他们还在一部分州爬上了领导的职位，手中把控着民主党，这些州从新英格兰地区一直延伸到伊利诺伊州。比如，近几年，纽约州的62个县里，57个县的民主党委员会委员是天主教徒。（还有2个是犹太人，3个是清教徒。）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的宗教分化极其严重，以至于民主党可以称之为天主教党，共和党是清教徒党。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民主党领袖大部分也都是天主教徒。而且，依照传统，30年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一直都是天主教徒。

在美国政治中，没有什么数据是一成不变的。一代又一代，这些族群在党派间腾挪，就像黑人在过去30年从主要支持共和党变成支持民主党，数百万天主教徒也在变换阵营。过去30年，他们的生活日渐富足，不断进步，于是和民主党渐行渐远，投身共和党。“啊，”一个深感惋惜的政治领导人曾对我说，“这些人的祖父过去想当选区的头儿，现在他们自己想当乡间俱乐部的主席。”

天主教徒与民主党领袖渐渐疏远，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领导层最大的担忧。罗斯福在后来的几次竞选中，在天主教选民中不再拥有65%—

70%的领先优势。要知道，民主党一贯都把这些选票视为己有。杜鲁门在1948年的大选中又拉回了一些选票。但是后来阿德莱·史蒂文森对阵共和党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时，主要民调结果都显示，史蒂文森失去了大比例的天主教徒选票。1952年，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推测史蒂文森只获得了56%的天主教徒选票；1956年，这个比例降到51%，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天主教徒不再是移民，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恩惠才能取得进步，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一个党派，他们可以在两党候选人中做出自由的选择。这样的天主教徒，如何能让他们重回民主党怀抱，怎样才能收复这样一个庞大的美国群体的选票——成了1952年以来一直困扰民主党的命题。尽管清教徒对天主教徒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天主教自身不再囿于狭隘的政治取舍，美国的天主教领袖已经趋于成熟、精于世故，无论是和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打交道，他们都游刃有余。据悉，在1960年，如果说在美国大部分教区的天主教有任何无声的倾向，那这个天平一定是倒向理查德·M·尼克松，而不是约翰·F·肯尼迪。

虽然大家都知道，天主教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会保持谨慎的中立，但还有数百万上流社会的天主教徒坚定地滑入了共和党阵营。其实两大党都不可能争取到全部的天主教选票，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天主教徒对相同信仰的候选人会有天然的偏向。这是普遍现象，美国的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如此，比如犹太人和清教徒。如果是面对两个清教徒候选人，天主教徒可能会毫无偏颇地根据性格、经济因素、本能、期望或传统来选择，但是如果这个选择摆在一个清教徒和一个天主教徒候选人之间，亲缘问题一定会浮出水面，还是把双刃剑。问题就在于：如果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倾向于投给同宗同源的候选人，那么一个天主教徒候选人，是会得到更多天主教选票，还是失去更多清教徒选票？

民主党领导层从1924年就开始辩论这个问题，当然一般是以选举人团制度为前提来探讨。1924年，民主党第一次认真考虑提名一个天主教徒——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1928年，民主党正式提名了史密斯；自此之后，他惨败的记忆挥之不去。民主党领导层（尽管绝大多数也都是天主教徒）相信，在任何选举中，天主教徒候选人因为信仰而丢失的选票远超过收获的选票。

这就是约翰·F·肯尼迪在1956年夏天寻求副总统提名时面临的险恶环境。4年后，到了1960年，这仍然是他最大的政治障碍。东部的民主党领袖不会从教义、美国文明和包容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只重视实际选举中的数字，而肯尼迪也只能期望用数字来说服民主党大会，给他机会，来个险中求胜。

统计美国宗教信仰的数据必定是模糊、变动的。在可信度上来说，肯尼迪团队用到的算法不见得比别人差。根据他们的算法，至少有14个在大选中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值得一提，因为天主教徒在居民总数中的占比对肯尼迪是利大于弊。这些州是：

纽约州（天主教徒，40%）

宾夕法尼亚州（天主教徒，29%）

伊利诺伊州（天主教徒，30%）

新泽西州（天主教徒，39%）

马萨诸塞州（天主教徒，50%）

康涅狄格州（天主教徒，49%）

罗得岛州（天主教徒，60%）

加利福尼亚州（天主教徒，22%）

密歇根州（天主教徒，24%）

明尼苏达州（天主教徒，24%）

俄亥俄州（天主教徒，20%）

威斯康星州（天主教徒，31%）

马里兰州（天主教徒，21%）

蒙大拿州（天主教徒，22%）

这些州的选举人票总计261张，只差6张就可以拿下全国大选。但即使是这张1956年的表格（特德·索伦森和约翰·贝利准备的）也没能说服东部大城市的政治领袖（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相信，这位与他们宗教信仰相同的人能够跨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宗教分化，并在最后取得胜利。直到1960年春天，肯尼迪在全国初选中的一番努力，才令他们和其他民主党少数派领袖相信，肯尼迪会赢。

所以，当1960年夏天约翰·F·肯尼迪终于要面对全国选民的时候，美国选民身上的矛盾性把肯尼迪的竞选活动推向分裂的境地，这在各类选举中是很少见的。肯尼迪在竞选当中的谈话、演讲和思想都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都是为实现美国未来最高目标而服务。但是，这也是一场关于美国过去的豪赌，这一点不容忽视：对天主教徒和清教徒而言，过去大于未来。

如何引导超然的宗教问题走向，在实际操作中能否把恐惧和偏执的不同特质割裂开，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因为偏执是非理性的，只有死亡可以终结；而恐惧，如果以诚相待，是可以用真相消除的。

在美国清教徒的普遍记忆中，罗马天主教过去利用国家工具，通过恫吓、强力和施压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社会各界人士，这是众所周知的。任何基督教教会一旦强行介入立法事务（确实，教会在1960年强力介入美国自由邦波多黎各的政治），就要接受公众对其展开合法、公开和公正的讨论。任何一个想要竞选公职的美国公民也是如此，如果他想要把任何教会的政策代入政治，他的态度就要接受公众的检视。所以问题不是政教分离这一信条本身，而是独立的美国人对这一建国信条的态度。

任何个人都要作为个体来接受评判。在历史长河中，美国同胞们可以做出理性判断。但是当下，他们没有条件做出合理评判。那时候，很少有美国人长期生活在国外或是旅居多地，有足够的阅历，能够认识到20世纪罗马天主教在态度和习俗上的多元化，例如，法国天主教会宽厚包容，尊崇人道主义精神，西班牙天主教会偏狭，不容异己，两者究竟相去多远，美国人并不知道。也很少有清教徒意识到，美国天主教徒看待教会在公共事务上的角色也是不同的（不管他们对圣礼多么忠诚）。所以约翰·F·肯尼迪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美国清教徒相信，某个身世模糊的教皇在异国他乡所信奉的教义并不能束缚他，他只会尊重美国清教徒作为公民的意愿和自由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寻求权力。这是肯尼迪唯一的出路。在这场细致入微的运筹帷幄中，理查德·M·尼克松（就像之前的休伯特一样）只能是一个见证人和旁观者。

两名候选人从过往起航，在8月开始搅动美国人的情绪——所谓过往，既有美国最近期的发展和变化，比如萎缩的城市和膨胀的郊区，技术变革以及随之改变的工作模式，也有遥远的过去，那里有母亲的歌谣和父亲的故事，黑人遭受的屈辱和白人内心的恐惧，教会的唱诗和被遗忘的殉道者——两位候选人将为所有美国人描述一个未来，未来是战争还是和平，未来上可达太空下可抵深海，未来的学校和医疗是什么样的，未来是富饶还是灾难，不管是什么样的未来，都要先放到历史的天平上去衡量。

没有逻辑指引两位候选人，只有一个僵硬的数字是他们的灯塔，这个数字就是269——足够拿下总统宝座的选举人票数。

---

1. 值得一提的是，两党在1960年秋季大选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州长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在大选年，全国有27名州长寻求连任，其中12名州长的职位没保住，都是因为基层的税收问题。盖洛德·纳尔逊以51.6%的支持率侥幸连任。去年，重要的34个参议员席位中只有两个席位换人。很明显，当州长比当参议员危险多了。

2. 理查德·M·尼克松曾经在论证自由私营企业是国家增长的一支生力军时告诉密西西比的观众："……我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巨大增长。市长告诉我，在他任市长的这12年间，你们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些增长从哪里来？这些增长不是来自政府的力量，而是来自数十万密西西比人的力量，因为他们有自我发展的机会。"

3. 当时非白人血统达到大约1600万人。

4. 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全国黑人数量是18 871 000，占全美人口的10.5%。1950年的黑人数量是15 048 000，占全美人口的10%。

5. 1956年，亚拉巴马州屈从于联邦压力，不得不在高等教育领域取消了种族隔离措施，黑人女性奥瑟琳·露西（Autherine Lucy）在联邦法院指令的护佑下，得以进入亚拉巴马州立学院就读。但是，由于其他学生骚动抗议，校方不得不将她逐出校园。——译者注

6. 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Montgomery bus strike）是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一名非裔女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一座巴士。当她搭乘的巴士行驶过几个车站以后，巴士司机命令罗莎·帕克斯将她的座位让给白人乘客。罗莎·帕克斯认为她应该得到和白人同等的待遇，因而拒绝让座。随后，帕克斯被警察逮捕，并被罚了一张10美元的罚单与4美元的法庭审判费。罗莎·帕克斯的行为激起了一系列的民权运动事件。在她被逮捕的几天以后，一些在蒙哥马利的民权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个持续了一天的公交抵制运动。民权斗士们号召蒙哥马利市内的非裔美国人拒绝搭乘公交，步行或者搭乘的士上下班，以表达对于帕克斯的逮捕以及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公车抵制运动从此拉开帷幕。——译者注

第9章

肯尼迪的竞选之战：第一回合

现在开始的竞选活动将从炎炎盛夏持续到雪花初飘的11月，必定和所有的总统选举一样，人们置身其中始终有一种真假难辨的感觉。

在整个充满混乱的时期，美国人逐渐从酷热的夏季慵懒醒来，突然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政治舞台吹响了喧嚣的号角，各种小道消息飞来飞去，不同派别自吹自擂——连续3个月，各方难分胜负，直至1960年11月8日的巅峰对决。若真要将这几个月的纷纷扰扰编入史册，恰如包装一团纠缠难分的乱麻。每位亲历者和参与者把它们分为不同的情绪变化阶段，每个阶段又包含他们自己想象或设想的不同回合。对于每位候选人而言，第一步是竞选活动的首轮对决，为了寻求主题和目标，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始探索之旅；下一步就是竞选中期的电视辩论；最后是第三回合，每位候选人将竭力激发美国人民的热情，使国民情绪突然爆发。

对约翰·F·肯尼迪而言，第一回合初期是愉快欢欣的，后来形势突然跌宕起伏，几乎令人绝望，随后柳暗花明，闪现出谨慎的希望之光。

肯尼迪从洛杉矶和代表大会径直飞到科德角和海恩尼斯港。此时蓝色的天空泛着淡白，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微风吹过南塔基湾泛起层层白浪，阵阵涌起的水流把沙滩冲刷得干干净净。肯尼迪再次回家和妻儿相聚，借机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他和妻子杰姬、弟弟博比乘坐52英尺长的“Marlin”摩托游艇踏水逐浪，他大声对着同船游伴朗读媒体和杂志上的大会报道；他浏览着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撰写的《美国参议员》（*The American Senator*）。在新建栅栏和肯尼迪宅邸周围白格篱笆的外面，一些好事者目不转睛地窥看着里面，有时候还试图掐一支装饰着尖桩篱笆的粉色蔷薇花作为纪念。在宅邸里面，肯尼迪和弟弟罗伯特漫步走过草坪相互串门，或者光着膀子慵懒地躺在阳光下的沙滩椅上，不紧不慢地又谈起了政治——选举政治的最新动向。

在芝加哥，共和党人依然在代表大会上争吵不休，这里成为全国的关注焦点。根据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肯尼迪在全国的支持率领先于尼克

松，两人的支持率分别是52%和48%，总体情况令人满意。对肯尼迪而言，他此刻可以幸福地在草坪上与卡罗琳嬉戏，可以幸福地喝上几碗蛤蜊浓汤，可以幸福地享受惬意的阳光和沙滩，可以幸福地指挥处于他牢牢控制之下的政党机器。按下按钮——政党机器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得克萨斯州有林登·约翰逊；密歇根州有“圆滑的”威廉斯；纽约州有瓦格纳市长；华盛顿有民主党委员会现任主席——杰克逊［绰号“勺子”（Scoop）］；遥远的卡梅尔城（Carmel）有中断假期来到这里的民主党电视广播战略专家J·伦纳德·赖因施（J. Leonard Reinsch）；还有不请自来的工会领导人、特别请求人、政治策划人，他们尽早拜访是希望在白宫谋求职位。

但专家们和要人提供的观点、报告和建议都无一例外地进入同一个信息收集系统，该系统是初选和代表大会的指挥中枢。当这些老面孔在博比房子外面的草坪上召开第一次会议时，8个垫子厚厚的绿色躺椅已摆放在那里，前面摆着一部牵着绿色加长线绳的电话，他们包括：候选人和弟弟罗伯特；肯尼思·奥唐奈和拉里·奥布赖恩；妹夫史蒂夫·史密斯，新闻主管皮埃尔·塞林杰，资深政客约翰·贝利（仍然吸着雪茄，但被劝说在太阳下解下领带）；还有活跃自信的吉姆·罗，虽在春天与肯尼迪集团的选举战中留下了累累伤痕，但仍然前来助战。罗的全国选举经验可以追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他曾效力史蒂文森的两次选举，1956年负责史蒂文森选举的先期行程安排。他现在负责肯尼迪选举的顾问工作，后来参与了约翰逊的全国选举。

此刻，我们停下来研究一下罗伯特·F·肯尼迪(注)的性格。1956年选举期间，当人们追随阿德莱·E·史蒂文森的行程之际，很少人注意到在民主党候选人飞机的后面坐着一位身材修长、金发碧眼的娃娃脸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观察记录着周围的点点滴滴，此人就是罗伯特·F·肯尼迪。他当时年仅30岁，从政略显青涩，求知欲强烈，尚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年轻的肯尼迪时任1956年温文尔雅的竞选主管——已故詹姆斯·芬尼根（James Finnegan）的助理，负责候选人飞机上的联络工作。“没有人问我任何事儿，让我做任何事儿，也无人人咨询我，”博比·肯尼迪回忆起初次参与总统政治时说，“于是我有充分的时间观察一切，关于如何进行总统选举，我记了好几本笔记。”

因此，1960年，当他在海恩尼斯港准备为哥哥赢得选举而在民主党内调兵遣将之际，对国内政治毫不陌生。他虽然年轻，但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见证人，不仅深知哥哥杰克（严肃场合称他为“约翰尼”，以示尊敬）的内在个性，也谙熟美国的竞选机制。他曾经深入研究和思考候选人的日程安排、演讲撰稿人的选择、政客们的习惯、组织的优先事项。

在上述知识的基础上，他还具有独特的个性力量——这一点使所有研究背

后复杂理论或信仰的政治分析家感到困惑不解。罗伯特·F·肯尼迪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一个操行优秀的人，其笃定信仰无论在党内还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都体现了出来。对他而言，美国人行为的所有粗俗和弱点——电视上赤裸裸的暴力、作为麦克莱伦委员会（McClellan Committee）的首席顾问在工会调查中所发现的严重腐败行为、美国青年人的羸弱身体和软弱外表，都令人难以接受。尽管信仰天主教，但罗伯特·肯尼迪像一个波士顿清教徒。

此外，我们必须把他看作一个“运动反射”主导型的人物。作为清教徒式的人，罗伯特·F·肯尼迪认为男人应当努力工作、早睡早起、竭尽全力，如果不尽职尽责，就应当受到严厉惩罚。他认为男人应当战则必胜，无论是触身式橄榄球还是政治，对朋友或敌人都要毫不留情。在随后的选举期间，他的信念——凡事殚精竭虑——激励和推动着整个肯尼迪竞选团队。他的不懈努力招致了许多敌对者，也使其不断受到政客和媒体的精密分析。但从根本上讲，他是简单自然而又情感充沛的人；充沛情感与卓越才能相结合，在直至选举日的时间里，就像一个强劲马达，不断推动着肯尼迪竞选朝着既定方向前进。

在未来10周主导肯尼迪竞选的几乎所有关键决策都是8月初在海恩尼斯港制定的；后来要实施目前在草坪或家里所做的决策时，人们不应忘记罗伯特·肯尼迪是主要推手。

§首先是选举战略。9个大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拥有237张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则至少要达到269张。如果在这些州大获全胜，老南方的林登·约翰逊再增加60或70张选举人票，几个比较可靠的新英格兰或中西部州再算进去，那么就颇有胜算了。总体战略是：肯尼迪的优势兵力集中在东北部工业区，这里聚集着9个大州中的7个；约翰逊必须拿下家乡得克萨斯州；候选人肯尼迪在屈指可数的竞选日中必须给加利福尼亚州挤出4天时间，其余工作则由阿德莱·E·史蒂文森负责。

§其次是选民登记战略。1960年，美国的足龄选民是1.07亿人。据估计，大约4000万选民不愿意登记。政治学者对这一数据持两种观点，道德家认为登记投票是每个人的公民义务，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对投票漠不关心或一无所知的人应当不予理会，他们的投票毫无价值。但对肯尼迪集团而言，令人瞩目的考量因素就是那个普遍认可的政治推测：如果促使这些选民参加投票，在4000万位未登记选民中，将有70%的人投票支持民主党。于是为了在投票名单增添1000万位新成员，应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登记运动；如果这1000万位新增选民按预期投票的话，则意味着民主党增加选票700万张。这一任务将交由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的众议员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绰号“礼帽”（Topper）］负责，此人颇具魅力，是

肯尼迪的忠诚支持者，尤善于组织当地选区的选民登记运动。（在两个月内，汤普森将指导50个州的登记主席、200个主要区域登记主席和一支专职人员小组开展工作；上述专职人员小组由8位训练有素的“领导人”组成，负责人是一位33岁的英语教授。总之，肯尼迪的努力加上对手尼克松一方的推动，1960年的选票总数将比1956年多680万张。）

§再次是选战日程安排。这项工作由肯尼思·奥唐奈负责。选战日程安排本身需要技巧。从打响选战的第一枪直至选举前夕上床休息，每位候选人的每天乃至每分钟都要精打细算。为了最有效利用时间，日程表需要随着政治需求、时间与交通要求、候选人随行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建议、所有地方政治领导人的宿怨和敏感性，不断协调和修改。先遣助选人员——帮助主要候选人安排行程的小型竞选干事团队，往往在践行着美国政治中最复杂的技巧之一。一位优秀先遣助选人员本身必须兼具马戏团宣传员、狂欢节组织者、资深外交官和军需总监的综合素质。奥唐奈兜里揣着一份大体日程安排，立刻从海恩尼斯港出发了，与全国各地的政治领导人进行协商，就能够挤出的候选人个人时间与对方反复磋商。在华盛顿，仰仗着马萨诸塞州的政坛翘楚，奥唐奈建立了一个调度每个总部的基地。奥唐奈、马圭尔（Maguire）、哈蒂根（Hartigan）、沙利文（Sullivan）、奥黑尔（O’Hare）和奥戈尔曼（O’Gorman）——看看华盛顿的这份调度人员名单，就像波士顿人聚会一样，其中有个人曾沮丧地摇着头说：“等着瞧吧，当人们读到我们的名单时，一定认为这是爱尔兰厅注的翻版。”

§然后是理念。现在，哈佛大学的教授开始聚集了。自1952年以来，为了影响他的国家思维，哈佛大学的个别教授就不断地向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校友提供观点、信息和分析。几年内，他将这些人纷纷拉入朋友圈，最后哈佛大学的教师好像成了其知识输血库。1960年1月，他在波士顿的联邦大街（Commonwealth Avenue）组建了哈佛俱乐部智囊团（Brain Trust at Harvard Club）。晚餐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现在来去自如（允许其中的史蒂文森派可以随意告辞）。现在时至7月，他们准备行动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注教授将在华盛顿亲自负责演讲稿撰写细节；其他教授将根据国家政策的实质来思考、筛选、分析和准备数据，依次从大学传给演讲稿撰写人、考克斯、索伦森，最后到候选人的手中。

§最后是组织。奥布赖恩马上要乘飞机前往华盛顿，他将担任当地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干事。拜伦·怀特［Byron White，绰号“能人”（Whizzer）］将担任肯尼迪–约翰逊志愿者组织的全国负责人。在每个州，志愿者组织都必须与现有的政治机构相互协调——这是一项微妙复杂的任务。志愿者往往对组织有序的政治机构持怀疑态度，他们与政客之间互不信任，不过对志愿者的热情必须有效驾驭。每个州的问题各不相同——如果州内政治组织是由公民领导的（像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或密歇根州），问题就比

较简单；如果政治组织力量强大，自信可以毫不担心地吸收并利用好志愿者（像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那么问题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州内政治组织保守僵化、疑神疑鬼，同时与其视为敌人的公民团体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那么问题几乎是完全不可控制的（比如纽约州）。奥布赖恩无意借用了中国古代行政部门的做法（从来不在家乡省份选聘任何人担任官职），着手建立了一支来自州外的“协调员”队伍，在全国各地的公民组织和机构组织之间进行裁断。最终在选战结束之前，奥布赖恩已有43个这样的州外“特使组织”成为全国性机构的地方使节。

时间刚入8月，候选人肯尼迪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选战。

初选和代表大会过去了。

现在首先要面对尼克松先生，其次是日趋高涨和紧迫的国外压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民主党候选人简要介绍过去几周的国外形势。他们在肯尼迪别墅进行了单独交谈。两人出来时，有人听到肯尼迪说：“你的‘黑暗之袋’注难道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吗？”杜勒斯先生回答说：“伊朗的形势现在好像有所好转。”

不过在选战开始前，必须成功度过低迷郁闷的8月；在接下来8月的3周之内，肯尼迪的选战陷入了曲折痛苦的低潮阶段。

首先说一下国会特别会议。民主党领导层在今夏之初就计划、修订并评估了本次国会夏季特别会议，最初目的不是针对肯尼迪的选战，而是为了约翰逊总统候选人资格，当然现在已时过境迁了。深陷会议犹如困兽，在参议院半圆形建筑后排坐着如坐针毡，夏季游客不时投来窥看的目光（有时候，多达4万名游客穿过国会大厦来观看以肯尼迪、尼克松、约翰逊为主角的参议院大会），肯尼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及其提案在会议现场和委员会上惨遭践踏。冗长沉闷的讨论将他着力打造的清新活力形象破坏了——他无力主导会议，无力施加个人意志。在炎热单调的几周内，国会有条不紊地将春天的遗留工作清理完毕——一份“南极条约”（Treaty on Antarctica）、一份“对外援助拨款法案”（Foreign Aid Appropriations Bill）、一份“高速公路法案”（Highway Bill）以及其他几个事项。肯尼迪的一些提案在参议院侥幸过关，但他大力推动的作为进军“新边疆”的所有提案均没有通过众议院的严格立法审查：老年人医疗护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学校资助、提高最低工资——它们均胎死腹中。

现在盖洛普民调公布了另一份两周一次的抽样结果，领先形势发生了变化。盖洛普博士说，尼克松以53%对47%的支持率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说

宪法围绕国旗转，我们不妨说现代民调围着电视曝光率转；尼克松先生在芝加哥电视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尼克松到芝加哥希望通过公开内战来争取力量；不到48小时，他显然纠集了一股力量；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掌控者；他在芝加哥大会闭幕式上的接受提名演讲是整个选战中最出色的演讲。作为一位精力充沛的竞选者，尼克松先生不会满足于领先地位。因为没有必须参加参议院日常会议的羁绊，尼克松开始向南方腹地进发；他乘飞机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的同时，还组织了助选游行，其宏大规模和热烈程度干扰了肯尼迪的精心计划。由于唱名表决使肯尼迪在华盛顿根本脱不开身，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只能眼看着对手在全国各地纵横捭阖——其身影从夏威夷飞到华盛顿，从底特律再到南方腹地，肯尼迪现在急切地希望走出去。

此外，整个团队上也出现了不和谐的混乱局面。博比·肯尼迪、拉里·奥布赖恩、迪克·多纳休、拉尔夫·邓根和其他十几个肯尼迪助手搬进了位于康涅狄格大街1001号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那里的办公室已人满为患，几个月之前还只有60人，现在一下子涌入200人。他们争相抢夺电话、秘书协助、办公空间以及特别关照。全国委员会的老员工和肯尼迪团队的户外人员都满怀狐疑地相互审视，各方对另一方的做法常常极尽讽刺挖苦。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新机构正在筹建——肯尼迪–约翰逊志愿者委员会正在组建，州协调员正在遴选，新部门（人权、选举登记、宗教、农民、老年人）正在招募人员。但什么都没准备好；在叮叮当当的嘈杂声中，工作艰难推进着，人们的火气越来越大，摩擦越来越多——全国委员会的新旧员工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史蒂文森派和肯尼迪派之间，举足轻重的纽约州改革派和坦慕尼派之间，人权委员会黑人之间，考克斯演讲稿撰写人员的新智囊团和参议院肯尼迪派（由索伦森领导）的智囊团之间。全国委员会的二层办公室好像愈发拥挤，人员越来越多，但成效如何呢？一天下午，我正和在初选中如鱼得水的两位朋友聊天，这时门猛然打开了，博比·肯尼迪敞着领口、衣冠不整地冲进促狭的小隔间。看到里面坐着的是自己人，不是老员工。“你们干吗呢？！”他大喊，“我们都在忙什么呢？上路吧！明天一起上路！我要求所有人统统上路！”还没等别人回应，他啪的一下就关上门消失了踪影。这两人只是沮丧但温和地摇着头，毕竟他们与博比已共事数年。静静地坐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对他是一种惩罚；他是户外活动人员，必须行动起来，但当务之急就是坐下来认真筹划。“你知道‘我们运行良好的机器’出什么问题了吗？”塞林杰曾在家里幽幽地说。当时是8月的一个晚上，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引述了时常令他苦恼不已的一句话：“太分散了，国家幅员辽阔，让人顾此失彼。”

最重要的是，带头人的情绪逐渐影响了团队上下。约翰·F·肯尼迪的心情很糟糕，在春季长达数月的初选中，他把嗓子弄坏了；在洛杉矶大会无休无止的预备会议上，由于不断演讲，他的嗓子完全坏了。甚至沐浴着海恩尼

斯港的和煦阳光休息了两周，也没有完全治愈在加利福尼亚州罹患的喉咙炎症；他目前正在波士顿一位演讲学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声乐课程。这位老师努力教他如何利用胸腔而不是喉咙讲话，不过他还是怀疑嗓子能否撑过未来的选战岁月，希望不要像温德尔·威尔基在1940年10月中旬那样完全失音。工作人员之间的摩擦也令他心烦，公民和组织团体之前的区域纠纷让他牵肠挂肚。他完全被困在参议院半圆形建筑里了，成了众矢之的，如惊弓之鸟般小心观察着现场抛出的每个诱饵和把戏，以防隐藏着可能使他陷入绝境的埋伏。理查德·M·尼克松已经上路了；南方传来的报告很不妙；浸信会牧师开始诋毁罗马教会及“其”候选人；宗教问题现在像脓疮一样日益肿大、溃烂和危险，必须尽早切除，但从参议院难以脱身，他能怎么办呢？

“他现在的情绪糟糕透了。”这条消息在团队上下不胫而走，于是其他人的情绪也变得阴沉起来。只要他不离开华盛顿，这种情形恐怕就难以扭转。他对朋友讲，这次会议失败透顶——他和团队已经一个半月没有见面了。沉闷枯燥的会议令他厌恶透了，他真希望像英国历史上的克伦威尔那样大声呵斥：“你们闹什么呢，闹什么呢，我说你们就不配叫议会。”最后在9月1日，民主党国会领导层想办法结束了这场漫无目的的会议，候选人肯尼迪终于解脱了。

他9月2日周五下午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友谊国际机场（Friendship Airport）乘专机出发了，好像要一口气跑遍全国。周五晚上，他在缅因州竞选宣传；周六中午，他在旧金山竞选宣传；周六晚上，他飞往阿拉斯加，随后仅仅睡了4个小时，就调转机头返回大陆。在其催促下，飞机全天飞行前往底特律，周一亦即国际劳动节，他将在那里正式拉开选战序幕。近些年来，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始终在凯迪拉克广场（Cadillac Square）当着底特律装配线工会成员的面郑重开始他们的竞选之战，成千上万的工人将云集倾听候选人争取工人支持的传统演讲。

两小时后，也就是周日晚上10点15分，他抵达底特律国际机场。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跑道蓝灯明暗互现，红灯闪烁的警车在前面照明开路，迎接队伍多达5000人，有穿衬衫的，有穿女士便装的。为一睹他的风采，人们将孩子举过头顶。11点钟，他前往酒店，在喜来登–凯迪拉克酒店（Sheraton-Cadillac Hotel）参加了一场咖啡招待会，随即上床休息了。

详细回顾一下底特律第一天的选战活动或许很有意义，因为在许多这样的日子里，两位候选人不断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剧情，一周又一周，激烈的竞争连续不断，最后美国总统的选举好像更多地纯粹凭着精力和体力，而不是领导才能、思维能力或雄辩口才。

肯尼迪在前两天晚上分别睡了4个小时，到了底特律，在睡了六个半小时后，被叫醒去吃早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将参加3次早餐会。7点钟的早餐是肯尼迪通常喜欢的标准早餐：鸡蛋、熏肉、橘子汁和牛奶，一起吃饭的包括随身侍从、奥唐奈、塞林杰和鲍尔斯。第二次早餐会未事先通知，很快结束了，共进早餐的是约翰·斯温森（John Swainson）。这位年轻帅气的民主党候选人正在竞选密歇根州州长，如果胜选的话，斯温森及年轻伙伴将接任年龄大些的威廉斯–施特布勒班子，肯尼迪希望认识一下他们。第三次早餐会在8点举行，对外已经通知，参加人员还包括韦恩县产业工会联合会领导人。接着从9点钟开始，与所有的议会候选人、州内候选人及其他要人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合影留念。能够和总统候选人交谈合影，这些人一定受宠若惊。他随后又抽出半小时与工人领袖和政党领袖分别会面并简单交谈两分钟。从此之后，他们可以时常提及与“杰克”聊天的事儿了。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任务就是认真修改演讲稿，出去到凯迪拉克广场，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讲；5分钟后，回来与沃尔特·鲁瑟进行私人谈话；接着与随行人员匆忙进餐（烤鸡肉和两杯牛奶）；当队伍在楼下等候之际，再次拍照留念——与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的黑人投手格兰特［Grant，绰号“鲶鱼”（Mudcat）］合影留念，以使人权组织满意；与莉莉姐妹（Lilly Sisters）合影，与底特律不同的法官合影留念。接着由于所在楼层的电梯开关一直按着，他箭步冲向电梯，向下走进人头攒动的大厅，15分钟后前往大街开始穿越密歇根州的汽车巡回。

他首先到密歇根州博览会参观5分钟；然后到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市（Pontiac）举行的国际劳动节野餐会（在那里，他获赠一个礼仪性印第安头饰）；接着长途驱车前往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Flint），参加一场劳动节野餐会并发表演讲（同时经同意，他匆忙宣读了一份声明，对国务院处理刚果形势的做法进行严厉抨击）；黄昏时乘飞机（现在他换乘个人的康维尔“母机”，在选战的其余行程里，他将一直乘坐这架飞机）前往马斯基根市（Muskegon）机场；驱车7英里，缓缓穿过劳动节度假的欢呼人群，前往皮尔马凯特公园（Pere Marquette Park），在那里对另一个劳动节野餐会发表了讲话。此时，他的嗓音变得沙哑了。他马不停蹄，还是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他自己在酒店房间里匆忙吃了晚餐（牛排、沙拉、两杯牛奶），抽时间给还在海恩尼斯港的妻子通了电话，然后到马斯基根的露珠客栈（Dew-Drop Inn）让密歇根州第九选区民主党候选人搭了个“便车”。演讲很简短——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内容，涉及密歇根州历史和民主党历史相互交织的密切关系，然后离开去机场，晚上11点钟起飞，第二天早晨2点抵达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市（Pocatello）。（当晚在波卡特洛市有5小时的睡觉时间，接着必须起床，在爱达荷州、斯波坎市、西雅图，再参加早餐会、发表演讲、乘坐飞机、简要汇报当前形势。）

从9月的第一周直到投票日，两位候选人都是这个样子——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上路、演讲，没有一刻独处或思考的时间。

飞机下面，大巴或火车的窗外，时时掠过不同景色：密歇根州大型装配厂低矮平坦的建筑；湖泊之乡的次生林，这片土地曾经砍伐、耕作后又放弃；西部广袤无垠的平原，这里随着测量员的卷尺笔直延伸着，不像原来新英格兰的公路一样蜿蜒曲折；绵延不绝的山体，干燥少雨的褐色山地，这里主要种植西部小麦；爱达荷州波卡特洛市占地千亩的大型舰炮制造厂，这里的设备和工人曾制造出击毁日本舰队的枪炮，不过现已人去楼空；一天之后，当火车沿着旧金山海湾行进时，又看到另一种绵延千亩的景象——锈迹斑斑的退役驱逐舰有序停在泊位，就像逝去的英雄；喀斯喀特山脉的惊艳美景突然展现在眼前，这个大陆倾斜高地的内侧山坡光秃秃一片，延伸到顶部后，在靠近海洋的一边，突然是一片葱茏翠绿的冷杉林；从飞机上极目望去，可以看到积雪盖顶的死火山锥形山体，山中碧波荡漾的湖泊，浩渺无垠的太平洋；还有风景宜人的海岸线，普吉特湾的游艇星星点点，巨大的木排上摆放着有待切成压合板的木材，简易机场的旁边是过去波音制造厂的灰色残壁断垣。飞机再往南飞，可以看到威拉米特河谷的葱葱绿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上空，人们可以欣赏到成片的冷杉松树林，棕榈树首次映入眼帘，此时你进入了另外一种文明。

人们不禁好奇，候选人肯尼迪目睹这一切的时候感想如何。肯尼迪的注意力好像没有停留在他希望治理的瑰丽风景或绵延土地上面，相反，他在认真倾听人们的讲话：给他做讲解的人，为其演讲准备草稿的人，了解政治地域差别并对他在陌生地区给予指导的人。在密歇根州，你们谈论什么问题：失业？自动化？最低工资？救助老年人？在爱达荷州，你们谈论什么：自然资源？农业支持？矿业？关于波卡特洛市的大型废弃兵工厂，应该怎么处理？在斯波坎市，你们谈论什么？在西雅图，你们谈论什么：针对波音公司员工的国防政策？针对太平洋沿岸人们的对外政策？西雅图非常重视教育，是教育问题？

后来，在人们疑惑的目光中，随着选战一天天推进，形势要素发生分化，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三大不同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将随着肯尼迪在竞选美利坚总统的艰辛历程中同呼吸共患难。

第一类始终是全国观众。全国知名媒体的40位新闻记者日复一日地紧紧跟随着他。为了满足他们的心愿，他每天两次发表声明或演讲，使全国各地的上下午报纸能及时报道他的最新活动。每到一处，一堆麦克风如雨后春笋般摆在他面前，记录着他的一字一句。全国广播网稍后通过一两分钟的新闻片段进行重播。电视摄像机也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抓取晚上播放的短片。通过这些媒体，肯尼迪走到全国观众身边，他们包括懒散地收看电视晚间新闻的观众以及仓促浏览晨报的读者。不出数日或几周，肯尼迪将及

时了解到任何演讲或声明对全国观众或特定少数群体的影响。

第二类就是从战略层面精心计划的观众。总统候选人首先挑选个别州，对其选举人票进行准确计算，现在要对这些州逐个发力。在每个州，当地报纸和周刊、当地电视台和电台，将突然对这位要人的到来作为大事报道。在行程路线的两侧，在每个站点的方圆范围内，通过大型报纸发行区域或主要广播电台听众的传播，州内公民可以了解候选人的来访及行踪。无论他到什么地方，都将引起阵阵激动。假如肯尼迪在圣路易斯（St. Louis）做了演讲，旧金山或纽约的报道将寥寥数字，但在圣路易斯，将是头版新闻——不仅头版，而且还配以醒目的照片。此时的活动对相关州产生了直接影响；当地要人由于受到接见，他们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志愿者组织开始集合准备活动，候选人的私人访问使人们热情迸发，其他人也受到了感染。

接着就是个人观众。他们的数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比任何人都重要。他们包括身穿工作服和运动衫的男性，怀抱婴儿、身穿女式便服的女性，默默注视的农民，专心倾听的莘莘学子，高声尖叫的少女。他们聚集在偏僻小站、机场、十字路口，人数如此之少，让人感觉为了引起他们的关注而花费精力撰写正式演讲或制定策略实在没有必要，但他们是最重要的一群人。肯尼迪认为，无论他是何种身份，都将陷入纷然复杂、缺乏人性的事务旋涡中；他的观点、措辞、资金、日程均由他人准备；无论什么方面都要咨询下属，他的总统行政决策必须不偏不倚。因此，不属于战略策划范围的个人观众可以给他最需要的东西：温馨宜人或冷若冰霜的态度，鼓掌欢呼或漠不关心的反应。笑声、愁容、沉默、欢呼、同情、打量的眼神，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神秘交流的唯一线索。当选总统完全是双方之间的私人事务——愿意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一方，以及对他做出评判的美国人。肯尼迪作为未来的领导人必须掌握人民的脉搏，走入百姓的内心是他的目标。通过他们的反应变化，人民可以清楚地告诉他是否已达到上述目标，任何舆论调查或分析效果与之相比都逊色不少。

在选战打响之后的前10天，约翰·F·肯尼迪慢慢确定了风格和主题。记者们一天要聆听同一个5分钟的“通用”演讲6至8次，发现演讲从州到州、从城市到城市逐渐发生变化。他们既能看到影响肯尼迪选战和选举的风格变化，也能看到其主题的升华。

肯尼迪在第一轮选战之初显得紧张焦虑，声音听起来急促匆忙，好像是赶时间；对于总统候选人的合适举止姿态，他看似毫无把握——或者说听众也觉得如此。后来慢慢地，他进行短时间的十字街头通用演讲时变得轻松自如。个人私事也体现了这种变化——比如提及即将出生的孩子。出于隐私意识，肯尼迪在选战最初的日子里，有意回避妻子或其怀孕状况，因为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必须对妻子表示尊重。后来有一天中午到俄勒冈州尤金市法院后面的一个小公园里举行活动，当时阳光和煦宜人，颜色鲜亮的法院建筑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肯尼迪心血来潮地为妻子缺席活动找了一个委婉借口——“她另有要事”。接着人群传来阵阵的友好笑声。第二天上午，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将借口改为“我妻子还有其他工作”，人群紧跟着又传来善意的笑声。下午时，他的措辞变得坦诚直率：“我妻子快要生小孩儿了。”下一天在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他的理由变成了“我妻子将在11月生个男孩儿”。这已成为名正言顺的噱头式话题了；当天下午在洛杉矶的记者招待会上，该话题演变成有关宗教的严肃问题了。“你怎么知道会是个男孩儿？”有人问。“我妻子说的。”肯尼迪说。招待会以笑声结束。

他不仅慢慢变得轻松自然，更重要的是缺乏亮点的通用型演讲升级了。演讲主题不再是始终主导并影响选战的宏大主题：“美国不能停滞不前”，“其全球声望正在下降”，“这是一个担当与牺牲并存的时代”，“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在第一轮选战之初，他只是将随意收集的一些词句和逸事像布丁原料一样拼凑到通用演讲中：“总统职位的重要性”，“世界不能在半奴隶制半自由状态下存在”，“只有总统才能发挥领导作用”，“农业是我们的首要国内问题”，“自动化或是福音，或是诅咒”，“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请求你们的帮助”。

后来这种模式逐渐演变成一个主题，他从掌声中知道什么切中了要点，从冷漠中察觉什么没赢得观众的共鸣。这一点好像在他风风光光地经过加利福尼亚州山谷时表现得最明显，当时宣传列车隆隆经过南太平洋的这条线路，上面坐满了政客，美酒、人群以及与大人物近在咫尺令他们陶醉了。

火车在前一晚刚刚离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Portland），第二天早晨，加利福尼亚州插曲就在车尾平台上开始了，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邓斯缪尔（Dunsmuir）车站，这是一个坐落于巨大红树山谷的山中小站。高高伫立的红树林映衬着早上6点就起来迎接肯尼迪的人群，就像一个静默不语的观众。

肯尼迪在火车月台上演讲了3分钟，声音在山林中回荡：“……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选举之战，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看到美国奋勇向前。在本次战役中，我恳请各位给予帮助……”

一个小时后，他在雷德布拉夫（Red Bluff）发表演讲。太阳更高了，但依然没有走出林区。

在我们国家的命运面临危机与困难之际，我竞选总统职位，我竞选并非要承诺：如果本人当选，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所有问题必将迎刃而解……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内经济的活力与我们的世界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在国内停滞不前，我们必将在世界寸步难行……

下午稍晚时候，他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士满（Richmond）。他现在处于民主党的核心区域，其措辞精雕细琢。

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校，为老人提供更多帮助，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可以开发本州以及西部的资源，如果你们认为提高美国的全球形象和声誉是可以做到的话，那就站在我们一边吧。如果你们身心疲惫、不想前进的话，那就站在共和党一边吧。但我认为我们已准备奋勇向前。［鼓掌］

第二天，火车一直穿行在圣金华河谷，走出初秋乍寒的北部山区，进入四季如春的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火车在沿线不时停下，每当在葡萄之乡、玫瑰之乡、无花果之乡短暂停留时，群众都会送一些金色山谷的农产品。一天过去，他的通用型演讲逐渐变得铿锵有力，他的汽车里塞满了这个富饶山谷出产的桃子、葡萄、橄榄、梨子、梅子以及其他水果。晚上抵达洛杉矶时，他准备像过去一样扔掉就人权、宗教和种族自由主题准备好的稿子，要华丽转身——完全即兴演讲，让大厅里成千上万的人为之起立、跺脚和欢呼。

……布朗州长和本人自昨天早晨从俄勒冈州边境出发，乘坐火车一路前行，在美丽富饶的加利福尼亚州沿线，我们采摘到橄榄、葡萄、香蕉、玉米等等。或许由于这一点，我想起了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在18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次考察之旅。当时为了探寻鱼类和花卉，他们沿着哈德孙河逆流而上进行植物考察，后来顺流而下，在纽约停了下来。他们遇到了阿龙·伯尔（Aaron Burr）和圣坦慕尼协会的“骑士们”，将美国乡村和美国城市联系起来，组建了民主党。我跨越3 000英里的行程，不是为了寻找蝴蝶。我来这里是为了请求你们的支持［鼓掌］……

……我与共和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就是他们一直不相信自由制度。当我们在美国人民面前要确立我们社会未竟的事业时，本届政府已设定了上限和限度。我认为两党的业绩及其针对未来的承诺可以从过去的记

> 录中一目了然。尼克松先生与本人、共和党与民主党自两次代表大会以来不是一下子冻结在冰中或固定在琥珀中。我们就像可以追溯渊源的两条河流，通过研究他们的渊源以及走过的漫长历程，你们就可以判断出每条河流的力量、能力和方向……
>
> 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切、我们现在讨论的每个问题、上个月国会会议上举行的每次斗争，都涉及我们是否有能力在这个困难重重、危机四起的世界上生存下来……我坚信未来属于相信自由的人们……我认为世界即将朝着我们追随的方向发展……1961年，你们各位在一定意义上亦将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任职；你们各位将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方式肩负着伟大的责任。注

准确地讲，肯尼迪选战的前10天是平淡无奇、令人失望的。事先准备的演讲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演讲时，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尤其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先遣工作糟糕透了，甚至让肯尼迪都感到不好意思。在加利福尼亚州，肯尼迪之行的失败程度也是无以言表的——由于在大河谷期间行程安排不当、曝光率不足以及顾问工作欠佳，到洛杉矶时，他只能在美国这个第二大都市规模较小的空闲聚集场所之一——圣殿礼堂（Shrine Auditorium）预约演讲。

以上所述是选战前几天技术上的情况。

但这一切无论在分量上还是价值上都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事实：肯尼迪找准了表达方式，调整好了情绪，确定了对于美国未来以及前进方向的态度，这一态度将影响选战的剩余进程。他已经向自己和观众亮明了一切。这一特点愈发鲜明，以后将通过朴实无华的力量彰显自我。

肯尼迪的第一轮选战还有另一个亮点。

如果说选举之战的第一段行程（10天，17 000英里）为肯尼迪确立了未来基调，但不能说它使肯尼迪为应对过去做好了准备。这一问题即将来临。在华盛顿州，一些国内德高望重的新教教士在全美最受尊崇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领导下举行了会议，他们对天主教总统候选人的忠诚度以及推选这种人就任要职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在南部、边境各州以及各农业州，问题不关乎未来而是过去——一位天主教徒是否能够相信和忠诚于美国宪法条文？在第一轮选战结束之前，肯尼迪必须亲自应对这一问题。

全国代表大会刚结束，肯尼迪就听到了关于宗教冲突的最初抱怨和传言。数月前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选时，他们曾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宗教问题；回想起来，他们现在才意识到当时多么幼稚可笑。纵观美国的历史和传统，宗教和政治一直是相互交织的，这一问题必须再次确认。现在时至9月，由来已久的担心声音逐渐增强——不仅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等边境州这样，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南部、农业区、整个美国南部亦是如此。肯尼迪作为一个思想敏锐或见多识广的政治家，在经过生活着俄克拉何马人、得克萨斯人、阿肯色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河谷时，迫切希望了解这些忠诚的民主党人是否对信仰天主教的候选人心存疑虑；如果他们是这样，其他的数百万人也会是如此。

肯尼迪阵营从西弗吉尼亚州知道，将盲从者和真正担心的人分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坦率公开地正视宗教问题，将问题从许多新教徒担心的黑暗、恭维和奇怪仪式中剥离出来。从战术上讲，问题在于何时这样做。最初的时候，肯尼迪的战略是耐心等待，希望在10月下旬的某个时候、临近选举时，可以有效解决该问题。但选举之战的万般决策往往由于任何人都难以控制的情绪变化而被迫集中到一个决策之上。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的崇高威望在9月初使他由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变成怀有古老恐惧和偏见的人。如果在其领导下，数百万美国人的情绪逐渐明朗化，他们的立场或许将变得刻板僵化，以后再撼动他们的立场将难上加难。现在当沿着缅因州、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爱达荷州、加利福尼亚州线路马不停蹄地巡游全国时，肯尼迪做出了决定：接受大休斯敦部长协会（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希望于9月12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探讨宗教问题的邀请。他将首先做一个开场白，然后现场回答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于是当沿着太平洋海岸线追寻未来之时，其头脑主要集中在过去。整个周末，他和一神论者特德·索伦森一起在洛杉矶的国宾大酒店修改必须说的话。“周一晚上，我们将在休斯敦赢得或输掉选举。”索伦森在洛杉矶度周末时对朋友说。

截至8点30分，牧师们已在休斯敦莱斯酒店（Rice Hotel）铺着粉色红色相间地毯的大厅聚齐，出席人员有300多人，其中观众就达300人。9点5分时，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身穿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坐在大会主席赫伯特·梅萨（Herbert Meza）牧师的旁边，一起面对着观众。肯尼迪从当天清早就开始沿着得克萨斯州线路巡回演讲——从埃尔帕索（El Paso）到拉伯克（Lubbock）再到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如果说他厌烦的话，也仅仅体现在紧握的双手上方焦躁晃动的大拇指以及拳头偶尔擦一下嘴唇的动作上。

他的发言很短，充分体现了简洁利落的风格。

……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在公务上既非天主教，非新教，也非犹太教；应当是没有公务人员就公共政策请示罗马教皇、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或任何其他神职机构，或者接受其指示；应当是没有宗教团体试图将其意志直接或间接地强加于广大民众或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应当是宗教自由不可分割，即：违背一种宗教的行为当视为违背所有宗教的行为。

……这就是我所信任的那种美国。这代表着我所信任的那种总统职务，这一重要职务必须是既不会因充当任一宗教集团的工具而蒙受耻辱，也不会因擅自阻止任一宗教团体的成员担任该职务而黯然失色。我信任的总统应当是，其宗教观点是他自己的私人事务，他既不会将其宗教观点强加于国家，也不会作为任职的条件接受国家强加给他的宗教观点……

下面是提问环节，问题反映了新教徒对天主教政策存在疑虑的方方面面：

12年前，肯尼迪为什么没有参加在费城举行的跨宗教教堂授职仪式？是其宗教不允许吗？那么其宗教也不允许总统参加此类仪式吗？肯尼迪对这一情况做了澄清：他当时的受邀身份不是众议员，也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作为天主教的发言人。他不能接受这一职位；他说，如果问题是“我作为议员或总统是否可以参加与本人职务相关的贵方宗教仪式，我能够并且一定参加”。

作为总统，他如何看待南美洲罗马天主教国家对新教传教士的迫害？他回答：“我将充分利用美国总统的影响力……来促进全球范围内自由的发展……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重要权利，我希望美国总统不论地域、宗教或者……将始终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这些权利。”（他话音未落，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有人问他是否将请求其上司——波士顿的库欣红衣主教（Cardinal Cushing）向梵蒂冈转达他支持政教分离的意见。他严肃地说：“我只能说本人不会接受任何神职官员指示我在本人公共职责范围如何做事的权利……我亦不会请求库欣红衣主教督促梵蒂冈做什么。我不会干涉他们自行其是的自由权利。”

他是否接受教会影响公共生活？他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如果我的教会试图以不正当方式或者对我作为公务员维护宪法的法定职责造成不利后果的方式影响我，我将对他们说：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我对此不予苟同并坚决反对，这是一种不幸的违规行为，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干涉。我相信不会出现这种干涉行为。”

简而言之，如果发现良知和总统职责存在任何冲突，他将辞去这一职务。

说完上述一番话，肯尼迪不仅结束了第一轮的选举之战，而且和信仰相同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首次更完整具体地确定了一位现代天主教徒在民主社会应当遵循的信条。

他在那天晚上的表现影响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最初，他面对的是一群几乎充满敌意的愠怒人群，后来赢得了许多人的掌声和更多人的同情。会议在尊重和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但会议大厅的胜利究竟能将温暖的光辉传播多远？我们不得而知。国内电视网在第二天向全国播放了演讲片段。肯尼迪志愿者组织打算在国内的天主教和新教区域连续7周使用会议纪录片，这是他们的主要资料。具体有多少人看过这一反复播放的影片？我们不得而知；效果评估如何，则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肯尼迪作为一个面对危机始终保持快乐心态的人，现在感觉好多了。像是奇迹一样，他那沙哑的嗓子竟然变清爽了；几周后，他完全不用接受声音导师的持续护理了。

第二天，在林登·约翰逊和塞缪尔·雷伯恩的陪同下，他向不断聚集的人群发表巡回演讲；再过一天，他要到圣路易斯与人们见面；接着离开前往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与东北工业区众多的支持者再过一天会面交流，在这些地方他志在必得。

---

1. 罗伯特·F·肯尼迪后任肯尼迪政府司法部部长。

2. 爱尔兰厅（Hibernian Hall），国家级历史遗迹，修建于1840年，是爱尔兰社团（Hibernian Society，1801年成立的一个爱尔兰慈善组织）召开会议的场所。——译者注

3.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1961年任美国首席检察官。

4. 黑暗之袋（black bag），指非法秘密搜查。——译者注

5. 肯尼迪选举活动的便利措施之一就是无论在厂矿、乡村广场还是纽约大剧场（New York Coliseum），均可以及时获得肯尼迪演讲内容的速记副本。负责这一工作的就是声音有些沙哑的速记员雷诺兹（Reynolds，绰号“小孩儿”），这个人在漫长的选举行程中也是好伙伴。由于知道一小时后可以得到准确的副本，记者们可以放松地欣赏肯尼迪的雄辩之才。鉴于后面将说明的原因，尼克松的选举团队直到选举后期才提供这种服务。

6. 肯尼迪开场白的全文请参阅附录3。

第10章

尼克松的竞选之战：第一回合

这一整周，我身边总有记者问我："选战什么时候开始，副总统先生？"我的答案是：选战今晚开始，就在这里，就是现在，然后一直持续下去。从现在开始到11月8日，我们不会有任何松懈……

"我有媒体的朋友今天也坐在这里，他们也问过我：'副总统先生，您会把精力主要放在哪些地方？你会拜访哪些州？'我的答案是：在这次竞选中，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州视作理所当然的，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州拱手让给对方。

"今晚我向大家宣布，同时也向大家承诺，从现在到11月8日，我会把竞选活动带到所有50个州……"

1960年7月28日晚上，面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欢呼声，理查德·M·尼克松在接受提名的时候，这样描述他将发动的选战。

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启动选战也是雷厉风行。他开始了空中疾飞，从芝加哥出发，先飞到罗得岛州，在纽波特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商议，又折返穿过中西部，到内华达州短暂停留（他妻子出生的州），接着又飞到南加州短暂停留（他自己出生的州），然后穿过大洋飞抵夏威夷州（最新的州），返回的时候穿过太平洋，途径西雅图，回到首都。提名后的短短10天里，他在伊利诺伊州、罗得岛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和华盛顿州都展开了拉票活动。人过留痕，他所到之处，报纸头条都在写他精力充沛，铺天盖地地报道他的活动。大选的晴雨表盖洛普民调也掉转方向，预测他以53比47领先肯尼迪。自从1月以来，这还是盖洛普第一次预测他领先。随着肯尼迪阵营的士气急转直下，尼克松阵营的士气一飞冲天。副总统忽然开始奔跑，而且领先。他的谋士们也安下心来考虑长期战略。

共和党内一早就仔细考虑过这些战略，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实施，但还是值得探究。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共和党内能人志士打算如何铺就总统之路。

副总统的朋友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认定副总统一定会获得提名。早在

5月，他们就开始筹划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他们计划在8月就早早启动竞选，从9月12日开始连续9周的密集活动。他们从副总统接到的数百份邀请中精挑细选，细细考量在优先州有哪些合适的邀约，可以和副总统的出行、航班和后勤密切配合。所有州的主席都要填写问卷，列出他们希望尼克松在当地强调的关键问题，好拿到芝加哥党代会上筛选。他们决定广泛利用地方的电视台，郊区的竞选活动也要全力出击，到访和电视节目的行程都要在9月12日之前敲定，只留最后两周可做灵活安排。

另外，他们打算在华盛顿成立一个筹划委员会，一旦副总统确立了政策和原则，委员会可以全权处理细节和时间安排。副总统做出任何承诺都要和委员会沟通，他还同意与委员会每周见一次。筹划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竞选主席（伦纳德·W·霍尔）、竞选主管（罗伯特·芬奇，Robert Finch）、策划主管（詹姆斯·巴塞特，James Bassett）、全国委员会主席（思拉斯顿·B·莫顿）、全国委员会资深宣传主管（L·理查德·盖伊莱，L. Richard Guylay）、电视运作主管（卡罗尔·牛顿，Carroll Newton）和一名来自艾森豪威尔白宫班底成员担任联络员（罗伯特·梅里亚姆，Robert Merriam）。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运作共和党的政治机器来支持候选人，并且会拉来一些知名人士助选，比如艾森豪威尔、洛克菲勒、戈德华特（Goldwater）、杜威、珀西、洛奇、米切尔（Mitchell）和贾德（Judd），给竞选总规划锦上添花。这些名字不管放到哪里都是熠熠生辉。

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提出的一些设想还是很值得关注，至少有两个设想值得被记录在案。

第一个设想可以称为莱恩·霍尔–吉姆·谢普利战略（Len Hall-Jim Shepley strategy），主要关注思想方面，描绘出过去和未来的桥梁，而尼克松后来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早期的霍尔–谢普利战略提出一个主题，要体现刚过去的这段时期是令人满意的：国家繁荣，战争结束，艾森豪威尔给新的提名人留下一个殷实的家底——和平与繁荣。候选人就应该以此为主线出发，再大谈构筑在科学与变化基础上的未来世界。既然艾森豪威尔已经平息了纷乱，让经济走上平稳轨道，尼克松就应该唤起大家对科技即将走入生活的向往，让公众看到一个经验丰富又有活力的人，能够发展奇妙的科技，为美国和全人类谋取更大的福祉。在发展美国科学这方面，尼克松可不只是个过客，他在华盛顿那几年积攒的经验，会让他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游刃有余。如果像当时预想的那样，尼克松在秋季竞选中真的采用了这一战略作为积极的前进路线，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现在虽然只能想想，但也是饶有趣味。

另一个在竞选中早早提出的设想可以称为牛顿–罗杰斯设想（Newton-Rogers concept）。纽约的卡罗尔·牛顿（使用现代电视艺术方面最富有创

造力和想象力的大脑之一），以及泰德·罗杰斯（尼克松的私人电视顾问，最娴熟、最有经验的政治电视从业者），两人都是忠实的共和党人，都坚持认为1960年的电视运作必须比过去更有创造力。他们强调，副总统不应该照过去的风格直接面对镜头，即兴地谈论严肃的政治话题，说到哪是哪。他们提出了一个由5个大型节目组成的整体计划——一个叫作“我所认识的赫鲁晓夫”（Khrushchev As I Know Him）的电视节目，用一些短片呈现尼克松在海外的形象以及他与赫鲁晓夫冲突的画面；另一个节目叫作“1960年的你和家庭”（You and Your Family in 1960），在这个节目里，尼克松要把自己从政治环境摘出来，以一个居家男人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强调他也要面对家庭问题；第三个节目可能是以尼克松第一周全国竞选活动打头，以竞选活动亮点的短片结束。策划者还提出一个设想，在竞选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进行一场精心准备的马拉松式电视节目，在其他的电视节目上，对民主党在夏季国会季乏味的失败做一些形象巧妙的分析，准备五花八门的地方电视节目，在当地反复向民众灌输，副总统对几个关键选区根深蒂固的地方问题非常关切。但是，副总统没有马上拍板，顾问在等他的指令。

渐渐地，到了8月、9月，大家终于明白，尼克松的竞选战略只能由尼克松个人决定。

可以肯定的是，在副总统的个人计划里，有些成分和肯尼迪的核心计划不谋而合。肯尼迪选定了9个州作为主要战场，尼克松选定了7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密歇根州）。肯尼迪担心郊区选票和清教徒选票，而尼克松担心农民选票和天主教徒选票。尼克松也立刻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尼克松–洛奇公民组织；虽然有一些来自民主党的不安分改革派，在共和党内起了争执，令政党机器分裂，但尼克松并未受到困扰。他最后动员了一个公民运动，效果堪比1952年经典的艾森豪威尔公民动员。

在风格上，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战略大相径庭；在对美国竞选节奏和奥秘的把握上，两人也有直观上的不同。

首先，贯穿整个共和党竞选活动的一个宗旨就是尼克松的“节奏”理论。肯尼迪团队认为竞选要尽早开始，全速前进；而尼克松认为，任何大型的竞选都要有节奏和自然的起伏。按照尼克松的理论，一场竞选有自己的高潮低谷，不要过早地把竞选推向高潮，不要提前耗尽民众的热情，让他们感到厌倦，要适时变换情绪和节奏，这些都至关重要。

准确来说，尼克松的竞选节奏是这样的：以温和低调平静但又自信乐观的模式开场。“首先我们必须消除好战的形象”——尼克松的竞选推手们这样界定第一回合，或者像报道所说，10月初，尼克松在回应共和党中坚分子

攻击他“戴着小羊皮手套”注的竞选时所说的，“我要先摆脱赫布洛克形象注”。随着10月慢慢过去，他会脱下小羊皮手套，加快进攻步伐。到了竞选的最后3个星期，他会利用电视的一切可控元素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能够赞助的媒体广告，火力全开，让肯尼迪接招。

根据“高潮和节奏”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就是“灵活性”。

“我们要控制好，”尼克松的一名策划师在8月说，“自己的时间安排。我们不能过早锁死行程。我们不能让他失去灵活性而被绑手绑脚。”所以，当肯尼迪团队早在劳动节就敲定了出访行程和重点目标（只留下两天时间随机应变，看形势再选择有价值的拉票地点），尼克松团队一直到10月都还没有把日期和活动安排定死，可以让尼克松见机行事。

但是，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一边坚持“灵活性”，另一边，尼克松却被自己在大会上承诺到“50个州”打选战的豪言壮语牢牢绑住。1956年大选，尼克松第一次表达他想到每一个州打选战的意愿，不过当时被否决了，因为在1956年的共和党战略家们看来这样很不明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副总统在这边秀活力，艾森豪威尔那边勉强从心脏病和回肠炎中康复过来，反差明显。既然现在尼克松自己竞选总统了，他打算重启1956年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这样充满戏剧化的登场方式才能打造出他想要的“全国形象”。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战场逐渐缩小，尼克松能否拿下东北地区的摇摆工业州，形势已经明朗化。尼克松被自己的公开承诺束缚住，所以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周末，肯尼迪在人口稠密的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地区进行巡回演说。尼克松却不得不遵照承诺，不远万里飞到北边的阿拉斯加州，那里只有3张选举人票。

第二个就是“全国形象”战略，尼克松的智囊团队已经明确讨论过。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想要实施一个和民主党类似的联盟战略是不可能的。民主党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党派，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是各少数族裔的集合，他们把自己的领导地位代代相传。正如尼克松一开始所想的那样，共和党唯一可靠的战略就是让尼克松以一个没有偏私的“全国”候选人形象竞选，他的竞选财富就是自身的经验和艾森豪威尔留下的“和平与繁荣”的政治遗产。尼克松不想专门针对波多黎各人、黑人、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族群发表讲话。如果那也是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任务，洛奇可以去寻求少数族群的支持，他在联合国大会的记录让他成为美国所有少数族裔眼里的英雄，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他们保护国人的工具。

如何精准打造“全国形象”，这一命题就留给候选人自己了，因为理查德·M·尼克松在独自竞选总统。从开始到结束，他本能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孤独的

领导人。

如果说肯尼迪的竞选在低落中开局，那么尼克松的竞选就是在欢腾中开幕，地点是老南方。

8月跟随理查德·M·尼克松突击南方的任何一个记者都很难否认，那里的气氛确实令人兴奋，那光景令人陶醉。尼克松的“灵活”竞选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那时的影响，后来也很难说清楚了。整个竞选策略一直都只存在他的大脑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虽然9月、10月的那几个星期里，竞选活动扎堆，群情激昂，示威游行纷呈，但是，1960年8月26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桃树街（Peachtree Street）和赫特公园（Hurt Park）所发生的一切，还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正是那天用火一般的热情欢迎尼克松的亚特兰大人，后来却让约翰·F·肯尼迪大比分领先尼克松（62.5%对37.4%）。这竟然是同一拨人所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要知道，肯尼迪在亚特兰大的领先优势可是超过了除新英格兰地区罗得岛州之外的其他州。

那个星期五的早上，约翰·F·肯尼迪还被困在国会会议中，副总统就早早溜出华盛顿，到亚拉巴马州向热情的观众发表演讲。在回程路上，下午3点左右经过亚特兰大，他稍作停留。竞选车队从亚特兰大机场出发，沿着新建高速公路小心翼翼地开着，城市的轮廓渐渐跃上山脊——州议会大厦的金色穹顶闪闪发光，气派的现代建筑立于山顶，大量塔楼从中间冒出——典型的北方城市印象。9天前，副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享受了热烈欢迎，当天早上又在亚拉巴马州受到同等待遇，但是佐治亚州可是民主党最牢固的票仓，怎么会这样？

当车队爬上山坡，开到桃树街的时候，所有政治上的流言蜚语和淡淡的希望都在一瞬间坐实。下午3点左右，街道上的亚特兰大人不是三两个，不是整齐的政治游行，人行道上全是人，有的地方站着5排，有的6排，有的8排，他们在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上堵塞了交通。从车窗看出去，各种五彩纸屑、彩纸带和红蓝金色的亮片像下雨一样落下来，越来越密集，变成一场彩色的暴雨，后来两位候选人穿过纽约市华尔街时享受的欢迎礼都不及这次壮观。亚特兰大人挥舞着横幅，叫喊着，外围的人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厚，直到后来车队以龟速前进。他们到了亚特兰大著名的五点区（Five Points），车子从桃树街左转，上了埃奇伍德大道，开始下坡开往赫特公园。亚特兰大人突然失控，热情的浪潮几乎淹没了他。从那里到赫特公园的路上，车队失去了秩序，连戴白头盔的警察、中年妇女和理性的年轻人都一路小跑跟着他，仿佛他有种魔力。他们尖叫着，欢呼着，和那些穿着白裙子、戴着红白蓝帽子的年轻女孩儿一样，一路高兴地在车队后

面飞奔。那些女孩儿扭动着腰肢和屁股一路跟着尼克松小跑到公园。赫特公园的人群面积有两三英亩，有的挤在大理石的矮护墙上，有的堆坐在游泳池边缘，有节奏地尖叫着喝彩，渴望聆听他的演讲，等待臣服于他。14年的竞选生涯，这是迪克·尼克松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会，他将在这场集会上发表演讲。当然，在后来的竞选活动上，他还会向不同的听众发表多次同样的讲话，但是那天，他是真心实意的，他处于最佳状态。

最先出现在我记忆里的，是那天他演讲的声音，清晰、洪亮、圆润，缓慢而有自信。（在后来的竞选活动中有一个奇怪的趋势，选情越来越激烈，尼克松的演讲却变得越来越急促和消沉；相反，肯尼迪一开始声音沙哑，语速很快，后来却放慢速度，声音洪亮。）我记得这场演讲，还因为这是竞选的第一场。接下来的10个星期，演讲的内容在全国又重复了数百次，虽然他会在不同的场合去掉或者添加一些内容，但竞选的最后一场演讲，他用的还是这篇通稿，也算是首尾呼应了。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的这篇通用讲稿里投射了他关于1960年的基本宗旨和想法，其他正式场合他所做的即兴演说和精心准备的讲稿，都不及这篇犀利。

演讲一开始，他友好和气地提到他个人和佐治亚州群众的联系。副总统说，他在杜克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个来自佐治亚州的男孩儿，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现在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他是纽约乙基公司（Ethyl Corporation）的副总裁，比我挣得多多了！［掌声］因为我在杜克大学法学院和比尔·珀杜（Bill Perdue）同宿舍3年，我了解了很多佐治亚州人的传统、文化和智慧，而且比你们想象得更深入……”

阐明了自己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后，尼克松驾轻就熟地转到政治话题，这个模式继续延续到其他地方。

> 在我来这里之前，有些人说：“你为什么要去佐治亚州？”他们说：“说到底，如果连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都无法拿下佐治亚州，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又何必费心来这里？要知道无论是担任总统还是竞选总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都是本世纪最受欢迎的。1956年，他获得900万票，赢得了选举。”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历史调查，猜我发现了什么？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里，没有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到佐治亚州打过选战 ……我不认为这是件好事，或是好的形势 ……我相信：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是时候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不再把佐治亚州和南方当作理所当然的票仓了……也是时候让共和党候选人不要再把南方拱手送给民主党候选人，是时候来这里了。因为这个州的民众，我们全国的民众，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未来4年领导这个国家和自由世界的人。

然后，他谈到了选择候选人和党派的问题。

> 不要根据候选人的年龄、宗教信仰和性格做出选择，不要根据党派被贴上的标签做出选择，要看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与你们更接近，不要管这个党派的标签，把票投给那个与你立场更一致的人。这才是做选择的方式。［掌声］
>
> ……我想谈谈，在我眼中，此次大选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知道问题是什么。看看坐在泳池边的那些男孩儿。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在一个无须妥协的和平世界里长大。［掌声］因为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计划、最好的健康保险计划和最好的就业机会，即使我们现在来不及享受也无碍……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到和共产主义领袖在会议桌上打交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人更有经验、更有能力，我相信他将是下一任副总统，亨利·卡伯特·洛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在阳光和煦的广场上听到这样的谈话，缓缓地，温暖地，像面对面的聊天，像朋友一样，几乎每句话都会被掌声打断，他说到“无须妥协的和平”和“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名字时，掌声几次达到高潮。说到无须妥协的和平后，尼克松迅速过渡到另一个核心主题，美国领袖与苏联人在会议桌上的对峙，以及峰会的破产。尼克松解释说，有些人说，艾森豪威尔应该在会议桌上立刻驳斥赫鲁晓夫。不过“我也有过与赫鲁晓夫先生会谈的些许经验，虽然只是在厨房里进行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发脾气只会导致“核灾难”。另外一方面，他说，总统应该道歉吗？（“不！”群众高呼。）当然不，“我们永远都不希望，一个总统，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需要为捍卫美国免受潜在敌人的突袭而道歉或后悔”。（在这里，雷鸣般的掌声把演讲推向了高潮。）

第二个主题是国内事务。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都想要更好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比我过得好，就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告诉我的一样。”但是谁来替民主党的所有承诺埋单？联邦政府？不！过去确实是这样。但是他所在的共和党不赞同，如果在场的人当中，有人觉得自己能更好地支配这笔钱，那就不要把这笔钱上交到华盛顿。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拿到华盛顿来解决？不。我们180年的历史证明，让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是错误的。

这样，话题就引到了各州的权利和联邦政府的权利。他宣称，共和党才是真正坚守杰斐逊原则的，而民主党是背离的。所以，在11月的时候，他说数百万的南方人投票给共和党，不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民主党，而是因为民

主党抛弃了他们。

接近尾声的时候，演说升华到精神层面。当然，日后的演说也都延续了这个模式。他提醒大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对美国抱有信念，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有重要意义。最后，“……我只请你们……做这一件事。想想我说的话，想想我的对手和其他人会说什么，大选当天，不要根据党派标签来投票……要为美国投票，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也一定符合佐治亚州和在场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群众再次欢呼，尖叫，高歌，吹口哨，尼克松享受着古罗马凯旋式。头顶上两架飞机悬挂着横幅，上面写着“今天是亚特兰大的尼克松日”。15万人聚集在这里听他演说，现在慢慢解散。外面在为他举行一个招待会，数千人围拢在那里。这个时候，亚特兰大居民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至少看起来如此。现代南方的一位智者拉尔夫·麦吉尔（Ralph McGill）说：“这是自从《飘》（*Gone With the Wind*）问世以来亚特兰大最大的事。”

那天晚上，记者搭乘媒体专机返程。他们在飞机上掂量刚刚发生的事情，游行是可以策划和制造的，但这种狂热的局面，不可能是人为的。尼克松此行对南方意味着什么？南方会动摇吗？一位和尼克松更亲近的记者说：“关键不在这里。重点不是这次的行程对南方有什么影响，而是对尼克松有什么影响。我都能想象出他此刻在另一架飞机上的画面，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梳理思路，拆解剩下的日子。现在重点是他怎么看南方，而不是南方怎么看他。”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非常敏锐和到位。8月突击了3个南方州之后，尼克松发现，南方州民怨沸腾，20年来都在渴求新的领袖。他的一位助理解释道，他突然到访北卡罗来纳州，本来只是为了“扰乱杰克·肯尼迪的大后方，扰乱他的心神，让他在那里费点儿心”。因为在北卡罗来纳州凯旋，他后来又拜访了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谁料想，他在这两个州更是大获成功。试想一下，还有哪一个选举战略家能对这股影响力视而不见。

在芝加哥的时候，尼克松就已经权衡了选举战略。之前，尼克松团队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自由开明的民权方案，用来争取东北关键工业州的黑人选票，另一个是稍显温和的备选方案，用来争取南方白人的选票，从而拿下旧联邦州。尼克松仔细考虑了这两个方案。他当时倾向于选用洛克菲勒的民权竞选纲领，也依此做出了关键决定，把目标瞄准了北方的黑人选票。但是，亚特兰大的集会游行如此壮观狂热，不免吊起了他的胃口。能不能把南方也拿下？这是个难题，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尼克松和肯尼迪都在斟酌这道难题：一个候选人怎样才能把南方白人和北方黑人的选票都拿下？如果可以，那他就赢了全国大选。但是怎么做呢？接下来到投票日前，两位候选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答这道题。但是尼克松相信“灵活

的”竞选策略，灵活意味着变通。所以对他来说，那股诱惑力就更急切，扰得他心神不宁。

从开始到结束，尼克松的竞选总是笼罩着一些悲哀的成分，一系列的插曲让人对他心生同情，就连最怨怼的对手也不例外。在所有插曲中，最糟糕的莫过于他的病痛。去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路上，他的膝盖骨撞到车门，感染了。亚特兰大大胜两天后，医生通知他，这不是普通的感染，而是由溶血性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除非他立即住院并固定膝盖，否则他的关节软骨将会永久损伤，或者更糟。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忽视这样的医嘱，所以，从8月29日到9月9日，他都躺在沃尔特·里德医院的病床上，腿上做了5磅重的牵引。他大动肝火，急不可耐地想要出院上路，那股不耐烦的劲儿像极了几周前的约翰·F·肯尼迪。

在这种不耐烦和恼火的情绪下，他后来做出了一系列关键决定。这些决定有多重要，当时并未显现，一直到9月底，他面对电视镜头的时候才显现出来。从本质上来说，住院意味着尼克松有整整两周时间不能参加竞选活动。如果他想遵照当初的决定，在所有50个州打选战，就必须超时工作，才能弥补那两周，但这样会榨干他的精力和身体。但是尼克松已经急不可耐，冲动，不听密友建议。他一离开病床就安排活动，似乎势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这就像在马拉松比赛中用冲刺的速度起跑。他的冲动，从他出院5天后安排的一天行程就能看出来，从9月14日星期三的傍晚到9月15日星期四的夜里，一共36小时，他的活动满满当当。

9月9日星期五傍晚，尼克松出院，已经安排好从9月12日星期一正式开始竞选活动。星期一早上，他就从巴尔的摩友谊机场出发，飞机在雨中起飞，早上就到了印第安纳州波利斯。他参加了一场秩序良好的集会；下午又转抵拉斯，参加了一场狂热的集会；晚上，他又去了旧金山的一场集会，那时他的声音已经沙哑。

旧金山的集会结束后，他只睡了6个小时，星期二早上又爬起来在旧金山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接着又去了华盛顿州的温哥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爱达荷州的博伊西，这些都是同一天的行程。星期三，他从爱达荷州的博伊西飞到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Grand Forks），再到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Peoria），会见党内官员，问候显要，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飞机上同时赶两个重要的政策演说稿：一个劳工政策演说和一个农业政策演说。那个农业政策演说稿，他已经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准备了一段时间，而那个劳工政策演说，于他有格外的感情。他在病床上烦躁不安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9月15日星期四的早上，他要在圣路易斯发表劳工政策演说，不过遭到了员工反对，因为星期四后的那一天，他要发表农业政策演

说，这样安排时间太紧张，根本没有多余精力来准备。但是无论是在华盛顿的病床上，还是在此刻的路上，尼克松都坚持要在星期四发表这一演讲。

星期三，在他离开病床的第五天，他带着感冒从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飞往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现在是晚上11点，他要离开皮奥里亚，往南飞250英里才能到圣路易斯。他的感冒还在调理，午夜过后不久，他抵达了圣路易斯。当地下着毛毛细雨，他在酒店房间里工作到凌晨3点，准备早上在国际机械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发表的劳工政策演说。3点，他准备睡觉，但是睡不着。他叫来一名助理，一起坐了一会儿，终于睡着了。3个小时后，他起床了，去给机械师演讲。冷淡的观众只是报以礼节性的鼓掌（约翰·F·肯尼迪前一天刚在这里发表了演讲，反应良好）。接着他又从圣路易斯飞了900英里，跨过美国大陆，来到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向一群女性共和党人发表演讲。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刺耳，随行的媒体被告知他得了花粉热。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他结束了在新泽西州的演说，接着又要去南方，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Roanoke）。他到罗阿诺克的时候已经七点半左右了，接着驱车前往罗阿诺克体育场。在山上凛冽的空气中，他边说边发抖（他发烧了）。在模糊的视线中，他看到一支美国高中乐队，演奏者戴着流苏饰物，鼓手队长穿着红白金色的衣服，流光溢彩的画面，本应令每一场总统竞选活动熠熠生辉。晚上十点半，他离开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登上飞机，一路飞回中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奥马哈东边相距不过350英里的地方，就是他最初启程的地方。

一连几次这样的奔波，不仅让尼克松自己筋疲力尽、才思枯竭，也在过度消耗他的员工。更糟糕的是，它在过度消耗媒体。在向美国民众作报道前，媒体自身要先获取信息，并加以理解。一个重要候选人，在一个重要的政策演讲中，阐述农产品剩余这么复杂的问题，他的想法和建议都应该提前告知媒体。如若不然，不管记者多努力，最多也只能给出一个机械性的总结。整整两天，尼克松在高压之下，间或还受发烧之苦，心无旁骛地准备农业政策演说，身边有最出色的智囊提供咨询。这样精心准备的演讲，却没有人提前把内容告知随行记者。一直到媒体专机跟着尼克松的飞机从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起飞，驶入夜色中，疲惫的记者们才拿到第二天的讲稿。他们的状态也不比尼克松好多少，却得马上把讲稿转换成简单易读的新闻报道。尼克松认为，他提出的处理农产品剩余的建议，是解决农场问题的关键。记者们都很勤勉，他们竭力解读这份复杂的提议，撰写新闻报道，但过程艰辛。他们只能尽力了。

完成正式报道后，他们开始写一些软性新闻，阐述个人的解读。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样的解读更精准，但其中当然不乏揣测臆断。我在这里重现一

些当时的新闻导语，也能再现媒体觉得遭到粗暴对待时的表现。

“艾奥瓦州加斯利森特——尼克松副总统今天说农民应该自己吃掉多余的库存，从而解决剩余问题……”

“艾奥瓦州加斯利森特——尼克松副总统今天说农民贪婪无度。他建议他们到城市工业中找一份他所谓的‘正当工作’……”

“艾奥瓦州加斯利森特——尼克松副总统今天承认农场问题太庞大，共和党无力应付。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会任命休伯特·H·汉弗莱担任农业部部长，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艾奥瓦州加斯利森特——尼克松副总统今天呼吁教皇若望二十三指引大家找到方法解决麻烦的农场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清教徒……”

也许这些供个人消遣的稿子里有任何恶意成分的话，在正式稿件里绝对没有；如果这些恶意有源头的话，那源头就在前面那架载着尼克松和工作人员的飞机里。那年很早的时候，尼克松和他的工作人员就认定媒体是敌人。他们打定主意，只有通过电视才能直接用情绪感染美国民众。这些决定产生的合力，我们稍后可见分晓。

媒体和公众不知道共和党候选人身上发生的不幸，他的团队隐藏得很好。对感染的膝盖进行抗生素治疗让尼克松筋疲力尽，他轻了8磅。之后，他每天喝三四杯巧克力麦芽营养饮品来恢复体重。在竞选的第一阶段，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还是很耀眼。不过，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身上的奇怪现象，尤其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注重形象的人身上，就更加令人费解。

例如，你会发现电视荧幕和摄像镜头这种冷冰冰的电子设备对外貌很苛刻。一天晚上，尼克松在旧金山的联合广场演讲，我坐在距离他几英尺远的媒体区；我看到一个当地的记者带了一台便携电视机，这样就可以同步从电视荧幕上观察他。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本身是一个帅气年轻的美国人，只是最近刚出院，稍显消瘦，却魅力十足。他看起来和纤瘦健康的肯尼迪一样轻盈，肯尼迪几乎算得上是运动员的体质了。对着这群友好的观众演讲时，他的脸上挂着笑容——尼克松与朋友相处时总是露出明朗得近乎灿烂的笑容。宽脸，深眼窝，浓眉，宽阔的额头，这样的五官让尼克松给人一种健康阳刚的感觉。但是在电视上，他的深眼窝和浓眉在脸上投下阴影，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当他言辞激动愤慨的时候，电视上的他看起

来一脸凶相。当他转身的时候，秃秃的前额微微发光，顶着一个V型发尖，浓密的头发格外显眼。他笑的时候露出洁白的牙齿，但是电视主持人露齿而笑的时候都有这样洁白的牙齿，所以这样的笑容毫无意义。

另一个观察就是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在一个不友好的地界上，或是对着一群冷漠的观众演讲时，他的声音会变得悲伤或是严厉刺耳。但是面对友好的观众时，他就会变得温暖、容光焕发、光芒四射。

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鸣锣开战的头几天，主要是试探民众的心声，发展自己的路线。他第一天飞越美国的征程表现精彩，从巴尔的摩到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再到达拉斯和旧金山。他在西北部和中西部一直情绪高涨，在黑色星期四情绪跌落谷底。星期五，他在奥马哈醒来，出席在市政礼堂举行的早餐会（8点，他只睡了4个小时），那时他仍然苍白憔悴。奥马哈的共和党中坚力量举行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会来声援他。然后，他从奥马哈穿过密苏里河到达艾奥瓦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Council Bluffs），那时太阳已经下山。出生于小镇的他在这里感到很自在，欢迎他的群众都喜欢他，爱戴他。他的精神明显提振，好像又充上了电，能量满满。

接下来的一天，尼克松的车队在艾奥瓦州穿梭，类似的日子在以后会出现很多次，其中包含大量信息。

一整天，从早到晚，车队都在大平原上移动，朝着密西西比河的方向行驶，从康瑟尔布拉夫斯出发，一路经过雷德奥克（Red Oak）、大西洋镇（Atlantic）、加斯里森特、达拉斯森特（Dalles Center），到得梅因，路边的玉米地快丰收了。车队一跨过密苏里河，满眼都是玉米株，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成熟，从上到下，颜色由深到浅。玉米须已经变成棕色，叶子黄了，不过接近地面的玉米秆上叶子还有大片绿色。在艾奥瓦州肥沃的土地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玉米地，玉米林在微风中波涛滚滚。整个大地仿佛坠入一片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浪中，棕色的玉米须就像浪头的泡沫。过了一会儿，玉米地让人视觉疲劳了，你会开始注意玉米之外的东西——间或有几片高粱地，露出红棕色的高粱穗；几块深绿色的大豆田；斜坡上散落着成捆的干草，就像摆在绿草地上的黄色多米诺骨牌；田地里黄色、红色或绿色的农业机械闪闪发亮；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流淌着小溪和小河，岸边的矮灌木丛勾勒出线条。但是一下午过去，接近黄昏的时候，视线内还是玉米，你才会意识到眼里看到的一直都只有玉米，一整天都是。从密苏里河到得梅因一路开了125英里，都是玉米地；得梅因再往前150英里，还是只有玉米。如此无边无际，已经超过一个人的忍受范围。因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粮食生产文明，而且1960年的夏天，艾奥瓦州的玉米种植面积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将收获740 590 000蒲式耳玉米，随处可见的铝桶和塔式仓库已经堆满了剩余的谷物，但是还得再往里面装。对于渴望粮食的地方，这样巨大的生产力是一种福泽，但是在艾奥

瓦州，丰收几乎是一种诅咒。没有政府计划，没有外力强迫，这里的粮食都是强壮英俊的当地人种植的。和这些人在一起，在这些小镇上，在阳光下，理查德·M·尼克松像回到家一样。

当尼克松进入艾奥瓦州的一个小村庄时，街道两边排着学生。他们挥舞着美国国旗，直到车队进入了一条山间小路。路边插着薄荷绿的条纹小旗子，在风中飘舞。尼克松在一个丰收庆典旁停下来（在雷德奥克斯），丰收的桌子上摆着成熟的玉米穗，已经剥了皮，露出斑驳的玉米粒，多彩的玉米粒像珠宝一样镶嵌在玉米棒上。在这里，他的状态最佳，因为他在这样的小镇找到了共鸣。这些人是他天然的支持者，他懂他们的俗语。所有的趣闻逸事，所有的用语（“顺便说一下，现在……现在听我说……你们得想想那个家伙……”）让他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出身小镇，他懂他们。在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上少有洋洋洒洒的演说，最动人的一次就是接受共和党提名的那一次。尼克松讨厌照着提前准备的稿子说，他喜欢即兴演讲；他演讲的时候无法调动大家的热情，很难逗人发笑，或是让人呛住，但是肯尼迪做得很好。尼克松的风格简单质朴，只有雷德奥克斯这样的小镇才有人欣赏，每一次蹦出的妙语金句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掌声会有节奏地响起，从“无须妥协的和平”到“我的搭档，亨利·卡伯特·洛奇”，到“他不想花自己的钱，只想花你们的钱”，再到最后煽情的“美国的精神财富”。艾奥瓦州后来把56.7%的票投给尼克松，所有产玉米的农业州都效仿（堪萨斯州，60.4%；内布拉斯加州，62.1%；北达科他州，55.4%；南达科他州，58.3%）。在美国几个主要地区中，艾奥瓦州表达了对尼克松最坚定、最有决心的支持意愿。

分析师后来把尼克松在农业带的胜利归因于宗教和偏见的影响。在美国其他州确实是这个原因，但在作者看来，在农业带起作用的不是宗教，而是小镇文化。这些人，从本质和成长经历，从说话方式和文化上来说，都是尼克松的同类，他替他们说话。约翰·F·肯尼迪的节奏和哈佛式文章，民主党严谨的语法和高雅的调调，与这些人格格不入，让他们生疑。

在艾奥瓦州的阳光和玉米带中，尼克松恢复了精神，但他的情绪起伏还是很明显的。早上，他在小镇之间穿梭，心情振奋；中午，他在艾奥瓦州大西洋镇的国民军联盟纪念碑（Memorial of the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旁的森尼塞德公园（Sunnyside Park）吃了盒饭（炸鸡和火腿三明治），接下来就到了这一天的高潮——在加斯利森特德发表农业政策演讲，那里正在举行州耕地大赛。演讲进行得很糟糕。太阳下，农民和妻子坐在山坡上，听他讲解决农产品剩余的建议。他们无动于衷，麻木冷漠，就像他们与美国政治的两个党派都疏离了一样，就像无人能触动他们一样，连尼克松都不行。尼克松慌了，他把演讲稿尽量压缩，然后转到和平与战争的话题。“无须妥协的和平”一出口，他的心里再次踏实了，他又

说了一些管用的妙语金句，然后起身走动起来。边走动边说的时候，他光彩照人，逗弄着傍晚来看他的孩子们（“亏你们下午还跑来看我，学校根本不让你们为了这个离开”）。天黑之前，他到了得梅因，正处于巅峰状态。

尼克松的第一轮竞选活动让他不由得欢欣鼓舞。在南方的现身让他成绩斐然，在他穿过中西部的时候，他走到哪里都有共鸣。他在按照计划和步调前进，有些顾问抱怨他的演讲太“保守”。他告诉他们，他还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抹掉好斗的形象。当然，连续的行程和演讲让他体力透支，不过不会再有一个黑色星期四了，而且他也在努力缩减灵活的行程安排。他的身体开始好转，体重也回来了一些。

所以尼克松（和肯尼迪一样）即将迎来选战的第二回合和电视的挑战，这种经历不仅是本次选战开的先例，在整个美国政治历史上也前所未有。

---

1. 戴着小羊皮手套，指温合软弱的竞选。——译者注

2. 赫布洛克（Herblock）是《华盛顿邮报–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Post-Times Herald*）的漫画家，他把尼克松描绘成一个胡子拉碴、深色眼睛、双下巴和高翘大鼻子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阅。尼克松极为敏感，被赫布洛克漫画刺得遍体鳞伤，核心圈子以外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被伤得那么深。他不允许《华盛顿邮报–时代先驱报》送到他家，理由也很合情合理，他不希望孩子们看到赫布洛克的漫画。尼克松渴望被人喜爱，渴望被东部世界接受。东部世界对他而言如此陌生，他的“新尼克松”行为和演讲都不能被这些自由主义者接受。“迪克的问题，”他的一个朋友说，“就是他被东部自由主义者洗脑了。如果他活到100岁，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幅漫画——胡子拉碴的尼克松从下水道爬出来，一支乐队和一群政府官员向他致敬。”

第11章

第二回合：电视辩论

1960年9月26日芝加哥时间晚上8点30分，上一个电视节目刚刚结束，接下来几秒钟就开始播放吹嘘利格特和迈尔斯香烟的广告，随后15秒钟是美宝莲睫毛膏广告——“眼部美容、柔软肌肤的专家”。突然，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遗憾地告诉收看本频道的观众今晚将无缘欣赏《安迪·格里菲斯秀》（*Andy Griffith Show*）了，下面登场的3位主角将见证美国总统政治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发起人不是这3位主角——约翰·F·肯尼迪、理查德·M·尼克松或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这场革命源自奋斗不息的美国技术天才，普普通通的美国电视机是它的唯一代理和组织者。今晚，它使美国的每个族群有幸在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会议上同时相聚，认真思考如何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做出抉择。

统计数据是这场革命的最佳诠释。10年前（1950年），在当时美国的4000万个家庭中，仅有11%（或者440万）的家庭买了电视机。截至1960年，美国家庭总数增加到4400万个，其中至少88%或4000万个家庭拥有电视机。过去10年中，购买电视机的人们好像是一拥而上，在1954—1956年，集中购买电视机的数量达到顶峰；一年中的每一天，至少1万个美国家庭首次购置新电视机。人们蜂拥购买电视机所带来的变化是难以估量的。截至1960年夏天，美国家庭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是4到5个小时。电视究竟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影响？大型电视网调研部门做出了最佳判断。根据调研结果，现在首次可以回答好奇的外国来宾关于美国人晚上究竟做什么的问题了。答案显而易见：他们在看电视。仅在10年之内，这种媒体取得了飞跃发展，它对于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力不亚于美国的学校和教堂。

在短短10年内，电视机从商业性实验演变为社会性威胁。这种迅速发展给美国文化带来的冲击效应在未来数年内始终是独立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我们在此关注的是政治和权力。实际上，影响美国人思想的电视媒体力量主要集中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三大电视网总部，这一点也是美国国会及管理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长

期挠头的问题。让国会为难的主要问题包括：出版自由的神圣原则是否能够不折不扣地适用于现代美国广电领域。如果像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言，仅有3家出版机构可以向全国发行文字内容，那么国民对如何管理这3家出版机构的关注也可能不限于“出版自由”了。国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虽然直到1960年夏天还一如既往地重申尊重电视台的言论自由，但始终对电视台在政治上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予以限制。实际上，针对广播电视系统的法规允许所有方自由播放粗俗、低劣或商业内容，但几乎不允许或禁止自由表达政治观点。

在1960年前的好几年内，这些限制规定一直令广播电视网的运营商们颇为烦恼。作为营利性企业，无论运营压力多么大，他们也不仅肩负着美国新闻传统的责任，而且跃跃欲试地希望为启迪、教育和影响美国人思想出一把力。最糟糕的时候——这是普遍情况，电视是美国文化最蹩脚的表达方式之一；最好的时候——这是罕见情况，它为观众呈现出摄人心魄的壮丽景象。像多数正常人一样，那些电视运营商渴望在发财致富之后，能够展现出他们最美好的一面。

1960年，电视系统越来越渴望展示出他们最美好的一面。电视运营商们对公众批评非常敏感；对见诸报端的任何不利言论，他们像青少年那样公开退缩和难过。1959年，他们遭到自行业创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波公众批评和挖苦。1959年“付费点歌”丑闻的冲击波；国会针对这些丑闻举行的听证会；“谷登堡”媒体（注）社论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些丑闻，而且批评了浸透着暴力、粗俗和西部武侠片的节目；上述的一切不光彩使他们有了自卑情结，而且也使其担心以承担“公共服务”法律责任为条件而慷慨获得的特许播放权被收回、限制或取消。“升级”电视的时机到了；1960年的总统选战好像是天赐良机——但愿国会能够放宽束缚和阻止电视展现最美好一面的法律法规。

在1960年冬春之交，以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为首的广播网请求国会允许它们充分发挥其能力，同时在公开听证和做证中不断要求取消传播法中的一段技术内容（称为315条款）。315条款一般叫作“对等时间”规则，这一条款规定每家广播电视台在向任何候选人提供“免费”时间时，必须向竞争相同职位的其他候选人提供类似的“免费和对等”时间。但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解释（尤其是1959年的拉尔·戴利决定），广播电视台不仅向两大政党的候选人提供对等时间，而且包括每个竞争相同职位的每位候选人。对于1960年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电视网不仅要向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提供时间，而且包括在美国政坛一直活跃着的小政党派别。（1960年，除了约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尼克松，实际上还有14位其他候选人要竞争总统职位。（注））拉尔·戴利决定不仅限制直接向两大政党的候选人提供时间，而且严格减少电视台以前对已

确认为候选人的任何人进行公开报道、记者招待会或讨论和访问的权限。广播电视网公开呼吁春天举行听证会取消此类限制：5月前，有人在国会提交议案请求允许特别针对1960年的大选暂停315条款；6月27日，315条款被正式暂停，广播电视网参与政治的力量逐渐摆脱了束缚。

了解1960年辩论为什么不同于电视传媒以前在政治上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电视至少从1952年秋天就开始在政坛初露锋芒，当时通过一次节目，电视使理查德·M·尼克松从饱受诟病的副总统候选人转化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选战的殉道者和重要人物。但是自1952年到1960年，电视只能用作一种耗资不菲的政党工具，其时间只能由政党为各自候选人出资购买。这类电视节目党派特色鲜明，它聚集的观众和政治集会没有两样，都是各自的忠诚观众——共和党候选人的忠诚观众、民主党候选人的忠诚观众。一般而言，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电视节目，其观众人数也连同档商业节目的一半都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候选人及电视顾问竭力在全国观众最喜爱的重要节目中间插播2分钟或5分钟的宣传广告；如果仅播放两三分钟，普通观众不会停止收看对方党派候选人的宣传，因此候选人利用“插播广告”更有可能走近对方党派的成员以及吸引为他们投票的“独立人士”。由于两位主要候选人同时出现，1960年的“辩论”创意预计将首次把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集中到同一个观众席。一些乐观人士认为这种辩论至少使两位候选人的曝光率翻一番。在1960年夏天，除了曝光率可以达到超出想象的“翻一番”，还有什么其他效果？

因此当两位候选人的代表以及广播电视的发言人于9月份在纽约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首次集中讨论双方会面的条件和环境时，前景依然扑朔迷离。此时，两大电视网承诺为选战提供8小时的免费时间，第三家电视网承诺提供3小时，三方的全国播放时间一共是19个小时，价值大约为200万美元；他们也向候选人阐明这不是“馈赠”时间——为确保最高收视率，电视网有权对这些时段进行编辑。慢慢通过讨论，辩论结构和形式初现雏形——4位新闻对话人组成可控座谈小组，不做评论，维护当事人尊严，每位候选人在首轮和最后一轮辩论中都有8分钟的开场白，回答问题的时间是两分半钟。尼克松一方的谈判者竭力限制辩论次数——他们认为其首领是辩论大师，一场“猝死”辩论即可把肯尼迪一下子扫荡出局。他们认为肯尼迪一方的谈判者坚持尽量增加辩论次数是软弱的表现。（“如果他们不害怕的话，”尼克松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一局锁定胜负？”）肯尼迪的谈判者坚持至少举行5场辩论，后来减少到4场。（“每次我们让这两个人一起登上银屏，”肯尼迪一方的电视策划专家J·伦纳德·赖因施说，“我们就会得分，他就会失分。”）

9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计划举行4场辩论——9月26日、10月7日、10月13日和10月21日。第一场由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直播，第二场

由华盛顿的全国广播公司直播，第三场由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广播公司直播，第四场由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直播。

在这场活动中，当一切尘埃落定时，观众人数超出了电视台的极致想象和判断。每场直播的平均观众数量估计在6500万到7000万之间。电视史上的观众纪录是1959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高潮赛，当时大约9000万美国人收看了芝加哥白袜队（White Sox）与道奇队（Dodgers）的比赛。最后，4场辩论的数据综合在一起，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总观众人数超过了这一数字。

当然在1960年9月25日，一切还显得那么遥远。这一天，约翰·F·肯尼迪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抵达芝加哥，下榻在国宾东大酒店（Ambassador East Hotel）；理查德·M·尼克松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到精选国会酒店（Pick-Congress Hotel）。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准备这次电视交锋。

肯尼迪的准备工作主要体现在注重团队力量以及镇定自若的态度上，他在任何危机面前都举重若轻、干脆利落，当做就做，不掺杂任何情感因素。他的三人智囊团也在周日（即前一天）到芝加哥的尼克博克酒店（Knickerbocker Hotel）会合。三人小组的负责人当然是特德·索伦森；索伦森的搭档有28岁的律师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此人身材修长、聪明活跃，在事实和推理方面能力出色，他在两年前就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首屈一指的人物；另有迈克·费尔德曼（Mike Feldman），此人身材魁梧、充满魅力，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法律教师，后来成功经商，现弃商追随肯尼迪担任立法调研小组负责人。注 他们随身带着肯尼迪选战资料便携式图书馆——一个装满文件的西尔斯·罗巴克牌（Sears Roebuck）手提箱，在尼克博克酒店举行了24小时的会议。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就像大学里为应付考试而临时抱佛脚的年轻人。工作结束时，他们编制了15页的副本资料，内容包括12到13个主题，它们涉及相关事实以及他们认为记者席或尼克松先生可能提问的问题。这3个人已和肯尼迪共事多年，知道作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完全了解涉及国内政策以及本人应记住的所有问题；现在重点倒不是相关问题或是否了解，而是对最新数据的掌握程度如何。

星期一清早，他们到肯尼迪的房间就问答环节进行讨论。肯尼迪看了他们就8分钟开场白提出的建议后，表示不同意，将建议搁置一边，向秘书口述自己的想法；接着在4个小时里，肯尼迪和智囊团一起思考尼克松的立场以及自己的立场，重点始终集中在如下方面：最近的失业率是多少？钢铁产量增速如何？尼克松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立场如何？据当时的在场人

士回忆，交谈轻松愉快、有趣宽泛，话题涉及大量完全无关辩论的问题。将近1点的时候，古德温和费尔德曼进入国宾东大酒店的一个地下办公室，回答肯尼迪提出的新问题；肯尼迪随后和特德·索伦森、弟弟罗伯特以及舆论分析专家路易斯·哈里斯轻松地共进午餐。肯尼迪稍后离开到美国木工联合兄弟会（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 of America）发表简短演讲（尼克松早晨发表了演讲），接着返回酒店房间短暂休息。5点钟左右，他从午休中醒来，精神焕发，重新把弟弟罗伯特、索伦森、哈里斯、古德温和费尔德曼召集在一起，再次召开哈佛导师策略研讨会。

就像1959年10月参加海恩尼斯港会议的人一样，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人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时依然历历在目。肯尼迪身穿白色开领T恤和陆军棕色休闲裤，躺在床上，不断向周围的好友提出问题。他手里拿着古德温和费尔德曼下午准备的资料卡，看完一张，随即向地板上扔一张。最后在大约6点30分时，他决定起床吃晚餐。独自吃了一顿“美妙晚餐”后，他身穿白色衬衫和深灰色西装站在大家面前，叫人拿来一块秒表，然后动身前往这座经过改造的古老运动场——位于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WBBM电视台，勇敢地迎接竞选对手的挑战。

理查德·M·尼克松已先他一步到了演播室。整整一天，尼克松始终独自待在酒店房间里，除了夫人，无人陪伴。副总统已身心俱疲了；前面两周的驾车宣传使他的体重自出院后又下降了5磅；电视顾问原打算劝他星期六到芝加哥，然后在星期一电视直播前休息一整天，但一直联系不上他，甚至连新闻秘书赫伯特·克莱因也联系不上。结果，尼克松先生在星期天晚上稍晚的时候才到达芝加哥，根本没意识到即将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星期一早晨，他向美国木工联合兄弟会发表了讲话。电视顾问认为这次露面是不幸的——这个兄弟会是一个怀有敌意的工会组织，他们的消极反应对尼克松的心理产生了干扰作用。

尼克松在12点30分从兄弟会的演讲现场返回酒店房间后，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电视技术人员急得抓狂，他们不断联系他，希望向他介绍一下辩论环境、舞台设计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但始终未果。那天下午，他在房间里接待了一位访客，前后仅仅5分钟。他接了亨利·卡伯特·洛奇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洛奇劝告他在电视上别表现出一种“刺客形象”。其余时间里，副总统除了与妻子商量问题，都单独待着。最后，当他走出酒店驱车穿过芝加哥街道前往演播室时，一位电视顾问获准随行，在10分钟的车程中，仓促地向他介绍情况。这位顾问建议副总统上台时要充满气势——这是一场比赛、一场搏斗，第一次回合必须给肯尼迪一个下马威。但副总统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好奇这条建议究竟是顾问提的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这类人提的。副总统曾说：弗兰克·斯坦顿就是希望演

出精彩绝伦。他们到了演播室，尼克松下车时，膝盖碰到汽车门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上次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就碰到过膝盖。据目击者说，他的脸霎时变得“苍白”，但很快恢复平静，走进演播室。

两位候选人都让其代表从辩论当日上午的8点30分就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演播室。

尼克松的顾问和代表由于没机会和当事人交流，紧张是情有可原的，他们只能尽量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最初要求两位候选人要站在小讲台后面演讲——肯尼迪一方表示同意。几天前，他们又要求两位候选人的位置间距比原先大些，对方也表示接受。辩论当日，他们对每个细节都是那么一丝不苟。他们担心尼克松面部的眼影过深，于是要求调整两个小聚光灯的角度，这样光线可以直接打到眼窝部位，消除阴影；他们要求在主持人前面放张桌子，对方也没意见；他们要求在辩论期间，不能拍摄尼克松的左侧，同样没有问题。

肯尼迪的顾问没提任何要求，他们像肯尼迪一样骄傲自信。

尼克松大约在开播前一小时左右就到了演播室，首先检查环境，然后通过内部摄像机简短录播，让顾问认真看一下效果，接着心绪不安地在演播室后面来回走着。踱步期间，他把制片人叫到身边，请求对方不要拍摄他正好擦汗的镜头。（那天晚上，与多数报道相反，尼克松没使用任何舞台化妆。为了使深色胡茬在屏幕上不那么明显，一位顾问仅涂了一层薄薄的“懒汉剃须粉”。）

肯尼迪到达时间大约比尼克松晚了15分钟。他检查了一下环境，坐下摄像。他的顾问认真审视后认为效果不错。制片人提出肯尼迪的白色衬衫显得有些刺眼，肯尼迪马上吩咐助手回酒店取一件蓝色衬衫，刚换好就到了开播时间。人员各就各位，摄像机的信号灯闪烁着红光，直播即将开始。

“晚上好，”头发灰白、相貌俊朗的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说，“美国所有的电视及广播电台……现自豪地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搭建一个就目前竞选问题舌枪唇剑、激烈辩论的平台。候选人自然无须介绍了……”

他们通过电视在7000万美国人面前正式亮相。

当重温第一场精彩辩论（以及后续3场辩论）的文字记录时，我们发现舌

枪唇剑振发的激荡情感已渐渐远去，但这场辩论对两位候选人命运的影响依然强烈、直接且富有戏剧性。

第一场论战主要探讨国内问题。和共和党相比，从理念和历史来看，民主党在这一方面更雄心勃勃，对未来的态度更为积极。肯尼迪在开场白中宣称：世界不能容忍一半奴役、一般自由的状态，美国的全球姿态主要依赖其国内姿态——我们如何对待彼此，我们应当如何推动美国社会发展。这不仅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整个世界。他说："当面临史无前例的最严重威胁时，自由是否能够维护？我认为毫无问题，它归根结底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如何做。我认为美国再次启程的时刻已经来临。"

尼克松的开场白仅从字面上看是友好地表示分歧：他同意肯尼迪前面综述的所有目标，只是在如何实现目标方面，他不能苟同肯尼迪。他对艾森豪威尔七年半的政绩大加赞扬——医院、高速公路、电力、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等方面令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望其项背。

阅读尼克松开场白的倒数第二段可找到当时双方交锋的蛛丝马迹："我想阐述的最后一点是：肯尼迪参议员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对穷人、老年人以及其他不幸的人群缺乏同情心……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我亦知道肯尼迪参议员和我一样深深地关注这些问题，但我们的分歧不在于美国的这些目标，而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尼克松先生和肯尼迪先生辩论时就像前面有一组评委正在打分，他不断反驳对手的矛盾之处或错误。尼克松的谈话对象一直是肯尼迪，而肯尼迪的谈话对象则始终是美国观众。在这些辩论中，当着全国观众，不能着眼于任何族群的历史或起源，只能着眼于美国大众以及未来。着眼于美国大众是尼克松先生的最初战略——全面出击，瓦解民主党的少数族裔联盟。然而到了演播现场，在史上数量最多的美国观众面前，尼克松的发言却抛弃了核心主题。他没有展现出共和党可以为美国人承诺的未来愿景，注意力只是停留在讲台另一边这位冷静自若的候选人上面，只是关注演播室里的个人对手，没有理会美国人民的感受。

随后，坐在辩论者前面的电视记者提问了关于如下方面的10个问题：候选人年龄的重要性问题、总统施政时的决策水平问题、农业问题、税务问题、教育问题、国会政治问题、颠覆活动问题，然后又谈到了教育问题。两人回答每个问题时，都像上面一样对比鲜明：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参议员面对相应问题，往往不是就题论题，而是将每个问题作为吸引电视机前数千万观众思想和想象力的起点。但是尼克松的思想和注意力仅仅拘泥于演播室内部。重温文字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演播大厅里不断以大比分击败对手，然而忘了必须赢得美国大众的心。

文字记录仍然可以再现尼克松先生在辩论中的防御性。（其最初阐述可以清楚表明这一点：“我们许多人可能都同意肯尼迪参议员所说的问题……我完全认同肯尼迪参议员今晚表达的宗旨——美国应当收拾行装继续前进……”）不能再现的是首场辩论的视觉效果。

最具冲击效果的是两位候选人并肩站在辩论台上的画面。

首先人们自然地强烈感觉到两位并排站着的候选人好像是棋逢对手。不过，在大众的印象中，如果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实际就意味着肯尼迪取得了重大胜利。当镜头还没有转向肯尼迪和副总统时，人们感觉肯尼迪还是一个遭受副总统突袭和攻击、年轻稚嫩且缺乏经验的小伙子。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从外貌还是举止上，他和副总统都不分伯仲。

不仅如此，两人的神态对比也令人吃惊。通常在私下里，肯尼迪紧张时会禁不住轻拍双手——调整领带、拍打膝盖、轻抚面部。今天晚上，他看起来那么镇定自若。与之相比，副总统则表现得紧张、胆怯，阵阵流露出阴郁神情，有时看起来面色憔悴，透着一种病态。定格在副总统身上的那个著名镜头清晰地表现出危机和戏剧性。与之相比，美国政治浪潮中的任何一幅画面也许都相形见绌了。此时，副总统半佝偻着身子，敷在脸上的“懒汉剃须粉”被汗水冲出若隐若现的沟痕，双眼凹陷，眼神无光，下颌、面颊和脸部也由于紧张下垂着。

重温尼克松深受折磨的静态照片和当时情形，令人不禁心生同情。那天晚上，不如意的事儿接连发生，副总统的一个特点在电视上显得尤为严重——皮肤天生色淡透明。在利用光学投影拍照的相机上，这种皮肤显得干净漂亮。但电视摄像机是电子投影，使用的超正析像管和X射线管类似，成像效果就像X光图片一样可以透入皮肤下面。在电视上，对着尼克松的镜头通常应离他很远，假若过近的话，其透明肌肤甚至显示出表层下面皮肤毛囊正在长出的细微毛发，即使刚剃过也是如此。在首场辩论之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为实现最佳效果，摄像机专门配备了全新像管，不过投影效果的完善只会给副总统带来麻烦。（在后来的辩论中，人们劝尼克松使用舞台化妆，以弥补电视电子管对脸色的损害；但在第一场辩论中，他只用了“懒汉剃须粉”。）

电视辩论现场——WBBM电视台的演播室一整天都紧张兮兮，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设备、写字台、讲台和背景反复调整。尼克松的电视顾问之前得知背景将采用5号灰度色——一种较暗的色调；为了对比鲜明，他们建议当事人穿浅灰色西装。然而当他们看到背景时，觉得颜色显然比预料的浅得多，于是理所当然地坚持重刷颜色。尽管一天内重刷了好几次，但每次干了之后，灰色调还是看起来很浅。（当两位候选人直播时，背景确实蹩脚不堪。）在这种背景的映衬下，身着浅色西装的尼克松显得轮廓不清，

而身穿深色西服的肯尼迪则看起来轮廓分明。尼克松的顾问在直播前，再次依据场景主灯设计为候选人调整每个灯光；但在辩论之前的几分钟，报纸杂志社的一伙静态摄影记者获准进入现场，他们四处乱转着抓取镜头，一些电线被踢到了一边，一些灯光和电视摄像机也被搬离标记位置。

最后一个情况就是，副总统依然疾病未愈；前两周紧锣密鼓的系列宣传之后，他也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普通衬衫套在他的脖子上显得松松垮垮，最近的体重下降使他显得瘦弱不堪。同时心理因素尤其值得一提，其顾问现在坚持说尼克松当时缺乏表现欲望——当他在电视上真正展现自我时，表现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有办法让观众的注意力从不利的脸色方面转到希望传达的主题或信息上，1952年他通过电视发表的著名“跳棋演讲”[注]就是典型例子。

不过，全国观众对这一切不甚了解。抽样调查表明，通过收音机收听辩论的人们认为两位候选人几乎旗鼓相当。然而对电视辩论观众的调查表明，副总统的表现差强人意，许多人甚至认为糟糕透顶。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是影像画面——1960年，电视已成功地将大众注意力从声音转向了影像。

副总统后来从首轮辩论给人们留下的糟糕印象中逐渐恢复过来了。但首轮辩论是较量的开始，和世间的许多事情一样，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二场辩论主要涉及外交政策——从古巴的卡斯特罗、U–2击坠与间谍事件到美国声望的下降。最后的议题是系列冲突的第一个尖锐冲突——金门和马祖岛的防御。

就像唱针卡在留声机里一样，第三场辩论重谈上次几乎不了了之的金门和妈祖问题，不过由于尼克松极其讨厌杜鲁门总统的脏话，话题中断了；辩论转向顽固盲从、工会和黄金外流。根据所有的抽样调查，从观众效果来看，这场辩论是尼克松表现最棒的一次。在这场辩论中，尼克松在洛杉矶，肯尼迪在纽约；好像与对手遥隔大州时，尼克松表现得更自然，也能够直接对着全国观众讲话。

第四场辩论乏味极了——两位候选人的发言几乎都了无新意，他们不断重复着前三场辩论说过的东西。说来奇怪，观众人数在首场辩论中达到顶峰，在第二、第三场辩论中略微下降，在最后一场辩论中几乎与首场不相上下。

对于1960年系列电视辩论这样宽泛的题材，还没有精确的政治衡量标准或者合理的评判尺度。当辩论开始时，人们普遍认为尼克松可能会赢得这场较量，肯尼迪将面临一场硬仗；当辩论结束时，两位对手的天平发生了逆

转。

任何记者都不可能准确记录从选战开始到投票意向最终统计期间奇妙且神秘的舆论变化；舆论连续数周摇摆不定，就像现在——电视辩论结束已经很久，它们对选战和美国人的观点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舆论仍在摇摆。

毋庸置疑，电视辩论还是带来了一些非系统性和局部的积极效果。

跟踪报道肯尼迪选战的记者依然记得，当他在首轮辩论的次日——9月27日星期二上午到俄亥俄州北部宣传时，迎接这位参议员的队伍陡然壮大。在电视辩论之前的整整7天时间里，人数是逐渐增加，但现在一夜之间，人群开始激情沸腾，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好像他们在家里电视上看到他之后，其身上产生了电视或电影偶像的“明星效应”。

同样明显的是愁云开始笼罩全国的共和党领导人；他们对自己的候选人及其表现非常恼怒，尤其对其“随声附和”的辩论风格感到不满。在华盛顿的尼克松总部，电话铃声不断，人们要求有人应联系并告诉这位新“尼克松”，只有原来的“尼克松”才能获胜。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严重政治后果。在首轮辩论的晚上，南部各州的民主党州长在阿肯色州的温泉城（Hot Springs）召开了一次年度性会议。

除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卢瑟·霍奇斯[注]州长，直至那时，他们对肯尼迪的态度还是五味杂陈的——有人是听天由命的冷漠，有人是悄然充满着敌意。那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他之后，他们突然觉得眼前一亮。我们不知道谁提议当晚向肯尼迪发去了10人（共11人）签名的贺电，电报传递的热情和激动不仅真诚而且标志着选战达到高潮。南部的州长现在站到了他一边；如果他们支持他，这意味着其政治组织也将支持他。

现在更难以从辩论议题以及是否帮助美国大众了解未来任务和问题的角度来评判辩论优劣了。毫无疑问，约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尼克松在理念和观点方面确实存在差异，然而和历史相比，这场政治选战探讨的问题更少，对问题的阐述更不清晰。

回想起来，电视辩论是进行此类探讨的最佳机会，但最终还是错失了良机。完全归咎于辩论形式是令人难以认同的，不过这种媒介形式和强制性无疑是重要因素。电视和电台的特点就是它们拒绝沉默和“停滞时间”。所有的电视和电台讨论节目必须是迅速问答，两位对手好像是“智力”网球对打选手。虽然每位资深记者和提问者都知道，要对任何难题做出深思熟虑的得体回答，必须经过较长的停顿，停顿的时间越长，随后的观点就越具启发性。尽管如此，电子媒体可以忍受的停顿时间不能超过5秒钟，如果停滞时间达到了30秒钟，这种停顿将感觉漫长难挨。于是在两分半钟的快

速问答环节，两位候选人只能对着摄像机和相关人员做出响应，个人没有思考时间。由于两分半钟只能允许交流少量的简单想法和寥寥的原始事实，两位候选人每当发现存在观点包含的内容过多，两分钟的探讨根本不够，观点过于大胆或新鲜，与既定的美国观点相悖这些风险时，往往刚阐明观点，就匆忙回到中点。肯尼迪回答有关金门和马祖岛的第一个问题时，也许是在所有的辩论问题中最犀利和清晰的回答之一；在回答中，肯尼迪实际上暂时触及美国治国之道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我们与亚洲革命的关系。然而，他以该观点作为两分钟回答显然走得过远了注。在后续辩论中，当回答后续问题时，如果几乎不可能区分，他就模糊处理其立场和尼克松之间的区别。

如果需要一个探讨问题的论坛，电视辩论本可成为这类论坛。但事与愿违：提问候选人的记者都挖空心思地提出可以想象的问题，但回答时往往是草草的两分钟——或者使用某些事实材料，或者使用没有差失的结论。两人都不能停下来缓缓反思和沉思——在决定之前选择放慢提问速度是领导人的必要内在素质。

在经验不足的政治学者梦想中，电视辩论能成为合理探讨问题的良好平台，但结果不如所愿，那么它们究竟起什么作用呢？

它们的最大作用就是为民主环境中的选民呈现出两位候选人承受巨大压力时的鲜活形象，然后让选民凭本能和感觉决定更喜欢的风格和行为模式。全体人民族群意识的政治根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元老院或者塔西佗所记述的日耳曼部落的啤酒聚会。这种个人选择领导人的意识自现代文明伊始的数百年以来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否则仅局限于像坦慕尼协会领导人会议一样的全体人民委托发言人秘密会议、共产党大佬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或者英国权力机构领导人在伦敦俱乐部举行的晚宴。电视辩论的作用就是普及了这种族群参与意识、这种对领导人的感情判断——从少数人到大多数。出色电视辩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不在于两位候选人说什么或者如何做，而在于两位候选人的美国同胞中有多少人放弃了美好的晚上时间来权衡对两人的选择。

针对电视辩论的观众数量，有许多不同的评测标准。美国资深民意调查专家乔治·盖洛普博士的统计数据较低，他认为观看一场或所有辩论的美国观众是8500万人。两次最广泛的观众调查是由两大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它们对观众数量的独立统计数据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数据：全国广播公司依据调查估计1.15亿美国人收看了一场或所有精彩辩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估计数量是1.2亿人。无论是否尚存争议，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人都关注同一问题的如此大型集会在人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和辩论观众数量相比，更重要的还有对候选人个性对观众的渗透影响调查；对于渗透影响，舆论抽样调查员意见一致。

这类调查曾进行过多次。最好的一次局部调查（最受尼克松电视顾问尊崇的调查）由什未林（Schwerin）调查公司在纽约进行。什未林调查公司在曼哈顿西区设有一家工作室，它在纽约都市区科学挑选了三四百位观众，麦迪逊大道的一些广告专家认为该公司是消费品广告领域最优秀的电视测评机构。通过依次调查每场辩论，什未林的分析专家报告肯尼迪在首轮辩论中以39比23（差额部分未定）战胜尼克松；第二轮辩论是44比28；第三轮以39比42败给尼克松（在这场辩论中，双方相隔东西大陆）；最后一场辩论以52比27获胜。

乔治·盖洛普的评测结果也不谋而合。首轮辩论后，43%的受访者支持肯尼迪，23%支持尼克松，29%认为他们不分上下，5%不确定。最后一场辩论后，42%支持肯尼迪，30%支持尼克松，23%认为两人势均力敌，5%不确定。

最后是埃尔莫·罗珀（Elmo Roper）博士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最广泛调查。通过在全国抽样调研，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托的罗珀博士估计57%的投票选民认为电视辩论影响了他们的决定。另外6%或者超过400万选民（根据本次抽样）认为其最终投票完全取决于辩论。在上述400万选民中，26%（或者100万）投票支持尼克松，72%（差不多300万）投票支持肯尼迪。如果这种外推方法准确无误的话，肯尼迪一方200万张的优势是源自电视对美国人意识的影响；既然肯尼迪最终仅以11.2万张选票胜出，他在选举后的星期一——11月12日完全有理由说："对于力挽狂澜、逆转获胜的结果，电视的作用远超其他任何因素。"

政治家的一条经验法则尤其受到民主党的推崇：选举之战只有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结束后才正式开始。他们认为，只有人们在酒吧里不再谈论投手和击球手转而争论候选人的时候，选战才算开始。1960年10月13日星期五下午3点45分，匹兹堡海盗队（Pittsburgh Pirates）的二垒手比尔·马泽洛斯基（Bill Mazeroski）在第九局后半局比赛中用力下探旋转身体第二次投球，猛然将球投过左场防守，打出了一个全垒。最终，海盗队以10比9赢得了这场比赛，并以总比分4比3的成绩赢得大赛胜利，这是他们自1925年以来首次获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奖旗。

马泽洛斯基在3点45分打出本垒打。6点45分，电视上播出赫鲁晓夫先生告别美国和联合国的消息，同时播放了他用鞋愤怒敲打桌子的镜头。在25天里，这位体型矮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在纽约的大道公园安营扎寨，在联

合国不断上演恶作剧。他咆哮喧闹，成功地将大量美国人的注意力从严肃的总统选举转向其无趣的威胁。当他宣布将在晚上离开时，赫鲁晓夫语调平静地声称，在美国人选出新领导人之前，他将暂停与美国进行有关人类命运的对话。他是否曾观看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精彩辩论？答案不得而知。

就在同一天东部夏令时7点30分，约翰·F·肯尼迪的助手、说客、服务员以及记者团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像仓库一样的演播室里聚集，理查德·M·尼克松的人马则在同一家公司的好莱坞演播厅聚集，他们在准备第三场辩论。8点30分后，肯尼迪前往伊利诺伊州，尼克松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宣传，最后一轮的选战即将打响。仅有一场辩论了——时间定于21日。时至今日，没有其他打扰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赫鲁晓夫先生以及卡斯特罗先生都走了，美国大众终于能一门心思选择领头人了。

距选举日只有三周半时间了。尼克松深知已落后（盖洛普的民测结果是：49%支持肯尼迪，46%支持尼克松，5%尚未确定）。能否为了证明自己而掀起宣战“新高潮”，这将取决于尼克松先生。

---

1. 谷登堡（Gutenberg），人名，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谷登堡媒体指纸质媒体。——译者注

2. 他们是C·本顿·科依纳（C. Benton Coiner，弗吉尼亚州保守党），梅里特·柯蒂斯（Merritt Curtis，宪法党），拉尔·戴利（Lar Daly，减税党），R·L·德克尔（R. L. Decker，禁酒党），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社会主义工人党，艾奥瓦州的农民劳工党，犹他州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党），奥瓦尔·E·福伯斯（Orval E. Faubus，全国州权党），西蒙·古尔德（Symon Gould，美国素食主义党），埃里克·哈斯（Eric Hass，社会主义劳工党，产业政府党，明尼苏达州），克莱农·金（Clennon King，非裔美国人团结党），亨利·克拉耶夫斯基（Henry Krajewski，美国第三党），J·布拉肯·李（J. Bracken Lee，新泽西州保守党），惠特尼·哈普·斯洛科姆（Whitney Harp Slocomb，绿币党），威廉·劳埃德·史密斯［William Lloyd Smith，美国超预期党（American Beat Consensus）］，查尔斯·沙利文（得克萨斯州宪法党）。上述列表选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在参议院通信小组委员会于1961年1月31召开会议之前提交的报表。

3. 这三个人现在依然是肯尼迪的“私人”智囊团，和肯尼迪的“学术”智囊团［施莱辛格（Schlesinger）、加尔布雷思（Galbraith）、邦迪（Bundy）、罗斯托（Rostow）］或者其“政治”智囊团（奥唐奈、奥布赖

恩和邓根）不同。虽然和外界有些疏远，但是这个三人小组超然脱俗的知识分子气质也着实令人难忘。他们自我娱乐时，喜欢进行复杂难解、格调高雅的智力猜谜游戏。

4. 跳棋演讲（Checkers speech），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于1952年9月23日发表的一场演讲。针对有人指控“私下接受赠款”，尼克松发表了该著名演讲，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也说明了自己自出道以来的详细财政情况。“Checkers”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一只小狗的名字，意为“跳棋”。——译者注

5. 卢瑟·霍奇斯（Luther Hodges），后任肯尼迪政府商务部部长。

6. 若要了解这个两分钟答案的完整扩展内容，需要等两天之后——肯尼迪于10月21日哥伦布纪念日在纽约就金门和马祖岛问题发表的半小时清晰演讲。演讲观众只是当地人，据我所知，演讲全文仅在国内3家报纸发表。演讲对一个国家级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本身是新闻工作者应该记录的优秀选战讨论，不过它对美国国内没有任何影响。

第12章

尼克松的竞选之战：第三回合

对尼克松来说，电视辩论就是一场灾难。

尽管在最后的辩论中，他已经明显从最初的溃不成军恢复过来，但是那道重要的无形界限已经被抹掉：在他的想象中，精神层面的差别无形中让他和对手泾渭分明，他是艾森豪威尔的继承人，“久经沙场”，而他的年轻对手初出茅庐，“经验不足”。1.2亿美国人观看了辩论。虽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可能会激烈地争论哪位候选人更好，但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能绷着脸坚持说“成熟的”尼克松反衬出肯尼迪是一个受到惊吓的毛头小子。如果尼克松能在辩论中与赫鲁晓夫旗鼓相当，那肯尼迪已经证明他能匹敌尼克松。

所以，辩论那段日子对尼克松来说就是痛苦的经历，但他必须从头坚持到尾。在等待辩论结束的过程中，他本就容易波动的情绪跌入谷底，但他要等到最后，才能进入竞选的第三回合，或者说最后一个阶段，把造势活动推向巅峰，冲击选前的那个周末。希望到那个时候，竞争对手的干劲有所消退。

其实在辩论还未结束的时候，即10月16日星期日，尼克松团队的最高指挥官们就齐聚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召开了一个紧急策划会议。像霍尔、谢普利、芬奇和牛顿这些人一直都想让候选人出席一个长时间的员工会议，让候选人把装在脑子里的战斗指令和观点拿出来，供大家讨论。现在距离最后一次电视辩论还有5天，在这个下着雨沉闷的星期日早上，在哈特福德的斯塔特勒酒店，他们安下心来考虑接下来的行动。

尼克松的竞选搭档亨利·卡伯特·洛奇也加入了会议，有很多问题要和两位候选人讨论。洛奇和他的工作人员已经极大地触怒了尼克松团队，因为他们承诺纽约东哈莱姆区的黑人，如果尼克松当选总统，就会在内阁中给黑人留一个位子。如果尼克松真的做出这样的承诺，他可能有望在北方多得一些选票，但数量肯定少得可怜，而他在南方失去的将是数百万的选票。（“不管哈莱姆区承诺是谁的提议，”一名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员说，“都应该把他从2.5万英尺高的飞机上扔出去。”）洛奇应该自我约束，他发展全国

少数族群的热情也需要降降温。

下一个讨论的话题是50个州全面选战的承诺该不该执行。很明显，在竞选的最后20天里，在关键大州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时间应该集中花在7个大州的主要战场，而不是别的地方。几个星期以来，尼克松的顾问都在恳求他，拿9月住院两周作为借口，把自己从大会承诺中解放出来。但是尼克松很坚定，他会到每一个州举行造势活动，不管需要付出多少精力和努力。

会上又再一次集中细致地讨论了宗教问题。其实共和党的这些指挥官们受到来自党内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尼克松谈宗教问题。虽然肯尼迪本人小心翼翼地避谈（比如在休斯敦之后）宗教问题，但他的助理人员，尤其是南方和工会的人手，都在密集地谈到“包容”问题，以至于尼克松像之前的汉弗莱一样，被这个问题掐住要害，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像亚瑟·弗莱明（Arther Flemming，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和弗雷德·西顿（Fred Seaton）这样不太懂清教，但在尼克松的顾问委员会中位居显要的人都建议，可以呼吁天主教徒对清教徒也要同等包容。但这是个容易被引爆的问题。尼克松斩钉截铁地拒绝把宗教问题提上日程，无论以何种方式。

他的顾问再次催促他在选战中要加强力度，在推销“新尼克松”定位的时候多加一些“旧尼克松”的风格。他们极力劝说他攻击肯尼迪在参议院、裁军委员会和非洲事务委员会经常缺席的记录。尼克松拒绝了。他将启动自己的强力决战，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事情还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们也讨论了如何重新安排最后几周的行程，尤其是新泽西州的安排。所有人都认同，尼克松应该拿高生活成本来做文章（“杰克·肯尼迪会把商店里所有东西的价格提高25%”）；他们还讨论了最后10天如何运用全国各地的电视，最后一战的时候，所有“影响因素”都要被派上用场。

这场会议在星期日晚上不欢而散，而接下来的那周更令人沮丧，可能是尼克松整个竞选中最阴郁的一段时间。尼克松从哈特福德飞到布里奇波特，然后又先后到了水牛城、尼亚加拉（Niagara）、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迈阿密、坦帕（Tampa）和威尔明顿（Wilmington），最后到纽约。短短两天时间跑了这么多地方，他身心俱疲。他到纽约的时候，从晨报上读到纽约前一天给肯尼迪的欢迎盛宴，估计有125万人参加了游行。星期三至星期五那几天，尼克松都坐在华尔道夫酒店35楼的总统套房里，只露过一次面，就是在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的纪念晚宴。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晚宴是为了向已故纽约州州长致敬，每年由纽约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主持，1960年的主持人是红衣主教斯佩尔曼（Spellman）。尼克松和他的对手都在晚宴上发言，他听到了这位民主

党人最有火花的一次竞选演说[注]。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酒店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托马斯·E·杜威以及其他共和党的政界元老商议，最后孤身一人的时候，他更沮丧了。他派新闻主管到楼下的孔雀厅召开了一场记者会。新闻主管一开始绷着脸说：“我听到关于副总统竞选的一些疑虑与日俱增，我想给大家一些数据……”然后，星期五，10点（美东时间），两位候选人都被带到美国广播公司在纽约第67街的演播厅。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在摄像机前角力，也是最沉闷的一次辩论，而电视的折磨也终于结束了。现在离选举日只剩18天，尼克松终于可以脱下温和的面孔，以他本来的面目进入竞选的高潮阶段。

星期日，尼克松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巡回演说，晚上在匹兹堡演讲。夜里，随着竞选列车沿着铁轨从匹兹堡摇摇晃晃地往西南方向开，他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早上，他到了俄亥俄州，这是他父亲的出生地，这里的文化和小镇影响了他的思想，沿海城市已经远远留在了后面。（最后的结果，他没有赢下大西洋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州，只拿下了坚定的3个共和党票仓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加上弗吉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到父亲的家乡让他精神一振，从那时起到竞选结束，一天一天（除了在纽约市，那是敌人的超越，他在那遭遇了灾难性的最后一天）他的选情渐次加强。只有在这最后的阶段，理查德·尼克松的形象才清晰起来。

在此之前，我已经观察了他几个月，从第一眼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注]，一直以来，他对我来说都是个谜。现在我认定，尼克松并不是自由媒体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强硬、冷酷、伺机报复，其实，他是一个渴望朋友的人，渴望得到别人的喜爱，几乎到了悲哀的地步。他渴望与民众产生共鸣，和他们打成一片。他想去沟通、唤起温情和赢得认同感，这恰恰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尼克松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直抵人心，虽然我觉得他可以，但是肯尼迪在公众场合讲话的时候，总能用最精准的表达，达到最好的沟通境界。在这些场合，尼克松总是喜欢表现得“只是个普通人”。当然，他的新闻稿和肯尼迪一样，都是标准的政治辞令。但是，当他自在地与仰慕者对话时，他看起来尤其想要打动这些“和气的人”。

从尼克松的措辞可以看出他渴望共鸣。10月25日，星期一，他在俄亥俄州玛丽埃塔（Marietta）醒来，开始他的“巅峰”行动，而且从那天的第一场演讲就能看出来，自从竞选第一周他穿过艾奥瓦州的玉米地后，还没有出席过这样的演讲场合。俄亥俄州玛丽埃塔的政府大楼外挂着一个标语：“高中辩手迎接世界级辩手。”这个标语真是恰到好处，是他此次访问的精髓。因为他在高中时期也是一个辩手，约30年前的那个男孩儿，在高中时期就宪法做出精彩陈词，赢得了《洛杉矶时报》的一个奖项。与其说

他在这里是为了传递信息，不如说他是为了赢得这些小观众的心。他的风格比较随意，在接下来的两周，这里有好多他的故事在流传。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就快要说到重点了，他会用手指着观众，就像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在电视上卖镇静剂一样。他侃侃而谈，用“团队精神”的比喻来分析对手，指责肯尼迪批判“团队”和美国仅仅是因为他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你们希望这样的人成为你们的首领吗？”尼克松问道。他很喜欢用“顺便说一句”这样的连接词。当他用“顺便说一句”开始一段话的时候，就说明他要把肯尼迪的记录翻出来了：“顺便说一句，由此。”他会在转折的时候用“但是，言归正传，如果要我说的话”，以示郑重。如果要用到厨房辩论中的谈话技巧时，他会用“听着”这个词，例如：“听着——在我成长的家庭，有没有工作很重要。”他也会用到“十分厌倦”这样的词，例如在西弗吉尼亚州匹兹堡：“我厌倦了听我们的对手批判西弗吉尼亚州，还批判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得加以阻止。”

最后几天，他公开发言，做罕见的正式演讲，一切在有序进行。如果没有提前读过稿子，那些演讲听起来完美无瑕。两个文字高手詹姆斯·谢普利和加布里埃尔·豪格（Gabriel Hauge）帮忙操刀。候选人朴实无华的个人风格更是锦上添花。

当他越过那道山脊，把陌生精致的东部和家园之地分开的山脊，他感受到这里的人一直与他同在，所以他沉湎于在这里公开谈论私事。他告诉他们，当初他多么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没有实现。在另一站，他感慨没能让加州惠蒂尔的足球队回归。下一站，他又谈到他多么想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当然也没有实现。尼克松一路从宾夕法尼亚州往北（在宾州，他告诉民众，他的父亲是如何在77岁的时候去世，留下3000美元医药费，这就是为什么如民主党指控的那样，他不反对帮助需要医保的老人），到俄亥俄州（在这里他说起他以前一直想要一辆玩具火车，但从没得到过），再进入密歇根州，这个男人开始让自己的形象鲜明起来。他的怨恨是真实的，但是他太轻易说出口。在密歇根州当天的竞选活动中，有人朝他扔了5个鸡蛋和3个西红柿[注]，有人拿恶毒污秽的话咒骂尼克松夫人。那天结束的时候，他失控了（这一整年，肯尼迪从不允许自己在公共场合失控）。他们对着他起哄责难，他就开始噼里啪啦地说：“我会建议，在我谈到教养的时候，顺便说一句，我也被专家质问过。所以不要试图对我耍什么花招，否则我们会让你好看。你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说明你们没有教养。现在，孩子们［对着起哄的人］，散开。我没雇你们来。所以请离开，可以吗？”

他太能顾影自怜了。第二天在伊利诺伊州的丹维尔（Danville），他谈起

了他的母亲："我记得我们的母亲过去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我们的乡村小杂货店烤派，这样我和我的5个兄弟才有机会获得我父亲没能享受到的教育。我父亲来自俄亥俄州，他的母亲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结果他不得不去工作，所以他只上到六年级。但是，顺便说一句，这并没有打倒他，他很了不起。但是我想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无私奉献：他们就是为了我们5个而活，他们希望我们拥有更好的机会。这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早上很早起床，她烤派，我父亲就去市场进一些蔬菜放在杂货店卖。"

那天下午，在伊利诺伊州的森特勒利亚（Centralia），他又补充了另外一个故事："我记得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一年，我哥哥极度渴望有一只小矮马。我父亲可以花75美元买一只给他。我哥哥一直在说：'噢，小矮马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作为长子，他一直深受父母宠爱，只要是他想要的，他们都想给他。他们可以说：'好的，你可以拥有一只小矮马。'但是，你们猜怎么着？我母亲和父亲开了一个小型家庭会议后，走进来说：'现在听着，如果我们买这只小矮马，就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杂货店的开支，没有足够的钱买衣服，也没法给你的弟弟买鞋子。'对我父母来说，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却是正确的决定。后来，我哥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记者们争论应该把那天称为"多愁善感的星期五"还是"告别小矮马之日"。

他这样一再重复这些故事，可能会让身边的人感到乏味。但是当你看到他那次在火车站，像很多他的听众一样，一副人生输家的模样，你很难抑制住不去安抚他或是帮助他。

在尼克松的最后一战中，无论是在小镇的短暂停留，还是在纽约市梅西百货（Macy's）门口先驱广场（Herald Square）的大型集会，他发表竞选宣言和重要演讲的时候，有两件事非常清晰。

第一就是尼克松很疲惫。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首先是他的演讲语速明显变快，没有前几个星期清楚、有分寸、节奏自然。其次是尼克松夫人憔悴得近乎虚弱的脸。她有一股沉静的魅力，追随丈夫到每个地方，从未恼火，虽然疲惫却不以为意，无论多累都保持温柔，让跟着她的人看在眼里都觉得心疼。再次是他有越来越多说错的地方，这就是大脑疲惫的征兆。他在最后几天说到"和平与妥协"（Peace and Surrender）的政策，当然他想说的是"无须妥协的和平"（Peace without Surrender），或者"在接下来的4年，我们将会在教育领域得到比上一届政府更多的进展"（在上一届政府中，他就是副总统），或者"我要说说我的对手，论起在联合国与共产主义对抗，没有人比亨利·卡伯特·洛奇更出色"，或者在竞选晚期才试图把自己和艾森豪威尔联系起来："在总统做出这些孤独的决策时，我坐在他

身边。”关于尼克松的决策经验，艾森豪威尔的公开表态模糊不清，这是一个小问题。

第二就是跟随他的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似乎受到了惊吓，很容易感到惊恐。那么多年来，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重拳出击、激进的斗士，现在要慢慢接受他流露出来的新面目，着实困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到了竞选的最后阶段，尼克松一直在防守，他的“脱下小羊皮手套的战斗”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进攻，而是一个惊恐退到墙角的人混乱的反击。

这种感觉第一次向我袭来，是在我跟着尼克松穿过纽约皇后区的那天，那是个令人沮丧的日子。他先出席了曼哈顿的一个晨间论坛，参加论坛的全是共和党籍的杂志出版商。当他与友好人士一起时，无论是语调、表现和风格，都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所以在那个论坛上他表现得极为出色。之后他沿着公寓楼林立的皇后大道一路往南，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他原本期待会有数千人在那里欢迎他，结果只有一小群人，是被警方路障困住的几百个家庭主妇，带着怀疑的眼光静静地听着。他的态度就变了，就像以往碰到不友好的情况时一样。“我最厌恶的，”我突然听到他说，“就是他们说我们是漠不关心的党派。我们当然关心。”他向她们强调。下午晚些时候，他停在皇后大道一个百货商店门口，慷慨陈词：“美国需要更多的道路、学校和医院。这是我们对手说的。但是我们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想把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通过大规模开支来实现，而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共同推动美国的前进。”

随着选战接近尾声，你可能会在尼克松的发言中越来越多地听到肯尼迪的影子，尼克松已经在自己的主题演说中慢慢响应他的对手。而且，他也开始接受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问题。“这个国家总是充满征服新边疆的伟大精神。”来看看具体的演讲内容（俄亥俄州玛丽埃塔）：

> 所以我说，是的，是有新边疆，美国有新边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新边疆，但是跨过新边疆的方法不是去削弱美国，而是应该想想我们是如何跨过旧边疆的，是谁完成的。你们记得吗？怀揣个人精神和强大信念的先驱们不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今天的我们也是最出色的。我已经受够对手贬低美国，让海外的敌人从中获益。

强硬路线，“脱掉小羊皮手套”的决战，尼克松竞选的重拳出击阶段，这是媒体和共和党高层一直期盼的，但是最终并没有演变成一轮猛攻，没有掷地有声、高瞻远瞩地阐述共和党为美国打造的未来，没有对对手个人经历的犀利剖析。这只是一个人的回击，闪躲，出拳，把对手推开，而不是把

对手逼退。

表现在论调中是这样的（纽约州锡拉丘兹）：

> 他说，我要引述他的话——他说：“共和党人一向反对社会保障。”他知道这是无耻的谎言，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欢呼声和掌声］……他知道没有哪届政府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支持社会保障，未来4年也不会有比尼克松政府更支持社会保障的。你们可以对此深信不疑［欢呼声和掌声］……
>
> 向美国民众灌输这样的理念，让他们错以为我们反对社会保障，所以会取缔社保，是不负责任的，是卑劣的。到了选举日当天，美国民众会用行动证明他们的想法，这样的谎言已被揭穿。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在锡拉丘兹还原真相，一切本该如此。［欢呼声和掌声］

从内容上分析尼克松的绝地大反击，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主题：

（1）约翰·F·肯尼迪宣称美国威望处于最低迷的时期，是在“贬低美国，让我们产生自卑心理”。

（2）如果民主党上台执政，将会把家庭主妇购买的所有东西提价25%。

（3）目前形势太严峻，美国禁不起一个经验不足的领导人来折腾（“顺便说一句，我与赫鲁晓夫谈判过”）。肯尼迪是一个不称职的公民，自己当不了首领就来贬低团队。

11月2日，距离选举日还有6天，尼克松在纽约百老汇受到盛大的列队欢迎，之后来到先驱广场梅西百货门口的集会。他在那里的演讲摘录，可谓他全面反攻的一个范例，包含了他防守型反攻、寻求认同和表现和气的所有特质。

> 所以，朋友们，美国民众会拒绝我们的对手而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是为真理而战。民众知道这一真相，他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而且——［欢呼声和掌声］
>
> ……还有一件事我想说清楚：我越来越受不了对手一把辛酸泪地哭诉美国现在有多差。他们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管理下，什么都在走下坡路。我们的教育排名第二。我们的科学排名第二。我们的太空力量排名第二。我们的经济在衰退，也会掉到第二名。我们的军力在消

耗，反过来看看强大的苏联，就像史蒂文森最近说的——我在这里引用他在苏联《真理报》（*Pravda*）上说的话——反过来看，共产主义世界看起来比美国世界更具活力。听着，我的朋友们，我到过苏联，我亲眼见过那里，我到过美国，我亲眼见过这里，任何美国人都不应该有二流国家的心理。［欢呼声和掌声］

是的，不管怎么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敢于自我批评并加以改进，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待任何竞选都奋力一搏。我们讨论问题，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他们既然请求民众给他们机会越过新边疆，就不该说什么放弃已经打下的旧边疆……［欢呼声和掌声］

［在这里他话锋一转，与观众寻求共鸣，然后才开始谈“价格主题”和梅西百货。］

……我记得当我从海外回来，我们在纽约安顿了4个月，那是我们曾有过的最兴奋的时光。我们在西93街有一个小公寓，每天晚上用微薄的积蓄去看演出。我们坐在楼座，顺便说一句，在那样的大都市，那已经是很近的座位了，我保证。我们看演出，我们什么都做，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大型百货商店。你们知道的，在梅西百货什么都能买到。我想告诉大家，梅西百货和总统、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有什么关系……

［他由此谈到价格，谈到价格与政府开支的关系，然后继续。］

政府开支是多少？花钱方面我得认输：我的对手会花更多钱，一年多花150亿。这与梅西百货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与梅西百货的生活用品价格、服装价格和家具价格究竟有什么关系？我来告诉你们。要想支撑对手在这次竞选中所承诺的政府开支，你们就得承担更多费用，美国人购买的一切东西价格都会不断攀升……

我的朋友们，我们想要生活用品的开支增加25%吗？［不！呼喊连天］

那么，有一种方法，就是支持尼克松和洛奇。［欢呼声和掌声］

诚然，演讲很有趣，而演讲的整个生态也体现了美国竞选的野蛮粗暴，有一种病态的魅力。3个月来，这位47岁的英俊美国人在全国来回穿梭，没有秘密，没有休息，没有重病所需的正常休养。47岁，他不再是个男孩儿，他需要休息来恢复体力和精神，才能以最大马力再出发。但是竞选活

动占据了两位候选人的所有时间，摆布着他们。那些毫无意义的惯例和传统，让他们日复一日、夜以继日地消耗着体力，恐怕连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都承受不来。报纸、新闻机构和广播电视网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派出记者对候选人做报道，候选人马不停蹄，追踪报道的记者就会每周轮换，以免崩溃。而肩负战斗重担和殷切期望的候选人，却从来不得抽身，不得休息，要时刻紧绷，为了一个伟大和重要的职位不懈战斗。

听尼克松在先驱广场的演讲，你可能会对他的措辞吹毛求疵，但当你看到坐在讲台上的他，你无法否认，他为竞选总统已经倾尽所有。看着他，你只会为他和他的夫人感到悲伤。

理查德·M·尼克松坐在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右边，那个讲台上不仅有总统，还有纽约州州长纳尔逊·A·洛克菲勒，两名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Jacob K. Javits）和肯尼思·B·基廷（Kenneth B. Keating）］和他的竞选搭档亨利·卡伯特·洛奇。总统比他的指定继承人大23岁，坐在那里，寒冷的天气中，脸孔如天使一般，面色红润。纽约州州长一直在倾力助选，他累得脸色苍白憔悴。其他人演讲的时候，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就那样坐着，毫不掩饰脸上的阴郁黯淡。他盯着阴暗的天空，思绪似乎已经飘到千里之外，这样的介绍词他已经听到耳朵长茧了。他的嘴巴半张着，下巴放松，明显气喘吁吁。他陷入了思维的某个角落，然后突然意识到纳尔逊·洛克菲勒开始在别人演讲的某个停顿处鼓掌，然后他也匆匆鼓掌。轮到他演讲的时候，那副虚空的表情突然消失，他挥着手，微笑着，大声致辞，听起来有些急促，然后再次坐下，把讲台让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致辞的时候观察他是很有趣的。他像自己演讲时一样身体保持着警惕，持续了几分钟。他的头歪到一边，皱着眉头专注地听总统演讲。过了一会儿，眉头舒展了，但他还是很专心。但是慢慢地，他的头疲惫地耷拉下来，又呆滞地半张着嘴巴，他又再一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

那天下午，他还得前往纽约市的郊区扬克斯（Yonkers），在另一个集会上演讲，然后再回到市区参加体育场的一个全国电视节目，再次在露天集会上演讲。当天晚上，他还要飞去南卡罗莱纳州和得克萨斯州。接下来的行程还包括前往洛杉矶，跨过大洋去阿拉斯加州（他的行程表上的第50个州），去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然后回到芝加哥，再到洛杉矶，就等着选举日来临了。

1960年，有68 832 818人通过不记名的方式自由选举他们的领袖，想要衡量或判断哪些情绪的波动或确切的事件影响了选民的决定，简直是天方夜谭。也许凭直觉和现实，你知道某件事影响了对最后的票数，但是你却无

法衡量这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多大影响。

关心1960年大选的人，无论是参与者、观察家或者行动指挥官也好，几乎都一致认同，最后10天的拉票活动让尼克松的选情突飞猛进，帮他拿下来一定比例的普选票。理论上来说，稍微再推一把，理查德·M·尼克松现在就是美国总统了；稍微松点劲儿，约翰·F·肯尼迪就能以历史性的大比分赢得选举。

我在后面会再谈到选情的上扬。现在我要讲述尼克松第三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故事，这里面至少有两件事必须记录下来。这两件事有多重要，后世也许会有很大的分歧。哪两件事？具体来说，就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助选和共和党最后对电视的极致运用。几十年来，政治学者一直在争论，这两件事对最后普选票的细微差距有多大影响，但谁也说不出个准头，最多只是揣测。

既然是揣测，不如先来看看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最后10天的助选。这件事很有趣。

从一开始，艾森豪威尔就决定让“迪克”尼克松按照自己的方式竞选。早在1956年，他就把两个选择摆在尼克松面前：进入内阁还是再当副总统。尼克松选择了副总统，但艾森豪威尔一直认为，尼克松如果以内阁的身份来竞选总统，会比以副总统身份竞选更有优势。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还是很敏锐的。到了1960年竞选的最后一个月，艾森豪威尔仍然对他身边最亲近的工作人员说，尼克松如果以国防部长或者国务卿的身份参选，会有一个更好的竞选基础，因为他会留下自己的政治记录。

在芝加哥大会上，艾森豪威尔只是露了面，没有留下来看尼克松的提名过程，他的贺词带着几分刻薄的味道，说他现在“至少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共和党大会闭幕4天后，两人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见面讨论竞选，那是两人之间为数不多的以尼克松为主轴的战略会议。在那里，总统先生清楚地告诉尼克松，只要尼克松提出要求，他一定竭尽全力，而且尼克松不用理会他的意见，可以自由掌控选战。所以纽波特的总统顾问会觉得，即将卸任的总统和未来可能当选的总统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尼克松会把精力集中在共和党的铁票仓，而总统会致力于拿下数百万独立人士和“独具慧眼的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在1952年和1956年大选中助艾森豪威尔一臂之力，拿下了总统宝座。艾森豪威尔同意为了尼克松在全国电视上露面3次——一次是9月29日在芝加哥为共和党筹钱，一次是在11月初，还有一次就是投票前夕。除此之外，他还会在全国出席各种“非政治性”活动，不断强调和平与繁荣的主题，加深民众的印象。据艾森豪

威尔的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是两人在纽波特达成的所有协议："我们所有人都期待总统会更多地参与到竞选中来，远超他现在实际参与的程度。"

但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总统先生想要做的更多，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有魔力的名字，而名字的主人一直在等待召唤，但一直没等到，艾森豪威尔的人至今都愤愤不平，而且很可能前总统自己也难以释怀吧。

但是尼克松的人和尼克松自己这么多年来都被艾森豪威尔的人当成小孩儿一样对待，现在明显跃跃欲试，想要自己掌控大局，自己领导共和党。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时刻。"我们希望艾克做的，"尼克松核心圈子的一名成员在欢欣鼓舞的第一回合初期告诉作者，"就是他在联合国应付赫鲁晓夫，并且不会把事情搞砸。仅此而已。"——他还强调了"仅此而已"一词。

几周时间慢慢过去。据当时的白宫工作人员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怒气越来越盛。尼克松的竞选总部同意第一场电视辩论安排在9月26日。同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也要上全国电视节目，他要出席纽约一个极其重要的天主教慈善晚宴并致辞，但是因为撞日子，总统就无法博得公众关注，这令他很不悦。更加触怒总统的是肯尼迪一直攻击现政府，指控美国声望日降、政府防御失误加剧。他本期望尼克松立刻反驳，或者，因为当时还处在选战比较温和的第一回合，或者说"新尼克松"阶段，尼克松不方便出面反驳，艾森豪威尔期望尼克松能邀请他，总统，来反驳。

直到10月29日，星期六，一名白宫助理（到访芝加哥来支持一位当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才猛然从一名尼克松的助理那里听说，尼克松打算呼吁总统参与最后一周的造势活动，而且非常急切。白宫助理说总统也很急切地想要帮忙，但是你们不能命令他，而是告知他并请求他帮忙。10月31日，星期一，一顿白宫午餐匆忙被安排成一次会面，总统团队的高级成员和总统提名人的员工一起研究细节。出席会议的人只记得那天的乳鸽肉碎很美味，还有，尼克松极度疲劳，如此"疲惫不堪"，其中一位出席的人说："以至于他都不能清晰或快速地思考，餐桌上的谈话也无关痛痒。"在这顿午餐上，总统同意亲自到匹兹堡和克利夫兰，而且还会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在纽约郊区和曼哈顿做巡回演说。

据那些关注竞选的人回忆，艾森豪威尔在最后8天参加了造势活动，如一缕清风，明快、新鲜、引人瞩目。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政治中一直都是有魔力的，他最特殊的才能就是让人们快乐。我跟随美国政治人物出行的时候，从没见过一个车队后面会留下这么多欢笑和热情洋溢的群众。美国人注视着艾森豪威尔，他们是快乐的。有些精明的人尖锐地剖析他的政治特质。他不是初出茅庐，但不老于世故，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从政，极其个人化，但又非常有效。

共和党的领导人还在争论竞选中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利用艾森豪威尔，还有他的影响力在最后一周是否得到了最好的运用。他表现得慷慨大方、全心全意，但是在大选后有各种猜想，其中如何处理和安排他的活动是最主要的一个：如果最后一周把艾森豪威尔放在芝加哥，而不是放在纽约，是不是更明智一些？毕竟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在大选临近时选情紧张，而纽约州已经提前认输。如果把他放在密歇根州而不是俄亥俄州，最后会不会是共和党拿到必要的35 000票赢下这个州？如果整个10月都让艾森豪威尔进行巡回演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愿意这样做），反驳约翰·F·肯尼迪，替本届政府辩护，也可以把尼克松解放出来，让他可以专心谈发展或是前瞻性计划，这样是不是更明智呢？

所有的设想永远都得不到答案。正如很多观察家所想，我也认为最后10天艾森豪威尔的力量强势推动了尼克松的选情。我更愿意把艾森豪威尔还在任时我最后见到他的样子印在脑海里——那是11月2日的晚上，在纽约体育场的外面，总统刚在里面做了一场演讲，还有副总统。他们那天都不愉快，马不停蹄地在超市、郊区购物中心和户外集会上拉票。那里有很多惹眼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喜欢艾克，但我们支持杰克。"现在，黑压压的人群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聚集在体育场门外，灯光打在彩旗和美国国旗上。这位老兵站在那里，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他那天使般的脸孔在灯光中发红，一小丛稀疏的白发闪着盈盈的光，他的好精神保持了两分钟。他挥手示意欢呼的人群安静下来，他说他似乎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在说，过去几年的一些伟大成就，是他们所有人和政府一起缔造的；他想要感谢他们；如果可以，他想要说说他自己的感受。这么多年，人们一直在喊"我们喜欢艾克"，这对他意义非凡，让他在面对千难万险的时候，让他在疲惫不堪的时候，能够继续前进。所以他感谢他们，祝福他们；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表达对他的喜爱，是完全不同于刚刚给理查德·M·尼克松的欢呼声，接着乐队开始演奏"天佑美国"。他消失在夜色中，最后以总统的身份与纽约告别了——艾森豪威尔1956年以1 597 562票拿下了纽约州。巨大的领先优势把所有赢下这个帝国州的人远远甩在身后，尼克松最后只得到383 666票，输掉了纽约州。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在最后关头的助选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政治揣测的话题，那么共和党最后在电视上的大举发力更值得来一场理性分析。目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没有公布选战最后12天的电视开支，因为在这类数字公布之前，要先进行有创造力的润色。从法律上来说，两党的全国委员会在总统大选中的开支都不得超过300万美元，而实际产生的费用最少也是这个规定限额的4倍。民主党承认在最后18天花了260万美元，大多用于广播电视节目。但是他们的数字和共和党一样，都没有依法列入账目和分类账中，以此来满足法律规定的限额。所以保守估计，共和党的开支要高得多。

共和党开始用电视对美国民众的思想进行最后的渗透。10月25日，尼克松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一场集会对全国直播；10月29日，艾森豪威尔在匹兹堡的活动直播；11月2日，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洛奇在纽约的集会对全国直播；接着，在最后一周，每晚7点都有一场尼克松的15分钟电视直播节目。到了11月7日，星期一，投票日前夕，他们突然大手笔搞了一个马拉松式电视节目，这应该是媒体渗透到美国文化后，电视造势活动中最昂贵但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模式。11月7日，星期一下午，尼克松在美国广播公司的底特律演播室进行了一场4小时连续电视节目，共和党估计费用大约是20万美元（民主党咬定是40万美元）。节目一半是感伤音乐，一半是实质内容，展示了共和党候选人的巅峰状态（谈和平的时候）和低谷状态［与金吉·罗杰斯（Ginger Rogers）讨论生活成本的时候，罗杰斯说她也靠薪水生活］。据估计，有1/5的美国家庭在下午某个时刻收看了副总统的节目。观众大多是家庭主妇，她们下午要接孩子放学，准备晚餐，等着工作的男人回家，所以电视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数百万美国人一定有恰好赶上他状态好的时候，并且被他打动了。尼克松节目结束后，美东时间六点半，托马斯·E·杜威州长的15分钟节目开始，预计费用是3.5万—4万美元。晚上11点，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洛奇的半小时三路连线大约花费5万—7万美元，节目从十一点半到午夜在ABC和NBC的重播大约各花费4.5万美元。合计下来，投票日前的那个星期一，共和党花在电视造势上的费用大概有50万美元，再加上上一周的开支，以及地方电视台费用——共和党的地方助选人和国会议员在地方电视台或独立电视台的开支，过去10天的总开支可能在200万美元上下。这是选举史上为左右民众思想展开的最壮观的行动。

最后一周对民众的思想到底有多大影响，没人说得准。在作者看来，这一周的造势活动居功至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尼克松的选情上扬，当然这些都无从证实了。

共和党在最后10天吹响了电视竞选集结号。有趣的是，这段故事还能帮我们由内而外地分析尼克松的整个竞选活动。

尼克松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大选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电视媒介运作，向美国民众传递自己的信息。他的电视顾问原以为尼克松会批准他们做全新尝试，已经准备了一篮子花式技巧和特别节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运用媒体（见第10章）。但是尼克松下不了决心批准或否定这些计划。他害怕被贴上“麦迪逊大道”的标签，所以这些纽约的电视顾问，各大广告公司自告奋勇的最强大脑们，不得不委身在范德比尔特大道（Vanderbilt Avenue）上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那里在麦迪逊大道东边，相隔一个街区。电视顾问从这些办公室里观察竞选进展，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忽略

了。从7月25日，尼克松在芝加哥接受提名演讲的那天晚上，到10月25日，3个月过去了，尼克松从来没有自主地上过一档全国电视节目。无论他的顾问如何哀求，尼克松还是放过了攻击民主党在国会夏季会期不良表现的良机。当他上电视发言的时候，他用的还是旧仪态——正面对着镜头，硬要把通用发言稿演绎成闲谈。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在10月举行一场马拉松式电视节目的想法，结果到了选举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觉得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选举日前那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纽约的电视工作人员得知要准备一场全面的马拉松式电视节目，49小时内开播。于是，他们以秋风扫落叶的阵势行动起来，在周末联络各大广播电视网，又催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管们设置长途线路，确保节目播出的时候万无一失。以电视支持尼克松竞选的目标就这样实现了，但不是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发生的，只是因为时间紧迫，尼克松此刻需要曝光率，才得以落实。

共和党竞选组织的每个电视工作梯队都表露出了不满。

在6月和7月，精心制订的竞选计划悄无声息地流产了。（见第10章）策划团队不定期开过4次会，到了9月中旬，候选人却抛弃了他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焦急地等待着领袖发话，一直在等待。“你可以，”其中一名重要主管说，“把钥匙带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门锁上，把钥匙扔进波托马克河（Potomac），然后把所有175名员工运到维尔京群岛，可以省下一笔钱——只要他肯听我们的意见。”策划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啊，我们过去在大学俱乐部召开战略会议，就像置身满是镜子的屋子，10个人互为彼此而倾倒。我们感叹自己多么聪明，但是没有人能让意见直达迪克。”

到了竞选快结束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变得很普遍。尼克松的高级策划师和志愿者都是高精尖人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放下在美国企业的要务来给尼克松工作，但是他们却没有向政治首长进言的机会。他们多番努力想要与他接触，试图得到他的亲自接见，博得他的关注，但最后也沦落到格格不入和丢脸的下场。有些人就算得到了尼克松接见，又不得不肩负起信差的责任，帮很多无法直接沟通的人传话。尼克松10月在纽约停留的时候，一位电视顾问有机会向他汇报工作。当他从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总统套房出来时，碰到一个充满嫉妒、试图掩饰焦虑的演讲稿撰写人，问他：“所以你见到他了，这个世界上最吝啬的人今天早上怎么样？”

这些人在竞选期间组成了共和党指挥部，这里从来都不缺强大的政治能力，在任何层次上都不缺。触怒这些能人才子的，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说法就是，“他把我们都当文员使了”。

尼克松的最后一个竞选提议，可以帮我们对这名共和党候选人做个大概的总结。11月6日，星期日，副总统在洛杉矶宣布了最后一个提议，来支撑他的“无须妥协的和平”这一宏大主题：前总统胡佛、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将被派往东欧，在那里组织对抗共产主义的秘密活动，当然事先得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允许。

这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可能也真的是先进的想法，但与当时的世界格局格格不入。期望赫鲁晓夫会和平邀请美国来清算他的东欧帝国，这不合乎逻辑。这一提议非常明确，但其背后的理念却令人费解。

最后，对于理查德·M·尼克松在承受巨大痛苦之下勇敢发起的这场竞选，我只能这样总结：这场竞选背后没有思想体系或结构，他没有全局观，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未来的全貌。从他最后时期的提议、精心准备的演讲以及个人的表达中，我们都无法感知到，是什么样的历史进程、时间长河或力量变迁塑造了今日的美国，以及未来的方向。尼克松有大量政治技巧，他的勇气毋庸置疑，他的忍耐力惊人，但是水手才具备技巧、勇气和忍耐力，水手知道风向，敢于迎着风浪前行，认得潮汐，他身上缺乏的是一个航海家的方向感。航海家认识星辰，靠星星指引方向，即使被风暴吹得偏离航道，也会等待星星和太阳出来，观察之后返回航道。

思想体系的薄弱也导致尼克松明显的情绪波动，这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也模糊了真实的尼克松，让他背上一个不怀好意的、不相称的绰号——“狡猾的迪克”。在个人生涯中，尼克松其实很少耍手段，而且他从来没有昧着良心耍过手段，除非是历史的泥沙裹挟着他，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尼克松的第一场重要竞选［对手是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通过给对手扣上“赤色分子”（Red-baiter）的帽子赢下的，那也只是为了响应时代和竞选地的召唤。如果说1954年他宣称选出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将会“让（美国）偏向左倾的大路，向社会主义靠拢”，那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至于有没有一个旧尼克松和新尼克松之分，其实也很难评说。这位来自南加州的年轻国会议员14年前是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但并没有固守自己的立场。他在华盛顿很容易被人说服而改变信念。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挣扎，他就变成增加对外援助的最积极拥趸，在整个共和党内仅次于保罗·G·霍夫曼（Paul G. Hoffman）。

正是因为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思想体系，缺乏一个大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个人世界观，在竞选过程中，他因为压力而短路的情况也是不胜枚举。

共和党大会期间，他从华盛顿飞到纽约。洛克菲勒那些惴惴不安但又勇气十足的员工都不敢相信，他们那天晚上可以对尼克松一再施压和催促，直到他一点一点妥协，最后彻底投降。但是尼克松的确投降了，因为在他看来，“第五大街合约”是点的组合；而在洛克菲勒看来，“第五大街合约”是

一个完整体系。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他在民权大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起初，他在芝加哥时已经发话，要搭建一个平台来在争取北方黑人选票，与民主党叫板，后来，他被自己访问南方的成就动摇，又希望能赢得南方白人的选票。

当美国黑人的英雄人物马丁·路德·金在大选前最后几天被捕的时候，尼克松的表现很难看出他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政治态度。约翰·F·肯尼迪反应很快，态度明确（见第13章），理查德·尼克松则没有。马丁·路德·金在佐治亚州被判苦役监禁4个月，当天下午，司法部在一位精明的共和党籍副司法部部长［劳伦斯·E·瓦什（Lawrence E. Walsh）法官］的建议下，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支持申请释放被监禁的黑人牧师。两份草案文本立刻被分别发送至白宫和尼克松的移动总部（那天在俄亥俄州），等待批准。在民权形势如此紧张之际，这么重要的声明草案却被毙掉，但究竟是谁做的现在也没有披露。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应该采取行动，但都没有动静。艾森豪威尔的动机让人雾里看花，但尼克松的行为就更加令人费解了，因为他是候选人。他在芝加哥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政治决策（见第7章），要拉拢北方的黑人选票，但是现在很明显，他觉得他很有可能凭白人选票把得克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全拿下，他不想冒犯这些白人选民。所以他没有行动，他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来指引方向。

毋庸置疑，副总统是天生的战士和勇者，但没有一个战略框架来统筹他的战斗力和勇气，使之发挥到极致。

究竟是因为理念模糊所以孤独，还是因为孤独所以理念模糊，没人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孤家寡人。他在国会山的办公室是P53房间，只有他在那里办公。他私人秘书的办公室在两层楼下——T6。他的行政人员更是远离他，在旧参议院办公楼一个角落的套间办公。他最信任的顾问团里面，很多都跟了他不到两年，有些人才结交几个月而已。只有他最忠心能干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和他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深得他的信任（8年）。

他的那些顾问首先是共和党人，其次才是尼克松的人，所以他们的怨恨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竞选中很多走偏的地方也能得到解释了。

他的顾问团成员虽然觉得自己首先是尼克松的人，其次才是共和党人，但也有顾虑和困局，而且这恰恰更能反映出尼克松的性格。“你必须记住，”其中一位能力出众的顾问团成员说，“他担任副总统如此之久，情绪上有很大的挫折感；他想要所有的决策权都握在自己手中，所有的决策——去50个州举行竞选活动，如何利用艾森豪威尔，辩论策略。他的态度

由他的自省和思考决定——我的角色嘛，就是尽最大能力来执行这些决定。”

一位白宫助理曾试图消除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隔阂，他这样说：“你必须先了解一个基本的心理状态——尼克松是一个自省的人。他不愿意向别人求助，任何时候只要他开口，我们都会提供帮助。他可以得到巴鲁克（Baruch）或苏兹贝格[注]或麦克阿瑟（MacArthur）的帮助。但是，尼克松拿不出勇气来向别人求助。”

还有一位在竞选期间和尼克松很亲近的人告诉我：“不要问我哪里出错了。我真不知道。我以为我和他关系密切，我以为我和他沟通无阻。我一直恳求他发表重大演讲，但是他太擅长即兴演讲，能蹦出一些妙语金句，所以你没有办法摁住他去发表一次重大的政策演说。比起全美1.8亿人，他更在乎面前的3万人。他犯的错误非常个人化，但是你又得尊重他的隐私，以此去理解他，然后放任不管。”

副总统从进入美国参议院之日起，就承受着压力和频繁的攻击。其实所有行使权力的人都要承受压力，但是，1960年大选对尼克松身体上的无尽折磨和诸多要求，给他加诸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即使是最爱他的人，做评价的时候也很难口下留情。“迪克不是输了大选，”其中一个和他相处过两年以上的人说，“迪克搞砸了大选。”那些年长的共和党人说话就更加尖刻。“可能，”策划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迪克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当一个领袖。”

所以，美东时间11月7日午夜（芝加哥时间11点），理查德·尼克松从芝加哥国际机场起飞。他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在声明中公布了他的竞选里程：他飞了65 500英里，去了188个城市，做了150多场重要演讲。而且，据他们估计，他亲自见了1000万人。

他很疲惫，但信心十足。几天前，他向媒体公布了自己的预测，应该是势均力敌。但是在他认为重要的7个大州中，他觉得他能拿下5个：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认为在密歇根州会打成平手，实际结果，就得看运气了。他觉得铁定会输掉的只有纽约州。他还有信心拿下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明尼苏达州和特拉华州。

但是，无论是尼克松还是肯尼迪，现在担心都是多余的，一切能做的工作都做了，只等宣判。他的大型飞机抵达洛杉矶以东的安大略国际机场，当时是投票日星期二早上美东时间4点（太平洋沿岸时间1点）。现在，所有

的努力都告一段落了。他在星期日下午离开洛杉矶，飞了7 170英里到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芝加哥，其间只睡了不到3小时。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到机场接他，开了18英里，抵达洛杉矶威尔希尔大道的国宾大酒店，他被安排住进了第五层的“皇家套房”。皇家套房据称是东方装饰风格，房间色调有红色、粉色、紫色、绿色和紫罗兰色，家具是青铜的，据称是暹罗主题，为了加强东方风格。他的母亲就住在楼下。第二天早上，他要驱车30多英里到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东部，在第33选区投票。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但这一点也改变了。

他在这样一个东方瑰丽色彩的酒店里结束他的竞选，就像开始的时候一样——他是一个客人。当初，他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的一个朋友家，作为客人，在棕榈树下开始了竞选。

他的竞选谈话一直都以家主题，但是除了妻子所在的地方，他并没有真正的家。即使在加州，他也是一个追寻家和朋友的陌生人。

---

1. 肯尼迪那天晚上状态上佳，而且就像耍蛇人控制蛇一样影响着尼克松，这对尼克松的自我是双重伤害。8月的时候，肯尼迪原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纯天主教的活动邀请，他觉得这样会凸现宗教问题。显然，他最终决定在活动上发言，但点到即止。活动前两天，他的助手还穿梭在媒体间问：“你知道什么段子吗？”肯尼迪的演讲开场白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再次出席这一著名的晚宴，我很开心尼克松也在这里。［掌声］既然斯佩尔曼主教展示出真正的宗教精神，我想我很快也会受邀参加纪念赫伯特·胡佛的贵格会教徒晚宴了。［笑声］也只有斯佩尔曼主教这样一个在美国政界广受尊重的人，才能让这两个政治领袖在大选中第一次和睦地同席而坐。这两个人对11月大选越来越焦虑不安，他们拿怀疑的眼光对视彼此已久，他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对峙激烈，他们就是——尼克松副总统和洛克菲勒州长。［笑声］和我们一样，尼克松在竞选中有他自己的麻烦。一度连《华尔街日报》都在批判他的策略。这就像《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批评教皇一样。

   但我认为本周对于共和党来说最坏的消息莫过于凯西·斯滕格尔（Casey Stengel）被解雇了。［笑声］这说明，经验并不一定管用。［笑声和掌声］

   在经验这个问题上，我今年年初就宣布了，如果我胜选，将来任命大使的时候还是要看经验而不是看竞选捐款。这话一出口，我父亲再也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上次辩论中有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片段，是副总统说的话。他非常动

人地提醒孩子们和候选人，反对总统和前总统做巡回政治演说的时候说脏话。我在国会和副总统共事14年，我知道他在说脏话上的看法是很真诚的。但是我听说，一个显要的共和党人昨天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次的演讲真他妈的好。"［掌声］副总统说："谢谢你的称赞，但请注意措辞。"这名共和党人继续说："好的，先生。我很喜欢这个演讲，所以我为你的竞选活动捐了1000美元。"接着尼克松回答："他妈的，是真的吗！"［笑声和掌声］

但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草率略过前总统杜鲁门的措辞。我给他写了封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您的建议，关于那些投票给我们对手的人该何去何从。我理解您的深刻动因，也感同身受，我想重点是我方应该避免提及宗教问题。"［笑声和掌声］

这样的演讲总是会扰乱尼克松的心神，他在公开场合的蜻蜓点水式谈话从来不会这么有效，私下里的点到即止也总是会带点儿脏话。而且，尼克松喜欢肯尼迪，但肯尼迪并不喜欢尼克松。

2. 本书作者应该告诉读者，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和绝大多数其他记者一样，尽管不懈努力，但都无法和尼克松私下会面和对话，讨论竞选问题。我提出这一事实，是因为尽管绝大多数尼克松的顾问和朋友非常慷慨、自信、礼貌，贯穿本书的解读始终来自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虽然跟随尼克松数周，但都被禁止私下接触。不管你和一个人同行多久，不管你们的距离多么近，这种观察得出的结论始终不免有个人理解上的偏差。

3. 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未经验证的经验法则，如果有人被扔鸡蛋或西红柿，这个人通常就被打上了失败者的烙印。

4. 这里的想法可能并不确切。有一些身居高位的共和党人认为《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es Sulzberger）本质上是共和党人，但他的妻子伊菲吉妮却是一个隐藏的民主党人。由此，他们认为这份美国最有分量的报纸《纽约时报》的路线是在家庭争论中敲定的。按照这种想法，尼克松如果向苏兹贝格提出请求，会让苏兹贝格与妻子的关系僵化，并让这份伟大的报纸支持共和党的副总统。但我自己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第13章

肯尼迪的竞选之战：第三回合

在约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尼克松各自率领队伍巡回宣传之际，双方的情绪对比超出人们的想象，堪称“几家欢乐几家愁”。回想起来，双方总部的情绪表现令人难忘，恰恰证明了这样一条政治定律：最贴近候选人的人其实最不容易判断选战的是非成败。

在10月的最后一周，我随尼克松的竞选队伍走完了本人的最后长途旅程——从匹兹堡出发，途经西弗吉尼亚，穿过俄亥俄州的南部和中部。行军路上，低落的士气始终像乌云般挥之不去地笼罩着随从人员，每到一站，不断传来候选人充满沮丧忧郁和自怨自艾的话语。一天晚上，在尼克松的竞选列车上，我震惊地发现其两位助手竟然开始讨论肯尼迪会选择谁担任国务卿和财政部部长。其中一个人——尼克松的演讲撰稿人在我们的谈话暂停时，语气平淡地问一位记者是否认为肯尼迪假若当选的话，真将任命哈佛大学的肯尼思·加尔布雷思（Kenneth Galbraith）担任财政部部长。这位记者告诉对他说肯尼迪很少透露这类信息，不过任命加尔布雷思好像没有可能。尽管如此，这位尼克松的下属想到这里还是禁不住难过地摇着头。

在本次尼克松行程前的一周，我跟随肯尼迪的队伍。后来在选举日逐渐来临时，我又加入了肯尼迪的营地。双方对比令人惊愕，在肯尼迪一方，人人信心爆棚，势在必得。电视辩论结束了，卢·哈里斯的民调表明肯尼迪成功赢得了辩论，他不仅胜在个人魅力，还在主题方面——美国声望下降已成为选战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观众对肯尼迪的支持率是62%，而尼克松是38%。盖洛普民调也证明了上述结论。9月初，尼克松以47比46的优势领先（7%尚未确定）；首轮辩论之后，肯尼迪则以49比46领先（5%尚未确定）。根据盖洛普的结果，最后一轮辩论之后，双方差距增加到51比45（仅有4%尚未确定）。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开始打赌，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开出了等额赌注，他说无人能说出尼克松可以稳操胜券的6个州。但结果证明，肯尼迪一方的骄傲自负和尼克松一方的悲哀忧伤都误导了人们的判断。

当然，警告还是不断传来。在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拉里·奥布赖恩

只相信协调员的报告，对于路上宣传队伍的欢欣鼓舞毫不理会，他坚持说双方仍然势均力敌、成败各半。在纽约，通过研究民调结果，哈里斯警告说，民主党候选人必须准备迎接共和党最后一刻的电视闪电战——艾森豪威尔加入选战，尤其在最后一场电视辩论结束后，随着民主党候选人年轻干练的形象和效应逐渐褪去，要准备应对宗教情绪的回潮。哈里斯认为，由于人们过去心存疑虑，历史包袱不会轻易消失的，有可能卷土重来，他建议肯尼迪通过电视节目重新正视宗教问题。博比·肯尼迪也不断督促手下团队，以免过分自信导致斗志松懈。（博比·肯尼迪认为尼克松的选战“高潮”和“节奏”理论纯属无稽之谈。他说：“在10周之内，我们只有一路前行、奋斗不息并寸土必争，才能赢得胜利。我们在辩论中的表现无出其右，我们坚决维护荣耀，我们终将胜利。如果稍有松懈，可能就功亏一篑。”）

随着辩论结束以及肯尼迪的选战进入第三和最后一轮，所有跟随民主党候选人巡回宣传的人在呼之欲出的胜利面前，变得目光迷离和眼花缭乱。虽然后方指挥中心传来了警告，但对于跟随约翰·F·肯尼迪的作战分队在前线奋斗的人们而言，好像不可能潜伏着危险。自9月中旬以来的6周时间里，竞选之战和竞选团队已发生变化：现在做出决策往往迅速自信，宣传车队轰隆前行，候选人的特色好像成为日常宣传主线。在人们看来，感性及时的反应比理性迟缓的判断更重要。

在肯尼迪最后一轮的选战中，曾做过不同决定，有的讲究技巧，有的影响深远。回想起来，只有少数决定对于研究美国的内部忠诚这一课题是具有意义的。

自10月初到选战结束，肯尼迪只休息过一个星期六；其间，他们在海恩尼斯港做出了一系列专业性决定。在10月1日举行的一次5小时会议上，肯尼迪将核心人物召集在一起（弟弟罗伯特与父亲约瑟夫·肯尼迪、特德·索伦森、奥唐奈与奥布赖恩、皮埃尔·塞林杰、卢·哈里斯与约翰·贝利以及现在负责选后策划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先阅读首轮辩论的材料，后为选战的最后几周制订计划。他们认为尼克松在首轮辩论中的表现已经抹杀了“资历和年轻”议题最初带给副总统的任何优势；他们现在自然应预见到艾森豪威尔的营救行动，但肯尼迪不要直接攻击艾森豪威尔，对他不予理会就行；他们同时决定应当提防尼克松将共和党和民主党描述为“殊途同归”的那种明显意图；肯尼迪必须澄清两党的目标完全不同，同时要将共和党标签牢牢地贴在尼克松身上——突出强调他是麦金莱、哈丁、胡佛、兰登和杜威的精神传人。

奥唐奈和候选人做出了另一些常规决定，旨在确认在8月份制定的最初选

战安排。他们确定选战的最后3周将主要在选举人票集中的东北部人口大州巡回演讲，重点是芝加哥、费城和纽约郊区。候选人要在加利福尼亚州挤出两天时间——一天半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剩余半天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他们还决定将俄克拉何马州添加到最初日程中，结果证明试图抓住这个边境州的安排是徒劳无功的。从传统上看，这个地方是民主党的长期势力范围，不过对天主教徒疑虑重重。

肯尼迪做出了这一阶段最精准的重要决定，尼克松就相同问题做出的决定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该决定涉及马丁·路德·金事件——一个既拷问良知，又要考虑北部黑人和南部白人选票微妙平衡的插曲。

在轰轰烈烈地争取真正美国平等权利的黑人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人物；他充满个人魅力，积极为争取当地社区的最大利益仗义执言。10月19日星期三，几乎在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就国防问题向迈阿密的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发表演讲之际，马丁·路德·金和其他52位黑人在亚特兰大的里奇百货商店（Rich’s Department Store）被捕，理由是他们拒绝让出店内玉兰厅（Magnolia Room）餐馆的一张餐桌。下周一，除了金之外，本次事件中的其他“静坐示威者”均被释放；糟糕的是，法庭找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理由判处金4个月劳役，然后迅速将他秘密转移到州立监狱。这次事件非同寻常——和美国其他黑人相比，马丁·路德·金深受南北黑人同胞的爱戴和尊敬。和其他黑人相比，他对南部白人的特权更有威胁。极有可能的是，他永远不会从羁押他的里兹维尔州立监狱（Reidsville State Prison，佐治亚州）活着出来了，监狱位于南部腹地；金的妻子已身怀六甲，她认为丈夫很可能被暗杀。如果金遭受私刑，激起的熊熊怒火将远远超过非洲帕特里斯·卢蒙巴[注]被绑架杀害时在美国社会激起的愤怒，激烈程度将与佐治亚州和加丹加省[注]之间的距离成反比。黑人社会磨刀霍霍，南部各州蓄势待发；在前几周，甚至在逮捕之前，至少3个南部州长直接通知肯尼迪总部：如果他干涉南方事务，对马丁·路德·金表示支持或赞同，那么民主党就别打算得到南方选票。现在，肯尼迪必须做出选择。危机出现了。

肯尼迪的每位选战相关人员立刻意识到了危机。10月25日星期二的晚上，在肯尼迪团队吸收从政的众多优秀年轻人中，有个人提出了危机应对建议，此人叫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系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一位法律教授，他主要在选战期间对人权部门给予指导。沃福德的想法就是从质朴的人性出发——肯尼迪直接致电慰问佐治亚州的金夫人。沃福德迫切希望联系到上司——肯尼迪选战团队人权部门的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以便施赖弗可以排除万难见到正在中西部巡回演讲的候选人。星期三清早，沃福德在芝加哥找到肯尼迪家族中最平易近人的施赖弗。施赖弗热情地接受了建议。事不宜迟，施赖弗立刻在芝加哥国际机场

的奥黑尔旅馆（O’Hare Inn）见到了肯尼迪，他此时要到密歇根州做一天演讲。

肯尼迪对沃福德的建言献策表现得随性、坦率和直接。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从房间里出来，直接给金夫人打了长途电话，表示他非常关注和挂念她当前的痛苦，必要时将进行干预。

金夫人既兴奋又不安，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几位密友。通过黑人领导层，消息迅速从亚特兰大传到北方，然后传到新闻界——肯尼迪准备干预保护身陷囹圄的黑人领导人。博比·肯尼迪在指挥决策期间了解到这一消息，其行动更进一步，他在第二天早上就从纽约致电做出该判决的佐治亚州法官，请求释放马丁·路德·金。星期四，金从里兹维尔监狱被安然无恙地保释，等待上诉。

在最后3周如火如荼的总统选战中，一般美国公民不会特别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在黑人社会，肯尼迪的干预就像编钟乐声般振聋发聩。马丁·路德·金的父亲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在几周前出于宗教原因还支持尼克松，现在立场突变。“由于这个人，”金牧师说，“愿意擦去我儿媳眼中的泪水，我愿意将我掌握的满满一箱子选票带给肯尼迪先生，全部倒在他的腿上。”全国有好几十位黑人领袖，他们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但也深深地被肯尼迪的行为感动，于是纷纷效仿。在指挥中心，肯尼迪现在可以彻底贯彻既定方案了。根据沃福德的要求，全国各地印刷了100万本有关该事件的宣传册，仅在芝加哥就有50万册，由这里通过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运往各地。在选举前的星期天，这些宣传册开始在全国各地的黑人教堂外面分发。由于1960年选举的局限性，人们在最终计票时无法确定某个特别事件或决定是否比其他的更重要，不过通过回顾如下事实——伊利诺伊州的差额仅为9000张，支持肯尼迪的黑人估计为25万人；密歇根州的差额仅为6.7万张，支持肯尼迪的黑人估计为25万人；南卡罗来纳州的差额仅为1万张，支持肯尼迪的黑人估计为4万人，人们可以发现肯尼迪的本能决定是最后几周的最关键决定。

目前为止，他们果断推出了一系列决定，决定指向哪里，队伍就可以打到哪里；竞选团队的不同部门通过实地检验说明已成功度过了磨合期，整个系统就像一台精密机器，运行起来和谐悦耳、统一高效。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在太平洋战争最后7月、8月的时候，美国轰炸机机组从天宁岛（Tinian）和塞班岛（Saipan）携手打击日本的情景。

队伍在全国各地奔走时，由奥唐奈和奥布赖恩联袂指挥。特别协调员带领他们走进了42个州。在纽约，在艺术家威廉·沃顿的感召下，高尚的民主党

改革派和卑鄙的坦幕尼协会成员也开始不自然地尝试配合；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稍微遇到了点儿麻烦；在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 line）的南部，林登·约翰逊像木兰花精油那样发挥着润滑作用，他们的行动畅行无阻。

选举团队在措辞和理念方面精益求精，在乘车、酒店、行李收取和招待方面毫不讲究，这一切由先遣人员全面掌控。

为选民呈现饕餮盛宴的时刻到了，因为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刚刚结束，选战渐入佳境，美国大众更加关注总统选举。美国人希望了解有关选举的更多资讯，于是尼克松和肯尼迪即使没有太多的新鲜东西，每天还是尽力翻新花样。随着资讯需求的增加和内容的减少，他们想尽了各种出奇制胜的办法。注 知识分子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索伦森–古德温团队连续两天殚精竭虑地努力，持续工作超过了48小时。他们的工作辐射3个州，为美国总统选举提供了一些重要理念。

理念对于约翰·F·肯尼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常常安排别人负责这一方面。肯尼迪曾经未能将知识分子的“种子”成功整合到选战中：流动选战队伍从1737 L街总部出发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教授的演讲撰稿人小组没有在喧嚣的队伍面前树立起权威来。在行军路上，两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加入了肯尼迪团队［《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约翰·巴特罗·马丁（John Bartlow Martin）和《阿尔及利亚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Algeria*）的作者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他们负责刺探重要情报，用马丁的话说就是“先遣消息”。两个人比候选人先行一步，他们利用媒体人的灵敏嗅觉全面了解当地情况，为肯尼迪的街头演讲提供背景和资料。但涉及重要事件和公告，肯尼迪还是倚重最初的索伦森–古德温组合。从这一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人如何人尽其才并激励每个人全力以赴的。

10月16日周日下午，在首都华盛顿，古德温一直在潜心准备和介绍6点钟“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可能要提问肯尼迪的问题。此时，索伦森正准备第二天要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威滕伯格学院（Wittenberg College）举行的演讲，题目初拟为“政府的伦理”（Ethnics in Government）。两个智囊团在华盛顿的工作几乎同时完成，“会见新闻界”节目刚结束，他们就趁着夜色随选战飞机编队从华盛顿飞往俄亥俄州。他们交替前进；星期一，由索伦森陪同，肯尼迪在俄亥俄州沿公路行经富兰克林县和哈密尔顿县进行宣传活动，最后到威滕伯格学院发表道德主题演讲。肯尼迪和索伦森一路前行时，古德温仍然待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Middletown）的一家酒店里，守着肯尼迪选战资料便携式图书馆，忙于第二天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Tampa）要发表的拉丁美洲事务主题演

讲。4点30分，古德温必须离开米德尔敦，当地的民主党总部催促他赶快到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机场，竞选战队将启程前往佛罗里达。他在机场见到了筋疲力尽的索伦森，后者刚从华盛顿的考克斯办公室收到关于国防的原始演讲资料并准备整理成形。在晚上前往南方的飞机上，两人见到了疲惫不堪的候选人。当肯尼迪边阅读边修改古德温在米德尔敦市曼彻斯特酒店起草的拉丁美洲演讲稿时，古德温讨论索伦森在路上起草的国防演讲，他准备在这方面帮下忙。在两人的联袂合作下，关于美国政策的两大演讲稿成功出炉；清早2点钟，他们到达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机场汽车旅馆，肯尼迪在那里睡了5个小时。

不过，两位疲惫不堪的顾问还要完成国防演讲的终稿，他们决定倒班进行。古德温先睡觉，索伦森和一位秘书一直加班到早晨5点钟。索伦森5点睡觉时，秘书叫醒了睡了3个小时的古德温，把索伦森的草稿交给他。不过现在候选人要对稿子做实质性改动——其中包括冷战时期的非军事内容和纯军事内容。8点30分，古德温开始定稿，边写边交付印刷；由于要赶下午2点离开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的秘书开始帮助收拾行囊。

当肯尼迪上午在超市和十字路口巡回演讲时，演讲撰稿人在重新组织措辞和观点。定稿后，古德温冲出去拦截住竞选车队并把关于国防观点的完整文稿交给肯尼迪；他在迈阿密公路的收费口示意肯尼迪的竞选车队停下，将演讲定稿交给了候选人。45分钟后，后者将以此阐述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后的国防立场。这两位理论家可以休息一下了，不过那天下午，当肯尼迪在坦帕市发表拉丁美洲事务主题演讲时，他们又起来准备次日晚上纽约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晚餐会上可能用到的妙语和笑话。

需要商榷的是，历史学家是否值得重述如下演讲：在威滕伯格学院发表的政府道德主题演讲；在迈阿密发表的国防主题演讲；在坦帕市发表的拉丁美洲事务主题演讲。这些演讲在竞选报道记者团尽职尽责的打字员之间不断传递着，全国媒体都如实地报道这些演讲。此时，细节和议题无所谓了，只有“风格”显得重要。肯尼迪“风格”在过去几周和团队一样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钟情于美国政治表演的人们而言，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美感。

肯尼迪于10月1日星期六在海恩尼斯港度过了最后一个休息日。从那时到选举日，他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睡眠越来越少（在选战的最后4天，他每晚仅睡4小时），但是他的嗓音变得愈发铿锵有力、抑扬顿挫。选战之初，他担心嗓子撑不过未来几周，在飞机上与工作人员交流时，一度是他们说话，他在黄色便笺上潦草写出回复。现在他可以在飞机上一直不睡觉，连续数小时交谈，这就像长跑运动员重新焕发了精力；随着说话变得抑扬顿挫，他的公关语言愈发优雅。最后甚至记者们也迷上了他的演讲风格，他们虽多次听过他的演讲，但还是愿意洗耳恭听，就像重温自己曾追

捧的大片一样。

最重要的是，民众热情让他热血澎湃，他好像也乐此不疲，他的陶醉状态就像利刃般挑衅着尼克松。现在本应是尼克松向肯尼迪全力发起的劈砍决战，但尼克松好像在笨拙地挥舞着大棒，肯尼迪则使用轻巧细长的长剑不断刺中他的身体。肯尼迪尤其喜欢借用西班牙斗牛竞技场的一个说法“mano a mano”（面对面的较量）。在英语中，它的意思是徒手格斗。他喜欢这种方式。

尼克松在纽约称他为“恬不知耻的骗子”，肯尼迪回应（在新墨西哥）：“两天前，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先生引述我的话说‘共和党一直反对社会保险’，其巧妙的措辞确实体现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他声称这是恬不知耻的谎言。在选战中，我曾4次接近他，看到过他的化妆，我不会指责尼克松先生厚颜无耻，但我认为美国大众在下周二将决定谁没有撒谎。”

在巴里·戈德华特的亚利桑那州（尼克松此时正携手艾森豪威尔、洛克菲勒和洛奇，在东部为挽救纽约的选票最后一搏），肯尼迪得意地笑道：“陪着迪克·尼克松来纽约的只有洛克菲勒州长、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总统，巴里·戈德华特没有来，我认为这很不公平。如果他们能够劝说巴里脱下始终穿着的南方同盟制服……让他来北方，他们可以看到他……”

尼克松先生曾指责民主党将使食品价格上升25%，肯尼迪选择威斯康星州这个农业州来回应上述指责：“尼克松先生前几天到了新泽西州，他因为几次演讲而声名大振。在一次演讲中，他指责我为促进农业收入而提出的建议将使食品价格提高25%。他到拉克罗斯市（La Crosse）时声称我的农业计划对农民毫无意义。他应当注意无论在拉克罗斯市还是新泽西州，无论东部还是西部，言辞都要统一。”

尼克松对他的每次攻击好像成了肯尼迪巧妙躲避的良机，他不断回到中心主题：国家必须行动起来，美国的声望正在下降，共和党难辞其咎。他好像决意将尼克松先生禁锢在量身定制的模子里——在选战中期海恩尼斯港会议上为他精心雕刻的模具。他在伊利诺伊州宣称：“大家都知道，尼克松先生通常表现出一种超脱于任何党派的模糊暧昧形象，因为党派现在无关紧要。但在前几天……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曾把他叫到一边说：‘迪克，必须承认，你是一个共和党人。’后来，尼克松先生面带愧色地走出房间说：‘没错，我是共和党人，我将自豪地全力支持每位共和党候选人。’我始终说我作为民主党人已有14年之久，因为我坚信民主党代表着进步……我不需要巴里·戈德华特这样的人来提醒党派的重要性。”注

在南方，尼克松不断鼓吹这样一个信条：托马斯·杰斐逊的真正衣钵传人是

他而不是民主党的肯尼迪，肯尼迪则引用一位杰斐逊同代人对这位弗吉尼亚伟人的评价予以回击：

“‘他（杰斐逊的同代人说）是一位32岁的谦谦君子，他多才多艺，能够绘制日食、演奏小提琴和表演小步舞。’那现在，”肯尼迪大声问南方观众，“尼克松先生和他有什么共同点呢？”台下观众震耳欲聋地回答：“一点儿也没有。”

到选战后期时，肯尼迪也学会了尼克松掌握的一种技巧——不过在肯尼迪这位新手的调教下，它又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技巧通过观众“是”和“否”的回答来调动他们回应和参与。政治观众参与欲望强，他们喜欢大喊。伟大的演说家无论做什么，都能让观众觉得自己是对方的完美搭档，其角色和他一样。现在肯尼迪开始像尼克松一样抖包袱，但他不仅和观众进行“是”与“否”的互动，而且还增添了笑声魅力。

选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的一些段子变得闻名遐迩，观众期待他的例行表演就像人们热切等待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这样的大牌演员演唱《这些日子里》（*Some of These Days*）一样。他在选战最后几天深受欢迎的节目就是以“尼克松在纽约的日子”为主题发表的荒诞风格演讲。我们知道，在11月2日，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洛克菲勒州长以及副总统候选人亨利·卡伯特·洛奇一起来到纽约，这是共和党高层为本次选战组成的最豪华阵容。肯尼迪首先讽刺尼克松不敢单独巡回宣传，又宣称尼克松只是艾森豪威尔威望庇佑之下的跟屁虫，后来（在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建议下）将艾森豪威尔–洛克菲勒–洛奇–尼克松阵容比作马戏团大象表演。

我曾在11月5日午夜聆听他冒雨向街头观众上演这一片段，他最后说：“各位曾见过马戏团的大象吧。［笑声］它们的脑袋配有象牙、皮糙肉厚、缺乏远见、依赖长时记忆，当它们在马戏场转圈儿时，后面的抓着前面的尾巴。［喝彩］嗯，迪克在1952年和1956年抓着前面的尾巴，但在1960年，是他在竞选，不是总统——……我今晚站在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亨利·杜鲁门曾站过的位置［喝彩］，迪克·尼克松站在麦金莱和塔夫脱曾站过的位置，听听这些候选人吧［笑声］——哈丁［观众发出哼声］、柯立芝［观众发出哼声］、兰登［观众发出哼声］、杜威［观众发出哼声］。他们从哪里找的这样的候选人？［笑声］……”

但肯尼迪获得的回应不仅仅是这些喝彩。

在选战的最后几周，东北部城市的街头和广场迎接肯尼迪的人群突然爆发，这一点始终令人难以置信。群众是政治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最受人

欢迎的。在别的国家，在其他时候乃至今天，群众集会影响政治。在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上空发出怒吼的集会改变了法国历史；在选帝侯大道（Kurfuerstendamm）和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 Tor）集会的群众修改了德国历史；今天在利奥波德维尔市（Leopoldville）的集会、30和40年代在新德里和孟买的集会、35年前在北京的集会，都在强行左右着本来不由他们做出的决策，理性和秩序发生了扭曲。任何群众集会往往掩盖着一种暴力性质，因为人群本身隐藏着野蛮的暴民特质。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人群中蕴含的这种野性是政治的最不安定因素；在法国和德国等成熟国家，他们经验丰富，由于对历史心有余悸，集会和游行在规模、地点以及组织方面都加以严格限制。在美国，允许群众每隔4年定期集会来为选战呐喊助威，传统对他们的约束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方面。4年间，美国大众一直压抑着，他们的政治如同地下的潜流；每当4年换届时，就像西部干涸的沟渠迎来春天，街头上的政治氛围明显浓厚起来。

但是即使不考虑上述4年一度的情绪爆发因素，肯尼迪的群众集会也是引人注目的。令其引人注目的不是数量（肯尼迪于10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百老汇大游行高峰人数可能最多125万人，这一数字赶不上艾森豪尔在选战期间的高峰人数），而是疯狂程度。

有人记得一次肯尼迪集会的情景，还在人群站着时，突然觉得远处传来阵阵压力。这股力量如同一波波的涟漪，源头来自后面，随着力量增强，逐渐成为汹涌向前的波浪，前面的人群被推着顶在木质隔板上，隔板断裂了。警察冲过去加固隔板，使劲向后搡着，波浪开始朝另一个方向涌动。人群有节奏地前后摇摆着，成千上万的人夹在人群中动弹不得，既孤立无援又如痴如醉。人们不断发出呻吟和抱怨声，一位衣着邋遢的妇女好像沙哑着嗓子自言自语：“哦，杰克，我爱你，杰克，我爱你，杰克——杰克，杰克，我爱你。”这位面色粗糙的妇女瞪着眼盯着一个人的肩部上方说：“你是记者吗？你最好把他写得漂亮些，否则小心点儿。”（嗯，她看起来会说到做到。）人们还记得一些制作粗糙的标牌——手写字母的，学龄儿童用蜡笔写的，建筑工人用粉笔写在油布上的，家庭用棍棒举着的[在布朗克斯，“犹太馅饼”之家认为杰克是美味可口的，“百吉饼（犹太硬面包）之家认为大杰克是能力出色的”]，到处喧嚷鼎沸。

人们难忘浩浩荡荡的车队和公路两旁的人群，在一些站点，五彩碎纸像雪花般飘落下来。当敞篷车门打开、肯尼迪从里面出来时，五彩碎纸突然像水箱里的水倾泻而下。人们难忘街道两旁热情挥手的人群，女人们把头巾解下来挥舞着，头发花白的劳工平时羞于公开流露感情，粗糙的面孔写满沧桑，他们突然在肯尼迪经过时伸开双手向他挥舞——在肯尼迪过后的数秒钟内，他们的手一直以罗马式告别姿势伸着，然后缓缓放下。人们忘不

了一些“贪心者”试图冲破警戒线接近或触摸他，一些人抓住他的手以后，为了证明热爱之情，使劲握着肯尼迪的手，直到有一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时候，肯尼迪布满老茧的手肿胀充血了。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热情舞动的人。那些载歌载舞的人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不久就出现了。在喜欢穿白色短袜的年轻女人心中，肯尼迪已从政治家变成了“偶像”。一位南方参议员说，他将“猫王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优点”集于一身。最初，舞动者是十几岁的小姑娘，车队经过时，她们摇摆跳跃，嘴里兴奋地尖叫着：“看到了，看到他了。”随着一天天过去，她们的动作好像更加迷人，更充满摇摆节奏，就像玩偶盒里上下跳动的小人。后来媒体对此进行了评论，舞蹈动作由此变得更具观赏性，中年妇女也加入进来了。当媒体大巴跟踪报道肯尼迪时，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些奇怪景象：穿着浴袍的妇女、身怀六甲的母亲、怀里抱着孩子的妈妈舞动着、穿着黑色长袍的成群修女都摇摆舞动着，所有的人几乎（不完全是）都要跃跃欲跳了；还有跳双人舞的人们——这是些十几岁的青少年。车队经过时，他们面对面、如醉如痴地将手搭在对方肩上，一起上下舞动。在漫长的选战期间，我曾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见过一支最逗人喜爱的舞蹈队，这里一家学校按多数社区欢迎两位候选人的习惯，也组织学生到草坪上观看总统车队。由于组织工作不周密，学校七年级和八年级这些大孩子被安排在了前面，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被安排在后面几步之远的草地上。不出所料，高年级的女孩子跳起来了，后面两排穿着彩色套衫和罩衣的孩子们也跟着原地跳动，就像一个个彩球随着一只无形的手不断跳跃。由于七、八年级的学生挡着，后面的孩子们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仍然蹦蹦跳跳着。

无论对人群的研究有什么价值，我借此谈谈本人对跳舞人群的观察结果：通过测定队伍的行进时间，我发现当车队速度大约为每小时20英里时，候选人能激发最具活力和节奏的舞蹈动作。如果低于这个速度，则不能达到最佳效果；如果超过25英里，车队速度可能过快，则激发不起人们的兴奋劲儿。

舞蹈只是一种反应方式，喧嚣如此，狂热如此，纯粹的数量也是如此。关于肯尼迪竞选反应的所有报道都是真实可信的，错误的是只根据人群反应而得出肯尼迪大获全胜的预测，这一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沉默的选民也会投票。

对集会人群做出评测和估计是政治家和媒体自尼克松在亚特兰大打响选战（或者在底特律凯迪拉克广场开始的肯尼迪选战）到最后结束始终乐此不疲的游戏。对于同一个集会，不友好人士估计人数大约为3万人，友好人士则估计大约为6万人。在纽约举行的同一个集会（假设是尼克松的支持者），民主党领导人估计人数是60万人，而共和党州长纳尔逊·A·洛克菲勒

则可能估计为200万人。但人群数量的多寡最终被证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经过数千英里的漫长行程后，我只能做出这样一个了无新意的观察：没有集会的确不是好兆头（就像肯尼迪在西雅图或者尼克松在皇后县一样，空无一人的黯淡日子几乎预示着一种灾难），但是大型集会无论多少人或多么热情，也根本代表不了什么——肯尼迪在俄亥俄州的集会或者尼克松在佐治亚州的集会都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两人在这两个呼声很高的州均分别败北。

在竞选过程中，一切都像雾里看花。选民的反应深受媒体关注，不过选民对尼克松和肯尼迪的反应有着天壤之别。毫无疑问，尼克松曾组织过大型集会和几场狂热的集会——尤其在亚特兰大、费城和得克萨斯，但尼克松组织的最狂热集会好像总是室内集会，聚集的人们估计主要是党内的忠实信徒。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伊利诺伊州的皮奥瑞亚（Peoria）以及纽约大剧院，共和党可以调动忠诚分子聚在一起，他们的呼喊声堪与民主党的任何集会相媲美。但到了室外，尼克松的支持人群则比支持肯尼迪的人们克制得多。肯尼迪善于激发出人们的热情，这与他的个性有关。尼克松组织集会时，人们显得冷静、专注和忧心。我记得曾在9天内随着两位候选人走过一段相同的旅程，沿线经过俄亥俄州南部、米德尔敦、代顿和哥伦布，其间我也观察了他们在同一地点的表现。通过目测代顿法院广场（Dayton Court House Square）以及哥伦布州议会广场（Columbus State House Plaza）的空间和距离，我认为两位候选人在这些地方召集的人数不相上下（在代顿，肯尼迪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演讲的；尼克松演讲时，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人数相同或许就意味着尼克松存在优势），不过人们对两人的反应有天壤之别。我禁不住和其他记者以及专业民调专家一样，认为肯尼迪在俄亥俄州占有一定优势。我看到尼克松的人群中举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民主党的基督教徒投票支持尊重自由的人”，但我完全可以忽略这个标语，因为这个头脑清醒的人群几乎不会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干扰，即使候选人口吐莲花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俄亥俄州支持尼克松的票数为27.3万张，占选民总数的53.3%，成为选举中的最大冷门。人群对肯尼迪的热情模糊了现实，绝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以及跟随两位候选人的政治记者都有这种误判，但对媒体而言，误判的影响往往更严重。由于误判，媒体报道往往洋溢着肯尼迪的热情以及对全胜结果的预测。由于预测不准确，副总统尼克松及工作人员严肃指出美国媒体往往出于这种富有感染力的热情而存在偏见和做出不准确报道。为此，人们应当停下来研究一下这一批评的声音，它实际反映了美国政治报道的现状。

人们对1960年的选战报道进行回顾时，首先在头脑中必须去掉“媒体”字眼儿，取而代之的是40或50个人的报道团队画面。他们都是业内资深人士，

都以诚实守信和职业使命感而自豪，多数人在报社、杂志或广播系统成功打拼多年之后才赢得了报道选战的资格，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人们必定会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四五十个中年人在凌晨一两点钟疲惫地摇晃着身子下飞机（“我们现在到哪里了？”“他们给我们提供饭食吗？知道吗？”），然后懒洋洋地听到候选人见到接待员时千篇一律问候他们的话，接着挤进大巴前往酒店，行程是半小时（他们一边走一边观赏着当地特色），下车后冲到楼上匆忙安排的新闻中心（“有咖啡和三明治吗？”），然后离开这一楼层，在2—3点钟睡觉，后被酒店职员叫醒（先遣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在早晨6点钟将所有行李放到大厅），下楼和先遣人员、工作人员、其他记者争抢鸡蛋和咖啡，之后匆忙离开倾听早餐会。（第96次听尼克松先生演讲：“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但愿美国总统始终为保护国家免遭突然袭击的工作表示愧疚的日子永不再来。”或者倾听肯尼迪先生的第96次演讲：“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认为它可以更伟大，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可以让国家再次踏上前进之路。”）

接着参加清晨集会，为了离候选人近一些，边和警察交涉，边使劲挤警戒线，然后回到大巴。（“我想他那边有1万人。”“1万人！你疯了吧。如果这边有1万人的话，那么他在纳什维尔有4万人。”“听警察局长说有5000人。”“那家伙是个民主党人，如果换成肯尼迪的话，他会说有两万人。”“好吧，姑且算8000人吧，怎么样？”）再次上了飞机。（“我们去哪里？新泽西吗？”“不，今晚晚些时候去纽瓦克，我们首先要去匹兹堡。”“不，不是匹兹堡。”“嘿，我们一起看看修订的日程表。”）

在飞机上，三明治不是一直供应的；从来没有香烟，如果清早忘买香烟了，那么在半夜前就没机会从竞选活动中抽身买烟了；不过酒是始终供应的（10月前，每个人都是先喝酒再吃午餐）。新闻秘书开始分发已经付印的上午资讯材料（主题包括环保、农民、失业、老龄、卡斯特罗或核裁军），打字员匆忙打印新闻报道，飞机着陆了（“哪里？我们到哪里了？”）。有人去参加集会（第97次演讲：“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但愿美国总统……”，或者另一边的第97次演讲：“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这个国家正准备再次踏上前进之路”），有人回到飞机上，午间集会在购物中心举行（“但愿这种日子永不再来……”“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没时间吃午饭了，飞机上或许有三明治，但下午的跋涉之旅是乘坐公共汽车，上面不供应三明治（飞机上的行李能安全到达酒店吗？）。下个城市的群众疯狂了。（“我敢说至少有5万人。”“你怎么知道多少人，外面很暗，你不可能看清。”“但警察局长说……”）

大家又重新坐上飞机，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谢天谢地，飞机供应晚餐，人们边吃喝、打字边交谈。到达机场时，发表简短演讲（“但愿这种日子……”“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先遣助选人员安排民主党这边

的漂亮女孩儿（或者共和党这边的漂亮女孩儿）为媒体准备好大巴上吃的盒装晚餐——今天的第二顿晚餐。在城里，当地报社慷慨地为来访媒体同行准备了丰盛的冷荤自助佳肴——今天的第三顿晚餐。肯尼迪后来没有发表事先准备好的教育主题演讲，他打算谈谈金门–马祖问题（“看在上帝的份上，西联公司的人在哪里？我要暂停已写好的故事……”）；当候选人在当地电视台参加访谈时，人们可以在酒店休息片刻，或者给妻子打个电话，但行李必须在午夜时放到大厅里，飞机今晚去阿尔伯克基。（“不对！要去盐湖城。”“不是！丹佛。”“不！是明尼阿波利斯。”）

凌晨1点钟，肯尼迪站在飞机的灯光下。当地的几位记者缠住了他，一位中学编辑问什么是与苏联人和平相处的最佳之道，身心疲惫的选战记者没有听清他的回答（“他说的什么？”“你听到了吗？”“谁问的这个问题？”）；当地的一位摄影记者又拦住了候选人，希望再拍一张他和“二战”期间一位鱼雷快艇战友的合影（“又一个人？天哪，肯尼迪的鱼雷快艇战友足够配备一艘战舰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或者与戴着羽毛头饰的印第安人合影（“这是一位苏族注印第安人，这是当地记者说的。”“不，这是一位温纳贝戈族注印第安人，你看不出来吗？”“嘿，有人给我说尼克松本人有印第安人血统。”“不可能。你疯了”）；候选人转身走向登机梯，当地电台把一个麦克风伸到他面前（“就是一个录音，花不了一分钟”），候选人讲话：“我们思考一个首要问题——没有妥协的和平。但愿这种日子……永不再来……‘或者’这个州的作用不可小觑。这是一个重要选举。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早晨1点30分上了飞机，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不过心里还牵挂着行李以及如何撰写今日新闻和相关内容。

交谈是重要的。跟随候选人的记者团之间的交谈不仅仅是闲聊，闲聊只是表面形式，它是一种共识——是记者之间就各种意见做出的疲惫且包含情绪的评估。在连续数周的报道行程中，这些人结成了只有他们才能体会的兄弟情义，对兄弟情义的判断使个人丧失了对偏见的警惕，使个人不再忠于事实，从而影响并改变了他们写的内容。被安排报道总统竞选的人通常是美国新闻界的翘楚——资历深厚且经验丰富，有些人学识渊博、聪明睿智，每个人都充满尊严和自我价值感。然而在连续数周和数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像流浪汉一样——担惊受怕，匆匆忙忙，在警戒线旁边与警察斗智斗勇，连续数天不能洗澡、肮脏不堪，像学生一样蜂拥挤汽车。在两个不断轮换的总部，记者们享受的待遇和管理是差别不大的——相同的即时电报和电话通信系统，差不多的盒装午餐，一样的行李–洗衣房–饮食酒店安排方案，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后勤照顾杜绝不了新闻报道的混乱现状，解决不了喷气机航班在1960年竞选期间暴露的荒唐质量问题，也保护不了记者们简单的个人尊严——环境无情地将最后的一点儿尊严完全剥夺，他们既像码头工人，又像哲学达人。

我认为，在媒体报道1960年选战的过程中，尼克松先生及工作人员严重伤害了记者的尊严感（这些人的职业自豪感），这种情况不是意外而是故意为之。尼克松先生及其新闻小组认为记者们的兄弟情义不是友谊而是阴谋，是一种充满敌意的阴谋；他好像始终认为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扮演着一种令人不安和不快的角色——盲流无赖。

其实早在尼克松先生获得提名之前，媒体就被确定为一种阴谋势力。他的一位助手曾在6月对我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家伙真是吃饱了撑的，他们都与迪克作对。让他们闹去吧，我们不会分发准备好的发言材料，他们带着铅笔边听边记吧。"他们不仅向我，还向许多同行表达了同样观点。选战之初实施的一项惩罚性政策就体现了这一观点。根据这一政策，副总统演讲的副本将不发给跟踪报道的媒体；只是到了选战后期，肯尼迪的即时副本显现出效果了，尼克松团队才不得不向筋疲力尽的记者提供同样的帮助。

媒体和尼克松竞选团队之间的敌意也不只是出于这种无伤大雅的轻视。随行报道尼克松的记者虽然多数倾向于民主党，但他们出于职业习惯还是渴望尽量详细、生动且客观地报道他的情况。不过他始终超然离群，其性格乖僻无常，有时允许记者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其他时候则拒人于千里之外（肯尼迪宁愿把副驾赶下飞机，也不会拒绝不断轮换的记者代表三人小组乘坐其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尼克松总是把想法、计划和意愿深压在心里，自己认为（直至选战末期）可以绕过记者借助电视让美国人民了解他，或者通过媒体所有者——发行商争取媒体支持。（尼克松的确赢得了78%报纸的社评支持，这些报纸的发行商在1960年如果选边支持某个候选人，对于他们所属的杂志而言，社评也往往支持这个人。）尼克松先生究竟有什么想法，希望阐述什么观点，他不想费神与记者交流。实际上，这些人才是他的扬声器。

尼克松对媒体的不信任也扭曲了新闻小组对于媒体的态度。新闻秘书——圣地亚哥赫伯特·克莱因本来是位诚实和善的人，如今也表现得躲躲闪闪、讳莫若深、了无趣味和沉默寡言。和媒体交流时，他好像也怀着深深怀疑的态度。向克莱因打探消息的难度甚至超过了向约翰·F·肯尼迪打探信息。和他人差不多，克莱因负责处理有关尼克松的负面报道。若想了解尼克松的内心世界，人们需要联系芬奇（此人可以提供有关副总统的几乎所有正面信息）或者能力卓越的策划总监——詹姆斯·巴塞特（时任洛杉矶《镜报》的助理执行编辑）。令人遗憾的是，他在竞选期间留在了华盛顿。选战之初，跟随尼克松先生的记者可能被分成了两派——友好派和敌对派；选战临近结束时，他成功地使多数人加入他最初担心的阵营——敌对派。

从跟踪报道尼克松的竞选再到肯尼迪的竞选，记者们承受的压力和强度是相差无几的，但角色的转变好像很明显——从讨人嫌和流浪汉成为朋友和

战友。

人们从肯尼迪一方可以体会到对记者截然不同的态度，肯尼迪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一点。肯尼迪当过记者，喜欢文字和阅读，曾荣获普利策奖。他欣赏文风清新干净的文字工作者。他喜欢记者，也愿意由和他们打成一片。甚至在竞选期间，肯尼迪还抽空阅读新闻，如果喜欢某个段落，就告诉相关的记者或专栏作者，然后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引述其中的词句。在选战初期，他有时玩一种轻松把戏，他最喜欢哈特福德市达文波特（Davenport）上校的故事以及这位上校在起草“康涅狄格宪法”（Connecticut Constitution）时的角色。由于多次讲述这个故事，他知道记者们可能听得心不在焉了，于是有时把达文波特上校换成一位记者的名字，比如换成布拉德利（Bradlee）上校，然后挺直脖子观察记者们是否察觉到这个变化。他经常向记者征询意见——虽然很少采纳，但仍表示赞赏。最重要的是，无论登机、乘机还是在路边喝可乐，他都愿意快速交流意见，与挤在周围的记者聊天。举例说，如果别人给了他一盒苹果，他可能以下手投球的方式扔给记者一个苹果，看看这个人是否有所准备。他经常向记者借梳子和铅笔，有时在就餐计划紊乱时还要别人的巧克力棒（在初选早期）。

肯尼迪的态度对工作人员也具有重要影响。他的顾问乘坐记者团大巴时，常常会透露大量信息；遇到新加入或再次加入报道团的记者时，皮埃尔·塞林杰、唐威尔逊[注]和安德鲁·哈彻[注]等人显得非常高兴，好像他们正恭候他的到来，然后低声向这位记者透露一点儿重要信息或者特定报刊亟须的一些趣闻逸事。他们尊重媒体，努力和媒体打成一片，其中有人还积极地撰写新闻稿并且要求署名。

由于对媒体秉持友善、尊重和培养的原则，毋庸置疑，这种态度积极影响了记者团对肯尼迪选战的报道。与之相比，记者们对尼克松一方的报道则形成了强烈反差。在选战后期，自竞选开始到11月，有四五十个记者一直跟踪报道肯尼迪。到选战后期的时候，他们不仅是记者，而且和肯尼迪结成了朋友，一些人甚至成为肯尼迪的忠实粉丝。当大巴或飞机在茫茫夜色中前行时，他们和肯尼迪的成员一唱一和地演唱着他们以尼克松先生和共和党为主题创作的歌曲，此时感觉他们也像上帝率领的战士一样向新边疆奋勇进发。

11月6日星期日上午12点30分，约翰·F·肯尼迪回到新英格兰为竞选活动最后一搏。[注]

多年来，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一直期待着这一天——4年前，是他（以及里比科夫州长）首次提名肯尼迪竞选国家要职；整整一年，贝利作为肯尼迪的助手一直马不停蹄地与每个州的政治掮客交涉，争夺、劝诱、游说肯尼迪必须得到的支持。他和里比科夫向肯尼迪保证他们的州——康涅狄格州将万无一失，但他们也要求一天的“表现”时间。

现在是午夜过后，天上下着雨，他们的一天在布里奇波特机场开始了。中学乐队吹着铜管乐器、敲着鼓，乐声在夜色中格外嘹亮，乐队指挥在弧光灯下挥舞着指挥棒。从机场到肯尼迪希望当晚下榻的沃特伯里（Waterbury）仅有27英里，但是乘车走完这27英里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贝利及其团队和这里的每个孩子、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位祖父母都是坦诚相待的同盟，他们不顾阴雨天气仍然前来迎接凯旋的英雄。上了诺格塔克山谷（Naugatuck Valley）的老8号公路之后，他们一路前行——经过谢尔顿（Shelton）、德比（Derby）、安索尼亚（Ansonia）、西摩（Seymour）、比肯福尔斯（Beacon Falls）、诺格塔克、友联市（Union City）以及曾孕育美国技术的所有工匠村庄。在每个路口，在午夜以及凌晨1点钟、2点钟，人们举着手电和红色信号等待着，嘴里欢呼着：“我们爱你，杰克。”在沿线每个消防队的外面，贝利的人让消防车整齐排成一行，红色信号灯和红色闪光灯在夜幕中不断闪烁旋转着表示敬意。桥梁和高架路下面悬挂着标牌、海报和标语。每到一处，他都要停下发表演讲。（“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选举。康涅狄格州是重中之重。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应该变得更伟大。这个国家必须再次踏上征程。”）回到大巴时，记者和工作人员的状态各自不同，有的累得什么也不管了，有的睡着了，有的在唱歌，每个人都等着前往酒店。

他在清晨3点钟到达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罗杰史密斯酒店（Roger Smith Hotel）时，3万人在酒店前面历史悠久的新英格兰绿地正等着助威加油。现在是3点钟，他很疲劳，但人们对他望眼欲穿。于是他爬到酒店阳台上，聚光灯从下面打到身上。他站在高处阳台上，开始对着人头攒动的草地演讲：

> 我是肯尼迪，我来这里是恳请各位的大力支持。［欢呼］
>
> 回想1956年，当时我是副总统提名候选人。承蒙你们州长阁下的大力推荐，我位列提名名单，4年之前我首先得到康涅狄格州的鼎力支持。［欢呼］全美支持本人进行总统竞选的第一位政府官员是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州长……
>
> 这场竞选之战实际上一直围绕一个问题针锋相对，我认为这个问题极大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福祉。尼克松先生选择参加1960年的竞选之战，

他对美国的人民说：我们国家的繁荣已经无以复加了，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辉煌，我们的国际威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哼声］我作为总统候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它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欢呼］我希望看到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在这个国家创建一个繁荣富强、生机勃勃且文明进步的社会，这个社会亦将为那些希望遵循美国前进道路的人带来启迪。［欢呼］

在美国大革命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美国的事业就是人类的事业。在1960年，所有人类的事业就是美国的事业。［欢呼］我们捍卫自由。如果我们这里成功，自由的事业将进一步壮大。如果我们这里失败，如果我们放任自流，如果我们故步自封，如果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不能做出自由力量之榜样，那么我们不仅背叛了自己和命运，也背叛了渴望自由但尚未自由的人们。

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6年接受第二届总统提名时说："政府可能犯错，总统也难免犯错，但是不朽的但丁告诉我们'神圣正义'（Divine Justice）对冷血之过和热诚之过的评判是有天壤之别的。彰显博爱仁厚精神的政府即使偶犯错误，一定胜过疏漏不断、冷漠平庸的政府。"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政府。［欢呼］

他说现在已过3点钟了，他们必须睡觉了。他说早就答应他们的市长要在3点钟之前把他们打发回家，人们不情愿地说："不行，杰克，不行，杰克。"他让康涅狄格州州长讲了几分钟，但他们要求他回来；人群上方阳台鲜亮雪白的灯光照在身上显出清晰的轮廓，他再次演讲：

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下林肯在100多年前一场类似竞选活动中写的一封信，当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我知道有个上帝，我知道他憎恶不公正。我看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我知道他干预其中。但若他让我肩负责任，我相信我已万事皆备。"现在100年过去了，问题依然是要自由还是奴隶制。我们知道有个上帝，我们知道他憎恶不公正，我们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知道他干预其中。但若他让我肩负责任，我相信我们已万事皆备。谢谢各位。

他们欢呼着，在草地上流连忘返，高声喊他回来，一直延续到差不多早晨4点，但他必须休息了，因为现在离选举日和总统职位仅剩下48小时了，他必须休息3个小时。

接下来的48小时是一片光怪陆离的模糊记忆，想起来有喧嚣吵闹、多姿多

彩、结束与启程，还有骚动混乱，它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融合——新英格兰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汇之地。

肯尼迪和几位记者曾对着美国的苍茫大地静默幽思。我问在选战期间走遍了美国大地之后，他认为哪里最美丽迷人。他略作思考，然后像多数美国人一样，也是选择家乡——新英格兰的连绵山脉。他觉得当秋天的树叶色彩交替宛如交响曲奏鸣，正是美国大好河山最瑰丽的景致。不过在选举前的最后两天，他回到了新英格兰，这时万彩竞放的高潮已过去两周时间了。当他在山上漫步穿行时(注)，树叶洗尽铅华，呈现出肃杀的冬日灰色，只有红枫圆圆的扇形叶子依然迎着料峭寒意傲娇地展示迷人的红衣。透过山上树枝灰色的网格条纹，人们可以分辨次生林和三次生长林，亦可分辨出（在雪中和夏季绿色中不能分辨）一代代的新英格兰人曾在哪里垦荒种田以及何时离开。新英格兰的土地今天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如过去一个世纪的水平了。

我们抚首回顾美国历史，时序交叉重叠令人五味杂陈，每个人变得心绪沉重。在新英格兰沃特伯里–斯普林–托灵顿——哈特福德这片方形区域内，曾经历人类历史上重要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和雅典的最辉煌时代类似。在这片不大的方形区域，125年前，一群才华勃发的美国人孕育出美国乃至现代世界的科技，这里首先破解了机床、精密机械、通用零件、规模化生产、合金和容差的神奇奥秘。这些技术在美国强大的工业领域广泛普及，随后传遍欧洲和俄国。这些体现美国强大工业实力的技术——托灵顿的轴承、斯普林菲尔德的来复枪、沃特伯里的钟表和黄铜制品、萨姆·柯尔特（Sam Colt）的手枪和第一款机关枪、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及其通用零件均诞生于新英格兰群山中的这块弹丸之地。然而技术进步也带来了令人不解的后果，鹅卵石街道的居民现在迎来了一些身材矮小的男人和包裹头巾的女人。为适应日新月异的美国，一些新英格兰城镇不断努力调整技术，红砖砌成的古老工厂宣称（字体已经褪色）既制造枪支（字体新鲜）也生产郊区居民使用的剪草机。一些城镇完全荒芜了，黄褐色、灰色和红色交杂的秋叶在数英寸深的檐槽里沙沙作响，工厂一片死寂，田地已经弃耕。其他城镇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走过哈特福德普惠公司（Hartford’s Pratt & Whitney）的大型喷气发动机制造厂，一想到古老的新英格兰生产的喷气发动机现在使人类飞行速度超出想象，就禁不住激动万分。经过新英格兰每个较大城市外围悄然转动的雷达蛛网状碟形装置时，你意识到它们是保护美国遭遇侵袭的忠诚卫士，知道它们是来自新英格兰新兴电子工业和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RADLAB）的神奇技术，同时对未来也心存忧虑。

刺耳的喧嚣声持续不断，尖叫声、喊叫声、舞蹈声和纯粹的狂欢声令人难受发狂。每个人都变得烦躁不安，即使平时友好和善的塞林杰也开始对着

记者龇牙咧嘴、大喊大叫了。像他一样，记者们也好几天没沾床边了。甚至拉里·奥布赖恩（参加了新英格兰校友返校日演出活动）现在也第一次失态了。为了确保康涅狄格州的政党机器在投票日运转正常，约翰·贝利留在了康涅狄格州。受各大报社派遣连着数月随行报道肯尼迪的大牌记者们开始悄悄溜走了——前往底特律、芝加哥、新英格兰、其家乡城市，他们希望好好地睡一晚上，恢复平静，结束流浪状态，准备在选举之夜就本次选举的意义为自家报纸撰写头版新闻。有人在嘈杂声中挥手告别了同伴，有人随着摇摇晃晃的大篷车继续前进。

我们回到迷人的波士顿，这里是肯尼迪的家乡，也是他的出生地，当年其父母是首批来到布鲁克莱恩（Brookline）聚居区的爱尔兰人。他们到来了，清教徒搬走了，犹太人随后搬来了。有人在选举前稍晚回到波士顿时，发现肯尼迪已疲惫不堪了。

到了波士顿，过去和现在令他百感交集。疲惫的候选人到达波士顿时，首先看到机场上欢呼的人群；他之前还希望下榻在波士顿的一家斯塔特勒酒店（Statler Hotel），但队伍走不动了，车队从机场到酒店像蚂蚁一样慢慢行进着，沿途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他们对这位老乡充满了赤诚之爱，最后还没有到酒店，去波士顿花园的时间就到了。

于是车队沿着波士顿华盛顿街狭窄的小巷在人群中踽踽前行，每个人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要晚于预定计划了，候选人必须在11点到古老的法纳尔大厅（Faneuil Hall）通过全国电视网发表全国讲话。这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后面还有其他人慢慢前行。他们经过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地标性建筑，首先是古来的马萨诸塞州州议会大厦，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曾在这里就民主代议政制进行辩论，然后将这些观点写入美国宪法；他们和弗吉尼亚人一起制定了约翰·F·肯尼迪希望赢得总统职位时应当遵循的游戏规则。接着是一块大理石碑，这里是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的纪念地。除此之外，若要记述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次屠杀的话，人们在1960年的此刻还应知道，这是一场“集体”屠杀——英国步兵在1770年残忍杀害了5位波士顿人，其中包括4位波士顿白人，一位名叫克里斯珀斯·阿提库斯（Crispus Atticus）的波士顿黑人。车队沿着华盛顿街的狭窄巷子缓慢行进，街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他们不愿意让路，不断拍打着汽车两侧，向候选人伸手尖叫。此时男女毫无两样，都喊着：“我爱你，杰克。”车队来到古老的北区，这里在“1775年4月18日”为了向当地居民发出英军即将来袭的信号，保罗·列维尔夜间骑行悬挂灯笼（“一支灯笼表示陆上，两支灯笼表示海上”）。我们现在进入作为摔跤手、拳击手和曲棍球运动员谋生之地的波士顿花园，肯尼迪将在此发表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次演讲。

这次在竞技场里的演讲效果有些差强人意。肯尼迪在台上演讲时，周围是一群大腹便便、面色红润、神情咄咄逼人的政坛人物，他们在马萨诸塞州政界已摸爬滚打了多年，这位总统候选人此时已精力不济了。共和党对手尼克松最后也体力透支了，他当晚是在芝加哥，即将独自回家（前往洛杉矶）。肯尼迪还没开口，现场的人们就欢呼起来了，声音几乎震耳欲聋，最后由于声音嘈杂，当地的政客不再对他做介绍了，只是无奈地轻轻翻了一下手，示意肯尼迪开始讲话。他在选举前夕具体说的什么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的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之一理查德·多纳休说的话，他在倾听肯尼迪演讲时示意我注意当地政客们羡慕的表情，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演讲。“你知道，”多纳休说，“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他们认为他一定有什么窍门。他们洗耳恭听，是希望学会其中的门道，这样他们也可以竞选总统了。”

肯尼迪的演讲很快就结束了，他随后要前往顶部装饰着金色风标（由保罗·列维尔精心制作）的法纳尔大厅。他首先听取电视顾问5分钟的简短介绍，换了一件衬衫，然后进入大厅。190年前，自由之子[注]曾在这里召集策划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肯尼迪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观众谈起了过去和未来（其当晚的纳尔逊收视率为17.7）。电视讲话结束后，他回到斯塔特勒酒店，抓紧睡了几个小时，等候妻子，最终从选战中脱身。

人们还记得在新英格兰的最后一天，各地不断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从普罗维登斯、斯普林菲尔德（那里下了第一场雪）、哈特福尔德、伯灵顿、曼彻斯特到波士顿。直到午夜时分，到处还人声鼎沸、群情振奋。此刻，当肯尼迪在斯塔特勒酒店14层上床睡觉时，室内一片寂静。他可能成为下一位新总统。

明天是星期二，也是选举日。

---

1. 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58年领导建立刚果民族运动党，任主席。他参加并领导了1959年1月爆发的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被捕入狱。1960年6月刚果宣布独立后，他任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译者注

2. 加丹加省（Katanga），刚果民主共和国沙巴（Shaba）省的旧称。——译者注

3. 跟踪报道肯尼迪战队的记者通过随行的西部联盟电报公司服务人员发

送的普通新闻简报在最后一周从原来的平均每天6万字增加到每天9万字。

4. 肯尼迪提到的这次演讲是10月15日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发表的，地点是韦斯特瓦德–豪酒店（Westward-Ho Hotel）的雷鸟会议室。尼克松先生刚刚与戈德华特参议员进行了会晤，后者认为尼克松竞选时过于软弱，没有表现出一个优秀党员的素质。戈德华特几天前曾说如果尼克松在1960年败选，他戈德华特将竞争1964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种说法对尼克松先生的信心没有多大的激励作用。戈德华特个性强势，他称肯尼迪为“谦谦君子”，肯尼迪也对其甚为尊重。直到那时，尼克松先生在竞选中一直呼吁选民忘掉党派标签，投票看人不看党派。现在由于戈德华特的强大压力，他以典型的散文风格（逐字逐句地）说：

正如巴里所说，你们是政党发展的动力之源；当我们进来时，他就告诉我……

……每次有机会，我都希望站到一群主要的党务工作者面前，由于情况不同，他们可能是选区工作人员、主席或者官员……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就总统选举及结果而言，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在全国范围内赢得我们一直期待的这场选举，而且要选举出更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在选举之后还要壮大共和党力量，将其发展成我们知道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就的理想政党，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知道，我谨此向各位保证每当有机会时，我都愿意像这样和各位交流，因为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政党——全国各地的共和党。我们必须在各地加强政党。

……1958年时，我曾巡回全国各地。我向各位保证这个差事很不容易，因为当选情对你不利时，由于党组织瘫痪而需要你挨州巡访时，当你巡访各州但知道失败难免但依然必须坚强挺住和全力支持候选人、党组织时，尤其当本人不是候选人时，毋庸置疑，这并非易事。但我认为对于本党全国推选的官员而言，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份责任，那就是我们要竭尽所能帮助政党摆脱困难，无论身处困境还是逆境，都要如此。

……坦率地讲，当我不再为所属政党以及携手竞选的候选人感到自豪时，我理所当然地要脱离政党。因此我只能说，既然毫无此意，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州乃至整个国家的每个共和党候选人，我也以此为傲。我们需要培养一种精神、你们在本州业已拥有的一种精神、其他州也能培养的一种精神、必将重塑我们力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正王者归来。

5. 苏族（Sioux），美国原住民，很多居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译者注

6. 温纳贝戈族（Winnebago），居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东部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北美印第安人。——译者注

7. 唐威尔逊（Don Wilson），后任肯尼迪政府的新闻署副署长。

8. 安德鲁·哈彻（Andrew Hatcher），后任肯尼迪总统的助理新闻秘书。

9. 在选战的最后一周，肯尼迪的平均睡眠时间为4个小时，日程安排如下：星期日，费城市郊；星期一，再到费城市郊；星期二，洛杉矶；星期三，旧金山和旧金山湾区；星期四，凤凰城、阿尔伯克基、阿马里洛（Amarillo）、威奇托福尔斯（Wichita Falls）、俄克拉何马城；星期五，弗吉尼亚、俄亥俄、芝加哥；星期六，纽约及其郊区。

10. 在肯尼迪选战的最后星期日和星期一，他除了乘飞机到长岛和新泽西州北部贫民区参加了4个小时的集会，其余时间都是在新英格兰度过的。精确地说，日程安排历时48小时：沃特伯里、沃灵福德（Wallingford）、纽黑文市、布里奇波特、沙福克县（Suffolk County）、蒂内克市（Teaneck）、泽西城（Jersey City）、纽瓦克市（Newark）、刘易斯顿（Lewiston，缅因州）、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斯普林菲尔德（马萨诸塞州）、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伯灵顿（佛蒙特州）、曼彻斯特（新罕布什尔州）以及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11. 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美国革命期间反抗英国统治的秘密民间组织。——译者注

第14章

以总统身份醒来

没有什么仪式比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更盛大。然而，就职是一个国家的仪式，是权力外在的荣光。总统的权力虽然独一无二，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更加引人瞩目、不同寻常的是权力更替的方法——自由的人民，以不记名的方式，一票一票，自由选择一个国家领导人。

美国人民做出一个好或坏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美国人民，也关系到人类的命运。但是，不管选择好坏，投票结束后，在任何整点，全国的钟声都没有响起，也没有穿紫袍的神父等着给这位即将成为自由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加冕。投票结束，权力在那个晚上悄无声息地转移，全国民众也在安静守候。一旦成败双方达成共识，胜者将在喧嚣和混乱中接受这一结果，就如他在喧闹的旋涡中一路竞选那样。他仍然是一半普通人、一半总统的身份，他还没有和帮他成就大业的伙伴们隔开，也没有和受他吸引而聚拢、在过去几个月与他接触的人群分开。1960年11月8日和9日的晚上没有任何仪式。

选举夜4点[注]，肯尼迪叫醒妻子，告诉她一切似乎都没问题，然后就去睡觉了。但其实他也不知道会不会顺利。草坪对面，博比·肯尼迪住所控制室里的竞选运作团队简单收拾了行李，都鱼贯进入等着送他们去酒店的巴士。他们也得休息，这一队人马从去年开始就在这所房子里一路陪伴着他，有肯尼思·奥唐奈夫妇、拉里·奥布赖恩夫妇、迪克·多纳休夫妇、卢·哈里斯和其他几个人。在被载往酒店的途中，他们一言不发，面色铁青、忧郁，半阴沉着脸。只剩下博比·肯尼迪独自待在空荡荡的指挥室，直到破晓。（“我们有太多事情要担心了，肯定会有事情扰乱我们的。”几个小时后，当被问到如何度过那个观望时期的黎明，还有他是否担心的时候，博比这样说道。）肯尼迪离开他的弟弟去睡觉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情况仍然不明朗，尽管博比·肯尼迪已经不可能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他还是一直在打电话，核对全国的状况。（指挥部仅选举夜的长途电话费估计就达到了1万美元。）

现在已经入夜，只有博比还没睡，权力正在转移，但无法精确到某一刻某一分。

在大陆的另一端，加州，理查德·尼克松已经睡了，他的总指挥漫不经心地等待着结果。他们觉得结果似乎已见分晓，就像等待缓刑执行一样，他们在等两个州的结果——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早在共和党候选人醒来前（太平洋沿岸时间早上6点30分，美东时间早上9点30分），宾州的休·斯科特就首先通知了他们，肯尼迪在宾州的领先优势太强大，农民和郊区的选票带来的选情上扬也不可能逆转局势；接着，来自密歇根州的一个电话报告说，共和党在密歇根州最乐观的判断就是，不管这个汽车州（6.7万张选票）的差距多么微小，那也是肯尼迪领先。所以不管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情如何，现在理查德·尼克松都不可能当选。

实际上，正是密歇根州的结果预示着权力从一个党派转移到另一个党派。整个晚上，特勤局局长乌尔巴努斯·E·鲍曼（Urbanus E. Baughman）都在他华盛顿的家里坐着，盯着电视屏幕。他是一个瘦削、头发灰白、说话缓慢的人，并没有比普通公民更灵通的消息渠道，却肩负着法律规定的重要责任，一旦新总统出炉，他就要立刻守卫和保护美国候任总统。两条长途电话线分别连接到洛杉矶和海恩尼斯港，两组（各16人）特勤人员在两地的中心等待命令，出动去保护总统——或者不出动。伯勒尔·彼得森（Burrell Peterson）组长在海恩尼斯港的希思假日酒店看电视，凌晨2点35分，当他看到电视上播出肯尼迪得到261张选举人票的时候，急不可耐地准备行动。鲍曼局长在电话里指示他继续等，肯尼迪还差8票。4点15分，肯尼迪获得265票，还差4票。彼得森再次给局长打电话，得到的指示还是继续等。5点35分，身在华盛顿的鲍曼局长看到电视上播出密歇根州的20票归于肯尼迪，肯尼迪暂时获得285票，初步获得了多数票。现在还继续观望或怀疑就太迟了，因为责任已经明确，5点45分，鲍曼给彼得森打电话，指示他立刻出动，保护候任总统。16名特工在夜色中乘着借来的车出发前往海滩边的院子，那时，肯尼迪和他的工作人员还在睡觉。早上7点，安保工作就绪，候任总统已经被保护起来，在接下来的4年或8年，总统都会与民众和普通人隔离。这些行动安静而高效，令肯尼迪的员工惊叹，记忆犹新。早上，肯尼迪每个参谋团成员抵达的时候，特勤局特工都能认出他们的脸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职能、重要性和责任。他们已经做了一切必要的功课来保护美国总统，把总统的工作人员和陌生人区分开。

索伦森第一个抵达。9点30分，他获邀上楼到肯尼迪在二楼的卧室，看到候任总统穿着白色睡衣坐在床上。索伦森告诉总统，加州已经是囊中之物，他，约翰·F·肯尼迪现在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了。几分钟后，皮埃尔·塞林杰带着同样的消息抵达。3个人一起花了几分钟讨论大选最新的结果速报和报告，没有太多的激动。虽然3人都坚信肯尼迪已经赢了，但是现在就宣布胜选为时尚早。候任总统决定要等理查德·M·尼克松在加州承认败选。这两人离开后，肯尼迪闲散地走到窗边。那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新英格兰天气，他看到草坪上集结了一堆摄像师和摄影记者。他朝他们挥手，微

笑，然后离开窗边。他刮了胡子（用刮胡刀），穿衣，然后下楼和妻子孩子一起吃早餐，早餐和平常一样。

10点钟刚过，他吃完早餐出来，风吹日晒过后的样子。他微笑着，看起来比6个月前疲惫，但是已经从过去24小时的筋疲力尽中恢复过来了。他牵着女儿卡罗琳，然后拗不过女儿的哀求，驮了她几分钟，邀请他的弟弟爱德华一起到海滩边散步。这时候，其他几位肯尼迪家族的人和特德·索伦森也出现了。他们穿过长草的峭壁和土丘来到沙滩上，后面跟着小心翼翼的特勤局人员。他们一直散步，差不多11点才回到博比·肯尼迪的住所。在那里，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erty）已经从华盛顿通知了塞林杰，德怀特·W·艾森豪威尔的贺信稍后就到，尼克松也会马上承认败选。所有人都坐到电视机前，当尼克松的新闻发言人赫伯特·克莱因出现在屏幕上时，一片寂静降临。有片刻工夫，新任总统在嘲笑塞林杰，对比他和克莱因在电视上的形象。之后，所有人一言不发。有人清了清喉咙似乎想要说话，候任总统厉声说道：“我想听听他说什么。”然后身体前倾。当克莱因说完的时候，竞选彻底结束，新总统说：“好了，我们走吧。”

接着是大约一小时的忙乱。“杰姬在哪里？”候任总统从扶手椅站起来问道。她正在沙滩上一个人散步，候任总统亲自去接她，找到她之后就把她带回来了。她穿着褪色的雨衣和平底沙滩鞋，头上包着围巾。现在所有人都必须盛装打扮，所有人都要到他父亲的起居室拍照，所有人都要准备乘车前往海恩尼斯军械库，媒体和电视台在那里等候。车队已经在约瑟夫·P·肯尼迪的屋外列队完毕，准备出发。总统突然从车上冲下来，似乎回想起什么，像被一股力量驱使着再次跑进屋子。他决定不再听从父亲一年来默默躲在背后的坚持，在这样一个胜利的时刻，他的父亲必须与他在一起，参加这场公开的仪式。他在等父亲穿衣服，车队在等他，摄像机和整个国家在等他们所有人。总统在草地上发现一个足球，就和其中一个父亲的宾客来回踢球。

终于，他们整装待发。48小时前，竞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样的车队会被视为一个灾难——街边没有多少人注视他经过，直到车队抵达军械库的时候，才听见人声鼎沸，一大群人在那里欢迎他。这些人群并不是问题，特勤局就是用来保护总统的——他们在前方开路，大步慢跑，训练有素地沿着白色林肯大陆型车以楔形散开，清除前方道路障碍。在军械库，所有人都站在通往讲台的路边——索伦森、奥唐奈、奥布赖恩、塞林杰、赖恩施、戴维·鲍尔斯、多纳休、邓根、古德温、费尔德曼和其他人。有一两个离肯尼迪登台最近的人坚持说，他的眼里溢出了泪水，说他上台前和这些襄助人士握手时说不出话来，但这些可能都是想象。当他最终站在麦克风前，面对媒体、面对全国讲话时，他很镇定，声音没有发抖，只有拿着黄

色电报纸和白色应答稿的手在摇晃发抖，但这些都没有被镜头拍到。他读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贺信，以及他对此的回应，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就走出军械库，但他走到门口却花了5分钟，因为他一路和跟随的记者握手。他停下来对每个能看见的人单独说了几句话。

接下来是午餐，在他父亲的房子里享用，所有家族成员都在，还有索伦森和沃尔顿。他们在讨论大选的结果，夸耀谁在哪个州表现最出色，嘲弄那些失利州的负责人，整个午餐充满欢声笑语。

下午，肯尼迪家人和朋友到草坪上玩触身式橄榄球。比赛到一半的时候，总统自己也跑到草坪上加入他们。总统担任其中一个队的四分卫，博比·肯尼迪担任另一个队的四分卫，特勤局人员从土丘草坪上注视着他们。一会儿，总统的妹妹尖叫着并用手乱抓，一会儿他们互相撞到彼此，一会儿队员纠缠在一起跌倒在地，美国总统（他们宣誓要保卫的人）站起来又和他们一起倒下。这样的时候，特勤局人员的脸上都会露出惊恐的表情。比赛在5点前结束（博比队以一个触底得分赢了），总统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那天晚上，他和艺术家沃尔顿以及本杰明·布拉德利夫妇（Mr. and Mrs. Benjamin Bradlee）一起吃晚餐，这些都是老朋友了。席间，他们谈论政治和性格，其中包括J·埃德加·胡佛和艾伦·W·杜勒斯。[注]他们还小心谨慎地讨论了赫鲁晓夫发来的第一封贺信。这时，约瑟夫·P·肯尼迪过来邀请他们一起去他屋里看电影。第一部电影是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动作片，没有人爱看，所以他们中断了这部电影，开始看另外一部——《青楼艳妓》（*Butterfield 8*）。总统只待了几分钟，电影荧幕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溜出了房间，没让任何人跟着，也没有人主动提出跟着他。

此刻，对他来说，独处很重要。他一路奔跑，神采奕奕。肯尼迪赢得大选的得票差距非常小，看起来好像是一场计票的意外出错。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而数字的组成和结构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这一年，他就像在一个暗流涌动的房间里运作，你能感觉到这些力量的存在，却没有光线可以让你辨认这些力量，直到选举日来临的那天。大选计票器就像一台在强光下拍摄的高速频闪相机，让所有动态静止下来，精准地抓拍到某一刻的画面。这个画面集合了美国所有团体的情绪、愿望、过去和未来。

我们可以看看1960年11月8日的投票画面，因为肯尼迪从中看到的信息，将决定美国政治和历史的走向。

接下来的几十年，人们都会探究1960年的数据，但是会投入多少精力和心思呢？像研究1860年的数据那样吗？那一年终结了美国历史的一个时代。

还是像研究1932年的数据那样？那一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次的投票是会迎来一个时代，还是告别一个时代，就要看肯尼迪总统如何行动了。无论史学家怎么解读这次投票，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必须先看看下面这份数据概要。

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11月8日当选为总统。他拿下了23个州的303张选举人票，而理查德·M·尼克松拿下了26个州的219张选举人票。密西西比州的8名独立选举人和另外7名来自南方的选举人（俄克拉何马州和亚拉巴马州）把票投给了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F·伯德。不过，选举人票上的明显差距，不能归功于赢家，而应该归功于撰写宪法的先贤们的智慧。他们深谋远虑，设计了选举人制度，既能保留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又能避免这场选择演变成暴力，因为刻板地清点人数通常会有暴力事件伴随发生。同一天，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个由64名民主党人和36名共和党人组成的参议院，以及一个由262名民主党人和175名共和党人组成的众议院，共和党多了2个参议院议席和21个众议院议席。

清点普选票的结果显示，有68 832 818名美国人参加了投票，或者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1.07亿合资格选民中有64.5%参与了投票。这是（投票率最高的爱达荷州是80.7%，最低的密西西比州是25.6%）美国全国选举史上投票人数和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约翰·F·肯尼迪获得34 221 463张普选票（49.7%），比理查德·M·尼克松多出112 881张票（占总票数的0.1%），尼克松获得34 108 582张普选票（49.6%）。13名少数党候选人瓜分了余下的502 773张票（0.7%）。普选票的差距如此细微，事实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伊利诺伊州的4 500名选民和得克萨斯州的28 000名选民改变主意，那这一共32 500张选票就能把这两个州及其51张选举人票归入尼克松囊中，这样就会让他获得选举的多数票，以领先两张的优势胜出，那么这32 500张普选票就会把理查德·M·尼克松推上总统宝座。

分析普选票的意义，首先要从可以精确获得的总体数据出发，然后再分别看各类选票，进行更加细致的推测。这些分类选票能够呈现美国人思想的隐秘处。

当我们把美国各州自然划分为几大类，模糊不清的画面就会显露出大概的轮廓。如果把美国按照地理特点划分为八大地区，你就会发现，在这8个各有特色的地域性社区中，理查德·M·尼克松赢了5个，而约翰·F·肯尼迪只赢了3个。

通过审视这八大地区各自的总票数，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因为这里面

确实有差距，微小，但真实存在。

以农业为主的5个州组合（艾奥瓦州、北达科他州、堪萨斯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最坚定地表达了支持理查德·M·尼克松的意愿。这里，在小镇和旧日美国的文化中，在这片一贯忠于共和党的清教徒宅地上，尼克松以598 362张票的差距领先，获得3 395 088张票中的58.8%。他在散布在落基山脉的8个州组合中（蒙大拿州、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也是大有斩获，以192 313张票的差距领先肯尼迪，获得2 641 593张票中的53.6%。在5个边境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俄克拉何马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差距缩小，尼克松以263 033张票的差距领先，获得5 837 945张票中的52.2%。这些既是传统的民主党票仓，又是热爱《圣经》的清教徒地区，显然宗教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尼克松只在6个州超越了艾森豪威尔1956年的得票率，其中有两个是边境州（田纳西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另外4个都是南方腹地：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的领先优势到了中西部环五大湖的6个工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又进一步缩小，尼克松以462 778张票的差距领先，获得17 607 696张票中的51.3%。这片工业中心地带仍然是共和党最大的优势基地。最后，太平洋沿岸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夏威夷州和阿拉斯加州）的优势最微弱——107 461张票的差距，尼克松获得8 733 361张票中的50.6%。

在这五大地理区域，共和党的优势从太平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逐渐增强，一共让尼克松领先1 623 967张普选票。但是，这都不足以抵消选举人票微妙的放大作用。原因很简单，肯尼迪领先的地方是人口众多的东北部和老南方。

在这3个地区，如预期那样，肯尼迪在新英格兰地区表现最佳。这6个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是美国天主教占比最重的地区，也是肯尼迪的家乡所在地，肯尼迪获得4 977 169张票中的56%，以603 587张票的差距领先，差不多可以比肩尼克松在5个农业州的表现了。老南方的10个州（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在忠诚度上紧随其后，肯尼迪的胜出票数为530 693，他获得8 865 501张票中的52.9%。我们稍后会看到，这次大选中，共和党在这个地区收获最大、最重要。如果早期进行恰当的战略规划，这个地区的收获可能会被放大到足以为尼克松献上一场胜利，让美国政治迎来一场革命。最后，（得益于肯尼迪自己决定的战略），在5个大西洋沿岸中部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

里兰州和特拉华州），肯尼迪的胜出票数为601 570，他获得16 372 790张票中的51.5%。从比例上来看，优势不明显，但在规模和分布上足以让他拿到这个地区的所有105张选举人票。合计下来，肯尼迪在这3个地区的胜出票数是1 735 851，或者说他在正确的地方赢得了不多不少的选票，刚好够他赢得大选，就如他计划的那样。

计划和决策在1960年大选中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一次大选都无法比拟的——算入潜在力量和偶然意外，从而暗藏足够的实力来利用或是应对意外事件，这就是肯尼迪的计划在本质上所达成的效果，这才是绝佳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在近几年的共和党候选人中，理查德·M·尼克松是私下里受亲密竞选伙伴和竞选总部指责最尖锐的那一个，连托马斯·杜威受到的指责都比他轻。两党都遭遇了不可预见的事故，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或者说根本没有战略——让共和党变得最为脆弱。

主观上，我们还可以把1960年大选看作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设想：如果尼克松下定决心，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北方黑人选票还是南方白人选票；如果波多黎各天主教主教早点儿因为无法忍受而介入波多黎各政治，如果尼克松对此加以利用；如果歇斯底里的达拉斯州权拥护者没有在酒店大堂粗暴对待林登和伯德·约翰逊女士；如果艾森豪威尔早点儿助选；如果尼克松在马丁·路德·金被捕的时候像约翰·F·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一样立马采取行动；如果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公民和新抱团的大佬集团能通力合作，事实上他们不能；如果尼克松能坚持最初的电视战略而不恐慌；如果尼克松能坚持霍尔和谢普利最初的前进主题——有无穷无尽的设想可以列举出来。把这些设想串起来，可能会逆转，也可能是巩固肯尼迪领先尼克松的11.2万张普选票。但是有这两位候选人的战略在前，再多的设想串联起来，也不过是泡影。

肯尼迪的第一个战略是一个区域性战略，是在他提名的那个晚上，独自决定的。他觉得新英格兰地区已经完全在掌握之中，他自己要到东北大的工业州拉票，林登·约翰逊就要替他出征老南方。这样的一盘棋的确起作用了。在这9个大州中，肯尼迪拿下了7个：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尼克松只拿下了两个：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肯尼迪在这几个大州投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尼克松要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到全国50个州。最后证明，新英格兰地区确是肯尼迪的囊中之物，而林登·约翰逊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拉动南方选情。如果肯尼迪除了战略构想里的几大州之外只拿下一个州（不过他实际上拿下了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夏威夷州），他也照样能获得多数选举人票。

在这个宏大的区域性战略中，有一个子战略值得点出来，也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0月，肯尼迪决定在大州广阔的郊区地带展开鏖战，过去10年，郊

区一直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他让大城市的政治领袖去巩固大城市里传统的民主党各族群联盟，艾森豪威尔此前已经打入内部，大大削弱了联盟。他自己则到芝加哥、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周边的郊区造势拉票，吸引还在成长阶段的年轻选民，这是他在家乡马萨诸塞州学到的。卢·哈里斯在竞选初期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一个怪异但有趣的事实，不足30%的美国家庭现在送孩子去上大学或大专，不足80%的美国家庭希望在将来能送孩子去上大学。在郊区，肯尼迪从始至终都在强调教育主题，把教育放在一个“我们必须行动”这样一个更大的主题下。那些“年轻夫妇”担心自己的孩子，一定仔细倾听了肯尼迪的讲话。在美国东北部的14个大都市圈郊区，他将民主党的得票率从1956年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时的38%提升到1960年的49%，这些可都是共和党天然的票仓。在东部海岸，他在巴尔的摩和水牛城清教徒郊区的收获和他在纽约和波士顿天主教徒郊区的收获是同一个数量级的。（向西移动，他的得票情况就没那么乐观：在芝加哥郊区的收获平平，在洛杉矶的外围郊区得票情况简直是灾难。由于对加州竞选活动管理失误，他在洛杉矶郊区的得票数明显下降；在全美的重要州里，肯尼迪在这个州的表现远远不如他的竞选搭档。）

不过，肯尼迪战略最奏效的部分来自黑人选票。这让肯尼迪势不可挡。我们一定记得，肯尼迪进入洛杉矶的民主党大会时，所有民主党参选人中，他在黑人中的支持率是最低的，很多北方的黑人政客青睐林登·约翰逊胜过肯尼迪。艰苦卓绝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民权这一块，由才能出众的萨金特·施赖弗和哈里斯·沃福德率领）和旋风般介入马丁·路德·金被捕一事，不仅改变了黑人对他的冷漠，更让他获得了比1956年史蒂文森更高比例的黑人选票（尽管比不上史蒂文森在1952年赢得的大量黑人选票）。在分析黑人选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同，7/10的黑人把票投给了肯尼迪——盖洛普民调预测有70%，IBM的估算是68%。底特律8/9或者更多的黑人把票投给了肯尼迪；芝加哥不断外扩的南边有5个黑人选区，大约4/5的黑人把票投给了肯尼迪。不只是北方的黑人投票支持民主党，南方黑人也是如此，而且南方黑人的选情是一个大逆转。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第35选区，一个典型的黑人选区，民主党的支持率从1956年的36%一跃变成1960年的67%，同样令人震惊的剧情还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一些黑人政治领袖宣称，在不下11个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共计169张选举人票，是黑人社区为肯尼迪献上了胜利的盛宴。这样的说法，就像给想要加速的弄帆人刮来了一阵风，颇值得玩味，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事实如何也不重要。如果黑人选区和辖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水岭没有偏移，维持1956年艾森豪威尔用魅力划分出的势力范围，那么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特拉华州（74张选举人票）还能被民主党拿下吗？这就很难说了。我们自然也会观察到，从10月到11月，人们对

冬天经济下行的温度开始有感知了，一如往常，没有技术的黑人工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先生，”一个芝加哥的黑人在1960年与我讨论投票时说，“他们可以在选票的第一栏放一只狗，如果他们说这只狗是民主党的，我也会把票投给它。民权那档子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让我荷包鼓起来的人才重要。”）

当我们对投票进行分类探讨时，最具争议的一个领域就是：美国人生活中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分化。1960年美国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是如何投票的，没有什么争论的空间，但是我们普遍接受的（有效）数据能说明什么，就值得玩味了。

美国天主教徒大多数都把投给了约翰·F·肯尼迪。自一个世纪前爱尔兰人首次踏上纽约和波士顿的土地起，他们就支持民主党。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又转而支持共和党（或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现在重拾往日的投票习惯，他们当中大约3/4或4/5的人把票投给了民主党。这触发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这样投票，究竟是出于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旧习惯的回归。关于1960年天主教徒投票的研究有两个极端，乔治·盖洛普博士（他的调查结果是78%的天主教徒把票投给了肯尼迪，不同的社会层次支持率不同，最低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富裕的天主教徒，他们对肯尼迪的支持率是65%，最高的较贫穷的、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天主教徒，他们对肯尼迪的支持率是83%）和IBM电脑数据；电脑数据显示，只有61%的天主教徒把票投给了肯尼迪。有一点应该注意，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投票习惯都一样。对他们来说，过去有很多条线，有些时候这些线会纠缠在一起。意大利裔天主教徒（大多数分析师都认同）中对肯尼迪的支持率是70%，波兰裔天主教徒中的支持率大约是68%。至于在肯尼迪同宗同源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中，肯尼迪坚守或者赢回的支持率是有争议的——IBM电脑数据显示可以确认身份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中68%投给了肯尼迪，而肯尼迪的员工则感叹很多地区（比如新泽西州哈德孙县）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支持率远低于预期，危及附近州的选情。

在美国天主教徒这棵大树上有不同分支，其中德国裔天主教徒的表现最耐人寻味。他们的投票情况可以单独拿来分析，估计是一半支持肯尼迪，一半支持尼克松。从德国裔天主教徒的投票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两股不同的历史力量在拉扯着选民：作为一名德国裔美国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党候选人，民主党两次把美国拖入与德国的战争；而作为一名美国天主教徒，他看到的是一个天主教徒候选人，与他一样，迄今都是遭排挤的少数族裔。这两股历史的压力相互碰撞。

在1960年投票中，最能呈现他们的冲突之地也许就是威斯康星州。在威斯康星州，记者会提及“10个天主教县”——指的就是在1928年投票支持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竞选总统的那10个县。1938年，他们又投票支持本州给教

区学校巴士提供援助。这些县里有大量德国裔天主教徒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汉弗莱和肯尼迪的春季初选竞争中，这10个县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肯尼迪，似乎在证明，在两个民主党参选人之间，他们青睐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在11月大选中，当一个共和党人（清教徒）和一个民主党人（天主教徒）摆在他们面前时，宗教和政治纠缠在一起，他们就被撕裂了——一半支持尼克松，一半支持肯尼迪。

毫无疑问，数百万的美国人，无论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在1960年，大多都是凭直觉、亲缘关系和历史过往来投票。

我们在探究俄克拉何马州、田纳西州、犹他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俄勒冈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或威斯康星州的投票结果分布时，不难发现，在某些县和选区，数百万清教徒还是无法忍受一个天主教徒入住白宫的想法。同样，我们在研究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新英格兰地区的结果时，也很容易发现，同样有数百万的美国人盲目地把票投给肯尼迪，只是因为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有一个县可以无比清晰地呈现出这两种偏执倾向缠斗的画面，那就是肯塔基州的纳尔逊县。在那里，4个以浸礼会基督徒为主的选区投给肯尼迪599票（35%），投给尼克松1 095票（65%）；而同一个县的5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选区投给肯尼迪1 285票（88%），投给尼克松174票（12%）。我们还可以看看费城的3个以爱尔兰裔为主的选区（如果想要进一步分析投票分布），过去这里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一贯维持在53%，但是1960年，70%的选民支持肯尼迪。如果还想进一步探究，可以再看看一个鲜明对比的例子，那就是蒙大拿州的新阿姆斯特丹，1958年以287比34票支持民主党籍清教徒李·梅特卡夫（Lee Metcalf）当选国会议员，但是1960年，他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当地舆论界指责他是“天主教党”候选人，以260比40票反对他当选。

总之，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天主教徒把票投给了肯尼迪。由于历史的缘故，他们大多居住在东北部地区，在这些大州参与投票，是最有价值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依肯尼迪的计划行事——把精力集中在东北部地区的竞选活动，强调民权，保护黑人，培植郊区，提倡一项新的联邦政府援助教育的重要计划。的确，肯尼迪一早就把天主教徒的选票算在自己头上了，但是整体投票情况不是能计划出来的，也不是能动员起来的。即使我们把天主教徒的选票和黑人选票、犹太人选票和郊区选票放在一起看，还是看不清1960年大选的全貌，也无法判断总票数的来源。肯尼迪和他的民主党前辈们一样，不是仅靠美国少数族群联盟选出来的，他的总统职位不是这么简单得来的，他的竞选活动水平再高，也规划不出这样的胜利。

从历史角度看，最重要的是，约翰·F·肯尼迪努力去吸引占美国人民绝大多数的清教徒。他逆流而上，让他们相信，不管他们背负着怎样不同的过去和传统走到1960年，在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将共享同一个未来、同一个信

念。

的确，这才是肯尼迪计划中最伟大的胜利。

因为少数族群的支持并不足以支撑肯尼迪的整体胜利。没有哪一项推测或分析会否认，在肯尼迪阵营最后获得的3400万张选票中，支持他的清教徒票数大大超过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票数的总和。据最高估计（IBM），46%的美国清教徒把票投给了约翰·F·肯尼迪，或者说是2250万票，占肯尼迪总得票的2/3。据最低估计（乔治·盖洛普博士），只有38%的美国清教徒投票支持肯尼迪，即使这样，也有1860万票，占3400万总票数的一半以上。即使我们无法断定肯尼迪在清教徒中的支持率，但一定是在最高估值和最低估值之间。所以肯尼迪的胜利是多维的——首先是美国包容性和当代清教徒开明领袖的一场胜利，其次是肯尼迪规划的胜利，最后也是美国无惧无畏精神的胜利。分析了大选得票后，我们不禁又想再次审视两位候选人的战略。

如果尼克松获胜，他只需以艾森豪威尔铺就的“和平与繁荣”为基础前进。这个国家的确处在和平当中，而且在秋末经济下行来临前，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繁荣。要想更上一层楼，他只需要大胆和坚定，给民众描绘蓝图。不管是近期的还是遥远的过去，天平都倒向他。他只要顶住过去的压力，再给未来添点儿料，让所有人都可以去憧憬。但是，在他应该领导大家向前看的时候，他却忙于辩护和反击。他没有给任何少数族群——天主教徒或其他人——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未来蓝图，一个不断前进和延展的美国未来。如果他这样做，也许能赢回少数族群在历史上某个时刻曾经偏向过共和党的心。他给占绝大多数的清教徒许诺的是没有恐惧的宗教世界，这很好，但无法抵消肯尼迪从他们内心唤起的情绪。肯尼迪用希望把他们从本能和恐惧的挣扎中解救了出来。

对于肯尼迪来说，问题同样很清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他的问题像是镜子里的影像，是反的。他要让国民对未来产生强烈的期待，才能让数百万美国人抛弃深埋心中但未曾言说的眷恋，对过去的眷恋——包括宗教的过去，还有打过南北战争的英裔美国人的自豪，他们建立了美国的工业，清理了平原，却发现他们在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后裔身上没有看到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亚当斯、海伊（Hay）、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斯廷森（Stimson）身上所具有的领袖品质。

70年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F·霍尔（Robert F. Hoare，共和党）在回答一个欧洲人的质询时宣称：“那些在教堂里一心虔诚、做善事的人，那些管理学校系统的人，那些在自己的农场里耕种的人，那些在商店里靠熟练技术干活的人，那些士兵，那些前往战场、一直坚持作战的人，那些偿还了债务、确保我们有充足货币、挽救了国家声誉的人，那些在战争中

拯救了美国、又在和平时期为美国人创造更好生活的人，一般来说，都遵循内心的召唤加入了共和党。而旧时的奴隶主和奴隶监工，酒吧老板，在投票箱动手脚的人，3K党，大城市里的犯罪集团，那些不会读写的人，一般来说，也都因为意气相投，在民主党找到了归宿。”

如果现在你到中西部或纽约北部或新英格兰地区走一走，就会发现，几个世代前的那番话至今仍有共鸣。如果约瑟夫·P·肯尼迪叛离天主教，在他儿子出生的时候，把他送到波士顿科普利广场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Copley Square）受洗成一名圣公会教徒，那么肯尼迪在竞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人们对过去的眷恋，人们在把命运交到新手手中的不安。所以，肯尼迪在绝妙地引用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梭罗和爱默生的话时，都会有意无意地替自己和过去找到共鸣。（有时候跟着他全国跑，那种感觉就像参与了历史上的一段充满逸闻趣事的章节。）他正是从这样的过去出发，激励所有美国人与他一起前进，走向共同的未来。

现在回想起来，他获得的成功，比表面上的细微得票差距要惊人多了。当然，他的面前有整个未来。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像尼克松一样，不做任何挣扎，把大片区域拱手相让。但是，他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政治就是要慢慢引导大众情绪。但是如果没有大灾难降临，例如1932年美国大萧条，或者1945年在德国战场上的失败，你很难触动所有人的神经。1960年，肯尼迪面对的这群人生活在和平与繁荣的时代，问题虽然不断累积，但未来会造成什么危机，现在还不明朗。他坚持要求他们前进，去迎战那些他自己都无法定义的模糊危机，敦促他们把最大的危机——战争与和平——交到他那双未经考验的手中，却从未说明他将如何迎接这一挑战。他能赢得大选，最重要的是，在人心惶惶的这一年，他指出了方向，在日渐暗淡的未来里，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我们还应该对1960年大选中可以辨别出的几股力量做一些观察分析，这些力量将会影响约翰·F·肯尼迪在总统位子上的作为和我们这个时代。

严格按照政治定义来看，最令人震惊的是南方力量的反叛。

理查德·M·尼克松在旧联邦各州收获最大。民主党人认为，在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大选，只有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人格魅力和名声，加上美国人民发自内心对他的喜爱，才能两次把一贯忠于民主党的南方归入共和党麾下。但是尼克松试图在南方至少4个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这些州都输掉了）——提高共和党支持率，超越艾森豪威尔，并且在另外两个州（弗吉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取得和战争

英雄一样的领先优势。总之，在旧联邦的11个州里，尼克松的票数是4 723 981，肯尼迪是5 179 550，尼克松的支持率是47.7%；1952年，艾森豪威尔只获得4 113 525张票，或者说48.1%的支持率；到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获得4 218 468张票，支持率50.5%。（1948年，托马斯·E·杜威只获得1 361 742张票，支持率仅为26.8%。）

你可以争辩说这是风格问题，比起肯尼迪的东部行事风格，尼克松朴素和气的举止对老南方小镇的居民更有吸引力。但是尼克松–共和党阵营得票最有力的地方却在繁华处，在新南方的现代都市：达拉斯、休斯敦、伯明翰、亚特兰大和这些城市的郊区。尼克松1960年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的成功不能被简单看成是小插曲，而应被视为一种趋势，不仅给共和党和民主党高层带来了紧迫的问题，也给国内安宁带来了挑战。

在南方，至少有两股力量在施压。过去12年间，这两股力量相互结合，试图摆脱民主党旧日联盟的束缚。一股力量来自当地民众对机器政治的反感，他们因诚恳地表达出全国人民的心声而备受欢迎；在南方，大城市被小镇政治机器折磨，反感的情绪让成千上万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共和党阵营，以示抗议。另一股力量就是种族间紧张带来的压力——南方白人知道他们和民主党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北方的黑人就会日益加压，想要介入南方事务。

这其中任何一种压力，都会给共和党带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自罗斯福革命启动以来，共和党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遇会不停地搅动共和党人的心思，也只有像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这样超然高尚、对党派政治无感的人才会放任机遇溜走，或者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从支持他的选举人中集结出一支真正的南方共和党部队。

尼克松在南方的成功，证明了共和党的机会是永久有效的，也说明了美国国内政治中最难解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命运似乎在捉弄共和党，他们又受到一个反向的诱惑。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中任何一种压力，笼络南方人心，让他们忠于共和党。他们也可以在南方的新兴城市里，由最高层级的人出面，把郊区白领阶层和商人组织起来，并从中选出领袖；或者利用南方人对种族的普遍恐惧，或者是共和党直接放弃寻求北方黑人选票，让南方忠于共和党。通过第二条路线，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新的三方联盟，这三方分别是中西部农业带、老南方的种族主义者和北方郊区居民，他们想把黑人从自己的生活周边赶走，隔离到旧城中心。

未来4年，美国国内的安定就与共和党领导层的战略决策息息相关了。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党内的戈德华特派和洛克菲勒派从现在起到1964年间会

不停争吵。密密麻麻的争吵中，核心问题就是这个。

对共和党来说，这是机遇，但对新总统来说，这却是问题。既要满足黑人提出的要求，即政府介入南方事务，又不失去他在1960年在旧联邦取得的细微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除非，作为美国大政治家，他能找到方法点拨南方民主党领导人，同时激发北方黑人中最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让他们一起来理性地讨论种族与融合的问题。如果他不这样做，正如1960年选举结果预示的那样，1964年共和党发起绝地反攻时，他会变得不堪一击。

另外，如果把总统选票的结构与国会、地方选举所呈现的两党选票结构加以对比，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肯尼迪是脆弱的。

任何分析家都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把这两部分选票分开对比会发现，虽然此次共和党的候选人是自1936年的阿尔弗雷德·M·兰登（Alfred M. Landon）以来最不得人心的，但共和党作为一个党派不仅守住了阵地，还有所前进。国会投票的全国总数据显示，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获得了全国55%的选票，而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获得45%。但是，如果我们去掉老南方的几个州，因为根本没有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在那里竞选，那么共和党在全美其他地方的投票中累积获得48.8%的选票。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是选票结构有变，那也是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在地方上，他们不只扭转了民主党对至少7个州的州议会两院全盘控制的局面，还增加了对另外6个州州议会的参院或众院的控制。他们多了两名参议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众议院的议员席位增加了21个。

正是国会选举结果把政治前景变得尤为复杂。这些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新手们，他们的基因里自带雷达，通常都能探测到美国政治运动中公众对一项政策的支持度，而在这63名新晋议员的第一次考验中（争论是否要扩大已然很强大的众议院规则委员会），肯尼迪后来发现（1961年2月），这些新手以44比19票反对他。如果说，1960年美国人民选择了一个迫不及待要带领美国前进的人，他们也选择了一个6年来最保守的国会在华盛顿陪伴他。民主党是国会多数党，262名民主党代表中，有101名来自老南方，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在本土问题上是共和党的永久同盟。事实上，美国人选送到华盛顿的国会，虽然民主党是多数党，但总是少了12到20票，让约翰·F·肯尼迪无法有效执政。

总统对国会的控制让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政治王国。我们很容易发现，国会控制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党政府和一个共和党政府造成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说到底，美国这两大党派的理念自古不同，他们的差异很简单，所以

美国人不经思考都能理解。

民主党的理念通常并未言说，但非常清晰，就是政府是行动的工具。这一理念在过去半个世纪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民主党忠诚之士——希望把政府当作新起点的公民团体，希望获得政府保护和拨款的少数群体，陷入困境的劳工团体和农民。他们希望对政府施加影响力，让政府扩大对全国经济的管控；当然也为民主党招来了最庞大的旧部——南方人。失败和占领的记忆让他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是多么强大的行动工具，他们希望在这样的政府内保有否决权。

共和党的理念则大相径庭，形式上很清晰，政治内涵却很晦涩。他们坚信，比起政府，每个公民都应该为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近些年，共和党悲剧的部分原因就是党内的智者没能清晰表达这一理念，去引出一些政治结论或项目。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理念也许能造就一个满怀抱负、动力十足的总统，但是在现代却没有发生。像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共和党总统坐镇白宫，6年间，身边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国会，却仍能轻松自在；如果因为缺乏对国会的控制导致他无法推进重大联邦事务，不仅是对性格的枷锁，也是对理念的折磨。

肯尼迪的性格和政治理念使他认为，他所掌管的政府必须行动，所以对于像他这样的民主党总统，无法行动的感觉令人光火，而1960年的国会选举就要让他尝到这一苦果了。他无法自由或大胆地行动，在每次提出议案或是行动的时候，都要去谈判争取6票或12票来支持他，直到他最终让全国民众都清楚地看到他的目标和领导力，从而迫使国会服从，不然的话，他只能等到1962年选出一个忠于自己的新国会了。

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以及两党在参议院、众议院和州议会赢得或失去的席位，这些原始数据的背后隐藏着其他事实，更加模糊的事实，让我们很难断定，1960年的大选究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还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选举过后，很多观察家认为约翰·F·肯尼迪已经成功重建了罗斯福新政的选民联盟，包括南方白人、城市、工会和少数族裔。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很难成立，反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旧日罗斯福的选民联盟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来，有两股力量将会永久地破坏旧日联盟。

如我们所见，一股力量就是南方人对民主党联盟的日渐不满，很多南方人渴望在维护州权的共和党内找到归属，那些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日渐疏远

民主党，导致民主党沦为众议院表面上的多数党。从这里就能看出，他们已经抛弃了民主党的共同目标。

另一股力量就是公民参与，这是史蒂文森担任民主党领袖多年留下的遗产，这是一个强大但不稳定的因素。史蒂文森对民主党的改变几乎可以比肩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大力宣扬民主党解放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些人一直无法清晰地把自己归入某个行业、某项传统或是某些势力集团。例如，在受史蒂文森影响深远的洛杉矶县，肯尼迪比当地州议会民主党候选人落后20万票。当地政客强调说，这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积极参与的公民对他的吸引力无感，或者说对他在当地结盟感到愤怒，所以排斥他。（事实上，在整个加州，肯尼迪比当地的民主党议会候选人落后100万票。）肯尼迪在纽约州、明尼苏达州或密歇根州这样的地方领先自己的党派，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民众对他的支持最强劲，且与他的竞选目标相契合。

简而言之，罗斯福时代的民主党联盟，只有在民主党占国会代表明显多数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单独来看各个地区的议会选举，少数族裔支持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必须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当这些民主党人出现在华盛顿国会山，作为特别代言人，去敦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或延缓行动，此时却难以达成共识。最终，当这些民主党联盟各群体需要共同选出一个人作为国家领袖时，联盟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自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获得51.7%的普选票）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没有获得过普选票的大多数。1948年，哈里·杜鲁门只获得49.5%的普选票；1960年，约翰·F·肯尼迪获得了49.9%。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多数党总统，约翰·F·肯尼迪必须先重塑起一个多数党——这个任务不简单。

肯尼迪现在领导的民主党被各种地区和国家问题困扰。在他的家乡州马萨诸塞州，他把民主党机器内最得力的年轻人挖走，放到他的竞选团队和后来的联邦政府。虽然1960年大选时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得票大幅胜出，但是共和党还是夺走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和州长的位置。在新泽西州，他在提名战中与州长罗伯特·迈纳的势力全面开战，导致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一分为二。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在春季初选时为了对抗史蒂文森的势力而不得不结成联盟，现在这一联盟要求他表忠心，这很容易毁掉民主党在1958年取得的各项胜利。在纽约州，他将领导的这支民主党队伍令人担忧，[注]纽约州民主党的灾难性局面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却需要他一力扛起责任。

1960年，民主党最好的情况是和共和党平分秋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遭受失败。不管是哪种情况，有一个结论不会改变：1960年的选举是约翰·F·肯尼迪个人的胜利，不是民主党的胜利。老南方的政治已经被种族问题扭曲

得很严重，如果我们把老南方去掉再来看选举，会发现约翰·F·肯尼迪在他取得重大胜利的州领先自己的党派，或者至少齐平，不是落后。民主党之于肯尼迪的总统大位，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呢？在他的领导力背后，是新联盟的诞生还是旧联盟得以巩固，都是他个人的责任。

但是，美国政治就是这样。美国总统的权力太大，以至于不管谁当总统，都是自己设定规则，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对对错的理解，创造新的问题，使之成为美国政治新的出发点。如果你把1960年的投票结果当作最终结果，并且认为这个结果是恒定不变的，那你就等于把这一结果看作罗斯福时代的终结，是对艾森豪威尔的褒奖，是1964年共和党好运的预兆。

但是美国总统有力量去教育美国人民，规划出新的战线。本书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政治体系。攘外必先安内。一个总统如果在国内不得民心，不能拍着胸脯说，他理解美国人民，随时能号召美国人民全力效忠自己，他就无法转身海外，在海外行使美国的权力。富兰克·D·罗斯福比其他总统都更懂得如何在海外运用美国的影响力，因为他知道如何动员国内的人民来支持美国的目标。相反，伍德罗·威尔逊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可与阿德莱·史蒂文森媲美，最后却没能带来持久的和平，就是因为他无法唤起美国的政治体系来追随他。当然，从恰当使用美国的核武器到任命政府官员和法官、分配荣誉和豁免起诉，就要看总统个人如何演绎，这也是对美国总统的考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最懂本国国情的人往往能够在海外将国家影响力发挥到极致。这一法则经久不衰，从恺撒到克列孟梭（Clemenceau）；纵贯东西，从丘吉尔到毛泽东。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政治中暗流涌动。在这个普及通识教育的时代，纷杂多样的力量以奇怪的方式涌动着——在白人和黑人的会面上涌动，在日常对和平与战争的关切中涌动，在自动化和失业中涌动。但是有一个人必须让美国民众清楚地看到这些力量，让他们通过投票来表达心中的渴望。

这个人就是总统。

这是一个独舞的职位。总统今天做出的决定将成为明天的问题。他是制定规则的人。

约翰·F·肯尼迪已经取得了个人的胜利，他必须为下一轮美国政治——很可能是为整个世界——制定规则。

---

1. 见第1章的选举日故事。

2. 第二天肯尼迪就宣布了胡佛和杜勒斯的任命，这是他的首批任命名单。他的理由是这两个职位都太敏感，不能进行跨党派的任命，他希望从

今以后，无论政府有什么变化，这两个职位都能确立为非政治性岗位。

3. 见附录1中全国大选中各州票数分布。我在这里使用的是美联社报道的最终官方数据。

4. 纽约州民主党的困境是埃夫里尔·哈里曼留下的遗产，也是美国政治权力研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项内容。15年来，论起在全球最大限度地行使美国权力，无人能超越埃夫里尔·哈里曼。他优雅而绝妙地向丘吉尔、斯大林、戴高乐、阿登纳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阐述了美国力量，而且从他早年对外交政策副手的选择也能看出他的直觉精准完美，他挑选了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和米尔顿·卡茨（Milton Katz）。但是一旦面对美国国内的权力体系，他似乎失去了理解能力。1958年他在纽约州带领民主党的表现不仅摧毁了民主党政治机器和积极参与的公民的骄傲和荣耀，可能也会让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无法有效管治纽约州。

第15章

白宫的视角

在1950年去世前不久，伟大的亨利·L·斯廷森被问到，在那么多他熟识的总统中，谁是最好的。我听到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斯廷森想了一两分钟，因为在美国历史中，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半个世纪，他比同时代的人熟知更多总统，或者替更多总统做过重要的工作，包括民主党籍和共和党籍，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塔夫脱、威尔逊、柯立芝、胡佛、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思考后，斯廷森这样回答他的朋友：

> 如果“最好的总统”指的是最高效的总统，答案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塔夫脱统领下，内阁有序会面，按照会议议程讨论各项事务，责任明确指派到人，当大家在内阁会议桌边起身，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向谁报告。是的，塔夫脱绝对是最高效的总统。但是，斯廷森继续说，如果“最好的总统”指的是“最伟大的总统”，那答案铁定不同。毫无疑问，他姓罗斯福，但他不确定名字应该是西奥多还是富兰克林。如你所见，这两位绅士不仅知道如何运用权力，还懂得享受权力。这一点很重要。

一个人是被权力所累还是享受权力，是被责任束缚住还是从责任中得到释放，是被外人或外力驱使着前进还是主动前进——这是领导力的精髓所在。

早在1960年成为总统之前，约翰·F·肯尼迪就深谙美国领导人的特质。他从小就听家人讲述关于美国领导人各式各样的传奇、趣事、歌曲、交易和权力。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他听说了波士顿选区、马萨诸塞州各区、市政厅、国会山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权力，还听说了美国金融和外交金字塔顶端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权力。后来他又有了亲身体验，在学校学习和操纵大众传播，在敌人的炮火下领导和指挥部队，这些都让他品尝到权力的滋味。这些都是他在1960年之前关于权力的认知。1960年，他周旋于搅动美国国内政治的权力掮客和各种权力形态之间，最后了然于心，使之为己所用。这样直接获得权力的体验，让他又有了新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的他越来越坚信，最伟大的领导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属于美国总统。当

今，没有一个候选人像他这样迫切地渴求总统的权力，他慷慨陈词地阐述权力对于他想要领导的民众意味着什么，那种意味深长，那样精确措辞，无人能及。从他参加初选的最早期开始，那还是在积雪尚未消融的春天，他已经喊出了“总统是关键职位”——而他也说到做到了。

和其他人一样，1961年到来的总统之职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总统的职位没有实习，也没有书本或手册可以指导，告诉这个领导世界上最伟大自由民族的人如何运用这无限的力量，也没有对这个职位的指导性分析。比起法律，这个职位更受人之本性和历史压力的约束和限定。

杜鲁门总统的一名个人助理这样告诉我：“一个新总统上台后感到最震惊的是，他的世界不是单一结构。在总统的世界里，下一道命令不代表事情结束。你可以用拳头捶桌子，你可以发火，你可以彻底爆发，然后出去打高尔夫。但你还是要永无止境地去跟踪、柔声安抚、威胁和逼迫，否则最终将一事无成。在华盛顿，有数千人在政府为你工作，每个人都在观察你，等待你，或是猜测你的言外之意，想要拿到你的电话号码。他们能糊弄到你吗？他们会一直这样跟你耗时间吗？当你听到事情还没办成时，你会发火吗？国会也在不停设立新的监管机构，你得雇用或者解聘机构管理者。他们都在考验你。他们有多大的概率能侥幸成功？他们能拿到多大的权限？你想给他们多大的权限？一旦你选择了你的人，你就得留住他们，这就意味着，就算你们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那些对立的意见会永无休止地消耗下去，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将来会非常得力。要想搞定政府，你就得搞定五角大楼，因为五角大楼每年要从整个800亿预算中拿走400亿美元。想控制五角大楼，你还得控制你的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国安顾问。但是如果你不和你的国务卿恳谈一番，你在国防问题上将无从下手，而国务卿也会有自己的主意。你的财政部部长会为了利率上升0.25%与你争论几天，因为这对他很重要，对你，其实也很重要。那些该死的官僚机构——管控他们！那些监管机构已经重要到实际把控整体经济了。如果你不管控它们，谁又来管控它们？结果总统又把授予这些机构的权限拿走，搭进去的全是自己的精力。”

美国总统的权力，无论是宪法规定的还是实际的权力，一直都是令美国政治学者无限着迷的课题。注 到目前为止，仅总统职责的目录就能列出一本书了。总统是三军总指挥，有权力提拔、降职、奖励和惩罚250万陆海空军士兵；他可以调派、启用或是搁置他们。他也是国家立法的总设计师，用自己的否决权监督国会。他有权赦免联邦监狱里关押的超过22 500名囚犯或是给予他们缓刑。他有权任命全部361名联邦法官，上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制定240万联邦雇员的工作规则和任务；他还负责内阁各部门外的40个重要委员会和机构的任命，为此，他要任命200名成员并获参议院批准，另外可以自行任命200名决策成员。他还是首席外交官，

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必须认识海外138个宣称或强烈主张主权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美国驻外大使，还有十几个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和北约。他还负责监督我们的经济、信誉评级、产业关系的和平和谐、商业活力、美国商业和国际贸易环环相扣的关系。他又是美国所有国家公共仪式的最高礼仪官。如果全世界的灭亡比缓慢的投降更有利，他还必须依法独自决定美国的灾难性武器核武器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使用。

依法律或习俗所定的美国总统职责和权力目录是列不完的，因为其中任何一项职责和权力都会衍生出庞大的职能部门，过程非常复杂，即使一个总统花一年的在职时间研究这些职能部门，也无法了解这些部门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总的来说，美国政府的这些职能部门都很杰出。那些长期在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和农业部供职的总统顾问是一支声势浩大的部队，个个才能出众，当危机发生时，就能立即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制定好一切备选方案，除非出现了愚不可及、不可挽回的错误，当然这种情况很罕见。但如果是这样，总统就要承担责任。

但是，区分一流总统和二流总统的不是愚蠢、犯错或危机，而是一个总统有没有能力，凭独立思考，比职能部门和情报人员看得更高、更远、更深，有没有能力察觉并抓住先机。

因国会的法律无法限定未知，习俗也无法预期未知，探索未知才会成就伟大的总统，他们遵守法律但又不拘泥于法律，既是美国人生活中的总统，又是他们的高级牧师。

意志的力量、想象和感知的智慧，把自己的构思套用到政府职能部门和美国政治习俗中——正是这些素质和主动性才决定一个总统将被铭记还是忘却。

当路易斯安纳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这样一个无法拒绝的机会摆在托马斯·杰斐逊面前时，没有法律规定他可以把美国的疆土扩大一倍，他的做法完全是自发的。1861年春天，个别州的居民宣布脱离联邦独立，还占据了南方州为数不多的邮局和要塞，成立了当时只是雏形的南方联邦政府，那时没有法律或宪法的哪一段规定总统必须做什么，但是林肯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并视之为宣战，从而开战。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的时候，19世纪80年代的《反垄断法》已经在册子里躺了近20年无人问津，是他自己给了《反垄断法》生命，从而重塑了美国企业体系。哈里·杜鲁门积极地从1947年春天的一场地中海危机中提炼出新思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行动，离开麻烦重重的希腊和土耳其。这一思路的执行就是马歇尔计划，拯救了欧洲的自由，随后又发展成北约，武装欧洲，捍卫

自由。20年后，当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被人记住，因为“和平与繁荣”而受到拥戴，也许他的政府不应该因为“和平与繁荣”被记住，而应该因为他所提出的倡议被记住——正在改变美国面貌的高速公路项目和正在改变美国战略的固体燃料导弹。

主动的想象力和决断力是伟大领袖的试金石，但是对美国总统而言，实践起来尤为复杂。

因为美国总统不只是众多掌权者中的一个，他还是国家的首席教育家、首席说客和大政治家。他所带领的党派、职能部门，以及最重要的，不那么听话的民众，都必须由他来说服追随自己。

在别的体系中，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要把目光转向其他的时代和地方，看看那里的伟大首领是怎么做的，就会明白，美国总统这个工作复杂得令人望而生畏。我想起美国战后派驻全球各地的使者有很多表现一流，其中有一位就是德国占领区的军事总督，时任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D·克莱（Lucius D. Clay）。在1945—1949年的5年间，他在德国展现了治国奇才。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德国被洗劫一空，百废待兴，德国的传统、意志和荣耀也都随着德国的邪恶军队一起毁灭了。但是，克莱的美式天才在这里熠熠生辉。在他治下，德国建起新的体制，整顿工业，让民众重新投入工作，兴办了全新的出版业，重新编写了学校教科书，新制定法律，重办法院。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卢修斯·克莱的功绩都是光彩夺目。而且，比起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他更应该被视为新德国的缔造者。但是，尽管克莱在那5年的执政表现非常卓越、积极且富有想象力，但是在美国人的定义中，这还不算政治表现。因为克莱将军统领美国占领军，在他的部队和警察监管控制下，德国人民不得自由表达意志。作为一个征服者和军事独裁者，他还可以下令废除货币，以其他货币替代；他可以不受法庭约束对他人施以监禁、判刑或是缓刑；他的手下一旦想到什么主意，只要得到他的批准，就可以强力执行，在德国不得有反抗的声音，他的政府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克莱将军只需下令，无须说服。

但是治理美国的总统要想推行任何事情，首先必须说服。每一任总统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位总统都必须面对他那个时代全新未知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答案和问题都是新鲜的，他还要想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倡议。遗憾的是，这个国家其实并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也不会主动要求，一切只靠总统的直觉去指引。他还要凭本事去说服整个国家去追随自己。这种说服的艺术就是政治，和成功当选总统的那种政治又截然不同。

总统的权力是在喧嚣嘈杂和铿锵战鼓中赢来的，靠的是调动民众的情绪和追溯美国各族群的过去，寻找共鸣。

但是，行使总统权力就必须依托理性和对现实的分析，因为只有总统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能看清现实，其他人，只能靠他的引导，才能看清他所察觉到的现实。

静默，一个人的全然静默，笼罩着这种权力。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静默得像不见底的深谷；不管总统有多少顾问大军，他都要独自坐在那里。

椭圆形办公室直径35英尺，短直径28英尺，墙厚4英寸，宁静又敞亮，和压在办公室主人身上那些不顺心的国家大事显得格外突兀。办公室的大落地窗11英尺5英寸高，阳光倾泻进来，即使是阴天也不会暗。在树叶凋落的冬季，从南边的窗户望出去，总统可以穿透树丛一直看到华盛顿纪念碑，甚至更远的地方。如果想看得更远，探出头，他还能看到纪念碑西边的林肯大理石像，刻画了林肯沉思的样貌。东边的3扇窗户外面就是草坪和玫瑰园。春夏时节，那里繁花似锦。只要总统愿意，他也可以从东边的一扇窗户进出椭圆形办公室，这3扇窗户可以像门一样开关，通往他在白宫中心的住所。

房间的格调和大小一样完美。房间的地上铺着一张巨大的灰绿色地毯，地毯正中织有美国国徽，和同样柔和色调的奶黄色墙面和米色窗帘很和谐。每逢新总统上任，这里的陈设都会进行重新布置，所以肯尼迪上任的时候，房间就有了变动。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房间摆设极为简洁开放，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7英尺长、4英尺宽的深褐色办公桌，艾森豪威尔（自从1902年起所有的总统）就坐在那儿。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在壁炉前放了两个乳白色的流线型沙发，化解了开放的感觉。访客进来坐下，可以近距离和总统对视，也显得比较尊重。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灰色的墙上挂着他喜欢的草地和山的风景油画，现在换成了灰色和蓝色构图的旧海军油画，色调柔和，有点儿褪色，还挂着海军徽章，彰显着这位曾参加过海军的新任总统的品位。总统的办公桌是用旧英国皇家海军的帆船船身木材打造的，橡木材质，办公桌后面的旗帜没变。总统身后是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总统旗帜，他的右边和左边分别是一面美国国旗和总统旗帜。办公室的静默也没变——这个房间几乎是寂静无声的。窗户关上的时候，华盛顿城市的喧嚣，车流经过白宫的嗡嗡声，完全被挡在外面。要知道，这里的窗户是3英寸厚的夹层玻璃，能挡住白宫周围暗杀者的步枪子弹，不过那也得暗杀者能接近视力范围内才行。

这里的权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里没有行色匆匆或嘈杂喧闹，也没有明显的压抑气氛。

但是摆在办公桌上的是一台电话，和总统坐在一起的人通常都会对这台电话感到痴迷，因为在现代美国政治范畴里，这台电话就相当于中世纪政治里的剑或权杖。美国任何层级的政客一说起电话，就好像说起骑士的长矛。我曾经问过一个小政客，为什么亲切但又备受苛责的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还想继续当纽约市长。“啊，”被我问到的人说，“你得理解当市长意味着什么。假设有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外面下着雨，他躺在床上，心情糟糕，这时候他猛然有个想法，他想任命老乔·麦布兰克的儿子为地方法官。所以他拿起床边的电话说，事情要怎么去办，瞬间他的心情又好了。你得了解一个市长手中的权力。”州长对电话也有同样的迷恋。州长们总是很健谈（当他们失去合法权力时，这一点保留得最好），有时他们会突然顿住，情绪波动得厉害，那是因为他们回忆起晚上坐在电话边，那头有一个罪犯在等待被行刑，只有州长从宅邸传到死刑室的声音才能缓期执行或是赦免死刑犯。不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多刻薄，没有一个会对这一刻掉以轻心，毕竟一个人的生死就悬在他从电话里传去的声音中。注

其实在白宫电话的另一头连接的不仅是个人的生与死，缓刑或赦免，还有人类的生死。美国人民的军械库里躺着炸弹和可造成35千兆吨级（大约相当于350亿吨炸药）热核爆炸的炸弹材料。你们对这个数字可能没什么概念。有一种毁灭叫作“地球毁灭”，就是粗略计算了一下，多少吨级热核爆炸会让地球上所有生物因为核毒物污染大气而灭绝。截至1960年底，美国的35千兆吨级的裂变聚变爆炸物是足够造成地球毁灭的1/8分量——足够毁灭2/3的苏联人口，也会招致报复，令2/3的美国人灭亡注。

这一切都系于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办公桌上的那台电话。无论是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还是身在法国罗屈昂库尔（Rocquencourt）总部的北约司令，没有得到总统电话传来的命令，都不得对任何敌人发射美国的任何核武器。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空中都有未公开数量的轰炸机，飞机炸弹舱都填充了足够毁灭至少6个苏联最大城市的核武器，当然也会招致至少6个美国最大城市的灭亡。这些美国的飞机现在就在空中，昼夜不停地发动，它们全副武装，时刻备战；但是没有总统电话从那间静谧房间传来的命令，它们不能飞越北极方向的一定纬度，当然这个范围也是机密。

总统永远也摆脱不了肩上的责任。有两个通信网都连到他那18个按钮的电话上。当然，其中一个是民用通信网，配有白宫操作员。他们受过训练，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要追查到总统想要联络的人；他们掌握了所有秘密、未列入电话目录的号码，他们必须了解总统开始注意的任何一个人的习惯、动向和藏身之处。

另一个通信网就是美国陆军通信兵的网络，在电话机上靠两个彩色按钮区分，一个琥珀色按钮和一个红色按钮。琥珀色按钮是一个连到陆军总机的直线电话，能立刻从总统办公室接通到各内阁成员、关键机构负责人和少数白宫幕僚中的指定成员办公室。红色按钮是“最高戒备”按钮，是一条特殊线路，会对总统的声音进行电子干扰，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类似的按钮解除干扰，就听不懂总统在说什么。另外，总统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琥珀色按钮和红色按钮立刻接通五角大楼作战室的接线总机。从那里，他的声音可以传播到全球。16条“红线”（说是16条，但实际数字不可能公开）从作战室连到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力量中心——美国大陆和海外的轰炸机基地、外国首都和盟友基地。只要总统电话打进来，不管“红线”上的通话多么重要或紧急，总统电话都会插进来，然后总统开始说话。

不管总统身在何处，第二个通信网，也就是军用网会随时跟着他。如果紧急情况下，华盛顿必须立刻疏散，总统要立刻前往一个秘密指挥站，那里也会提前安装军用网，可以直线接通所有事先准备的所有关键机构应急办公室和军事指挥官。如果总统离开白宫度假，或是前往海外进行外事访问或礼节性访问，都是军用通信网先行。美国陆军会提前安装电话线和转接线，让他可以随时下令指挥美国的任何决策。

任何人适应这种权力感都需要时间。但是在记忆中，近些年，在行政部门和司署机构的所有事务中，没有哪一任总统比约翰·F·肯尼迪使用这台电话更频繁、直接和突然，也没有谁像他这样坚持和真诚要求幕僚、将军、内阁部长、驻外大使和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在有紧急问题需要他快速解决时直接打到他的白宫办公室。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他的贴身人员外，没有人敢使用这一特权。他们需要见他时，还是通过他的秘书处，秘书处再等他的电话和指令才安排见面。在椭圆形办公室，那台电话总是很安静——极少或者压根儿没有因为电话打进来而响起。一般都是他要向外发号施令，电话才会振动。

总统的任何一天都像一份日报的头版，总是塞满全世界。对他来说，新闻不仅仅是新闻，还是在报道他的胜利、失败和一大堆无法逃避的问题。这个人的思维必须要在所有美国经验中穿梭。

比如，1961年初冬，约·F·肯尼迪刚上任几个星期的时候，一个典型的星期四是这样的：

早上，秘书汇报他的会见安排和访客名单；中情局汇报世界各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行动和不安分举动。

一天的正式工作开始，肯尼迪先和前总统哈里·S·杜鲁门进行轻松愉快的私人会面，接着是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Atomic Energy Commissioner）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总统私人科学顾问杰尔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以及预算主管戴维·贝尔（David Bell）持续1小时10分钟的重要会议。

随后是即将前往巴黎上任的美国驻北约大使托马斯·芬勒特（Thomas Finletter）的25分钟礼节性拜访；接着是和新任美国驻法大使詹姆斯·加文将军（General James Gavin）的简短会谈，主要是讨论法国、戴高乐和巴黎的问题。然后是和纺织业棉花种植委员会（Cotton Growers Committee on Textiles）的会议，新总统和8个南方人审视美国出口棉花到日本的各环节问题，以及从日本进口美国棉花制造的成品问题。

接下来，总统来到白宫私邸，一个简短的影片介绍他对和平队的看法。与朋友的私人午餐后，总统回到白宫参加两个仪式性会见，一个是与“一战”老兵的司令，另一个是与新任的迷人财长，来自加州的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

其后是最高级别的严肃问题——战争与和平：内阁会议室进行了一场持续1个小时15分钟的漫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雷姆尼策将军（General Lyman Lemnitzer）、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海军上将哈里·D·费尔特（Harry D. Felt）、总统的两名私人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er Rostow）以及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考虑了美国该如何应对共产主义者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最新一轮的渗透行动——东南亚丛林和山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进入混乱的老挝王国。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但却是决定性的一次。在那里能做什么？如果能，应该做吗？问题最险恶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他的决策正确，这次会议会变得无关紧要，在历史中慢慢淡出，但如果决策带来战争，那么，就是美国挑起了战争。

总统的行程从这次承载着终极危险的会议切换到另一场仪式——新任民防国防动员署署长的宣誓就职仪式。另外，这一整天始终穿插着员工汇报——汇报早上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审议他的大规模教育法案的情况，这是对总统实力和目标的一次考验；汇报他的饲料谷物法案在众议院的进展；汇报那天他的住房和城市改造新项目的第一反馈；快速浏览为前一天访问白宫的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准备的纪念相册。接着又是另一场会议，肯尼迪和预算主管戴维·贝尔、国安顾问麦乔治·邦迪、总统私人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以及他的亲密私人顾问特德·索伦森一起讨论科学预算。银器冲泡的咖啡匆匆端进来没多久，总统就继续晚间的工作和仪式了。

在这样的一天结束时，我最后见到他，不禁感到好奇，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是否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他在谈话中放松下来。也许只有在这一天结束时，他才更容易回忆起完整的过去。他先回顾了大选，称之为“奇迹”，而结果确实是奇迹。他回忆个别城市的选情（那个晚上，这些城市的选民悠闲自在，完全不知道老挝的威胁），分析选票，并且把1960年他的票数和1928年阿尔弗雷德·S·史密斯的票数做比较。他对这个国家的变化加以评论。接着，他又谈到理查德·M·尼克松的性格，这是他困惑的地方——他认识的尼克松在私下里说话直爽、掷地有声，为什么在竞选中偏偏那样和美国民众说话？他说他最近浏览了尼克松的竞选演说集，尼克松的风格让他惊愕不已。尼克松为什么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民众说话？一个竞选总统的人必须用谦和的语气。随后，话题又转到国会的问题，以及现在选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国会，还有几小时前，他的饲料谷物法案是如何以7票优势有惊无险地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项目、饲料谷物法案甚至教育法案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那里（他挥了一下手），远在老挝、刚果和非洲。因此，谈话转到他最喜欢的主题之一，领导力，以及在世界各地，什么样的领袖才能带领好自己的人民。他开始如数家珍地报出一些老挝人和刚果人的名字，分析他们的性格，就像6个月前，他也能这样罗列出洛杉矶民主党大会代表团领袖的名字，分析他们的性格。下一个话题是中国，谈到中国对台湾地区明显坚定的态度，以及如何领会中国的思想并与之交流时，他很谨慎小心，一边沉思一边说。接着回到非洲，他一想到在去年前后成立的新国家都还不能被视为共产主义国家，包括几内亚，又变得信心十足。这是个施压的问题，我们一直在互相施压。他简洁轻快地谈论着似乎日渐明朗的全球战略走向。

过了一会儿，我该离开了，他从办公桌边起身。他穿着短袖衬衫，坐在那里的时候，一个膝盖弓着顶住废纸篓。我们站在门边的时候，他似乎还想补充一个观点。在这个安静的椭圆形办公室，他曾经在这个国家的广场和超市做的所有演讲似乎得到了另一个层面的共鸣。他坚持认为，问题就在于惰性。你怎么推动工作？多年来，一个共和党总统身边伴着一个民主党国会。作为反对党，民主党的国会从来不会从国家层面上思考问题。每一位国会议员都是随心所欲地为自己的选区和席位谋划。就算国家处于通缩状态，他们也能与总统抗争，让国家止步不前，袖手旁观。现在民主党的国会要学着重新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国家目标、行动和新事物。你得前进。

他能赢得总统宝座和权力，是因为他曾向美国人承诺了前进。现在他要兑现承诺。他的动作和优雅看起来和候选人时期一样，只是他的眼睛变了，变得很忧郁和阴沉，眼窝深陷，眼角比候选人时期多了很多皱纹。候选人时期，他渴望这个职位，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的了，他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对于60年代的约翰·F·肯尼迪来说，问题会尤其艰难。

正是1960年的氛围，而非其他因素，让约翰·F·肯尼迪能通过政治运作战胜美国人四分五裂的过去。也正是这样的氛围，和其他因素一样，定义了他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时代的独特性。

1960年是一个举国关注的年份，但是关注的问题又模糊不清、无迹可寻、变化多端、难以定义。这一年，美国国会第一次认为，是时候就国家目标举行正式听证会；这一年，卸任美国总统认为，可以把一份他精心定义国家目标的官方文件作为政治遗产留给新任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是一个转折性的政治元年，因为美国最有分量的报纸《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莫斯科的报道，文章说苏联人把自己称为“世界霸主”——迄今只有美国能用的骄傲头衔。这一年，美国人感觉到随着海外各大陆的政治变化，他们周围的世界也在改变。他们知道，自己的世界也将改变。

最重要的，这一年，美国人担忧起自己的身份。在时间和历史的悠悠长河中，英国人、法国人、苏联人、德国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从强大到没落再到强大，无论如何变迁，他们仍然是英国人、法国人、苏联人、德国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但是美国是一个由怀揣希望的欧洲流浪者创造的国家，不是由地理和基因界定，他们是为了追寻共同目标，寻求公平的政府和平等的机会，来到这里。如果其他国家从强大走向衰退，他们的人民身份不变。但是如果美国走向没落，那美国人不过就是其他国家的弃徒和饥民，再无其他身份。

这是1960年竞选的中心问题，也是一个能在没有明显危机的时代显现出来的问题。

没有危机是肯尼迪竞选时面临的问题，也是他当选总统后面临的问题。在大选中，约翰·F·肯尼迪能让足够多的美国人相信，他们那些模糊的担忧合情合理，需要换个党派领袖才能阻止美国走向衰退，人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为了建立强大的美国才来到这片土地。他无法阐述，甚至也没有试着去阐述，将采取何种措施来阻止这股动荡的洪流，阻止别的国家超越美国。他也没有明确说出，他需要欢呼的群众去接受何种牺牲。从历史角度看，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结束了朝鲜战争，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美国经济陷入崩溃之年整顿了经济，为之注入了活力。这些都是鲜活有形的危机，美国人需要并接受了民选领袖的直接领导。

但是约翰·F·肯尼迪在1961年宣誓就职，他将管理的国家没有清晰的危机。这个国家认识到危机，或者至少从选民投票给他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感觉到了危机，但是危机还封闭在时间的子宫里，在胚胎中不安分地膨胀，危

机的面貌仍然不清楚。如果说1960年的选举对新总统有任何要求，那就是为模糊的危机做准备。

但是，他首先要让危机清晰可辨。1961年新总统就职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都不是用是或否能回答的，也无法从两个明确界定的方案中做出选择。

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都要先创造出来。这不仅需要他有惊人的政治创造力，让美国人看到他提出来的问题，更需要非同寻常的智力和洞察力，首先定义这些问题。

作为美国总统来看待这些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很明显，都需要一个全新的思维逻辑。

§教育和知识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教育和资源、勇气、创业精神一样重要，是造就伟大美国的因素。但是知识以几何速度增长，而现有知识体系已经无法支撑它的传播和控制。

一方面，在知识传播上，学习的普及是狭义政治问题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美国需要提高教育规模和质量。但是在教学问题上，狭义政治学里的极端势力相互冲突：极端的天主教徒提出，如果要让他们配合联邦行动，前提是州政府给教会学校提供援助；极端的黑人群体要求政府停止向没有达到种族融合标准的社区发放援助，而标准得由他们来界定。

另一方面，在民主社会如何使用知识和科学也是文明本身的一个问题。“二战”期间，美国的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将科学脑力发挥到极致，并服务于国家目标，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比肩。但是这样卓越的临时工作在战后被抛弃了，大手笔的科学支持政策沦为一个难以管理的体系。单靠联邦政府的慷慨支持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据大部分科学家称，1960年大手笔的联邦拨款（纯基础研究的拨款是7.5亿美元，所有研发拨款是80亿美元）远超他们的需要。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责任和方向的问题。谁来评判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和智者如何与政治当局打交道？他们怎样才能免于烦琐的行政纠葛，不遗余力地搞科研？众多前沿领域如何排出先后次序，谁来决定这个国家应该先探索哪一片前沿阵地？

§短期和长期的共同财富问题又是什么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能否通过30年代的自由主义万应灵药来解决？1933年以来，科技和一代人的发展是否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属性？到了60年代，30年代的自由主义答案是否就像20年代的保守主义传统一样局限？在长远来看，拿虚构的苏联、美国和西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相互比较和竞争，是明智还是

愚蠢？我们是否应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率以超过其他国家，超过某些社会形态要求的离奇增长率，还是应该找到最适合美国国情的增长模式，给予助力？

§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法律法规都已经过时，问题过时，答案自然也是过时的。拿混乱的美国交通来说，法规和时速还承袭自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交通秩序的全面改革？不调整税收，不进行系统性道路建设，不调整时速，不拨款对拥堵的空中交通进行电子划分，货车、铁路、航空公司和私家车之间的竞争也许能得到解决，但是竞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受到陈旧的联邦机器和州法规的合理管控。只有符合国家需求的全新理念，才能对各方加以管控。那么，大前提就是，先把问题准确地提出来。

什么时代对税收还有一个清晰思路？最近也只能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了。而现在，整个联邦税收体系摇摇欲坠，加上关税增长，简直一团糟。只有调整美国人各个生活领域的税收评估，杜绝某些阶层的既有税收特权，才能在修复联邦税收体系的同时，不制造新的不公正问题。一句话，税收需要全盘重新调整。

§美国体系中的宪法问题在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旧宪法的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天才的光芒，但是也有很多内容已经过时。例如，依照联邦宪法，联邦政府如何干预地方政府？如果不加以干预，1960年人口普查中所描述的大都市郊区带的蔓延发展，正在跨越所有的市政、城镇和州界，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当镇、市和州政府在法律范围内都如此无力，中心城市如何得以挽救，才能保留其巨大的文化价值，郊区如何筹措资金，来应对未来不可避免的需求？一个承认阿拉斯加州（22.4万常住人口）和纽约州（1650万常住人口）在参议院享有平等名额的宪法，一个承认夏威夷州（62万常住人口）和加利福尼亚州（1550万常住人口）在参议院享有平等名额的宪法，你认为怎么样呢？

§种族的问题是什么？面对极端白人、极端黑人和极端教条，这个国家虽然努力寻求公平解决种族问题，但在现实中，却显得无能为力。

种族关系问题是国内所有问题中最激烈、最个人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所有思维似乎都被教条束缚了。很显然，美国内部不能再继续分裂为白人和黑人的社会，这两个社会的文化相互独立。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把这两种文化纳入相同标准下。更显然，推进的时候要稳步有序，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评判，把孩子只当作孩子来评判。但是，教条的思维本身又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求，根据肤色把每个孩子送到单一种族的学校，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孩子必须立刻混合在一起上学，不管国家是否做好准备，不管孩子的背景和身心状况是否准备好迎接大融合，似乎所有孩子都必须马

上坐在一起，要么干脆彻底分开。

种族问题只是被教条模糊掉的问题之一。共和民主两党似乎都僵化在教条中，而且，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最有智慧、最有创意的总统就职之时，却恰恰是美国政治创意看起来最贫乏的时期，这简直是种悖论。

总统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冲破所有教条，清晰地提出问题，然后给出答案，等待评判。但是，在所有危险的教条中，诚然，最危险的教条思想已经让外面的世界僵化，美国就被包围在中间。隔海相望的世界里，固化的思想不是倒退了三四十年（当前主流的美国政治思维倒退了三四十年），而是倒退了六七十年，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教条和反共思潮才刚出现。

面对外面的世界，总统必须和那些比他年龄还要大的僵化思想做斗争。他与这些思维想法的博弈，不仅决定着美国人的生死，也攸关全人类的生死。他必须对付海外的精神分裂症领袖——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他们一方面相信人类没有方向的技术思维创造了不可名状的逻辑和不可逆转的辩证法，把决定权更多地放到群众手里，群众才是“历史的引擎”。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必然也知道，技术日益将决定权从群众手中夺走，放到他们自己道德或者不道德的手中。

所以，总统必须下一盘战争与和平的三维象棋，在地图上部署导弹、弹头、潜艇和空降部队。这张地图他看得很清楚，可以分清轻重缓急。但是，敌人也在观察同一张地图，也在权衡轻重缓急，所以他还必须洞察出此刻敌人的心思，猜测他们的部署和动向。如果敌人有误判，那么，总统做出的理性推定也都变成了误判。

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F·肯尼迪坐的总统之位，主要就是一项智力劳动。60年代的战争与和平所需要的勇气和技巧已经升级，不再是从穴居时代到美国P–51战斗机和日本零式战斗机在冲绳上空呼啸作战时代所需要的简单男子气概和技巧。旧时代的勇气和技巧，这位新任美国总统有很多。他是第一个出生于20世纪的美国总统；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战争英雄，参与了最近的一场战争。在那里，任何人的勇气和意志都能得到考验。他在敌军的战火中，凭借勇气和意志，拯救了自己和他的士兵，赢得了尊重。但是，这样的勇气在现代战争中差不多已经过时。也许只有在总统通过电话做出最后决定，是否要拿纽约的灭亡换莫斯科的灭亡、洛杉矶的灭亡换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灭亡、华盛顿的灭亡换北京的灭亡时，这种旧时代的勇气才会体现出来。要改变新棋局的规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脑力。要说服海内外的敌人和朋友抛弃教条，回到现实中与他协商谈判，需要更高超的技巧。

当然，在第35任美国总统就职初期，他会一试，大概只有这一点能得到肯

定了。

我们只能想象到，他从1960年的政治运作中学到了什么，他从一层又一层意志和力量的试炼中获得了什么。我们只能再次回想，在这漫长的一年中，我们第一次在威斯康星州的雪中瞥见这个年轻人时，他看起来还有些荒谬可笑。现在，他坐镇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穿着短袖的衣服，虽然只过去了12个月，他看起来却老了好几岁。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想1960年的大选时，会发现，在黑暗中，他似乎能够识别和区分改变美国的那些强大力量，以及影响这些力量的人。如果这些冰冷的力量对历史的作用力远胜个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通过决策，也可以娴熟地指引这些非人的力量导向良善，或者导向灾难性冲突。设定1960年的竞选路线时，他就相信，如果他能了解影响美国的力量，能够认识、影响和推动这些力量的代言人与他合作，那么，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的权力。一路走来，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独自分辨这些力量背后的领袖，是去征召、惩罚、击败还是赢取——每一次，他又要独自判断，如何用自己的意志和意欲去影响这些领袖。

但是在1960年，在任何时刻，即使是最荒唐的时候，他也从不相信，人类无力提出新的问题，无力制定新的规则，或者在“历史的引擎”碾压过来时，个人是无助的。他似乎总是带着一种信念，人类是力量的主宰，似乎只要一个人目标坚定、思路清晰，万事皆有可能，包括总统之位。

这也许就是他在1960年习得的精粹——尽管他称自己的胜利是一个“奇迹”。这就是他在白宫将独自珍藏的宝藏，这个不耐烦的世界在等待着白宫的奇迹。

---

1. 要想罗列出近期出版的所有关于总统和总统权力的重要书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几本最出色的：《美国总统》（*The American President*），悉尼·B·海曼（Sydney B. Hyman）著；《总统的职责：危机与重建》（*The Presidency: Crisis and Regeneration*），赫尔曼·芬纳（Professor Herman Finer）著；《美国总统的职责》（*The American Presidency*），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著；《总统的权力》（*Presidential Power*），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Richard E. Neustadt）著。

2. 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掌权时是另一种做派，他不允许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放置电话。

3. 据我所知，当代探讨美国拥有的毁灭性力量和军备控制的最佳作品是亚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所著的《国家安全和军备控制》（*The*

Nation's Safety and Arms Control），维京出版社出版。

附录1

1960年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统计

[illegible]

以上表格重现了美联社1960年12月17日报道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的最终“官方”统计表。

美国总统大选“官方”统计表总是很神秘，尤其是在这样投票结果很接近的选举中，神秘感更浓重。因为在美国是由各个州来统计和汇报投票结果，而不是联邦政府，所以第一份全国性的统计表通常是由非官方的报道群体制作的。这些非官方的“官方”统计表一般相差无几，但是最后的总计数字会出现分歧。

本书通篇使用的都是上述美联社1960年12月17日的统计表。

但是，为准确起见，应该指出的是，在美联社制作统计表的期间，夏威夷的重新计票还在进行，而重新计票的结果改变了夏威夷的票数，从尼克松以92 403票领先肯尼迪的92 342票（如上页表所示）转为肯尼迪以92 410票领先尼克松的92 295票。所以，以上表格也许应该显示为总计68 832

778名美国人参与总统大选投票，肯尼迪获得34 221 531票，尼克松获得34 108 474票；肯尼迪领先113 057票。

因为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最终“官方”数字出炉前就送交出版社了，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我通篇都使用了美联社12月17日的数据。目前还没有研究给出一份1960年大选的一致总计票数。高度可靠的《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断定肯尼迪领先111 803票。同样可靠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官方总结中将肯尼迪的优势定为112 801票。我调整后的数据显示肯尼迪领先113 057票。正巧在5月初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交到出版社的时候，另一份总计表公布了，这次是众议院文员发布的“半官方的官方”统计表，显示总票数为68 836 385，肯尼迪领先119 450票。除非联邦政府成立一个官方的计票机构，否则这些数据差异会一直令专家和民众困惑下去。研究美国投票的学者大都使用政府事务研究所在理查德·M·斯卡蒙（Richard M. Scammon）的带领下准备的投票汇编作为标准。斯卡蒙的研究（《美国投票》（*America Votes*）非常出色，但是1960年大选时还没得到应用。现在肯尼迪政府任命斯卡蒙为人口普查局局长，也是希望官方或者非官方的人口普查都能有助于精准统计全国投票。

作者也应该向读者推荐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研究和他们关于1960年大选的总结《1960年选举》（*The 1960 Elections*）。经过这些年，我发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研究人员是华盛顿的最佳数据来源，能快速提供准确的统计表和投票结果分析。共和党高层大力支持华盛顿的优秀研究人员，竟然很少留意他们的研究员，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里充斥着热衷政治的人，但他们配备的研究人员和资源竟然如此简单老旧，真是令人意外。

美联社注意到投票中的古怪事情还有：

亚拉巴马州——选举人是作为个人而不是团体投票，造成选票分裂，无法断定确切总票数。肯尼迪在亚拉巴马州获得的318 303票仅仅是宣誓效忠民意支持肯尼迪的选举人得票数。而拒绝向肯尼迪宣誓的民主党选举人获得324 050票。亚拉巴马州的11名民主党选举人中有6名拒绝宣誓，后来把票投给了参议员哈里·F·伯德。注

密西西比州——全部8张选举人票都落入拒绝宣誓的民主党选举人手中，他们后来达成一致支持参议员伯德。他们共获得116 248票。支持肯尼迪的选举人得票排名第二，尼克松第三。

纽约州——肯尼迪的总得票数包括自由党的406 176票。

---

1. 一般而言，当选的选举人会宣誓效忠民意，将自己的一票投给本州选

民青睐的候选人。但1960年大选中，亚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两州的民主党组织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抵制该党候选人肯尼迪主张的种族平等，而开出了包括许多拒绝向肯尼迪宣誓者在内的选举人名单。民主党在这两个州获胜后，两州19名选举人里只有5名在最后填票时选择了肯尼迪，其余则投给了支持种族隔离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德。——译者注

附录2

洛克菲勒州长在纽约发表的声明文本

纽约州奥尔巴尼市行政会议厅

（1960年7月23日星期六）

今天，副总统和我在我纽约市的家里进行了会面。

本次会面应副总统的要求举行。

会面的目的是讨论共和党纲领。会议期间，我们与珀西主席以及其他纲领委员会成员通过电话交流了意见。副总统与我就以下外交政策和国防的具体和基本立场达成一致，如下：

1. 共产主义的活力和竞争力与日俱增，这就要求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采取新的意义深远的努力和行动。

2. 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新的政治创造力，在自由世界的所有重要地区，领导和鼓舞强大联盟的成立，去应付现代社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当立刻在北大西洋共同体和西半球领导这种联盟的成立。

3. 在裁军领域，我们应该：

（1）大力探索更好的侦测方法；

（2）在这样的氛围中中止核武器试验；

（3）如果侦测方法可行，中止其他试验；并且

（4）立刻重启地下核试验，旨在提高侦测方法。

4. 在国防方面，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苏联威胁日益紧逼，我们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因为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幸存下来的事实并不能保证我们以同样的军事态势也能平安度过60年代。

5. 20世纪60年代有两件事刻不容缓：

（1）强大的二次核打击能力——一种核反击能力，既能在突然袭击的洗礼下幸存下来，也能对任何侵略者发起毁灭性惩罚。

（2）现代、灵活和均衡的军事编制，旗下部队能够威慑或是应对任何对本土的侵略。

6. 这些刻不容缓的事情需要：提高轰炸机数量和性能，加强空中警戒，加速导弹和北极星潜艇的生产，加快基地部署和巩固，实现地面部队装备的全面现代化和强化民防计划。

7. 美国必须增加开支以全面落实加强国防态势的计划，美国也负担得起。美国安全没有预算上限。

副总统和我还就以下国内事务的具体立场达成协议：

1. 我们的政府必须整顿，尤其要在关键决策过程中支持总统，以有效处理现代问题和挑战。具体要求：

（1）设立一个职位，在整个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领域帮助总统；

（2）设立一个职位，在国内事务计划和管理上帮助总统；

（3）整顿国防计划和指挥，在总统领导下统一原则和前进方向。

2. 出台刺激自由企业制度的政策和项目，尽快提高经济增长率，以便于我们应对国防开支、社会需求和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对更高生活标准的要求。正如副总统在1958年的演讲中所指出的，实现5%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令我们在1962年实现新增100亿美元税收。

3. 依据现实情况调整农场项目的方向：

（1）找到方法激励低收入农民提高生产率，加入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2）至少将保育休耕提高一倍；

（3）针对具体产品出台相匹配的最优价格支持，以扩大市场，放松生产控制，帮助农民获得公平合理的收入；

（4）通过更大规模的“粮食换和平”计划和划拨一部分库存用于民防储备物资来加速处理剩余库存。

4. 在我们的民权计划之下，确保采取积极行动消除美国生活各领域残存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现象，包括投票、住房、学校和就业领域。我们的计划将支持静坐示威者的目标，也将统筹安排部分商人发起的行动，他们摒弃了过去拒绝在便餐柜台给黑人顾客提供服务的行径，我们将敦促所有其他商家向他们学习。

5. 我们的老年人医保计划将通过自缴保费制度来提供有稳健财政基础的保险，受益人有权购买私人医保。

6. 我们的劳工计划重申了将会努力支持和加强自由集体谈判进程，并将为危及国家福利制度的争议提供更完善的解决流程。

7. 我们的教育计划将会满足紧迫的教育需求，要求联邦政府依据学校的财政需求、按照公平分配的法则立即为学校提供大额财政补助金用于学校建设，各州政府相应提供配套资金。我们的计划中还有针对高等教育出台的措施，为教室和实验室这样的学校建筑提供财政补助金，扩大宿舍贷款项目，扩大学生贷款和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出台一项联邦奖学金项目，奖励最有能力的大学生。

这些就是我一直为之奋斗的基本立场。

如果它们在共和党纲领中得以体现，并获得大会通过，我将会满怀自豪与激情地支持这份纲领。

附录3

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对大休斯敦部长协会就政教分离发表的讲话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1960年9月12日）

非常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尽管所谓宗教问题是今晚理所当然的主要话题，但我想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在1960年的选举中还有许多重大问题要面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迄今已经侵蚀到距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处；那些不再尊重我们权力的人对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的侮辱性对待；我在西弗吉尼亚州见到的饥饿儿童；付不起医疗费的老人；被迫放弃其农场的家庭；一个有太多贫民窟和太少学校的美国；以及一个迟迟不能涉足月球和外太空的美国。

这些都是可能左右本届竞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都不是宗教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无知和绝望并不知道什么是宗教壁垒。

但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而从未有过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所以本届竞选中的实际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这在某些更不负责任的地区或许是有意为之。因此，我显然有必要再次说明，问题不在于我信仰哪种宗教（因为这应该只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性），而在于我信任哪种美国。

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政教绝对分离；应当是没有天主教教长会告诉总统（如果总统是天主教徒）如何行动，也没有新教牧师会告诉其教民选举

谁；应当是没有教会或教会学校得到任何公共资金或政治性优惠；应当是没有人仅仅因为其宗教信仰不同于对其有任命权的总统或不同于对其有选择权的人而被拒绝担任公职。

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在公务上既非天主教，非新教，也非犹太教；应当是没有公务人员就公共政策请示罗马教皇、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或任何其他神职机构，或者接受其指示；应当是没有宗教团体试图将其意志直接或间接地强加于广大民众或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应当是宗教自由不可分割，即：违背一种宗教的行为当视为违背所有宗教的行为。

尽管今年的怀疑对象可能是天主教徒，但其他年份的怀疑对象则曾经是犹太教徒，或者是贵格教徒、唯一神派教徒或浸礼教徒，而且可能有朝一日再来一次。例如，是弗吉尼亚州的浸礼教传教士骚乱催生了杰斐逊区的宗教自由法案。今天我可能是受害者，而明天的受害者就可能是你，如此轮回，直到我们和谐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巨大的民族劫难中四分五裂。

最后，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宗教排他现象有朝一日会终结；应当是平等对待所有人和所有宗教；应当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某宗教；应当是没有拥护天主教的投票，没有反对天主教的投票，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集团投票；应当是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包括普通信徒和牧师级信徒）摒弃过去往往妨碍其工作的那种鄙视和分裂的态度，转而弘扬美国的兄弟情谊理念。

这就是我所信任的那种美国。这代表着我所信任的那种总统职务，这一重要职务必须是既不会因充当任一宗教集团的工具而蒙受耻辱，也不会因擅自阻止任一宗教团体的成员担任该职务而黯然失色。我信任的总统应当是，其宗教观点是他自己的私人事务，他既不会将其宗教观点强加于国家，也不会作为任职的条件接受国家强加给他的宗教观点。

我不会拥护暗中破坏《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保证宗教自由之规定的总统。我们的制衡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我也不会拥护那些通过以宗教作为任职检验标准（即便是以间接方式）来暗中破坏《宪法》第六条的人。他们如果不同意这种保护法案，就应当站出来公开争取将其废除。

我想要的总统，应当是其公务行为对所有团体负责却不对任何团体承担义务，应当是可以出席与其职位相适应的任何仪式、礼拜或宴会，应当是其总统就职誓言的履行不受任何宗教宣誓、礼仪或义务的限制或左右。

这就是我所信任的那种美国，就是我在南太平洋为之战斗的那种美国，就

是我的兄弟在欧洲为之牺牲的那种美国。当时，无人提出我们可以有“分裂的忠诚”，无人提出我们“不信仰自由”，也无人提出我们属于不忠诚的团体，而该团体威胁着“我们的前辈为之牺牲的自由”。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前辈为之牺牲的那种美国。他们曾经逃到这里以躲避拒绝劣势宗教成员任职的宗教检验誓言；他们曾经为维护《宪法》《权利法案》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Virginia Statute of Religious Freedom*）而战；他们曾经在我今天访问的圣地阿拉莫（Alamo）战斗。与鲍伊（Bowie）和克罗克特（Crockett）并肩战死的还有麦克卡弗蒂（McCafferty）、贝利、贝地里奥（Bedillio）和凯里（Carey）。但是，无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在阿拉莫没有宗教检验。

今晚，我请你们按照这种传统来评判我。你们的评判可以根据我在国会工作14年的记录，可以根据我反对一位驻梵蒂冈大使的公开立场、反对违反宪法资助教区学校的公开立场以及反对公立学校举行任何联合抵制活动（我自己也参加过这种活动）的公开立场。但是，请不要根据我们大家见过的这些宣传册和出版物来评判我，因为这些宣传册和出版物精心选录了天主教会领导人的陈述，而且这些陈述往往是在外国，大多是在上几个世纪。当然，这些宣传册和出版物总是略去美国主教在1948年所做的声明，因为此声明强烈主张政教分离，并且更贴切地反映几乎每个美国天主教徒的观点。

我认为这些选录内容不会制约我的公务行为。那么，你们又为何以此来评判我呢？但我要说，对于其他国家，我完全反对国家被任何宗教集团（天主教或新教）用来强迫、禁止或骚扰其他任何宗教的自由活动。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同样强烈地谴责那些拒绝新教徒担任总统职务的国家和那些拒绝天主教徒担任总统职务的国家。与其引述那些宗教歧视者的劣行，倒不如引述爱尔兰和法国这类国家的天主教会的记录以及阿登纳和戴高乐这类政治家的独立性。

但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是我个人的观点。与常见报纸的报道方法相反，我不是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恰巧也是天主教徒。我不代表我的教会谈论公共事务，教会也不代表我说话。

作为总统，无论有什么问题出现在我面前，无论是计划生育问题、离婚问题、审查制度问题、赌博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会按照这些观点做出我的决定，都会按照我的良知告诉我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做出决定，而不在乎外部的宗教压力或要求。任何权威或惩罚威胁都不能让我另做决定。

但如果真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不可能对某种冲突做出丝毫让步，而我的

职务要求我在违背良心和违背国家利益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就会辞去总统职务；而且，我希望任何有良心的公务员都会这样做。

但是，我不打算为这些观点而向批评我的人道歉，无论他们是信仰天主教还是信仰新教；我也不打算为了赢得这届选举而否定我的观点或否定我的宗教。

如果我在实际问题上失败了，我将回到我在参议院的位置，并且为我已经尽力而且得到了公正的裁决而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本届选举确定的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其接受洗礼之日失去了成为总统的机会，那么，整个国家都将是输家，在全世界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的眼中是这样，在历史的眼中是这样，在我们自己的人民眼中也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赢得选举，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履行总统就职誓言。或许我可以加一句——这实际上与我在国会14年的誓言完全相同。毫无保留地说，我可以“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地履行美国总统的职务，将尽全力维护、保护和捍卫《宪法》，上帝做证”。